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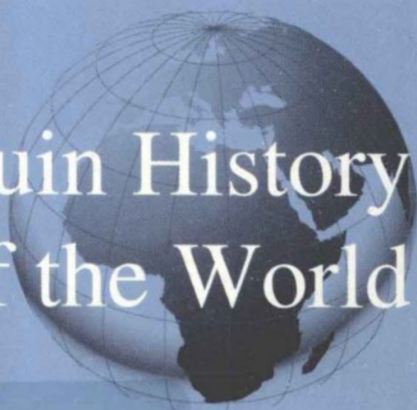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下册

全球史

J.M.罗伯茨 著 陈恒 黄公夏 黎海波等 译



The New Penguin History of the World



中国出版集团

東方出版中心

The New Penguin History
of the World


ISBN 978-7-5473-0611-6

9 787547 306116 >

定价：150.00元(上下册)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 -2009 -73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史/(英)罗伯茨著;陈恒等译.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2013.8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7-5473-0611-6

Ⅰ. ①全… Ⅱ. ①罗… ②陈… Ⅲ. ①世界史—历史
Ⅳ. 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74242 号

责任编辑：欧阳敏
责任印制：尚小平
装帧设计：罗　洪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邮政编码：200336
电　　话：021-62417400
印　　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0 毫米　1/16
印　　张：85.5
字　　数：1170 千
版　　次：201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611-6
定　　价：150.00 元(上下册)

目录 Contents

第六卷 大加速时代 / 763

第七卷 欧洲时代的终结 / 935

第八卷 新纪元 / 1071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世界历史文库　全球史　下
作者=（英）罗伯茨著；陈恒，黄公夏，黎海波译
页数=1347
出版日期=2013.08
SS号=13422311
DX号=000007989249

丛书名=世界历史文库
形态项=1347
ISBN号=7-5473-0611-X
中图法=K107（历史、地理 -> 世界史 -> 通史 -> 研究、考订、评论）
原书价=150.00（上下）
出版社=北京市：东方出版社
主题词=世界史-历史
内容提要=

网址=http://book.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7989249&d=95D0D9FB4E0F383E6D2BF115A55ACF8F&fenlei=11020106

第五卷

欧洲时代的形成

导　　论

公元1500年左右，有很多标志表明世界史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前文已经提到了一部分，其中包括在美洲的新发现和欧洲冒险家在亚洲的初步尝试。从一开始，这些标志就暗示了新时代的两个彼此矛盾的本质——这一时代越来越具备真正的世界史特征；而同时，虽然世上存在大量文明，却独独被一个文明的惊世成功所主宰，那就是欧洲。这两面属于同一进程；所有国家的事件形成了愈发持续和有机的相互关联，但事件的成因大多与欧洲人的所作所为有关。他们最终成为全球的主人，并运用其掌控权（有时是无心插柳）把世界打造成一个整体。趋同性和统一性的不断强化由此成为世界史最近两到三个世纪的主旋律。 547

在一段著名的文字中，英国历史学家麦考利（Macaulay）曾指出，五大湖沿岸的红种人彼此剥下对方的头皮，为一名觊觎其邻国某个省份的欧洲国王的劫掠行径大开方便之门。这就是我们现在必须正视的一段历史中的惊人一面——整个世界逐渐卷入各民族和国家之间一场又一场不断升级的战争中，但政治、帝国构建和军事扩张只是这段历史中的一小部分，全球经济整合是该进程的另一部分；而更重要的是共同的理念和思想的传播。若以我们发明的某个虚伪的短语来表达，其结果是——所谓的"同一个世界"。各文明独立或接近独立的时代已经走

到尽头。

我们的世界拥有极为丰富的多样性，想到这一点，前文的描述给人的第一印象似有误导和夸大之嫌。民族、文化和种族差异所造成和引发的骇人冲突依然没有消停；公元1500年以后数百年的主要历史可以写成一系列战争和暴力斗争史（史书也往往是这般模样），与几个世纪前的祖先相比，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们显然不觉得彼此的相似性有多少提高。然而他们确实比前人（例如10世纪的）更不分彼此，并有数以百计的方式来表现这一点，从外观服饰到谋生手段和社会组织形式莫不如是。下文要讲述的历史，主要由这一变化的起源、范围和局限构成。这一结果来自某个在很多地区依然持续着的进程，我们有时称之为现代化。数百年间，现代化逐步磨去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是世界史走向统一趋势最深刻、最根本的表现。另一种描述这一进程的方式是称之为世界的欧洲化，因为与现代化关莫大焉的观念和技术都源自欧洲。不过，“现代化”是否等同于“欧洲化”（或是现在经常使用的“西方化”）可以留待他人探讨；有时这不过是措辞偏好的问题。一目了然的是，从年代学角度来看，世界史的整合是随着欧洲的现代化开始的。一场欧洲的伟大变革是近现代史的起点。

548

一、新型社会：早期近代欧洲

“近(现)代史”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术语，但并非总是指代同一种对象。过去，近代史曾经包括“古代”史以来发生的一切，犹太人、希腊人和罗马人是其研究的主题。以笔者所处的时代为例，这一概念被用来定义牛津大学的课程，其中包括了中世纪。然后，它又脱离“中世纪”史自成一系。现在往往采用进一步的细分，因为史学家们已经开始发掘其内部的区别，“早期近代”史的说法不时出现。通过这一方式，他们真真切切地让我们注意到一段进程的存在，因为“早期近代”是指一个崭新的大西洋世界从传统主导的、农业的、迷信的和局限于西方基督文明的中世纪崛起的时代。这一进程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段上演，在英国非常迅速，在西班牙直到公元 1800 年还远未完成，而东欧大片地区甚至在一个世纪后依然未受影响。尽管表现出极大的无序性，但该进程显然是真实的，其重要性也确实无疑，因为它打下了欧洲世界霸权的地基。 549

如欲思考其中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以一个简单和明显的真相作为起点不无裨益：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阶段，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都受一个残酷现实的深刻影响——对于如何满足自己和家人的遮风避雨和果腹之需，他们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直到历史近期，世上才有极少数人产生了并非必然如此的念想。而从设想成为数量可观的人生活中的

现实,则又不离开欧洲近代早期的经济变迁,这一变化大部分发生于易北河以西。中世纪欧洲与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一样,依然由某种形态的社会构成,其中,从生产者(农民)手中获取大部分超出消费需求的那部分产出,是通过社会或法律体制,而非市场机制。当我们能够辨识出"近代"欧洲的存在时,这一状况已经改变;榨取和动员那些剩余产能已成为变化无常的"资本主义"(这是我们经常给它贴上的标签)的任务之一,其运作大多通过日趋复杂的市场中的现金交易进行。

550

由于第一次具备了相当充分且连贯的量化数据,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这些变化的轨迹,而这在之前的历史阶段是做不到的。在一个重要的领域,最后四五百年间的历史证据的参考价值大为改观,其统计性大大增强,因此定量分析也更为容易。这些新统计材料往往来源于政府。出于很多理由,政府越来越想要了解他们掌控的资源或潜在资源。但公元 1500 年后的私人记录也给我们带来大量额外的数据资料,尤其是业务记录。随着纸张和印刷的不断普及,这些资料的复本也大大增多,意味着保存下来的概率极大提高。商业的出现导致了对集合数据资料合集出版物的需求,例如船只动向或价格报告。此外,历史学者也精进了研究技巧,可以从哪怕贫乏或零碎的史料中取得极大突破,这在仅仅数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

这一切都大大提升了我们对早期近代欧洲变化规模和形态的了解水平,但必须保持谨慎,既不能夸大这类史料的精确程度,也不能随意以此得出结论。搜集高质量的统计数据长期以来都十分困难。就连相当基本的问题也很难得到准确的答案,例如某特定地区有哪些居民。这一状况直到历史近期才有所改观。准确列出国内的土地明细——这一工作被他们称为地籍测量(cadastral survey),甚或弄清究竟有多少臣民,都被 18 世纪推行改革的君主们视为一项了不起的目标。大不列颠直到 1801 年方才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比《末日审判书》晚了将近八个世纪。法国的首次官方普查到 1876 年才进行,俄罗斯帝国的惟一一次普查也要等到 1897 年。如此姗姗来迟其实算不上真正的意外。进行一次普查或调查需要复杂且可靠的行政机器,而且可能招致强烈

的反对(政府获取新信息后,新的税收往往随之而来)。使这些困难雪上加霜的是,欧洲在近代史大半时期都有大量的文盲人口。

新的统计资料能够解决很多历史问题,同时也能提出很多新问题。它可以揭示出当时使人困惑不解、也更难加以概括的包罗万象的现象,对于 18 世纪的法国农民,自从研究揭示了隐藏在这一单纯名词背后的多样性以来,想作出任何整体性的论述都变得更加困难。也许根本没有法国农民一说,只有若干各异的阶层。最后,对于那些完全看不出前因后果的事实,统计资料也能揭示出其背后的成因。无论如何,从 1500 年起,我们越来越深入一个测算统计的时代,其总体效应在于,比之较早的年代和其他地区,对于当时的欧洲发生了什么,我们更易于得出可论证的观点。

551

人口发展史是最明显的例子。15 世纪末,欧洲人口即将迈入一段一直延续至今的增长期。公元 1500 年以后的人口发展史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个阶段。以大约 18 世纪中期为界,此前的人口增长相对平缓而稳定(除了暂时和地区性的波动),是"近代早期"史的特征之一,该时段也与"近代早期"史基本重合。第二阶段的增长速度大大加快,重大的变化随之产生。只有第一阶段是本章所关注的对象,因为它确立了近代欧洲的成型方式。该阶段的普遍事实和趋势也足够明朗。虽然严重依赖于估算,但这些数值的依据比以往的估测要牢靠得多,部分是因为自 17 世纪早期开始,对人口问题的关注就几乎从未间断。这份关注对 17 世纪末统计学科的奠基(当时称为"政治算术")有所贡献,英格兰是该学科的主要发源地。政治算术确实完成了一些突出的工作,但这就好比是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孤岛,被大量猜测和推导所包围,只有一丁点相对而言比较精确严谨的内容。尽管如此,统计得出的大体布局还是清楚的。公元 1500 年的欧洲有大约 8000 万居民,两个世纪后为1.5 亿不到,到 1800 年达近 2 亿。公元 1750 年以前,欧洲的人口增长率相当稳定,一直到 1700 年前后,其人口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始终保持在五分之一左右,但到了 1800 年,这一比例已经接近四分之一。

因此,显然有很长一段时期,欧洲和其余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并不存

在后来所出现的惊人差距。从中作出以下推断似乎不无合理之处——相比 1800 年以后的状况,欧洲和其他地区在人口问题其他方面上的差别也较小。例如,欧洲人的死亡年龄当时依然普遍较低。公元 1800 年以前的人普遍早夭,因此平均死亡年龄比今日低得多。18 世纪法国农民家庭的新生儿有大约 22 年的预期寿命,只有大约四分之一可以活过婴儿期。这与 1950 年的印度农民或罗马帝国时期的意大利人相差无几。超过 40 岁的人屈指可数,因为饮食比不上现代人,他们在同一年龄下比我们更显老,体型可能更小,气色也更差。和中世纪一样,女性的寿命依然比男性短。也就是说,很多男子再婚甚至三婚并非如今日那样因为离异,而是早年丧偶。欧洲夫妇婚后生活的平均时间相当短暂。以波罗的海到亚得里亚海的连线为大致的分界,西部的婚姻寿命比东部更短,而且西部有晚婚的习俗,往往要到二十好几才首婚,这长期以来都是东西欧人口构成存在差异的成因之一。不过总体而言,家境较好的欧洲人可以供养的家庭规模也较大,穷苦家庭的人口数则较少。以下两点可以通过推论得到强有力的证明,在 17 世纪,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某种限制家庭规模的做法,除了堕胎和杀婴之外,还有其他实现这一限制的手段。要解释这一难以理解的现象,就需要了解更多的文化和经济现实。在一个大多由文盲组成的社会中,有些领域的历史几乎不可能完全搞清,这就是其中之一。关于早期的生育控制状况,我们几乎没有可以确信的资料来源,而至于这一控制手段有没有引发早期近代欧洲人对自身及决定同类生命的做法的反思、又引发了什么样的反思,我们的所知则更少。

就总体而言,人口还反映了农业在经济中的持续主导地位。长期以来,农业产量只比需求略高,只能养活缓慢增长的人口。1500 年的欧洲大陆依然以农村为主体,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当低下。以现代眼光来看,当时那片大陆的人丁非常稀少。英格兰和大陆其他地区相比人口密度较高,但在 1800 年也只有大约今日六分之一的人口;东欧的不少统治者用尽一切手段鼓励移民,急于填补那里巨大的人口空缺。不过城镇规模和人口依然得以增长,其中有几座城镇的发展速度显著

高于人口总体增长速度。阿姆斯特丹的居民数量在18世纪达到20万左右，巴黎的城市规模在公元1500至1700年间可能扩大了一倍，有将近50万人口。这两百年间，伦敦人口从12万左右增长到接近70万，比巴黎更胜一筹；当然，鉴于英国人口总数比法国少得多，这意味着该国的城市化规模也大得多。一个意义重大的英语新词开始被人使用：城郊(suburbs)。但中等及以下规模城镇的情况并不容易概括，大部分都很小，到1700年依然不足两万人，人口超过十万的欧洲城市在1500年只有九座，而两个世纪后至少有12座。这几个世纪中，欧洲的城市化进程并不像后来那样傲视群侪，其他大陆也有很多宏伟的名城。例如，16世纪的墨西哥城以30万的庞大人口居于所有欧洲城市之上。

553

城市化和人口增长的分布都不均衡。那些年间，法国依然是西欧最大的国家，1700年有大约2 100万居民，同期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600万上下。但要进行对比分析并不容易，因为有些区域的人口估算远不如其他区域可靠，边境线的变动时常使人难以确定同一个地名在不同时期究竟指代哪个区域。可以肯定的是，在17世纪的一波天灾人祸下，一些地区的人口增长一度受制，也有可能出现负增长。西班牙、意大利和德意志都在17世纪30年代经受了严重的传染病爆发，还有其他广为人知的地方灾难，例如1665年的伦敦大瘟疫。饥荒是另一个偶尔出现的地区性影响因素；17世纪中期，德意志甚至有人吃人的传闻。农业歉收有可能导致经济萧条，加上营养不良和由此导致的抵抗力低下，很快会酿成灾祸。如果再碰上战争，就会导致十分可怕的后果。而战争在中欧始终随处可见。饥荒和疾病跟随着军队的脚步，可以迅速使一小片地区尸骨累累。这一状况部分反映了经济生活依然高度地方化的事实，据说未被攻打或沦陷的城镇即便处于会战区也可能毫发无伤，而仅仅几英里外的另一个镇子却被夷为平地。在生产力提高的速度超越人口增长之前，欧洲的人口增长始终极不稳定。

在这方面，就和其他很多方面一样，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15世纪中期，农业有恢复元气、重新扩大规模的迹象。其标志之一是14世纪因人口凋零而遭废弃的土地又成为农田。然而在大约公元1550

年以前,这一进展十分有限,也只有少数地区受益。农业发展的影响力长期局限于这些地区,不过,当时已经有了重大的技术改良,通过对劳动力的妥善运用,也就是集约耕作方式,土地的生产力提高了。在没有受此影响的乡村地区,中世纪的往日气息长期萦绕不散。甚至连货币的出现也不能很快打破某些社群近乎自给自足的状态。农奴制在别处走向消亡的同时,却在东欧扩大了规模。不过到 1800 年,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农业是进步最为明显的两大经济领域之一(另一个是商业),若干发达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总体而言,农业提供了足以维持人口持续增长的产量,起初只能支持极为缓慢的增长,但此后不断加快。

市场针对性的逐步提高和技术创新使农业缓慢地发生了变化。农业和人口相互关联,有大量人口的地区往往会形成集市,从而刺激农业发展。甚至早在 15 世纪,低地国家的居民就已经在集约耕作的技术方面领先一步。排水系统的改良也出现在佛兰德斯,带来了更好的牧场和更高的畜牧业产量。另一个城镇人口相对较多的地区是意大利北部的波河流域,而那里有从亚洲引入欧洲的新作物。例如,作为欧洲人饮食的一种重要补充,稻米就出现于 15 世纪的阿尔诺(Arno)河与波河流域。另一方面,并非所有的作物都能立刻获得成功。尽管营养价值明显,还有很多民俗故事吹嘘马铃薯有催情的功效,是治疗肉疣的良药,但直到大约两个世纪后,这种从美洲传入欧洲的作物才成为英格兰、德意志和法国的寻常菜色。

低地国家的农业改良于 16 世纪传播到英格兰东部,并在那里缓慢地得到进一步完善。17 世纪,伦敦成为玉米出口港,下个世纪,大陆本土的欧洲人来到英格兰学习这种作物的种植方法。18 世纪还见证了畜牧和养殖业的进步。此类改进使人们对之前不可想象的高产作物和优质家畜习以为常。农村的景致和农民的外表都发生了转变。农业是科学(哪怕只是初级科学)力量最早的展示,表明通过实验、观察、记录和再次实验的方法,能够比习俗的选择作用更迅速地提高人类对环境的控制力。这些改良使得人们青睐于土地重组、形成更大的农场,减少

小农数量（只有特别有利于小农式种植的土地例外），采用有偿劳力，为建筑、排水和机械投入高额资金。但我们决不能夸大变化的速度。英格兰变化速度的标志之一是"圈地"的进展情况，即传统英式村庄的开阔地和公用土地被兼并作私用的现象。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才开始频繁而大量地出现授权此类行为的议会法案。农业完全融入市场经济、土地被当作和其他商品别无不同的单纯商品来对待，这一切要等到19世纪才发生，哪怕在大洋彼岸的玉米田投产之前一直领跑全球农业的英格兰也一样。不过，通往前方的道路在18世纪已经浮现端倪。

555

更高的农业生产力最终消除了物资匮乏的积弊，这种匮乏长久以来都具有毁灭人口发展的力量。16世纪末也许是欧洲人口最后一次表现出对资源的压力、乃至于让14世纪那样的大灾难仿佛近在眼前的时刻。在下个世纪中期的战乱中，英格兰和尼德兰都避免了最糟糕的情况。此后，虽然必须承认，饥荒和物资不足依然能够在欧洲某地或某国造成大规模的人口损失，但谷物进口量的不断增多还是使其逐渐却步。前文提到，歉收令1708至1709年的法国成为"一家大医院"，但当时是战争期间。同一世纪后期，一些地中海国家开始依靠波罗的海地区提供面粉和玉米。不过事实上，进口成为一种可靠的物资来源还要等很久；这一手段往往不能很快奏效，特别是需要走陆地运输的情况下。甚至到19世纪，法国和德国部分地区依然受物资匮乏的折磨，18世纪的法国人口增长速度快于生产，因此当时很多法国人的生活标准实际上有所跌落。不过，对英国农村劳动者而言，有几个世纪堪称后世回忆中的黄金时代，餐桌上总有够饱的小麦面包甚至肉类。

16世纪晚期，可以隐约感受到日益扩大的人口规模对增长缓慢的资源所形成的压力，鼓励移民是应对这种压力的手段之一。截至1800年，为了向海外土地输送人力，欧洲人做了大量的工作。1751年，一名北美人认为这片大陆有100万英国血统的人；现代计算得出，17世纪有大约25万英国移民前往新大陆，下个世纪又增加了150万。当时还

有大约 20 万德国人和一些法国人在加拿大生活。我们有理由认为,到 1800 年,差不多有 200 万欧洲人抵达美洲格兰德河以北地区,还有大约 10 万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该河以南。

对家乡粮食不足的恐惧推动了这场大移民潮的形成,反映了农业始终是经济生活中占首位的考虑对象。三个世纪中,欧洲经济所有主要领域的结构和规模都发生了重大改变,但在 1800 年,就连法国和英国也依然被农业所主导,尽管这两个西方最大的国家在商业和制造业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一事实,就像 1500 年时一样千真万确。而且,完全脱离农业的工业人口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少之又少。酿酒工、织布工和印染工都依赖农业,同时,很多耕地务农的人也纺纱、织布或从事市场上的买卖。除了农业,只有贸易领域向我们展现了决定性的变化。从 15 世纪后半叶以来,该行业的运转节奏开始明显加快。欧洲当时重新获得某种始现于 13 世纪的商业活力,并表现在规模、技术和动向上。而这再一次与城镇的发展有关。城镇需要专业人才,也为他们提供了生计。中世纪的大型展销会和市集延续下来,中世纪高利贷法和行会的限制性措施也一样。然而,一个全新的贸易世界在公元 1800 年以前已经成为现实。

556

在 16 世纪就已经可以察觉到贸易领域的新气象,当时,世界贸易刚刚步入漫长的扩张阶段,除了短暂的战争时期,实质上这一扩张从未中断,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世界大战爆发,然后又重新恢复发展。贸易扩张的开端始于经济重心进一步从欧洲南部向西北部、从地中海向大西洋区域转移,这一点前文已有评述。其推动因素之一是政治动荡和战争,例如 16 世纪早期使意大利生灵涂炭的战乱;[①]其他因素包括小而短暂但起到关键作用的压力,例如同一时期葡萄牙人对犹太人的迫害,导致大量身怀商业技术的犹太人离开该国前往低地国家。16 世纪的安特卫普写下了一段伟大的商业传奇,不过在数十年后的政

① 1494－1559 年间的数起发生在意大利的战争,统称大意大利战争,又称哈布斯堡-瓦卢瓦王朝战争。——译者注

治和经济灾难中走向崩溃。阿姆斯特丹和伦敦于17世纪后来居上。贸易对这三座城市的崛起都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些贸易依托于人丁兴旺的内陆，提供了使制造业、服务业和银行业实现多样化的利润。佛兰德斯首先取代了中世纪意大利诸城在银行业中的古老统治地位，然后是16世纪的德意志银行家，最后是荷兰和伦敦。阿姆斯特丹银行，甚至直到1694年才成立的英格兰银行，都很快成为国际经济中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以它们为中心，还聚集起一批从事信贷及金融业务的其他银行和商会。利率开始走低，中世纪问世的汇票获得极大普及，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主要金融票据。

从那时开始，纸币逐渐进入流通领域，取代了金银。18世纪出现了欧洲最早的纸质货币，支票也于同一时期问世。股份公司造就了另一种可流转证券，即公司的股票。伦敦证券交易所成立，取代了17世纪提供股票报价的伦敦咖啡馆。到1800年，很多其他国家也有了类似的机构。新的资本筹措和配置项目在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彩票和养老储金会一度风靡；一些风险投机项目也大行其道，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英国南海“泡沫”。[①] 但世界无时无刻不在朝更商业化的方向发展，更习惯于以财生财的观念，并以现代资本主义武装自己。

557

这一趋势的效应很快出现在17世纪后期的外交谈判中，各国不仅对贸易问题投入了极大的关注，更不惜为之一战。英国和荷兰在1652年因贸易纠纷开启战端，拉开一个漫长时代的序幕。这两国以及法国和西班牙一再发生摩擦，贸易问题往往是争议的重中之重，至少也具有重要地位。

政府不仅以战争的方式维护商人的利益，而且还以其他方式干涉贸易经济的运作。有时政府本身就是企业和雇主；威尼斯的军火工厂

① 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是英国南海公司，成立于1711年，从事南美奴隶贸易，后认购英格兰战争国债，从而引发民众对其股票的投机热潮，最终导致18世纪20年代的经济泡沫，使很多人破产。——译者注

据说在16世纪一度是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企业。政府还以特许状的方式为公司提供垄断特权,这使得后者的利润更有保障,筹集资金也因此更为容易。最后,人们开始觉得特许公司也许并非是确保经济优势的最佳手段,这些公司因而失宠(在19世纪末又经历了短暂的回光返照)。无论如何,此类活动得到政府的密切参与,所以商人的利益诉求开始影响政策及法律的成型。

贸易发展和社会的相互作用可以间或揭示出意义极为深远的变化趋势。17世纪的一名英国金融家首次向公众提供人寿保险就是其中一例。当时,以人身寿命为对象的年金买卖早已有之,而将精算学和"政治算术"所提供的新统计资料应用于该行业是此前所没有的。死亡这一话题,过去总是存在使人望而却步的无常和变数,而现在,用合理的计算取代赌博式的猜测已成为可能。随着该技术的不断完善,人们可以为范围愈加宽泛的天灾人祸提供有偿的保护。这一过程无意中还创造了另一种非常重要的工具,可以用来筹集大额财富,以作进一步投资。但其意义还不仅如此,因为人寿保险问世于一个特别的年代——在初期,它有时被称作"理性时代"。这一事实告诉我们,经济变化的影响力有时确实非常深远。这是一个小小的引证,表明去宗教化的世界正在向我们走来。

558 从17世纪后半叶开始,海外贸易对欧洲商人的重要性突增,这是欧洲商业最显著的结构性发展,也是经济活动从地中海向欧洲北部转移的部分表现,不到公元1500年,这一转移已能为人感受得到,也使未来世界的经济初现雏形。不过,直到1580年左右,这幅蓝图的绘制者主要还是伊比利亚半岛的人。他们不仅统治了南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的贸易,而且公元1564年后,还有"马尼拉大帆船队"定期从阿卡普尔科(Acapulco)[1]驶向菲律宾;葡萄牙人自西方远道而来,在中国立足,此后远东的中国也与欧洲人展开了商业接触。全球贸易开始令古老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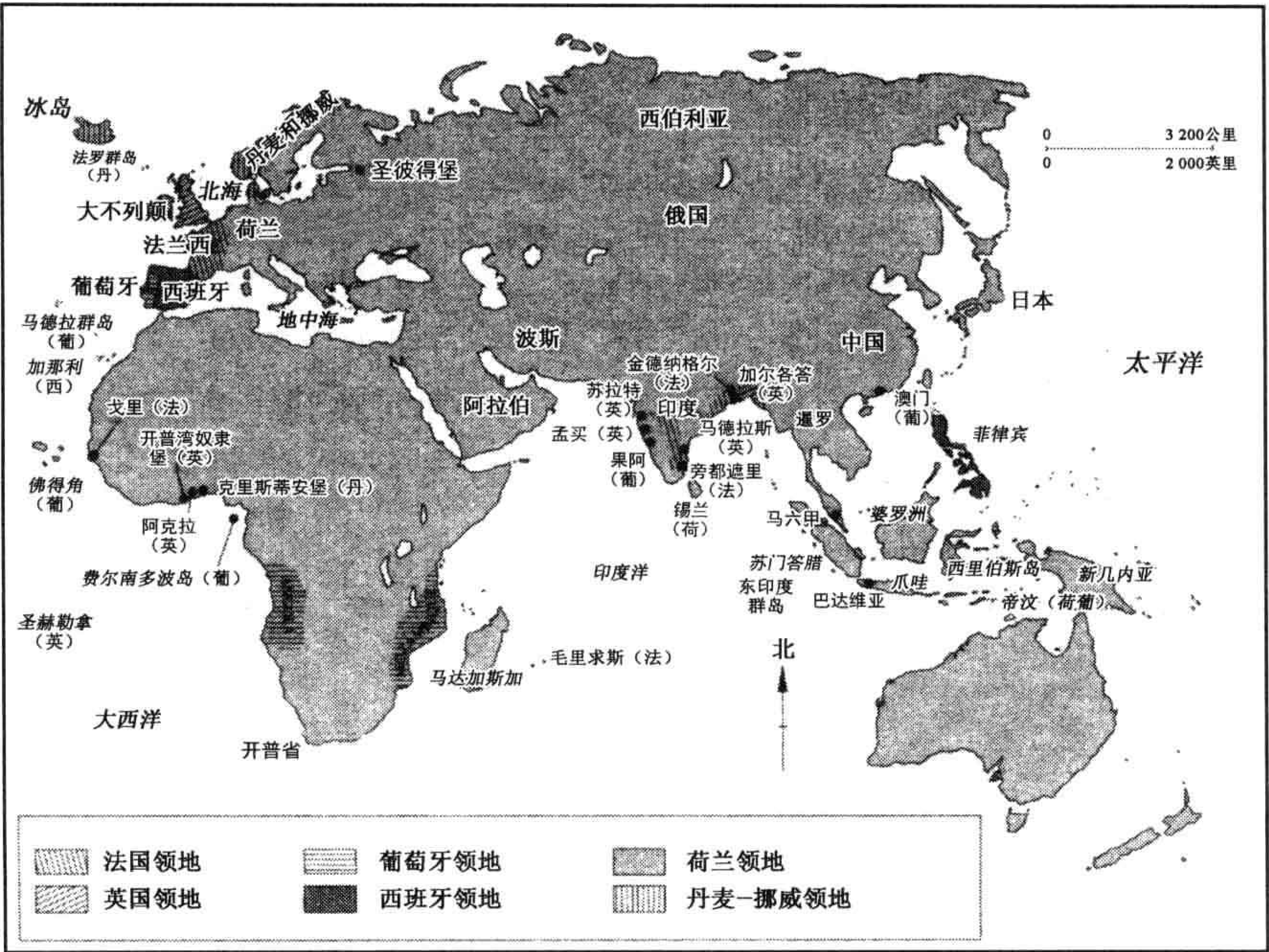
[1] 墨西哥南部格雷罗州的港口城市,1531年被西班牙殖民者发现,1550年建立居民点。该市是在墨西哥与东方之间往来的西班牙殖民舰队的主要补给点。——译者注

中海贸易黯然失色。17世纪晚期，西班牙、葡萄牙与大洋彼岸的殖民地之间的封闭式贸易依然不失其重要性，但海外贸易被荷兰人和其日趋壮大的对手——英国人所统治。荷兰人的成功源于过去向欧洲市场供应咸鲱鱼的收益，也和拥有特别适合大宗运输的“快速平底船”(flute)有关。凭借这一工具，他们首先主宰了波罗的海的贸易，并进一步成为欧洲船运的掌舵人。虽然到17世纪后期经常被英国人取而代之，但他们维持着远达四海的殖民地和贸易枢纽网络，尤其在远东地区，其地位更在葡萄牙人之上。但英国以大西洋为成就霸业的基础。渔业对英国也相当重要；他们在纽芬兰沿海一带捕捞营养丰富的鳕鱼，到岸上晒干腌制，然后到地中海各国贩卖。因为有周五斋戒的习俗，这些国家对鱼类的需求极大。越过海岸旅游区进入内陆后，至今依然可以在那里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南部居民的餐桌上看到这道被当地人称作巴卡劳(*Bacalao*)的鳕鱼菜肴。荷兰人和英国人都逐步拓宽船运范围、增加船运种类，也都亲自参与贸易交换。法国人同样不甘寂寞，在17世纪前半叶将海外贸易规模扩大了一倍。

人口的增长和一定程度上的运输保障(水路始终比陆路便宜)使国际谷物贸易逐步成型。造船业本身促进了沥青、亚麻、木材、食品等货物的流动，这首先影响到波罗的海的贸易，然后成为北美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涉及欧洲的消费，一切活动的背后还有一个个不断扩张的殖民帝国。到了18世纪，人类已身处于一个海洋经济体和国际贸易社会之中，他们在全球范围从事业务，并为此明争暗斗。

在这一经济体中，奴隶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大部分奴隶是非洲黑人，其中最早的一批1444年被带到欧洲的里斯本出售。奴役现象在欧洲本土已完全消失(不过依然有欧洲人被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捉拿为奴贩卖)。现在，这种现象开始向其他大陆大规模扩张。不到两三年，葡萄牙人已经贩卖了超过1000名黑人，并很快在西非设立永久性的奴隶贸易点。这些数据表明，欧洲人很快就发现这一新的行当有利可图，但并不能揭示此后事态将发展到何等规模。一目了然的是，这一行当残忍野蛮(葡萄牙人很快发觉，只要抓住孩子通常就能让其父母乖 559

乖就范),还有非洲人与他们沆瀣一气,当奴隶贩子深入内陆寻找奴隶时,地方上的统治者会包办一切,囤积黑奴向他们批量出售。



非洲和亚洲的欧属商栈和领地(约 1750 年)

有很长一段时期,来自西非的奴隶几乎全部被欧洲和大西洋岛屿上的葡萄牙及西班牙殖民地所吸收。改变随后发生。从 16 世纪中期开始,非洲奴隶乘船横越大西洋,前往巴西、加勒比诸岛和北美大陆。于是,该贸易步入一段长期而惊人的增长阶段,我们的生活中至今仍留有其人口、经济和政治后果的痕迹。非洲黑奴绝非惟一在近代史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奴隶,欧洲人也不是惟一的奴隶贩子。尽管如此,少数非洲人将同族人作为黑奴卖给葡萄牙人、英国人、荷兰人和法国人,又转手卖给美洲的其他欧洲人,这一现象的影响力比奥斯曼人奴役欧洲人或阿拉伯人奴役非洲人要深远得多。黑奴的人数也较容易估计,虽然只是约值。美洲殖民地群得以建立和发展,其所需的大量劳力来自黑奴,不过由于气候原因,各殖民地的奴隶人口分布存在差异。绝大多数

560

奴隶始终从事农业或担当家仆，在工匠或后来出现的工厂工人中，黑人并不常见。

从商业角度来看，奴隶贸易也非常重要。巨额利润在这一行并不多见——把这些活人当货物处理的奴隶船拥挤不堪、疾病丛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每次航行的奴隶死亡率很少低于10%，有时更会达到骇人的程度。正常的资本回报率被严重夸大，这一行当在人们心目中依然利润丰厚，使人趋之若鹜、竞相争夺。两百年间，一个又一个国家希望从中分一杯羹或实现垄断，引发了一场又一场外交争执乃至战争。这印证了贸易在政客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无论是否具有充分的经济价值。

人们一度广泛认为，奴隶贸易的利润为欧洲工业化提供了资本，但这一论调不再令人信服。工业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公元1800年以前，虽然可以在若干欧洲国家找到工业集中的实例，但制造业和采掘业依然以小规模作坊生产为主，只存在量变和技术完善，工艺和体制上均没有翻天覆地的革新。1500年的欧洲已积聚了巨大的财富，吸引大批熟练工匠前来，他们对于研究新工艺流程和探索新技术已习以为常。采矿和冶金业在火炮发明后的两个世纪间发展到顶峰。科学仪器和机械钟表的出现证明制作精密商品的技术已非常普及。这类优势确定了工业化时代的早期模式，并很快开始扭转欧洲与亚洲的传统关系。千百年来，东方的能工巧匠一直以其鬼斧神工的技术和精美的创作令欧洲人大开眼界。亚洲织布和瓷器至高无上的地位一直保留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之中：代表中国的"China"又指瓷器，从"Muslim"衍生出指平纹细布的"muslin"，从"Calicut"衍生出指素白棉布的"calico"，指中国山东的词"shantung"又可指柞蚕丝绸。然而到14和15世纪，部分手工行业的领先地位已被欧洲取得，尤其是机械和工程技术。亚洲的统治者们开始向欧洲人寻求指导，学习如何制造有效的火器，甚至把欧洲市集上随处可见的机械玩具当作奇珍收藏。欧洲在传统行业的技术积累以及对新技术领域的拓展是扭转双方角色关系的基础。这一进程通常发生在城镇；工匠们时常随着需求的变化在不同城市间游历。但显而

561

易见的也仅此而已。难以说清究竟是什么想法驱使欧洲工匠不断进步,也激起社会上层的兴趣,令痴迷机械工程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的重要断面,与建筑艺术和金器加工不遑多让。毕竟,这种状况并没有出现在欧洲以外的地区。

早期工业区以逐步外扩的方式发展,不仅在和农业关系密切的欧洲传统制造中心(例如纺织或酿造)周围蔓延,而且也在乡间不断扩大。这一状况延续了很长时间。旧时代的贸易活动创造出了支持产业的聚集区。安特卫普曾是英国纺织品进入欧洲的重要港口,因此,制衣和印染业也在那里扎根,对途经该港的商品作进一步加工。同时,英国乡间的羊毛商人建立了工业增长的早期模式,向纺纱和织布的农民"预售"他们所需的原料。矿石的出现是另一个界定时代的元素;独立于农业之外的工业活动中,采矿和冶金最为重要,分布范围也颇为广泛。但工业可能停滞不前,有时甚至还会崩溃。意大利似乎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其在中世纪的工业领导地位于 16 世纪消失无踪,而佛兰德斯低地国家和德意志西部及南部地区(古代加洛林王朝的心脏地带)的制造业领导地位又持续了一个世纪左右,直到英国、荷兰和瑞典获得显而易见的领先地位。待到 18 世纪,俄国也凭借采掘工业跻身工业国之列。到那时,其他因素也开始发挥作用:有组织的科学研究被用于工业技术开发,国家政策开始有意无意地成为工业的指导力量。

对工业扩张和增长的长期图景进行整体描述显然需要大量限定条件。哪怕 19 世纪也很容易发生大幅波动,歉收能够引发银行提款狂潮以及制造业产品需求的紧缩,其规模之大足以被称作一场萧条。这反映了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一体化也可以导致新的苦难。例如,公元 1500 年后不久,人们开始注意到物价以史无前例的速度飞涨。这一趋势在某些地区势头极猛,一年就能翻倍。虽然如此涨幅并不能在所有地区长期维持,但总体效应依然强烈,大体相当于欧洲一个世纪内的物价翻了 4 倍。与 20 世纪的通货膨胀相比,这不算很令人震惊,但在当时却颇为新鲜,也带来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一些业主得益,另一些则因此落魄。部分地主的应对措施是提高租金,尽一切可能利用其封建权力

562

增加产出。而部分地主不得不出售地产。就此意义而言，通胀导致了社会流动，这也是通胀经常导致的后果。穷人受到的影响通常更残酷，因为农产品价格飙升，而薪酬的涨幅则要滞后，实际工资因此下跌。有时，地区因素还会使情况雪上加霜。例如，英格兰高昂的羊毛价格诱使地主圈占公共土地用于牧羊，从而剥夺了其公共用途。可怜的牧人食不果腹，正如当时一句著名的评语所言，这是"羊吃人"的社会。该世纪中期的 30 年间，民众起义和持续混乱无处不在，揭示了当时局势的严重性和不可理喻。无论何处，受通胀折磨最深的总是社会两极：穷人因此忍饥挨饿，而国王则比任何人开销更大。

历史学者们为解释长达一个世纪的物价上涨着实费了大量笔墨。他们不再满足于最早由当代观察家提出的解释，即根本原因是西班牙人开始挖掘新大陆的矿产，带来了新的黄金供应；通胀早在美洲的贵金属输出量达到可观程度之前就已经开始，哪怕后来这些黄金确实加重了通胀的程度。归根结底，也许压力始终来自人口的不断增长，而生产力的飞跃依然没有到来。物价上涨一直持续到 17 世纪初，随后开始放缓，甚至偶有跌势，至 1700 年又恢复了缓慢的增长。

在如今的时代，不用别人提醒，我们都很清楚经济变化可以很快导致社会变化。我们相信，所谓亘古不变的社会形态和体制只是无稽之谈。但在三百年前，很多人相信这些体制形态都是神赐的，于是，虽然通货膨胀后出现了社会变化（必须指出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却被顽固的老一套所掩盖和噤声。大致在公元 1500 至 1800 年间，从表面和名义上讲，很多欧洲社会始终没有什么改变。但经济现实基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表象是具有欺骗性的。

公元 1500 年以前，某些国家的农村已经开始显现出这一点。由于农业变得越来越像生意（但这绝非惟一原因），传统农村社会必须随之作出改变。但生活方式通常得到保留，于是导致了越来越大的不协调。虽然 18 世纪 80 年代的法国依然存在封建领主，但其经济作用已经比社会职能更加突出。这些"显贵"也许从未见过自己的佃户，也许没有高贵的血统，也许领主身份只能给他们带来钱，象征着获取佃户劳力、

563

时间和产出的权力。更往东的地区,封建关系的实际意义保留得更多。这部分反映了统治阶级和贵族之间存在联盟关系,他们利用欧洲西部和南部人口不断增长所形成的新的谷物和木材市场牟利,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榨取日益沉重的劳役。农奴制在俄国成了社会最根本的基石。

另一方面,早在公元 1800 年以前的英格兰,就连商业化"封建主义"也已经消失,而在法国尚且保留。除了能应召出席议会(在其他方面,他们的法律地位与乔治三世国王的大部分臣民类似,不具备议会成员的选举权)之外,贵族身份不再提供法定特权。英国贵族数量稀少;即便在苏格兰同侪加入之后,18 世纪末的上议院也只有不到两百名世袭成员,他们的法定地位只能传给一名继承人。大不列颠不再有贵族阶级,其他民众和他们享有同样广泛的法律权利,而在欧洲其余地区,这些权利几乎总是贵族的特权。工业革命前夕,法国可能有 25 万贵族,所有人都具备重要的法律和形式权利;而牛津大学的一间大厅就可以绰绰有余地容纳同级别的英国法定社会等级成员,他们的权利与人数一样逊色许多。

另一方面,英国地主阶级的财富和社会影响力则十分巨大。贵族之下是定义模糊的英国绅士阶级,其最顶层是贵族家族成员,最底层是事业有成、极受尊重但不属于"上流社会"的农场主和商人。阶级之间的可渗透性对于促进社会凝聚力和流动性具有极大的价值。通过财富积累、杰出的职业地位或个人美德都能获得绅士身份。绅士的本质为共同的行为守则,依然反映着贵族式的荣辱观,但涤除了排外和野蛮的不开化属性,也失去了法定权利的支持。17 和 18 世纪的绅士观念是构成英国历史的文化影响因素之一。

564 事实上,每个国家的统治阶层都不一样。这种反差在欧洲各地都能找到。简明扼要的结论是无法作出的。尽管如此,至 1700 年,依旧看得出社会变化是很多国家的总体趋势,使旧的社会形态陷入挣扎。在进步幅度最大的国家,对于决定身份的因素和认同身份的方式,这一变化带来了新的理念。虽然并不完全,但当时发生了两种转型,一是确

定权利和期望的因素从个人纽带转为市场关系，二是看待社会的视角从集体主义转为个人主义。在七省联合王国荷兰——该时期兴起于尼德兰的共和国，这两种转型最为明显。这个国家实质上由商人统治，尤其是阿姆斯特丹的商人，该城位于荷兰省中心，而荷兰省又是该国最富有的省份[①]。在该国，拥有土地的贵族从未像商人和城市寡头那样位高权重。

在1789年，欧洲任何地区的社会变化都不如英国和荷兰那般深远。对传统地位的质疑在其他地方几乎还没有出现。一部18世纪法国喜剧中的主角、身为男仆的费加罗讥笑他的贵族主子没有干出任何与其特权身份相称的事来，只有一桩除外——大费周章地降生到世上。这在当时是一种危险和颠覆性的思想，但几乎没有引发任何警惕。欧洲依然充斥着自大狂妄的贵族(这还会持续到公元1800年以后许久)。排外的程度不一而足，但贵族和非贵族之间依然存在决定性的分野。虽然怀有戒心的贵族指责国王与平民联手对付自己，但任何国王都不会这么做，哪怕走投无路。按其中一人的说法，国王也是贵族，这是贵族之间的问题。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才使事态发生了重大改变，但在那个世纪末之前，其影响力也仅限于该国。当历史走进19世纪，大部分欧洲人似乎依然尊重贵族的血统。有所改变之处，不过是不假思索地认为这种差别应当得到法律保障的人略少了一些。

一些人开始感到，用具有不同法定权利和义务的等级团体来描述社会已不能反映现实，同样，也有人开始对宗教支撑的特殊社会等级体系产生怀疑。但哪怕在很多年以后，如下说辞依然有人相信：

富者居城郭，
贫者栖门前，
上帝造化，高低有别，
使贵者贵、贱者贱。

---

① 荷兰的国名因此而来。——译者注

565 不过，这段来自19世纪北爱尔兰阿尔斯特女诗人①的诗句并不完全表示一成不变的等级秩序是来自上帝的旨意。早在1800年就有人开始认为，富人自力更生而没有继承父辈的地位，这表现了上帝的智慧，因此得到上帝的喜爱。“政府是人类智慧所发明的工具，用以满足人类的需求。”一名保守的18世纪爱尔兰人②如是说。在先进国家，广义的功利主义成为越来越多的人评判体制和风俗的标准，其中包括社会体制和风俗。

旧有的正式等级体系遭受的最大压力来自经济变化——流动性增加、城镇规模扩大、市场经济崛起、新商机出现——的挤压，但也有压力来自教育普及和社会意识觉醒。总体来说，当时的状况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在东方的俄国，新的社会发展对农业社会的撼动力微乎其微，所以至18世纪末，传统的社会模式不仅完整无缺，而且几乎毫无改变，波兰或东普鲁士和匈牙利的情况也大致一样。这些内陆国家远离欧洲沿海地区的商业发展对既有体制与生俱来的威胁，其传统统治阶级不仅能保住地位，还往往能切实扩大特权。第二类中，经济与社会的碰撞足够激烈，这成为社会现实，并促使既有体制产生改良的需求。当政治环境允许，这些需求会引发要求实现的呼声，但会被抑制一段时间。法国就是喧嚷的一例，但一些德意志国家、比利时和意大利部分地区也显示出同样的张力。第三类相对更为开放，例如英国、荷兰和大洋彼岸的英属北美，在这些地方，身份已经不如财富（甚至才能）来得重要，法定权利广泛普及，人们普遍能感受到经济带来的机遇，对薪金的依赖也非常明显。早在16世纪，英国社会就比大陆国家更具流动性，而北美人更在18世纪自创的新宪法中禁止了授予世袭头衔的行为。在这些地方，个人主义几乎不受法律束缚，不管现实中是否受习俗的限制、是否有得不到的机会。

---

① 指塞西尔·弗朗西斯·亚历山大里亚(Cecil Frances Alexander)，语出其诗作《一切光明和美好的事物》。——译者注

② 指埃德蒙·伯克，语出其《对法国革命的反思》。——译者注

像本书这样的概要式描述，稍不留意就会因分类过度而失当。即便上文采用的三分法也模糊了太多的细节。如果将属于同一类的国家和地区视为同然，那我们就谬之千里，完全忽视了其内部存在的惊人反差。在发展程度更高的第三类中，依然有大量会让我们觉得奇怪乃至陈腐的东西。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城镇大多如同小小的巴彻斯特(Barchester)①，在乡土观念和气息的包围下怡然自得，由屈指可数的商人寡头、事业有成的行会成员或大教堂的修士们统治。然而，一方面，沙特尔(Chartres)是一个心满意足地抱持中世纪乡村风貌和中世纪生活方式的小镇，18世纪的人口依然和五百年前一样，另一方面，与其同属一个国家的南特或波尔多则是欣欣向荣、喧嚷繁华的港口，而且缔造了法国贸易经济活跃局面的港口城市也不仅仅是这两个。就连19世纪的人也会觉得他们的上一代固步自封；因此，我们远不能断言当时存在成熟的、定义明确的，和今天任何欧洲国家一样拥有完全的自我认识的个人主义及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姑且可以将"先进"作为这些国家的标签，即比其余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更快、更进一步地迈向那种状态。

566

有时，它们因此而赢得未来改革家的钦佩。对现状发起质疑的伟人伏尔泰因一个事实深感震撼：早在18世纪早期，英国的大商人就可以得到与贵族同等的敬仰和尊重。他或许略有夸大，也无疑混淆了一些细枝末节上的重要差异，但依然道出了一个不寻常的事实——也是大不列颠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原因之一，换言之，统治18世纪英格兰的政治阶级所依赖的是土地，这也体现出极强的土地取向价值观，然而他们却长期为守护国家的商业利益操心，并接受伦敦中心区议院通过集体智慧施加的领导和指引。虽然"有钱"和"有地"群体之间存在政治分歧始终是人们谈论的话题，尽管政治长期以来都是充满争议的是非之地，有地阶级内部也有勾心斗角的传统，然而在其他国家导致冲突的利

① 虚构的城市，出自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的系列小说《巴塞特郡纪事》(*Chronicles of Barsetshire*)。——译者注

益焦点却没有令英国的商人和贵族彼此疏远,反而为双方带来了共同的繁荣。其解释必然相当复杂,有些原因可追溯至上一世纪,例如英国农业的商业化;有些距当时要近得多,例如加大力度促进政府和商业领域私人投资的举措。

伴随经济、尤其是商业的成功,荷兰和大不列颠都向着更先进的社会进化,其过程具有惊人的相似性。这与它们的宗教一度大有关联:由于基督教世界的一场大动荡,天主教会在两国都失去了主导地位。18 世纪的反教权主义者和 20 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力求探索和挖掘这一相似性背后的机理;有人将新教称作资本主义道德观的源泉,现在看来,这不再具有说服力。反例之一是天主教资本家为数众多,也往往能获得成功。在 18 世纪,法国和西班牙依然是重要的贸易国家,前者的增长速度可以和大不列颠相提并论,不过随后落了下风。两国都有大西洋入海口,拥有这一条件的国家自 16 世纪以来往往都有表现出经济增长的倾向。但这一解释的适用范围也不算很广,苏格兰——位于北部、信仰新教、濒临大西洋——就长期保持落后、贫穷和封建状态。欧洲的地中海地区和东部地区与北部及南部的差异,要大于单纯的地理位置不同,能解释现代化速率存在差距的因素也不止一种。例如,促成英国和荷兰农业进步的最大原因可能是两国的耕地相对而言都较为稀少。

567

欧洲东部依然比较落后。其社会和经济结构基础直到 19 世纪才发生改变。深层次的解释前文已经提过——例如,与西部相比,东部的作物生长季节较短,肥沃的土壤较少,种植业从起步阶段就更为艰难,因此其经济潜力在农业发展至关重要的早期阶段就受到阻碍。那里也存在人为的障碍。东欧定居点长期处于中亚游牧民族的骚扰之下,不仅如此,其南侧的巴尔干地区和与土耳其人接壤的边境地带千百年来都是战火和匪寇肆虐之地。在某些区域(如匈牙利),土耳其统治带来非常恶劣的后果,使国家人口大减。欧洲人夺回该地后又想方设法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同一时期,在从莫斯科大公国演变而成的俄国,农奴人口也有所增加,占总人口的比重变得更大。法律更加严酷,使国家

强制力成为地主控制农民的依靠。在其他东部国家(普鲁士是其一)，地主相对于佃户的权力有所强化。这不仅仅是王室出于安抚和纵容贵族、以免王权遭到对抗的目的而采取的措施,而且也是经济发展的工具之一。经济进步与社会不公相伴相随,这既非空前、亦非绝后;农奴制是一种手段,可以带来让土地发挥生产力所需的资源,正如强制劳役在很多其他国家和时期的作用一样。

有一结果的某些痕迹至今仍能看到：欧洲可大致沿易北河为界划分。河西各国向着更开放的社会形态缓慢进化至 1800 年。河东是掌管着农业社会的极权主义政府,少数地主大权在握,农民背负着沉重枷锁。几百年间,西部城镇往往能走向繁荣,而在东部却较为少见。它们往往成为负税过重、被农村所包围的孤岛,因为农奴制的铁腕,也无法从乡间吸引所需劳力。在波兰和俄国的大片地带,甚至连货币经济都几乎不存在。欧洲史后来的很多篇章都可以从这一东西部差异中窥得一斑。 568

在非正式层面也能看出这种差异,例如对待女性的方式,不过在这方面,欧洲的地中海地区与北部地区之间又存在区别,并随着时间的流逝映射成拉美和北美之间的不同。在形式和法律意义上,女性受到的对待几个世纪以来几乎都毫无改变,不管哪里都一样;女性的法律地位依然和过去一样,这一状况持续到这一时期接近尾声时才遭质疑。不过,在发达程度更高的国家,真正独立的女性确实比以往更多见,特别在上层社会中。早在 15 世纪,异邦人就提及英国妇女享有非同一般的自由。它们一直保持着领先地位,但进入 18 世纪后,别处(至少是法国)也有迹象表明,出身良好的女士能享有充分且真正的独立。

其部分原因是 18 世纪的上流社会出现了一种新形态的生活方式,在宫廷之外提供了另一种社交聚会的场所,并逐渐独立于宗教和家庭仪式之外。如我们所知,17 世纪末的伦敦人会到咖啡店聚首,这成了首批俱乐部的雏形。很快又出现沙龙,即朋友和旧识在女士家中的会客室举办的社交聚会,法国人对此创举贡献尤多;一些 18 世纪沙龙是知识界的重要中心,表明女性抛头露面、对宗教以外的思想问题表现出

兴趣不仅合宜，更被视为时尚。为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Mme de Pompadour）绘制肖像时，她选了一本书作为画中的布景之一——孟德斯鸠的社会学论著《论法的精神》。不过，就算是无心追求文学修养和学识的女性，由于出现了沙龙和独立于宫廷之外的社会，她们也得到一个逃离家庭禁锢的去处，即使有限，但真实存在；这一社交圈、再加上宗教和职业团体，至当时为止是寻求社会多样性和消遣的惟一寄托，哪怕对男性也是如此。

到 18 世纪末，我们进入一个属于女性艺术家和小说家的时代，这也是接受事实、承认待字闺中并非未婚女子惟一生活方式的时代。要看清这类改变源自何处并不容易。该世纪早期，英国《观察家》（*Spectator*）杂志已经认为，值得将女性读者视为和男性一样的受众群体，这提醒我们应该到过去寻找答案。也许有所助益的是，18 世纪产生了万众瞩目、具有重大政治影响力的女性典范——一名英国女王和四名女皇（奥地利一位，俄国三位）都凭自身的实力统治国家，也常常取得斐然的成就。但我们无法充满自信地加以断言，因为女性解放肇端的历史有很多方面依然有待研究。

569

最后，哪怕在近代早期欧洲最发达的社会，这一切都没有触及占压倒多数的大众群体的生活。工业岗位尚未大量涌现，后来这将成为第一股强大的力量，打破大部分人牢不可破的传统生活方式，无论是男是女。虽然女性的从属地位和被社会排斥的状态在波兰或西班牙南部——摩尔化影响加剧了这一趋势——的原始村庄中特别明显，但在 1800 年的任何其他地区，这也依然是社会主流状况的写照。

二、当权者和挑战者

1800 年，很多欧洲人依然秉持着四百年前为众人所理解和接受的社会及政治体制理念。就此而言，"中世纪"和众多其他事物一样，并非戛然而止。能合理划归为"中世纪"的、关于社会和政府的看法，在广大区域中作为一种具有实效的观念力量长期保持着生命力，这数百年间，可以找到越来越多的契合这些观念的社会事实。大体而言，被称作"共同体"——人们组成不同的团体，各自以相应的法律特权作为保护成员的手段和定义身份的方式——的社会组织形式依然是 18 世纪欧洲大陆的主导形态。如前文所述，农奴制在欧洲中部和东部大片地区变得更为普遍和牢固。政治体制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持续性。1800 年，神圣罗马帝国和 1500 年时一样，依然健在；教皇的世俗权力同然。法国国王依然是卡佩王朝的后裔（不过他与 1500 年的统治家族并非同一分支，而且事实上处于流亡状态）。即便在英格兰，哪怕到了 1820 年，国王乔治四世的加冕宴上，护驾斗士（king's champion）[①]依然会穿戴全身盔甲策马进入威斯敏斯特宫，在所有来宾面前守护君主的头衔。政府是供人告解的实体、宗教和社会彼此交织、教会的权威受法律保 570

① 英国加冕仪式上的传统职务，代表被加冕的国王，起初其使命是向任何质疑新君主统治权的人提出你死我活的决斗邀请。——译者注

障，这些观念在大部分国家都被视为理所当然。虽然遭到诸多质疑，在某些国家还经受了严重挫折，但在1800年，这些观念以及很多事物依然具有历史积淀下来的、极为沉重的分量，而仅仅十年前甚至更为沉重。

这些事实都应当得到承认，但在1500至1800年的三个世纪间，中世纪政府所特有的旧社会和政治关系的消解或削弱依然是欧洲的总体趋势。权力和权威逐渐脱离“封建”式的私人依附体系，流向国家所缔造的中央集权制（事实上，“封建”这一概念本身是17世纪作为法律术语被发明出来的，对“封建”加以定义的需要，恰恰暗示了当时其存在感正在逐渐淡化）。这一时期，基督教世界的概念，尽管在情感上甚至在潜意识中依然重要，但已失去了一切实质上的政治现实意义。在大分裂时代，教廷权威开始受到民族情感的打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自14世纪以来就是无足轻重的小角色。新的、可对欧洲加以整合的大义名分也没有出现。奥斯曼威胁是一块试金石，暴露在穆斯林铁蹄之下的基督教王公或许会向拥有同样信仰的基督徒求援，教皇或许还会发表宣扬十字军东征的冠冕之辞，但土耳其人对真相心知肚明，基督教国家只会依据自身的利益来行动，如有必要，还会与异教徒结盟。这是功利政治（*Realpolitik*）[①]的时代，是大义和荣誉屈服于算计和国家利益的时代。有趣的是，在那样一个时代，欧洲人虽然越来越认同巨大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是欧洲的骄傲和价值所在，对此他们毫不怀疑）是使他们与其他文明产生隔阂的主因，可他们却对如何保障自身内部根本性的团结毫不关心。只有难得一现的远见卓识之士倡议构筑某种超国家的体制，但是究其原因，也许只是对欧洲的文化优越性产生了新的认识而已。欧洲正迈向一个不可一世的扩张时代，无需一个共同的体制来告诉它该怎么做。与此相反，国家的权威在这几百年间逐渐式微，政府的实力也随之弱化。不被外在形式所误导是理解其过程的关键。关于谁应当行使国家权力，无论争论多么激烈，也不管汗牛充栋的政治学著

571

① 以务实而非理念或道德为首要出发点的政治和外交。——译者注

述提出了多少种权力限制的方法,总体趋势还是朝着接受国家最高权力拥有合法地位的方向发展——换言之,欧洲人开始觉得,只要国家权力在正确的人手中,就不应对其立法权加以限制。

即便考虑到种种局限,人们的思维还是在过去的基础上有了极大的突破。对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某些理念不仅从社会和司法角度来看实属荒诞,更是对神明的亵渎。例如,高于人类范畴的权利和法则也许并不存在、法律豁免权和特许自由权不得被后来的立法者剥夺、基本法应永远得到尊重,或者人类的法律永远不能和上帝的律法相抵触。17 世纪的英国法学界人士为究竟该如何制定土地基本法争得焦头烂额,但就某种基本法必然存在这一点,所有人都没有争议。一个世纪后,法国的法学界主流也产生了同样的想法。然而到最后,两国都接受了主权——合法的、不受限制的立法权是国之为国的标志这一理念。但这一过程耗费了很长时间。早期近代欧洲的大部分时期,近现代主权国家的兴起被一个事实所掩盖,即君主制是广泛占据主导地位的统治形式。统治者的争权夺利构成了这些世纪中欧洲史的主旋律,而且有时难以把他们争夺的焦点看得分明。总体上,王室统治者的主张会遭到两种立场截然不同的挑战:一种质疑所依据的原则是某些君主所要求的权力本质上不可容忍,任何政府都不该获得如此权力(这可以称为中世纪或保守主义的捍卫自由原则),而另一种反对的理由是此类权力可以存在,但落在了错误的人手里(这可以称为近现代或自由主义的捍卫自由原则)。就实际状况而言,两种立场往往相互混淆、不分彼此,但这种混淆本身也是显著的标志,说明人们的思想正在发生转变。 572

抛开法学原理不论,国家地位的强化表现为君主得偿所愿的能力不断提高。16 和 17 世纪,曾在中世纪晚期的很多国家出现的代议制体系几乎全面衰落,是为上述趋势的表征之一。1789 年的大部分西欧国家(暂且不提东欧和中欧)都由君主统治,且几乎不受代议制团体的掣肘;大不列颠是其中的一大例外,国王们从 16 世纪开始享有的权力会让中世纪的贵族和市民感到吃惊,该现象有时被描述为极权君主制的兴起。如果我们不夸大君主实际上能够按自己意愿行动的可能性

(因为其权力要面对很多现实层面的障碍,就如中世纪的豁免权或议会一样难缠),那这种说法是可以接受的。自 16 世纪起,所有(或者几乎所有)地区的统治者相对于其对手的实力都大大增强。新的财政来源使他们拥有常备军和火炮,可用来对付负担不起这些军力的大贵族。有时,君主能够将缓慢成型的民族国家意识化为己用,共同约束实力过大的割据王侯。在 15 世纪晚期,很多国家都对王室政府产生了新的认同,只要他们能确保秩序与安宁。所有个案基本都有其本身的特定原因,但君主几乎无一例外地凌驾于最强大的贵族之上,用枪炮和税收维持着前所未有的尊贵地位和权威。寡头与高等臣民分享权力,凭身份获得实质上的官僚地位,有时还能得到名义上的头衔,也不再对国王构成沉重的压力。英国都铎时期的枢密院精英云集,有时几乎清一色全是门阀贵族。

573 在这一局面下,16 和 17 世纪早期出现了有些人所谓的“复兴国家”(Renaissance State)。这一称谓颇为华而不实,臃肿的官僚机构才是背后的真相,充斥着王室雇员,以中央集权化的野心为行动纲领,但如果我们还记得与这种国家相对的中世纪王国——其大量政府职能往往被委托给封建诸侯和私人的依附者或某种团体(教会是其中最大的),则其含义还是足够清楚。当然,这两种政治组织模式在历史中都没有纯粹的模型可循。王室官员中总有出身寒微的“新人”,直到今日,政府依然会向非政府团体委派工作。近代“国家”并不是突然出现的:其转变过程经历了数百年,新体制也往往沿用旧的外在形式。英国都铎王朝沿用既有的王室治安官制度,将地方乡绅融入王室政府的体制之内。这是削弱领主权威的漫长过程中的阶段之一,别处的领主制还将延续几百年的生命力。但即便在英国,王室长久以来都要小心谨慎地对待贵族,除非与他们成为你死我活的对手。叛乱并不罕见,而是 16 世纪的政治家长期面对的现实。王室军队也许能最终得胜,但没有君主想陷入不得不依赖武力的境地。如一句著名的箴言所述,枪炮是国王最后的论据。一直延续到 17 世纪中期的法国贵族兴风作乱的历史,同一时期英国地方与中央的利益冲突,以及哈布斯堡王室打压地方

贵族、意图统一领土的企图,都表明了这一点。英国最后一次诸侯叛乱发生于1745年;其他国家还要晚一些。

税收问题也得不到非常充分的解决,因为既要顾忌叛乱的危险,又没有充分的行政能力进行征收,但薪俸和军饷都是必须的开支。解决方式之一是允许官员在需要他们服务的地区征收钱款或享受特权。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这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此,统治者必须想办法征到更多的税。挖掘王室领地的资源依然可以起到一定效果。但或早或晚,所有的君主都会被迫寻求新的税收来源,能找到充足税源的人则寥寥无几。其中存在直到19世纪甚至更晚才得以解决的技术困难,但在这三个世纪间,君主们为创建新的税收名目展现出极为丰富的想象力。泛泛而言,收税官只能对消费行为(通过关税、消费税或营业税等间接税种,或通过必须付费才能获取贸易许可和授权的形式)或不动产课税。通常,最贫困的底层所承受的税收负担大得不成比例,在他们少得可怜的可支配收入中,用来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比例比富人更高。要制止领主将其税收负担转嫁给金字塔底层的穷苦大众也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另外,法律豁免权这一中世纪思想的残余对税收的阻碍作用尤其明显。1500年时,人们普遍接受,某些地区、人物和行动受特别条文的保护,不应遭到侵犯。受保护的依据可以是以前王室作出的不可撤销的许诺,例如很多城市的特权,可以是某种协议,例如英国大宪章,可以是源头无法考据的习俗,也可以是某条神律。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教会。教廷以外的权威一般不能对其财产课税,教会内部事务由自己的司法体系管辖,王室治安官不能插手,他们还掌控着重要的社会和经济制度——例如婚姻。但通常在司法或税收方面,某个省份、行业或家族也能享有豁免权。王室的地位在各处也不一致。尊贵如法国国王,在布列塔尼也不过是一介大公,其权限会受到影响。诸如此类的事实是"复兴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即便未来掌控在王室官僚及其同伴手中,这些国家也只能和当时的现状共存。

574

16世纪早期,一场深重的危机令西方基督教世界大为震动。它永久性地破坏了旧有的中世纪信仰统一,加快了王权的整合。这场危机

被过分简单地称作新教改革运动，揭开了又一场关于宗教权威的争执，呼吁质疑教皇所掌控的权威——其形式和理论体系曾成功经受住一场又一场挑战。仅此而言，这完全是属于中世纪的现象。但这还不是历史的全部，也远未尽述改革运动的重大政治意义。鉴于这场运动同样点燃了文化改革的火种，我们没有理由去质疑它作为近代史发端的传统地位。

要求教会改革的呼声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在1500年，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教皇和库里亚教廷未必关心所有基督徒的福祉。一些城市已经发展到对教义提出异见的程度。15世纪影响深远、规模日益膨胀的宗教崇拜活动，表达了人们想为灵魂问题寻找新答案的诉求，也表明他们愿意到教会权威所设置的界限之外去寻找。异端从未被杜绝，只是受到限制。反教皇至上运动大行其道是一种古老而普遍的现象。长久以来，这种运动都在促进对福音派教士的需求。15世纪的宗教生活中还显现出另一股潮流，其颠覆力也许比异端更为深刻，因为这股势力与异端不同，它包含的力量有可能最终斩断传统宗教观的根基。这场运动拥有学术、人文、理性、思辨式怀疑的特征，在缺乏一个更贴切的术语之时，我们不妨称之为伊拉斯谟运动，其命名源自当时人们认为最清晰地体现了该运动精神的人物，他也是首位在欧洲历史中扮演领导角色的荷兰人。他对自己的信仰坚贞不贰，明白自己是基督徒，也知道这毫无疑问地表明他是教会的一份子。但他持有一份理念，酝酿着对这个教会实行某种改革的可能性。他希望能简化崇拜方式、净化教士的职能。虽然他没有挑战教会或教皇的权威，但以某种更隐晦的方式挑战了理论的权威性，因为其学术著作蕴含着非常深刻的颠覆力。他与遍及欧洲各地的同仁往来的书信也有同样的论调。这些同仁从他那里学习如何摆脱学术界生搬硬套亚里士多德哲学所创造出的逻辑体系，从而也摆脱了这套逻辑下的信仰说教。在一个希腊研究再度盛行的时期，他所编译的希腊文《新约全书》为教义之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伊拉斯谟还揭露了怪异而死板的文体所具备的虚伪本质。

但无论是他、还是那些持有同样观点的人，都没有直接攻讦宗教权

575

威,也没有将教会的问题公之于众。他们都是称职的天主教徒。16世纪之初的欧洲孕育着人文主义——譬如异端、对教士行径和王室贪婪的不满——的情怀,等待——就像很多经历了漫长等待的事物一样——某个人物和事件降临,将这股氛围转变为一场宗教革命。除了革命,没有任何其他词汇足以描述那位德意志修士的无心之举所招致的后果。他名叫马丁·路德,在1517年释放出社会中蛰伏的能量,自阿里乌斯派消失以来一直保持完整的基督教统一局面被敲得四分五裂。

与胸怀世界的伊拉斯谟不同,路德的一生基本都在易北河畔的德意志小镇维滕贝格(Wittenberg)度过,那里几乎是一个被世人遗忘的角落。他是一名笃信奥古斯丁学说的僧侣,对神学钻研极深,也因而多少承受着灵魂的苦痛,他后来得出结论,必须用新的论调来布道《圣经》,将上帝阐释为宽恕之神,而非惩戒之神。他在与教皇起争执之前从未怀疑过其正统性,没有必要为这一论点走上革命的道路。但去过罗马之后,他对所见所闻感到不快,因为梵蒂冈城显出种种世俗的迹象,教会统治者的行为也配不上他们的身份。这份感受也没有令他对一名在萨克森地区四处游荡、出售赎罪券的多明我会修士产生好感。修士号称赎罪券是教廷颁发的凭证,并向持有者保证,只要付出一定的金钱,就可以免除他们所犯罪孽的一部分来世惩罚。当时,这笔进账被用来兴建宏伟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一些听他布道的农夫将此人的言论和他们所购买的赎罪券带到路德面前。经过研究,一切真相大白,他们所听取的布道不仅具有误导性,更是无耻之极;此人所宣扬的交易俗不可耐,展现了中世纪天主教最令人不悦的面目之一。关于人必须在一生中经过何种转变才能确保获得救赎,路德报以无可复加的严肃和较真,几乎为此食不知味,因此自然会勃然大怒。他撰写九十五条,不仅声讨这一恶行,也无疑针砭教廷的其他做法,以此表达自己毫不动摇的观点。按学术辩论的传统,他于1517年10月21日将用拉丁文写成的辩文张贴在维滕贝格教会城堡的门口,还寄给美因茨大主教暨全德主教长,后者将文书呈交罗马,并提出让路德所属修道院禁止他传播此

576

类思想。当时,路德的论文已有了德文版,而且局势因新的信息技术而发生转变;这些文章被大量印刷,出现在德意志的每个角落。于是路德获得了他想要的辩论舞台。若非路德所在地区的统治者、萨克森大公弗雷德里克给予保护,拒绝交出路德,他的性命可能早已不保。没有及时将异端扼杀在萌芽状态的后果是致命的。路德被修道院抛弃,但他的大学没有这么做。教廷很快面临一场席卷全德的大运动,不满的矛头直指罗马,路德突然意识到自己拥有惊人的文学才能,语言流畅、思如泉涌。作为挖掘印刷手册载体的巨大潜力的第一人,他使运动得以持续且愈演愈烈,而当地大公的个人野心也起到一定作用。

不到两年,路德开始被人称作胡斯派异端。宗教改革已经与德意志的政治纠缠到一起。早在中世纪,未来的改革家们就会寻求世俗统治者的帮助。这未必超出信仰的范畴;伟大的西班牙教士西梅内斯(Ximenes)[①]就曾意图利用天主教国王的权威来解决西班牙教会所面临的问题。统治者无意保护异端;支持真正的信仰是他们的职责所在。然而,向教会外的权威寻求帮助可能导致始料未及的后续变化,而这看起来正是路德所遇到的情况。他的观点十分激进,使他的立场和追求超出了对实践进行改革的范畴,质疑的矛头先是直指教廷的权威,后又发展至对教义的怀疑。他初期批判的核心并不涉及神学。尽管如此,577 他后来发展到驳斥化质说的地步(用一种甚至更难领会的圣体论来取代),并宣扬人的称义——也就是成为能获得救赎的一方——并非单纯来自圣礼的履行(即所谓的“事功”),而是来自信仰。这显然是极为个人主义的立场,并撼动了传统教习的根基,因为传统观念认为教会之外没有任何获得救赎的可能(不过,或许值得一提的是,伊拉斯谟被问及自己的看法时并没有对路德加以谴责;而且他觉得路德的言论中有不少可取之处)。1520 年,路德被教会绝罚。在围观者好奇的注视下,他用一把火将绝罚诏书和有关教会法的书籍一起焚烧殆尽。他继续布道

① 西梅内斯·德西斯内罗斯(1436－1517),1495 年担任托莱多大主教,从此开始着手整顿西班牙天主教会。——译者注

和著述，受帝政议会传唤出庭为自己辩护，并拒绝收回自己的观点。德意志内战似乎一触即发。带着一份通行许可证离开议会后，他消失于人们的视野，被某个同情他的王公带走，以确保他的人身安全。1521年，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对他施以帝禁（Imperial Ban）[①]，使路德成为流亡之徒。

路德的教义进一步扩展，对忏悔、告解以及教士独身制也发起谴责，这吸引了很多德意志人。其追随者通过布道和分发他翻译的德文版新约来传播这些观念。路德宗也是一股政治力量，同德意志诸王侯与皇帝错综复杂的关系纠缠在一起，再加上皇帝的权威很不明确，从而确保了改革派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战争接踵而至，人们开始使用"新教徒"一词。到1555年，德意志天主教和新教公国彼此分裂的状况已无法逆转。这一状况得到奥格斯堡议会协议的承认，该协议规定，每个公国的主导教派应为其统治者所信仰的教派，这是欧洲首次确立的宗教多元化体制。对于一名自视为天主教大一统捍卫者的皇帝而言，此等妥协着实令人好奇。但如果他想维持德意志诸王的忠诚心，这么做却是必须的。在一个不同教派彼此竞争的世界中，无论是德意志的天主教公国还是新教公国，宗教都前所未有地仰仗政治权威的支持。

但宗教改革中的任何现象都不单纯；动荡不安的福音派浪潮中也出现了新教的其他变种派别。其中有一部分靠社会动荡维持生命力。路德马上在其教义与农民起义的主张之间划清界限，起义者以他的名义作为对主子发动叛乱的立场。其中有一个名为再洗礼派（Anabaptist）的激进团体，同时遭到天主教和新教君主的迫害。1534年，再洗礼派的领导者在明斯特推行财产共有和多妻制[②]，这应验了其反对者的恐惧，引发一场残酷的镇压行动。但其他新教派别中，只有加尔文派可以在本书

① 被施以帝禁的人将失去一切法律权利和保护，任何人均可随意伤害其生命、剥夺其财产而无须承担法律后果。——译者注

② 该事件史称闵斯特暴乱，但该地区现在一般译作明斯特。——译者注

这样笼统的叙述中占有一席之地。虽然其创建者是法国人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但该派系是瑞士对宗教改革最重大的贡献。加尔文是一名神学家,在年轻时就构筑了其教义的基本核心:亚当堕落后,人类全然败坏,除少数被上帝预先拣选之人,其余都不可能获得救赎。如果说路德这名奥古斯丁派僧侣以保罗的口吻传教,那么加尔文则援引奥古斯丁的论调。要理解这一悲观主义的派系为何能取得成功并不容易。但不光是日内瓦的历史,就连法国、英格兰、苏格兰、荷兰和英属北美的历史都见证了加尔文派所引发的效应。其教习的关键步骤是确认被拣选的资格。由于其外在标志与上帝的戒律和圣礼的参与一致,要获得这种确认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578

由于加尔文的存在,日内瓦注定将成为是非之地。他以神权统治下的国家体制为依靠,这一体制为加尔文派实行高度自治的管理提供了框架。渎神和巫术要受死刑,但当时的人不会对这套规则感到惊讶。通奸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也是犯罪,要接受宗教法庭的判罚。但加尔文所在的日内瓦将这种不正当行为看得更为严重,并以死刑作为惩罚;通奸的女子会被溺死,男子则被斩首(与男性主导的欧洲社会中通常的惩罚方式相比,这显然是一个反例——一般而言,女性被视为精神和智力上更弱的存在,因此更受宽容,所受到的惩罚通常较男性为轻)。异端也会遭到严刑峻法的处置。

以日内瓦为根据地——加尔文派的牧师在这里接受训导,这一新宗派在法国打下根基,至1561年已有超过2000名同道,并在贵族中赢得皈依者;在荷兰、英格兰和苏格兰也对路德宗形成挑战,这一状况最后还发展到德意志。该派信仰也传播至波兰、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加尔文主义早期的活跃程度超过路德宗,除了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和最早接纳其主张的德意志以外,后者从未在其他土地上牢牢扎根。

由于多样化的特征,我们对新教改革同样无法进行概括和简述。这场错综复杂的改革深深扎根于其源头,也深受环境左右,具有丰富、深远而多样的效应和表现。如果当真要把“新教主义”这一名称作为其纷繁无序的表现载体背后的基本定义,那么该定义可以从它的影响及

效应中找到：也就是颠覆性。在欧洲和美洲，新教创造出以《圣经》研究和布道为基础的新型教会文化，而且令这份文化具备了有时能够超越圣礼的重要意义。它让千百万人养成一种频繁省视私人行为和良知的新习惯（讽刺的是，这正是罗马天主教长久以来渴望实现的目标），从而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同时也令独身教士获得新生。其负面影响是令一切既有的教会机构遭到冷落，至少也受到了质疑，并创造出新的、王

579



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运动下的欧洲

族能够为自己的目的加以操纵的教会政治势力——他们往往利用这股势力来对抗教皇,而后者在他们眼中与自己无异,也只是世袭统治者中的一员而已。新教主义被其敌友双方同样恰如其分地视作确定近代欧洲形态的决定性力量,因此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决定性力量。

但首个否认教廷权威的国家的出现与路德宗或加尔文派都没有直接关系。几乎出于偶然,一场独一无二的宗教变局在英格兰展开。15世纪末期,一个源自威尔士的新王朝都铎成为英格兰的主人,其系谱中的第二代国王亨利八世与教廷发生纠纷,因为他希望与首任妻子解除婚姻关系(他前后共有六任妻子)以便再娶并生养一名继承人,这是可以理解的想法。此纠纷导致双方的对立,以及整个16世纪最突出的、世俗权威崛起的事件,对英国的未来造成重大影响。听命于亨利八世的议会通过了他需要的法案[①],在其支持下,亨利八世自封为英国教会之首。在教义方面,他没有与过去割裂的想法;毕竟,他曾亲笔撰写驳斥路德的檄文,因此还被教皇封为“信仰守护者”(其后代至今仍拥有这一头衔)。但他坚持王室至高无上的立场,从而开启了英国教会脱离罗马的进程。既得利益集团也很快形成,修道院和一些教会体制的其他基础机构被解散,其财产被变卖给贵族和乡绅。认同新信仰的教士意图在次任国王的统治期让英国教会大步迈向欧洲大陆的新教主张。大众的反应不一而足。有人视之为维护与罗马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古老民族传统而感到满足;也有人憎恶创新的举措。在纷纷扬扬的争议和暗流涌动的政局中,涌现出一部文学巨著——《公祷书》,以及一些殉道者,其中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皆有。在都铎第四任君主“血腥玛丽”统治期间,曾出现重新接受教廷权威的趋势(还将新教异端处以火刑),她得到如此别名实属不公,或许是英格兰历史上最具悲剧色彩的女王。不仅如此,因为欧洲诸国越来越有赖于其宗教立场,当时的宗教问题和国家利益及外交政策已完全不分彼此。

以上并非英国宗教改革值得关注的所有方面,就如德国宗教改革

580

① 即《至尊法案》。——译者注

一样,这是国家意识成型的里程碑。《议会法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也是宗教解决方案对宪政体制发出的无声疑问:立法权威是否应受任何限制?玛丽的异母妹妹伊丽莎白一世登基后,趋势又倒转过来,但有很长一段时期看不清局势究竟能发展到何等程度。不过伊丽莎白坚持她依然保留其父亲的地位,议会也立法给予支持。英国教会——或按后世那样称作圣公会——坚持天主教教义,但以王室为最高权威。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议会法案》承认了这一至高权威,英国将与西班牙天主教国王维持漫长的战争状态,西班牙国王在他所统治的土地上扫荡异端的坚定决心是世所共知的。于是,另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也因新教而奠定。

宗教改革有助于英国议会的存续,而其他中世纪代议制团体则被君主的实力所打压——当然,这远远不是历史的全貌。身处一个自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统一至今的王国,又没有地方行省议会的对立,使英国议会比其余国家的类似团体更易于成为国家政治的焦点。王室的漫不经心也有所助益;亨利八世曾获得建立君主专制稳固基础的绝好机会,通过解散宗教机构,他曾暂时持有大量地产,大约占整个王国五分之一的土地,可他却坐失良机,将这些土地迅速清偿变现。尽管如此,哪怕把所有此类无法衡量的因素都恰如其分地考虑在内,亨利选择寻求国家代议制团体的支持,以贯彻其建立国家教会的意志,这依旧是议会史上最为关键的决断之一。

581

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的天主教殉道者死于叛国的罪名,而非异端——但英国的宗教分化程度远不及德、法。16世纪的法国在天主教和加尔文派两方的利益纠葛中遭受着折磨和撕扯。两方本质上都是贵族氏族所组成的群体,为争权夺利而战,是为法国的宗教战争。1562至1598年间,可辨识出的战争就有九起。某些时期,两派的斗争令法国君主的地位岌岌可危,法国贵族几乎赢得了对抗中央政府的战争。但最终他们之间的矛盾还是让一名国王从中渔利,令各派互相残杀。境况悲惨的法国民众不得不承受混乱和破坏所带来的大部分代价,直到1589年,一名旁支末系的王室家族成员——小公国那瓦尔的国王亨

利——在前任遇刺身亡之后登上王位,他成为法国的亨利四世,并开启波旁王朝,其后代至今仍拥有法国国王的名分。他曾是新教徒,但后来改信天主教,因为他认识到大部分法国人信奉该教派,这是他继任王位的有利条件——也是法兰西民族认同感中长盛不衰的特质。新教徒得到特别保障,他们保留着国中之国的状态,占有要塞化的城镇,国王的号令无法通行;这种非常古老的解决方式创造了新的豁免权,从而保护了他们的宗教。于是,亨利及其继任者可以专心着手于重建因暗杀和密谋而摇摇欲坠的君主权威的工作。但法国贵族依然桀骜难驯。

在此之前,宗教对立已因罗马教廷的内部调整进一步激化,这一举措就是我们所称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在能表现这场运动的事件中,最正式的莫过于1543年召开的特伦特全体大公会议,共分三期、历时13年。来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主教占会议成员的大多数,这对会议的走向不无影响,因为宗教改革对意大利教会的冲击微乎其微,在西班牙则完全不存在。大会决议成为19世纪以前正统教义和教规的基石,为天主教君主们提供了党同伐异的基准。主教获得更大权威,教区具有了新的重要地位。会议还不言自明地回答了一个古老的问题,即欧洲天主教领导权的归属;从那时起,这一权力无可争议地属于教皇所有。不过,和宗教改革一样,反宗教改革运动不仅涉及形式和原则问题,还掀起了新的宗教热忱,让教会内外人士一同重燃信仰的狂热。除了将每周参加弥撒确定为义务、对受洗和婚嫁加以更严格的规约、终止"赎罪券贩子"出售赎罪券的行为(正是这一行为导致路德宗运动的爆发)之外,这场运动还力图拯救陷于传统迷信泥沼的农村地区,他们所受忽视极为严重。想在意大利的蒙昧乡野传播福音的传教士将其称作"我们的印度",意指他们就如新大陆异教徒那样亟需福音的拯救。

582

然而,早在15世纪的信徒当中就已经明显表现出来的自发式精神狂热也是反宗教改革运动汲取力量的来源。这一新情绪最强有力的表现之一是某位行伍出身的西班牙人的创举,他就是罗耀拉的圣依纳爵(Ignatius Loyola)。而且,他所创建的机构具有非常持久的生命力。出于某种命运的嘲弄,他曾就读于加尔文在16世纪30年代求学的巴

黎大学，但没有关于两人见面的记载。1534年，他与若干同道中人一同起誓，将传教事业作为自己的目标，因为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他们在罗耀拉领导起了一个新的宗教团体。1540年，教皇承认其领导地位，并将该团体命名为耶稣会。其成员很快被冠以耶稣会修士之名，在教会史中具有等同于早期的本笃会或13世纪的方济各会的重要地位。作为创建人和一名骑士，圣依纳爵将他们视为教会的民间武装，要求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以及对教皇权威的完全服从，教皇的命令则由居于罗马的总会长传达。他们改变了天主教的教育方式，是世界每个角落的传教先驱。在欧洲，他们凭借满腹经纶和政治手腕身居各国宫廷的高位。

然而，虽然耶稣会为支持教皇权威提供了新的工具，反宗教改革运动（就如宗教改革一样）也能强化非教职统治者对臣民的权威。宗教对政治权威——也就是有组织的武力——产生了新的依赖，进一步加强了政治机器的控制力。这在西班牙诸王国表现得最为明显。两种势力在该地汇成一股，早在特伦特会议之前就形成了无可动摇的天主教君主统治局面。首先，刚完成不久的收复失地运动是一场十字军式的运动，天主教君主的头衔本身就使一段政治进程拥有了与意识形态斗争相同的定义；其次，西班牙君主面临大量非基督教臣民突然涌入的难题，其中包括穆斯林和犹太人。人们惧怕他们对一个多种族社会的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为了对抗这种威胁，一个全新的机制应运而生：由王室控制（而非像其中世纪的前身那样由教士掌控）的异端裁判所。凭借教皇颁布的诏书，西班牙异端裁判所于1478年设立，从1480年起在卡斯蒂利亚开始运作。教皇很快碰上麻烦；加泰罗尼亚的教内、教外权威一同予以抵制，但最终不了了之。到1516年，当首位同时拥有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王位的统治者查理五世成为国王，由皇家裁判团组成的异端裁判所是西班牙全境内惟一能对所有领地行使司法权的机构——在美洲、西西里和撒丁岛的权限不亚于在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其最突出的后果已经显现，即后世所称的“种族清洗”，犹太人被驱逐、摩里斯科人（Morisco，皈依天主教的摩尔人）被严加约束。

583

这令属于少数的路德派信徒无力打破西班牙的宗教统一,异端裁判所要收拾他们易如反掌。但西班牙最终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然而,在天主教狂热信徒查理五世的统治下,不管在宗教还是世俗生活中,西班牙都已经在谋求一种新形态的中央化君主专制;这个极为杰出的"复兴国家",事实上(也是无意间)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必须就遍及全球的事件作出决策的行政有机体。该半岛形式上的宪政体制残余几乎对此趋势毫无影响。西班牙是其余反宗教改革运动国家学习的典范。在一处偏僻的修道院隐居、用大半余生侍奉上帝之后,查理于1558年去世,此后百年间,通过示范或武力,其体制将被很多欧洲国家采纳。

在所有支持反宗教改革运动、视其为铲除异端之正道的欧洲君主中,无人比西班牙腓力二世更为坚决和偏执。他是查理大帝的儿子暨继任者,也是都铎女王玛丽的鳏夫。他继承了父亲的半壁江山:西班牙、印度群岛、西西里和西属尼德兰(又在1581年获得葡萄牙,并将西班牙对该国的占有状态保持到1640年)。他在西班牙的宗教清洗政策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一直众说纷纭。而该政策在西属尼德兰的效应则无需争议——催生出世界上第一个挣脱君主及贵族领主统治这具古老枷锁的国家。

被某些人称为"尼德兰起义"、荷兰人称作"八十年战争"的战火,和很多其他关乎民族国家起源的事件一样,是神话的重要来源,其中有一些传说系有意为之的创作。但即便是此类传说和神话,也不如另一种假设来得更具误导性:因为这场战争最终令一个近代形态的社会崛起,所以起义本身也是"近代式"的,其主旋律是为宗教容忍和民族独立而斗争的激情——这种观点是彻头彻尾的谬误。尼德兰问题具有极为鲜明的中世纪背景。作为通过联姻转入哈布斯堡王室名下的大公领地,北欧最富饶的一片土地被古勃艮第王朝所继承。西属尼德兰就是这片土地的一部分,由17个类型差异巨大的省份组成。南部省份包括欧洲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和安特卫普的佛兰德斯大贸易中心,那里的很多居民都说法语。这些省份长久以来都不安分,15世纪后期,佛

584

兰德斯城镇还一度试图获取独立城邦的地位。北部省份更偏重农业和海事。那里的居民对其土地表现出一种近乎怪异的偏执情感,或许是因为他们一寸一寸地从海洋手中争得这些土地,并从 12 世纪开始围起一片片圩田的缘故。

南北两部分将分别成为后来的比利时和荷兰,但在 1554 年还看不出任何端倪,也想象不到两地的宗教会发生分裂。尽管很多新教徒移居北方,令南部的天主教主导地位略有增强,但在未来的国境线两侧,这两种信仰都你中有我。与反宗教改革运动起效之后的情况相比,16 世纪早期的欧洲对宗教分歧的容忍力要强得多。

腓力强行实施特伦特会议敕令的决心可以解释后来所发生的部分事态,但麻烦的根源来自很久以前。当西班牙人致力于对中央政府和地方社区的关系进行近代化改造(意味着通过更有效的税收向日渐繁荣的经济索取财政来源),他们采取了更与时俱进的手段,或许也不如勃艮第人那样善于避免矛盾。西班牙王室使节首先与南部行省的贵族发生冲突。就和那个时代的其他贵族一样,南部行省贵族对于保护自己象征性的"自由"——即特权和豁免权——十分敏感,他们感到这名比查理更遥远的君主对这种自由构成了威胁,即便腓力是伟大的查理五世之子——他们觉得查理能够理解他们,也使用与他们相同的语言。他们声称,西班牙元帅阿尔瓦大公干涉了缉捕异端的当地司法事务,进一步侵犯了地方上的特权。新教徒已在佛兰德斯城镇中扎根,害怕自己会被交到西班牙异端裁判所手里。虽然贵族们是天主教徒,但这些城镇的繁荣局面也是其利益所在。此外,他们就和当时的其他贵族一样,对通货膨胀的压力感到不安。

585

以彻头彻尾的中世纪方式,抵抗西班牙政府的行为在布拉班特地区发端,数年后,由于西班牙军队的暴行和反抗贵族中的一员——奥兰治的威廉(William of Orange)——的领导,贵族们团结起来、共同对抗法定意义上的统治者。和同时代的都铎女王伊丽莎白一样,威廉(别名"沉默者",因为他得知西班牙统治者决意要把他臣民中的异端赶尽杀绝后,依然强忍住内心的愤怒,并以此扬名)善于为共同的事业赢取认

同感。但贵族和加尔文派市民之间始终有着潜在的矛盾,因为市民参与抵抗行动将面临更严重的后果。最终,西班牙总督更高明的政治手腕和西班牙军队的胜利足以迫使这份矛盾浮于表面。贵族偃旗息鼓,于是西班牙军队在无意之中划定了现代比利时的边界。只有北部省份继续斗争(但依然在“沉默者”威廉的政治领导之下,直到他 1584 年遇刺身亡)。

荷兰人(现在我们应该可以如此称之)有太多值得抗争的东西,也不像南部的同派教友那样对贵族的不满情绪并不彻底。但他们自身内部也存在分歧;各省份很少顺利达成一致。另一方面,他们可以利用宗教自由的呼声和广泛的容忍精神来掩盖分歧。而且,他们也因佛兰德斯人的大规模北迁受益,从中收获了大量资金和才俊。其敌人也有难处:西班牙军队虽十分强大,但躲在城墙后的荷兰人并不容易对付,何况他们还会升起堤坝,用一片水泽将西班牙人围困起来。几乎在不经意间,荷兰人将主攻点转到海上,在那里,他们能对西班牙人造成沉重得多的打击,双方的作战条件也更为平等。起义军开始袭扰北海航道后,西班牙与尼德兰地区的联络状况立即恶化。通过途经意大利的漫长陆路来维持一支常驻比利时的大军代价不菲,如果出现其他需要打退的敌人,这笔开支会更难以承受。而这一状况很快就成了现实。反宗教改革运动已经令国际政治染上了一层新的意识形态色彩。出于维持欧洲大陆实力平衡和防止西班牙彻底坐大这两方面的利益诉求,英国首先采用外交手段遏制西班牙,接着转为海陆军事对抗,使荷兰人获得盟友。

几乎是出于巧合和偶然,这场战争创造出一个灿然一新的社会——由七个小共和国和一个弱小的中央政府组成的松散联邦,称为联合行省王国。很快,其国民发现了该民族被遗忘的过去(与 20 世纪去殖民化后的非洲人非常相似),并从罗马人对叛乱者只言片语的记述中发掘和赞颂日耳曼部落民的美德和节操;这股热忱的残迹保留在受阿姆斯特丹显贵委托、描绘日耳曼部落攻打罗马营帐场景的画作中(这一时期属于因伦勃朗的画作而被我们铭记的时代)。这个通过刻意创

586

造而形成的民族国家的特殊气质，比此类历史题材的意识形态宣传更饶有趣味。不用再为生存问题担忧的各行省享有宗教容忍、极大的民事自由和行省独立地位；荷兰人不容许加尔文主义在政府中占据上风。

后世认为，从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可以找到相似的宗教和民事自由；考虑到英国体制在下一个世纪的演进方式，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依然是一种谬年代之误的观点。矛盾的是，国家立法权大大增强是这份自由的组成部分之一，使特权受到极大限制，到 17 世纪末已达到令其他欧洲人称奇的地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人们都想象不到这种结果。伊丽莎白一世是一朵无与伦比的王室奇葩。当青春和美貌的神秘光环从身上消退，她已获得了那些熬过摄政时期、最终掌握权柄的人所具有的堂堂仪态。这位女王在 1603 年走到了登基的第 45 个年头，通过都铎王室血统中与生俱来的、将王朝利益与爱国主义紧密结合的本能，借助才华洋溢的诗人的作品，以频繁游访等平凡的方式（她总是在贵族家中客居以减少出行开支）接近民众，凭借应对议会的超凡技巧，她成为整个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她也不会为宗教原因发动迫害；诚如本人所言，她不想“在人们的灵魂上开窗破洞”。这位“英明女王”的加冕日会成为爱国者反对其继任者治下政府的节日，也就完全不足为奇了。美中不足的是，伊丽莎白膝下无子，无法传承她赋予君主宝座的光辉与荣耀，而且她还留下一堆债务。和当时其他所有君主一样，她的财政始终捉襟见肘。对于继承其位的苏格兰斯图亚特王室首任国王詹姆斯一世来说，这笔债务有害无益。该王室接连为英国送上四名昏君，直至今日，论及其男性成员的种种缺陷，相关著述依然难以做到心平气和。不过，詹姆斯既不像他儿子那样愚蠢，也不像他孙子那般失节。对其政治生涯伤害最大的，可能是他有欠老练和疏离人心的做法，而非其他更严重的缺陷。

如果要为斯图亚特王朝辩护，那么，他们并不是惟一麻烦缠身的王室，这一点是得到公认的。17 世纪，多个国家的当权者大致在同一时期面临危机，而且有意思的是，这场危机与全欧范围的经济危机平行发展。两者也许存在关联，但要确定关联的本质并不容易。同样有趣的

587 是,这些内乱在时间上与反宗教改革运动所开启的宗教战争时期的最后阶段彼此吻合。或许,我们至少可以假设,正常的政治生活在多个地区同时崩溃,而且在英伦三岛、法国和西班牙特别明显,这可部分归结为三国政府被迫参与宗教战争的需要。

在英格兰,这场危机一路升级,从内战、弑君发展到英国历史上惟一一个共和国的成立。关于这场查理一世与议会之间的争斗,其争执的核心是什么、无可挽回地发展成一场武装冲突的临界点又在哪里,史学界依然存在争议。他陷入与部分臣民兵戈相见的境地(因为他是英格兰及苏格兰两地的国王),不得不在 1640 年向议会寻求帮助。若没有新的税收来源,英格兰就将失守。这是局势发展的关键转折点。但当时有部分议员确信,王室密谋利用议会通过的法案推翻教会、重新确立罗马的权威。议会对国王的臣仆发起攻讦,还将两名最可疑的人送上绞架。1642 年,查理下定决心,认为武力是解决问题的惟一手段,于是内战爆发。查理败北后,议会心中忐忑,很多英国人也一样,因为如果连国王、领主和平民所组成的古老体制都被推翻,无人知晓最终会如何收场。但查理向外来入侵者寻求支持(苏格兰人这一回将为他而战),从而断送了自己的优势。这超出了多数议员的底线,查理被审判和处决——当时看来是令人震惊的结果,其子沦为流亡者。

此后,英格兰进入一段无王时期,全英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奥利弗·克伦威尔一直是该国的掌舵人,直到 1658 年去世。他是一名乡绅,后凭借其作战才能在支持议会的地方政府中崭露头角。这给了他巨大的优势——凭借身边的军队,他完全不用依靠那些政客——但也给他设下了限制,因为他不能冒失去军队支持的风险。为了寻找一种通过议会管理国家、同时避免英格兰全盘新教化的手段,克伦威尔打造了一个英国共和政体,在新宪政体制下,这一史称大英联邦的政体成果斐然。

某些议员不能容忍其他教派,这种立场是英国(以及美国)的新教存在多方面张力的表现之一,这种原则被称为清教主义。自从伊丽莎

白一世时代起，这一定义模糊的势力就在英国人的生活中日趋强大。其代言人起初只追求用一种高度封闭和清苦的方式来实践宗教教义及仪式。大部分早期清教徒是圣公会成员，但对抱残守缺于大量天主教旧习的教会失去耐心；随着时间流逝，这种不耐烦越来越成为定义清教徒的标志之一。到17世纪，作为标志性名词，除了严格的教义和不赞同宗教仪式的态度之外，“新教徒”还暗示着某人具有改革社会行为规范的倾向，而且带有强烈的加尔文主义色彩。在共和时期，很多内战中的议会支持者开始显现出利用这场胜利、通过法律来强制推行清教教义和道德观的意愿，不仅要针对保守派和忠王派的圣公会教徒，而且也针对少数派宗教异见群体——公理会、浸信会、一位论派——这些群体在共和政体中都有一定发言权。清教在政治和宗教两方面都毫无民主可言。那些被拣选者或许可以自由选择该地的长老，作为一个社群实行自我管理，但对于圈外人来说，这批自封的被拯救者仿佛（也确实）以上帝旨意的惟一代言人自居，从而更令人无法接受。他们是一些非典型的少数派，而不是新教体系中的主体，对共和时代的伟大辩论贡献良多的民主和制衡理念被他们弃之不顾。 588

内战与联邦时期，共出版了超过两万本以政治和宗教为主题的书籍和小册子（pamphlet，17世纪50年代开始使用的英语词），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使该时期成为英国政治教育的伟大时代。不幸的是，一俟克伦威尔撒手人寰，共和国的体制缺陷就暴露得一清二楚。英国人无法通过任何新宪法，因为达成一致意见的人数总是不够。到头来，其中大部分人还能够接受原先的君主制。于是，英联邦伴随着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的复辟告终。英格兰以心照不宣的条件迎回了自己的国王：作为最后的选择，查理二世重返王位，因为议会如此要求，也相信他会守护英国圣公会。天主教反宗教改革运动给英国人带来的恐惧不亚于激进的清教主义。国王与议会的斗争并未结束，但英格兰不会再有极权君主；从此以后，国王将陷于守势和被动。

历史学者已连篇累牍地论述过所谓的“英国革命”究竟表达了什么。显然，宗教在其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新教极端分子获得一次后无

来者的、影响整个国家的机会,招致圣公会教徒深切的厌恶,令英格兰政界产生延续数百年的反教士情结。一位研究这场纷争的英国古典历史学者以“清教革命”论之,这并非没有根据。但宗教并不比立宪之争更全面地表现出这段岁月的意义。另一些人在这场内战中发现一份古典式斗争的痕迹。很多内战参与者的利益动机不难判明,但不存在任何清晰的普遍模式。还有人视其为不断膨胀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斗争,前者是官僚、廷臣和政客所织成的政府网络,都通过财政依附关系与整个系统相连;后者是为中央体系提供财力的地方名流。但各地方团体之间往往存在分歧:内战所酿成的悲剧之一是亲人之间也会彼此反目。英国革命的结果比其起源和意义更容易看清。

589

大部分欧陆国家因查理一世被审判和处决而惊恐万分,但各国都有自己的麻烦,也不乏血腥。红衣主教黎塞留引导法国进入一段有意识地强化王权的时期,不仅削弱了胡格诺派(即法国加尔文主义者)的特权,而且在各省安插名为总督的王室官员,作为王权的直接代表。17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行政改革使法国民众几乎毫无喘息之机的苦难生活雪上加霜。在经济依然以农业为压倒性主体的法国,黎塞留的措施必然会对穷人造成最严重的伤害。不出几年,农民的赋税就翻了倍,有时甚至达到三倍。而这种做法的结果是引发一场声势浩大、遭到残酷镇压的叛乱。法国部分地区更是因波旁与哈布斯堡王室之间的冲突而饱受战火荼毒。这场冲突是波及德意志和中欧的三十年战争的最后阶段。法国的洛林、勃艮第和大片东部地区沦为废墟,部分区域的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针对法国国王意图征收新税(且有人称其不合宪章)的控诉最终在黎塞留继任者当政时期引爆政治危机。特殊利益集团承担起捍卫传统宪章的任务,特别是巴黎大理院(*parlement*),[①]由律师团体坐镇,可向法兰西第一法院提出申诉。1648年,他们领导了一次巴黎暴动(不久后得名投石党暴动[*Fronde*])。经过一段人心惶惶的过渡期后,又发生了第二场由大贵族领导的投石党

① 法国旧体制下的最高法院,其前身是卡佩王朝时期的御前会议。——译者注

暴动,此后双方达成了妥协方案。虽然巴黎大理院无法长期维持内部的统一阵线,但就如地方叛乱所昭示的那样,这些人可以成为地方行省贵族反中央集权意识的凝聚核心。然而国王依然保住了王位(总督们也保住了官位)。1660 年,法国的君主极权制在本质上依然完好无缺。

税收问题也令西班牙陷入麻烦。一名大臣试图压制西班牙联邦体制形式所固有的地方主义风气,导致葡萄牙爆发起义(以承诺尊重当地自由为条件,葡萄牙在腓力二世治下被西班牙兼并),巴斯克人和加泰罗尼亚人也发起叛乱。加泰罗尼亚的叛乱耗时 12 年方得平定。1647 年,西班牙那不勒斯王国也发生了动乱。

590

以上所有内乱都是金钱压榨所引发的抵抗。因此,从财政角度而言,西班牙这个"复兴国家"远远算不上成功。17 世纪,常备军在大部分国家出现,这一方面标志着一场军事革新,因为战争将开始吞噬巨额的税金。然而法国人承受的税额似乎远远大于英国人,为何这场"危机"给法国君主带来的折磨反而更小呢?而另一方面,英格兰经历了内战,一度推翻了一国之君,却没有遭受外敌入侵所造成的那种破坏。该国偶尔发生的、抗议物价过高的暴动,也无法与 17 世纪法国恐怖血腥的农民起义相比。而且,英格兰当权者还面临源自宗教分歧的特殊难题。而宗教分歧在西班牙不存在,在法国早已得到控制。胡格诺派的确是一个既得利益团体;他们视君主为庇护者,所以在投石党暴乱中站在君主的一边。地方主义对西班牙影响很大,对法国较小,对英格兰的作用似乎微乎其微,但为保守团体保护自身利益、抵御政府创新举措的威胁提供了立足点。随着年轻的路易十四完全掌控法国大权、查理二世返回英格兰,1660 年可以称得上是某种转折点。法国的无政府状态直到 1789 年才复萌,且在此后半个世纪中展现出惊人的军事和外交实力。尽管英格兰依然面临不少宪政难题,但将再也不会发生内战,也不再有国王被废黜。1660 年以后,英国将拥有常备军,并经历最后一次动乱,由一名实力不足的谋反者和数千被蛊惑的乡民于 1685 年发起,对国家不构成丝毫威胁。以回顾历史的视角来看,这一切令一桩事实显得更加突出——人们总是不愿承认最高权力的真实性质。英国人郑

重其事地订立一系列保护个人自由的《权利法案》,但直到 1689 年,一名国王在议会中下的决定无法被另一名国王撤销的惯例依然无法动摇。在法国,人人都同意国王的权力是绝对的,但法学家却声称他不具备从事某些行为的合法权力。

至少有一位思想家认识到了社会前进的方式,他就是英国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其著述——特别是 1651 年出版的《利维坦》——中表达了这一观点。霍布斯主张,让一个人拥有法律定义的最终决定权可能导致该权力落入暴君之手的危险,而不允许某人独揽大权虽然会造成一些不便和不确定性,但显然是权衡利弊后的更好选择。他为那个时代的困惑感慨良多,深感亟需找到权威的确切来源。虽然混乱没有持续发生,但始终有爆发的可能:诚如霍布斯所言(大意),不必成天在瓢泼大雨中生活,你也能说天气少晴多雨。无限的立法权——最高权力——属于且仅属于国家政府,不能被豁免权、习俗、神律或其他任何一切限制,否则就有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危险,认识到这一点,就是霍布斯对政治理论的贡献所在,但他并未因此获得多少赞誉,而且直到 19 世纪才获得应有的评价。对他的攻击几乎铺天盖地,然而人们的行为却往往成为其观点的注脚。

591

采取立宪制的英格兰事实上是首批按霍布斯的原理运转的国家之一。18 世纪早期,英国人(尽管苏格兰人在《1707 年联合法案》生效后加入了威斯敏斯特的议会,但他们的想法不如英格兰人坚定)原则上接纳了,也在实践上对这样一个原则加以某种程度的贯彻——除非出于务实考虑,否则法律的效力应不受任何限制。甚至晚至维多利亚时代,这一原则也会受到公然的挑战,但 1688 年的英格兰无人公开反对,是时,议会最终放弃斯图亚特王室的直系男性继承人,将詹姆斯二世赶下王位、有条件地把他的女儿及王夫扶植上台,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间,议会越来越成为国王必须应对的存在,这已经显示出议会力量强化的趋势;随着契约型君主制的确立,英格兰最终告别其旧制度,开始以宪政国家的方式运转。中央权力被有效地分立;主要权力属于下议院,代表

社会主导群体——即地主阶级——的利益。国王依然享有重要的特权，但事实很快表明，他的提议必须获得下议院的信赖方可实施。最高立法权属于“议会之君”(Crown in Parliament)，①国王可通过法律手段采取一切行动。但依然为欧陆国家的特权阶级充当保护伞的豁免权或有望与议会对抗的实体都不复存在。对于权力如此集中所构成的危险，英国人的应对方法是确保——如有必要，哪怕采用革命手段也在所不惜——权力机关只能依照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意愿行动。

1688年，英格兰迎来一位荷兰国王：玛丽女王的丈夫威廉三世，对他而言，同年爆发的“光荣革命”最主要的意义在于可以让英格兰动员起来对抗法国，因为法国正在威胁尼德兰七省联合王国的独立地位。虽然后世单纯从宪政或意识形态角度解读英法战争，但其中有太多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不仅如此，由于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和德意志诸王国的存在，此后二十多年间，抗法联盟经历了种种变迁，令所有在两个阵营间寻找清晰的政治原则对立面的尝试变得毫无意义。不过，那个时代确有一些人发现这场战争背后掩藏着某种意识形态元素，而且他们的想法并没有错。英格兰与荷兰社会比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更为开放。前两国允许并保护不同的宗教实践活动，不对媒体进行审查，而是用保护个人及国家不受诽谤的法律加以规范。两国由寡头统治，这些寡头代表着切实掌握社会及经济力量的群体。而法国则截然相反。

592

在路易十四统治下，政府的极权达到了法国历史上登峰造极的地步。要把他的抱负准确划入某个世所熟知的范畴并不容易；因为他个人、所属王朝和法兰西民族的伟大是几乎不可分割的整体。也许正因如此，他才成为所有欧洲君主中的典范。政治被切实限制到行政范畴；王室议会、代表王室的各省总督和军事将领都充分顾及到贵族和地方

① 联邦制国家的专用术语，指国王作为立法者的身份，他须在议会或立法机关的建议和咨询下行使其权力。——译者注

豁免权这类社会现实的存在,但他的统治对法国至该阶段所形成的、真正独立的政治势力还是造成了极大的打击。这是一个在全法境内确立王权的时代,也被部分后世之人视为革命的时代;该世纪后半叶,黎塞留所打造出的框架终于不再空洞,行政实践使其有了实质性的内容。路易十四用全欧洲最富丽堂皇的宫殿让贵族顺服;基于本人的社会等级和尊卑意识,他乐于用荣誉和俸禄来安抚贵族,但从未忘记投石党暴乱,像黎塞留一样始终对贵族加以控制。路易的亲属被排除在宫廷之外,宫中还有非贵族出身的大臣,让他有可以放心依靠的对象。大理院的职能被限制在司法范围;法国教会独立于罗马的地位获得保障,但结果是更无法离开基督教陛下(Most Christian King,这是路易的某个头衔)的羽翼。对于胡格诺派,路易的立场十分坚定,无论付出多少代价,他也不想成为异端的国王;没有逃离法国的胡格诺派信徒遭到严酷迫害,以强迫他们皈依正统。

尽管法国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时代取得了伟大的文化成果,但这似乎依然难以让法国人认同其中残酷的一面。他所君临的社会等级森严,强调集体主义和神权统治,即便统治手段是与时俱进的,可目标却是陈腐过时的。路易甚至觊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宝座。他禁止在法国为哲学家和宗教捍卫者笛卡儿举办宗教式的葬礼,因为其思想具有危害性。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他所打造的政府似乎是大部分法国人所向往的那种。高效政府的行事风格可能显得残忍,593 例如让士兵暂住在胡格诺派信徒家中强迫他们改信,或让骑兵部队每隔一个月左右去威吓不愿交税的农民,这些都是已知的史实。然而,除了若干不寻常的灾年,民生还是比数十年前有所改善。归根结底,这段统治期是一个混乱时代的终结,而非另一个乱世的开端。法国大体上免于外敌入侵,土地投资的预期回报有所下跌,并持续到 18 世纪中后期。正是这些有据可循的现实,折射出了这个被后人称为盛世的时代的闪耀光芒。

路易在欧洲的地位大多靠战争赢得(不过统治末年经历了严重倒退),但也不纯靠军队和外交。作为完美的集权制君主,他树立了君主

的典范，从而令法国的威望达到巅峰，并能长久保持。规模浩大的凡尔赛宫的落成是路德维希[1]所取得成就的实体化身。无论是作为建筑还是其居住者，都鲜有如此被人尊崇和模仿的范例。18 世纪的欧洲到处充斥着微缩仿制版的法国宫廷，建于数十年的承平时期，由未来的"大帝"们兴建，以其臣民的痛苦为代价。经过路易时期大规模战争的动荡之后，这种稳定与持续的局面几乎出现在所有地区。

1715 至 1740 年间没有任何可以引发各国内部变革的重大国际紧张局面，也没有 17 世纪的那类严重的理念分歧、抑或急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相应的张力。因此，经历了百年左右的乱世之后，政府不再变化、社会也安定下来的局面几乎成为全欧洲的普遍景象也就不足为奇了。除了大不列颠、联合行省王国、瑞士各州和活化石一般的意大利诸共和国，君主极权制是 18 世纪大部分时期最盛行的国家制度，有时会采取后来被称作"启蒙专制"的形式，这一名词现在没有、过去也从未具备过比今日的"权利"或"左派"之流更为清晰的含义。所谓"启蒙专制"是指始于 1750 年左右的一种趋势，若干可能受当时先进思潮影响的君主意欲在实践层面推行改革，从而走向创新之路。此类创新即便有效，也多少受极权制下君主绝对权力的影响。虽然有时显出人道主义色彩，但"启蒙专制"的政策在政治上未必自由。另一方面，这些措施往往具有近代属性，因为削弱了传统的社会及宗教权威，打破了既有的社会等级或法权观念，有助于集中国家的立法权，确保国家对臣民的权威不受挑战，这些臣民越来越被当成个体的集合来对待，而非等级群体中的成员。

594

毫不令人惊讶的是，能完美契合这一概述的实例几乎不可能找到，就如不可能找出百分之百"民主"的现代国家，也不可能在 20 世纪 30 年代找到完全满足"法西斯"定义的国家，这一观念放之四海皆准。例如，在地中海和南欧国家中，那不勒斯、西班牙、葡萄牙及其他一些意大

---

① 原文 Ludovican，即 Ludovic 的形容词态，而 Ludovic 同 Ludwig——即 Louis 的德语拼法。——译者注

利王国(有时就连梵蒂冈也不例外)都有大臣试图推行经济改革。其中有些人是受新兴事物的刺激;另一些人——如葡萄牙和西班牙廷臣——将启蒙专制视为一种手段,意图恢复所失去的强国地位。他们的部分做法侵蚀了教会的实力。这些大臣所侍奉的君主几乎都与波旁家族沾亲带故。帕尔马——参与这股潮流的最小的国家之一——与教廷发生争执,导致以上所有国家都被卷入一场针对教廷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左膀右臂——耶稣会——的全面攻击。1773 年,教皇被迫解散耶稣会,这场失败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不仅确有实效,也展示了进步的反教士主义思想哪怕在天主教欧洲也拥有强大的力量。

这些国家中,除了陷入衰退的西班牙,没有任何国家怀有一丝一毫的称霸企图。另一方面,在走上启蒙专制道路的四个东欧国家中,有三个无疑抱着如此野心。不属于此列的是摇摇欲坠、步履蹒跚的老迈王国波兰,沿“启蒙”路线进行的改革在既有体制面前如以卵击石;波兰确实存在启蒙思想,但没有能够有效对其加以运用的专制政体。普鲁士、哈布斯堡帝国和俄罗斯则更为成功,均在打开启蒙局面的同时强化了国力。变革的线索又一次可以从战争中找到,其代价远远超过建造哪怕最奢华的凡尔赛宫复制品。俄罗斯的近代化可追溯至该世纪初,当时,彼得大帝力图通过技术和体制革新确保该国未来的大国地位。该世纪后半叶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成为这一举措极大的受益者。她还广泛宣扬自己对文学和人文事业的扶持,用最时髦的思想为其治世镀金。这一套非常肤浅;传统的社会秩序毫无变化。俄罗斯还是保守的专制国家,其政治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贵族派系和家族间的斗争。启蒙思想也没有令普鲁士发生多少改变,高效节俭的中央化行政风格在该国有着良好的传统,体现出很多别国的改革者所追求的特质。普鲁士已经实现宗教容忍,霍亨索伦王朝的君主统治着一个传统意识浓郁的社会,在 18 世纪根本没有发生变化。普鲁士国王必须(也愿意)认识到,贵族的默许是其权力的基础,因而悉心守护他们的法律和社会特权。腓特烈二世一直深信只有贵族可以获得高级军官头衔,而且在其统治末期,普鲁士领土内的农奴数量比他登基时更多。

595

与普鲁士的竞争是哈布斯堡王朝改革的决定性推动力。改革之路存在巨大的阻碍,该王朝领地内的民族、语言和体制构成都非常多样化;皇帝身背无数头衔,匈牙利国王、米兰公爵和奥地利大公只是其中寥寥数例。如果这一成分复杂的帝国要在欧洲事务中发挥相当的影响力,中央化和更高的行政统一度必不可少。另一个问题是,罗马天主教在哈布斯堡帝国占压倒性的主导地位,这与波旁王朝统治的国家类似,与俄罗斯或普鲁士不同。教会势力在该国各处深深扎根;哈布斯堡领土涵盖西班牙周边大半地区,那里的反宗教改革运动最为成功。教会还拥有巨额资产,无不受传统、教会法和教廷政策的保护,此外也垄断了教育。最后,哈布斯堡家族成员在这数百年间几乎毫不间断地占据着神圣罗马帝国的王位。因此,他们对德意志负有一份特殊的责任。

这一背景本身已有可能为哈布斯堡帝国境内的近代化进程抹上"启蒙"的色彩。改革实践无处不与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教会势力发生冲突。玛丽亚·特蕾西娅(Maria Theresa)女皇本人对于具有反教会倾向的改革并无好感,但谏言者可以凭一项具有说服力的事实让她支持改革主张:从 18 世纪 40 年代起,哈布斯堡将与普鲁士争霸的局势开始明朗化。财政改革和后续的行政改革一旦开启,最终必然会导致教会和政府之间的冲突。这场冲突在玛丽亚·特蕾西娅的儿子和继任者约瑟夫二世(Joseph Ⅱ)统治期达到高潮。他没有继承母亲的宗教虔诚,且被人称作观念先进的开明派。他的改革与去宗教化举措的关联尤为紧密。修道院失去土地,宗教职务的任命遭到干涉,庇护权被废除,教士对教育的垄断被剥夺。改革的进程引发了种种愤怒和反对的声浪,但后果都不如 1790 年的事件来得严重——约瑟夫的过激行动导致布拉班特、匈牙利和波希米亚贵族的公开抗命。在约瑟夫统治末期,强大的地方机构——庄园和议会——使其大片领地内的政府陷于瘫痪,那些地区可以通过这些机构来反对他的政策。

596

采纳启蒙专制的环境、主导这些国家的先入观念、专制取得了多少成果、是否体现"启蒙"思想、体现到何种程度,这些方面的差异均表明,认为存在某种"典型"的启蒙专制范例是多么具有误导性的观点。显

然,受改革政策和抱负影响的法国政府进一步表明了这一点。矛盾的是,路易十四死后,变革的阻力反而有所增强。其继位者治下(统治初期受摄政者掣肘,只得到少数人的支持),特权阶级的实际影响力有所增强,在最高法院,对侵犯特殊利益和传统特权的法律大加鞭挞的趋势也日渐滋长。认为一国之君拥有至高无上且不受限制的立法权的观点遭到了新的抵制,且这种舆论日趋见长。随着 18 世纪的进程,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令其财政负担越来越沉重,改革的话题逐渐归结为寻找新的税收来源的问题——一种注定要招致反对的做法。对法国君主制实行改革的提议大多都以此为目标。

矛盾的是,1789 年的法国是一个与批判性和先进性思想的构筑和传播关联最为密切的国家,同时却也是最难以将这些思想付诸实践的国家之一。但这是一个在 18 世纪末期波及欧洲所有传统君主制国家的话题。无论为改革和近代化付出多少努力,传统既得利益集团和社会结构的妨害依旧成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无论在哪个国家,把专制君主作为最后的倚靠也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他们无法太过咄咄逼人地质疑传统权威,因为那正是君主本人的依靠。不受限的最高立法权在 18 世纪似乎依然会让很多事物的存在受到威胁。如果传统权利被侵犯,那财产岂不是会同样不保?这是合情合理的担忧,不过作为欧洲最成功的统治阶级,英国统治者似乎接受了法律权限无所不包、改革对象没有例外的原则,并不惧怕如此革命性的思想可能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不过,加上这条重要的限定条件后,启蒙专制也体现了那个已然确立的主题——在长达三百年、波及大量国家的政治演进过程中,作为这一错综复杂的故事的核心,政府实力的提升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试图逆历史进程而动且取得成功的人寥寥无几,也总是昙花一现。诚然,即便最坚定的改革者和最能干的政治家也不得不与一台落后的国家机器打交道,任何现代官僚都会觉得这台机器破旧得无可救药。虽然 18 世纪的政府可以动员的资源比过去多得多,但只能在没有革命性技术创新的条件下加以利用。18 世纪的通讯手段最终还是依靠风力、畜力和

597

人力，和三百年前没有分别；该世纪最后十年投入使用的"电报"只是一套旗语系统，以拉绳为工作方式。军队的机动力只比三百年前略好一点，虽然武器有所改善，但并没有改头换面。如今的警察机构没有在任何国家出现，所得税依然属于将来时。但政府实力已出现可以察觉的变化，这并非源于技术，而是来自理念的改变，是因为早已有之的体制发挥出了更高的效率。1789 年前，没有一个大国敢于奢望所有臣民都掌握政府的官方语言，而且，也许除了大不列颠和联合行省王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赢得臣民足够的认同感，从而不必担心政府和民众的对立、可以专注于保护国民不受外侮。大西洋东岸也没有任何拥有主权的势力展现出充分的近代国家面貌。

三、列强争霸的新世界

598 在那些15和16世纪就确定了基本形式且保持至今的制度当中，就包括常驻代表制。君主们彼此递送长文、相互协商，也还有很多其他方式能进行这项工作，让各方理解事态的进展。例如，中国人把其皇帝设想为九五至尊、普天之王，所有远道而来的使节本质上都是来请愿或纳贡的。中世纪国王彼此间派遣使者或不定期的使节团，从中发展出一套特别的礼节和仪式，使者还能获得特殊规约的保护。公元1500年后，永久性的常驻大使制度慢慢成为和平时期所实行的惯例，也是我们沿用至今的标准手段，这些使官至少能初步处理一切常规事宜，并负有向其君主通报所在国情况的使命。

威尼斯大使是其中第一批值得关注的范例。作为一个如此依赖贸易和正常外交关系的共和国，出现首批堪称典范的职业外交官毫不令人惊讶。更多的变化接踵而至。早期使者所要面对的种种危险逐渐成为被人遗忘的往事，外交官获得了特殊地位，受特权及豁免权的保护。协定和其他外交范式的性质也变得更精确和规范，外交流程向更为标准化的方向演进。所有这些变化都是缓慢发生的，且以人们相信作出改变确有益处为前提。绝大部分情况下，公元1800年确实还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职业外交官，当时的使节通常还不是领取薪水的文职公务员，而是可以负担维持代表地位所需开支的贵族。尽管如此，外交职

业化的进程已经开始。另一个标志是，公元1500年后，一个由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所组成的新世界取代了封建式的个人裙带关系和教皇及罗马帝国皇帝说不清道不明的所谓至高地位所构成的旧世界。

599

这一新体系最突出的特质是，它表明人们开始认为世界由主权国家组成。该观念的成型经历了不少时间；16世纪欧洲在当时人们眼中绝非一系列由只属于该地的统治者管理的独立区域的集合。除了少数例外，其组成部分更不会被视为任何类型的、可称作"民族国家"的实体。如此状况的成因不仅仅是存在像神圣罗马帝国那样堪称古代习规之大全一般的存在，而且还因为王朝统治是早期近代欧洲的外交主导原则。

在16和17世纪，欧洲的政治单元更似一份份领地而非一个个国家。这些领地以兼并、婚嫁和继承为手段，通过或长或短的积累成形，也就是说，具有与构建任何私人家族地产相同的流程和推动力。其结果可从地图上见到，这块或那块世袭领地在两名统治者之间易手，令各份领地的边界处于持续变化状态。这种转让就像农田易主，领地继承人和农民一样对此无能为力。王朝统治模式就是各国君主全神贯注于可能影响联姻的谈判及协定、悉心安排和确保王位传承事宜的原因所在。

除了王朝的利益，君主们还为宗教事宜发生争执乃至开战，而贸易或财富也越来越成为争夺的焦点。部分王朝获得了海外殖民地，也使问题更为复杂化。封建主从关系这一陈旧的原则偶尔还会被各国援引。在上述模式之外也始终存在其他令版图发生变化的推动力，例如对新土地的殖民或民族情感的觉醒。不过，总体而言，16和17世纪的大多数统治者都以继承权和家族利益的守护者自居，且必须将这些资本传递给下一代。由此，他们的行为可以想见，就像一面镜子，反射出各自社会中的其他人和其他家族的立场。不只是中世纪沉浸于家世和血统不可自拔，16和17世纪也是属于谱系学的伟大时代。

公元1500年的欧洲王朝版图将会经历一次重大的变迁。此后的两个世纪，两个伟大的王族将在欧洲大片土地上你争我夺，而且当时已

经在意大利展开角力。他们是哈布斯堡王室和法国的统治家族——起先为瓦卢瓦王朝,1589 年亨利四世登基后改为波旁家族。前者将成为奥地利的统治家族,后者始终以法国为活动中心。但很多其他国家的君主、亲王或王后均出自这两个家族。16 世纪伊始,双方争议的核心是勃艮第继承权的归属问题。当时,任何一方在欧洲的影响力都远远谈不上深远。实际上,与当时的其他王朝相比,它们并不具备鹤立鸡群的实力——虽然过去相当强大,例如,威尔士都铎王朝的初代君主亨利七世曾在 1485 年登上英格兰王位。

600

除了英格兰和法国——或许还包括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其他国家看不到丝毫能够维系政治团结的、真正的民族凝聚力和情感。虽是一个相对而言不算重要的国家,英格兰却是相当成熟的范例。1492 年后,凭借岛国的地理位置免遭大陆司空见惯的入侵和劫掠,只有加莱海港(直到 1558 年方才失陷)除外,这令英格兰政府的中央化程度非同一般。经历以“玫瑰战争”为标志的漫长而无序的混乱时期后,都铎王朝急于确保王国的统一,有意识地将国家利益和王室利益结为一体。莎士比亚对爱国主义语言的运用显得驾轻就熟(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宗教分歧着墨极少)。法国在建设国家凝聚力的道路上也取得一定进展。不过,瓦卢瓦—波旁王朝的麻烦比都铎王朝大得多,其领土内有一片片受豁免权和特权保护的飞地,君主无法完全行使作为法国国王应有的最高权力,部分臣民甚至不说法语。尽管如此,法国的民族国家建设还是成果斐然。

虽然两个西班牙王国的王位直到天主教王室——哈布斯堡的查理之孙在 1516 年登基为查理一世、并与其疯癫的母亲共同执政后才得以统一,但西班牙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查理一世依然留心确保卡斯蒂利亚人与阿拉贡人的权利存在明显的差别,但西班牙民族意识在其统治期变得更为清晰,因为虽然起初广受欢迎,但查理将西班牙纳入更广大的哈布斯堡帝国,从而模糊了该国的民族存在感,而且还为达成哈布斯堡王朝的目标和胜利牺牲西班牙的利益。他于 1519 年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这是该世纪前半叶的一桩重大外交事件。他

的祖父马克西米利安是前任皇帝，也大力促成了他的当选，当时，处心积虑的联姻已使他成为世上有史以来领土最广阔的帝王，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可谓适得其所。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西班牙各王国，因此同时将阿拉贡人在西西里岛的权益和卡斯蒂利亚人在新发现的美洲大陆的权益收入囊中。他从父亲(也就是马克西米利安之子)那里继承了属于勃艮第公爵领地一部分的尼德兰，又从祖父手中获得哈布斯堡王室在奥地利和蒂罗尔(Tyrol)的领地，以及弗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阿尔萨斯和意大利境内大片地区的继承权。这是那个时代累积领土最广阔的王朝，而且查理的弟弟斐迪南拥有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王冠，后来还继承了兄长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宝座。16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哈布斯堡王朝的崇高地位是欧洲政治的基本事实。查理登上皇帝宝座时的头衔充分展现了该王朝标榜的各种真真假假的统治权："罗马之王；获选皇帝；永远的奥古斯都；西班牙、西西里、耶路撒冷、巴利阿里群岛、加那利群岛、印度和大西洋彼岸国王；奥地利、布拉班特、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卡尼奥拉(Carniola)、卢森堡、林堡、雅典和帕特雷(Patras)大公；哈布斯堡、佛兰德斯和蒂罗尔伯爵；勃艮第、埃诺(Hainault)、佩弗特(Pfirt)和鲁西荣(Roussillon)大法官；士瓦本(Swabia)伯爵；亚洲与非洲领主。"

601

无论这一大堆头衔代表着什么，都与民族国家的定义无关。为方便起见，可将上述地区分为两大区块：一是西班牙世袭领地，包括尼德兰和金块供应量与日俱增的美洲，因此颇为富有；二是哈布斯堡旧领地，要维持在该地区主导地位，哈布斯堡王室需要在德意志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在位居皇帝宝座的查理眼中，其家族的权力范围还远远不止如此。他素好以"上帝代言人"自居，如同古时的基督教圣武士那样与非洲和地中海全境的土耳其人对抗，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不少东西。在他自己眼中，他依然是一名中世纪的罗马帝国皇帝，远比其他君主崇高；他是基督教世界的领袖，只对上帝一人负责。或许在他看来，他比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更有资格称为"信仰守护者"，后者是他的对手，也觊觎帝国皇帝的宝座。为了实现他自诩的抱负，德意志、西班牙和哈布

斯堡王朝的利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牺牲。但他的追求是不可能达成的。统治如此庞大的帝国只是一种梦想,考虑到宗教改革的压力和16世纪贫瘠的交通及行政手段,这超出了任何人的能力范围。可查理的野心还不仅如此,甚至竭力坚持以一己之力实行统治,还为实现这一虚妄的目标马不停蹄地四处巡游,或许正因如此,他倒是让帝国的任何部分(尼德兰可能除外)都无法产生对王室的归属感。其志向是中世纪生命力依然在延续的表现,但也揭露了他陈腐过时的思想。

当然,神圣罗马帝国显然不是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它也体现了中世纪的往昔,但体现出的是中世纪最腐朽和虚无的一面。帝国的大半领地位于德意志,该国名义上受皇帝及手下领主的统一领导,实际上乱象丛生,这些领主所组成的机构即帝国总议会。《金玺诏书》发布以来,前后共七名选侯对各自领地拥有实质性的统治权。另有上百名王侯和50多座帝镇具备独立地位。再加上300来个小王国和帝国封臣,即构成神圣罗马帝国版图的全貌,也是那个中世纪早期的大帝国所残留的一切。16世纪初始,试图改变这一混乱局面、赋予德意志某种形式的民族统一的尝试遭到失败,最后只形成了若干新的行政机构;这一结局甚合小国和城邦的心意。查理于1519年当选为皇帝绝非预料之中的必然;被哈布斯堡王朝这个庞然大物吞并后,德意志的利益可能被放到次要地位或彻底忽视的恐惧心理自然会油然而生。为了凌驾于法国国王(惟一构成严重威胁的候选人,因为亨利八世虽然也是候选人之一,但没人相信他的钱袋够充裕)之上,他必须重金贿赂选侯。于是,直到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之前,哈布斯堡王朝的利益一直是该国惟一有效的凝聚力源头。

602

作为地理统一程度最突出的欧洲地区之一,意大利却仍分裂成多个独立王国,大部分由专制王侯统治,还有一些依附于外部势力。教皇是各教会国家的世俗君主。一名出自阿拉贡王族的那不勒斯国王统治着这一国家。他的西班牙亲族则握有西西里岛。威尼斯、热那亚和卢卡都采取共和体制。斯福尔扎(Sforza)家族统治着占据波河大片流域的米兰公爵领地。佛罗伦萨理论上是共和国,但从1509年起被前银行

世家美第奇家族掌控,实际上成为君主制国家。在意大利北部,萨伏伊公爵坐镇阿尔卑斯山另一侧的古代世袭领地,统治着皮埃蒙特一带。分裂状态使这片半岛成为诱人的猎物,以剪不清理还乱的亲缘关系为借口,法国和西班牙统治者都插手该地的事务。哈布斯堡和波旁王朝的明争暗斗构成了16世纪前半叶欧洲外交史的主旋律,其中尤以意大利为焦点。

以意大利为舞台的哈布斯堡—瓦卢瓦战争始于1494年的法国入侵——这让人回想起中世纪的军事冒险和劫掠(披着十字军的外衣)——持续到1559年为止。期间总共发生六场史称的"意大利"战争,其重要性更甚于初期的表象。这段历史在欧洲国家体系的演化过程中具有特殊地位。查理五世的登基和弗朗西斯的竞选失利令两王朝争雄的趋势进一步凸显。对于身为帝国皇帝的查理而言,这场竞争使得德意志的路德宗问题得不到充分关注,从而导致致命的后果;对于身为西班牙国王的查理而言,这场竞争则是耗尽国力的灭亡之路的开端。对法国人而言,这场竞争带来了贫穷和外敌入侵,给他们的国王带来了沮丧和挫折,因为西班牙势力最终还是占据意大利的统治地位。对意大利民众,这场战争带来了各种灾难。自野蛮人入侵以来,罗马城首度告破(在1527年被一支哗变的帝国军攻占),西班牙的霸权最终使城市共和国的伟大时代落下帷幕。意大利海岸一度被法国和土耳其舰只轮番洗劫;法国国王与苏丹正式结盟,揭露了基督教世界的所谓团结有名无实的本质。 603

也许只有奥斯曼人把这段时期看作好时光。往往要独立对抗土耳其人的威尼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东地中海帝国分崩离析。西班牙沉迷于主宰意大利的迷梦不可自拔,已经放弃了早先在摩洛哥取得的征服成果,而美洲仿佛能供应无穷无尽的宝藏,更是令这份幻想日益膨胀。查理五世和其子的帝国大业都在非洲遭受挫折,1571年于勒班陀(Lepanto)打败土耳其人也只是短暂的成功,三年后,土耳其人就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回突尼斯。即便以西班牙的财力,在对抗奥斯曼的同时支撑哈布斯堡王室在意大利的基业也已超出了能够承担的极限。查理

五世的统治末期因债务而举步维艰。

1556 年,在奥格斯堡会议达成德意志宗教争端的第一次解决方案后不久,查理将罗马帝国皇帝宝座让予其弟,后者取得奥地利的继承权,西班牙则由其子腓力二世统治,腓力二世是土生土长的西班牙人。查理生于尼德兰,这位大帝统治时期的落幕仪式也在该国的金羊毛宫举办;离开仪式现场后,他靠在年轻贵族"奥兰治的威廉"肩头失声而泣。哈布斯堡王室继承权在 16 世纪 50 年代的分裂是欧洲历史进程的分水岭。

此后,欧洲历史走入一段数百年来最为黑暗的时期。经历起初的片刻安宁之后,欧洲各国君主及其臣民一同陷入 17 世纪仇恨、偏执、屠杀、残害和野蛮的狂潮,在 20 世纪以前都无出其右者。这段时期首当其冲的事实包括:西班牙拥有军事上的优越地位,反宗教改革运动开启了意识形态冲突,宗教内斗令德意志瘫痪、使法国有很长一段时期动弹不得,英格兰、荷兰和瑞典崛起成为新的权力中心,两场海外殖民地冲突发生,预示了此后两个世纪的走向。直到该时期末尾,西班牙势力凋零、欧陆霸权地位被法国取代的局面才显山露水。

从尼德兰的叛乱开始说起是最好的选择。与 1936 至 1939 年的西班牙内战类似(但漫长得多),这场叛乱集合了意识形态、政治、战略和经济争端,使局外人无从把握。西班牙军队可能从西班牙、意大利和佛兰德斯的任何一处入侵,法国无法安之若素。英格兰的插手干涉导致了其他问题。英国属于新教阵营,但也仅此而已,腓力试图避免与伊丽莎白一世完全断绝往来。他曾与都铎王朝的玛丽联姻,在英格兰取得一定权益,长期以来都不愿放弃重新攫取这些利益的机会,而再娶一位英国女王、保住这些利益是他最初的盘算。不仅如此,与奥斯曼人的战争早就将他的注意力转到别处。但西班牙对英国海盗的处置方式使英格兰的民族和宗教情感爆发成一场熊熊大火,对西班牙帝国造成不利;英西关系在 16 世纪七八十年代急速恶化。伊丽莎白不希望尼德兰垮台,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给予支持,但无甚热情可言;作为一国之君,她并不喜欢叛乱分子。最终,西班牙挟教皇授命,在 1588 年发动大举入

604

侵,要废黜被定为异端的伊丽莎白女王。"上帝之风将他们驱散"是一块英国纪念章上的文字;恶劣的天气完成了西班牙的计划或英国人的操船术和火炮都未竟的奇功,使无敌舰队大难临头(尽管双方实际上没有一艘船被火炮击沉)。在舰队残余跌跌撞撞地驶回西班牙港口后,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还持续了很久,但一场大危机已经过去。而且,几乎在无意之间,极具重要性的英国航海传统就此诞生。

一俟和平重现,詹姆斯一世力排其臣民的反西班牙成见,明智地竭力避免再起战端,也取得了成功。20 年休战期之后,尼德兰叛乱再起,并成为一场规模更大的斗争的组成部分——即三十年战争。这回,英格兰没有被欧陆冲突拖下泥潭。这场战争的核心是哈布斯堡王室企图以反宗教改革的胜利为资本,在德意志重建帝国权威。这令《奥格斯堡和约》和宗教多元化在德意志的存续岌岌可危。此外,这份和约也被视为限制哈布斯堡王室野心过度膨胀的手段。就如 16 世纪与瓦卢瓦王室逐鹿意大利,哈布斯堡王室在 18 世纪又与波旁王朝就德意志展开争夺。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再一次给意识形态冲突抹上了混乱的色彩。王朝利益将法国卷入战场,与同为天主教信仰的哈布斯堡王室对阵。在一名红衣主教的领导下,以"教会的长女"著称的法国与尼德兰加尔文主义者和丹麦及瑞典的路德派联手,以确保德意志王侯的权利。同时,大量不幸的中欧民众不得不时常忍受半独立武装领主朝三暮四、贪得无厌的秉性。拒敌于莱茵河之外的对外政策使法国获益一个多世纪,红衣主教黎塞留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被称作这一政策的创始人。如果还有人怀疑这点,需记得他见证了功利政治和唯目的论(*raison d'état*)的出现,这标志着无视原则、单纯追求国家主权利益的时代已不折不扣地到来。

605

1648 年终结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几方面来看都是变革的标志,然而也显现出日渐消逝的往日所残留的痕迹,这令它成为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该和约是欧洲宗教战争时代的终结;欧洲政客们最后一次共同将其人民未来宗教的普遍解决方案作为一项要务加以考量和商榷。它还标志着西班牙军事统治地位的终结和查理五世重建

帝国梦想的破灭,也为哈布斯堡王朝史中的一个时代拉下帷幕。在德意志,一股新势力兴起于勃兰登堡选侯领,后与哈布斯堡王室展开竞争,但后者在德意志遭受的挫折是瑞典和佛兰德斯的外来势力所导致的。这里有真正揭示未来走向的征兆:在易北河以西,欧洲进入一段被法国所主宰的时期。以更长远的眼光来看,该和约开启了一个时代,期间,欧洲外交的焦点是包括欧洲东西方在内的各国实力平衡、奥斯曼帝国的命运,以及全球势力的划分。

尽管当时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已有一个半世纪,西班牙、葡萄牙、英格兰、法国和荷兰都已建立起海外的殖民大帝国,但 1648 年和约的起草者显然对这一状况不感兴趣。英格兰甚至没有成为任何一次谈判的核心国之一;战争第一阶段结束后,各国在各项事务中都没有考虑到她的存在。英格兰因内部纷争和苏格兰近邻带来的麻烦无暇他顾,相比欧洲内部,其外交政策更针对欧洲以外的目标——不过,正是这些目标导致该国与荷兰开启战端(1652 — 1654)。虽然克伦威尔很快恢复了和平,并告诉荷兰人这个世界能为双方提供足够的贸易空间,但英国和荷兰的外交已经比其他国家更清晰地显现出商业和殖民利益的影响。

法国在欧陆的崛起以坚实的自然优势为基础。法国是西欧人口最多的国家,在 19 世纪以前,单凭这一点就为其军事实力提供了保障;想要遏制法国,始终需要集合强大的国际力量。不管民众的生活在现代人看来有多么贫苦,法国还是拥有巨大的经济资源,能够维持路易十四在位时的盛世之貌,展现出登峰造极的实力和威望。就形式而言,他的统治期始于 1643 年,但实际上是 1661 年,当时,年方 22 岁的路易宣称意欲接管属于自己的事务。他掌管最高权力一事在世界和法国的历史中都具有重大意义;路易是当时有史以来为君之道最完美的典范。其外交政策与统治的方方面面不可分割,只为行文之便才单独列出。例如,兴建凡尔赛宫不仅为满足他个人的品味,也是为其外交打造一份必不可少的威仪。与此类似,他的对外和对内政策虽然可以彼此区别看待,但相互紧密交织,也与其理念结为一体。路易想要改善法国西北边

606

境的战略布局,但也鄙夷荷兰人的商贩习气,认为他们算不上共和者,还厌恶他们的新教信仰(但他还是会每年从荷兰购买上百万朵郁金香来装饰凡尔赛宫)。反宗教改革的好斗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鲜活的体现,但这还不是全部。路易尊重法律(国王必须如此),如果他的所作所为能获得足够的法律立场和权限,会令他更加安心。这就是当时法国实行对外扩张政策的复杂背景。虽然到头来令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这让法国一时如日中天,经历了 18 世纪半数年月才慢慢搁浅,创造了一段法国人至今仍深情缅怀的传奇。

路易希望改善边境的状况,也就会同依然控制着西属尼德兰和弗朗什孔泰的西班牙发生冲突。西班牙的败北开启了法国与荷兰的战争。荷兰人寸步不让,但 1678 年终结战事的和平协议被普遍视为路易外交成就的巅峰之作。此时,他将目光转向德意志。除了征服领土以外,他还意图染指帝国皇冠,并愿意为此与土耳其人结盟。1688 年,荷兰的执政王(Stadtholder)"奥兰治的威廉"偕妻子玛丽·斯图亚特前往英格兰,取代其父亲登上英国王位,是为历史的转折点之一。从此,海峡另一端出现一名与路易对抗的新敌手,和委曲求全的斯图亚特国王们不同,他们相当执拗。荷兰人威廉可以动用英国这一新教领袖国家的资源,自克伦威尔时代以来,英格兰第一次向欧洲大陆派出军队,支持由欧洲国家组成的同盟(就连教皇也秘密加入),共同对抗路易。国王威廉之战(也称奥格斯堡同盟战争)让西班牙、奥地利以及欧洲的新教国家走到一起,共同限制法国国王过于膨胀的野心。在终结这场战争的和平协议中,路易不得不破天荒地作出让步。

1700 年,西班牙查理二世去世,且膝下无子。这是全欧洲期盼已久的时刻,因为他的意志力和体魄都弱不禁风。由于其去世必然带来巨大的危险和机遇,各方为此投入了极大的精力,进行外交准备工作。一个庞大的王朝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以过去的联姻为依据,哈布斯堡皇帝和路易十四(他已将这方面的权利传给孙子)将有权力对继承权提出要求。但其实所有人都对此事抱有兴趣。英国人想知道西班牙的美洲贸易会变得如何,荷兰人则关心西属尼德兰的命运。波旁或哈 607

布斯堡王室中的任何一方取得完整继承权的可能使所有人感到警惕,查理五世帝国的幽灵再度浮现。各方随后达成了领土分割协议,但查理二世的遗嘱将西班牙的完整继承权都授予路易的孙子。路易接受遗嘱,将已经签署的协议弃之不顾。他还冒犯了英国人,承认流亡中的斯图亚特僭王为英格兰詹姆斯三世。一个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联合行省王国和英国组成的伟大同盟旋即成立,由此揭开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序幕,延续 20 年的战火最终迫使路易妥协。1713 至 1714 年间签订的条约(《乌得勒支和约》)将西班牙和法国王室置于永远不得统一的立场。不过首位波旁王朝的国王登上了西班牙的王位,连带获得印度群岛,但西属尼德兰归属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作为对后者的补偿,并让皇帝担当荷兰人抵御法国今后入侵的第一道警戒。奥地利也在意大利获得利益。法国在海外利益的划分中向大不列颠作出让步(此时,英格兰和苏格兰已于 1707 年统一)。斯图亚特僭王被逐出法国,路易也承认了新教统治英格兰的合法地位。

这些重要的事实保障了西欧大陆的稳定局面,一直延续到 75 年后的法国大革命才被动摇。并非所有人都为之欣喜(皇帝拒不承认他已无权要求获得西班牙的王位),但很大程度上,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西欧地区在 1714 年的主要格局至今仍没有变动。比利时当然尚不存在,但奥属尼德兰占有该国如今的大片地区,联合行省王国辖地就相当于现代的荷兰。法国将保留弗朗什孔泰(除 1871 至 1918 年间),路易十四为该国赢得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也一直没有易主。1714 年后,西班牙和葡萄牙将在各自边境内保持独立国家的状态;两者依然是庞大的殖民帝国,但再也调不出潜能,只能安于做二线强国。大不列颠成为西方的新兴强国;1707 年起,英格兰不用再为苏格兰人的威胁忧心,但通过个人关系再次与欧洲大陆形成关联,因为该国 1714 年后的统治者还兼任汉诺威选侯。在阿尔卑斯山以南,格局尚未尘埃落定。依然四分五裂的意大利又经历了三十多年不安定的时光,欧洲各王室中的小人物在其中的不同国家间往来穿梭,试图将松散的势力拧成一股,攫取王朝争霸时代遗留下的好处。1748 年以后,该半岛只余下一个重要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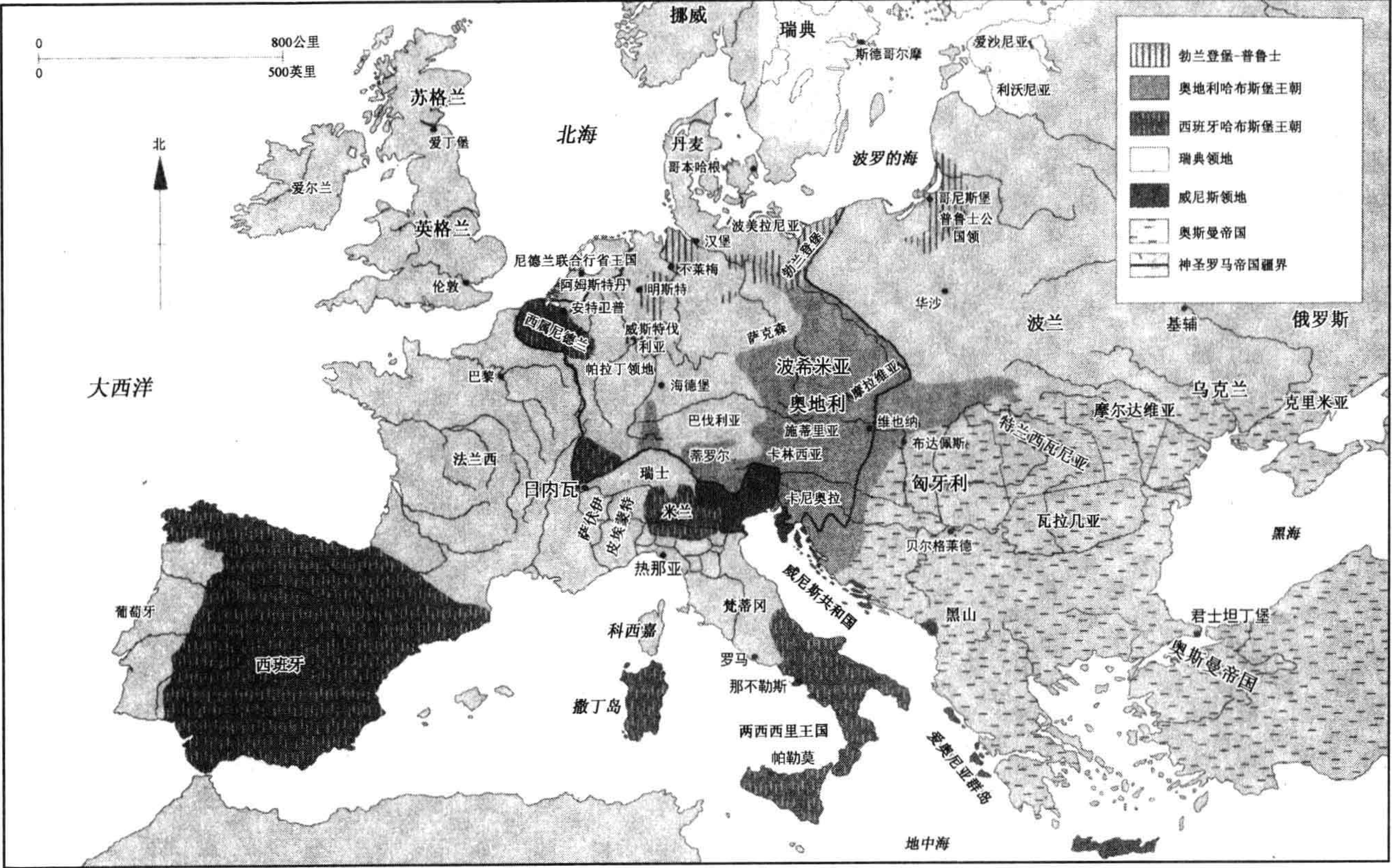
土王朝，即统治着阿尔卑斯山南侧的皮埃蒙特和撒丁岛的萨伏伊王朝。从15世纪起，梵蒂冈教皇国确实可以视作一个意大利君主制国家，但只能偶尔显现出被称为王朝的资格，日渐腐朽的威尼斯、热那亚和卢卡共和国依旧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意大利式独立模式，半岛其他国家的王位都被外来统治者占据。

609

西方地缘政治格局就此长久奠定。经过这场战争，所有政治家都感到有必要尽力避免再次发生如此大规模的冲突，这是该格局形成的一大原因。1713年协议是有史以来首份以通过势力均衡来确保和平为签字国公开目标的协议。如此务实的目标是政治思想中的一项重大创新。这种现实主义乃是源于：战争代价之高昂前所未见，就连大不列颠和法国也精疲力竭，且它们是18世纪惟一两个能够维持与其他列强的战事而无需外援的国家。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终结还为现实问题带来了有效的解决方案。一个新时代正在开启。意大利以外，20世纪西欧政治版图的轮廓已经十分明显。王朝统治模式开始退居二线，成为外交政策考量中的次要原则。国家政治的时代已经开始，至少对部分国王而言，他们感到再不能将其王室的利益与民族的利益割裂开来。

莱茵河以东(易北河以东更不用提)的情况则完全不是如此。那里已经发生了巨变，1800年前夕还会有更大的变革。但变化的起源必须追溯到很久以前，早至16世纪伊始。当时，欧洲的东部边境由哈布斯堡名下的奥地利和幅员辽阔的波兰—立陶宛王国守护，后者由源于14世纪联姻的亚盖沃(Jagiellons)王朝统治。他们与海上帝国威尼斯共同承担抵抗奥斯曼势力的负担，而奥斯曼是当时决定东欧政治局势的第一大元素。

“东部问题”这一短语当时尚未发明；假使出现，其含义将是欧洲抵挡伊斯兰势力的防御问题。土耳其人接连获胜，直到18世纪依然在攻城略地，不过最后一次大举入侵已成往事。但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的两个多世纪间，他们依然决定着东欧外交和战略的基调。该城沦陷后，海上战争和土耳其人的扩张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其主要受害者是威尼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48年)签署时的欧洲

斯。与其他意大利国家相比,威尼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还算富裕,但与过去相比还是有所衰退,首先在军事领域,随后商业实力也受波及。军力萧条是与土耳其人长期作战且不断败北的结果,这又导致了贸易的式微。土耳其人在1479年占据爱奥尼亚群岛,并对黑海贸易征收年贡。虽然威尼斯在两年后占得塞浦路斯,并将其建成主要基地,但该地也于1571年失陷。到1600年,尽管该国依然算得上富庶(得益于其创建者),却不再是与联合行省王国乃至英格兰同一级别的贸易强国了,其地位被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先后超越。土耳其人的成功势头在17世纪早期一度中断,后又重新恢复;1669年,威尼斯人不得不承认失去克里特岛的现实。与此同时,匈牙利在1664年成为土耳其人所征服的最后一个欧洲王国,但不是最后的征服对象。乌克兰人也很快承认土耳其的宗主权,波兰人被迫放弃了波多利亚(Podolia)。[①] 1683年,土耳其人第二次围攻维也纳(第一次发生在一个半世纪之前),欧洲仿佛面临着两百多年来最大的危机,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维也纳最后一次被兵临城下,因为奥斯曼帝国的伟大年月走到了尽头。

610

实际上,征服匈牙利的攻势是一个痼疾缠身的强权所挥出的最后一击。其军队不再配备最先进的军事技术:他们缺乏已成为17世纪战场决定性武器的野战炮。在海上,土耳其人拘泥于古老的大战船接舷战法,与大西洋各国将舰船作为浮动炮台使用的战术对抗,胜算变得越来越小(威尼斯人同样保守,这对土耳其人来说并非幸事)。不管怎么说,土耳其人的势力范围都扩张得太大,严重超出了自身实力的限度。他们拯救了德意志、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新教运动,但由于1639年从波斯人手中夺得伊拉克,几乎整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都归入奥斯曼人的统治之下,其亚洲版图大大扩张,也处处受到掣肘,在非洲和欧洲亦然。对于一种难免出现昏庸无能的统治者的体制来说,如此巨大的压力实在太过沉重。该世纪中期,一名大维齐尔(vizier)整顿局面,使奥斯曼的最后一次攻势成为可能。但有些积弊他也无法矫正,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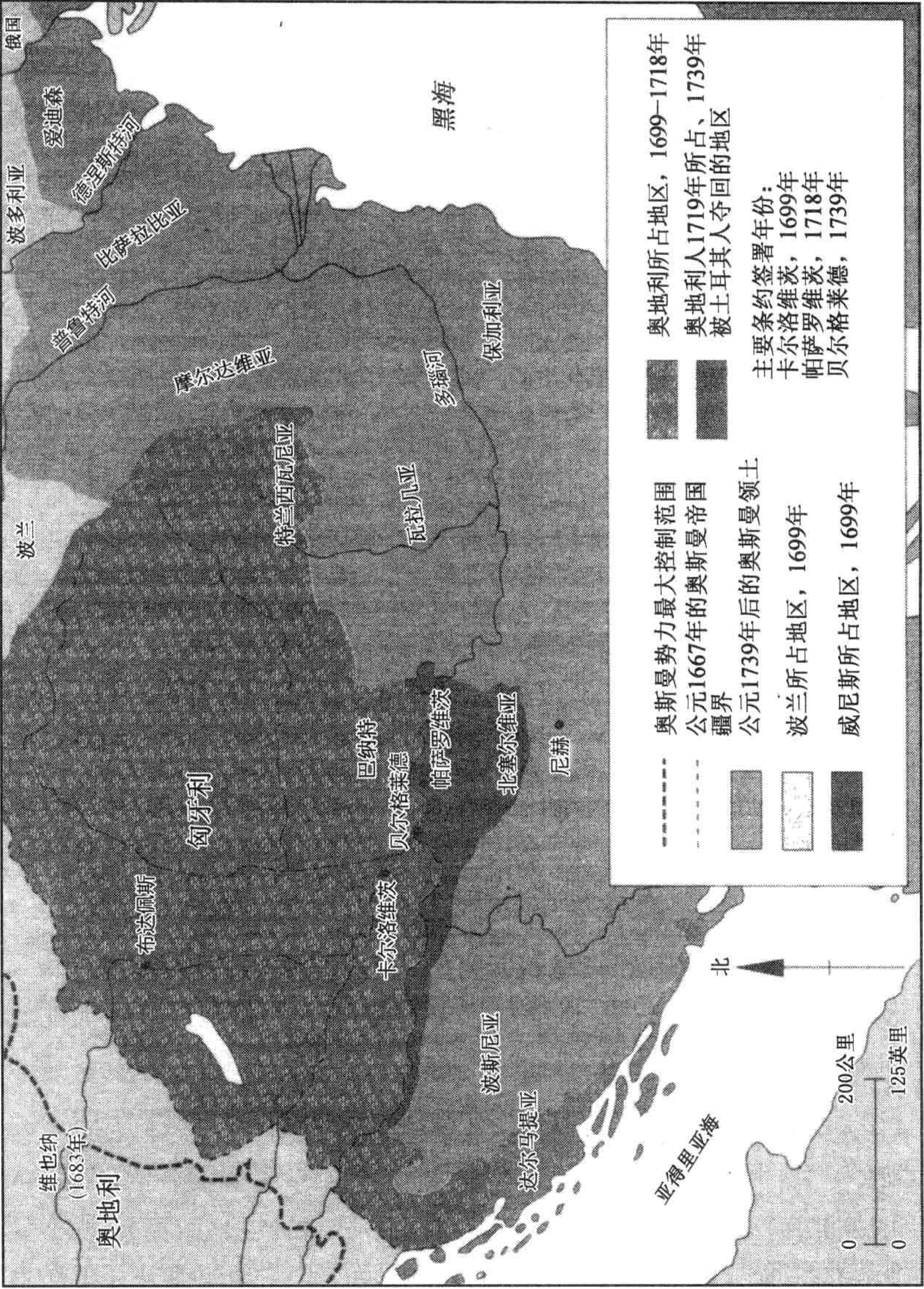
① 历史地名,相当于今乌克兰西南部地区。——译者注

为那是帝国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奥斯曼帝国以持续扩张和攫取新的税收及人力资源为统治方针，其军事占领的优先目标是掠夺而非政治统一。而且，该帝国依赖于无法赢得其忠诚的臣民，这点相当危险。奥斯曼人通常会对非穆斯林群体的习俗和体制报以尊重，采取米利特(*millet*)体系、通过这些社群内部的权威人物进行统治。其中最重要的是各有一套管理方式的希腊正教、亚美尼亚和犹太群体；例如，希腊基督徒必须支付一笔特殊的人头税，君士坦丁堡的希腊牧首是他们的最高领导。在较低层级，看起来最好的管理方式是与地方社群的领导人合作，为这台掠夺机器提供支持。最后，奥斯曼人的这套体系培养出了过于强大的臣民，各自为政和效率低下的局面令帕夏们羽翼渐丰、自成一统。苏丹的子民没有为此认同他的统治，倒是与之更为疏远。

611

所以，1683 年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象征性年份，标志着欧洲最后一次以防御者的姿态面对伊斯兰世界，此后它将转入反攻，但当时并没有表面上看来那般危险。随后，土耳其人掀起的波涛开始几乎马不停蹄地消退，直到 1918 年再次缩回君士坦丁堡周边一隅及安纳托利亚这片古代奥斯曼的核心地带。匈牙利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奥斯曼统治后获得解放，此后，波兰国王约翰·索别斯基(John Sobieski)解除了维也纳的危机。1687 年，一名成事不足的苏丹被赶下王位，他成为阶下囚一事证明了土耳其人的衰弱已经无可挽救。1699 年，匈牙利正式成为哈布斯堡领地的一部分，经过起初的和平阶段，奥斯曼与哈布斯堡开战，最终以败者的身份签约罢战。在下个世纪，特兰西瓦尼亚、布科维纳(Bukovina)和黑海沿岸大部分地区也将脱离奥斯曼的控制。到 1800 年，俄罗斯已承诺为奥斯曼的基督教臣民提供特殊保护，且开始尝试煽动他们造反。18 世纪，奥斯曼在亚非的统治也出现衰退；到该世纪末，虽然可能仍然保留着形式上的地位，但帝国哈里发的状况与阿拔斯王朝衰亡时期的君主多少有些类似。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阿拉伯都取得不同程度的独立或半独立地位。



奥斯曼势力退出欧洲的开端

东欧的传统守护者波兰—立陶宛联邦和哈布斯堡王朝并非奥斯曼帝国遗产的接收者,也不是帝国崩溃时施以最大惩罚的打击者。事实上,波兰人作为独立民族的历史已接近终点。立陶宛和波兰因王室私人关系实现的统一并没有及时转化为两个国家的真正统一。1572年,当亚盖沃王朝的末代国王无嗣而终,其王位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事实上成为可以自由争夺的对象,其巨大的国土成为竞相瓜分的目标。他的继任者是法国人,下个世纪间,波兰门阀贵族和外国君主在每次挑选继承人时都会发生争执,而国家承受着土耳其人、俄罗斯人和瑞典人不间断的沉重压力。只有当敌手在别处遇到麻烦时,波兰才能占得一些优势。瑞典人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扩张到波兰北部领土,于1660年夺走波兰最后一处入海口。波兰内部分歧也更加恶化;反宗教改革运动对波兰新教徒发起迫害,乌克兰地区出现哥萨克叛乱,农奴暴动也持续不断。英雄人物约翰·索别斯基是最后一位并非由外国君主操纵选出的波兰国王。他赢得重大战役的胜利,并成功驾驭了波兰奇特而高度分权化的政体。国王能够用来制衡领主的合法权力微乎其微。他们没有常备军,当地主或门阀派系为达成目的不惜发动武装叛乱的时候,无法只依靠私人军队加以平定。在总议会——即王国的中央议院团体中,全体一致原则阻碍了任何改革的实现。然而,如果一个地理上定义不明、宗教上四分五裂、由自私狭隘的地主集团所统治的波兰想要生存下去,改革却迫在眉睫。波兰是一个身处近代化世界的中世纪国家。

613

约翰·索别斯基对此无能为力,什么也改变不了。波兰的社会结构对改革有很强的抵抗力。贵族或地主们实际上是若干财富惊人的大家族的门客。其中的拉齐维尔(Radziwills)家族拥有相当于半个爱尔兰面积的地产,其宫廷让华沙皇宫也黯然失色;波托茨基(Potocki)家族的地产占地6 500平方英里(大约等于半个荷兰共和国)。在这类大门阀贵族面前,小地主根本不堪一击,他们在1700年只占有波兰不到十分之一的土地。法定意义上组成波兰"民族"的百万乡绅大多生活贫穷,受大门阀掌控,大门阀不愿放弃彼此拉帮结派或操纵总议会的权力。农民处于社会底层,是全欧洲境况最凄惨的群体之一,在1700年

承受着无穷无尽的封建压迫，地主依然拥有对他们生杀予夺的大权。城镇势单力孤。其总人口只有乡绅阶层的一半规模，而且被 17 世纪的战火摧残得满目疮痍。然而同样依靠农业和封建基础体制的普鲁士及俄罗斯却能生存下来。波兰是东方三国中惟一彻底没落的国家。由于波兰的王位继承人选原则，该国无法出现属于自己的都铎或波旁王室、将王朝与国家自我壮大的本能相结合。一名外族的萨克森选侯于 1697 年当选为约翰·索别斯基的继承人，成为波兰国王，统治该国进入 18 世纪，但登基后很快被瑞典人废黜，又被俄罗斯人再次推上王位。

俄国是东方新崛起的超级大国。该民族的同一性在 1500 年还几乎无法辨识。两百年后，大部分西方政客对其潜力的认识依然很粗浅，不过波兰和瑞典已经对此有所关注。要认识到后来成为世界两极之一的俄罗斯是多么迅速且惊人地崛起为一股举足轻重的势力，我们需要花一点功夫。在欧洲时代之初，俄罗斯的未来只能从伊凡大帝画出的蓝图中寻找，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都没有人可以设想到那样的结局。正式拥有“沙皇”头衔的第一人是其孙、1547 年登基的伊凡四世；在他的加冕典礼上授予该头衔意味着莫斯科大公国的大公已成为统治着诸多民族的帝王。尽管有着野兽般的精力，使他获得“雷帝”（the Terrible）的别名，但他对欧洲局势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俄国是如此不为人知，甚至到下个世纪，一名法国国王还会给已经去世的沙皇写信，浑然不知此人已死了十年之久。未来俄国的成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几乎没有被西方所察觉。即使到伊凡大帝死后，俄罗斯的领土划界依然混乱，且暴露在外敌面前。土耳其人已推进到欧洲东南部。乌克兰隔在他们和莫斯科大公国之间，这片土地属于拼死捍卫独立的哥萨克人，在强大的邻国出现以前，他们可以轻易守住独立地位。俄国东面的乌拉尔山只是一条理论上的边境，几乎没有实际意义。在四周充满敌意的空间中，俄罗斯统治者总是很容易产生孤立感。几乎出于本能，他们在边境寻求天险的庇护，或安置其他民族以提供保护性的缓冲地带。

614

俄国首当其冲的要务必然是巩固伊凡大帝的征服成果，这一过程

构筑起俄国的核心地带。随后是向北部荒原扩张。伊凡雷帝登基时，俄国拥有黑海的小片海岸和一直延伸到白海的广袤领土，虽然住民稀少且处于原始状态，但提供了前往西方的通道；1584 年，阿尔汗格尔斯克(Archangel)港落成。伊凡在波罗的海边境无可作为，但对鞑靼人的战事取得了成功，鞑靼人曾于 1571 年第二次焚毁莫斯科，据说连带屠杀了 15 万人。他将鞑靼人逐出喀山和阿斯特拉罕(Astrakhan)，并控制伏尔加河流域全线，将莫斯科大公国的势力扩展至里海一带。

他在统治期间还发起了另一波大推进，越过了乌拉尔山脉，深入西伯利亚，其殖民意义更甚于征服。直至今日，俄罗斯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土依然位于亚洲，这一世界强国有将近两个世纪被沙皇及其继任者统治。而迈向此结局的第一阶段却展示了一份具有讽刺意味的前景，将成为后世西伯利亚边境开拓者中常见的景象：乌拉尔山外的第一批俄罗斯殖民者是逃离诺夫哥罗德的政治难民。随后加入殖民大军的是其他逃跑的农奴(西伯利亚没有农奴)和对现状感到不满的哥萨克人。到 1600 年，俄罗斯殖民点已深入乌拉尔山外 600 英里处，一批能干的官僚对他们进行严密监管，确保国家能以毛皮的形式收缴贡物。河流是该地区的关键，甚至比美洲拓荒者眼中的河流更加重要。不出 50 年的工夫，人们已经可以独自携带货品从乌拉尔以东 300 英里的托博尔斯克(Tobolsk)出发，仅经三次陆运就抵达三千英里之遥的鄂霍茨克港(Okhotsk)。从那里再走 400 英里海路就能抵达日本岛链最北端的萨哈林——大约与地角(Land's End)[①]到安特卫普的海路等长。1700 年，乌拉尔山以东已有 20 万殖民者：到了这一步，他们才有可能与中国签订《尼布楚条约》，也有可能像一些俄罗斯人所谈论的那样，对中国发动侵略。

615

伊凡死后的“混乱时期”带来了骚乱和危险，使西方波罗的海的一些前哨殖民地一度丢失，甚至连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也被立陶宛人或波兰人占领，但并没有对俄国向东扩张的势头造成太大影响。

① 英格兰西南部康沃尔郡靠近最西端的海岬地区。——译者注

俄国在17世纪早期依然算不上是一支重要的欧洲势力。当时瑞典人风头正劲,对俄国施加了强大的压力,直到1654至1667年的一场大战后,沙皇才终于夺回斯摩棱斯克和小俄罗斯,并一直固守到1812年(当时两地经历了短暂的沦陷)。地图和条约开始绘制出俄国在西方的版图,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到1700年,俄国已获取第一座黑海要塞亚速,同时西南边境延伸到第聂伯河大部分流域的西岸,历史名城基辅和居于第聂伯河东岸的哥萨克人都在其势力范围之内。他们向沙皇寻求保护以便不受波兰人的侵犯,并获得特殊的准自治待遇,这一管理形态一直延续到苏联时期。俄国所占得的大部分土地都来自波兰,后者长期为抵挡土耳其和瑞典人而无暇他顾。但1687年,俄国和波兰军队为对抗奥斯曼联手;这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正统意义上的东部问题——究竟是否该对俄罗斯帝国蚕食奥斯曼欧洲部分的行为加以限制、其限制应达到何种程度——就此发端。欧洲政客一直为此烦恼,直到1918年,他们发现问题最终随奥斯曼帝国一同消失。

俄国的缔造是彻头彻尾的政治行为,君主制是其核心和动力所在。该国欠缺能够明确其存在感的种族同一性,也鲜有可划定国土范围的地理坐标。将正教视为统一的黏合剂也欠说服力,因为斯拉夫人同样是正教信徒。沙皇个人权限和实力的增长是其国家建设的关键所在。伊凡雷帝是一名行政改革家。在其统治下,贵族以军事效忠换取领地的做法开始实行,其前身是莫斯科大公为募集与鞑靼人作战的兵力所采用的体系。俄国获得了组建军队的能力,波兰国王为此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发出警告,如果俄国人获得西方科技,他们将不可战胜;他所预见的危险虽然遥远,但不失先见之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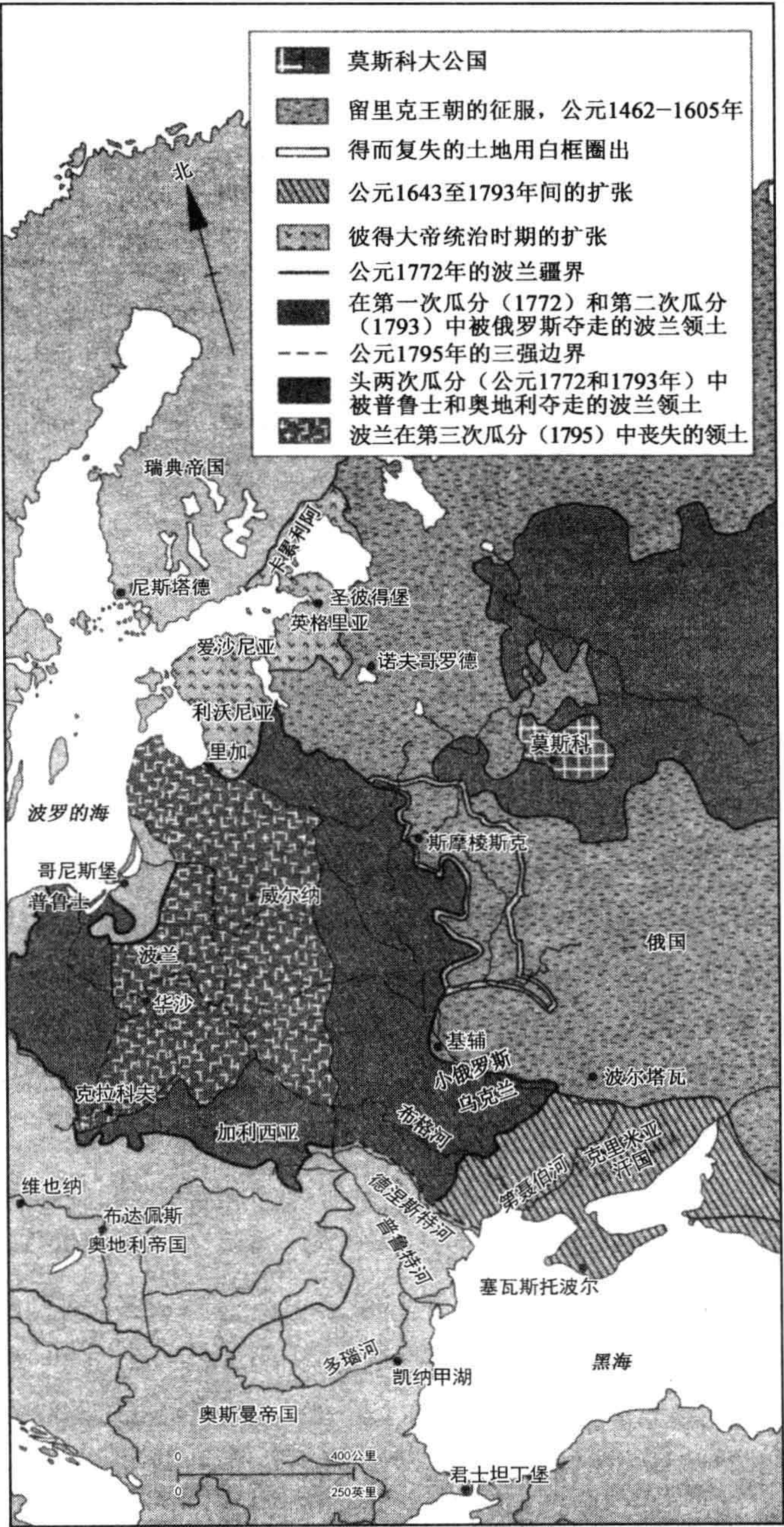
俄国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倒退,但以回顾历史的眼光来看,其国家的存续倒并无大碍。留里克家族的末代沙皇死于1598年。 616
篡位阴谋、贵族与波兰干涉者的王位争夺战持续到1613年,直到新王朝的初代沙皇米哈伊尔·罗曼诺夫(Michael Romanov)脱颖而出。虽然这位软弱的君主生活在父亲主宰一切的阴影之下,但他建立了一个

统治俄国达三百年之久的王朝,该王朝终结之日也是沙皇制的崩溃之时。他的直接继承人击败了敌对贵族,打压了波维尔(boyar)[①]大贵族,后者企图恢复被伊凡雷帝所遏制的权势。除这批人之外,教会是国内惟一潜在的敌人。教会在17世纪因大分裂弱化,1667年,牧首又与沙皇发生争执,被剥夺地位,使俄罗斯的历史迈出了重大的一步。俄国没有发生主教授权之争。牧首被废黜后,俄国教会在体制和法律上都服从于一名世俗官员。大量信徒自发地对当时的正教教义和道德观产生敌视,开启了一场生命力顽强且极具文化重要性的宗教异见地下运动,称为裂教(*raskol*),并最终成为孕育政治对立的温床。但是,正如俄国从不知宗教改革的刺激为何物,它也从不知政教冲突为何物,而政教冲突在西欧创造了很多新事物,是一股重要的推动力。

这一切最终导致了俄国长久以来的政府形态——沙皇专制的进化。沙皇专制有着如下特征:半神圣的、不可侵犯的权威在统治者身上的人格化体现,不受法律的明确限制;强调所有臣民都有为沙皇效力的义务;领地持有权与这一义务间存在关联;除教会之外,国家所有机构都源于沙皇的权威,自身不具备任何独立地位;权力缺乏明确定义和界限;庞大的官僚体系;军事为第一要务。就如列出上述特征的学者所指出,这些特征并非从一开始就全部出现,也并非在所有时期都同样起效和明显。但它们清楚地标明了沙皇制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君主制之间的差异,早在中世纪,西方城镇、领地、行会和很多其他团体就确立起特权和自由地位,后世将以此为基础构筑宪政理念。在古代莫斯科大公国,最高官员的头衔中有“奴隶”或“仆人”的含义,而同一时期,在毗邻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其同级别的官僚却是获得委任的“市民”。就连相信神授之权并向往无上权力的路易十四,也始终认为该权力受地位身份、宗教和神圣律法的明确限制。尽管其臣民知道他是专制君主,但依然肯定他不是暴君。英格兰则发展出了差异更惊人的、受制于议会的君主制度。尽管英法的君主制实践或许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都

618

① 沙俄贵族阶级成员,地位仅次于王公。——译者注



俄国扩张(1500－1800)

接受了对沙皇制而言不可想象的实践和理论限制,带有俄国前所未闻的西方传统烙印。就整体而言,沙俄独裁政体在西方人眼中就是专制暴政的同义词。

然而这套体制适合俄国。不仅如此,该体制背后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同样适合俄国。18 世纪的社会学者普遍认同,幅员辽阔的平原国家有利于专制体制的成型。该结论过于简单,像俄国这般覆盖多种自然区域和不同民族的庞大国家总是潜伏着某种分裂主义倾向,直至今日,这份多样性依然能从各种事件中得到体现。俄国始终需要一股来自中央的强大聚合力,才能避免接壤的敌国利用其内部的差异性。

当波维尔们风光不再后,统治家族独占着高高在上的地位。基于贵族地位来自为君主效力的理由,俄国贵族逐渐沦为国家的依附者。17 世纪确实常常用土地犒劳效忠的贵族,后改为赐予农奴。按 1722 年官阶表(Table of Ranks)①的规定,一切土地持有权都要以效忠专制君主为条件。这一做法有效地将所有类别的贵族整合为单一阶级。该体制让贵族承担了极大的责任,往往会延续一辈子,但在 18 世纪逐步减少,最终彻底废除。不过,为君主效力依然是自动取得贵族身份的途径,俄国贵族从未获得像其他国家贵族那样独立于君主的地位。他们被赋予新的特权,但没有从中出现封闭的社会等级。恰恰相反,新加入者和自然繁衍的结果令贵族数量大增。部分成员非常贫穷,因为俄国没有长子或长女继承制,家族财产经三四代之后会分割得非常厉害。临近 18 世纪末时,大部分贵族所拥有的农奴都不超过 100 人。

在所有俄国沙皇中,彼得大帝对专制权力的运用最为后世所铭记,也给这份权力赋予了最深刻的特征。他登基时只是 10 岁的孩子,而去世时已为俄国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他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 20 世纪的伟人,毫不留情地鞭策一个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但他也充满了那个时代的君主所具有的特征:赢得战争的胜利是他关注的焦

① 彼得大帝制定,以个人才能和表现确定陆海军及文职人员的官职,共分 14 级,8 级以上都成为世袭贵族,一直沿用到 1917 年。——译者注

点。在彼得大帝统治期间,俄罗斯只享受了一年的和平——而西方化和现代化是他为了实现这一胜利目标所选择的道路。他要为俄国赢下波罗的海的入海口,这份野心成为其改革背后的动力,而改革也将为他打开通往目标的道路。他有心走上这条道路的根源可能与其童年有关,他在莫斯科的"日耳曼"区长大,那里居住着外国的商人和随从。1697 至 1698 年,他派出一支宗教大使团考察西欧,此举广受好评,表明他对科学技术的兴趣确实不假。也许在他自己的想法中,让其国民走向现代化的迫切需求,与让他们永远告别对邻邦的恐惧的迫切需求是结为一体的。无论其动机究竟为何,他的改革一直是后世所推崇的理想典范;一代又一代的俄罗斯人带着敬畏和沉思回顾他所做的一切,以及这些行为对俄罗斯的意义所在。正如其中一人在 19 世纪所写的那样:"彼得大帝不仅翻开了俄罗斯历史新的一页……他还在这张白纸上写下了'欧洲'与'西方'两词。"

619

他的领土扩张成就是最容易评价的。他派兵出征堪察加和布哈拉的绿洲,且不再为前任的软弱向鞑靼人纳贡,但他的野心不止如此,获得西方的入海口才是最终的目标。他建立黑海舰队并兼并亚速(但后来因别处的麻烦不得不放弃此地,这些麻烦来自波兰人和瑞典人,尤以后者为甚)。与瑞典人争夺波罗的海入海口的战争事关生死存亡。当时的人将其中最后一场称为北方战争,始于 1700 年,一直持续到 1721 年。1709 年,当世无出其右的瑞典国王麾下军队在远离国土的波尔塔瓦遭受惨败,全世界都意识到发生了某种决定性的事态。波尔塔瓦位于乌克兰中部,瑞典国王意图在乌克兰的哥萨克人当中寻找盟友。彼得在余下统治期内完成了自己的目标,达成和平协议后,俄国已牢牢占据波罗的海沿岸的利沃尼亚(Livonia)、爱沙尼亚和卡累利阿(Karelian)地峡。瑞典的强盛时代就此终结,成了一个新兴强国的首个牺牲品。

波尔塔瓦战役爆发的数年前,法国的《王室年鉴》(*Almanach Royale*)首度将罗曼诺夫王朝列为欧洲统治家族之一。胜利进一步打开了与西方沟通的渠道,而且彼得 1703 年初就预料到和平的降临,在

从瑞典人手中夺得的领土上,圣彼得堡这座美丽的新城将成为此后两个世纪的俄国首都。于是,俄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从孤悬东方的莫斯科转至最靠近西方发达社会的边境地带。此后,俄罗斯的西方化进程将更加轻松。这一迁都是有意与过去诀别的举措。

当然,就算莫斯科也从未完全孤立于欧洲之外。一名教皇协助安排了伊凡大帝的婚事,希望他能皈依西方教会。俄罗斯人一直与周边地区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波兰人有往来,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国商人也曾一路辗转抵达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陈列着光彩夺目的英国银器藏品,使他们的努力至今仍得到人们的纪念。贸易活动络绎不绝,偶尔也有专业人才从西方来到俄国。17 世纪,欧洲君主们在俄罗斯设立了第一批永久性的使团。但俄罗斯人的反应中总有试探和怀疑的成分;就和未来的情形一样,隔离外国居民的行为时有发生。

620

彼得摈弃了这份传统。他需要专业人才——船工、铸炮师、教师、文员、士兵——并相应给予他们特权。在行政方面,他打破了官位世袭的旧有陈规,尝试创立一套任人唯贤的官僚体制。他设立学校传授技术知识,还成立科学院并将科学观念引入俄国,而此前该国的一切学术都是文科范畴的。与很多其他伟大的改革家一样,他还为一些或显肤浅的领域投入大量精力。侍从需穿着欧式服装;旧式的长须被剪断,女性在公众场合被要求以德式装扮示人。在一个如此落后的国家,此类心理层面的震撼不可或缺。在摸索前行的道路上,彼得完全是孤家寡人,他所实现的目标最终要依靠强制,他的专制权力是这些改革惟一的依靠。由波维尔组成的旧杜马(Duma)被废弃,他任命的人选所组成的新议院取而代之。彼得着手打破土地所有权和国家权力、统治权和财产之间的关联,致力于将俄罗斯打造成一个崭新的多民族帝国。反对者被无情地消灭,但要涤除俄罗斯人的保守天性更加困难;他能够动用的行政机器和通信手段缺陷多多,对任何现代政府而言都相当不便。

俄国崭新的军事力量是其现代化取得成功最惊人的标志,另一个突出标志是教会彻底沦为国家的附属部门。更复杂的考验则更难通过。彼得的教育改革没有惠及绝大多数俄罗斯人,仅有技术人员和上

层阶级中的少数人明显受到影响。这缔造了一批西方化程度较高的高等贵族，在圣彼得堡尤其多见；到 1800 年，其成员大多使用法语，也时而能接触到西欧兴起的最新思潮。但他们往往遭到地方士绅的憎恨，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形成了一座文化孤岛。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大部分贵族并没有从新的学校和学术体系中获益。社会下层的俄罗斯大众依然普遍目不识丁；会读写的人大多师从乡村教士，只达到初级水平，且往往仅有本人脱离文盲状态，并不会传到下一代。俄罗斯民族的教育普及必须等到 20 世纪才能实现。

621

其社会结构也越来越显示出俄国式的标志特征。她是欧洲最后一个废除农奴制的国家；在基督教国家中，只有埃塞俄比亚、巴西和美国落于其后。18 世纪，农奴制几乎在其他任何地区都显出颓势，而在俄国却反而有所抬头。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劳力始终比土地稀缺；作为一个突出的例证，俄罗斯人通常以依附于土地的“人头”——也就是农奴——的数量来评估地产价值，而非其面积。农奴数量在 17 世纪开始上扬，沙皇发觉用赐予土地的方式来满足贵族是可取之道时，部分贵族已经有现成的农奴可以用来安置了。受债务束缚，农民无法摆脱领主，还有很多人被奴役，以劳动作为抵偿。同时，法律对农奴施加了越来越多的限制，使国家的结构越来越扎根于经济。限制农奴人身自由和捕获逃跑农奴的法律权力稳步增加，彼得让领主负责征收人头税和征兵，于是这类权力还给他们带来了特殊的利益。因此，俄国经济和行政的结合比任何西方国家都更彻底。俄国贵族往往会成为政府官员，为沙皇效力。

到 18 世纪末，除了处死以外，主子可以名正言顺地对他名下的农奴为所欲为。如果不想承担沉重的义务劳役，农奴就要缴纳金钱，数额几乎全凭领主独断。农奴的逃跑率很高，他们前往西伯利亚，甚至志愿担任划桨手。1800 年，大约半数俄罗斯人受领主束缚，其余还有很大一部分为王室承担几乎同样的劳役，也始终面临被赐给某个贵族的危险。

新的土地被兼并后，那里的人口也沦为农奴，即便他们此前对这种

制度一无所知。这使俄国积重难返,也严重加深了社会的紧张局面。到该世纪末,俄国此后百年间最大的问题已经出现:当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需求都使得农奴制越来越不堪容忍,但庞大的人口规模又给改革出了巨大的难题,究竟该如何处置这一过于庞大的人口?就好比骑大象的人,前进时无甚大碍,要下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622 奴役劳力已成为经济的支柱。除了著名的黑土区,俄罗斯的土地无论如何都算不上肥沃,而且这一区域直到 18 世纪才开始开垦,此外,就算在最好的耕地上,耕作水平也相当低下。虽然有周期性的饥荒和传染病作为自然的制衡人口的手段,但在 20 世纪以前,农产量的增长看起来始终不可能跟上人口增长的脚步。俄国的人口在 18 世纪几近翻倍,达到 3 600 万左右,其中,城镇人口只占 4%左右,有大约 700 万来自新占领土,其余是自然增长的结果。这一速度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快。

可俄国的经济依然在该世纪取得惊人的发展,在利用农奴制实现工业化方面堪称独一无二,这也许可以看作彼得无与伦比的成就之一。尽管俄罗斯工业化的发端始于罗曼诺夫最初两任沙皇时期,但明确指引方向的人是他。俄国的起步水平非常低,拥有 18 世纪任何其他欧洲经济体都不具备的迅速增长空间。诚然,工业化的效果并非立竿见影。虽然俄国在 18 世纪提高了谷物的产量并开始出口(后来成为俄罗斯对外贸易的一大支柱),但这一切是依靠古老的手段实现的,即增加耕地面积,此外,领主和税官对富余产量加以更成功的利用或许也不无关系。农民的自身消费有所减少,这一情况贯穿俄罗斯帝国时代的大部分时期,有时负担大得使人崩溃:据估计,彼得大帝时期的税收占农民收获的六成。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尚不具备,体制却愈发严酷,对农民构成越来越严密的桎梏。甚至到 19 世纪后半叶,在为领主劳作之余,俄国农民还要徒劳地花费所剩无几的时间,在构成其全部家当的些微土地上劳作。这些农民往往没有农具,只能依靠表层土壤仅有的肥力种出庄稼。

尽管如此,这一农业基础依然以某种方式支撑起令俄国崛起为强

国的军事活动，以及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到1800年，俄国的生铁产量和铁矿石出口额都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而彼得对这一切的贡献比任何人都更大，他意识到矿产资源对俄国的重要性，并建立行政机关对此加以利用。他发起勘测活动，引进国外矿工进行开采。为了敲山震虎，那些隐瞒领地内的矿藏或企图阻止开采的领主被处以死刑。为开采这些资源，交通手段得到发展，俄国的工业中心逐渐转移至乌拉尔山一带。河流的作用至关重要。彼得去世后仅仅数年，波罗的海就通过水路与里海连通。

623

制造业以采矿和伐木行业为核心成长起来，使俄国在整整一个世纪间都能保障有利的贸易差额。工厂在彼得治下不到百座，至1800年则已达三千有余。1754年后，俄国废除了内部关税障碍，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通过这一举措，以及提供农奴劳力和垄断权，国家政府继续控制着俄国的经济；俄国的工业并非源自自由企业制度，而是调控的产物，也不得不如此，因为工业化与俄国社会现实背道而驰。内部关税障碍也许是不复存在了，但远距离内部贸易并不多见。1800年，大部分俄罗斯人的生活与1700年时无异，他们局限在自给自足的地方社群中，依靠当地工匠提供少量制造类产品，货币经济依然没有成型。当时的所谓"工厂"有时仅仅是工匠的集合而已。土地租赁以劳力而非租金为支付形式，在极为广阔的区域都是如此。国外商人依然是对外贸易的主要操控者。而且，虽然政府授予资源开采权和提供农奴的做法鼓励了矿产主的生产活动，但此类促进手段的存在，本身就表明了俄国缺乏在其他地区能够有效维持增长的刺激推力。

不管怎么说，彼得去世后，国家的创新力明显迟滞。推动力难以为继；受过教育的人数量不足，在他离去后无法让官僚体系保持向前的动力。彼得没有指定继任者（亲生儿子被他折磨至死）。他的人格力量和震慑力随之消失后，大贵族家族重新对其追随者表现出敌意。1730年，彼得的孙子死去，其家族直系血脉断绝。然而王室可以利用派系间的斗争，其侄女安娜取得帝位，使王室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恢复。虽然是由控制其前任的贵族扶植上台的，但这些贵族很快就被她击垮。具

有象征意义的是,彼得死后迁至莫斯科的王宫也回到了圣彼得堡(这是保守派所喜闻乐见的)。安娜向外裔大臣寻求帮助,直到她1740年去世,这一手段都相当有效。其继任者、尚处幼年的姨侄不出一年就被废黜(遭囚禁二十多年后被谋杀),彼得大帝的女儿伊丽莎白取而代之,她依靠的是近卫军的支持和俄罗斯对外族人的反感。1762年,伊丽莎白的侄子继承帝位,仅在位六个月后被迫下台。他的妻子是强权人物的情妇,[①]随后谋害了被废黜的沙皇,这位德意志公爵之女史称叶卡捷琳娜二世,也像彼得那样获得了“大帝”的称谓。

624

叶卡捷琳娜随后加诸于身的光环遮掩了大量黑幕,也蒙蔽了很多当时的人。几乎始终被隐瞒的事实包括她登上帝位的血腥和不当手段。但也许不假的是,若非先下手为强,受害者可能就会是她。不管怎样,她和其若干前任登基时的状况表明,彼得死后,独裁制的根基有所弱化。女王统治的初期阶段荆棘遍布;强大的利益集团随时准备利用她犯下的错误,而且不管如何强调自己是这个新国家的一员(还放弃路德宗信仰改投正教),她始终是一名外国人。她曾言:“不成王则待毙。”她也确实成了女皇,并造成深远的效应。

虽然叶卡捷琳娜的统治比彼得大帝更令人侧目,但创新力更小。她也兴办学校、扶持艺术和科学。差别在于,彼得关注的是实际效果;叶卡捷琳娜则用启蒙思想家的威望来粉饰其宫廷和法律。这些做法往往具有放眼未来的外表和阻碍进步的实质。冠冕堂皇的法律条文欺骗不了局内人;年轻的拉季谢夫(Radischev)遭流放一事表明了事实的真相,他敢于批评政体,被视为俄罗斯第一位异见知识分子。可以想见,随着叶卡捷琳娜统治的延续,当她被国外事务占据心神,此类促进改革的动机便开始逐渐弱化。

通过她不愿侵犯贵族势力和特权的态度,可以充分看出其根本的不安所在。她是众领主的女皇,给予他们更大的地方司法权,并剥夺了

---

① 据称叶卡捷琳娜的情夫不止一位,都对她夺取帝位有很大的贡献。分别是波兰贵族波尼亚陶斯基、近卫军军官奥洛夫和为她粉饰太平的波将金。——译者注

农奴请愿申诉其主人的权利。在叶卡捷琳娜34年的统治期中,政府只有20次采取行动,限制领主对名下的农奴滥用权力。意义最重大的是,为君主效劳的义务在1762年被废止,此后她还向贵族颁发了一份权利宪章,使彼得对贵族的政策就此废弃达半个世纪之久。上层阶级被免于个人税务、体罚和安置士兵住宿的义务,只有同等地位的人可以对他们进行审判(和剥夺他们的身份),且独享设立工厂和矿场的权利。在某种意义上,领主和专制君主达成了一种合作关系。

625

从长期来看,这是一种恶性状态。叶卡捷琳娜治下,当其他国家开始放松社会结构的桎梏,俄国却把这件束腰越勒越紧。这将使俄国越来越无法应对此后半个世纪的挑战和变革。困局的标志之一是农奴起义的规模。这一现象始于17世纪,但最可怕和危险的危机来自1773年的普加乔夫(Pugachev)暴乱,这场最为严重的大型地方起义使19世纪以前的俄罗斯农业止步不前。此后的政策虽有所改善,意味着起义通常限于地方且规模可控,但一直持续了几乎整个帝国时代。起义的一再发生并不使人惊讶。叶卡捷琳娜统治期间,黑土区农民所承受的劳役负担直线上升。文化阶层中很快出现批评之声,农民的境况成为他们偏爱的话题之一,从而提前展现此后两个世纪间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很显见的矛盾。人们开始明白,现代化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如果借鉴西方的观念,这些观念所产生的效果是无法限制的。对正教和专制的第一声批判即将出现,保存和固化社会体系的需求最终将使变革真真切切地停滞下来,而俄国需要变革才能保住大胆和不择手段的领导方式及仿佛取之不竭的军事人力赋予该国的地位。

到1796年叶卡捷琳娜去世时,该国的地位着实相当突出。军队和外交是其国威最坚实的基础。她给俄国带来了700万新臣民。她说她承蒙俄国的厚待,初来时是个"只有三四件衣裳的可怜姑娘",但已经用亚速、克里米亚和乌克兰偿还了这份恩情。她与其前任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彼得的统治所带来的巨大惯性,使俄国在君主权力弱化的时期依旧延续了沿两条传统路线——波兰和土耳其——对外扩张的政策。对俄国有利的是,其可能的对手在18世纪大部分时期都遇到越来越大

的麻烦。瑞典出局后,只有普鲁士或哈布斯堡帝国可以成为旗鼓相当的对手,由于双方经常彼此冲突,俄国通常可以对积弱的波兰和处于崩溃边缘的奥斯曼帝国为所欲为。

1701 年,勃兰登堡选侯在皇帝的首肯下成为国王;他的王国普鲁士最终存续到 1918 年。自 1415 年起,霍亨索伦王室成员接连出任选侯,使他们祖先的领地稳步扩张,在波兰国王逐走统治普鲁士的条顿骑士后,这块原本的公爵领地于 16 世纪被勃兰登堡统一。一名选侯在 1613 年改信加尔文派,而其臣民依然是路德宗的信徒,此后宗教容忍一度是霍亨索伦王朝的政策。该王朝所面临的难题之一是其领地的广阔和多样化,这片土地从东普鲁士一直延伸到莱茵河西岸。17 世纪后半叶,瑞典人填补了这片人丁稀少的土地,但就连"伟大选侯"腓特烈·威廉也为此遇到过麻烦,他是普鲁士常备军的缔造者,打赢过瑞典人,为一段欧洲近代史中最持久的军事传承打下了基础。军队和外交继续把他的继任者推向他所渴求的王冠,也让他们参与到对抗路易十四的伟大同盟之中。仅此一项事实,普鲁士就显然算得上是一方强国。参战的代价十分高昂,但经休养生息之后,到腓特烈二世上台的 1740 年,普鲁士已再次建立起一支精兵和富裕程度在欧洲数一数二的国库。

626

他对这些资源的运用使他获得了"大帝"的称谓,哈布斯堡和波兰王国是主要的牺牲品,但他自己的臣民也付出了代价,被课以重税,还要遭受外敌的入侵。把他和他所憎恨的、残忍的父亲相比,很难判断究竟谁比较可亲一些。他无疑是个凶残暴戾、睚眦必报、完全不知顾忌为何物的人物,但也富有才智和文化,会吹奏长笛和谱曲,喜欢与智者交谈。他和父亲一样,对王朝利益有着无以复加的执着,在他看来,领土扩张和如日中天的威望就是这份利益的体现。

腓特烈放弃了一些过于偏远、无法真正纳入国家体系的地盘,但为普鲁士增添了更多有价值的领地。神圣罗马皇帝于 1740 年去世,虽设法确保其女儿继位,但她的前景不甚明了,这为腓特烈提供了征服西里西亚的机会。这位新任女帝就是玛丽亚·特蕾西娅。在腓特烈的对手当中,她一直是对普鲁士国王最愤恨难平的一位,直到 1780 年去世为

止；而腓特烈个人对她的厌恶也完全不遑多让。一场波及全欧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使普鲁士夺取西里西亚，也没有在此后的战争中得而复失，到统治期末年，腓特烈组织起德意志王公联盟，遏制玛丽亚·特蕾西娅之子和继承人约瑟夫二世的企图——他打算通过协商获取巴伐利亚，作为对哈布斯堡世袭领地的补充。

这段插曲对欧洲史的整体影响比人们想象中更大，虽然表面上看只是对德意志诸王领导权和一个行省的争夺，无论该省有多么富庶。初看之下，此事提醒人们，王朝利益纠葛在 18 世纪依然相当活跃，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还开启了一段长达一世纪的新篇章，并对欧洲造成重大影响。腓特烈发起一场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王朝逐鹿德意志的斗争，直到 1866 年才尘埃落定。虽然这么说也许超出了如今通常的观点，但这场斗争为霍亨索伦王朝利用德意志反帝爱国主义情感提供了背景，因为皇帝的很多根本利益与德意志无关。在始于 1740 年的漫长斗争中，双方也经历过关系良好的时期，但奥地利始终有一个巨大的不利因素：该国既非完全的德意志国家，又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德意志国家。

627

其利益诉求过于分散的不利因素在玛丽亚·特蕾西娅统治期间表现得淋漓尽致。奥属尼德兰给行政带来的麻烦更甚于战略上的优势，但使该国无暇顾及德意志问题的最大麻烦来自东方，而且在该世纪后半叶形成越来越沉重的压力：为决定奥斯曼帝国的命运与俄罗斯长期不断地交锋的可能性越来越明显。有大约三十年左右，俄国与土耳其人的关系一度缓和，只是偶然发生因建筑要塞或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劫掠所导致的小冲突，这些鞑靼人源于金帐汗国的一支，当时视奥斯曼为宗主国。在随后的 1768 年至 1774 年间，叶卡捷琳娜完成了她最成功的战役。她与奥斯曼人在籍籍无名的保加利亚村庄库楚科—卡纳吉(Kutchuk Kainarji)所签署的和约，是整个世纪中最重要的协议之一。奥斯曼人放弃了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宗主权(造成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重大损失，前者是因为失去了他们的军事人力，后者是因为奥斯曼帝国此前从未放弃过对任何信奉伊斯兰教民族的统治权)，俄罗斯获得了布格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领土、一份赔款，以及黑海和两大海峡间的自

由通行权。在某些意义上,所蕴藏的未来机遇最多的条款是,规定俄罗斯有权与奥斯曼分享“将来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的教会及其教众”的利益。这意味着俄罗斯政府将被视为苏丹的希腊臣民——也就是基督徒——所获得的新权利的担保者和保护者。历史证明,这就是一张让俄罗斯能够随意干涉奥斯曼事务的空白支票。

这只是开始,而非结束。1783 年,叶卡捷琳娜吞并克里米亚。经过对土耳其人的又一场战争,她将边境推进到德涅斯特河一线。下一处明显可作为边境的地理坐标是距黑海百来英里处、与多瑙河交汇的普鲁特河(Pruth)。俄罗斯在多瑙河口立足的可能性将成为奥地利人挥之不去的梦魇,但在此噩梦成真之前,俄国吞并波兰,已然构成了来自东方的威胁。由于瑞典国道中落,俄国可以有效地控制华沙政府。叶卡捷琳娜安置了一名听话的波兰国王,确保了在波兰的利益。贵族门阀的派系分裂和斗争阻碍了波兰的改革之路,而没有改革,波兰就不可能对俄国进行有效的抵抗,独立也只能是空想。当微小的改革契机一度出现,俄罗斯人手法老练地利用宗教分歧制造对立,并很快使波兰陷入内战,从而扼杀了改革的萌芽。

628

1768 年,奥斯曼以意欲捍卫波兰自由的借口对俄国宣战,开启了波兰历史中最后一段独立篇章。四年后的 1772 年,波兰第一次遭受“瓜分”,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分享了波兰大约三分之一的领土和半数居民。曾经人为地在某种程度上保全波兰的古老国际体系已经消失。又经过两次瓜分之后,俄国尽其所能地扩张了版图,兼并了大约 18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但下个世纪的情况表明,吸纳这批心怀不满的波兰人口绝非只赚不赔的买卖),普鲁士也获利不少,凭借战争所得提升了国力,在他们分得的土地中,斯拉夫臣民比德意志人更多。始于 1500 年的东欧转型就此完成,进入 19 世纪的舞台已经设好,再无余留的战利品让奥地利和俄国从争夺奥斯曼遗产的问题中分心。同时,作为独立国家的波兰消失了将近 130 年。

叶卡捷琳娜声称自己为俄国贡献良多,这确实不假,但她只是利用了该国早就显而易见的强大实力。早在 18 世纪 30 年代,就有一支俄

国军队西进至内卡河(Neckar);1760年,又有一支军队开进柏林。18世纪70年代,一支俄罗斯舰队曾在地中海活动。数年后,一支俄罗斯军队进入瑞士作战,20年后,另一支军队开抵巴黎。此类展现其强大的证据有一个矛盾的内核,即这份军事力量的基础是一套落后的社会和经济体制。也许,这是彼得的所作所为必然导致的结果。俄国的国家体制依赖于一个本质上与政体无法兼容的社会,后来的俄罗斯危机将一再重演这一主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时钟回拨。奥斯曼帝国将永远失去争夺霸权的资格,较之俄国不遑多让的普鲁士崛起宣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16世纪初的人想象不到联合行省王国和瑞典将成为国际上的强大势力,但到了1800年,两国的地位同样逝者如斯,尽管依然是重要的国家,却已沦为二流。法国在那个民族国家时代还是一等强国,和16世纪王朝争霸的年月中一样;实际上,其相对实力变得更强,而且将迎来主宰西欧的鼎盛时期。但法国也遭遇新的挑战,这名对手过去就曾使她尝到失败的滋味。在欧陆海岸之外的岛屿上,英格兰从1500年那个不起眼的小王国成长起来,在一个突然发迹的王朝统治下崛起,成为世界大国大不列颠。

629

这一转变几乎和俄国的崛起同样突然和令人吃惊,使欧洲外交的古老格局重新洗牌。在部分历史学者称为“大西洋群岛”的诸岛屿和王国中,在都铎和斯图亚特王室君主断断续续、方式和局限程度都不一而足的统治之下,一个新兴的海上霸主跃然而生。除了新实现的统一之外,该国还享有独特的体制和经济优势,有助于施加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三百年间,欧洲冲突和争议的主要区域从意大利古战场、莱茵河流域和尼德兰迁至德意志中部和东部、多瑙河流域、波兰和喀尔巴阡山脉以及波罗的海,但也转到每一片海洋——而这是最为巨大的变化。一个新时代确已开始,其标志不仅是东欧的重组,还有路易十四的战争,这是近代史上最早的世界大战,规模之大不仅关系到帝国的兴废,而且从陆地一直打到海洋。

四、欧洲人涌向世界

630 1500年后，世界历史发生了前所未见的惊人变化。此前从未出现过一种能覆盖全球的文明。即便在史前，文化传播也总是朝着差异化的方向发展，现在这种状况开始改变。早至18世纪末，未来局势的基本要素就已经明朗。当时，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国家宣称拥有的领土已覆盖世界一半以上的陆地。他们实际控制(或号称控制)着的领地大约为其中的三分之一。如此巨大的领土被一批共享某种特定文明的国家占据，且只为他们自身的利益服务，这一状况是史无前例的。不仅如此，其后果也已经开始在不可逆转的变革中展现出来。欧洲人早就在从事农作物移栽和动物迁移养殖，开启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生态重构进程。他们向西半球输送人口，早在1800年就形成了新的文明中心，配有欧式政府、宗教和教育制度。一个新的国家从原先由英国人统治的北美地区兴起，南美有两个业已成熟的文明被西班牙人毁灭，也被西班牙自身的文明所取代。东方发生的故事有所不同，但同样令人震撼。在1800年，如果一名英国人乘坐东印度公司的特许商船(East Indiaman)越过好望角(有大约二万荷兰人居住在那里)，他靠岸的地方不会是如同美洲殖民地那样的欧洲殖民社区，除非漂洋过海，抵达刚刚开始接纳定居者的澳大利亚。但在东非、波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他可以找到前来开展业务的欧洲人，他们计划或早或晚返回家乡，去享用

所赚得的利润。甚至在广东也能看到这类人的身影,封闭的岛国日本也有,不过数量极少。只有非洲内陆依然被疾病和气候隔绝,看起来无法企及。

这场由此开启(并获得极大发展)的宏伟变革几乎完全是单方面的进程。是欧洲人走向世界,而非世界靠拢欧洲。除土耳其人之外,鲜有非欧人士进入欧洲,除非作为引进的异域奇珍或奴隶。但阿拉伯人和中国人的航海技术绝非泛泛,他们曾出洋远航,还知道罗盘的用法。太平洋岛民也在海上划出过长长的足迹,他们的旅程充满神秘色彩。尽管如此,绕过合恩角或非洲远端完成环球航行并返回大西洋海港的船只属于欧洲,而非亚洲。

631

这是一场国际关系的重大转型,也是欧洲人缔造的结果。探索、事业活动、技术优势和政府扶持构成了其层层叠叠的基础。到 18 世纪末,该趋势看起来已不可逆转,即便在某种意义上——也被后来的历史所证明,欧洲人直接统治导致的瓦解将比其建立更迅速。没有任何文明取得过更迅速和更急剧的成功,扩张的步伐如此轻松,除了一时和偶然的挫折没有遇到任何困难。

欧洲人拥有的一项优势是非成功不可的强烈动机。文艺复兴时代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他们想要更靠近东方、与远东取得更直接的接触这一愿望,那里有欧洲急需的东西,而当时远东对欧洲实际上一无所求,没有什么交换的基础。当瓦斯科·达伽马将他所带去的东西呈给国王,卡利卡特的居民报以嗤笑;他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东西,可以和阿拉伯商人早已从亚洲其他地区带往印度的商品相比。正是因为东方如此众多的文明享有此等传奇般的优越地位,才促使欧洲人试图建立一种更常规和有保障的交通方式,而非马可·波罗式的零星游访。巧合的是,中国、印度和日本在 16 和 17 世纪都处于某种文化巅峰状态。由于土耳其人在东欧形成的陆上屏障,这些文明古国对欧洲人的吸引力比过去更为强烈。那里有巨大的利润,所以值得巨大的付出。

如果有所回报的期望是提升士气的良方,那么成功的期望也一样有效。到 1500 年,探索工作已经做得足够充分,欧洲人开始自信满满

地向新的事业发起冲击；这一过程有良性循环的因素，每次成功的出航既能增加了解，又能使他们对取得更大成果的前景多一份确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资助未来的扩张活动也将变得有利可图。此外还有基督教提供的精神财产。海外定居点建立后，很快为传教事业提供了新的舞台，但宗教传播始终以文化为载体，在与传教对象的初次接触中，欧洲人确信了自身的优越地位。此后四百年间，这一认知往往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欧洲人自信拥有真正的宗教，欠缺耐心，看不起他们所惊扰的民族和文明所创下的成就和价值。其结果往往令人不快，也往往沾满血腥。同样不假的是，宗教狂热能够轻而易举地使高尚和可鄙的动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如西班牙最伟大的美洲征服史学家在描述为何自己和同胞要前往印度时所言，他们觉得是去“为上帝和他的权柄效劳，将光明带给那些黑暗中的人们，也是为了获得财富，这是所有人类的渴望”。

632

贪婪很快导致实力的滥用，导致用武力实现统治和剥削。最后，这一切发展为罄竹难书的罪行——虽然往往是无意中犯下的。有时整个社会因此毁灭，但这只是欧洲人在其事业开端打算主宰一切所导致的最坏的一面。首批抵达印度海岸的探险家很快开始袭击亚洲商船，折磨并屠杀其船员和乘客，掠夺货物，将毁坏的船体付之一炬。科技优势使数量极少的欧洲人实力大增，最终通常可以强夺他们所需的一切，使那些文明经历史沉淀所形成的庞大人口在几个世纪的力量对比中处于劣势。

继达伽马之后，下一个来到那里的葡萄牙船长炮轰卡利卡特，为这一状况提供了应景的诠释。不久之后的 1517 年，葡萄牙人抵达广州，他们鸣响礼炮以表示友好和敬意，但火炮的噪音吓坏了中国人（起先称他们为佛朗机[*folangki*]——对“法兰克人”谬之千里的误读）。这些武器比中国人手里的任何装备都强大许多。枪炮在亚洲早已存在，中国人发明火药比欧洲要早数百年，但火炮技术却一直裹足不前。欧洲在 15 世纪实现工艺和冶金技术的巨大飞跃，制造出了远比世界其他地区优越的武器。此后还有更惊人的改良，使欧洲人的相对优势进一步

加大，并延续到 20 世纪。这一进程此前是、此后也将和其他领域平行前进，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造船业和驾船技术的发展，这方面前文已有提及。这些进步彼此结合，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武器——载有火炮的帆船，被欧洲人用来打开世界的大门。同样，这一发明在 1517 年远未达到完善的境地，但葡萄牙人已经能够击退奥斯曼舰队，让他们无法染指印度洋。（土耳其人在红海更为成功，那里水域狭窄，划桨驱动、接舷作战的平底大船更有发挥的余地。但即便在红海，葡萄牙人也能够往北一直推进到苏伊士地峡。）中国人的战船不比平底划桨船更有用。放弃划桨驱动方式、在侧舷安装大量火炮，使欧洲单薄的人力所发挥的效用获得几何级数式的增长。

633

当时的欧洲人非常清楚这一优势：早在 1481 年，教皇就禁止向非洲人出售枪支。17 世纪的荷兰人极其谨慎地保护着枪炮制造的秘密，不让这些技术落入亚洲人之手。但他们还是泄露了出去。15 世纪，有土耳其人在印度担任炮兵，这些技术流传到中国之前，葡萄牙人还为波斯人提供加农炮，并指导他们如何铸炮，以此制压奥斯曼人。17 世纪，枪炮设计和制造技术的吸引力是耶稣会神父得到中国当权者厚待的原因之一。

但即便如荷兰人所害怕的那样，最先进的铸炮知识流传到了东方社会，欧洲人的优势也无法被抹消。尽管接受了耶稣会的操练，中国的炮兵部队依然相当落后。欧洲与世界的技术差异不仅仅来自知识技能。在属于欧洲的时代刚刚开启之际，欧洲所享有的财富不只是新知，而且还有与其他文明不同的、对待知识的态度。欧洲人有意识地利用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具备一种使科技发挥效用的本能。而这其中又蕴含着欧洲人的另一份心理特征的基础：他们对于自身改变世界的力量越来越充满自信。或许，这就是他们和欧洲以外的世界最根本的区别所在。未来向欧洲打开大门，为他们展现了其他文明无法企及的种种可能性。以这份自信为基础，他们形成了一份无比重要的心理优势。早在 1500 年前后，部分欧洲人已经见到了未来——而且他们的设想确实成真。

非洲和亚洲首先成为欧洲人运用这些优势的目标。在这两片大陆,葡萄牙人的殖民事业保持了一个多世纪的领先地位。他们成为显赫的存在,在开辟东方航路的探险中取得极大的成功,使其国王获得受教皇认可的如下头衔:“印度、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和波斯的征服者、航海和贸易之王”,这足以彰显葡萄牙霸业的规模之大和对东方世界的倚重,但埃塞俄比亚之王的头衔略有误导之嫌,因为葡萄牙与该地的接触规模很小。非洲拒人千里,只有极少的区域可以进入,而且也不无风险。葡萄牙人觉得,是上帝用神秘而歹毒的疾病(19 世纪末之前一直让欧洲人无法进入)在非洲内陆周围特意圈起了一道障碍。即便西非的沿海基地也谈不上卫生,只是因为对奴隶买卖和远途贸易的重要支撑作用才被堪堪忍受下来。位于东非的基地更缺乏健康保障,但因为是阿拉伯人创建的商贸网的组成部分——而非作为进入内陆的跳板——所以也利益攸关,葡萄牙人蓄意袭扰这些基地,使沿红海和中东运到东地中海威尼斯商人手中的香料成本大增。葡萄牙的后继殖民者们对非洲内陆未加干涉,也别无选择,在远离文明世界的森林和大草原深处,那片大陆此后两个世纪的历史大体上依然沿着自身的节奏发展,其居民仅受到欧洲及其边陲世界的慢性蚕食和偶尔的刺激。但同样不假的是,在亚洲开启的欧洲时代表明,任何强权势力起初都没有兴趣对大片土地进行征服或殖民。至 18 世纪中期为止,这一阶段的标志是商栈的大量涌现、港口设施的出让、沿海要塞和基地的兴建,因为这些事物本身可以确保早期帝国主义在亚洲所追寻的惟一目标,即安全且有利可图的贸易。

634

葡萄牙人在 16 世纪主宰了这一贸易;他们用坚船利炮横扫一切阻碍,迅速建起一连串基地和商栈。瓦斯科 · 达伽马抵达卡利卡特的 12 年之后,葡萄牙人在距离印度西海岸大约 300 英里的果阿(Goa)建立起主要的印度洋贸易中心。那里将成为传教和贸易两方面的中心;在该地站稳脚跟后,葡萄牙帝国大力支持传播信仰的工作,方济各会于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1513 年,第一艘葡萄牙船只抵达传说中的香料之岛摩鹿加(Moluccas),揭开了欧洲势力席卷印尼、东南亚和太平洋诸

岛的序幕，其势力圈的最南端远至帝汶。四年后，第一艘葡萄牙船只来到中国，打通了欧洲与该帝国的直线贸易航路。十年后，他们取得澳门的使用权；1557 年又获得该地的永久定居权。查理五世将西班牙凭借对摩鹿加岛的探索所主张的权益弃让给葡萄牙人，只保留菲律宾作为远东的势力范围，并宣布放弃印度洋海域的任何利益，使葡萄牙人在此后半个世纪垄断了这片东方帝国。

这种垄断是贸易层面的，但不仅是远东与欧洲的贸易；船队往来亚洲各国之间时也有很多可以从事的业务。波斯地毯传到印度，摩鹿加的丁香、日本的铜和银运至中国，印度的布料进入暹罗，都通过欧洲船只运输。葡萄牙人和后继者们发现这是利润丰厚的收入来源，可以部分补偿欧洲与亚洲的贸易逆差，因为除了银之外，后者的居民长期以来对欧洲所需甚少。海上惟一的有力竞争者是阿拉伯人，在东非一带活动的葡萄牙舰队能够有效地限制他们，葡萄牙舰队基地包括 1507 年建立、位于红海海口的索科特拉岛(Socotra)，波斯湾入口北部沿岸的荷姆兹岛以及果阿。葡萄牙人以这些基地为出发点，逐步扩张贸易范围，最终使贸易活动远抵红海深处的马萨瓦(Massawa)和波斯湾另一头，在巴士拉(Basra)办起工厂。他们还确保了在缅甸及暹罗的特权地位，并于 16 世纪 40 年代成为首批登陆日本的欧洲人。这一贸易网络得到与地方统治者所签署协议的外交支持，也以葡萄牙海上的优势火力为后盾。因为缺少人力，即便他们有意向内陆发展势力也无法如愿，所以这一商业帝国不仅具有经济合理性，也是当时条件下所能够达成的极限。

635

印度洋的霸权地位掩盖了葡萄牙人根深蒂固的弱点：缺乏人力、财政基础薄弱。其主宰地位仅持续到该世纪末，然后被荷兰取代，后者将商业帝国的管理技巧和制度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荷兰人是极为杰出的贸易帝国主义者，但最后也在印尼定居并发展种植业。1580 年，葡萄牙被西班牙统一。这一变化激起了荷兰航海家的野心，也给他们创造了机会。他们当时被排除在从里斯本向北欧倒卖商品这一利润丰厚的再输出贸易之外，而过去曾是该业务的主要掌控者。荷兰和西

班牙的八十年战争这一背景带来了额外的动机,使他们更愿意进入这些区域,把自己的获利建立在伊比利亚人的损失之上。荷兰和葡萄牙一样人口寥寥,不过区区 200 万,其生存基础相当狭隘;因此贸易财富对他们至关重要。他们的优势在于丰富的海事人力资源、船只、财富和通过北部海域的捕鱼及船运所积累的经验,同时,由于国内的商业水平高度发达,为新的经营活动募集资源毫无困难。阿拉伯人在同一时期恢复元气,趁西班牙统一令葡萄牙实力式微的机会夺回桑给巴尔以北的东非根据地,这也使荷兰人从中受益。

因此,葡萄牙人的东方帝国在 17 世纪开头的数十年大范围解体,并被荷兰取而代之。而且,荷兰人还一度在葡萄牙控制的巴西蔗糖产区伯南布哥(Pernambuco)立足,但未能长期保持。荷兰人的主要目标是摩鹿加。私人航海(七年间共 65 次,一些船队绕过了麦哲伦海峡,还有一些绕过了非洲)的短暂阶段于 1602 年结束,是年,荷属东印度公司在总议会(States General)——联合行省王国政府——的发起之下成立,历史证明,该组织将成为助荷兰取得东方商业霸权的决定性机构。和他们之前的葡萄牙人一样,该公司通过与当地统治者勾结的手段排除竞争者,通过一套商栈体系运转业务。1623 年,10 名英国人在安波那(Amboyna)[①]遇害,终结了英国人直接插手香料贸易的任何企图,此事可以表明荷兰人对竞争对手有多么厌恶。安波那是葡萄牙利益遭到迅速侵占的过程中首批被夺走的葡萄牙基地之一,但直到 1609 年,荷兰向东方派遣一名常驻总督之后,葡萄牙的大型要塞才开始陷落。荷兰人在爪哇岛的雅加达(改名为巴达维亚)设立总部,作为这些战役的指挥中心,并一直控制该地,直到荷兰殖民统治结束。该地成为一片殖民地区的核心,周围的荷兰种植业主可以依赖东印度公司的支持,对其劳力实行残酷无情的控制。荷兰殖民地的早期历史色调阴郁,充斥着暴动、驱逐、奴役和屠杀。当地船运贸易以及中国的商船活动被蓄意破坏,好让荷兰人独占一切利润来源。

636

① 摩鹿加岛上城市安汶的旧称。——译者注

对欧洲的香料贸易是荷兰人关注的核心，也是巨大的利益焦点所在。在该世纪大部分时期，香料的价值占运回阿姆斯特丹所有货品的三分之二。但荷兰人还着手取代了葡萄牙人在颇具价值的东亚贸易中的地位。他们虽然派出远征军，可无法将葡萄牙人逐出澳门，但在台湾成功立足，从那里与中国大陆开展间接的贸易往来。1638 年，葡萄牙人被赶出日本，荷兰人继承了他们的位置。此后 20 年间，锡兰岛的葡萄牙人也被荷兰人挤走。另一方面，荷兰人通过协议所取得的暹罗贸易垄断权则被另一强国——法国夺走。法国与该地区的关联始于 1660 年的一场偶然事件，有三名法国传教士出于机缘巧合来到暹罗的首都。得益于他们所建立的传教中心以及一名希腊顾问在暹罗宫廷中的影响力，一支法国外交和军事使团于 1685 年随后抵达。但这一前景光明的开端最终导致一场内战，并以法国的失败作结，暹罗再度脱离欧洲势力的影响范围，该状况延续了两个世纪之久。

637

于是，18 世纪早期的荷兰既在印度洋和印尼享有霸权，也在中国海拥有重大利益。除了果阿和澳门等依然残存的葡萄牙根据地，这一格局与此前的葡萄牙势力分布有着惊人的相似度。荷兰远东势力以马六甲海峡为核心，从那里通过马来西亚和印尼辐射至台湾，连接起通往中国及日本的贸易纽带，并往东南方向延伸到至关重要的摩鹿加。当时，该区域享有繁荣的内部贸易，开始财政自主，作为硬通货的金银锭更多来自日本和中国，而非早前的欧洲。再往西看，荷兰人也在卡利卡特、锡兰和好望角立足，并于波斯设立工厂。巴达维亚是一座大城市，荷兰人也在此经营种植园、栽培所需的作物，但这里依然是沿海或岛屿式的商业帝国，而非大陆中的封闭领地。海上实力是荷兰人最后的依靠，他们的海军地位被人超越后，其保障力有所缩水，但不至于消失。

显然，这种超越在 17 世纪后半叶已现端倪。印度洋霸权的挑战者是英格兰，一个意想不到的对手。英国早先曾试图染指香料贸易。詹姆斯一世时期曾有一家东印度公司存在，但无论是试图与荷兰人合作还是与他们对抗，其经营者都碰得头破血流。这一状况导致的结果是，到 1700 年，英国人实际上将马六甲海峡以东视为其利益的必争之地。

和 1580 年的荷兰人一样,他们面临改变航道的需要,并加以实行,于是引发了新教改革之后、工业化启动之前英国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他们主宰了印度。

英国人在印度的主要对手不是荷兰或葡萄牙人,而是法国人。这场竞争所涉及的利害在很长时期都没有显山露水。英国势力在印度的崛起是非常缓慢的过程。在马德拉斯建立圣乔治堡、从葡萄牙人那里接手孟买,作为查理二世的王后带来的一部分嫁妆之后,英国人在该世纪中没有进一步扩大在印度的势力范围。以早期根据地为出发点(孟买是他们惟一拥有全部主权的领地),英国人从事着咖啡和纺织品贸易,不如荷兰人的香料贸易那般风光,但价值和重要性与日俱增。这项业务还改变了他们的民族习性,从而也改变了社会,伦敦出现的咖啡店就可以展现这一点。很快就有船只从印度出发,被派往中国求购茶叶;到 1700 年,英国人已获得一种新的国民饮品,时隔不久,一位诗人对此作评,称茶是“令人愉悦而不上瘾的杯中物”[①]。

638

正如东印度公司武装在 1689 年遭受的失败所显示的,靠军事力量夺取印度霸权并非易事。不仅如此,对抗也未必会带来繁荣。因此,该公司对于冲突总是能免则免。虽然在该世纪末,公司获准占用其过去兴建于加尔各答的威廉堡,从而完成了一次里程碑式的势力扩张,但公司董事以不切实际为由,于 1700 年放弃了在印度获取新领地或种植园殖民地的想法。不过,1707 年奥朗则布去世后,莫卧儿帝国陷于崩溃,令英国人的侧重点发生变化。其后果虽然来得缓慢,但累积起来的效应还是使印度解体为一系列自治国家,没有一方能够坐大。

1707 年以前,马拉塔人就给莫卧儿帝国造成了麻烦。帝国内部的分裂趋势总是对纳瓦布(*nawab*,即行省统治者)有利,这些统治者彼此瓜分势力,马拉塔人在其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锡克教形成了第三股势力。该教派起源于 16 世纪的一支印度的秘密教派,后与莫卧儿统治者反目,但也远离正统印度佛教,实质上成为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外的

---

① 引自威廉·柯柏 1785 年发表的无韵长诗《任务》(The Task)。——译者注

第三种宗教。锡克教采取一种军事化的兄弟会组织形式，没有种姓之分，所有教徒都能在这段分裂时期掌控自己的权益。一个锡克帝国最终在印度西北部形成，并延续到 1849 年。同时，印度教和穆斯林日趋对立的迹象也在 18 世纪出现。印度教进一步融入社群，加强宗教仪式方面的实践，以此在公开场合凸显自身的存在。穆斯林也采取同样的手段，双方互不相让。保守和反动的莫卧儿军事及民事行政体制管理着这个分歧日渐深化的帝国。波斯人还在 18 世纪 30 年代发动入侵，夺走了该国的部分领土。

这一局面对外部干涉势力构成了极大的诱惑。令人意外的是，以回顾历史的眼光来看，英国和法国都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坐收其利；甚至到 18 世纪 40 年代，英属东印度公司的财力和实力依然比不上荷属东印度公司。其进展之慢证明贸易依然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也是他们关注的重点。当英国人确实开始插手干涉——主要是出于对法国人的敌意以及害怕落于其后的心态，他们拥有若干重要的优势。加尔各答的根据地使他们控制了孟加拉及恒河下游流域的门户位置，而这一部分是印度最有潜力孕育财富的地区。得益于英国的海军力量，他们已确保和欧洲的海上交通线，而且伦敦的大臣听取东印度公司商人的意见，而凡尔赛宫的大臣却没有这份雅量。法国人是最危险的潜在竞争者，但他们的政府总是动不动就为欧洲大陆的其他目标分心。最后一点在于，英国人对传教并不热心；从狭义角度来讲，新教在亚洲传教的兴趣确实比天主教来得更晚。而且，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他们无意干涉当地习俗或体制，只是希望提供一种中立的权力结构——有些类似莫卧儿人，让印度人在该体制下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同时希望东印度公司能够在和平的局面下从商业活动中获利并兴旺发达。

639

印度政局是通往未来帝国之路的关键。支持彼此敌对的印度王公是法国和英国之间最早的间接对抗形式。1744 年，这种对抗引发了首次英法武装冲突，发生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卡纳蒂克(Carnatic)。印度身不由己地陷入这场英法之间的世界级对抗。这场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冲突史称七年战争(1756 — 1763)。即便英法两国在 1748 年后正式缔

640 结和约,战争爆发之前,印度实际上就已难免一战。在杰出的卡纳蒂克总督杜布雷(Dupleix)的经营下,法国的事业蒸蒸日上,他通过武力和外交在当地王侯中扩张势力,使英国人产生极大的危机感。但他被召回法国,而且法属印度公司无法得到首都政府全心全意的支持,可他们需要这份支持才能崛起为新的龙头老大。当战火于 1756 年再度点燃,孟加拉纳瓦布攻击并占领了加尔各答。他处置英国俘虏的手段十分残忍,有很多人在不久后成为传说的"黑洞"①事件中窒息而死。这令英国人又添了一层怒气。东印度公司军队在公司成员罗伯特·克莱夫(Robert Clive)的率领下夺回城市,占领位于金德纳格尔(Chandernagore)的法国据点,并于 1757 年 6 月 22 日击败纳瓦布的一支规模大得多的军队,战场位于胡格利河上游方向的普拉西(Plassey),距加尔各答大约 100 英里。

战斗并不十分血腥(纳瓦布的军队被英军收买),但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决定意义的战役之一。它为英国打通了控制孟加拉和该国财政的道路。这一切以卡纳蒂克法国势力的毁灭为基础;法国人的失败又为英国进一步扩张势力铺平了道路,从而不可阻挡地导向英国垄断印度的未来局面。任何人事先都没有这样的计划。英国政府的确开始意识到兹事体大,其贸易受到迫在眉睫的威胁,并派出一个营的正规军为公司助战;这一举动在两方面都具有启发性,首先表明政府认识到此事关乎国家利益,但也说明这场军事行动的规模甚小。配备欧式野战炮的极少数欧洲军队就可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印度的命运取决于该公司寥寥无几的欧洲人和欧洲训练出的士兵,以及其当地代理人的外交技巧和精明手段。依靠这薄弱的基础和四分五裂的印度对统一政府的需要,英属印度帝国(British Raj)就此成立。

1764 年,东印度公司正式成为孟加拉的统治者。这完全不是公司董事事先设下的计划,他们只想从事贸易而无意统治。然而,如果孟加

---

① 孟加拉纳瓦布占领加尔各答的次日,英国殖民军官收复该地,发现英国俘虏被关押在只有一扇小窗的房间内,其中大部分人因窒息死亡。该牢房后来被称为黑洞。——译者注

拉可以为政府买单,那承担管理的责任也未尝不可。法国的基地如今稀稀落落,所剩无几;1763 年的和平协议给他们保留了五个贸易中转站,前提是不得建筑防御设施。1769 年,法属印度公司解体。不久之后,英国从荷兰人手中夺取锡兰,供一种独一无二的帝国主义实例登场的舞台已然就绪。

6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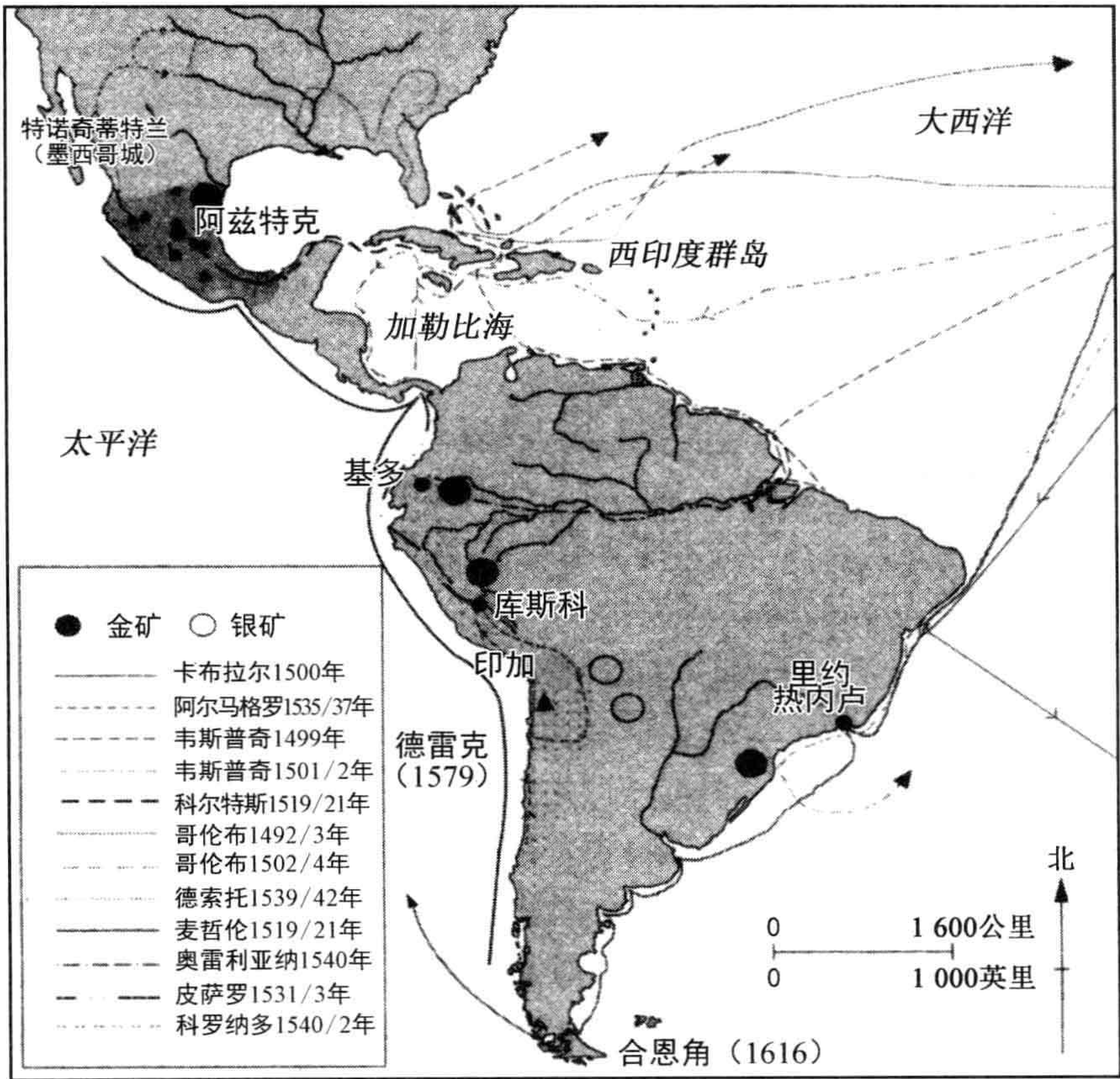
这将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东印度公司长期以来也并不情愿走这条路,但由于财务问题和邻近领区本地行政的无序状况,它逐渐被动地扩大了政府的职能范围。公司的贸易职能日趋边缘化,这对业务并非好事,但其成员也从中获得了更大的自立门户的机会。这引起了英国政客的关注,他们首先削弱公司董事的权力,然后将公司牢牢置于王室的控制之下,于 1784 年在印度设立一套"双重控制"体系,并持续到 1858 年。建立该体系的法案中还包括反对进一步干涉地方事务的条款;英政府和公司一样热切地希望避免以帝国主义势力的身份在印度陷得更深。但此后半个世纪,这一状况还是发生了,公司此后兼并的土地越来越多。由此开启的道路最终导致 19 世纪英属印度的启蒙专制局面。印度与欧洲国家此前控制的任何附属国都大不一样,因为有千百万臣民要加入帝国,只有少数具有远见的有识之士到很久以后才意识到信仰归化或同化的必要性,这在当时是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概念。大英帝国的体制特征将因此发生深刻的转型,并最终使英国的战略、外交、对外贸易模式乃至样貌都发生改变。

除了印度和荷属印尼,这几百年间,欧洲人从东方获得的任何一片领地就面积而言都无法与在美洲占据的巨大地盘相比。哥伦布登上新大陆后,他们对"西印度"群岛中的主要岛屿进行了相当迅速和彻底的跟进探索。格拉纳达陷落、西班牙主大陆的收复失地运动完成后不久,他们从摩尔人手里夺下北非,事实很快表明,征服美洲的土地比这更加容易,因此成为一个诱人的目标。殖民地迅速扩张,尤其在伊斯帕尼奥拉(Hispaniola)和古巴。作为美洲殖民的里程碑之一,第一座天主教大教堂落成于 1523 年;如西班牙人的城市建设所表明的那样,他们是来长期定居的。他们的第一所大学(与大教堂在同一座城市:圣多明

戈)成立于 1538 年,第一家印刷社同年在墨西哥成立。

西班牙殖民者的目标是土地和黄金,前者是农民的需要,后者是投机者的向往。他们没有竞争对手,确切地说,在 16 世纪末以前,除了巴西以外,中美和南美地区完全是西班牙人的后院。首批登上这些岛屿的西班牙人往往是卡斯蒂利亚乡绅,虽然贫穷,但能吃苦耐劳,且雄心勃勃。进入美洲大陆后,他们四处掠夺战利品,但也传扬十字架的福音和卡斯蒂利亚王室的光辉形象。1499 年,他们在委内瑞拉完成了对大陆的初次渗透。然后是 1513 年,巴尔沃亚(Balboa)穿过巴拿马地峡,成为首个见到太平洋的欧洲人。他的探险队建起屋宅、播下种子;征服

642



对美洲的探险

者(*conquistadores*)的时代就此开启。有一位征服者的冒险经历使后人遐想联翩,他就是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1518年,他带领数百名追随者离开古巴。他存心藐视总督的权威,并以献给王室的战利品为自己的行动正名。1519年2月在韦拉克鲁斯(Vera Cruz)上岸后,他焚毁船只,让手下拿出无路可退的觉悟,接着向墨西哥中部的高原挺进,这将成为帝国主义历史中最戏剧化的传奇故事之一。抵达墨西哥城之际,所发现的文明令他们大受震撼。该城不仅有遍地的黄金和宝石,而且所坐落的土地也适合采用卡斯蒂利亚人在故乡所熟悉的方式耕作。 643

虽然科尔特斯的人手极少,要征服统治中部高原的阿兹特克帝国需要英雄般的勇气,但他们拥有巨大的优势和非凡的好运。他们所面对的民族的科技十分原始,易被征服者携带的枪炮、钢铁和马匹所震慑。阿兹特克人以为科尔特斯也许是神祇的化身,传说该神明终有一天会回来,这份不安使他们无法放开手脚进行抵抗。而且他们对殖民者带来的外来疾病抵抗力极差。不仅如此,阿兹特克人本身也是残忍的征服民族;其印第安臣民乐于迎接新的征服者,将他们视为解放者,再不济也可以换波新主人。因此局势对西班牙人有利。尽管如此,决定性的因素最终还是他们本身的坚韧、勇气和残酷无情。

1531年,皮萨罗对秘鲁发动一场类似的征服行动。这一成就甚至比征服墨西哥更为突出,而且以更可怕的方式展示了征服者的贪婪和残忍。新帝国的殖民始于16世纪40年代,一开始就在波托西(Potosi)发现一座银矿山,这是史上最重要的矿藏发现之一,将成为此后三百年间欧洲银块的主要来源。

截至1700年,西班牙美洲帝国名义上覆盖着从今日新墨西哥城一直延伸到拉普拉塔河(River Plate)的巨大区域。通过经巴拿马和阿卡普尔科的航线,该地与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建立了海上联系。然而地图上的巨大面积具有误导性,格兰德河以北的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和新墨西哥地区人口非常稀少;除了几座孤堡和商栈及数量略多的传教点以外,所谓的占领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相当于今日智利的南部地

区也一样,殖民开发相当欠缺。最重要且人口最密集的区域有三块:很快成为西班牙美洲帝国最发达地区的新西班牙(即墨西哥的旧称);因矿产获得重要地位、土地占用率极高的秘鲁;以及若干面积较大、殖民时期较长的加勒比岛屿。不适合西班牙人定居的区域被统治当局长年弃之不顾。

墨西哥和利马总督辖区成为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王国的姊妹国,依附于卡斯蒂利亚王室,其总督对印第安人行使统治权。他们设有自己的王室议会,国王通过该议会直接行使权力。这一模式理论上的中央化程度很高;但实际上,地理位置和格局使此类自欺欺人变得毫无意义。以当时具备的通信手段,在西班牙对新西班牙或秘鲁实行严密的控制是不可能的。王室名下的总督和都督在日常事务中享有实质上的独立地位。但马德里可以通过殖民地经营获取财政收益,事实上,西班牙和葡萄牙不仅不用负担占领美洲的成本,还能从中获取一份净利,在一个多世纪间,西半球没有其他殖民国家可以做到这点。究其原因,贵金属输入占了很大一部分。1540 年后,源源不断的银块抵达大西洋彼岸,但对西班牙人而言不幸的是,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的战争吞噬了这笔财富。截至 1650 年,共有 1.6 万吨银流入欧洲,这还不包括 180 吨的金器。

644

究竟西班牙有没有从中获得其他经济收益则更难断言。该国与其他殖民势力共处一个时代,相信贸易流通额有其上限,从而认为所属殖民地的贸易应该留作己用,并以法规和武力作为保障。此外,西班牙还支持另一种老生常谈的早期殖民经济理论,该观点认为殖民地不得发展工业,否则将对母国规模有限的市场形成冲击。不走运的是,西班牙通过这一措施所取得的效果并不如其他国家。虽然除了农作物加工业、矿产业和手工业之外,美洲殖民地其他工业的发展都受到限制,但西班牙当局越来越无力排除在本国殖民地领土从事其他贸易的外国商人(后来被称作闯入者)。西班牙种植业很快就产生了母国无法供应的需求——尤其是奴隶。各岛屿和新西班牙经济的依靠除矿业之外就是农业。这些岛屿很快就对奴隶产生依赖;而西班牙设在美洲大陆殖民

地的政府不愿支持奴役被征服人口的做法，于是，其他确保劳力供应的手段应运而生。第一种方法始于各座岛屿，后蔓延至墨西哥，与封建领主制有些类似：西班牙人得到委托监护地（*encomienda*），为一群村民提供保护，并换取他们的部分劳力作为回报。其总体状况与农奴制乃至奴隶制的差异并非始终泾渭分明，奴隶将很快成为非洲黑奴的同义词。

殖民初期是否有大量亲殖民者的土著人口对劳力供应的影响很大，正如占领势力的性质对殖民主义在中南美洲和北美洲所表现出的差异也有很大影响。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曾统治摩尔地区达数百年，因此对多种族社会的生活并不陌生。拉美很快就出现了一批混血人口。在葡萄牙经三十年对抗、最终从荷兰人手里夺来并牢牢占据的巴西，混血现象非常普遍，欧洲人和土著及黑奴都会生育后代，这些黑奴最早于16世纪作为甘蔗园的劳力引入，后来人数不断增多。非洲的葡萄牙人也不介意种族混血，不存在肤色壁垒曾被视为葡萄牙帝国主义的一个突出特征。

645

虽然在一片广大的区域建立起多种族混合社会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帝国留下的遗产之一，而且其生命力经久不衰，但种族差异依然是这些社会的等级划分依据。统治阶级始终是伊比利亚半岛人和克里奥尔人（*creole*），即出生于殖民地的欧裔。随时间推移，后者觉得受前者——称为半岛人（*peninsulare*）——排挤，无缘关键职位，遂萌生敌意。克里奥尔人以下的等级界限较不分明，其地位按血统渐次降低，直到最困苦、最受压迫的纯印第安人和黑奴。虽然印第安语得以留存——经常要归功于西班牙传教士的努力，征服者的语言当然还是成了这片大陆的主流通行语。这是决定大陆文化统一形态的最主要因素，不过罗马天主教也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教会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的开创过程中扮演了极为突出的角色。其先驱是殖民时代最初期来自正规修会（特别是方济各会）的传教士，但此后三个世纪间，他们的后继者在远离欧洲的美洲土著文明世界中布道。他们带着印第安人离开所属部落和村庄，教授基督教和拉丁语（早期托钵僧经常不让他们接触西班

牙语,以防止受殖民者的腐化),改变他们赤身裸体的习惯,然后送他们回去,在同胞之间撒播光明。开拓者建立的传教站点为数百年后才出现的国家确立了版图的形状。传教者鲜遇阻力。例如,墨西哥人热情地接受了圣母玛利亚崇拜,将她等同于本土神话中的大地母神(Tonantzui)。

无论其是非功过,教会从一开始就自视为卡斯蒂利亚王室的印第安臣民的保护者。数百年后,当罗马天主教群体的人口分布发生重大改变,才能感受到其最终的效应,但大量蛛丝马迹很早就显山露水了。1511 年,一位多明我会传教士在圣多明戈发表了第一篇反对西班牙人对待新臣民手段的布道辞。以此为契机,国王宣布了在新大陆的道义和基督教使命。保护印第安人的法律获得通过,人们向教士寻求建议,研究土著的权利和保障权利的方式。1550 年发生了一桩不寻常的事件,王室政府发起一场神学和哲学探讨,争论的焦点是统治新大陆民族应采取何种原则。但美洲远隔重洋,法律难以执行。土著人口数量又发生灾难性的锐减,造成劳动力短缺,也使保护工作更难以开展。早期殖民者将天花传播到加勒比海一带(其源头似乎在非洲),科尔特斯的一名手下又将病毒带到大陆;这可能是西班牙美洲帝国史的第一个世纪中发生人口灾难的主因。

646

同时,教会几乎马不停蹄地开展工作,争取土著的皈依(在赫奇米尔科[Xocomilcho],两名方济各会修士一天之内就让 1.5 万名印第安人受洗),并以传教活动和教区为他们提供保护。其他人也没有停止向王室进言的工作。多明我会修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是其中不容忽略的一位。他起初是殖民者中的一员,后成为美洲第一位获得正式任命的神父,此后,作为神学家和主教,他毕其一生于对查理五世的政府施加影响,也不无成果。他坚持一条原则,如果告解者对待印第安人的方式使他感到不满,他就拒绝为其赦罪,哪怕临终仪式时也不例外,并以彻头彻尾的中世纪理论在反对者面前为自己辩护。他认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有些人确实是“天生的”奴隶(他自己也有黑奴),但认为其中并不包括印第安人。他后来作为殖民主义

最早的批判者之一被载入史册，主要是因为两百年后的一名启蒙运动宣传家利用他的著述来宣扬自己的观点。但这是一种年代错误式的观点。

数百年间，教会的布道和仪式是美洲印第安农民接触欧洲文化的惟一途径，天主教的部分特质也赢得了他们的认同和理解。仅有少数人能获得欧式教育；17 世纪以前的墨西哥主教都不是当地人，除了教士进修，农民所接受的教育比教义问答好不了多少。事实上，虽然很多教士为当地事务鞠躬尽瘁，但教会依然希望保持一种外来的、殖民式的地位。讽刺的是，教士保护当地基督徒的尝试反而孤立了他们（例如不教授他们西班牙语），使他们脱离于本地人和社会当权者融合的进程之外。

这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美洲殖民地的天主教垄断地位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使教会和政治体制彼此融合：这对覆盖广阔地区的薄弱行政机制是重要的补充，令西班牙人热衷于布道的也不仅仅是十字军式的狂热。新西班牙设立了异端裁判所，是支持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教会确定了格兰德河以南的美洲天主教的形态。多年以后，这一局面带来了重要的后果；虽然有些教士在南美改革和独立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虽然 18 世纪的耶稣会为保护土著不惜招致葡萄牙殖民者和巴西当局的怒火，但作为一个整体，教会从未找到采纳进步立场的轻松途径。这意味着，许许多多年后，拉美政治独立和自由主义运动将与天主教欧洲的反教皇至上势力携手。这一切都与同一时期在英属北美地区扎根的宗教多元化社会形成鲜明对比。 647

尽管大陆殖民地输出了数量惊人的金银，在早期近代史的大部分时期，对欧洲最具经济价值的还是加勒比诸岛。其重要性依赖于农产品，尤以甘蔗为首，该作物首先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的西西里和西班牙，然后被欧洲人带到马德拉群岛（Madeira）和加那利群岛，接着传入新大陆。加勒比和巴西的经济都因此作物而转型。中世纪的人用蜂蜜给食品增加甜味；到 1700 年，蔗糖虽昂贵如昔，但已是欧洲人的生活必需品。甘蔗与烟草、硬材和咖啡共同构成加勒比群岛的主要产品，也是

熙熙攘攘的非洲奴隶贸易的根源。这些出口品使种植园主在母国的国内事务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西班牙殖民者开启了加勒比群岛大规模农业活动的序幕，上岛之后，他们马上开始种植从欧洲带来的水果并饲养牲畜。引入稻米和甘蔗后，农产品产量长期受限于劳力短缺，岛上的土著人口饱受欧洲人的虐待和疾病之苦。后期抵达的寄生产业——海盗和走私奠定了经济发展的下一阶段。西班牙人占领了加勒比海域较大的岛屿——大安的列斯群岛，仍有数百座较小的岛屿属无主之地，其中大部分位于大西洋的边缘。这些小岛引来了英国、法国和荷兰船长的关注，他们发现可以将那里作为基地，捕猎从新西班牙回国的伊比利亚船只，或是和需要其物资的西班牙殖民者进行非法贸易。委内瑞拉沿海一带也有欧洲定居点，那里的居民需要盐来腌制保存肉类。个人行动起了头之后，以英国王室特许状和荷属西印度公司为形式的政府行为也在 17 世纪紧随其后。

648 此时，为了在新大陆寻找适合建立当时所谓“种植园”(即殖民定居点)的地点，英国已花去数十年的时间。他们首先在北美大陆进行了尝试。到 17 世纪 20 年代，他们成功建立起最早的两个西印度群岛殖民地，分别位于巴巴多斯和背风群岛(Leeward Isles)的圣克里斯托弗。两个殖民地都繁荣起来；到 1630 年，圣克里斯托弗已有大约 3 000 居民，巴巴多斯有 2 000 左右。这一成功的基础是烟草，连同梅毒(据说 1493 年已出现在欧洲的加的斯)和后来的廉价汽车，被一些人视为新大陆对旧世界暴行的报复。这些烟草殖民地迅速成为对英格兰举足轻重的存在，不仅因为其带来的关税收入，而且因为加勒比地区新的人口增长刺激了出口需求，为插足西班牙帝国的贸易提供了崭新的机会。法国人马上加入这份有利可图的行当，他们占据了向风群岛(Windward Isles)，而背风群岛的余下岛屿归英国人所有。17 世纪 40 年代，西印度群岛有大约 7 000 名法国人和 5 万多英国人。

此后，英国前往新大陆的移民潮有一部分流向北美，西印度群岛的白人定居数量将不复此前规模。甘蔗成为烟草之外的又一主要作物是

另一部分原因。少量种植烟草也可实现经济效益,因此适合在大量小片田地上分散种植、养活大规模的白人移民。甘蔗只有大规模种植才有经济效益,适合拥有大量劳力的大种植园,鉴于 16 世纪当地人口的减少,这些劳力很可能来自黑奴。荷兰人是这些奴隶的供应者,他们孜孜以求于在西半球实现和远东逐步取得的地位相类似的商业垄断,并在哈德孙河口建立新阿姆斯特丹作为基地。这是加勒比地区发生重大人口构成变化的开端。1643 年,巴巴多斯有 3.7 万名白人居民,非洲黑奴仅有 6 000;到 1660 年,后者的数量已超过 5 万。

随着甘蔗种植业的兴起,法国殖民地瓜德卢普(Guadeloupe)和马提尼克(Martinique)取得了之前所不具备的重要地位,也对奴隶产生需求。一段复杂的发展进程正在进行之中。加勒比地区对奴隶和欧洲进口商品的市场需求十分巨大且与日俱增,进一步扩大了西班牙人已经建立的市场规模,而西班牙帝国原本就越来越无力保护其经济垄断地位,这确定了下一个世纪西印度群岛在与列强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加勒比地区将长期陷于混乱和无序,各殖民地边境犬牙交错,治安糟糕,又不乏获取暴利的机会(某年,一名荷兰船长俘获一整支西班牙珍宝船队[*flota*],载有从印第安运往西班牙的一年份的财宝)。毫不令人吃惊的是,加勒比海域成为经典乃至传奇般的海盗狩猎场,17 世纪最后二三十年间是其鼎盛时期。列强逐渐争出个头绪,最终达成可以接受的协议,但这要耗费很长时间。在此期间的 18 世纪,西印度群岛和巴西为奴隶贸易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是该贸易得以持续的主要原因。随时间推移,该地还被纳入除欧洲、非洲和新西班牙以外的另一个经济体:一个全新的北美洲。

649

长期以来,不管标准的经典殖民理论怎么说,北美殖民地总是一片贫瘠之地,不如拉美或加勒比来得诱人。那里没有发现贵金属,虽然北部地区有毛皮,但除此之外,似乎没有什么欧洲人想要的物产。但由于西班牙垄断了南美,也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所以很多国家在北美进行了尝试。我们无需关注西班牙人在格兰德河以北地区的扩张,因为这仅仅是传教行为,完全算不上占领,西属佛罗里达则具有战略层面的重要

地位,因为该地俯瞰加勒比海北部出口,为西班牙与欧洲的交通提供了一定的保障。而其他欧洲人感兴趣的区域是大西洋沿岸的定居地。那里甚至短暂地存在过一个新瑞典,与新尼德兰、新英格兰和新法兰西毗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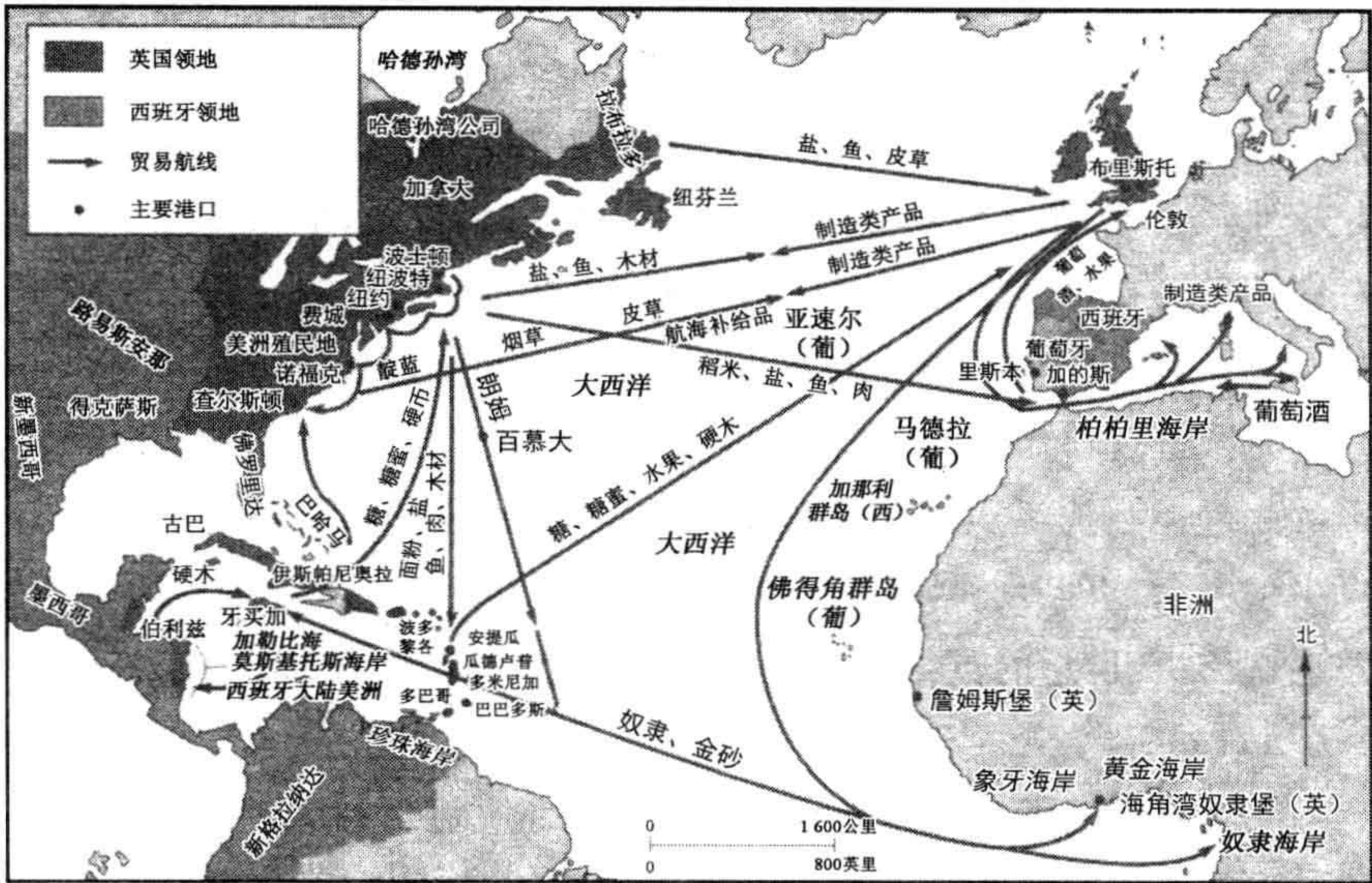
殖民北美的动机与其他殖民地区往往相同,但十字军式的、收复失地运动者所具有的那种传教狂热在接近北端的地区几乎完全绝迹。对北美潜在机遇的探索开展得最频繁的是英国人,16 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他们认为那里或许存在能够与西属印第安矿藏相匹敌的矿脉。其他人相信人口压力会带来移民需求,日积月累的知识揭示,这是一片地大物博、气候温和的大陆,而且与墨西哥不同,土著民数量极少。在北美西北部寻找前往亚洲的通道也始终令人神往。

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至 1600 年,大量探索工作出现,但只有一次(不成功的)殖民尝试,位于佛罗里达以北的弗吉尼亚州洛亚诺克(Roanoke)。英国人力量太弱,法国人太三心二意,都不足以获得更大的成果。17 世纪,英国崛起为强大的海上帝国,出现了一系列支持移民的政策变化,并以更大的精力、更好的组织和财力投入海外殖民事业,还发现了若干可能在北美大陆种植的主要作物。在两个世纪间的这段时期,这些事实为大西洋沿岸带来了革命性的转型。1600 年只有少数印第安人居住的荒凉之地在百年之后成为一处重要的文明中心。很多地区的殖民者向内陆推进极远,直到被阿利根尼(Allegheny)山脉阻挡为止。同时,法国人沿圣劳伦斯河流域和五大湖沿岸设起一连串交通站。大约 50 万白人在这片呈三角形的广阔殖民地上生活,以英国和法国裔为主。

650

西班牙宣称对北美全境拥有统治权,但英国人早就以“宣而不占,有名无实”的理由予以驳斥。伊丽莎白时代的冒险家对沿海一带进行了大量探索,并将北纬三度以北的所有领地命名为弗吉尼亚,以彰显女王的荣耀[①]。1606 年,詹姆斯一世向一家弗吉尼亚公司颁发建立殖民

① 伊丽莎白一世终身未嫁,故又称“贞洁女王”(The Vergin Queen)。——译者注



18 世纪 70 年代的英国大西洋贸易

地的特许状。这一开端只是形式上的;该公司开展的很多项目都没有利润,其业务状况很快使体制调整成为必需,但英国第一处美洲殖民地于 1607 年建立,并一直存续到现代,那就是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敦。虽然刚刚通过初期的考验,但到了 1620 年,“大饥荒”[①]早已成为往事,该镇开始走向繁荣。詹姆斯敦落成的次年,即 1608 年,法国探险家萨米埃尔·德尚普兰(Samuel de Champlain)在魁北克建立了一座小型要塞。法国殖民地在紧随其后的一段时期内岌岌可危,不得不由法国本土供应粮食,但这为加拿大殖民揭开了序幕。最后,到了 1609 年,荷兰派英国探险家亨利·哈德孙(Henry Hudson)出发找寻通往亚洲的东北航道。这一使命彻底失败后,他把航向掉转一百八十度,穿越大西洋去寻找西南方向的航路。他最终发现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河流,并以此迈出了荷兰争取北美统治权的第一步。不出数年,哈德孙河畔的曼哈顿和长岛都出现了荷兰人的定居点。 651

① 发生于 1609－1610 年间。——译者注

英国人从头至尾一直是北美殖民的领头羊。他们的成功缘于此前所不具备的两点事实。其一是技术,英国人是最早也最成功的倡导者,并用这些技术手段将一个个社群的男女老幼运往大洋彼岸。这些人建起农业殖民地,亲手开垦和耕作,很快实现自给自足,能够独立于母国存续。第二点是发现了后来成为主要作物的烟草,首先在弗吉尼亚种植,然后传播到1634年开始殖民的马里兰。更靠北的区域具备可以按欧洲方式进行耕作的土地,从而确保了殖民地的生存;虽然起初对该地区的兴趣源自皮毛贸易和捕鱼业的前景,但那里的谷物产量很快就有了少量富余,可以用作出口。这对土地稀缺的英国人很有吸引力,人们普遍认为17世纪的英国是人口过多的国家。17世纪30年代,有大约2万人前往“新英格兰”。

新英格兰殖民地与宗教异见群体和加尔文派新教活动的关联是其另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如果没有宗教改革,这些殖民地将会是另一番光景。虽然常见的经济动机也在殖民地起效,但17世纪30年代前往马萨诸塞州的移民由一批与英国新教中的清教团体有关的人士领导,他们创造了一个殖民地群落,其体制从神权寡头到民主不一而足。虽然有时由英国绅士领导,但北方殖民地的居民比南方更迅速地摆脱了英国社会和政治习俗,而这种变化发生的原因不仅是生存环境所迫,也包括他们的宗教小众立场。该世纪中期,当英国宪政陷入困局,新英格兰殖民地甚至有全体脱离王室控制的迹象,但这一状况没有发生。

尼德兰殖民地——即后来的纽约——被英国人吞并后,从佛罗里达北部至肯纳贝克(Kennebec)河一带的北美沿海地区在1700年共有12个殖民地(第13个殖民地出现于1732年,即佐治亚),生活着大约40万白人,黑奴的数量是其十分之一。稍北处是归属权依然未决的领土,更北部则是无可争议的法国领地。那里的殖民者分布比英格兰殖民地更为稀疏。北美的法国人或许共有1.5万,他们不能像英国殖民地那样享受大量移民所带来的好处。很多人是捕猎者、传教士和探险家,他们沿圣劳伦斯河一线落户,也在五大湖区域乃至更偏远的地区零星散布。新法兰西在地图上面积巨大,但在圣劳伦斯河流域和魁北克

652

以外只有零星的要塞和商栈,仅具战略及商业价值。居住密度也不是法国和英国殖民区域的惟一差别。新法兰西受到国内的严密监管;1663 年后,公司体制被王室直接控制所取代,加拿大由法国总督在王室监察官(*intendant*)的监督下进行统治,与法国本土省份非常类似。那里没有宗教自由;教会在加拿大一家独大,开展传教工作。其历史写满了关于勇气和殉教的光辉范例,也不乏坚贞不屈所换来的苦痛。殖民区域的农田被分割成条地(*seigneuries*),①这一体系对分散下放行政权责具有一定价值。因此,该地社会形态与旧大陆的相似性远超过英国殖民地,王室甚至还设了一名带加拿大头衔的贵族。

英国殖民地非常多样化。这些殖民地的散布区域几乎覆盖整个大西洋沿岸,气候、经济和水土环境包罗万象。它们的起源折射了类别广泛的动机,建立方式也大相径庭。1688 年后,数量可观的苏格兰、爱尔兰、德意志、瑞士和胡格诺派移民开始抵达,很快造成一定程度的族裔混合性,但很长时期内,英语的主导地位和非英语移民相对稀少的数量还将维持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压倒性优势。英属殖民地不乏宗教多样性,而且到 1700 年已具备相当有效的宗教容忍措施,若干殖民地与特殊宗教派别往来甚密的现实也无法改变这一点。这一切都增加了各殖民地彼此视同已出的难度。英格兰在美洲没有中心;王室和母国是殖民者生活的共同焦点,因为他们的文化背景依然是英国式的。尽管如此,英属北美殖民地显然为个人提供了出人头地的机遇,而这在规范更严格、监控更紧密的加拿大社会或欧洲故土都不具备。

到 1700 年,部分殖民地已经表现出一种趋势:不会放过任何脱离王室控制、获得自由的机会。独立精神在后世所盛行的传统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因此,回顾久远的历史、寻找这份精神存在的证明难免使人心动。事实上,以这种眼光来看待美国建国以前的历史将是一种谬误。直到 18 世纪末,1620 年登陆科德角的“朝圣者之父”才重新被人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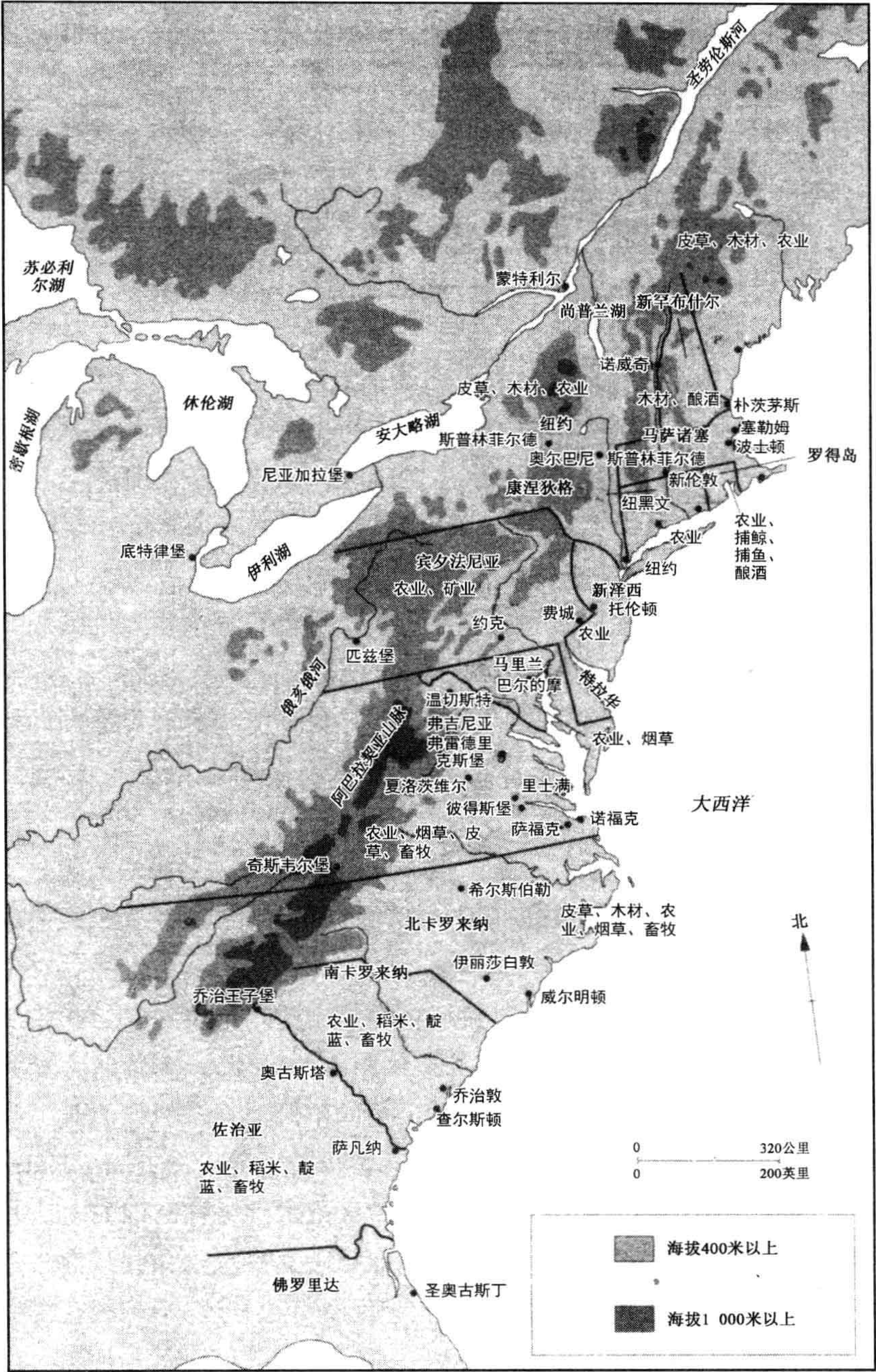
① 沿圣劳伦斯河流域的土地被划分成条块,属于法国国王,由条地主(seigneur)管理。——译者注

提及,或在国民神话中占据突出的位置。但他们确实想要创造一个新英格兰。早在独立理念出现以前许久,就可以看到一些醒目的事实,有助于更好理解独立和统一这些未来的概念。其一是代表制传统在殖民之初的第一个世纪间得到缓慢强化。无论起初彼此间的差异有多大,18 世纪早期的每片殖民地都通过某种形式的代议制团体开展工作,这些团体与伦敦任命的王室官员沟通,是当地居民的代言人。早期的一些殖民地需要为抵抗印第安人彼此协作,对法战争使合作变得更为重要。为对抗英国殖民者,法国人与休伦人(Huron)结盟,这有助于各独立殖民地感受到共同利益的存在(也促使英国人将休伦人的世仇易洛魁人[Iroquois]拉到自己的一边)。经济的多样性也催生出一种使各殖民地经济彼此相连的手段。中部和南部殖民地出产稻米、烟草、靛蓝和木材等种植园作物,新英格兰建造船只,提炼、蒸馏糖浆和谷类烈酒,种植玉米和捕鱼。有一种感受与日俱增,其逻辑性也显而易见:如果是为自身而非母国的利益,美洲人或许可以把当地事业——包括西印度的殖民地经营得更好。经济增长也改变了人们的态度。就整体而言,大陆北部的新英格兰殖民地受母国轻视乃至厌恶。该地参与造船业竞争,也从事非法的加勒比海贸易;与种植型殖民地不同,该地没有任何母国所需的物产。此外,该地还遍布宗教异见分子。

653

18 世纪,英属美洲地区的财富和文明程度都取得极大发展。总殖民人口持续增长,在该世纪刚过半时已远超 100 万。18 世纪 60 年代,有人指出,大陆殖民地对大不列颠的价值将远远超过往日的西印度群岛。到 1763 年,费城的时尚和文明程度已经可以和很多欧洲城市媲美。一份巨大的不确定性也在 1763 年烟消云散,因为加拿大已被征服,同年的一份和平协议确保了那片地区继续归英国所有。这改变了很多美洲人对两个问题的看法,一是帝国政府给予的保护究竟有多少价值,二是要不要进一步向西部扩张。占满沿海平原后,农业殖民者向西推进,翻过山脉的屏障,到达另一侧的河流流域,最终来到俄亥俄和大西北。与法国人发生冲突的危险就此解除,但 1763 年以后的英国政府在处理这一动向时还要考虑其他方面的问题。印第安人的权利和可

654



18世纪英属美洲殖民地的经济资源

能作出的反应不能忽视,与他们发生冲突将招致危险,但若要止住殖民者的脚步、避免印第安战争,就必须由英国军队对边境进行管治。结果,伦敦政府决定实施一条限制扩张的西部土地政策,并从殖民地征税作为防卫武装的军费,约束商业体系,打消人们向外开拓业务的念头。不幸的是,在殖民地政策制定者依然不加怀疑地认同关于殖民地经济依附的过时理论、接受殖民地与母国关系的陈旧观念的最后一段年月中,这一切都将造成麻烦。

655

至此,欧洲定居新大陆已有大约两个半世纪的历史。在美洲的扩张已经给欧洲历史带来了巨大的总体效应,但要评估这份影响力则远远称不上简单。显然,所有殖民国家到18世纪最终都从殖民地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但方式各不相同。流入西班牙的银块最显而易见,也当然对欧洲乃至亚洲的整体经济有所影响。殖民地人口的增长也有助于刺激欧洲出口和制造业。在这一方面,英国殖民地的重要性最为突出,预示了来自欧洲的移民潮日渐扩大的趋势,这一趋势最终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大移民中达到高潮。殖民扩张也必须和欧洲船运和造船业的巨大发展联系起来看待。无论是从事奴隶交易、走私、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合法进出口贸易、捕鱼或为新的消费市场供货,造船业者、船东和船长都从中获利。这产生了日积月累、无法估量的效果。因此很难计算出帝国主义初期阶段占领美洲殖民地对帝国主义列强造成的总体效应。

从长远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更确信地指出这一事实在文化和政治上的重要意义:西半球将属于欧洲文化圈。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英国人固然差异很大,但依然是同一种文明的不同演绎。他们的身上都具备某些欧洲文明的精华。政治上,这意味着覆盖从火地岛(Tierra del Fuego)到哈德孙湾的巨大幅员的两片大陆最终将按欧洲的立法和行政原则加以组织,即便脱离殖民国家取得独立后也是如此。整个半球将归入基督教;虽然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最终也会出现,但只能获得少数信众,无法成为基督教文化的对手。

656

在这些概述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北美和南美洲差异的持续扩大具

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诚然,从文化角度讲,北美土著民族为人类创造的成就不如中南美洲文明那般突出。但殖民主义也是一种能够改变现状的客观因素,回顾古代的同类范例进行类比并非是不切实际的联想。古希腊人的祖先所建立的城邦殖民地是基本独立的社群,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英国的北美沿海殖民地。一旦建立,发展出自我归属意识是合乎必然的演化趋势。西班牙帝国则展示了一种规范化的中央和帝国体制模式,就如罗马帝国的行省制度。要经过一段时间,人们才会意识到,已经赋予英属北美地区的基本演化模式将形成未来世界霸权的核心。因此,事实将证明,这一演化决定了世界以及美国历史的走向。在北美洲未来的主线得以确定之前,两大转型因素还将继续发挥作用:涌入大陆北部的西进浪潮所面临的环境差异,以及规模大得多的非盎格鲁-撒克逊移民潮。这些移民势力涌入后,英国后代所确立的社会模式渐成孤岛,但将在未来的美国社会中留下印记,就如拜占庭在俄罗斯所留下的遗产。国家和民族不会摆脱起源,只会学着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有时,旁观者看得最清。一名德国政治家在 19 世纪末将至时评价道,大不列颠和美国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事实在国际事务中意义最为重大。

五、世界史新篇章

657 1776年，美洲开始出现第一波殖民地暴动，并一直延续了数十年。除了为美洲大陆的历史开创了一段新纪元之外，这些动乱还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便于将欧洲霸权的第一阶段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世界其他地区也出现了历史节奏开始发生某种变化的标志，例如法国人不再对印度的英国人构成严重威胁，以及澳洲这片最后被发现的宜居型大陆开始接纳殖民者。18世纪末蔓延着一份新旧时代交替的沧桑感；若要评价之前三个世纪对全球历史带来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

三百年来，赤裸裸的征服和占领是欧洲霸权的主要形态。凭借征服所得财富，欧洲可以进一步扩大对其他文明的优势，他们还设立政治体制，以其他方式传播欧洲的影响力。完成这些工作的是寥寥几个欧洲国家，也是第一批地理势力范围覆盖全世界的强国——即便实力还够不上世界强国的标准：大发现时代为大西洋国家带来了与其他欧洲国家截然不同的机遇和历史使命。

首先抓住机遇的是16世纪仅有的殖民大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当终结七年战争的巴黎和约于1763年签署时，两国早已告别鼎盛时代。把该条约看作新世界秩序的奠基石只是为方便起见，西班牙和葡萄牙所主导的世界格局此前早已被颠覆。该条约还见证了大不列颠在海外

事务中对法国人的胜利，英国人为这场胜利投入了将近八十年的心力。对决还没有结束，法国人依然有收复失地的希望，但大不列颠还是将成为未来的强大帝国。这两个国家已经使荷兰相形见绌，后者的帝国与英法一样建立于17世纪，即葡萄牙和西班牙势力衰落的时代。但西班牙、葡萄牙和联合行省王国都依然握有重要的殖民领地，也在世界地图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658

到18世纪，由于其海洋史，这五国都与中欧内陆国家和过去如此重要的地中海国家形成了差异。由于殖民地和海外贸易的特殊利益，五国外交官有了新的竞争理由和舞台。大部分其他国家都更晚才认识到欧洲以外的事务有多么重要，而且就连五国中的某几国也有些后知后觉。西班牙一直征战不休(首先为哈布斯堡王朝争夺意大利，然后对抗奥斯曼人，最后是决定欧洲霸权的三十年战争)，浪费了从西印度群岛取得的财富。在同英国的漫长对决中，法国人总是比对手更容易分心他顾、把资源转移到欧陆事务上去。毕竟，外交界起初几乎没人意识到，欧洲内外事务在本质上也许密不可分。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达成彼此满意的利益划分方案时，其他欧洲国家对此漠不关心。佛罗里达的法国胡格诺派殖民地的命运，或是像洛亚诺克的英国殖民者那样对西班牙毫无根据的领土主张不当回事的行为，都不会让欧洲外交官操心，更不可能影响他们的谈判。当英国海盗和冒险家在伊丽莎白一世的支持下对西班牙殖民地和舰队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这一状况开始改变。荷兰人很快加入他们的行列，此后一个世纪的一份重大外交话题从此刻开始浮出水面；如一名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官大臣所写，“贸易是欧洲各国争斗的永恒主题，无论在战时还是和平年代”。以上就是两百年来所发生的变化。

当然，统治者总是关心财富和增加财富的机会。威尼斯曾长期通过外交手段保护商业利益，英国人经常用条约来保障对佛兰德斯的纺织出口。,各国曾普遍认为，贸易周转利润存在限度，因此一国的收益必然以其他国家的损失为前提。把欧洲以外地区的财富追逐列入外交必须考虑范围的年代还要很久以后才到来，甚至还出现过将两者彼此分

离的尝试;1559 年,法国和西班牙同意,双方船长在“界外”(当时指亚速海以西、北回归线以南)对另一国船只的所作所为不能成为这两个欧洲国家相互敌视的理由。[①]

659 外交模式的彻底翻新——倘若可以如此表述——始于同西班牙帝国展开的贸易冲突。当时的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殖民地关系中,母国的利益始终是至高无上的。只要那些利益属于经济范畴,殖民地就会被要求尽可能实现自给自足,并为母国提供净利润——无论是通过开发矿产和自然资源,还是通过相对母国的贸易逆差,同时,其贸易基地可供母国主宰特定区域的国际事务。到 1600 年,国家势力范围取决于海上力量的现实已显而易见,由于无敌舰队的溃灭,西班牙海军不再享有过去令人敬畏的地位。本质上,腓力陷于两难的处境:其力量无法兼顾欧洲和西印度群岛的利益,在欧洲对抗瓦卢瓦王朝和伊丽莎白、镇压尼德兰起义、开展反宗教改革运动都需要投入资源,而西印度群岛的安全离不开海上力量,也离不开可满足殖民者需求的有效供给。他选择继续维持帝国的存续,但要利用殖民所得推行欧洲政策,这低估了在 16 世纪的官僚和通讯体系下控制如此庞大的帝国所要面临的难度。不管怎么样,为独占西印度群岛的财富,西班牙建立起一个巨大而复杂的体系,包括设立定期船队制度、将殖民地贸易集中到若干授权港口、由海岸卫戍舰队保障治安等措施。

首先挑明立场、为争得一份好处不惜一战的是荷兰人,于是,外交官们首次被迫关注欧洲以外事务,也不得不拿出手段来平息事端。对荷兰人来说,贸易主导权是最优先的目标。至于实现该目标的方法,从 17 世纪初就可一目了然,在东印第安、加勒比和巴西这些世界主要甘蔗产区,尼德兰人投入大规模舰队,与西班牙和葡萄牙设下的防卫力量开战。他们在巴西遭遇了惟一的严重失败,1654 年,葡萄牙人逐走荷兰驻军,恢复对该地的控制,也没有受到进一步的挑战。

寻求商业财富与 17 世纪英国政府的新教立场充满矛盾;上个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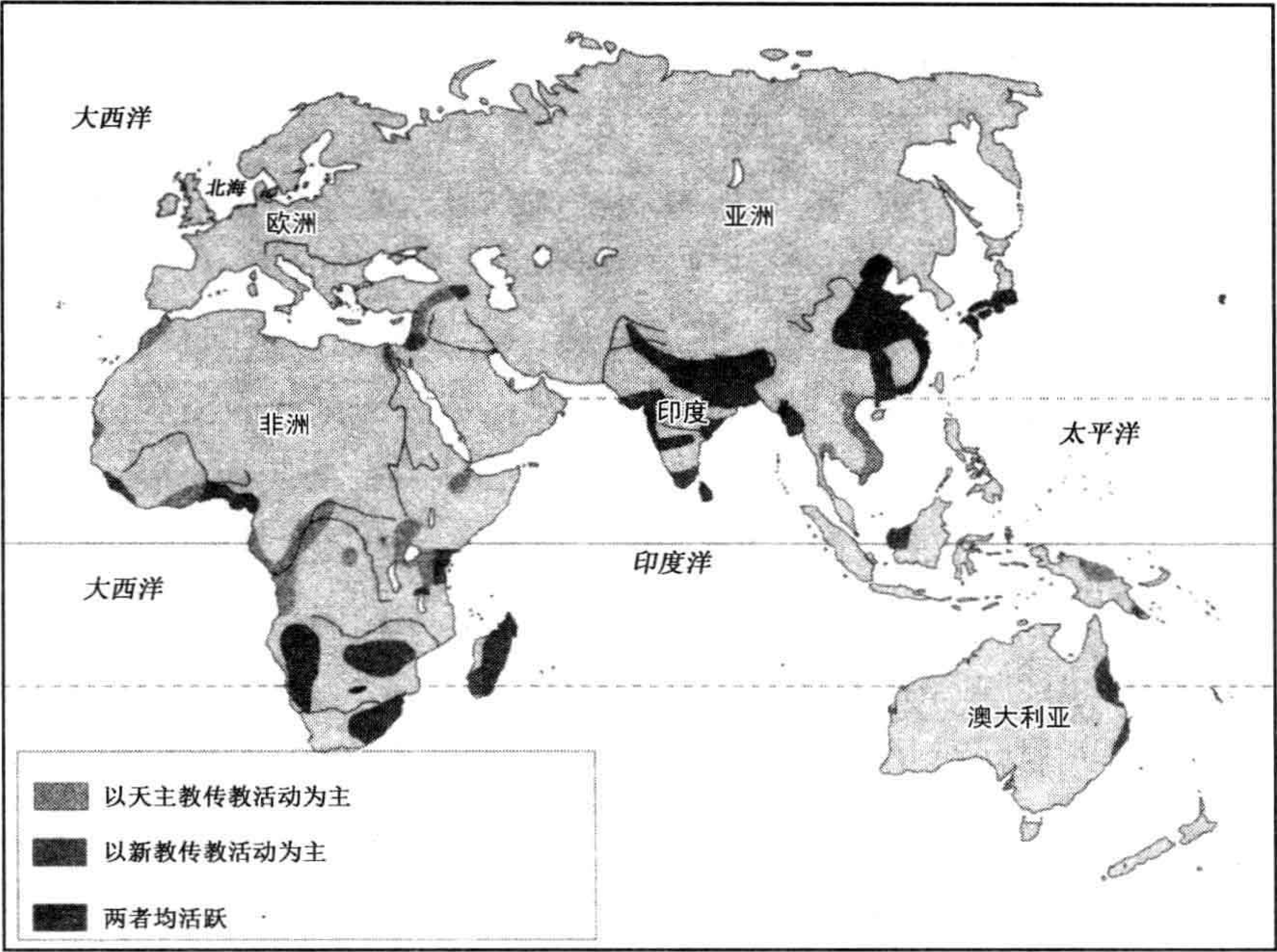
① 即《卡托-康布雷齐条约》。——译者注

纪,英国曾是荷兰反叛者的盟友,对克伦威尔来说,能领导一个对抗天主教西班牙的新教联盟是再好不过。可事实上,他却不得不经历最初的三场英荷战争。第一场(1652－1654)是不折不扣的贸易战争。其导火索是英国的一项决定[①],规定进口该国的商品只能由英国船只或商品生产国的船只运输。该决定的意图非常明显,希望促进英国船运业的发展、缩短乃至消除和荷兰的差距。这损害了荷兰的核心利益:欧洲船运贸易,尤其是波罗的海船运贸易。英联邦依靠一支优秀的海军赢得了战争。第二回合始于1665年,英国人夺占新阿姆斯特丹的行为又一次触怒了荷兰人。这场战争中,荷兰人有法国和丹麦人助阵,也有当时最强大的海上力量。因此,他们得以在和约中迫使英国人放松进口限制,但也将新阿姆斯特丹让给英国人,以此换取从巴巴多斯扩张后占领的苏里南。使这一切成为白纸黑字的是《布列达条约》(1667年),也是第一份涉及欧洲以外事务的程度不亚于欧洲本身的欧洲多边和约。根据该条约,法国向英格兰割让了西印度群岛,作为交换,无人居住、条件恶劣但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阿卡迪亚(Acadia)被承认为法国领地。英国人所获颇丰;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得牙买加使其成为英联邦的传统成员国之后,又在加勒比地区有了新的进项。这是英格兰首次凭借征服手段在大洋彼岸有所斩获。 660

克伦威尔的政策被视为英国有意识地走向帝国主义道路的决定性转折点。这种观点也许过多地将历史的走向归于他个人的远见。复辟后的斯图亚特王朝倒也大体上保留了保护船运和殖民贸易的"航运"体系,牢牢占据牙买加,也没有忽略西印度群岛新体现出的重要价值。查理二世向一家以哈德孙湾命名的新公司颁发特许状,与法国人争夺北部和西部地区的皮毛贸易。他和他的继任者詹姆斯二世至少保住了英国的海上实力(虽然不无退化),使英国海军成为奥兰治的威廉与路易十四开战时可以倚仗的力量。而詹姆斯二世在其他方面则达不到国王的标准。

---

① 1651年10月通过的《航海法案》。——译者注



19 世纪基督教在亚非的传教活动

661 详细记述下个世纪的种种变化将显得冗长无趣，期间，英格兰和大英帝国新的外交侧重点先后明朗化。为时不长的第三次英荷战争(没有任何实质性的重要后果)并不真正属于这一时期，英格兰和法国的漫长斗争才是该时代的主旋律。奥格斯堡联盟战争(在美洲称作威廉王战争)在殖民地也打得如火如荼，但没有使殖民地发生太大的变化。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则大不相同，这是近代史上的第一场世界大战，关乎西班牙帝国的命运和法兰西的地位。战争结束时，英国不仅赢得阿卡迪亚(也就赢得了新斯科舍[Nova Scotia]①)和其他取自法国人之手的西半球领地，而且还获得向西班牙殖民地供应奴隶和每年载一船商品前去交易的权利。

此后，海外事务在大英帝国对外政策中的权重越来越大。尽管

① 北美洲东部沿海的加拿大省份。——译者注

1714年发生王朝更迭，汉诺威选侯[1]成为大不列颠的首任国王，但欧洲问题的受重视程度还是降低了。英国人始终坚持这一政策，尽管也有为难的时刻，但最终都会重新回到促进、维持和扩张英国贸易的轨道上来。维系普遍和平往往是实现这一目标最好的方式，有时通过外交施压（例如哈布斯堡王室曾被说服，放弃了让奥斯坦德公司参与亚洲贸易的计划）、有时通过争夺并维持特权或战略优势实现。

战争的重要性变得越来越明显。有史以来第一场交战双方为欧洲国家却又完全与欧洲本土事务无关的战争始于1739年，当时，英国政府开始与西班牙交恶，争端的根本焦点是西班牙人在加勒比地区的搜查权——或按西班牙人的说法，是他们为保障帝国利益、防止英国人滥用1713年获得的贸易特权所采取的适当措施。这就是史书中记载的“詹金斯之耳战争”——耳朵的主人在下院中展示了腌制的器官，怀有敏感的爱国之心的议员们听了他的一面之词，相信西班牙海岸守卫队就是割耳的元凶，顿时义愤填膺。冲突爆发后不久，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也来火上浇油，于是演变为一场英法之间的对抗。1748年的和约并没有令交战双方各自的领土范围发生太多变化，也没有终结北美的纷争，法国似乎将靠一连串北美要塞令英国殖民者永远无法踏足美洲西部。为应对这一危机，英国政府首次派遣常备军踏足美洲，但并不成功；直到七年战争时期，一名英国大臣才意识到，给这场漫长的对决画下终止符的机会是存在的，因为法国不能抛弃欧洲盟友奥地利。按这一方针调整资源分配后，英国立即在北美和印度连连告捷，加勒比地区的胜利也接踵而至，其中不乏西班牙人所吞下的苦酒。一支英国武装甚至夺取了菲律宾。这是一场波及全球的战争。

662

1763年的和约对法国和西班牙的限制事实上没有达到英国人所希望的程度，但切实消除了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竞争行为。要从加拿大和瓜德罗普——一座出产甘蔗的岛屿——中二选其一时，一份支持保留加拿大的观点认为，已经服膺于大不列颠旗帜下的加勒比种植业

① 格奥尔格·路德维希一世。——译者注

者会害怕帝国内部甘蔗生产的竞争加剧。结果就形成了新不列颠帝国的巨大版图。到 1763 年,整个北美东部和往西延伸至密西西比河口的湾岸地带都属于英国。法属加拿大不复存在,法国人的威胁也烟消云散——从法国人的角度来看,烟消云散的是法国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建立帝国的希望,这份由伟大的 17 世纪法国探险家所打造的基业覆盖着从圣劳伦斯河到新奥尔良的区域。海岸以外的巴哈马是一条岛链的最北端,该岛链贯通小安的列斯群岛,往东南方向一直延伸到多巴哥,几乎将加勒比海完全围绕。岛链内的牙买加、洪都拉斯和伯利兹(Belize)都属于英国。1713 年的和约中,英国人迫使西班牙给予其帝国境内的有限奴隶贸易权,并立刻得寸进尺、越界千里。英国的非洲贸易站位于黄金海岸,数量寥寥无几,但为巨额非洲奴隶贸易提供了基地。在亚洲,对孟加拉的直接管理将为英国在印度的领土扩张阶段拉开序幕。

英帝国的霸权以海上实力为基础。其真正的起源可追溯到亨利八世所造船只,属于当时吨位最大的一类(例如配有 186 门火炮的"亨利蒙主恩典"号[*Harry Grâce à Dieu*]),但起步虽早,却没有延续下去,直到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期才恢复发展。虽然王室或商业投资者提供的资金寥寥无几,但她麾下的船长们还是依靠对西班牙作战所取得的利润延续了海上作战传统、升级了船只。到斯图亚特王朝早期,海军获得的关注和投入再一次缩减。皇家行政机关无法负担造船成本(事实上,出钱造新船就是能让皇家税务议会怒不可遏的原因之一)。讽刺的是,直到英联邦时期,对海上力量的持续和大力关注才真正开始,这份关注将成为皇家海军未来得以存续的保障。当时,荷兰商业船运的优势和强大的海军实力之间的关联已经深入人心,结果导致英国《航海法案》的出炉,引发第一次英荷战争。强大的海运行业是水兵的摇篮,也能带来贸易和相应的关税收入,为正规战舰的保养提供资金。而海运业的发展只能依赖于为其他国家运送商品,因此,海运竞争十分重要,必要时可以动用武力;打入那些不容外人染指的区域也很重要——例如西班牙美洲贸易。

从 15 至 19 世纪,这场竞争所使用的战斗机器不断得到改良和专

门化,但没有革命性的改变。一旦横帆和侧舷射击战术被采纳,船只的基本外形就确定了下来,不过个别设计依然能大大提升航海性能,在18世纪的英法对决中,法国人造出的船往往比英国人更胜一筹。16世纪,在英国人的影响下,船只的长度和宽度都与日俱增。与此同时,船首楼和船尾楼相对甲板的高度也一直在逐渐减少。早在17世纪早期,青铜炮铸造技术就已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因此火炮的变化主要来自设计、准度和注射量的改良。18世纪有两项重要的创新,一是铁铸短程大口径重型臼炮,就连小船的火力也因此大大提升;二是装有燧石发火装置的射击构件,使更精确的火炮控制成为可能。

17世纪中期,战舰和商船的功能和设计彼此区别化的方针得以采纳,但由于老旧船型和私掠船的存在,其界限还不是很分明。私掠船是构筑海上力量的廉价方案。战时,政府授权私掠船长或其雇主打劫敌方船只,从中牟利。这是一种正规化的海盗行为,英国、荷兰和法国私掠船在各个时期都展开行动,对别国贸易造成极为成功的打击。第一场大规模私掠战争是法国国王威廉对英国和荷兰发起的,但结果并不成功。

17世纪的其他航海创新属于战术和行政范畴。旗语信号逐渐正式化,第一本战斗指导手册向皇家海军发放。征募工作的重要性开始凸显;英格兰还出现强征行为(法国人在从事航海业的省份为海军征兵)。大型舰队以这种方式获得了人力,而且,考虑到各方不相上下的技术和有限的杀伤力——哪怕重炮也强不到哪去——战争的胜败很可能最终取决于人数。 664

17世纪的初期发展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一名海上霸主在这一阶段崛起并维持了两百多年的统治,在世界范围缔造了不列颠统治下的和平。荷兰共和国要在陆地上抵御法国人、捍卫其自由,所以海上竞争力逐渐丧失。英国的海上强敌是法国,不难看出,国王威廉的统治期结束时,法国已经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当时,法国在陆地和海洋的两难抉择中作出决定,打算将帝国事业的重心放到陆上。从那以后,虽然法国造船业者和船长们依然能凭借技术和勇气赢得胜利,但法国海军

再无笑傲天下之日。英国人则更加专心地经营海上力量;他们只需让欧陆盟友维持战力,而无需自己供养大批军队。但除了单纯的资源集中度以外,两国还有些许其他的差异。英国海上战略的进化方式与其他海上强国截然不同。说到这一点,路易十四对法国海军失去兴趣一事与此不无关联,因为英国人在 1692 年令法国海军蒙受惨败,从而使法国海军将领失宠。历史上有许许多多场胜利表明,海上实力最终的意义在于掌握制海权,供友军船只安全通行并阻止敌方船只通行。而英国人在 1692 年的胜利是最早的一次。达到这一期望目标的关键在于消灭敌方舰队。只要敌舰队不除,危险就始终存在。因此,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英国海军将领的最高目标就是尽早与敌舰队决战并取胜,这一战略给皇家海军带来几乎毫无间断的制海权和勇往直前的攻势传统。

海军战略对帝国大业同时起到直接和间接的促进作用,因为这份战略需要不断获取更多的基地,作为舰队活动的依托。这一点对大英帝国的构建尤其重要。18 世纪后期,该帝国还将失去大片定居领地,这进一步阐明了欧洲霸权的性质所在,直到 1800 年,除新大陆以外,这份霸权依然依托于商栈、岛屿种植园和基地,依然取决于对贸易的控制而非对广大区域的占领。

通过不到三百年的时间,即便是这种有限的帝国主义形式也使世界经济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1500 年前,世界上有数百个一定程度上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其中部分存在贸易往来。欧洲对美洲和非洲几乎一无所知,更是完全不知道澳洲的存在,与其广阔的面积相比,这三个大洲与欧洲的联系少得可怜,只有少量从亚洲到欧洲的奢侈品贸易。到 1800 年,一张遍及全球的交换网络已经成型。就连日本也是其中的一员,虽然非洲中部依然是神秘的未知地区,但也通过奴隶贸易和阿拉伯人与整个体系连为一体。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首先预兆了该体系的出现,一是部分亚欧贸易转走葡萄牙所控制的海路,二是美洲向欧洲输入了大量贵金属。没有这些以银块为主的货币供应就不可能有什么亚欧贸易,因为欧洲人几乎不能生产任何亚洲需要的商品。这也许是来

665

自美洲的贵金属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其输出量在 16 世纪末和下一世纪初达到顶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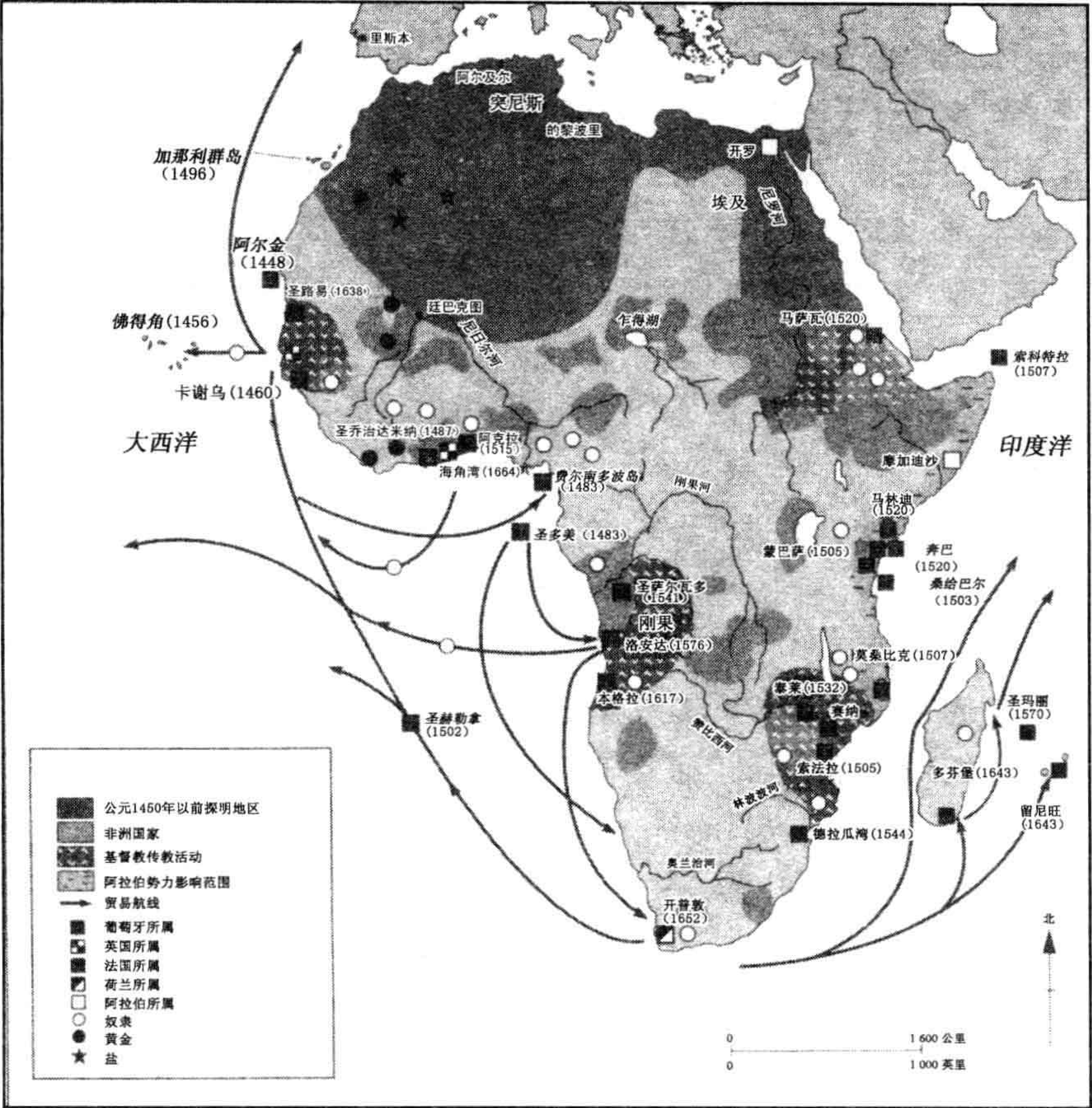
虽然新获得的贵金属来源是欧洲与亚洲和美洲建立往来所取得的最早也最夸张的经济效果，但其重要性不如贸易的总体增长，其中包括来自非洲、供应加勒比及巴西地区的奴隶贸易。奴隶船通常会载着美洲殖民地出产的物资返回欧洲，而且这些物资对欧洲的必要性与日俱增。在欧洲，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先后超越了安特卫普作为国际港口的地位，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殖民地商品再出口贸易的巨额增长，此类商品都由荷兰和英国船只运输。以这些贸易为主干，各种衍生和次级贸易大量涌现，带来了进一步的专门化和市场细分。造船、纺织和随后出现的保险业等金融服务共同走向繁荣，在经济总量的巨额扩张中分享利润。18 世纪后半叶，东方贸易占荷兰对外贸易总量的四分之一，该世纪期间，从伦敦驶出的东印度公司船只数量翻了三倍。而且，这些船只的性能比过去更强，设计更好、载运量更大，所需人手也更少。

在这场欧洲与世界的新交互所导致的后果当中，物质层面的结果比某些其他层面要容易辨识得多。欧洲至今仍是世界上食谱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一状况始于近代早期。仅是烟草、咖啡、茶叶和蔗糖的出现就使他们的口味、习惯和生活起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铃薯比过去的作物能供养更多人口，后来改变了很多国家的生活方式。欧洲药典里也增添了大量新药，其中大部分来自亚洲。

666

除了这些物质层面的效果以外，其他效应很难分析。关于世界的新知与欧洲人的思想所发生的互动尤其难以明察。早在 16 世纪，有关东西方大发现与航海的书籍就大量涌现，这表明人们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作为一门科学，对东方世界的研究始于 17 世纪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说法，不过，直到该世纪末，欧洲人身上才开始体现出关于其他民族的人类学知识所带来的冲击。由于这一切发生在印刷时代，其传播效应就更为猛烈，也使我们难以评估这份对欧洲以外世界前所未有的兴趣究竟有多大。不过，到 18 世纪早期，有迹象表明知识界受到了意义重大的深层次冲击。没有基督教护持的野蛮人过着道德高尚的生活，

666



近代早期的非洲

这种田园般的光景令欧洲人深思;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667 Locke)用其他大陆的证据表明,人类没有任何上帝赐予的、先天的共同观念。尤其是对中国的理想化和带有感情色彩的描绘,为社会体制的相对性提供了思考的对象,同时,中国文学的传播(耶稣会的研究对此贡献良多)揭示了该文明的历史流程,其源头之久远,使得将圣经所描述的大洪水视为人类第二次开端的传统观点显得荒唐无稽。

随着其产品的不断普及,中国还在18世纪的欧洲引发了对东方式样的家具、瓷器和服饰的狂热。其影响力涉及艺术和知识界,因此总是

更为显眼,但意识到别处也有不同的文明、奉行不同的标准,这使欧洲人能用更深层次的视角来观察自身的生活状况。虽然此类对比可能含有一些令人惶恐的要素——表明与中国人对待其他宗教的态度相比,欧洲人或许该无地自容,但仍然有其他让欧洲人继续保持优越感的素材——例如西班牙征服者的英勇事迹。

世界对欧洲的冲击很难用几种简单的公式来概括,反之亦然,但欧洲人所带来的影响有时极为夸张和明显,至少某些表象是如此。一份令人惊诧的事实是,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非欧国家从欧洲扩张的第一阶段中获得实质性的好处;恰恰相反,很多国家遭受了可怕的磨难。但欧洲人并不应总是为此受谴责——除非欧洲人进入那些国家本身就应受谴责。在那个时代,除了最初步的了解以外,人们对传染病一无所知,无法预知从欧洲带到美洲的天花或其他疾病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但后果是灾难性的。据估算,16 世纪的墨西哥人口减少了四分之三,一些加勒比岛屿的居民彻底死绝。

而另一方面,对幸存者的残酷剥削则是另一回事——由于人口锐减,他们的劳力变得价值连城。臣服与统治的主旨几乎贯穿欧洲影响世界其余地区的所有早期实例。各殖民地环境和欧洲各国传统的差异使压迫和剥削的程度存在极少但微妙的不同。并非所有殖民社会都基于同样极端的残忍和恐怖,但都染上了些许残忍和恐怖的色彩。联合行省王国的财富及 17 世纪的璀璨文明从血腥的土壤里汲取养分,至少印尼和出产香料的岛屿是血淋淋的实例。早在北美殖民地扩张到阿利根尼山以西之前,弗吉尼亚首批英国殖民者和"红印第安人"短暂的友好关系就已经变味,种族灭绝和驱逐开始上演。虽然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住民得到政府某种程度的保护,免于在委托监护制下受到最可怕的虐待,但也基本上沦为劳工,而且其文化被蓄意灭绝(这是来自最高层的旨意)。南非霍屯都人(Hottentot)的命运、澳洲原住民(Aborigine)的命运,都一再重复了同一种教训:欧洲文明可以毁灭一切与之接触的对象,除非像印度和中国那样有古老和发达的文明守护。就连这两个伟大的国度也遭受极大伤害,而且也无法抵抗决意投入充

668

分武力的欧洲人。但殖民地最清晰地展现了欧洲统治的模式。

很多殖民地的繁荣长期依赖非洲奴隶贸易,前文已经提及这份行当对经济的重要意义。自 18 世纪起,批评家就对此难以释怀,他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最惨无人道的行径,无论是白人对黑人、欧洲人对非欧民族还是资本家对劳工。在关于欧洲扩张和美洲文明的历史学研究中,这一主题不失恰当地占据了主导地位,因为确实是两片大陆的首要事实。但较为不妥的是,由于奴隶制对新大陆的成型是如此重要,对此问题的关注使人们忽略了其他时期、其他形态的奴役行为——甚至忽略了奴隶会遭受的其他命运,例如有意或无意的、也会降临到其他民族头上的屠杀。

新大陆殖民地市场主宰了奴隶贸易的走向,直到 19 世纪该贸易被废除为止。奴隶商人最可靠的主顾依次位于加勒比岛屿、美洲大陆北部和南部。最初统治该贸易的葡萄牙人很快被先后到来的荷兰人和伊丽莎白一世的"海狗"[①]赶出加勒比地区,但葡萄牙船长在 16 世纪余下的时期转而向巴西输送奴隶。17 世纪早期,荷兰人成立西印度公司,以确保对西印度群岛的定期奴隶供应,但到 1700 年,法国和英国的奴隶贩子已在非洲"奴隶海岸"建起商栈,取代了他们的领头地位。这些国家总共将 900 万至 1 000 万黑奴运往西半球,其中八成贸易发生在 1700 年以后。奴隶贸易在 18 世纪达到鼎盛,期间有 600 万奴隶漂洋过海。布里斯托和南特等欧洲港口凭借奴隶贸易所获财富建立了一个新时代。由于黑奴贡献的劳力,新土地得以开垦。新作物的大规模种植又使欧洲的需求、制造和贸易模式发生重大改变。我们的生活中依然有奴隶贸易所留下的痕迹,种族分布也不例外。

669

而已经不留痕迹但永远无法估量的是人类在其中所遭受的苦难,不仅是身体上的摧残(哪怕一名黑人在骇人听闻的船运环境中幸免于难,他到西印度种植园后或许也只有几年可活),也包括这批数量惊人

① 受女王之命骚扰西班牙舰队、在新大陆获取立足点的船长,其中不乏大名鼎鼎的人物和臭名昭著的恶徒。——译者注

的移民在心理和情感方面所经历的无数悲剧。历史学者依然在争论，奴隶贸易是否“开化”了美洲的黑人、让他们无论情不情愿都必须与更发达的文明接触，或是否延缓了黑人文明的发展、使他们陷于半襁褓式的依附状态。奴隶制的残忍有多么无法估量，这一问题看起来就有多么无解；一方面，我们有脚镣和鞭刑台为证；另一方面，这些东西在欧洲人的生活中也很常见，而且按逻辑推论，种植园主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也会照管好自己的资产。奴隶起义表明事实并不总是如此。不过除巴西之外，起义并不多见，这一事实也值得加以思考。这场辩论的终点看起来遥遥无期。

对于非洲所遭受的、史料中几乎只字未提的损失，要估计出结果甚至更难，因为证据更依赖于推测。某些人试探性地提出，从美洲引入非洲的新食品也许能抵消人口显著下降的负面作用。可以想见，这类因欧洲人一心想要捕获奴隶所导致的接触而产生的副作用实际上会使人口增多，但这一假设的利好因素无法抵消外来疾病那同样不可估量的负面效力。

值得一提的是，长期以来，非洲奴隶贸易没有引发任何像西班牙教士保护美洲印第安人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疑虑，而且部分基督徒实际上还抵制对此贸易的任何限制，这份血腥的生意对欧洲人依然充满诱惑力。直到 18 世纪，以法国和英国为主，责任感和罪恶感才开始蔓延滋生。这份感受在英国人对 1787 年获得的属国塞拉利昂的使用方式中得到表现，博爱主义者使该国成为在英格兰获得自由的非洲奴隶的庇护所。在有利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双重作用下，人道主义思想所培育的公众情感将在下个世纪摧毁奴隶贸易，并在欧洲范围内消灭奴隶制度。但这是另一段历史要讲述的内容。在欧洲势力向世界蔓延的过程中，奴隶制是一份触目惊心的社会和经济现实，也将成为一段宏伟的传奇，以最苛烈无情的方式象征着暴力压倒一切的现实和人类的贪婪。悲哀的是，它不过是比较突出地体现了发达社会用武力统治弱小社会的普遍现实。

有些欧洲人意识到这一点，但依然相信他们给其余世界带去的东 670

西足以弥补一切罪恶,其中最具分量的就是基督教。召开特伦特大公会议的教皇保罗三世发布诏书宣称:“印第安人是真正的人……不仅能够理解天主教信仰,而且依我们所知,他们极其渴望接纳这份信仰。”此类乐观情绪仅仅反映了反宗教改革运动的精神,因为从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占领殖民地之初,天主教就不乏在那里传教的动力。耶稣会传教工作始于1542年的果阿,从那里辐射到整片印度洋和东南亚,甚至波及日本。和其他天主教国家一样,法国也重视传教工作,甚至在没有经济或政治参与的地区也同样热心。尽管已经不乏关注,在16和17世纪,人们又为传教事业投入了一份新的热情,并也许给反宗教改革运动增添了一定的活力。至少在形式上,罗马天主教在16世纪获得的信徒和领地比之前任何世纪都要多。要评价其真正的意义更为困难,但罗马天主教会为美洲土著提供了后者所仅有的一丁点保护,其神学主张维系着惟一的、针对早期帝国主义理论下的被臣服民族的托管理念,尽管这一理念有时显得弱不禁风。

新教对殖民地土著的关注远远滞后于天主教,其传教工作也一样。荷兰人几乎无所作为,英国的美洲殖民者不仅没有赢得信徒,而且还奴役了一部分邻近的美洲土著(值得称赞的是,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会教徒是个例外)。直到17世纪末,声势浩大的盎格鲁-撒克逊海外传教运动才现出端倪。不仅如此,即便是作为礼物送给世界的福音,到达受众手中时已存在悲剧性的歧义。而且,这份欧洲人输出的思想对传统体制和观念极具潜在侵蚀力、挑战性和破坏力,威胁了社会权威、律法、道德机制和家庭及婚姻模式。传教士经常身不由己地成为统治和臣服其他民族的工具,这一过程贯穿欧洲与世界其余地区往来的整段历史。

也许,欧洲人带给他们的一切最终都将成为威胁,或至少是一柄双刃剑。葡萄牙人16世纪从美洲带到非洲的粮食作物——木薯、红薯和玉米也许改善了非洲人的饮食,但有观点称,这也许同样造成了人口增长,进而导致社会动荡和骚乱。另一方面,落户美洲的种植园创造出新的产业,促成了对奴隶的需求;咖啡和甘蔗就是这类产品。更北部的英国殖民者种植小麦,因此不需要奴隶,但对土地的需求日益增加,这份

671

压力驱使他们闯入印第安人自古以来的狩猎地,并无情地将后者赶出家园。

这类鸠占鹊巢的行为将决定当时尚未出生的子孙后代的生活方式,若要了解其意义所在,比 1800 年的人更长远的视角会有所助益。毕竟,小麦最终使西半球成为欧洲城市的谷仓;在 20 世纪,就连俄罗斯和亚洲国家也要靠这些粮食过活。葡萄酒产业早在 16 世纪就被西班牙人引入马德拉群岛和美洲,至今繁荣依旧。香蕉、咖啡和茶叶分别在牙买加、爪哇和锡兰落户后,未来的政治格局就已大体确定。而且,这一切改变都发生在因需求多样化而充满复杂性的 19 世纪,工业化进程增加了对棉花等旧时主要作物的需求(英格兰在 1760 年进口了 250 万磅棉花,到 1837 年,这一数字增至 3.6 亿),还创造了一些新的需求;橡胶从南美成功引入马来西亚和印度支那也是这一局面所导致的结果,并对未来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欧洲霸权时代早期的这些状况对未来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将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得到充分的展现。在此,惟一的重点是指出该模式所具有的、往往反复出现的又一特征,即无计划性和随意性。这是很多个人决策的无序混合,而且决策者的数量相对极少。即便是最无心插柳的念头也会导致惊天动地的后果。值得一提的是,1859 年被带到澳大利亚的几十只兔子不出数十年的工夫就繁衍至数百万,使澳洲大片乡村沦为荒地。英国蟾蜍肆虐百慕大的事件与此类似,但规模较小。

但有意识的动物引进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对澳洲兔灾最早的应对措施是引入英国短尾鼬和黄鼠狼;而更好的手段还要等到兔瘟的发现)。到 1800 年,几乎所有欧洲家畜都已在美洲定居,其中最重要的是牛和马。在 1800 年前的这段时期,这些家畜使草原印第安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待冷藏运输船出现后,它们将使南美洲成为巨大的肉类出口基地,大洋洲同样在英国人引入绵羊后转变为肉类产地,而英国人引进绵羊的源头则是西班牙。而且,欧洲人当然还带去了人类的血统。就像美洲的英国人一样,荷兰人对种族通婚长期秉持保守的态度。但在拉美、果阿和葡萄牙控制的非洲地区,混血造成了深远的影

672

响。在英属北美,种族问题也以完全不同和相反的方式留下了深刻印记。由于通婚现象并不显著,有色人种几乎可以和法定仆从画上等号,这给未来留下了极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

大量殖民人口的出现形成了未来的版图,也给管理提出了难题。英国殖民地几乎一直具有某种形式的代议制机构,体现了议会制的传统和实践,而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沿袭纯粹的极权和君主政体。所有殖民地都没有期望任何形式的独立地位,也没有考虑任何保障其利益不受母国侵犯的需要,不管他们将母国的利益看得至高无上、还是将双方看作互惠互补的存在。麻烦将最终因此而起,到 1763 年,至少在英属北美殖民地,能让人回想起 17 世纪英格兰王室和议会之争的迹象开始出现。当殖民者与其他国家对立时,即便其政府没有向该国正式开战,他们也总是表现出对切身利益的积极关注。甚至当荷兰与英国正式联手对抗法国,两国的水手和商人依旧在“界外”(beyond the line)①争战不休。

不过,18 世纪帝国统治的问题主要出在西半球。那里是殖民者前往的目标。1800 年,在世界其余地区,贸易依然比占领更为重要,就连印度也是如此,很多重要区域依然没有完全受到欧洲的冲击。到 1789 年,当年驶向广州的东印度公司船只也只有 21 艘;荷兰人只被获准每年派两艘船前往日本。当时的中亚依然只能通过成吉思汗时代的长途陆路抵达,俄罗斯人对欧亚内陆施加的影响力依然远远称不上有效。非洲被气候和疾病阻隔。在能够称霸非洲以前,欧洲人还要进行不少探索和发现工作,才能绘制出这片大陆的完整地图。

在太平洋和“南洋”,历史进程则显得更为迅速。萨默塞特人(Somerset)丹皮尔(Dampier)在 1699 年的航海开启了未知大陆大洋洲融入已知世界版图的进程,但尚需一个世纪才最终完成。在北方,白令海峡于 1730 年被人发现。布甘维尔(Bougainville)和库克在 18 世纪

---

① 引自威廉姆森的名言“界外无和平”,这里的边界是指《卡托-康布雷齐条约》划出的休战区。——译者注

六七十年代所完成的航海将大溪地、萨摩亚、澳洲东部、夏威夷和新西兰加入世界地图，也终于使新大陆完整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库克甚至进入了南极圈。1788 年，共计 717 人的第一船流放犯在新南威尔士上岸。因为美洲殖民地已无法用来收容英国社会的弃子，英国法官便用这片新的放逐地作为补充，于是无意中创造了一个新的国家。数年后抵达该大陆的第一头羊甚至具有更重大的意义，牧羊产业随之形成，从而确保了该国的未来。随动物、冒险家和失意者一同来到南太平洋的还有福音。1797 年，首批传教士登上大溪地。伴随他们的脚步，或许可以认为，欧洲文明的惠赐（至少是萌芽形态）终于遍及世界所有可居住的地区。 673

六、新旧理念

674 欧洲向全球输出的文明以理念为本质。他们所施加的限制及带来的可能性界定了文明运作的手段、文明的样貌和看待自我的方式。不仅如此,虽然其他文明在 20 世纪受到极大破坏,但欧洲人从 1500 至 1800 年间显露端倪的领先理念依然为我们提供了大部分指明方向的路标。那一时期,欧洲文化打下了去宗教化的基础;也是在那一时期,欧洲人意识到历史发展是一段向上的、运动的进程,并觉得自己正位于其顶峰。最后,那一时期还产生了一份自信,即实用主义指导下的科学知识可以带来无限的进步可能。概言之,在具有思想的人看来,中世纪文明最终走到了终点。

由于历史进程很少显得清楚明了,所以鲜有欧洲人在 1800 年意识到这一变化。几个世纪以来,大部分人所理解和遵循的模式还是一如往昔。在那个年头,君主制、世袭制社会和宗教的传统机制依然控制着千百万人的生活。在 1800 年,世俗婚姻依然是欧洲极为罕见的现象,仅仅一百年前,更是哪里都找不到这样的例子。18 世纪 80 年代,最后一场针对异端的火刑在波兰上演,甚至在英格兰,一名 18 世纪君主还是像中世纪国王那样用触摸来治疗臣民的"国王之恶"。[①] 事实上,在

① 即淋巴结核。中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认为王室成员的触摸可以治疗这种病症。——译者注

某些方面,17 世纪甚至表现出倒退的迹象。欧洲和北美都兴起了猎巫热潮,其波及范围远远超过中世纪的任何一次(查理曼曾把给女巫上火刑的人处死,教会法禁止人们将夜晚幽灵和其他女巫的所谓鬼把戏当作一种异端信仰)。但迷信也没有就此终结。进入 18 世纪后许久,英国最后一名男巫被邻居一直骚扰到死,1782 年,一名瑞士新教徒因行巫术的罪名被同胞按法律程序处决。到法国大革命时代,那不勒斯的圣雅纳略(St. Januarius)崇拜依然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因为人们相信这位圣徒之血是否能顺利液化象征着神明对政府行为的喜怒之情。刑罚依然惨无人道;在人们看来,有些罪行实在穷凶极恶,理当遭受格外残暴的惩罚。刺杀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者和谋杀路易十五未遂的犯人都经历了令人发指的酷刑,弑父者也会得到同样的下场。行刺路易十五者在 1757 年死于酷刑,只比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监狱改革提案的发表早了几年。我们很容易被 18 世纪的近代文明之光所蒙蔽;在那些创造出精美艺术、塑造出骑士精神和荣誉感的杰出典范的社会,大众娱乐的焦点却是逗熊戏、斗鸡或拽鹅头。[①]

如果说流行文化往往最容易显露出往日气息、不足以为凭,那么这三个世纪临近尾声的时候,过去挑大梁的正式体制机构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也依然基本保持原样。以现代眼光来看,最惊人的例证是 18 世纪的宗教组织在几乎任何地区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每个国家,无论是天主教、新教还是正教,就连教会体制改革家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宗教应当得到法律及政府强制手段的支持和保护。只有极少数领先时代的思想家对此表示质疑。当时的欧洲依然几乎不存在容忍意见分歧的环境,只有各家教会的不同观念可以并存。法国国王的加冕宣誓会使他担负扫除异端的责任,直到 1787 年,非天主教法国人的民事身份才获得承认,从而具备了相应的合法婚姻权,可以让子女获得合法地位。在天主教国家,审查制度虽然经常远远算不上有效,但依然理论上

① 17 至 19 世纪在尼德兰、英国和北美流行的血腥娱乐,方式是将活鹅倒挂在横木上,游戏者骑马从下方全速通过,并尝试拽下鹅头。——译者注

担负着制止不利于基督教信仰和教会权威的异端邪说的责任,有时还努力付诸行动。尽管反宗教改革运动的精神已经消退,耶稣会也已解体,但禁书目录和最早编制该目录的异端裁判所依然存在。各处的大学都由教士掌管;哪怕在英格兰,牛津和剑桥的大门也对不信奉英国国教的异见者和罗马天主教徒紧闭。宗教还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学教学内容和追求的研究方向。

不过,社会体制结构也确实表现出新气象来临的征候。几个世纪以来,大学失去了过去的重要地位,其原因之一是它们不再垄断欧洲的知识文化圈。从 17 世纪中期以来,各种学院和学术团体在很多国家相继出现,往往得到最高层的扶持,例如 1662 年获得特许证的英国皇家学会,或是四年后成立的法国科学院。18 世纪,此类学会的数量大大增加,向规模较小的城镇渗透,而且有些新成立学会的目标更特殊、更有针对性,例如促进农业。一场大规模的、自发的社团化运动已经浮出水面;虽然在英格兰和法国最为明显,但几乎传遍了西欧所有的国家。过去的社会体制已不足以释放出那个时代全部的潜能,于是出现了堪称时代特征的、各形各色的俱乐部和学会,这些团体有时还引来政府的关注。一些团体没有将文学、科学或农业活动作为其标榜的追求,只是提供了一处聚会的场所,就一般观点进行探讨、争论或单纯的清谈,并以这种方式促进了新理念的传播。在此类协会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共济会这一遍及全球的结社组织。该组织源于英格兰,在 18 世纪 20 年代进入欧洲大陆,不到半个世纪就获得极大发展;到 1789 年,其会员可能已超过 25 万。他们后来遭到大量污蔑中伤,号称该组织长期从事革命和颠覆活动的传言不胫而走。虽然对一些会员个人也许不假,但这并不是该组织整体的真实写照。不过,不难相信的是,共济会社不仅和其他团体一样有助于新理念的传播和探讨,而且也有助于打破传统和习俗的坚冰。

676

当然,理念和信息传播速度加快的主要依靠并非这类聚会,而是印刷业对书籍的普及作用。识字率的提高是欧洲在 1500 年后经历的至关重要的转型;有人将之概括为一种文化从关注图像到关注文字的转

变。阅读和书写(尤其是前者)能力虽然没有完全普及,但至少被广泛掌握,在某些地区已经稀松平常。这些知识不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和秘密,也不再因与宗教仪式具有密切和特殊的关联而充满神秘气息。

在评估这一变化时,我们可以暂时离开无法考证的混沌领域,进入数据构成的定量世界,数据表明,虽然1800年依然存在大量文盲,但通过某种途径,欧洲当时已经是一个与1500年不同的、知书达理的社会。当然,这一陈述就本身而言并无太大帮助。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存在很大差别,不能一概而论。尽管如此,不管我们如何使用限定词,欧洲及其附属国在1800年可能拥有世界上大部分识字人口。因此,欧洲文明的识字比例比其他文明更高。这是一次决定性的历史变迁。当时,欧洲早已进入印刷普及的时代,印刷品最终取代口头表达和图像,成为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最重要的指导和说明手段,并延续到20世纪,直到广播、电影和电视让口语和视觉元素重占主导地位。

677

19世纪中期以前(当时,似乎有半数左右的欧洲人依然没有读写能力),可用来估算识字率的资料始终不够充分,但那些资料都表明,情况从1500年起一直在不断改善,只是分布不太平均。在不同国家、同一国的不同时期、不同的镇和区、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之间都存在重大的差异。这一切至今依然是现状的真实写照,只是差异程度更小,也极大简化了作出一般性陈述的难题:对不远的过去进行最含糊其辞的概括就是极限了。但具体的事实对体现趋势依然不无帮助。

有迹象表明,提高识字率的教育工作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就已展开。这些工作应属于12至13世纪间城市生活重现活力的又一组成部分,这一复兴的重要性前文已经提及。关于学校教员的委派和教学场所的提供,其最早的证据来自意大利城市,当时,那些城市是欧洲文明的先驱。那些地区很快形成一份新的认同,即具备文书能力是担当若干职务的必要资格。例如,当时存在法官必须具备阅读能力的任职条件,这份历史早期事实颇具引人入胜的弦外之音。

到17世纪,意大利城市的领先地位被英格兰和荷兰城市取代(两国都具有在当时而言颇高的城市化水平)。两者被视为1700年欧洲文

盲率最低的国家;领先地位的易手表明识字率提高的历史进程在地理分布上并不平均。但法语将成为18世纪出版业的国际通用语,维持该状况的公众基础也必然出现在法国。就算英格兰和荷兰的识字率更高也不会令人惊讶,但法国的总人口要大得多,因此识字人口的绝对数量很有可能更多。

印刷业的传播状况必然可以作为反映教育发展总体趋势的绝好标志。到17世纪,印刷业已真正实现大众化,体现为童话故事、具有真实蓝本的单恋爱情传说、年鉴、占星术书籍和圣徒传记。这些书籍的存在证明了需求的存在。印刷业也使得欧洲的读写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因为手抄本相对而言难以获取,要研读就必然耗时费力。以印刷本为载体,技术知识可以非常迅速地传播,专业人士可以从中获益,在相关领域与时俱进。

678

新教改革是另一股普及文化的推动力量。改革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教会信徒识字的重要性;到19世纪,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识字率比很多天主教国家要高,这并非偶然。宗教改革使阅读《圣经》具有了重要的意义,而且通俗版圣经也迅速普及,从而通过印刷技术加强和规范了神圣文本的传播和标准化。尽管充斥着显然不太美妙的表征,但书籍崇拜现象依然是推动启蒙运动的伟大力量;既提高了阅读的乐趣,也是知识分子活动的焦点所在。在英格兰和德意志,这一崇拜对缔造共同文化的重要性怎么说也不为过,并孕育出两份堪称杰作的《圣经》译本。

如宗教改革者的例证所示,权威往往乐于见到文化的普及,而且这一趋势不仅限于新教国家。18世纪新式君主制国家的立法者尤其突出,经常致力于推广教育——其中初级教育占了很大比重。奥地利和普鲁士在这方面是显著的范例。在大西洋彼岸,由于新教传统的存在,新英格兰殖民社区从成立之初就把提供教学条件视为一种责任。在其他国家(当然也包括英格兰),教育属于非正式和不规范的私人及慈善事业,或留给教会打理。教育事业受宗教法令特殊关照(例如法国)的伟大时代始于16世纪。

期刊的兴起与识字率提高互为因果。到 18 世纪,起初的印刷传单和偶尔发行的快报已经进化成为定期出版刊物,满足了多种多样的需求。报纸问世于 17 世纪的德意志,1702 年的伦敦出现了第一份日报,至该世纪中期,该国已有一家重要的地方媒体,每年付印的报纸达数百万份。英格兰的首批杂志和周刊出现于 18 世纪前半叶,其中最重要的是《旁观者》(*Spectator*),它通过有意识地打造品位和确立工作规范为新闻业树立典范,其中不乏一些新气象。只有联合行省王国的新闻业堪比英格兰;这可能是因为所有其他欧洲国家都设有效力不一而足的审查制度,文化普及水平也不一样。具备知识和文化水平的新闻业者队伍逐渐扩大,但政治报道和评论依然罕见。即便在 18 世纪的法国,著者们也通常只能用手稿来传播承载先进思想的作品;在这个堪称批判思想堡垒的国度,审查制度虽有些主观和无常,且到该世纪后期的运作效力也不如从前,但至少依然存在。

679

也许是逐渐意识到易于被大众获取的新闻媒体所具有的潜在颠覆力,官方对教育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教育和文化知识也许有危险的一面、不能过分普及的看法到 18 世纪成了非常普遍的认知。虽然正式审查制度的存在表明权威一直意识到文化知识的潜在威胁,但主要还是担心其宗教方面的颠覆性;异端裁判所的职责之一就是让禁书目录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以回顾历史的视角来看,比起宗教颠覆力而言,文化普及和印刷术更重大的效果在于给普遍意义上的批判和质疑权威的精神带来更大的机会。但这也不是两者惟一的重要之处,技术知识的传播还加速了其他类型的社会转变。如果没有识字率的提高,工业革命就不可能发生;17 世纪史称“科学革命”的历史进程也必须部分归功于更迅捷、更广泛的信息传播所带来的单纯的累积效应。

但这场“革命”的根本源头属于更深层次,来自知识界观念的转变。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是这场观念转变的核心。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单纯地带着赞叹和敬畏之情将自然界视为上帝神能的证明,开始迈出重大的一步,有意识地寻找操控自然的手段。尽管中世纪科学家的工作绝非人们一度普遍信之凿凿的那般原始和欠缺创造性,

但受制于两大关键局限。一是这些工作所形成的实用知识极少，从而难以获得关注；二是中世纪存在理论不足的问题，其概念和技术水平必将被后世所超越。尽管得益于阿拉伯科学思想的润泽，部分学科分支也具备强调定义和判断的良好风气，但中世纪科学依赖于未经证实的假设，部分是因为缺乏实证手段、部分是因为缺乏实证意愿。例如，中世纪科学家墨守成规，断言一切事物由火、气、土、水四大元素构成，也没有用实验证实这一理论。虽然炼金术和方术传统中采用了某种类型的实验手段，经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发展后，也不仅限于寻找合成黄金的方法，但依然以神秘主义的、先验的概念为指导方针。

680

这一局面普遍保持到 17 世纪。文艺复兴展现了一定程度的科学精神，但通常表现为描述性研究(一份杰出的范例是维萨里 1543 年发表的人体解剖学研究成果)、艺术领域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例如透视法)和机械工艺。这类描述和分类定义研究工作的一个分支尤其突出，使得由航海发现和宇宙学研究所揭示的新地理知识具备条理性和可读性。一名 16 世纪早期的法国医生说到，在地理学及“天文学相关领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古代哲学家推动了学科的进步，托勒密则在此基础上贡献良多。但如果其中的任何一位来到今天，他会发现地理学已面目全非”。而面目全非的地理学中就有一份促成新的自然界认知手段的因素。

这一因素的见效并不算快。但固然不假的是，早在 1600 年，极少数有识之士就难以接受以综合亚里士多德学说和《圣经》的中世纪宏大理论为基础的、老一套的世界观。因为眼中的世界不再协调一致，突然失去思想的凭靠、一切都无法确定的紧张感使其中有些人感到不安。但对于大部分有心考虑这一问题的人来说，旧有的世界观依然是正确的，整个宇宙依然以地球为中心，也以地球惟一拥有理性的居民——人类——的生活为中心。下个世纪最伟大的知识界成果就是令受过教育的人再不可能以这种方式进行思考。这一变化是如此重要，从而被视为中世纪与近现代的根本差别。

17 世纪早期，科学界已经出现了一些新东西。这些随后广为人知

的变化意味着认知领域的一道障碍被跨越,文明的本质将发生永久性的改变。欧洲出现了一种具有深刻功利主义色彩的新观念,鼓励人们投入时间、精力和资源,通过系统性的实验掌控自然规律。当后世回顾这段历史,人们从弗朗西斯·培根身上找到了这一先驱理念的杰出范例。他曾出任为英格兰大法官,是一位知性超凡、具备诸多难以想象的个人特质的男子,一些后世的仰慕者热心支持他才是莎士比亚部分剧作真实著者的主张。他的著作在当时的影响力似乎很小,乃至根本为零,但以其摒弃过往权威的前瞻性论点引起了后世的关注。培根提倡以观察和归纳为基础、以人类的实际需求为目的对自然进行研究。“科学合乎理法的真正目标,”他写道,“是通过新发现和新力量使人类的生活更丰足。”通过这些手段,可以“使(大部分)主宰权和力量回到人类手中……这是人类在创世之初就与生俱来的地位和能力”。这一抱负着实远大,完全不亚于为亚当堕落之后的人类送去救赎,但培根确信,如果对科学研究进行有效的组织,这是可以办到的;就此而言,他再一次扮演了预言者的角色,是后世科学界和体制的先驱。

681

培根的现代性被后世所夸大,一些其他人(比较突出的是同时代的开普勒和伽利略)在推动科学进步方面的重要性更值得大书特书。后世科学家也没有充分贯彻以务实的态度寻找“改善人类生活的新艺术、财富和商品”(也就是以技术为主导的科学)这一他所提倡的原则,至少没有达到他希望的程度。尽管如此,他依然配得上头上那顶颇具神化色彩的光环,因为他点出了科学的核心,提倡观察和实验,而非依赖逻辑推论。与这一地位相称的是,据说他甚至还为科学殉道,为了观察低温对肉体组织的影响,在某个寒冷的三月天用积雪填塞禽鸟,从而感染风寒病逝。40 年后,他的核心理念成为了科学界的常规。“世界这部伟大机器的构造和机理”,一名英国科学家在 17 世纪 60 年代言道,“只能通过实验和机械论的哲学加以解释”。其中有培根领悟并赞同的理念,也是我们依然身处的世界的核心。自 17 世纪起,以实验手段寻找问题的解答就一直是科学家的特质之一,经过漫长的岁月,这一理念还引发了新的尝试——通过构筑体系来理解实验所揭示的内容。

该理念首先带来的后果是对物理现象的集中攻克，以当时的技术，这类研究可获得最佳的观测和测量结果。欧洲工人在数百年间的缓慢工艺积累带来了各种技术创新；在当时，这些技术可以用来解决问题，并进而克服其他知识领域的难题。对数和微积分的发明与其他元素共同构成了一套应用理论工具，创造出更好的计时和光学设备。作为时钟的控制部件，17 世纪出现的钟摆使时钟制造工艺取得长足进步，进而使精确计时乃至天文研究变得更为容易。随着天文望远镜的问世，人们可以更深入地细观天象；哈维通过实验进行理论探索，进而发现了血液的循环，但只有等到显微镜出现、可以看清血液通过微细血管的过程，人类才能理解循环的机理。望远镜和显微镜下的观察不仅是科学革命式发现的核心工具，而且令非专业人士得以窥见某些预示着新世界到来的新奇事物。

682

科学与哲学的界线如今也可以划出，这是过去长久以来都无法实现的目标。已经应运而生的不仅是科学家所组成的新天地，而且还有一个真正的、国际范围的科学界。在此，我们要又一次提及印刷术。新知识的迅速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科学书籍的出版不是知识传播的惟一形态；英国皇家学会创办了《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其他学术团体的论文集和学会纪要也相继出现，数量不断增长。不仅如此，科学家们还保留了相互之间卷帙浩繁的私人书信，其中的大量素材为揭示科学革命发生的真实过程提供了部分最有价值的证据。有些书信已获出版；比起今日顶尖科学家之间的书信往来，这些文字具有更强的可读性，也更易于理解。

在现代人眼中，科学革命的突出特征之一是业余人士和爱好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人提出，能够解释为何科学在欧洲取得进步，而在曾经成就斐然的中国却一潭死水的最重要的事实之一，就是欧洲的业余爱好者和绅士可以凭借科学研究赢得社会声望。该世纪中期开始广泛出现的会员制学术团体充斥着玩票的绅士，无论往哪个方向延伸想象力，都无法称之为专业的科学家，但无论是否除下手套躬亲实验工作，他们凭借自身的名望和地位，为学术团体带来了无法定义却意义重

大的存在感。

到1700年,主要科学分支的专门化已经完成,尽管完全没有达到以后的重要程度。那时的科学研究也不需要无止境地投入时间,但撰写神学著述、担任行政职务都不会影响科学家通过研究作出重大的贡献。这揭示了17世纪科学革命的若干局限;而既有技术的局限也是无法逾越的,虽然若干领域能不受影响、实现了重大进展,但其他领域难免因此受到冷遇。例如,化学所取得的进展相对较小(但16世纪统治思想界的亚里士多德四元素物质构成说已鲜有人接纳),而物理和宇宙学发展日新月异,且确实达到某种巩固成果的稳定状态,迎来不那么激动人心但稳步前进的阶段,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后期被新的理论重新激活为止。 683

总体来说,17世纪取得了巨大的科学成就。最重大的成果是推翻了将自然现象视为往往无法预期的、神力直接作用的结果的宇宙观,并以机械论取代,认为其中的一切变化都是规律的,服从统一和普适的运动法则。这一新观念依然与上帝的信仰相当合拍。万能的主也许没有用直接干预的方式展现大能,而是创造了一台伟大的机械;在那个最著名的类比中,上帝被形容成一名伟大的钟表匠。17世纪典型的科学爱好者和科学世界观都不反对宗教,也不反对以上帝为中心的宇宙观。新的天文学观念将人类赶下宇宙中心的神坛,从而间接质疑了人的独一无二性(一本1686年出版的书籍主张可能存在另一个拥有生命的世界),这一事实固然具有不容置疑的重要意义,但并非宇宙观革命的缔造者所在意的对象。对他们而言,太阳围绕地球运行的观点有损于教会的权威只不过是碰巧罢了。他们所提出的新见解仅仅突出了上帝行事之道的伟大和神秘,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新知会融入基督教的教义,就如亚里士多德学说曾在中世纪被纳入基督教范畴一样。

早在德国哲学家康德于18世纪末提炼出"哥白尼式革命"一词之前,新宇宙观的一系列缔造者就已经获得世人的承认,而波兰教士哥白尼(Copernicus)是其中的第一人,他的著作《天体运行论》于1543年出版。维萨里的解剖学巨著于同一年出版(而且有趣的是,阿基米德文集

的第一版也出版于这一年)。相比于科学家,哥白尼更像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学者——鉴于其生活的时代,这并不令人称奇。部分出于哲学和美学理由,他选择了行星围绕太阳运转的宇宙观,以均轮和本轮构成的体系来解释它们的运动。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了不起的猜想,因为他没有证实这一假设的手段,而且大部分常识证据都与此相反。

支持日心说的最早的、真正的科学数据实际上来自一位不接受该学说的人士:达内·第谷·布拉赫(Dane Tycho Brahe)。除了拥有一只颇显与众不同的假鼻子之外,布拉赫的出众之处是对行星运动轨迹的记录,他首先使用简陋的仪器,后来得益于一位慷慨的国王,得以使用当时设备最好的天文台。其观测结果构成了以亚历山大里亚时代为起点的西方天文史上最早的系统化天文数据集合。第一位伟大的新教科学家、受布拉赫之邀担任助手的约翰内斯·开普勒(Johannes Kepler),进一步开展了更加细致的观察,使理论获得第二次飞跃。他的观测表明,如果行星轨道为椭圆,且运行速度不定,那么就可以用某种规律来解释行星的运动。愈发站不住脚的托勒密宇宙体系最终被开普勒打破,20世纪以前的行星学说均以他的理论为基础。随后登场的是对望远镜爱不释手的伽莱里奥·伽利略(Galileo Galilei),这种仪器出现于1600年左右,可能是一项无心插柳式的发明。伽利略是帕多瓦的学者和教授,从事两项早期科学史中具有典型关联的研究:物理和军事工程学。他运用望远镜所取得的成果最终撼动了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根基;哥白尼的天文理论获得了眼见为实的证明,此后两个世纪,行星的已知属性也将被套用到恒星的头上。

684

但伽利略的主要工作并非观测,而是理论与技术实践的结合。他为天体运动设立了一套数学模型,从而首先为哥白尼宇宙学说提供了站得住脚的物理学描述。凭借他的工作,力学脱离了工匠手艺的范畴,进入科学的殿堂。不仅如此,伽利略通过系统性的实验得出了一份结论,其基础是被他称为"两种新科学"的静力学和动力学。这些成果在1632年出版成册,是为《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指托勒密和哥白

尼的），被视为科学思想最早的革命性陈述。不如其内容那般突出但同样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并非以拉丁文写就，而使用通俗的意大利文，并题献给教皇；伽利略无疑是个忠诚的天主教徒。但此书引发了一场骚动，这也恰如其分，因为它是基督教—亚里士多德世界观的墓志铭，而这份世界观是中世纪教会所取得的伟大的文化胜利。伽利略随即遭到审判。他被判有罪，并声明放弃异端观点，但这无损于其著作的影响力。哥白尼的主张和日心说就此成为科学界的主导思想。

伽利略去世的那年，伊萨克·牛顿呱呱坠地。他的成就是为哥白尼宇宙学说提供物理解释；他证明同样的力学法则能够同时解释开普勒和伽利略的发现，并最终将有关地上的知识和有关天上的知识结为一体。他采用了所谓“流数法”的新数学方法，即后世术语中的无穷小量微积分。牛顿不是该算法的发明者，但用它来研究物理现象。该算法提供了一种计算物体运动中位置的方法。他在一本著作探讨行星运动的章节中归纳了自己的结论，此书展示了万有引力定律维系物理宇宙的方式，经历史证明，这是自欧几里德以来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科学著作。《原理》是该书拉丁原名的简称，译成英语后的全称为《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这一发现的普遍文化效应堪比科学影响力，我们不具备合适的度量标准，但也许前者的分量还更大。通过观察和计算得出的单单一条法则可以解释如此之多的现象，这一惊世骇俗的事实昭示了新的科学思想具有多么强大的力量。蒲柏的诗句已经被引用得太多，但这番隽永之辞依然最精当地概括了牛顿的成果对欧洲人思想的冲击：

685

自然之法，久藏玄冥，
神赐牛顿，万物生明。

于是，继弗朗西斯·培根之后，牛顿逐渐成为第二位世所公认的现代科学圣人。与培根不同的是，这一名头对牛顿来说可谓实至名归。他对科学的兴趣几乎无所不包，但也正如字面意思所言，对于不热衷

的东西则基本不闻不问。但非科学工作者必然无法充分领会牛顿许多工作的重要意义。其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完成哥白尼所开创的革命。宇宙处于动态的概念取代了静态宇宙观。他的成就十分伟大，足以为此后两百年的物理学奠定基础，并给所有其他学科提供一份新的宇宙观。

牛顿及其前人所没有料到的是，这一发现预示着科学与宗教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实际上，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无法充分支持宇宙是一个自治体系、创世后即可独立运转的观点之后，牛顿甚至感到欣喜；如果宇宙不只是单纯的钟表，其创造者在设计、制造和上紧发条之后，就不会完全退居一旁。他乐于见到其中的逻辑漏洞，以便用假想中的上帝之手来填补，因为他是新教信仰的忠实捍卫者。尽管如此，教士尤其是天主教教士，还是觉得新科学难以接受。中世纪教士为科学作出过重大的贡献，但从 17 至 19 世纪中期，绝大多数顶尖科学成果都与教士无关。毫无疑问，反宗教改革得势的几个世纪，上述情况比其他时期更确凿无疑。体制化宗教与科学的分歧始于 17 世纪，尽管为弥合裂痕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尝试，但此后欧洲知识界始终摆脱不了这一阴霾。由那不勒斯人布鲁诺(Bruno)引发的危机是这一分歧的象征之一。他并非科学家，而是一位思想家，曾经为多明我会修士，后脱离修道院，周游欧洲各地，发表引起争议的作品，捣腾一种据说源自古埃及、类似魔法的“秘术科学”。最后，异端裁判所将他抓获，拘押八年后，于罗马以异端罪名处以火刑。在后世人心目当中，这把火成了“自由思想”发展史和反宗教进步斗争史中的神话之一。

686

17 世纪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对这一斗争的感受还不强烈。牛顿有大量以《圣经》和神学为主题的著述，并相信他对先知书的研究就和《原理》一样完美无瑕，他认为摩西知道日心说理论，并建议其读者“小心哲学、虚伪的妄言和假冒科学之名的反科学”——而这段话借用了《旧约》中的桥段[①]。对数的发明者纳皮尔乐于用这一方法来计算《启示录》用

---

① 见《歌罗西书》：2,8 及《提摩太前书》：6,20。——译者注

神秘的语气所提到的野兽数目①。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推导出宗教信仰和基督教真实性的哲学辩护,并为此满足,而其推导手段和所要证明的主题同样不无阙疑。他(或是以他命名的哲学运动:笛卡儿主义[Cartesianism])也没有因此停止对教会敌对派的攻击。宗教信仰的传统捍卫者正确地认识到,人们所得出的结论固然重要,但得出结论的方法同样要紧。对于宣扬真理出自权威之口的教会而言,基于理性思辨接纳宗教信仰的立场是糟糕的盟友,其起点是普遍怀疑原则,其结论完全可以被合理地推翻。教会相当理智,没有将笛卡儿个人的虔诚和基督教原则混为一谈,也恰如其分地(以教会的观点)把他的著作统统列入禁书目录。

17世纪晚期的法国新教教士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接过这一“诉诸权威”的问题,指出了令人不安的缺陷:能定义权威的权威又是什么?这最终似乎还是取决于立场。他认为,如果不遵循自然理性,传统基督教的每条教义都可能被推翻。伴随这一理念,欧洲思想史进入了史称启蒙运动的新篇章。

这一词语或类似变体在18世纪的大部分欧洲语言中出现,用以描述那个时代的知识界在人们心目中的与众不同,并将其与过去的时代相区分。启蒙运动给人留下的关键印象是让光明照亮黑暗,但德国哲学家康德在一篇著名论文中提出“什么是启蒙?”的问题时,他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告别作茧自缚、获得自由。其核心是对权威的质疑。启蒙运动留下的伟大遗产是批判精神的普及化。最终,一切事物都要接受细致全面的考察。有些人感到一切都失去了神圣的光环,但多少有些误导,直到很久以后这才成为现实。启蒙运动也有自己的权威和教条;批判立场本身就长期未遭质疑。而且,启蒙既是大量观点的杂烩,又是一系列理念的集合,使得接纳其思想的难度又平添一层。多种思潮汇入其中,但绝非都朝着同一方向。启蒙运动的根源蒙着一层迷雾;其发

687

① 见《启示录》13:8:“在这里应有智慧:凡有明悟的,就让他计算一下那兽的数字,因为是人的数字,它的数字是六百六十六。”——译者注

展总是更像一场无尽的争端——有时是内战，而且敌对各方还持有大量相同的见解——远甚于齐心协力的启蒙者所组成的军队向前迈进的历程。

笛卡儿提出，系统性的怀疑是获取可靠知识的起点。50 年后，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提出一套知识的心理学理论，将知识的主要构成来源归结为感官传递给头脑的印象；而非笛卡儿所认为的人类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头脑中所包含的只有感觉和信息，以及头脑在两者之间所建立的关联。当然，这暗示了人类没有关于对错的固定观念；洛克主张，道德价值观来自头脑对痛苦和愉悦的体验。这一理念将在未来得到极大的发展，从中产生了教育理论、规范物质条件的社会责任理论以及大量其他教育环境论的衍生理论。这一理念也有庞大的历史背景：笛卡儿和洛克在区分躯体与思想、物质与精神时所表现出的二元论思想以柏拉图和基督教形而上学为源头。然而在这方面上最惊人的事实也许是洛克依然能将他的理念与基督教信仰的传统框架联系到一起。

这种不协调性贯穿启蒙运动始终，但其总体趋势还是明朗的。科学所取得的新的影响力似乎也肯定了来自感官的观察确实是获取知识的途径，而且这份知识已经证明本身所具有的实用主义价值。它可以让人类所生活的世界更美好，其技术可以解开自然的秘密，以物理和化学定律揭示这些秘密背后的逻辑和理性基础。

这一切构成了一份长期保持的乐观信仰（法语中的"*optimiste*"一词就是 17 世纪诞生的）：世界正在好转，也将不断变得更好。而公元 1600 年的情况曾截然不同。当时，对古典时代的文艺复兴式崇拜、战乱，以及始终潜伏在宗教人士心中的末世将临的感受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悲观的氛围和世界正在腐朽、昔日的伟大正在远去的论调。在一场关于古代成就是否超越现代的文学大辩论中，17 世纪以后的作者们用启蒙运动中兴起的进步观来提炼自己的结论。这也是一份属于非专业人士的信仰。在 18 世纪，一名受过教育的男子依然有可能掌握多种不同研究领域的逻辑和方法，至少达到他自己所满意的程度。伏尔

688

泰是著名的诗人和剧作家,但在历史方面也著述颇多(他一度是法国皇家史料编纂人),还为同胞详解牛顿物理学。在推出震惊世界、堪称现代经济学开山之作的《国富论》之前,亚当·斯密以道德哲学家的身份闻名。

这种折衷主义也给宗教留下了位置,但如吉本所言,“在现代,即便是最虔诚的灵魂底下也有一份暗藏的、甚至是无意识的怀疑”。“启蒙”思想留给神明和神学的空间并不大。不再觉得地狱的血盆大口悬于头顶的不仅是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整个世界的神秘色彩都在消退;也使人坚信并非过去想象的那么悲观。人们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困难并非必然,而是人为的结果。固然,地震之类的可怕自然灾害依然会带来艰难困苦,但如果大部分疾病的痛苦可以得到缓解,如果像一位思想家指出的那样,“追求快乐、远离不幸是人类的正当事业”,那么拯救和罪罚的教义与此又有何干?上帝依然会被哲学家以漫不经心的方式纳入对宇宙的描述,例如启动万物的第一推动力和定义宇宙运行法则的大机械论,但主是否拥有对其运转施加后续干涉的任何地位,不管是化身后的直接干涉,还是通过教会及圣礼的间接干涉?启蒙运动无可避免地导致了针对教会这一知识和道德最高权威的革命。

其中存在一种根本性的冲突。17 和 18 世纪思想界摒弃权威的意识仅仅初步形成,他们依然在科学和理性的教诲中寻求新的权威,并对此深信不疑。但往日的权威遭到越来越坚定和彻底的放弃。正如对古代和现代文化的自由思辨削弱了欧洲传统文化两大支柱之一——经典学说的权威性,新教改革同样推翻了其另一支柱——天主教会的权威性。在新教改革家用新派神父(或《旧约》)取代老派牧师的同时,他们已经不可逆转地开启了削弱宗教权威的道路,后来的启蒙运动者将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很远。

689

无论教士马上产生何种顾虑,也不管这些顾虑是否很快得到证实,此类效应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显露端倪。18 世纪先进思想的特征往往表现在颇为务实和日常的建议中,这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其倾向性。若要概括这些特征,最好的方式也许是援引同为其支撑和源头的根本

信仰。对思想的力量产生的新的自信是其特征之一,也是所有其他特征的基础;这是启蒙者如此敬仰培根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都秉持着这份信心,而就连文艺复兴时期创造力非凡的天才,也无法像 18 世纪那样让欧洲人如此确信头脑和知识的力量。以此为基础,人们确信改善世界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的。当时有很多思想家乐观地视那个时代为历史的顶峰。他们自信地认为,通过对自然的操纵,以及真理逐渐被理性揭示的过程,人类的未来会变得美好。从正门蜂拥而出的天赋观念又从后楼梯悄悄返回。仅仅意识到存在可以克服的重大实际障碍就足以确定乐观主义基调。首当其冲的障碍是单纯的无知。或许终极意义上的知识是不可能获取的(揭示出自然愈发深奥的秘密后,科学无疑表明了这一点),但启蒙者所担忧的无知并不是这一类。他们所在意的是更趋于日常水平的知识经验,并自信这类无知可以破除。启蒙运动最伟大的文学成果分毫不差地以此为目标。这就是狄德罗和达朗贝尔(D'Alembert)的巨著《百科全书》,一部长达 21 卷、卷帙浩繁的信息和理念宣传集成,出版于 1751 至 1765 年间。如其中部分条目所揭示的,启蒙运动的另一大障碍是缺乏容忍——尤其是对出版和论辩自由的干涉。其作者之一称,《百科全书》是一部"战争机器",旨在改变思想、用信息武装思想。地方观念是人类走向美好未来的又一个障碍。在人们心目当中,启蒙运动的价值观是所有文明社会价值观的综合,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欧洲知识界精英从未如此兼容并蓄,也从未如此享有共同的语言,也许只有中世纪是例外。启蒙运动对其他社会展现出非同一般的兴趣,这些了解强化了其普世的包容性。这部分是因为发自内心的好奇;游记和发现向公众呈现了陌生的理念和体制,从而激发了人们对社会和伦理相对性的兴趣。这些新知为批判思想提供了新的土壤。18 世纪欧洲人心目中那个人道和开化的中国尤其令他们浮想联翩,或许这一事实也能表明他们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有多么肤浅。

690

人们设想,一旦无知、不容忍和地方观念得以破除,由理性所发现的、不可阻挡的自然规律将推动社会改革,除了那些因蒙昧或享有站不住脚的特权而深陷往日泥潭的人以外,这场改革会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法国作家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开启了一份传统：通过与自然规律作对比，就可改善既有社会的体制——对他而言是法国法律。在宣扬这一方案时，启蒙运动者自视为新社会秩序的布道人。他们将自己想象成批判和改革的化身，从中首度涌现出一份陪伴我们至今的社会理念，即知识分子式的理念。道德学家、哲学家、学者和科学家早已有之；他们的本质特征是某种专业特长。而启蒙运动所创造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批判性知识分子的概念。独立、理性、持续和全方位的批判主义精神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系统化发展，其结果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诞生。

18世纪并没有使用"知识分子"这一术语。这类人已经出现，但被单纯地称为"哲学家"。这是对熟悉的词汇加以活用的有趣范例；其所指并非哲学研究这一特殊的精神追求，而是对未来的共同展望和一致的批判立场。这一词汇具有道德和评判色彩，被用来赞扬同伴，也被用来抨击对手，而且还形容通过批判性思维向不具备专业知识的广大公众宣扬真理的热忱。其原型是一群法国作家，虽然各有差异，但还是很快聚集到一起，并被冠以启蒙哲人(*philosophes*)之称。他们的人数和名望都恰如其分地表现了法国在启蒙运动中期的重要地位。其他国家没有那么多属于知识分子传统的风云人物，为数不多的几位也得不到名望和地位。不过，启蒙运动早期的正神还是英国人牛顿和洛克；将哲学家边沁(Bentham)称为把启蒙思想和手段发展到极致的人物也不无道理，最伟大的史学史里程碑则是吉本的著作。在更北方，苏格兰经历了18世纪伟大的文化全盛时期，产生了休谟和亚当·斯密这两位伟大人物，前者是启蒙运动中对科学技术哲学研究最深入也最敏锐的哲学家之一，将极端怀疑精神和良好的自然与社会保守主义观点结合在一起；后者创作了近现代史上最具原创性和才华的著述之一。拉丁国家中，尽管罗马天主教在意大利占据主导地位，但该国是法国以外对启蒙运动贡献最多的国家。哪怕仅凭贝卡利亚(Beccaria)一人，意大利启蒙运动也绝不会被历史遗忘，他的一本著述奠定了监狱改革和刑罚批判的基础，并使一句名留青史的口号广为人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

691

福”。德国的启蒙运动开展较晚,赢得普世推崇的人物也较少(可能和语言因素有关),但诞生了康德这位思想巨人,虽然他有意超越启蒙主义,但其道德倡议依然高度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立场。比较籍籍无名的似乎只有西班牙。哪怕把若干受启蒙思想影响的政治家的作品算上,这份评价也不失公允;18 世纪的西班牙大学依然拒不接受牛顿的学说。

虽然其他民族的成果对文明史也相当重要,但法国人的成就对当时的冲击最为强烈。这有很多原因,其一单纯在于国力的强盛;路易十四治下的法兰西拥有一份长盛不衰的威望。另一原因是法国文化有一份冠冕堂皇的传播工具,也就是法语。它是 18 世纪欧洲知识界和时尚人士的交际语;玛丽亚·特蕾西娅和其子女的家书都使用法语,腓特烈二世也用法语作韵诗(但写得很糟)。任何法语书籍都能在欧洲找到读者,而该语种的成功有可能实际上阻碍了德语文化的发展。

通用的语言令理念宣传、探讨和批判性评论成为可能,但短期内能够通过实际改革实现多少成果终究有赖于政治环境。一些政治家试图对“启蒙”理念进行实践,因为国家的利益和哲学家的目标存在某种一致性。当“启蒙专制”与既得利益和保守主义发生冲突,这种对政治环境的依赖就显得尤其明显。哈布斯堡领地内触及教会利益的教育改革的实施,或是伏尔泰在一封写给一名王室大臣的简函中对阻挠财政革新的巴黎最高法院的攻讦,都明显带有这种冲突色彩。一些统治者像叶卡捷琳娜大帝那样,大张旗鼓地展示启蒙思想对其立法的影响。也许,除了被用来反对教会的实用主义改革理念之外,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理念冲击始终与教育和经济领域有关。在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经济建议至少对行政产生了影响。

692

宗教问题拥有吸引启蒙哲人关注的独特力量。当时,宗教和宗教教诲与欧洲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还是密不可分。这并不仅仅因为教会掌握了巨大的权威,还因为教会实体无处不在,社会和经济两方面的教会组织利益也无处不在;宗教以某种方式渗透到社会的各种层面,而这些层面是改革者可能会感兴趣的。无论是神圣权力或教士特权的滥用

阻碍了司法改革、教会土地保有权(mortmain)拖了经济的后腿、教会对教育的垄断局限了行政人才的培养,还是忠心有为的臣民因教义无法得到公正的待遇,罗马天主教会似乎总是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但这不是宗教引来启蒙哲人非难的全部理由。他们认为,宗教还会导致罪行。宗教迫害时代末期有一桩激起民众愤慨的重大事件,即 1762 年在图卢兹将一名新教徒判处死刑,罪名为强迫天主教徒改信异端邪说。他为此被折磨、审判和处死[①]。伏尔泰为此案申诉,并激起轩然大波。他的努力没有改变法律,但在天主教和新教对立感依旧强烈的法国南部——也有可能是整个法国,使得此类判决再也无法重现。不过,法国法律对新教徒一直毫不姑息,直到 1787 年才有所改观,而犹太人依然不被接纳。那时,约瑟夫二世已在其天主教领地内推行宗教容忍政策。

这表明启蒙运动的实际成果受到一个重要因素的限制。不管有多么强大的革命力量,它必须在局限性依然极大的旧时代社会政治体制和道德框架内运行。启蒙与专制的关系比较模糊:启蒙者也许会反抗神权君主强加的审查或宗教偏执行为,但也可能依赖专制权力实施改革。必须牢记的是,启蒙思想并非社会进步的惟一动力。伏尔泰所赞赏的英国体制并非源自启蒙运动,18 世纪英格兰的大量变化更多得益于宗教,而非“启蒙哲学”。

693

启蒙运动最伟大的政治意义在于给未来留下的遗产。它明确并发展了后世所称的“自由主义”所要求的很多关键主张,不过这份传统在此处也不乏歧义,因为启蒙运动者并非追求自由本身,而是追求自由所能带来的结果。人类能够在尘世间享受幸福生活的设想是 18 世纪形成的伟大见解;可以说,那个时代不仅将世间的幸福视为一种可行的目标,而且还发展出幸福可度量(边沁撰写过一套“幸福计算”[felicific calculus]理论)、可以运用理性增进人类福祉的观念。最重要的是,启

---

① 即马克·安东尼·卡拉谋杀案。被处死的人是他的父亲约翰·卡拉,他们一家为胡格诺派新教徒,马克·安东尼系自杀,但坊间传言他打算改信天主教才被父亲谋害。——译者注

蒙运动传播了一份理念：就社会倾向性而言，知识的本质是良性和进步的，因此值得信赖。以上这些理念都具有深远的政治影响。

除此以外，那个时代以一种更具体和偏否定的形式对欧洲未来的自由主义传统作出了最为人熟知的贡献；启蒙运动创造了经典的反教皇至上主义。对罗马教会所作所为的批判形成了支持政府攻击教会组织和权威的舆论。除启蒙哲学之外，政教之争还有很多其他根源，但总能表现为启蒙与理性对抗迷信与偏执这一长期战争的组成部分。教皇尤其容易引来批判或藐视；伏尔泰一度相信，这一职位在该世纪末以前就会消失。在敌人和很多支持者眼中，启蒙哲人最伟大的成功是促成教廷解散耶稣会。

若干启蒙哲人对教会的攻击超出了体制范畴，矛头直指宗教本身。18 世纪首次出现了彻头彻尾的无神论（结合唯物主义决定论）的严肃表述，但这种哲学观尚不普遍。启蒙运动时期思索这些问题的人大多可能会怀疑教会的教义，但依然是模棱两可的有神论者。他们也无疑相信宗教是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如伏尔泰所言，“为了人民，你必须有所信仰”。不管怎么说，他和牛顿一样，毕其一生强调上帝的存在，去世时也与教会相安无事。

这暗示着人性中知识及理性以外部分的重要性，总是面临被启蒙运动忽视的危险。该世纪，日内瓦人卢梭是这方面最具预言色彩的人物，他也与很多“启蒙者”和启蒙哲人发生激烈的争执。他热忱呼吁感性和道德应获得应有的重视，从而在思想史中占据重要地位。感受和道德在理性面前都有黯然失色的危险，因此他认为，那个时代的人是被蒙蔽的生灵，是不完全和堕落的存在，被一个暗无天日的理性社会所扭曲。

694

卢梭的远见给欧洲文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有时这种影响是有害的。他在每个人的灵魂中撒下了（诚哉斯言）新的苦种。他的著述中可以找出各种新观念和思想，例如一种赋予宗教新生的态度、一份后来充斥艺术和文学领域的针对个体的心理痴迷、一种理解自然和自然之美的感性手段、现代民族主义学说的兴起、重新转向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

理论、去宗教化的禁欲主义(基于古代斯巴达的神秘观念),还有很多很多。这一切都有正反两面的后果;概言之,卢梭是创造浪漫主义的关键人物。他在很多方面都是创新者,也往往能跻身天才之列。他与别人共通的思想同样不少。例如,他唾弃启蒙运动对社群的侵蚀,觉得人人都是兄弟姐妹,是同一个社会、同一个道德整体的成员,这些想法恰恰表达了爱尔兰作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观点,只不过后者从中得出的结论与卢梭大相径庭。卢梭发出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被其他人视为启蒙运动已过巅峰的表现。然而他在浪漫主义中的特殊地位和中心作用是无可怀疑的。

浪漫主义是一个被大量使用和误用的词语,可以用来形容看起来全然相反的事物。例如,1800 年后不久,有人开始对过去的一切价值观说不,试图以和启蒙时代同样暴力的手段推翻遗留的传统,与此同时,也有人寸步不让地守护着重要的历史体系。双方都可以(也都曾被)称作浪漫主义者,因为道德激情对双方的作用都胜过理智分析。此类对立事物之间最清晰的共通点在于强调感受、本能和自然,这是浪漫主义欧洲的新气象,其中尤以自然为重。表现形式纷繁多样的浪漫主义几乎总是从反对部分启蒙思想开始,不管是怀疑科学能解答一切,还是对以理性为外衣的利己主义深恶痛绝。但其肯定意义上的根源比此更深,源自用来取代多种传统价值观的宗教改革最高价值观——真诚;一些天主教批评家将浪漫主义看作新教主义的去宗教化形态,这不无道理,因为其首当其冲的追求是真实、自我实现、诚实和道德昂扬感。不幸的是,浪漫主义者为了这些追求总是不惜代价。他们的伟大事业将唱响整个 19 世纪,且往往带来痛苦的结果,进入 20 世纪后,还将作为欧洲文化活力最后的表现之一,给世界上大量地区带来影响。 695

第六卷

大 加 速 时 代

导　论

18 世纪中期,世上大多数人(可能欧洲大部分人也一样)依然相信历史会按部就班地延续下去。极为沉重的历史枷锁无处不在,而且往往无法挪动分毫:部分欧洲人展开了挣脱桎梏的尝试,但在欧洲以外的任何地区,别说尝试,就连可能性也不存在。尽管与欧洲的接触开启了很多地区改革生活方式的进程,但大部分地方未受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纯粹的传统。 697

但即便在 18 世纪,有思想的欧洲人也开始广泛认识到历史变革的来临。后一个半世纪,迅速而深刻的改变几乎无处不在,要忽视这一事实就算有可能也极为困难。到 1900 年,欧洲和欧洲世界显然已同过去的大量传统分道扬镳。一种根本上更为进步的历史观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即使进步的神话从未完全摆脱质疑,但也使历史事件有了越来越多的意义。

同样重要的是,源自北欧和大西洋国家的推动力也往外辐射,改变了欧洲与其余世界的关系,也改变了许许多多欧洲人赖以生活的基础,尽管有很多人对此感到抵触和沮丧。到 19 世纪末(但这只是大略和权宜的界标),一度被传统所约束的世界走上了一条新的轨道。持续和加速转型是世界新的宿命,而后一个形容词与前者同样重要。一个 1800

年生的人，如果能有诗篇作者所称的七十年寿命，[①]就可以用一生见证世界经历了比之前一千年更大的变化。历史正在加速前行。

欧洲霸权的巩固是这些变化的核心，也是变化背后的巨大推动力之一。到 1900 年，欧洲文明已证明自己是有史以来物质上最成功的文明形态。至于其中最重要的意义所在，他们的看法也许并不总是达成一致，但鲜有欧洲人否认，这份文明创造了规模空前的财富、以武力和影响力主宰了世界其余地区，此前从未有任何文明能做到这种地步。欧洲人（或他们的后代）掌握了世界。其主宰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政治范畴，是直接的统治。大片地区被拥有欧洲血统的人所占据。形式上和政治上依然独立于欧洲之外的非欧裔国家中，大部分实际上遵从着欧洲人的意愿、允许欧洲人干涉其事务。能够抵抗的原住民屈指可数，就算他们做得到，欧洲人也往往会成为真正的胜利者，因为抵抗运动需要借鉴欧洲人的行事方式才能成功，也就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欧洲化进程。

698

① 这一用法源自《圣经·诗篇》90 章 10 节：“我们的寿数，不外七十春秋，若是强壮，也不过八十寒暑；但多半还是充满劳苦与空虚，因转眼即逝，我们也如飞而去。”——译者注

一、长期变化

1798年,英国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发表了《人口原理》一书,经历史证明,该书将成为该学科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他描述了人口增长的法则,但此书的重要性超越了这一明显具有局限性的科学范畴。例如,它对经济理论和生物学的冲击与对人口学研究的贡献同样重大。不过与此相比更为重要的是,此书标志着人口学思想的变迁。一言以蔽之,有大约两个世纪,欧洲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认为人口增长是繁荣的标志。国王们设法提高臣民的数量,因为人们不仅认为这可以提供更多的纳税人和士兵,而且还认为人口的增多与经济运行速度的加快互为因果。显然,更大的人口数量表明维持其生计的经济规模也扩大了。亚当·斯密为此观点的核心内容提供了最权威的支持,其影响力巨大的著述《国富论》早在1776年就认同了人口增长大致等同于经济繁荣的论调。 699

但马尔萨斯又狠狠泼了一盆冷水。他得出结论,不管社会整体将如何发展,日渐膨胀的人口迟早会释放灾难,给其中最大的阶层——穷人带去苦难。在一段著名的阐述中,他提出,地球的产出有其限量,取决于可用的耕地面积,进而为人口施加了上限。然而人口始终存在爆发性增长的趋势。生存压力会随人口的增加与日俱增,产量增长的速度会越来越滞后于人口增长。当产量无法多过需求时,饥荒必然随之

降临。然后人口开始减少,直到现有粮食产量可以供养的程度。只有700节育(以及有助于鼓励人们晚婚的克制和审慎)手段,或是灾难或战争等恐怖的自然因素才能阻止这一机制的运转。

关于这份阴沉的理论有多么复杂和精妙,还有很多可以大书特书。它激起了轩然的争议和驳斥,无论是否正确,如此引人关注的理论必然能告诉我们那个时代的很多信息。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人们已经对人口增长感到忧虑,即便是马尔萨斯那般不得待见的理论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人们对人口增长产生了之前所没有的认识,而这仅仅是因为增长的速度比过去更快。在19世纪,无视于马尔萨斯的言论,部分人类世界的人口数量急剧增长,其速度对当时或以前的人类而言是无法想象的。

这类变化最适合用长期视角来解读;纠结于精确的日期有害无益,其总体趋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后期。如果把俄罗斯(其人口数据直至本作诞生之时依然非常欠缺统计学依据)包括在内,那么欧洲人口在1800年为1.9亿左右,一个世纪后增加到4.2亿上下。世界其余地区的增长速度则慢得多,使得欧洲人口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从大约五分之一提高到四分之一;有一小段时间,欧洲缩小了对亚细亚文明中心的人口劣势,但继续享有技术和心理上的优越地位。不仅如此,在同一时期,欧洲还经历了规模巨大的对外移民。19世纪30年代,欧洲海外移民人数首次超过一年10万;1913年达到150万以上。以更长远的视角来看,1840至1930年间,也许有5000万人离开欧洲前往海外,其中大部分都抵达西半球。这些人和他们的后代都应被计入总量,才能理解这些年来欧洲人口增长的规模。

该增长在欧洲内部并不平均,也对大国的地位造成重大影响。军事人力通常被视为强国实力的体现,1871年,德国取代法国,成为俄罗斯以西单一政府下人口最多的国家,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看待此类变化的另一种方式是比较欧洲军事大国在不同时期中占欧洲总人口的相对比例。例如,1800至1900年间,俄罗斯从21%提升到24%,德国从13%升到14%,而法国从15%跌至10%,奥地利跌幅略少,从

15%降至 12%。但没有国家像英国那样取得了如此惊人的增长,从马尔萨斯著书立说时的 800 万左右升至 1850 年的 2 200 万(还将在 1914 年达到 3 600 万)。 701

然而人口增长无处不在,只是速度和时间段不同。例如,最贫困的东欧农业型地区直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才迎来人口增长的顶峰。这是因为死亡率的下降是该时期人口增长背后的基本机制,且无处不然。在过去一百年间,死亡率的下跌幅度是史上空前的,并首次出现于 19 世纪的欧洲发达国家。笼统而言,1850 年以前,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出生率略高于死亡率,而且两个数值在所有国家都基本相等。换言之,该状况表明,在那个时代、在依然以农业为压倒性主体的社会,人类生活的基本决定因素所受到的冲击很小。1880 年后,这一切迅速发生变化。欧洲发达国家的死亡率呈相当稳定的下跌趋势,从每年 35‰降至 1900 年的 28‰,五十年后还会进一步减少到 18‰。略欠发达的国家在 1850 至 1900 年间依然保持着 38‰的死亡率,到 1950 年才降至 32‰。这造成了欧洲内部惊人的不平等,较富裕部分的预期寿命要高得多。大体而言,除死亡率高且贫穷的西班牙之外,欧洲发达国家都位于西部,因此死亡率的不平等再次加剧了旧有的东西欧差异,给波罗的海至亚得里亚海的那条假想的边界添上了新的浓墨重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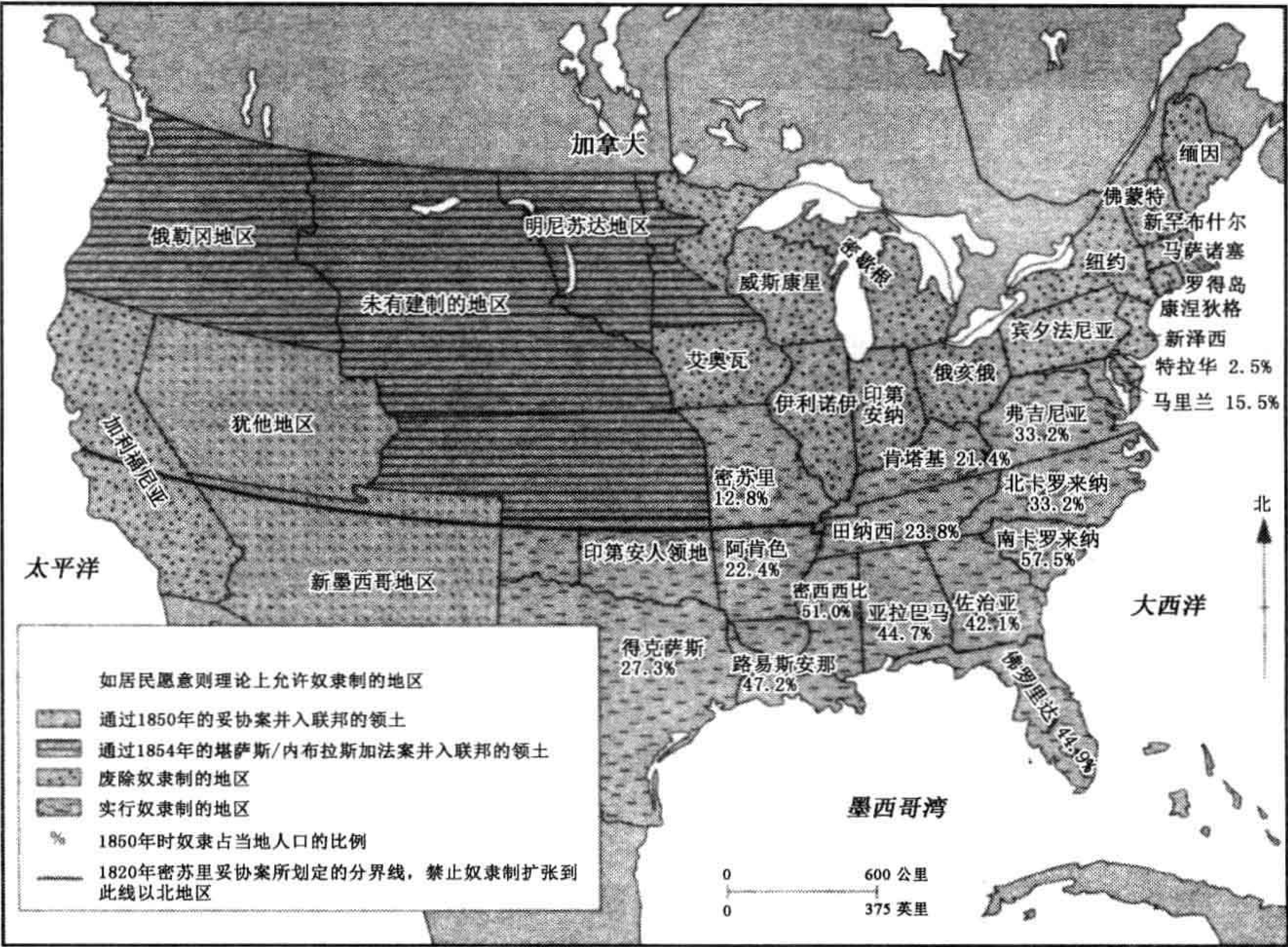
死亡率降低以外的其他因素也不无贡献。随着经济状况的改善,早婚和出生率提高在人口扩张的第一阶段就显露端倪,但现在两者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因为从 19 世纪开始,得益于更充分的人道主义关怀、更廉价的食物、更好的公共卫生条件以及医疗和工程学的进步,早婚儿童的存活率大大提高。影响人口发展趋势的因素中,医学和医疗条件是最晚发挥作用的。直到 1870 年左右,医生才开始掌握重大绝症的治疗方法。这些疾病都是儿童杀手:白喉、猩红热、百日咳、伤寒。婴儿死亡率因而急速下降,新生儿的预期寿命则显著提高。但更早之前,通过给日渐扩大的城市建设改良的排水系统、设计更好的清洁卫生手段,社会改革者和工程师已经为降低这些和其他疾病的发病率(虽然不包括其死亡率)做了大量工作。到 1900 年,曾于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

肆虐伦敦和巴黎的霍乱在工业化国家已经绝迹。1899 年后,西欧再无702 一国爆发大型疫病。这类变化影响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各地都产生了提高平均寿命的普遍趋势,也造成了惊人的长期效果。当 20 世纪过去四分之一的时候,北美、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和欧洲工业化地区的男女可以期待的寿命比中世纪祖先要多一至两倍。这一情况所带来的后果是极为惊人的。

正如人口增长加速首先降临到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下一个可以感知的人口发展趋势——增长减缓也最早出现于那些国家。这是出生率降低所导致的,不过由于死亡率降低的速度更快,这一原因长期被掩盖。在每个社会,该趋势最早显现在富裕阶层当中;直至今日,生育率与收入成反比依然是大体说得通的规律(尽管富裕的美国政界世家提供了不少名声响亮的反例)。在某些社会(而且在西欧比东欧更明显),这是由于晚婚的趋势缩短了妇女婚后的生育时期;在某些社会,这是由于夫妻选择少生——得益于有效的节育技术,他们具备之前所没有的可靠手段。也许部分欧洲国家之前就对此类技术有一定了解;但至少可以肯定,这些技术在 19 世纪取得了改良(有些改进离不开科学和技术进步,从而制造出了必需的设备),也获得了使其广为人知的宣传效果。一场社会变化带来的影响力就像无数根触手所织成的巨网,这种情况再一次重现,因为很难不把这类知识的传播与特定因素——如识字率的提高——和生活期望的提高联系起来。尽管人们开始获得比祖先更多的财富,但也一直在调整所谓过得去的生活标准的概念——从而调整了可以接受的家庭规模的概念。至于他们据此概念所采取的行动是推迟结婚年龄(如法国和爱尔兰农民所为)还是采用节育技术(似乎是英国和法国中产阶级的做法),则取决于其他文化因素。

人们在家中生老病死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进而使社会结构出现转型。一方面,在 19 和 20 世纪的西方国家,青年的绝对数量比过去更多,有一段时期,其相对比例也比以往更多。19 世纪欧洲的外向、喧哗和活力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此。另一方面,发达社会逐渐面临前所未703 有的老龄人口比例。过往世纪中供养老者和无工作能力者的社会机

制越来越不堪重负;工业社会下的就业竞争日趋激烈,使这一问题雪上加霜。到 1914 年,几乎所有欧洲和北美国家都为解决贫困和无法自立者的供养问题绞尽脑汁,无论这项工作的规模和成果在各国有多大差别。



美国的奴隶问题

此类趋势直到 1918 年才见于东欧,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其普遍模式早已确立。死亡率的跌幅长期高于出生率,即便在发达国家也一样,因此直至今日,欧洲和欧洲世界的人口始终处于增长状态。这是该时代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几乎与方方面面都有联系。其物质方面的影响可见诸于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和规模巨大的消费市场的崛起,后者为制造业提供了发展的温床。其社会影响包括体制变化下的冲突和动荡,也包括体制变化下的投机行为。政客将人口数据列入考虑,决定可以(以及不得不)承担何种风险。人们对人口过密的警惕性越来越高,这些趋势都造成了国际上的反响。19 世纪的英国担心无数穷人和失

业者的福祉，从而产生了鼓励移民的措施，并进而塑造了臣民的帝国式思想及感受。稍晚些时候，德国人因为害怕损失军事潜力而不提倡移民，法国和比利时人则出于同样的理由成为发放儿童补贴的先驱。

704

其中部分措施恰当无误地表明，马尔萨斯的悲观预言将随着岁月的流逝被人遗忘，令他恐惧的灾难并没有发生。19 世纪的欧洲依然不乏人口灾难；爱尔兰和俄罗斯都遭遇大饥荒，濒临断粮的状况在很多地方出现，但此类灾祸越来越罕见。发达国家杜绝饥荒和物资短缺之后，也使得疾病的人口杀伤力不复从前。同时，巴尔干以北的欧洲地区享有两段为时较长的完全和平时期，即 1815 至 1848 年、1871 至 1914 年；作为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中的另一个阻碍因素，战争似乎也算不上称职的灾星。最后，如平均寿命所示，人口伴随生活水准的提高而增长，似乎否定了他的判断。悲观主义者能作出的惟一合理的反驳就是：马尔萨斯的疑问并没有获得解答，所发生的一切只能证明人类可以获取的食物比过去的假设要多得多，人们所害怕的饥荒没有出现。但无法从中得出供给无限的结论。

事实上，当时还发生了另一场伟大的历史变革，属于屈指可数的、真正改变人类基本生活条件的变革之一，称之为粮食生产革命并不为过。其开端前文已有涉及。18 世纪的欧洲农业已经能够获得中世纪两倍半的产出。而当时，更了不起的农业进步即将成为现实，产量会提升到更叹为观止的水平。据计算，从 1800 年前后开始，欧洲农业生产以每年 1%左右的速度增长，使之前所有的进步都相形见绌。更为重要的是，随着时间推移，欧洲工商业将使其有能力利用世界其余地区的巨大粮食储备。两场变革都属于生产力投资不断加快的同一进程，到 1870 年，这一进程已使欧洲和北美成为毫无争议的全球财富最集中的地区。农业是财富集中的本质基础。人们曾谈论一场“农业革命”，假如不考虑其中的急速改变之意，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术语；毕竟，如果用过于内敛的词汇，就无法形容 1750 至 1870 年间实现的世界农业产出的巨大飞跃(后来甚至更上一层楼)。但这一进程充满复杂性，其推动力来自众多不同的源头，也与经济的其他层面具有不可或缺的关联。

它只是一场世界范围的经济变革的一面,最终卷入其中的不仅是欧洲大陆,还有美洲和大洋洲。

705

一旦这些重要的性质开始定型,就可以对此加以专门的详述。1750年的英格兰拥有全球最好的农产业。英国的农业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并与贸易市场经济充分融为一体,其领先地位将持续到大约一个世纪以后。欧洲农夫到那里观摩学习、购买牲畜和机械并寻求建议。同时,得益于国内的和平(1650年后,英国本土没有大规模或持续的军事行动,对经济的好处是无法估量的)和人口增长所带来的购买力提升,英国农夫赚得了进一步改良所需的资金。他们愿意采取这种投资方式,就短期而言是对贸易前景乐观的表现,但也揭示了英国社会某些更深层次的东西。在英格兰,农业进步的好处属于个人,他们拥有土地,或作为承租者、以基于市场现实的条款安心使用土地。英国农业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的一部分,早在18世纪,土地就几乎被视作和其他任何商品没有区别的存在。从亨利八世剥夺教会财产以来,欧洲其他各国常见的土地使用限制在英国就处于不断加速消亡的状态。1750年后,这一过程的最后一大阶段随着世纪之交的大批《圈地法案》的出炉(与谷物高价时期存在醒目的重合)而到来,此类法案剥夺了英国农民放牧、砍柴或其他传统的经济权益,将土地集中起来供私人牟利。19世纪早期英国和欧洲农业最惊人的反差之一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在英格兰几乎完全消失。英格兰有雇佣劳力和小农,但没有那种在欧洲规模巨大的农业人口。那些欧洲农民个人拥有一些(尽管微不足道)法律权利,通过集体使用权和大量极小规模的所有权建立与土地的关系。

在经济繁荣和英国社会体制所构成的大环境下,技术不断向前迈进。技术发展长期处于成败参半的状况。良种牲畜的早期饲养者之所以成功,并非缘于尚处襁褓的化学知识,亦非凭借还不存在的遗传学知识,而是紧紧依靠长久以来积累的实践经验。即便如此,其成果也相当不俗。这片土地上栖居的牲畜改头换面;中世纪瘦弱的绵羊——其背影的某些部分与收养它们的修道院的哥特式拱顶有几分相似——让位于今日所熟悉的那些肥嘟嘟、圆滚滚、看起来怡然自得的动物。"对称、

茂实”是一句18世纪农夫的祝酒词。灌溉和围篱技术取得进步,大型、开放式的中世纪田地——由狭窄的条块组成,每块由一名农夫耕种——被英国乡野上一块块方格状补丁的封闭式轮作农田取代,这些都使农村的外观发生了改变。在某些田野上,甚至1750年就有机械投入生产。18世纪期间,机械的使用和改良获得大量的精力投入,但起初似乎并没有带来产量上的太多贡献,直到进入19世纪,当越来越多的大型农田出现,机械也变得更加具有生产成本效益。不久之后,蒸汽打谷机在英国农田现身,开启了一条通往20世纪农业的道路,最终机械将基本上彻底取代人力。

这类改良和变化传播到欧洲大陆,带着一定的滞后性,也根据欧陆的情况作了因地制宜的变通。进步并不总是那么迅速,除非与过往世纪的半停滞状态相比。在卡拉布里亚或安达卢西亚,也许一个多世纪都感受不到进步的步伐。尽管如此,变化还是降临到欧洲农村,而且通过很多途径。与食品供应储备不足的状况所进行的斗争最终取得了成功,但这是数百桩胜利的综合结果,克服的对象包括一成不变的轮作制度、过时的财政安排、低下的翻耕水平和彻头彻尾的愚昧无知。这些胜利换来了更好的牲畜、更有效的动植物疾病控制、全新作物的引入和很多其他收获。这类变化涉及如此广泛的基础,还往往不得不克服社会和政治的阻力。法国于1789年正式废除农奴制;这也许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当时法国境内的农奴已经相当少见。同年,“封建体系”废除的意义则大得多。这一含混的术语代表着阻碍个人开拓土地、将土地视为通常投资对象的传统惯例和法律权利,如今这些障碍被大范围破除。几乎在第一时间,很多农民发现,他们想要的变化真正成为现实后并不完全令人称心;他们对封建制的态度是有所偏颇的。废除交给采邑领主的例行赋税是一桩乐事,但失去对公共土地的例行权利则使他们无法接受。基于贫困现象在同一时期大规模重演的事实,这一改变就整体而言更使人难以琢磨和评价。不出数年,大量之前属于教会的土地被出售给个人,由此导致土地持有者数量的激增和平均财产规模的扩大。按英国的前例判断,这应该为法国带来一个农业大发展的时代,但

事实并非如此。农业进步非常缓慢,类似英国模式的财产兼并也极少发生。

707

这恰如其分地表明,对那段历史时期的步调和共性加以概括是需要审慎和限定的。尽管德国人在19世纪40年代周游各地、展示农业机械,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德国毕竟是一个面积巨大的国家,也是某位伟大的经济史学家给出如下评价的两国(另一个是法国)之一:“概言之,在铁路时代以前,农民的生活没有发生有史可查的、普遍而彻底的改善。”然而在阻挡农业进步的中世纪体制解体后,两国确实在稳步向前,也为铁路时代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某些地区的加速发展缘于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占领军,他们以及后来的其他势力引入了法国的法律,因此到1850年,农民被土地束缚和强制劳役的现象在大部分欧洲地区已经消失。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旧制度下的观念在该体制消失后不再阴魂不散。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即使不再有合法性的支持,普鲁士、匈牙利和波兰地主在采邑中似乎依然保持着大量原有的寡头权力,而且到1914年依然如此。这些地区以较之西欧强烈而集中得多的方式来确保保守贵族价值观的延续,这一事实具有重要的意义。容克贵族常常在规划和管理名下地产时考虑市场因素,但在管理自身与佃户的关系时并不会考虑。

对农业传统法定模式的变革抵制得最为长久的是俄罗斯。该国的农奴制一直延续到1861年废除为止。此法案没有一举将俄罗斯农业整体转入个体经营和市场经济体制之下,但给欧洲历史中的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从乌拉尔到拉科鲁尼亚的整片地区,再没有合法的、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大规模土地劳动,也不再有农民依附于地主不得脱身。这是一个体系的终结,该体系从古代传承自蛮族入侵时代的西方基督教世界,也曾经是欧洲文明上千年间的基础。1861年后,欧洲所有农村的普罗大众都为工钱或食宿工作;这一伴随14世纪的农业危机首先在英格兰和法国传播的模式如今已遍及全欧。

中世纪的契约劳工形式在部分属于欧洲世界的美洲国家延续得最久。作为最绝对和彻底的强制劳动形式,奴隶制在美国部分地区直到

1865年内战结束才失去合法地位，当年，废奴法案在整个共和国生效(不过胜利方的政府在两年前就开始宣传和推广了)。该国原本十分迅速的发展势头在一定程度上被这场实现废奴运动主张的战争所拖慢，战后又得以恢复，并使美国成为对欧洲至关重要的存在。即便在战前，作为奴隶制争论所围绕的核心，棉花种植业已经表现出新大陆能够为欧洲农业提供极大规模补充的势头，具有几乎不可或缺的作用。战后，为欧洲供应其他产品的通道得以开启，不仅是棉花等欧洲不易种植的作物，还包括粮食。

708

美国(还有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阿根廷和乌拉圭)很快表明它们能够供应比欧洲廉价得多的粮食。有两点使这一状况成为可能。一是这些面积巨大的新土地现已成为欧洲的资源。美国的平原、一望无际的南美无树大草原和气候适中的大洋洲均为种植谷物和饲养牲畜提供了广袤的田地。第二点是运输革命，使这些资源首度唾手可得。从19世纪6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蒸汽机车和轮船被投入使用。运输成本迅速降低，低价格促进需求增长，又使成本下降的速度更快，于是产生了更多的利润，并作为资本投向新大陆的山脉和平原。同样的现象也在欧洲内部以较小的规模发生。19世纪70年代起，波兰和俄罗斯西部建成的铁路以及从黑海沿岸港口出发的蒸汽轮船，都能将俄罗斯的谷物以低得多的成本运到东欧和德国日渐发达的城市，使两地农夫面临竞争。到1900年，不管本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欧洲农夫的竞争舞台已经是整个世界；智利鸟粪或新西兰羊羔的价格都可以确定欧洲农民本地市场的走势。

哪怕是这样一本概要式的历史书，农业爆发式增长的历程也值得大书特书；农业首先创造出文明，随后在数千年间限定文明的发展，接着突然又成了文明的推进器，用大约百来年不到的时间向世人展示，农业可以养活的人口比过去要多得多。不断扩张的城市的需求、铁路的问世、资本的出现，都与1750至1870年间日益壮大的越洋经济体有着形影不离的相互关系。不管具有多么首当其冲的年代地位、在聚合投资资本方面发挥了多么巨大的作用，把农业在该时期的历程剥离于整

体增长之外进行叙述也只是为了方便起见，这一整体增长最明显和突出的表现是一个基于大规模工业化的新社会的完全成型。

这是另一个浩大无垠的主题，甚至要看清这一主题究竟有多庞大都不容易。工业化创造了自蛮族入侵以来欧洲历史上最惊人的变化，但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甚至更高，被视为农业、铁器或轮子问世以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变革。在相当短的时期（一个半世纪左右）内，社会的构成元素从农民和工匠转变为工人和文书。讽刺的是，这一转变源自农业大发展，却又终结了农业在古代至高无上的地位。和若干其他重要事件一起，工业化将上千年的文化演进所产生的差异化人类体验转变为一种共同经历，此后，人类还将进一步走向文化融合。

709

即便只对工业化下个定义也绝不容易，不过若干核心进程显而易见，就在我们身边。其一是用其他能源驱动的机械取代人力或畜力，并且逐步向矿物能发展。另一进展是用大得多的单元来组织生产。还有一点是制造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但这一切都具有间接和多元的影响，很快就使我们的目光远远超越其本身。虽然工业化是无数企业家和客户作出的不计其数的有意识决策的体现，但也仿佛是一种盲目的力量，以转型之力横扫社会生活的一切，一名哲学家认为这类转型力量是革命性变化的“无情执行者”之一，而这类“执行者”可以占据工业革命史的半数篇幅。工业化意味着新型的城镇，需要新的学校和新形态的高等教育，也很快形成日常和共同生活的新模式。

使此类变化得以发生的根源要回溯到近代早期。投资资本伴随着数百年的农业和商业创新过程缓慢积累，知识也不断丰富。工业化启动后，运河提供了最早的大宗运输交通网络，从 18 世纪起，欧洲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开凿运河（当然，中国的运河史是另一番光景）。但就连查理曼的手下也知道开凿的方法。即便最惊世骇俗的技术创新也深深扎根于过去。“工业革命”（19 世纪早期的法国人以此来为这个动荡而伟大的时代命名）时的人类站在无数前工业时代能工巧匠的肩膀上，是他们缓慢地发展出未来所需的技巧和经验。例如，14 世纪的莱茵兰人（Rhinelander）学会了铸铁；到 1600 年，鼓风炉的逐步普及开始移除

此前的高成本给铁制品使用带来的限制,18 世纪的一些发明使得部分加工流程可以采用煤炭取代木材作为燃料。即便以后世的标准来看创新并不算多,但廉价的铁器还是引发了研究新用途的实验热潮,并带来进一步的变化。新的需求意味着铁矿石丰产区将具有重要的地位。通过新的冶炼技术,矿物燃料取代了植物燃料,以煤矿和铁矿出产地为中心,未来的欧洲和北美工业布局开始成型。北半球拥有一条蕴藏世上大量已知煤矿储备的大环带,从顿河流域开始,途经西里西亚、洛林、英格兰北部和威尔士,直到宾夕法尼亚和西弗吉尼亚。

710

伴随着蒸汽机这一新发明的动力源,更好的金属和更丰富的煤炭为早期工业化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其源头依然非常深远。希腊时代的亚历山大里亚就有人知晓用蒸汽能驱动物体的知识。即使如某些人相信的那样,当时存在开发这一知识的技术,但限于经济条件的压力也不会是值得投入的尝试。18 世纪迎来了一系列非常重要、堪称翻天覆地的技术改进,而且当时不乏可用作投资的金钱。两相结合,创造出一种动力源,并迅速在世人心目中占据革命性的重要地位。蒸汽机不仅是煤和铁的产物,也同样消耗二者,其直接消耗方式是作为蒸汽机的燃料和制造原料。以间接的方式,蒸汽机刺激生产,使其他加工工艺成为现实,从而导致了煤铁需求的上扬。铁路建设是最显著的范例。铁轨和机车需要海量的铁——后来改为钢,但也使货物运输的成本大大降低。这些新火车所运载的很可能还是煤或铁矿,从而让远离矿产区的地方也能以低廉的价格使用这些物料。新的工业区在铁路沿线成长起来,铁路又可以将它们的产品运送到远方的市场。

铁路不是蒸汽带给运输交通的惟一变化。第一艘蒸汽机轮于 1809 年入海。到 1870 年,虽然帆船依然很多,海军也还在建造配备满帆的战舰,但采用“汽船”进行常规海运已是稀松平常。其经济效果十分夸张,海运在 1900 年的真实成本相当于一百年前的七十分之一。蒸汽机轮和铁路大幅缩减成本、运输时间和空间,推翻了传统观念中可能与不可能的概念。自从驯服马匹、发明车轮以来,货品和人员的运送速度无疑要取决于道路状况,但只要距离不是太短,每小时一至五英里大

概就是极限。走水路可以跑得更快，上千年来，伴随舰船设计和技术的大量改进，其速度可能提高了不少。但是，当人们可以在有生之年见证马背上的旅行与能够长时间保持 40 甚至 50 英里时速的火车旅行之间的差异，与此相比，过去那些缓慢的进步都显得不值一提。

如今，我们不再能享受工业时代最怡人的景观之一：高速运行中的机车用烟囱喷出长长的、绒絮般的蒸汽，在绿意盎然的田野所组成的布景上悬停数秒，然后消散无踪。初见此景，人们总是大为震撼，工业化转型的其他视觉表现也同样惊人，只是不那么美妙。最可怕的景象之一是黑烟弥漫的工业城镇，工厂的烟囱是镇上最醒目的标志，一如教堂尖顶曾是前工业时代最突出的城内建筑。工厂是如此新奇和令人叹为观止，使得人们往往未曾注意到它们是工业化早期阶段非比寻常的存在，而非什么典型的事物。直到 19 世纪中期，大部分英国产业工人依然在雇佣人数不足 50 的制造型企业内工作。长期以来，只有纺织业出现了劳动力的大规模集中；巨型棉纺厂使兰开夏郡首先形成与早期制造业城镇截然不同的视觉和城市特征，这些工厂看起来如此震撼，因为它们在当时独一无二。但到了 1850 年，显然有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加工程序朝着集中化方向发展、聚集在同一屋檐之下，这一趋势的吸引力在于降低运输成本、提高工序专门化程度、使用更强力的机械和建立有效的劳动纪律。

到 19 世纪中期，这些变化（上述的那些是其中最惊人的）只在一个国家创造出成熟的工业化社会：大不列颠。其背后有长期而无意识的准备工作作为铺垫。和平的国内环境、野心较欧陆国家更为保守的政府，都有助于投资信心的滋长。农产品盈余的进一步增加首先在英格兰实现。以两三代人所完成的重大发明为基础，凭借丰富的矿产资源，英国人可以充分开发新的技术工具。不断扩张的海外贸易带来更多可用来投资的利润，投资所需的基础金融和银行业体制在工业化之前已经就位。社会看起来已经为变革做好心理上的准备；观察者发现，18 世纪的英国人对金钱和商机格外敏感。最后，人口的增加开始同时带来劳动力和制造业商品需求的提升。以上所有推动力汇聚到一起，造

就了空前和持续的工业增长,19 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全新的、不可抗拒的现象成为这一增长最初的明显见证。到 1870 年,德国、法国、瑞士、比利时和美国都紧随其后,展现出强势和自持续性的经济增长,但英国的工厂规模和历史地位依然排在首位。对喜欢以“世界工厂”自居的英国人而言,计算那些表明工业化为他们带来多少财富和实力的数据是一桩乐事。1850 年,英国拥有的远洋船只和铁路都占到世界总量的一半。在那些铁路上,列车运行定期准点,其速度甚至到一百年后都不算太落后。规范列车运行的“时刻表”是最早的同类实例(英语也最早使用这一词汇),电报是其准确运转的依靠。乘坐列车的男女老幼在数年前还只坐过马车或货车。在 1851 年,即一场大型国际博览会于伦敦举行并向全世界昭告其新贵地位的年份,大不列颠冶炼出 250 万吨生铁。这听起来不算很多,但相当于美国的五倍和德国的十倍。那一刻,全英国的蒸汽机能够产生 120 万匹以上的马力,比欧洲总和的一半还多。

到 1870 年,各国的相对地位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大不列颠在大部分领域依然独占鳌头,但其优势并非不可企及,维持领先地位的时日也不会长久。该国依然拥有多于任何欧洲国家的蒸汽马力,但美国(1850 年就超过了英国)已经后来居上,德国也在迎头赶上。19 世纪 50 年代,德法两国都完成了英国已经实现的重要转型,炼铁所用燃料的主体从木炭转为矿物燃料。英国依然保持着制铁行业的领先地位,生铁产量一度节节上升,但当时只相当于美国产量的 3.5 倍和德国产量的 4 倍。不过这依然是巨大的优势,英国统治下的工业时代还没有完结。

与未来的形态相比,这些以大不列颠为首的工业国家尚未发育完全。到 19 世纪中期,其中只有英国和比利时的城市人口达到较高比例。1851 年的人口普查表明,英国各行各业中,农业的雇佣劳动者依然最多(只有家政行业有得一比)。但这些国家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制造业当中,新涌现的经济财富集中现象和达到新高的城市化规模都一目了然地显示了正在向前迈进的变化过程。

随着工人的涌入,整片整片地区的生活面貌发生改变;在约克郡西

区、鲁尔和西里西亚，以及无数新城镇，工厂拔地而起、烟囱高耸入云，连外观都变了样。19 世纪，这些工业区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尤其是该世纪后半叶，涌现出一个个大型城市中心，将成为后世所特指的"大都市圈"的核心。有史以来第一次，欧洲部分城市的增长不再依赖于农村的移民。要找出体现城市化程度的标志并不容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不同国家的城市区域有不同的定义，但这一进程的大方向依然是清晰的。1800 年，伦敦、巴黎和柏林各有大约 90 万、60 万和 17 万居民。1900 年，这三个数值分别为 470 万、360 万和 270 万。同年，格拉斯哥、莫斯科、圣彼得堡和维也纳的人口也都超过了百万。在这些大型城市身后，还有 16 座人口 50 万以上的欧洲城市，一百年前，能超过这一数字的只有伦敦和巴黎。这些大城市，以及虽然略小一些但比曾经让它们失色的古代名城依然大很多的城市，还在吸引大量来自农村的移民，尤其是在大不列颠和德国。这表明城市化趋势只在相对较少的国家显得突出，而那些国家正是最早开始工业化的国家，因为将工人吸引过去的是工业化带来的财富和就业机会。1900 年有 23 座人口超过 50 万的城市，四个国家占了其中的 13 座：英国(6)、德国(3)、法国(3)和比利时(1)。

人们对城市的观念经历了很多转变。18 世纪结束之际，某种向往乡村生活的情感正大行其道。这与工业化的第一阶段相重合，对城市生活之转变的审美和道德评价始于 19 世纪之初，这一转变确实展现出往往令人反感的新面貌。城市化被很多人视为不愉快乃至不健康的变化，这种舆论是一股演进力量正在发挥效力的标志。保守主义者不信任城市、惧怕城市。虽然欧洲政府展示了可以轻易控制城市骚动的能力，但此后很久，人们依然对城市投以不信任的目光，视其为可能滋生革命的巢穴。这一点也不令人吃惊，很多新兴大都市往往面貌可憎，城内穷人的境况十分可怖。如果深入伦敦东区的贫民窟，任何人都能找出贫穷、肮脏、疾病和死亡的骇人证据。一名年轻的德国商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 1844 年写下该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揭露了曼彻斯特穷人可怕的生活状况，不过很多其他英国作家也 714

被相似的主题所吸引。在法国,“危险阶级”(巴黎穷人的称谓)现象是该世纪前半叶政府所操心的话题,社会的悲惨状况引燃了 1789 至 1871 年间的一系列革命暴动。显然,惧怕城市发展会滋生对社会统治者和既得利益者的怨恨并非毫无道理,这也是一股潜在的革命势力。

预言城市将引发理念颠覆同样合乎情理。在 19 世纪,城市极大破坏了欧洲传统行为模式,也是新社会形态和理念诞生的熔炉,这是一片易于隐姓埋名的巨大丛林,任何人都能轻易躲开教士、地主和邻居刨根究底的眼神——这曾是农村社会约束力的来源。从中(尤其是当文化知识普及到中下层以后)产生的新思想开始挑战长久未受质疑的假说。19 世纪欧洲上流阶级对于城市生活倾向无神论和无信仰的表征尤其感到震惊,而普遍的应对手段之一就是兴建更多的教堂。他们觉得危在旦夕的不仅仅是宗教真理和教义的完整性(对此,上流阶级本身倒是容忍异见多年,也没有感到不适)。宗教是道德和社会既有秩序的支柱。革命作家卡尔·马克思轻蔑地称宗教为“人民的鸦片”;统治阶级当然不会采纳如此称谓,但他们也承认宗教对于社会凝聚力的重要价值。所导致的结果之一是一系列长期延续的企图,既发生在天主教国家,也发生在新教国家,其目的是找出让基督教重新占领城镇的方法。这一尝试至少在某个方面存在误解:自以为教会确实还有在城市立足的资本。实际上这些缺乏宗教氛围的城区不断蔓延滋长,就连传统教区和古村老镇的宗教机构都岌岌可危。但这些措施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从城郊工业区建起的新教堂到结合福音传道与社会服务的传教活动不一而足,使教士从中了解到现代城市生活的实际情况。到该世纪末,宗教界人士至少充分意识到了前人所没有意识到的挑战。一名伟大的英国福音传教士经过精心的推敲之后,在一本著作的标题中选用了两个词语:最黑暗的英国(*Darkest England*),[①]以此凸显传教工作

① 卜维廉《最黑暗的英国及其出路》(*In Darkest England and the Way Out*),这一书名呼应了斯坦利对非洲内陆的评价——“最黑暗的非洲”,本书作者的弦外之意也是如此。——译者注

的状况形同海外异教大陆。他给出的解答是创建一种全新的宗教宣传机构，尤其以吸引新一类的居民、对抗城市社会的弊端为己任，这就是救世军。

在这方面，工业革命的冲击再一次远远超出了物质生活的范畴。 715
我们所知范围内最早的现代文明——其核心并不是某种正式的宗教信仰体制——是如何诞生的，这是一个极难判明的复杂问题。也许，我们不能将城市打破传统宗教习规的作用与科学、哲学观念颠覆知识阶层信仰的作用彼此分割。但 1870 年的欧洲工业人口已经可以望见一个崭新的未来，其中的很多人掌握了文化知识，也疏远了传统权威，具有去宗教化的思想，并开始拥有自我存在意识。他们所构成的文明基础和以往的一切都有所不同。

虽然他们对未来的想法只是一份期待，但不无合理之处，这又一次体现了工业化给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了何等迅猛与深刻的冲击。就连生活的节奏也发生了变化。此前的全部历史中，人类大部分行为根本上受制于自然的节拍。在农业或畜牧经济下，自然条件决定了一年的步调和模式，人们必须做些什么、能够做些什么都取决于此。白天与黑夜、好天气和坏天气又把季节设定的框架划分得更细。佃农与农具、牲畜和田地形影不离，从中赢得一份口粮。即便是相对较少的城镇居民，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生活也取决于自然的力量；1850 年以后很久，一次歉收依然可以令大不列颠和法国的经济整体萎靡。但工业化以后，决定很多人生活节奏的因素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最首要的因素是生产方式及其需求——需要低成本高效率地运用机器，需要或拮据或豪爽的投资资本，需要劳力的供应。工厂是这一因素的象征，而工厂的机器则确立了离不开准确计时的工作模式。由于工业化的工作，人们开始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思考时间。

除了建立新的社会节奏之外，工业主义还将劳动者与新的工作方式联系起来。我们要避免因伤怀往日而影响对这一新工作方式的评价，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很重要。乍看之下，工厂工人的处境使人沉痛：千篇一律的作息、非人性化的管理和为他人创造利润的宿命，都给种种

反工业主义言论提供了立场，不管其形式是为手工艺人的世界已经消亡而懊丧，还是对工人与产品脱离的状况加以分析。但是，中世纪农民的生活也很单调，同样花费大量时间为他人创造利润。他们死板的工作日程并不比工人好过或舒坦，因为日出日落和雇主同样无法违抗，干旱或暴雨同商业萧条或繁荣一样变化无常。不过，无论我们将工业生产与过去相比时会作出何种评价，在这些新的严格制度之下，无数男女获得生计的方式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型。

716

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很快便臭名昭著、成为早期工业时代痼疾之一的滥用童工现象。有整整一代英国人的道德意识因废奴和随之而来的激昂感而被拔高，他们也是极度重视宗教教育的一代——因此同样重视年轻人接触宗教的一切可能障碍，又是对孩子的情感超乎前人的一代。这一切都滋长了对童工问题(最早针对英国国内)的关切，并有可能使人们忽略一个事实，即工厂残酷剥削儿童的现象只是雇佣模式全面转型的冰山一角，至于将儿童作为劳力本身则毫不新鲜。成百上千年来，欧洲的儿童一直都从事养猪、养鸟、拾穗、万用杂役、清道夫、雏妓和偶尔的苦力(大部分非欧社会也是如此)。雨果的小说名著《悲惨世界》(1862)中大量无依无靠的儿童所组成的骇人场景，就是他们在前工业化社会的写照。工业主义带来的差异在于对儿童的剥削加以规范化，并有工厂制度这一全新的压榨工具。由于力气较小，农业社会中的儿童能够承担的工作必然有别于成人，然而机器操控领域却存在一应俱全的、儿童的劳力能够直接和成人竞争的岗位。在通常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这意味着父母面临无法抵抗的压力，必须将孩子送入工厂，尽早挣得一份家计，有时从五至六岁就开始了。其后果不仅往往给受害者带来可怕的经历，还使儿童与社会的关系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也令家庭结构出现残缺。这是历史发展最面目可憎的“无情的执行者”之一。

这股力量所导致的问题相当突出，社会不可能不加关注，并很快着手遏制工业主义最显著的罪恶。到 1850 年，英格兰法律已经开始施加保护性干涉，对象包括矿场和工厂的妇女儿童；而当时，在经历了农业

基础型经济长达千年的历史后，即便是大西洋诸国也依然不可能杜绝奴隶现象。鉴于史无前例的转型规模和速度，而且病灶初期只能堪堪窥见轮廓，对早期工业化欧洲应对不够及时的指责是应当加上限定范围和条件的。哪怕在付出代价或许最为沉重的英国工业社会早期阶段，人们也难以摒弃一份信念，即不受法律干涉的经济自由是创造规模巨大的新财富不可或缺的前提，而且这一创造过程正在进行当中。

717

诚然，工业时代早期几乎找不到一名提倡绝对不干涉经济的经济理论学家和政治评论家。但确实存在一种广泛而持续的思潮，支持政府放任市场经济自由运转能带来极大的好处。人们往往用一个术语来概括推行此道的某种学术流派：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这一名词因一群法国人而出名。概言之，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越来越一致地认为，由于财富生产将加快步伐，如果遵从市场的“自然”要求来使用经济资源，人类的福祉就能得到普遍的提升。个人主义是另一个不断强化的趋势，体现为两方面，一是个人能够为自己做主、谋求自身最大利益的观点，二是社会的组织形式越来越以个人的权利和利益为中心。

工业主义和自由主义长久以来的关联就是如此产生的；保守主义者对此哀叹不已，怀念过去等级分明的农业社会体制，以及该体制背后那份责任共担的、静如止水的理念和宗教价值观。但单纯的消极和自私绝非欢迎新时代的自由主义者的写照。对“曼彻斯特学派”(此名缘于该城市对英国工商业发展的重要象征意义)的领袖来说，该学派的信念绝不仅仅是知识和修养上的自我充实。一场在19世纪早期引起英国人关注的政治大争斗明显地揭示了这一点。其焦点是废除“谷物法”，该法案是一套关税体系，意图在更为廉价的进口谷物所带来的竞争中保护英国农夫的利益。“废法派”的思想和政治领袖是不太得志的生意人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该派声称该法案给英国带来重大的损失。首先，谷物关税的保留表明传统统治阶层——农业利益集团依然掌控着立法机关，而他们不应该握有垄断大权。站在其对立面的是一些面向未来的活跃势力，他们希望解放国家经济，不受此类

特殊利益集团的扭曲。反废法者给予回应：废法派是制造业主，本身也属于特殊利益团体，反对的初衷只是想要便宜的进口食品，从而能够降低工资标准；因为，如果他们是想帮助穷人，那为何不改善工厂中妇孺的雇佣条件呢？这一立场展现了工业生产中不人道的一面，特权阶级对自己的义务漠不关心，这种态度在农业时代的英格兰是绝不会被容忍的。对此，废法派的回答是，廉价的粮食就意味着更廉价的出口商品。而且对科布登这类人而言，其中牵涉到的远远不止是利润问题。他认为，不受重商主义政府干涉的自由贸易在全球范围的扩张，将带来物质和精神双重层面的国际进步；贸易把人与人联系起来，互通有无、增进福祉，以其进步的力量使文明更加繁荣，令每个国家的国力都获得提升。科布登甚至一度坚信自由贸易是神圣意志的体现(但英国驻广州领事的言论更出格，他曾公开宣称“耶稣即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即耶稣”)。

大不列颠围绕自由贸易所展开的是非曲直(其中谷物法是争议的焦点)远非一篇简短的概述可以尽言。其含义越是明朗，以下事实就越是显然：工业主义包含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意识形态，也意味着对过去的知识、社会和政治权威构成挑战。正因如此，这不是单纯的道德判断问题，虽然当时的保守和自由派都认为这就是道德判断问题。对保护工人、禁止工时过长的立法加以抵制的人，也许同时是一位模范雇主，积极支持教育和政治改革，与败坏公共利益的特权阶级斗争。他的对手也许是一名竭力保护工厂童工的好心地主，对佃户相当仁慈，但又愤然抵制除正规教会成员以外的人士获得选举权，或反对地主阶级的政治影响力受丝毫削减。一切都极为混沌。就谷物法这一特定主题而言，结果也充满矛盾，因为一名保守派的首相最终被废法派所说服。1846年，趁着不致过于明显地打断政策连贯性的机会，他说服议会作出改变。永远都没有被同党派某些成员原谅的罗伯特·皮尔勋爵(Sir Robert Peel)凭此行为成就了自己政治生涯的巅峰，但很快就迫于保守派内部的压力辞职，却也赢得自由派对立人士的尊敬。

只有在英国，围绕该话题展开的争议才如此直截了当，其结果才如

此历历分明。有违常理的是，其他国家的保护主义者最终得偿所愿。直到该世纪中期，各国经历一段扩张与繁荣的阶段——尤其是英国经济体，自由贸易思想才在英国以外地区获得大力支持，英国的繁荣被自由贸易的信仰者视为其观点正确性的明证，甚至平息了其对手的情绪；自由贸易成为英国不容触动的政治信条，直到 20 世纪中后期才发生改变。英国经济如日中天的领导地位，帮助这一思想在其他国家也短暂地盛行了一段时间。事实上，与自由贸易理念的胜利相比，其他因素对这一时期的繁荣同样大有贡献，但放任主义者的信念助长了他们的乐观情绪。他们的学说是对人类潜力的认识不断进步的结果，其根源在于启蒙运动思想。

这一乐观主义的坚实土壤如今很容易被人忽视。评价工业化的影响时，我们没有正视工业时代以前的污秽和凄惨。不管有多少穷人和棚屋（当时最最糟糕的局面已经过去），1900 年的大城市居民比祖辈消费得更多，也活得更久。当然，这不表示那种悲惨的生活令人满足，或者以后世的标准来看可以容忍。但他们的生活往往（也很可能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比祖辈更好，比欧洲以外的同代人更好。虽然看似荒唐，可他们是人类当中少数的幸运儿，更长的寿命就是最好的证明。

二、革命时代的政治变迁

720 18世纪,"革命"一词展现出新的含义。传统中,它只代表政府构成的变化,未必具有暴力色彩(不过英国人学会相信,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其非暴力的特性)。某朝大臣被人取代就可以称作一场"革命"。1789年后,这一状况发生了变化。这一年被人们视为某种新形态革命的起点,这是一场与过去的真正决裂,也许具有暴力特征,但也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剧烈变化带来无限的可能。人们还开始想到,这一新气象可能超越国界,体现出某种无处不在的普世色彩。即便是那些对此类革命极为反感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新形态的革命是那个时代政治舞台上的一大现象。

希望用"革命"为标题来涵盖该时期的所有政治变迁确有误导之嫌。但基于两个其他原因,"革命时代"则是一个体用相宜的称谓。原因之一是这百来年间确实发生了大量政治动荡,以最极端的定义来看也属于革命,虽然其中有很多功败垂成,还有不少所带来结果与人们心中的期望大相径庭,但数量上超过了过往历史的总和。第二点在于,如果我们多赋予该词一点点弹性,允许它涵盖大大加速的基本政治变化——而这些变化无疑超出了政府更迭的范畴,那么这些年来还发生了大量戏剧性的政治变化、然则后果俨然与革命无异的政治变迁。最早也最明显的实例是大英帝国的解体,其核心篇章则是后世所谓的美

国独立战争。

1763 年，大英帝国在北美的势力正处于顶峰。他们已经从法国人手中夺走加拿大；法国人用要塞构成一环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封锁圈，包围 13 块殖民地的恐惧已烟消云散。这似乎打消了一切对未来感到不安的理由，然而甚至在法国人败北之前，部分征兆就已出现，预示着法国势力的根除不仅不会强化英国对北美的控制，反而有所削弱。毕竟，英国殖民地的人数已经超过不少欧洲国家的国民人口。其中很多人既非英国后代，也不以英语为母语。他们的经济利益未必与英帝国一致。并且单凭伦敦和殖民地之间的距离，英国政府对他们的控制就必然会松动。一旦法国人（以及他们所煽动的印第安人）的威胁被解除，英帝国和北美殖民地之间的纽带更形弛懈也许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721

难题很快出现。西部如何安置？西部与现有殖民地应为何种关系？新加入的加拿大臣民应获得何种待遇？1763 年，由于殖民者视西部为理所当然的定居和贸易领地，俄亥俄河流域的印第安人在此压力下爆发叛乱，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十万火急。帝国政府立即宣布阿利根尼山以西为禁止定居地区。以此为开端，很多希望去那片地区拓荒的殖民者开始感到不满，随后又被英国行政当局的行为进一步激化——英国当局与印第安人达成协议，划出一条派兵驻守的边界，以确保殖民者和印第安人彼此相安无事。

此后十年，美洲独立运动的潜能在蛰伏中不断酝酿，走向成熟和发端。怨言首先转化为抵制，然后是叛乱。殖民地政客反复利用令人不快的英国立法在美洲政坛煽风点火，让殖民者相信他们实际享有的自由已面临危机。而决定整个过程走向的还是英国方面主动采取的行动。矛盾的是，当时掌管大不列颠的连续几任首相都急于推行殖民地事务改革；他们的良好动机成了打破经历实践证明的既有现状的助推力。于是乎，这成了某种现象最早的实例之一，将在此后数十年频繁上演：出于良好意愿但缺乏政治判断力的行为将既得利益群体逼上梁山。

伦敦政府奉行不贰的一项原则是美洲应当提供一份相称的税收，为自身的防务和帝国整体的福祉作贡献。有两次为贯彻这一原则所采取的行动比较突出。第一次在 1764 至 1765 年，包括对殖民地进口食糖征税，[①]以及一份对各类法律文件课税以增加财收的《印花税法》。这两份法案的重要意义不在于意图征收的税额，甚至也不在于开殖民地内部交易税的先河（这一点也备受争论），而在于（英国政客和美国纳税人都看在眼里）英帝国议会的单边立法行为。此前，处理殖民地事务和开征税种的普遍方式是与殖民地议会讨价还价。而如今被打上问号的，是一个过去根本无人提及的问题：英国议会无可争议的最高立法权是否同样适用于其殖民地？暴动、抵制英货公约[②]和愤怒的抗议接踵而至。执行印花税法的倒霉官员一度度日如年。九个殖民地的代表出席印花税法案大会发表抗议，显示出不祥的预兆。该法案随即被废除。

722

于是伦敦政府改弦易辙。其第二个财政动作是对颜料、纸张、玻璃和茶叶课税。这些属于外贸税，帝国政府也一直在管制贸易，所以看起来更有可行性。但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幻想而已。当时，激进的政客已经告诉美洲人，英国议会中没有他们的席位，所以根本无权对他们征收任何税收。如乔治三世所见，受到攻击的是议会而非王室。更多骚乱和抵制随之而起，其中有一场事件，在影响深远、为去殖民化历史染上浓墨重彩的冲突中属于最早的一批，那就是 1770 年的“波士顿屠杀”，在这场被神化的骚乱中，可能有五名抗议者身亡。

英国政府再次让步。三种税收被废除，只有茶叶税保留下来。不幸的是，情况已经失控，超出了税收问题的范畴，在英国政府看来，已成为帝国议会是否有能力在殖民地贯彻法律的问题了。如乔治三世在不久后的评价所言：“若不能彻底制服，就只能完全放手。”殖民地处处都

① 即 1764 年通过的《食糖法》，旨在取缔糖和糖浆走私贸易，通过规范食糖贸易获取更多税收。——译者注

② 殖民地自由之子社和辉格党商人所组织的各类抵制英国商品的协议。——译者注

展现这一趋势，但有一个地方成为焦点。1773 年，在激进派(波士顿茶党)销毁一船茶叶后，英政府面临着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能否控制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局势？

乔治三世、其大臣和下议院多数成员都同意已经无路可退。他们通过一系列强制性法案，旨在让波士顿俯首就范。有一项强制法案一石激起千层浪，使其他殖民地在这一关键时刻对新英格兰[1]激进派报以更大的同情，那就是 1774 年的《魁北克法》，其本身是合理且人道的，也满足了加拿大未来的需要。有的人对该法赋予罗马天主教特殊地位(其本意是让改换门庭的法国裔加拿大人尽可能不受打扰，保持原来的生活)感到不满，也有人认为将加拿大边界向南扩张至俄亥俄是另一种阻碍西进的手段。同年 9 月，各殖民地代表在费城召开大陆会议，使美洲与英国的贸易关系进一步恶化，并主张废除包括《魁北克法》在内的大量现有法律。至此，诉诸武力的结局也许已无法避免。激进的殖民地政客已经在公开谈论现实意义上的独立，且很多美洲殖民者都感同身受。但要让任何 18 世纪的帝国政府理解这一状况都属于天方夜谭。事实上，在混乱难以收拾、遵纪守法的温和派殖民者广泛遭到恐吓之前，英国政府始终不愿痛下单纯依赖武力的决心。到了这一刻，殖民者显然已不会心甘情愿地服膺于主权原则之下。

723

马萨诸塞殖民地开始囤积武器。1775 年，一队英军前往列克星敦收缴其中的部分武装，从而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而战争的序章并未就此完结。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殖民地领导者们才坚信，只有以完全摆脱大不列颠争取独立的姿态才能号召起有效的抵抗，于是就诞生了 1776 年 7 月的《独立宣言》，辩论的舞台也转移到了战场。

英国输掉了此后发生的战争，因为距离过远、水土不服，因为殖民地将领成功地避免在劣势兵力下作战，将主力保存到 1777 年的萨拉托加战役，因为法国人此役过后马上加入战局，自 1763 年七年战争败北后扳回一城，也因为西班牙人随即跟进，扭转了海上的实力对比。英国

① 马萨诸塞即新英格兰的一部分。——译者注

人本身也有顾虑,恐吓美洲民众、迫使他们宁愿让英国人维持统治,从而切断华盛顿将军的部队所享有的补给和行动自由——采用这种作战方式是有机会赢得军事胜利的,但他们不敢尝试。因为他们必须保留调解和谈的余地,让殖民者再一次心甘情愿地接受英国人的统治是他们最首要的目标。在如此情况下,殖民者与波旁王朝的联盟使胜负再无悬念。军事上的决定性战役发生于 1781 年,一支英军被陆上的美洲殖民军和海上的法国舰队围困于约克城(Yorktown)。这支部队最终缴械投降,虽然只有 7 000 余人,但英军从未遭受如此奇耻大辱,也标志了帝国统治时代的终结。双方很快开始和谈,并于两年后的巴黎签724 署和约,大不列颠承认了美国的独立,并在领土划分中退让到密西西比河一线。这一决定对一个新国家的形成至关重要;曾经展望于重夺密西西比河沿岸的法国人则大失所望。从形式上看,只有西班牙和英国从起义者手中分得大陆北部的部分地盘。

尽管尚有千头万绪需要理清,还有若干边境争议数十年拖延不决,但西半球毕竟出现了一个资源潜力极大的新国家,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这都是不折不扣的革命性变化。如果说国外观察家起初往往低估美国的存在意义,那是因为这个襁褓中的国家当时所显示的弱小一面比其潜力更加醒目。实际上,美国还远远没有一个国家应有的模样;各殖民地自行其是,很多人等着看它们陷入争执、四分五裂。但他们有无法估量的巨大优势,即地理位置的偏远。他们可以在丝毫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自身的问题,这份天赐之福对以后的历史走向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打赢战争之后的六年是至关重要的时期,若干美国政治家在此期间作出的决定将给世界未来的格局造成重大的影响。就和所有内战及独立战争一样,这场战争造成了新的分歧,凸显出国家政治基础的孱弱。其中,忠王派和起义派的分歧虽然写满辛酸,但也许是最无关紧要的。这一问题不难解决,只是手段残酷——败者被赶出了家园;有大约 8 万名忠王派离开了起义殖民地。他们的动机不一而足,有的不喜欢恐吓,有的单纯不愿放弃对王室的忠诚心。其他分歧则更有可能对未

来造成困扰。农夫、商人和种植园主因阶级和经济利益各成一派。以殖民地为前身新成立的各州之间、这个迅速发展的国家内部的不同区域和行业之间,都存在重大的差异性;其中之一源自黑奴对南方各州的重要经济意义,将到几十年后才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在着手开始国家建设之际,美国人也享有巨大的优势。在很多其他国家,民主体系的演进被大量文盲和落后的农村人口拖了后腿,而美国的未来之路上不用背着这种包袱。另外,即便只计算当时占据的区域,他们也拥有广袤的领土和巨大的经济资源。最后,他们还有欧洲文明作为寄托和依靠,只需稍作改动,就能将这些文化遗产移植到一片处女地(或接近处女地)般的新大陆。

7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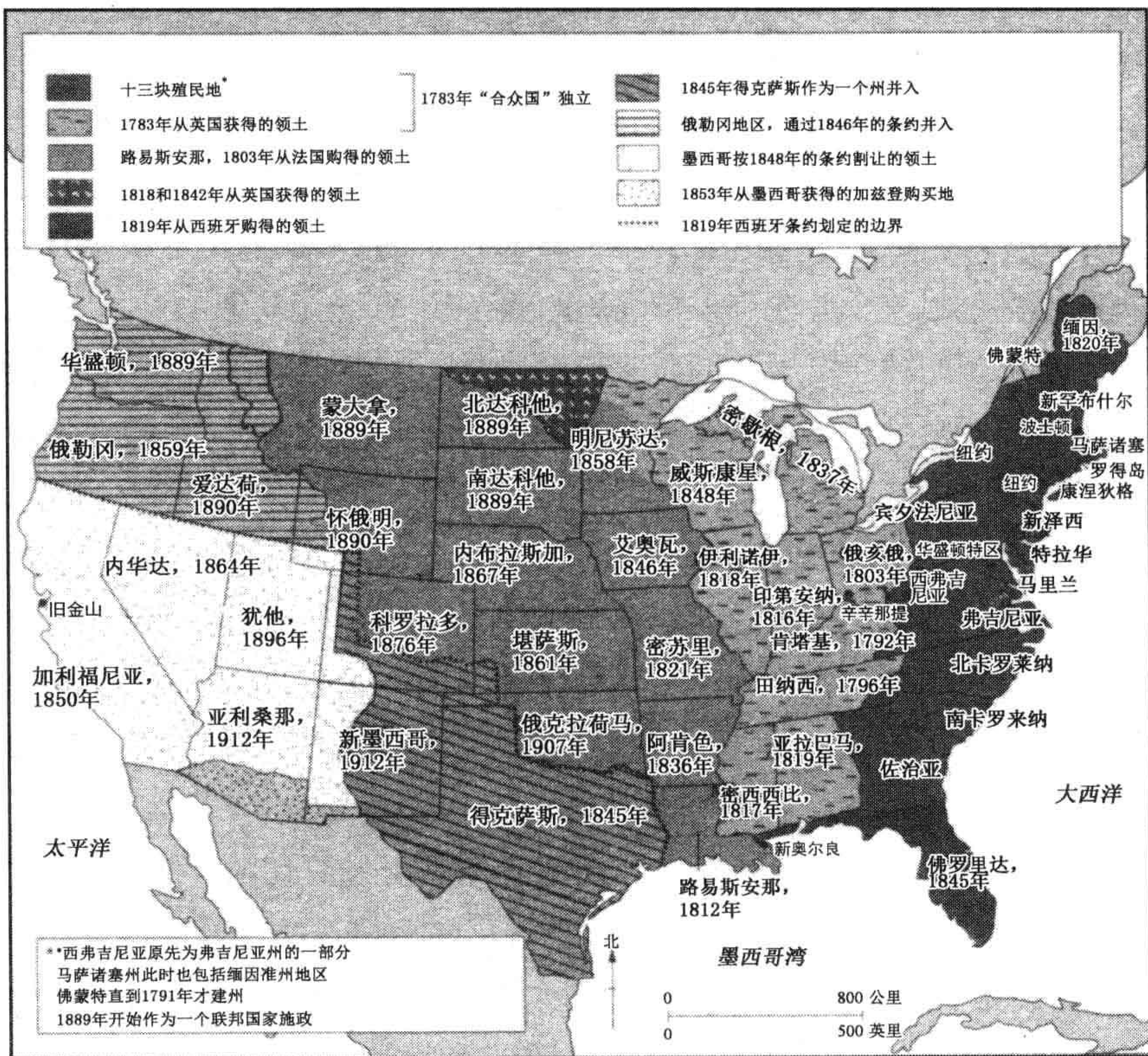
对英作战带来了一定的纪律性。前殖民地之间达成了一系列联邦条例,并于 1781 年生效。条例中出现了这一新国家的名称,即美利坚合众国。和平降临后,人们愈发感到体制上存在未竟之处,尤其有两方面特别引起关注。其一从根源上人们就工业革命对国内事务应有何意义存在分歧。很多美国人觉得中央政府过于弱势,远远不足以应对不满和无序。另一个关注点来自战后的萧条经济,这尤其影响对外贸易,也和个别州的独立所导致的货币问题挂钩。要处理这些难题,中央政府也显得捉襟见肘。人们对政府发起非难,指责他们在与别国往来时罔顾美国的经济利益。无论是否属实,人们广泛地相信这一点。于是,各州代表在 1787 年的费城召开立宪大会。经过四个月的会务工作,他们签署了一份宪法草案,并提交给各州批准。获得九个州的认可后,该宪法于 1788 年夏生效。1789 年 4 月,抗英作战中的前美国武装部队指挥官乔治·华盛顿,宣誓就任新共和国的首任总统,就此翻开了延续至今、从未间断的美国历任总统年表。

简明的体制和意图明确的原则是立宪时反复强调的要素,但新宪法在问世两百年后依然能表现出自我进化的潜力。尽管起草者下定决心,要创造一份毫无歧义、绝不可能以其他方式来解读的文件,但他们并未成功,而且这算得上是幸运的失败。美国宪法经过历史的考验,跨越了整整一个时代,该国也从以农业为主的松散社会转变为世界工业

强国和巨头。这部分源于刻意为之的宪法修正案和补充,但更大的原因是以与时俱进的方式来解读宪法所体现的精神。不过,保持原样的内容也很多,尽管往往是形式上的守成,但这些一成不变的部分是宪法非常重要的特征。此外还有一些基本原则确实传承至今,哪怕其含义大有探讨的余地。

首先从最明显的事实讲起:这部宪法属于共和制。在 18 世纪,这绝非理所当然,也并不正常。有些美国人把共和主义看得重如泰山又危如累卵,因为觉得如其中一人所言,有"滑向君主制巢窠"的倾向(特别是手握执行大权的总统一职)而不认同这部宪法。受过古典教育的欧洲人都熟悉那些古代共和国,知道它们有传说般伟岸的道德,也知道

726



美国的崛起和版图定局

它们走向衰败和分裂的命运。意大利诸共和国的历史也不能给人以信心,远远不如雅典和罗马来得光彩。18 世纪欧洲的共和制国家寥寥无几,也显然欠缺活力。共和制似乎只能在小国存续,不过观察家也承认,美国或许能凭借其偏远的位置守住这一在其他地区必然导致大国崩溃的政体,但他们对这个新生国家依然不抱乐观。因此,美国后来所取得的成功为扭转人们对共和主义的看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须臾之间,其生存力、低成本,以及自由主义——被错误地归为共和主义不可或缺的要素,引得整个文明世界的传统政府批判者都投来关注的目光。欧洲的政治变革倡导者马上向美洲寻求启迪;共和主义范例的影响力也很快从北美传播到南美。

727

新宪法的第二个重要基本特征是非常倚重英国的政治经验。这一新生国家的司法体系引入了英国的习惯法原则,此外,政府的实际编制也以英国为模板。开国元老们都在英属殖民地体系中长大,为了地方公众的利益,经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要和君主派来的总督针锋相对。他们按照英国模式设立了两院制立法机关(但排除了议员构成中的世袭要素),以制衡总统的权力。而设立总统这一政府执行机构的首脑也是对拥立君主这一英国宪政理论的遵循。就另一种意义而言,英国只有一名推选出的国王,总统制并非 18 世纪英国宪政的实际运作方式,但也相当接近其表象。事实上,开国元勋们采纳了他们所知的最好的宪政体制,去其糟粕(凡是他们所看到的),并加以适合美洲政治和社会环境的适当改动。而他们并没有效法当时欧洲的另一种政体——君主专制,哪怕是启蒙专制也未采纳。美国人写就了一部属于自由民的宪法,因为他们相信英国人就是自由的人民,英国宪法也是自由的宪法。他们认为英国宪法的失败之处仅仅在于其腐坏和滥用,还被用来剥夺美国人理应在该宪法下行使的权利。因此,有朝一日,与英国相同的政府原则(但其形式大为进化)将在这片源于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但与其文化划清界限的土地上发扬光大。

美国与当时大部分国家截然不同、并且有意和英国宪政体制分道扬镳的特色之一,是对联邦制的坚持。联邦制确实是美国的基石,因为

只有向各州的独立作出重大让步，新的统一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原先的各殖民地无意成立中央政府，免得又造出一个会像英王乔治的政府一样颐指气使的机构。联邦机构给出了这一问题的解答——合众为一。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此后 80 年间美国政治的形式和内容。一个又一个属于经济、社会或意识形态范畴的问题都将汇入一条奔流不息的辩论大潮：中央政府和各州的关系怎样才算合适。这场辩论最终几乎使合众国灭亡。联邦主义还促成了宪政体制内的一项重大修正，即最高法院这一司法审查机构的崛起。在 19 世纪，有很多国家从美国身上看到了联邦制的可取之处，对他们所实现的成就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联邦制被欧洲自由主义者视为调和统一与自由的关键手段，也被英国政府看作处理殖民地问题的绝佳备选方案。

728

最后，任何概括美国宪法的重要历史意义的文本，无论多么简短，都会提及其开场白："我们人民"（尽管当时写就这两词可能完全是无意识的行为）。有几个州在 1789 年的实际政治局面完全谈不上民主，但人民主权论的原则从一开始就掷地有声。不管任何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神话如何遮掩，这一人民意志将始终是美国政坛的最高仲裁法则。这与英国宪政实践存在根本性的不同，而与 17 世纪殖民者为自己制定的某些宪法有某种程度的渊源。英国宪政是约定俗成的产物；国王在议会中享有最高权力不是因为人民的决定，而是因为属于既成事实，也未受质疑。如伟大的英国宪政历史学家梅特兰（Maitland）所言，英国人将王室权威主义作为一种治国的替代理论方案。美国新宪法与此方针以及所有其他权威主义理论分道扬镳。（但没有脱离英国政治思想，因为洛克曾在 17 世纪 80 年代说过，政府所拥有的权力是托管性质的，如果滥用托管权，人民就可以推翻政府，而这也是英国人认同光荣革命的理由之一。）

如《独立宣言》的陈述，一切政府的正当权力都来自被管理者的认可，这一美国所接纳的民主理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这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政治权威的归属问题。很多美国人对民主心怀畏惧，从一开始就意图限制政治体系中的民粹元素。另一个问题体现在 1789 年末

的宪法前十条修正案[1]所设立的基本人权之中。可以设想,在人民主权的控制下,宪法的其他部分同样有可能发生变化。这就是未来争议的一大源头:美国人总是很容易困惑(对其他国家的事务尤甚,有时对本国内政也不例外),无法肯定民主原则是该遵循大多数人的意志、还是该维护某种基本人权。尽管如此,这部 1787 年宪法事实上接纳了民主原则,意义极为重大,也不愧为人们心目中的世界史里程碑。新成立的美国将成为此后全球世世代代的自由追求者所向往的焦点——如一名美国人留下的传世名言,这是“世上最后的希望,也是最好的希望”。[2] 即使到了今天、即使美国人本身都往往显得保守而内敛,他们长久以来所守护和标榜的民主理念依然在很多国家发扬光大,该理念所滋养和灌溉的机构和体制也依然在保持运转。

729

欧洲社会和政治话题的谈论中心是巴黎。一些法国士兵在帮助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后回到这座城市。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尽管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对大西洋彼岸的革命作出了某种程度的反应,法国人的关注表现得尤为突出。有一波滔天巨浪,经历两百多年的时光和无数前仆后继的效仿之后,被称作“惟一的法国大革命”。对此,美国所树立的典范和扬起的希望不无贡献,尽管是辅助性的。不幸的是,这一耳熟能详的简单术语并不利于理解。关于这场革命的本质,政客和学者们提出了大量不同的解读,对于革命延续了多久、结果如何,甚至何时开始,各方都有不同的见解。除了一致认为 1789 年发生的一切极为重要以外,能达成共识的地方很少。尽管其中放眼未来的成分远不如效法过去来得多,但它毕竟在极短的时间内彻底颠覆了革命一词的概念。法国社会一时翻江倒海,保守和创新元素五味陈杂,与 17 世纪 40 年代的英格兰非常相似,同样的,各种方针和追求也在有意无意间彼此纠缠,你中有我。

这一混乱是法国的物质条件和政府方针存在严重错乱及失调的症

---

① 即《权利法案》。——译者注
② 引自亚伯拉罕·林肯的国会演说。——译者注

状。作为欧洲最强大的势力,其统治者既不愿也不能放弃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美国独立战争对法国的影响首先在于提供了复仇的机会;约克城一役解了七年战争败北之痒,让英国人失去13个殖民地则多少抚慰了法国失去印度和加拿大的创伤,然而成功的代价十分高昂。这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二个重大后果:除了羞辱对手之外,法国没有得到任何像样的利益,反而使自17世纪30年代以来为建立和维护欧洲霸权而陆续背上的巨大债务又多了一笔。

730 路易十六治下的好几任大臣都试图清偿这笔债务,让君主摆脱其沉重的拖累(1783年以后,法国在外交中的实际独立地位显然因此大受制肘),这位1774年登基的年轻国王略显驽钝,不过坚持原则,也有着良好的意愿。但就连遏制赤字的增长都没有人能办到,更遑论削减规模了。更糟的是,削减债务的尝试反而将法国的颓势广而告之。赤字额可以计算,数据也会被公布,这在路易十四时期是完全不能想象的。如果说有一种恐惧在18世纪80年代的法国阴魂不散,那并不是革命,而是破产。法国的整个社会和政治结构都不利于让富裕阶层成为财政来源,而这正是必然能走出财务困境的惟一道路。路易十四时代以来的历史证明,要想对富裕阶级征取与其财富相称的税额,不诉诸武力是不可能的,因为法国的法律和社会习俗、大量特权、特殊豁免以及受此保护的约定俗成的权利都是前方的拦路虎。18世纪欧洲政府面临的困局在法国最为明显;理论上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无法侵犯本质上属于中世纪的国家宪章中所包含的自由和权利主体,否则就会动摇其自身的根基。君主制本身也是约定俗成的产物。

越来越多的法国人认为,为了摆脱困境,法国需要对政府和宪政结构加以改革。但某些人走得更远。在他们看来,政府无法让各阶层平等负担财政的无能,从根本上体现了无所不在的权力滥用,必须对此进行改革。这种无能以两极化的形式表现得愈发夸张:例如理智和迷信、自由和奴役、人道和贪婪。首当其冲的象征和焦点是法定特权问题。贵族阶级成为这一话题下的众矢之的,该群体极为多元、规模庞大(1789年的法国可能有20万至25万男性贵族),在文化、经济或社会

层面都无法一言以蔽之，但全体成员都享有某种法定身份，该身份以法律形式赋予了他们一定程度的特权。

迫于财务上的极端窘境，政府与特权阶级的冲突越来越无法避免，但很多王室阁僚本身就是贵族，自然不愿出此下策，国王本人也务求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经历一系列失败后，政府在 1788 年接受了冲突无可避免的现实，但依然希望将冲突限制在法律渠道以内，并像 1640 年的英国人那样向历史前例寻求解答。他们没有现成的议会可以依靠，便从法国宪政的故纸堆中翻出了最类似于民主议会的国家代议制团体，即三级会议。该团体由贵族、教士和平民代表组成，[①]1614 年以后就再没有召集过。法国人希望它能以德服人，从享有财政特权的阶级手中榨出更高的税金。这一宪政举措无可指责，但作为一种解决方案，其缺陷在于所受期望过高，而合法权限却定义不明。就此给出的答案不止一种。有些人已经开始呼吁让三级会议为国家制定法律，即便这意味着未受质疑的传统特权要接受拷问。

这场千头万绪的政治危机到来时，法国正处于一段困难时期的末尾，还面临着其他压力。其一是人口增长。自 18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法国的人口增长率虽然以后世的标准来看算不得快，但还是超出了粮食产量的增幅。这造成了食品价格的长期上涨，而穷人（大部分是没有或几乎没有土地的农民）最深受其苦。加上政府又同时面临财政压力，长期通过举债或直接间接的征税来避免财政危机，穷人的纳税负担又最重；为了在通胀期间保护自身利益，地主们压低薪酬、提高租金和缴费，使得穷人本就凄惨的生活在该世纪的大部分时期每况愈下。在普遍贫困之外，特定区域或阶级还反复遭遇特殊的困难，不幸的是，18 世纪 80 年代后半段恰好是这些天灾人祸的高发期。歉收、畜瘟和萧条都令 18 世纪 80 年代孱弱的法国经济更加恶化，经济的衰退对织布纺纱补贴家用的农民家庭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在上述情况的综合效果下，1789 年的三级会议成员选举是在一种充满激亢和怨愤的气氛下进

① 这是原文的词序，但一至三级依次是教士、贵族和平民。——译者注

行的。数百万法国人绝望地寻找逃离困境的道路，急于找出替罪羊来加以鞭挞，对他们所信赖的好国王有着相当不切实际的过高期待。

于是乎，在政府无能、社会不公、经济困难和改革热情的复杂互动之下，法国大革命拉开了帷幕。但是，在此后的政治斗争和简单化的标语占据人们的视线、令这种复杂性淡出视野之前，有必要强调的是，几乎没有人预估到或希望会产生那样的结果。法国社会确实充满不公，但也不比 18 世纪其他欧洲国家更多，而别的国家都能与这种不公共存。各种对特定改革的期待和倡议你方唱罢我登场，有的想废除审查制度，有的则企图查禁不道德和蔑视宗教的文学，但人人都坚信国王能轻易实现这些改变，只要他听到了人民的呼声、知道他们的愿望和需要。而革命党以及作为抗争对象的反动党却并不存在。

732

三级会议召开于 1789 年 5 月 5 日(在乔治·华盛顿宣誓就任总统后一星期)，这是世界史上重要的一天，因为法国的政党直到那天才问世，也因为那天是一个时代的开端，对法国革命是支持还是反对？这将成为大部分欧陆国家的核心政治问题之一，甚至连大不列颠和美国这两个迥然不同的政治实体也同样沾染了革命的气息。法国所发生的一切终将影响到其他地区，最单纯的原因在于法国是欧洲最强盛的势力，三级会议的效果只能二选其一：要么令国家瘫痪(也是很多别国外交官的希望)，要么使其摆脱困境，再次占据强者的地位。此外，法国也引领着欧洲的文化界。由于法语的通行地位，他国人士马上就可以了解该国文人和政客的一言一行，也必然不会等闲视之，因为各界都惯常于向巴黎寻求思想智识上的指引。

1789 年夏，三级会议自我转型为国民议会，宣称拥有最高权力。与该会议代表着中世纪社会大分裂的设想相左，其大部分成员都声称一视同仁地担任所有法国人的代表。能够迈出这革命性的一步，是因为法国的动荡局面使政府和反对变革的议员都感到惧怕。农村暴动和巴黎骚乱都是一种警示，使大臣们不再确信军队是可以依靠的对象。国王首先为此抛弃了特权阶级，然后在很多其他事项上勉为其难地作出让步，以满足新成立的国民议会的政客们所提出的要求。同时，这些

事件在大革命支持者和反对者的阵营之间划出明显的界限；在传遍全球的言论中，他们很快被称为左派和右派(基于双方在国民议会中的坐席所处的位置)。

该代议制团体为自己设立的主要使命是立宪，但在此过程中改变了法国的整个体制结构。到1791年散会时，国民议会已经将教会的土地收归国有、废除了议会所定义的"封建体系"、终结审查制度、创立了一套中央代表制政府体系，废除了旧的行省和地方区块划分，并代之以法国人至今仍在沿用的"省"制，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还将执行权和立法权分开。作为整部世界史中最突出的议会团体之一，以上只是国民议会最突出的事迹。但这些巨大的成就难免被其败笔所掩盖，而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概言之，他们为法国的现代化移除了法律和体制障碍。此后，人民主权、行政集权和法律平等将成为法国体制生活中一再援引和回顾的坐标。

733

很多法国人不能完全接受这场革命；有些人一点也不喜欢。到1791年，国王本人也明显表现出忧虑的迹象，他在革命早期所获得的支持和善意已经散去，如今背上了反革命的嫌疑。部分贵族对发生的一切极为不满，愤然移居别国；国王的两名兄弟是其中的带头人，这对王室的形象无法带来任何改善。但最重大的发展是，由于教廷的策略，国民议会对教会事务的决议引起了争议，很多法国人开始反对革命。为数众多的法国人对决议的大部分内容深表赞同，其中不乏教士，但教皇拒绝接受，于是引发了关于权威归属的终极质问。法国天主教徒们不得不决定何者为尊：是教皇的权威，还是法国的宪法。这形成了最重大的分歧，也给革命政策造成了困难。

1792年初，英国首相自信地宣称，此后15年将为和平时期是合乎理性的预期。可4月份，法国就与奥地利开战，并很快和普鲁士交火。个中缘由错综复杂，但很多法国人相信，这是境外干涉势力意图消灭革命、复辟1788年旧制度的行动。到了夏季，随着局势的恶化、国内物资的短缺和种种怀疑的出现，国王失去了人心。一场巴黎起义推翻了君主制，召集起新一届的议会，以共和主义原则起草新的宪法。直到

1796年为止,以国民公会之名载入史册的这一团体是法国政府的核心。它顶住了国内外的战争和意识形态危机,成功保住了革命的火种。大部分成员在政治观念上并不比前人高明多少。他们相信个人权利,相信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任何提议立法引入土地共产制度的倡导者都被他们判处死刑),相信贫穷是无法摆脱的现象,但也允许部分穷人获得一点话语权,支持让所有成年男性获得直选投票权。国民公会有别于前人的地方在于,到了危急关头,他们比以往的法国议会更敢于越向雷池(尤其是面临失败的可能而感到恐惧的时候);此外,他们身处于巴黎这座被极端派政客长期操控的首都,因此往往身不由己地采取了本来不愿动用的激进手段,说出了非常民主化的言论。因此,与上一届议会相比,他们给欧洲带来的恐惧要大得多。

734

1793年1月,国民公会表决通过对国王的处决令,是与过去决裂的象征。此前,以法律手段弑君一直是英国人专属的越轨行为;而今,就连英国人也和其他欧洲人一样感到震惊。而且英国也向法国开战,因为害怕法国在尼德兰对奥地利人所取得的胜利会造成对战略和贸易方面的不利后果。但这场战争越来越像是意识形态斗争,为了赢得胜利,法国政府对国内异己愈发嗜血成性。作为一种人道的新处决工具,断头台(革命以前的启蒙运动下的标志性产物,处决过程迅速而致命,是高效率的技术和仁慈相结合的产物)成为一段时期的象征,在这段马上被冠以恐怖统治之名的时期,国民公会拼命恐吓国内敌手,以保障革命的存续。但这一符号有很大的误导性。所谓的恐怖统治不乏夸张成分,政客们试图保持一种狂热的氛围,以振奋精神、威吓对手。这些恐怖的实质往往是爱国主义、务实需求、杂乱的理想主义、私心和琐碎的复仇心所搅成的一锅粥,是以共和之名对旧账的清算。当然,很多人为此丧命——也许超过3.5万人,还有很多流亡国外避难,然则受害者大多没有死于首都的断头台之下,而是毙命于各地各省的内乱,有的人死时并非手无寸铁。在18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被当时的人视为野兽的法国人所杀掉的同胞大致相当于1871年巴黎的街斗和纵火中十天的死亡人数。用另一种同样具有启发性的方式来衡量,当时全年的死亡人

数大约为1916年索姆河战役第一天英军阵亡人数的两倍。这些流血事件在法国人之间造成了深刻的分歧,但也不应夸大其程度。也许所有贵族都在大革命中遭受了损失,但只有一小部分觉得有必要逃亡。坦率地讲,教士的损失也许比贵族更大,流亡海外的神父也很多。然而这一数量比不上1783年以后逃离美洲殖民地的教士人数。美国独立之后,因为对革命感到恐惧或厌恶而非离开家园不可的美国人所占的比例,要比恐怖统治下无法继续在国内生活的法国人大得多。 735

国民公会取得胜利,镇压了国内的暴动。外战方面,到1797年,只有英国尚未与法国媾和,恐怖统治已成为过去,法兰西共和国转向更类似议会制的政体,以一部1796年生效、令国民公会成为历史的宪法为准绳。尽管革命的果实前所未有地安全,当时看起来并非如此。国外的忠王派为复辟竭力寻找盟友,也和法国内部的不满分子密谋。但鲜有法国人会欢迎旧制度的复归。另一方面,有人提出民主的逻辑应进一步大行其道,认为富人和穷人之间依然存在巨大的鸿沟,就和过去特权阶级与非特权阶级的差距一样恶劣,而且巴黎的激进派应当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对于那些从革命中得益、或是单纯希望避免更多流血的人而言,这种趋势所带来的警惕和恐惧几乎不亚于一场复辟。于是,在左右两派的挤压下,督政府(新政体的称法)以某种方式站稳了脚跟,但也因其中庸之道而树敌,那些反对者无法接受督政府所遵循的、多少显得曲折迂回的路线。最终,一群政客与士兵密谋,在1799年发动政变,从内部瓦解了督政府,并建立起新的政体。

在那一刻,距三级会议召开已有十年,至少一点是大部分观察家都确信无疑的:法兰西已永远与中世纪的过去一刀两断。这一切的法律工作完成得非常迅速。至少在理论上,几乎所有重大改革的立法工作都完成于1789年。正式废除封建制、合法特权和神权专制,以个人主义和去宗教意识为基础组织社会,就是"1789年原则"的核心。随后,从这些原则中提炼出了作为1791年宪法序言的《法国人权宣言》。法律平等、个人权利受法律保护、政教分离和宗教容忍则是这些原则的体现。人民主权所派生出的权威由一个统一的国民议会行使,任何地方

或团体的特权都不能对抗议会的立法,这是支撑其权威的法理学基础。新政体表明,自己可以经受住远比旧时代的君主无法克服的财政困难严重得多的金融风暴(其中包括国家破产和货币崩溃),也可以推行启蒙专制下只存在于梦想中的行政改革。看着这台强大的立法引擎被用来推翻和重建法国各个级别的体制,其他欧洲国家惊恐万状,至少也吃惊不小。如启蒙专制君主所知,立法至上原则是绝佳的改革工具。严刑逼供成为历史,有名无实的贵族、司法不公和旧式的法国工人行会也不复存在。通过禁止工人或雇主为共同经济利益联手的立法,刚刚冒头的贸易联合主义被遏止在萌芽状态。以后世的眼光来看,市场化社会的标志已经相当明显。甚至货币体系也推陈出新,以 1∶20∶12(里弗尔[*livres*]、索尔[*sous*]和便士[*deniers*])的兑换率为基础的加洛林体系被法郎(*francs*)和分(*centimes*)组成的十进制体系取代。混乱的旧式度量衡同样(在理论上)让位于后来几乎通行全球的公制体系。

736

如此巨大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分歧,更何况改变思想比改变法律更花时间。废除封建赋役令农民欢欣鼓舞,但取消使他们从中获益的土地集体使用权却换来不少微词,而这也是“封建”秩序的一部分。解读宗教事务中的此类保守主义尤其困难,但又非常重要。存放在兰斯(Rheims)的圣器被恐怖统治当局公开销毁,中世纪以来的历代法国国王所涂的圣油就来自其中,一座理性圣坛取代了巴黎圣母院中的基督圣坛,很多教士个人也遭到严酷的迫害。很明显,作出这一切的法国人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基督徒,大部分人都没有为神权君主的去世表示悼念。然而,教会所受对待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普遍反革命情绪,部分革命者推广的一些半神半俗的宗派,例如理性(Reason)崇拜和至高存在(Supreme Being)崇拜,遭到了彻底失败,很多法国人(也许占了女性中的大多数)都乐见于天主教正式重返法国人的生活,也确实等到了那一天。那时,教徒们早就开始自发前往教区教堂,天主教皇教生活实质上已经恢复了很久。

就和 1789 年体现的原则一样,法国革命所造成的分歧也无法被国界所限制。起初这些理念在别国备受景仰,遭到的公开谴责或怀疑并

不多见，但变化立即随之而来，尤其是当法国政府开始以政治宣传和战争的手段输出意识形态以后。法国的变化迅速在别国引发了应该何去何从的争论。此类辩论必然会反映出其兴起时所处的环境和语境。法国以这种方式向欧洲输出了自己的政治，这也是大革命十年间的第二个重大事实。现代欧洲政治从那时开始，右派和左派这两个术语也从那时起一直与我们相伴。法国大革命为政治立场的判定提供了试金石或酸碱试纸，使自由派和保守派（但还需十来年才被人们当作术语使用）成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存在。一边是共和主义，支持普选权、个人权利、言论和出版自由；另一边看重秩序和纪律，强调责任更甚权利，认同等级制度的社会功能性，并希望用道德来约束市场的力量。

737

一些法国人始终相信法国大革命具有普世的重要意义。以启蒙思想为语言，他们倡议其他国家借鉴法国人治疗自身病症的药方。这并不全然是自大的表现。工业化以前的传统欧洲社会依然有很多共同点；所有国家都能从法国身上学到些东西。以此方式，有意识的政治宣传和传教工作使法国影响力的传播得到更强有力的推动。这是法国的历史事件进入世界史篇章的另一条渠道。

不单只是仰慕者和支持者认为法国大革命具有普世的、史无前例的重要性，这一观念也是欧洲保守主义的根基和自我认识的力量源泉。早在 1789 年前，现代保守主义思想中的很多宪政元素就已经在某些现象当中涌现，例如刺激启蒙专制采取改革措施的因素、教士对特权阶级的愤慨和“先进”思想的影响，还有蔚然成风的、自觉的理性群体基于情感的反应——这一群体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核心。这类元素在德国尤其盛行，但第一份、且在很多方面也是最伟大的一份保守主义反革命宣言来自英国。这就是埃德蒙·伯克于 1790 年出版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他此前曾捍卫美国殖民者的权利，因此不难推断，这本书远非不假思索的特权辩护词。在此书中，保守主义立场摆脱了为体制进行法律辩护的窠臼，表现为某种社会理论的捍卫者，该理论下的社会不仅是意志和理性的创造物，也不仅是道德的体现。相比之下，他所谴责的大革命却体现出知识的狂妄自大、理性的贫瘠不毛，还有最致命的原

罪——自傲。

大革命给欧洲政治带来了新的两极阵营格局,这一局面又催生出关于革命本身的新观念,而且具有重大的后果。原本的概念中,政治革命只是本质上不间断的政治进程中偶尔和权宜的中断,而今,新的概念视其为一场激进的、全方位的骚乱,没有什么无法革命的体制,革命的信条也不存在限制,甚至可以颠覆家庭和财产之类最基本的社会构成。根据人们对此景象的态度是欢欣鼓舞还是惶惶不可终日,就决定了当革命作为一种普世现象登场时他们会认同还是唾弃。19 世纪之人甚至将法国大革命称为一股普世而永恒的力量,这一观念是一种至今仍未消亡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极端表达。依然有人在总体上认为,无论具体情况如何,所有起义和颠覆运动从原则上讲应获得认同或遭到谴责。这种二元论神话造成了很多悲剧,但起初是欧洲、随后是被欧洲所转变的世界,都不得不与那些对革命感情用事的人共存,正如先人不得不与愚蠢的宗教分歧共存一样。其存续以一种不幸的方式证明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依然延续至今。

有很多日子都可以选作法国大革命的"起点";而一定要找出一天作为其"终点"则没有意义。但 1799 年仍然是革命进程中具有标志性的重要年。推翻督政府的雾月政变使一人掌握大权,他迅速成为独裁者,在位至 1814 年,将欧洲秩序搅了个天翻地覆。他就是拿破仑·波拿巴,曾担任共和国将领,现在是新政体的第一执政,并很快成为法兰西第一任皇帝。和那个时代的大部分风云人物一样,他掌权时依然年轻。在军旅生涯中,他就已经展现出非凡的才华和冷酷。其胜利与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敢于以下克上的行事风格相结合,为他赢得了辉煌的声誉;在很多方面,他都是 18 世纪"冒险家"中最伟大的范例。在 1799 年,他的声威和人望已经如日中天。除了被他排挤失势的政客以外,无人对他的掌权有多少怨言。他立刻以打败奥地利人(他们又一次加入一场反法战争)的功绩给自己的权力正名,为法国赢得一份胜利者的和平(也是他的第二次)。革命所受到的威胁就此解除;没有人怀疑波拿巴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巩固革命成果是他最具有建设性的成就。

虽然拿破仑(这是他 1804 年称帝后的正式称谓)在法国复辟君主制,但这绝非任何意义上的倒行逆施。他还处心积虑地大肆羞辱流亡中的波旁家族,公开消除了双方和解的一切可能。他举行全民公投,寻求民众对帝制的认可,并得偿所愿。这一君主政体是法国人投票选择的;其基础是人民主权,也就是大革命的成果。执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的革命在拿破仑的帝政下得到了巩固。18 世纪 90 年代所有重大体制改革都获得肯定,至少也保持原样;教会财产充公后的土地出售依然按部就班地进行,遗老遗少没有死灰复燃,法律平等原则也没有被质疑。部分举措甚至还更进一步,比较突出的是每个省都配属一名省长,担任行政首脑,其权限有些类似于恐怖统治时期的临时特使(很多过去的革命家都成为省长)。此类对行政结构进一步中央集权化的举措当然也会得到启蒙专制君主的认同。在政府的实际工作中,革命的信条往往受到侵犯是不争的事实。和所有 1793 年以后的前任掌权者一样,拿破仑以一套惩罚性的审查制度控制媒体,不经审判就把人投入大牢,总体上对人权中的公民自由漠不关心。执政府和帝制下都有代议制团体存在,但没有得到多少关注。然而法国人似乎恰恰想要这种体制,也需要拿破仑对现实的敏锐洞察力,例如,他与教皇签订政教协定,向法国教会已然存在的现实授予法律认可,从而实现天主教与政体的和解。

739

归根到底,这一切极大地巩固了革命的成果,并通过坚实有力的政府和强大的军事外交控制了国内外的局势。但拿破仑巨大的军事投入最终将使两者都化为乌有。这些军事付出一度令法国成为欧洲的主宰;其军队往东一路打到莫斯科、往西一直杀到葡萄牙,从拉科鲁尼亚到什切青(Stettin)的大西洋和北海沿岸地带都有法军的营帐。然而其代价过于高昂;即便残酷压榨被占领国也不足以无限期无止境地支撑法国的霸权,并对抗欧洲所有其他国家因拿破仑狂妄的野心而结成的联盟。1812 年入侵俄国的法军在拿破仑指挥过的军队中规模空前,当他带领这支大军在冬季的风雪中走向溃败,就已经无法躲过灭亡的命运,除非对手们分崩离析。而这一次他们没有失去团结。拿破仑本人将失败归咎于英国,1792 年开始,英法几乎一直处于交战状态(在他之

前，英国也和革命政府开战），只有一次短暂的中断。他的看法并非毫无道理；这是双方在百年之争中最后的、最重要的一个回合，也是君主立宪制和军事独裁制的对决。是英国皇家海军在1798年的尼罗河战役及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战役中将拿破仑封锁于欧洲境内，是英国的财政援助帮助做好进军准备的盟友不至于捉襟见肘，是一支英军从1809年起在伊比利亚半岛坚持作战，[①]消耗了法国的资源，也给其他欧洲国家送去希望。

740

到1814年初，拿破仑能守住的只剩下法国本土。尽管他使出浑身解数，但所拥有的资源不足以抵挡东线的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联军，以及西南方向的英军进击势头。最后，将军和大臣们将他废黜并签下和约，波旁王朝就此复辟，但并没有引发普遍的抗议。而且在当时，1789年前任何具有重大意义的事物都没有重现。拿破仑和教皇签订的《教务专约》依旧有效，省制被保留，法律面前依然人人平等，代议制体系没有废除，事实上，大革命已经成了法国既有秩序的一部分。是拿破仑提供了巩固革命所需的时间、社会和平与制度。与大革命有关的一切当中，只有他认可的部分存续下来。

这使得他截然不同于传统类型的君主，甚至可能是最具现代色彩的一位。但是事实上，他的政策中也往往有非常保守的一面，对创新持怀疑态度。归根结底，他是一位民主专制君主，从形式和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其权威都源自人民，前者包括全民公投，后者是指他需要（也赢得了）民心才能驱使军队作战。因此，他的统治风格更类似20世纪的统治者而非路易十四。然而他与这位前任国王也有共同点，都将法兰西的国际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以此功绩成为国民长久仰慕的对象。但其中有一份双重的重大差异：拿破仑不但取得了路易十四从未实现的欧洲主宰权，而且由于出现在大革命之后，他的霸权不仅仅表明了法兰西民族的优越性，当然，我们不应对这一点过于感情用事。拿破仑作为解放者和欧洲伟人的形象是后世创造的传说。1800至1814

① 指1809至1814年间由惠灵顿指挥的伊比利亚半岛战役。——译者注

年间，他给欧洲带来的最明显的冲击是遍及大陆每个角落的流血和混乱，而且往往是他个人狂妄自大的产物。但也有一些意义重大的无心插柳，有些波及海外、有些没有。这一切综合起来，进一步强化了法国大革命理念的传播和效力。

从地图上能最明显地看出这些影响。在拿破仑掌权之前，如布满补丁的棉被般的欧洲版图就已经经历过革命性的修订，到 1789 年，法军又在意大利、瑞士和联合行省王国创建了新的卫星共和国。但法国扶持势力撤走后，这些国家都无力存续，直到法国霸权在执政府时期重新确立，才出现一种新的、对欧洲部分地区产生长远影响的体系。

741

拿破仑时期的欧洲

受影响最大的是德意志西部地区，其政治结构天翻地覆，中世纪基础被一扫而空。1801 至 1814 年间，莱茵河以东的德意志领土被法国吞并，就此开启了该国传统政治构架的崩坏进程。在河的另一侧，法国拿出一套重组计划，对政教合一的国家实行去宗教化、撤除几乎所有的自由城邦、将额外的领土划分给普鲁士、汉诺威和巴伐利亚以补偿三地的其他损失，还废除了古老的独立帝国贵族制。其实际效应是消除了天主教和哈布斯堡王室在德意志的影响力，同时强化了几个较大的君主国家（尤其是普鲁士）的势力。神圣罗马帝国的体制也根据这些变化进行了相应的修正。改头换面后的神圣罗马帝国仅存续到 1806 年，奥地利的又一场失败在德意志引发了更大的变动，也导致帝国的消亡。于是，一套尽管存在缺陷、但也自奥斯曼时代以来为德意志带来政治凝聚力的体制结构就此终结。莱茵邦联[①]在那时成立，成为与普鲁士和奥地利三足鼎立、制造均势的第三股势力。通过一番声势浩大的破立，法兰西以胜利者的姿态确保了本民族的利益。莱茵河成为法国的边界、对岸的德意志分裂成彼此掣肘的不同利益集团，如此光景必然会让黎塞留和路易十四陶醉不已。但从另一方面看，旧制度毕竟也是德意志统一的阻碍。后来的任何重组都从未考虑过要复辟旧制。最终，当反法联盟为后拿破仑时代的欧洲重新布局时，他们也设立起一个德意志邦联，与拿破仑组建的邦联有所区别，普鲁士和奥地利也是其中的成员，至少其领土是德意志的一部分，但德意志没有在统一的道路上开倒车。到 1815 年，1789 年的三百多个不同政体的政治单元已减少为 38 个国家。

742

意大利的版图重构不如德意志来得激烈，效果也没那么具有颠覆性。拿破仑在半岛南北各建立起一个基本独立的大型政治实体，同时有大片地区（包括梵蒂冈）被法国正式兼并，成为省级体制的一部分。这一切到 1815 年都不复存在，但旧制度也没有完全恢复。比

① 是拿破仑一世主持下、由普鲁士和奥地利以外的所有德意志各邦组成的联合体。——译者注

较突出的是，最早被督政府打入坟墓的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两个古代共和国并没有还魂重生。它们分别被撒丁王国和奥地利这两个更大的国家吞并。在欧洲各地，当拿破仑处于权势的顶峰，法兰西吞并和直接统治的领土十分广大，其北部海岸线从比利牛斯山一直延伸到丹麦，南部海岸线几乎毫无中断地从加泰罗尼亚延伸至罗马和那不勒斯的边境。还有一大片领土孤悬在外，即后来的南斯拉夫。实际独立程度各异的卫星国和附庸国瓜分了意大利其余部分、瑞士和易北河以西的德意志领土，其中的一些国家由拿破仑家族成员统治。东方还有一个脱离主要领区的卫星国，即在过去属于俄国的领土上建立的华沙"大公国"。

这些国家大多采纳类似的行政实践和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了一份共同的经历。这份经历中的体制和理念部分自然是大革命信条的体现。除了在波兰进行的短暂试验以外，易北河以东几乎没有受到影响，于是法国革命成了又一种反复出现的、令东欧和西欧走上不同道路的伟大成型力量。在法兰西帝国境内，德意志人、意大利人、伊利里亚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都受拿破仑法典的管辖；这一切能成为现实是依靠拿破仑本人的发起和坚持，但本质上还是那些革命立法家所追寻的、无法在内忧外患的18世纪90年代成为现实的、无数法国人在1789年就希望成真的法律。这部法典所涉及的家庭、财产、个人、公共权力等概念就此遍传欧洲各地。对于混乱的地方、习俗、罗马和教会法律而言，这部法典有时能取而代之、有时能作为补充。与此类似，帝国的省级体制带来了统一的行政实践，在法军服役的经历带来了一致的纪律性和军事规范，以十进制为基础的法国度量衡取代了很多地方上的标准。此类新事物的影响力超出了法国统治本身的实际范畴，为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推进者提供了范例和启迪。而且法国官员和技术人员在很多卫星国工作，也有不少法兰西以外民族的人士为拿破仑效力，使这些范例更易于被各国所吸纳。

743

此类变化需要时间才能产生充分的效果，但具有深刻性和革命性。这与自由绝无必然联系；即使人权随着法国军队的三色旗堂皇登场，拿

破仑的秘密警察、军需官和税官也一样紧随其后。一场更难以言传的革命源自拿破仑的所作所为引发的反作用和抵抗。法国人传播的革命理念往往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人民主权论是大革命的核心，也与国家主义紧密关联。根据法国革命的信念，人民应当自我统治，而国家是开展自我统治的适当实体：以此为理由，革命者宣称他们的共和国是“惟一而不可分割的”。一些国外的革命仰慕者将这一原则引入本国；显然，意大利和德国并非民族国家，但或许两国人民应该在民族国家中生活。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法国人统治的欧洲为法兰西的利益服务，从而不允许其他欧洲民族获取民族权利。各国人民眼睁睁看着本国的农商业为法国经济政策牺牲，不得不进入法军服役，或者是任由拿破仑的法国(或当地)统治者及总督摆布。当那些欢迎革命的人都开始怨声载道，从不待见革命的人也开始考虑民族抵抗运动就毫不令人惊讶了。即便政府持怀疑态度、不敢放心大胆地利用民族主义，拿破仑时代终究给欧洲的民族主义打了一针强心剂。德国人不再把自己看作单纯的威斯特伐利亚人和巴伐利亚人，意大利人开始相信自己不仅是罗马人或米兰人，因为他们从反抗法国的事业中找到了共同利益。在西班牙和俄国，爱国主义抵抗运动与反对大革命的抵抗运动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同义词。

744

可见，虽然拿破仑希望开创的王朝和所建立的帝国到头来都朝不保夕，但其所作所为意义重大。正如大革命释放出法国的能量，他也释放出其他国家被禁锢的能量，此后这些力量再也不会被完全压制。他确保了大革命遗产的效果最大化，而这就是他最伟大的成就，无论是否合乎他的向往。

他在 1814 年的无条件逊位还不是故事的结局。仅仅一年之后，这名皇帝从给他养老的流放地厄尔巴岛返回法兰西，令复辟的波旁王朝一触即溃。但反法同盟决意要推翻他，因为他曾经带来太多的恐惧。拿破仑意图在敌人聚集起压倒性优势兵力之前赢得胜利，但于 1815 年 6 月 18 日的滑铁卢战役中功败垂成，英比联军和普鲁士军队就此消除了法兰西帝国复兴的威胁。这一次，他被胜利者放逐到数千英里之外、

位于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直到 1821 年去世。他带给敌人的恐慌坚定了他们的决心,要缔造一份和平,避免任何可能重现欧洲在法国大革命的惊雷中所经历的将近三十年几无宁日的战乱的危险。就这样,拿破仑又一次影响了欧洲的版图,以前是凭借他所开创的变化,现在则是凭借法国在他领导下所带来的恐惧。

三、政治变革下的新欧洲

745 无论保守派政客在1815年抱有多大的希望,一个令人不安的动荡时代才刚刚开始。其最明显的标志是欧洲地图在此后60年中的变化。到1871年,当一个刚刚统一的新德国跻身强国之列,亚得里亚海到波罗的海一线以西的大部分欧洲国家都以民族自决原则为基础构建,依然反对的少数派也无力阻止这一切发生。甚至该分界线以东也已经出现了一些货真价实的民族国家。到1914年,民族自治还会取得更大的胜利,大部分巴尔干国家也将组建为民族国家。

作为新型政治的一方面,民族主义起源于很久以前,可以从大不列颠和一些欧洲小国在过去所设立的范式中寻找。然而其辉煌的胜利发生在1815年以后,也是新政治的表现之一。其核心是接纳一种新的思想框架,承认公共利益的存在,这份利益要大于统治者或特权阶级的私利。民族主义还认为,界定及捍卫这份利益的竞争是合法合理的。此类竞争愈发需要专门的舞台和机制;要解决当下的政治问题,古老的司法或宫廷模式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令公共生活发生这类转型的体制框架在部分国家出现得较早,在某些国家则较晚。即使在最为先进的国家,也找不出该转型惟一的实践套路。不过,它始终倾向于对特定原则的认可和推广。民族主义是其中之一,也属于对旧有理念(例如王朝统治主张)反对最激烈的原则

之一。随着19世纪的进程,有一种主张在欧洲政治演说中变得越来越常见,即某些公认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民族利益应得到政府的保护和促进。当然,这份主张从头到尾充斥着刻薄冗长的争议,争议的对象是哪些民族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如何界定他们的利益、这些利益在政治家的决策中能够且应当占据多大的权重。 746

除民族主义之外,也有其他原则在发挥作用。民主和自由主义之类的术语并不利于充分理解其内涵,但也只能将就,因为没有更好的名称,何况当时的人就是如此称呼的。在大多数国家,接纳代议制是一种普遍趋势,代议制成为让越来越多的人(哪怕只是形式上)参政的手段。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人士几乎总是要求让更多的人获得选举权,要求改善选举代表制。同样,个人主义也越来越成为经济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组织的基础。个体在社区、宗教、职业和家庭团体中的成员身份变得远远不如其个人权利来得重要。虽然这在某些方面带来了更大的自由,但有时也使人更不自由。19世纪,国家相对于人民的司法力量比过去大大增强,执行机关的技术效率逐渐提高,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实施强制力。

法国大革命是此类变革的发起者,因此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但作为范例和传奇之源,其持续的影响力也具有同样的价值。革命在1815年落下帷幕时,不管之前带来了多少希望和恐惧,它对整个欧洲的全部冲击力依然没有完全释放。在很多其他国家,已经在法国被扫清的体制招致批评和毁灭。由于经济和社会变革也在发挥效力,这类体制变得更加难以招架。革命思想和传统从中获得了新的机会。有一种感受传播甚广,认为无论是好事抑或坏事,全欧洲都面临着一场潜在的革命。受此鼓舞,革命支持者和既有秩序的未来破坏者都锐化政治话题,将它们嵌入1789年诸原则的框架: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总的来说,这些理念主导欧洲史至1870年左右,也为欧洲政治提供了内在动力。其倡导者所希望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各种理念在实际中的运用存在很多限制和前提,彼此之间频频发生阻碍和冲突,而且也面临大量敌对因素。但它们依然是可以因循的脉络,有助于理解厚重而动荡的19

世纪欧洲史，这片大陆已经成为一座试验场，其实验、爆发和发现正在改变世界其余地区的历史。

1815 年的《维也纳条约》终结了法国战争时代，在这份构成 19 世纪国际秩序格局基础的协议中，已经可以看出上述影响的作用。条约的核心目标是防止此类战争的重演。调解者力求压制法国、避免革命，他们使用正统原则这一欧洲保守主义的核心理念以及若干务实的领土安置手段来限制法国未来的扩张。于是，普鲁士在莱茵河一带获得大片土地，一个由荷兰国王统治、涵盖比利时和荷兰的北方新国出现，撒丁王国获得热那亚，奥地利不仅恢复了过去在意大利的领地，还保住了威尼斯，而且能不受干涉地控制意大利其他诸国。在上述安置方案中，正统原则常常让位于权宜的考量；混乱时期被夺走的东西并没有全部物归原主。但列强们依然把正统性挂在嘴边，也凭借完成后的安置方案取得了一些成果。将近 40 年间，维也纳会议安排的框架提供了一个不用战争就能解决争议的途径。40 年后，1815 年设立的政权大多依然存在，尽管有一些开始动摇。

747

这一局面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革命所带来的恐惧。在这段复辟时代(1815 年以后时段的称谓)，所有主要大陆国家都成了警察和密谋分子一同大显身手的舞台。秘密结社如雨后春笋，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面前毫不气馁。然而，这段历史时期的档案表明，没有什么颠覆威胁是不能轻松解决的。奥地利军队镇压了皮埃蒙特和那不勒斯的未遂政变，法国士兵扫清了一场自由派宪政运动的阻碍，将一名反动的西班牙国王推回王位，俄罗斯帝国度过了一场军事政变和一场波兰起义。奥地利人在德意志的主宰地位完全不受任何威胁，以后世的角度来看，在 1848 年以前，哈布斯堡王朝的任何领地都没有出现任何非常具有真实性的威胁。俄国和奥地利的实力是维也纳体系所依赖的两大支柱，前者有惊人的动员力，后者是 1815 至 1848 年间控制中欧和意大利的主要势力。

人们通常认为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后世的经验表明，这是非常可怕的错误，但如果仅针对 1848 年以前确实想通过革命

来改变欧洲面貌的少数人而言，那他们大体上的确打算通过推广法国革命的政治原则——代议制政府、人民主权、个人和出版自由——和民族主义的原则来达成目标。很多人把两者混为一谈；年轻的意大利人马志尼是其中最知名也最受景仰的一位。他提倡大部分同胞都不感兴趣的意大利统一主张，并为此投身于以失败告终的地下活动，从而为此后百年间每片大陆上的民族主义者和民主人士带来典范和启迪，也是以同情激进派为时尚的时髦分子所推崇的第一批偶像人物之一。但他所代表的理念属于另一个时代，当时还没有到来。 748

因为神圣同盟(用来描述三个保守国家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组成的集团)的法令在莱茵河以西无法通行，那里的情况就有所不同，正统原则并没有延续很久。1814 年波旁王朝的复辟本身就是正统原则的妥协。被囚禁在一座法国监狱中的路易十七在 1795 年死后，路易十八本来是应该像所有法国国王那样行使统治权的。而正统主义者试图隐瞒却人尽皆知的事实：他是坐在打败了拿破仑的同盟军的行李车上返回法国的。他也只能在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政界和军方精英所认同的条件下行使统治，而且可以设想，这些条件不能超出法国民众的容忍限度。复辟的政体受一部宪章约束，从而确立君主立宪体制，但选举权有所限制。个人权利得到保障，革命时期的充公和出售所形成的土地安置格局未受质疑；一切都没有回到 1789 年的状况。

尽管如此，人们对未来仍有一些疑虑；右派和左派之争从针对宪章本身的辩论开始——这是国王和人民之间的契约，抑或单纯是王室大发慈悲的产物，有多容易赐予，就有多容易撤回？——并发展为全方位的辩论，对革命的原则问题提出质疑(或者这些争论看起来像是质疑)，这一原则关系到革命为自由和有产阶级赢得的果实。

大革命的果实面临潜在的威胁。作为描述这种威胁的方式，可以说那些在旧制度下拼命想要在法兰西统治阶级中获得话语权的人已经赢了；他们有时被称为“名流显贵”，其政治地位得到保障，现在成了法兰西真正的统治者——无论是过去的法国贵族、革命时期的发迹者、拿破仑的马屁精，或是单纯的大地主和大商人。另一种变化是法国体制

中国家元素的成型;现在没有任何人或团体可以公然脱离于法国国家政府的管辖领域之外。最后也是关键的一点,大革命改变了政治思想。法国人就国内公共事务进行探讨和争论的语境已经发生变化。当然这只是政治思想改变的表现之一。无论右派和左派、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界线在哪里,如今的政治斗争必须以这条分界线为中心展开,而非围绕向神授权利的君主进言的特权展开。这恰恰是波旁王朝的末代国王查理十世未能看清的一点。他愚蠢地企图打破宪政的限制,从而构成了实质上的政变行为。人民群起反抗,在 1830 年的巴黎爆发"七月革命",自由派政客赶紧以领导者的姿态出面,并安排一名新国王取代查理,从而令共和派懊丧不已。

749

新国王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是法国王室中级别较低的分支奥尔良家族的一员,但在很多保守派眼中堪称大革命的化身。其父亲曾投票支持处决路易十六(而后自己也很快上了绞架),他本人则曾在共和主义者的军队中担任军官。他甚至一度加入臭名昭著的雅各宾俱乐部,人们普遍相信该团体涉及一场内幕极深的密谋,也无疑是若干最著名的革命领导人成长的温室。自由主义者对菲利普的好感很大程度上源自同样的理由;他让大革命与君主制下的稳定局面共存,但左翼人士对此感到失望。他统治的 18 年间,政体的宪政属性无可怀疑,政治自由从根本上得以保留,但上层阶级的利益也获得保护。该政体积极镇压城市动乱(19 世纪 30 年代的穷人发起过不少),从而与左派交恶。有一名显赫的政客叫同胞们想办法致富——这一建议饱受嘲笑和误解,而他的本意不过是告诉国民高收入乃获得投票权的一种途径(在 1830 年,拥有国家代表选举权的法国人只有英国人的三分之一左右,而法国人口大致是英国的两倍)。无论如何,就理论而言,七月王朝的基础是人民主权,也就是 1789 年的革命原则。

这使得法国在欧洲的意识形态分歧下获得一种特殊的国际地位。19 世纪 30 年代的欧洲存在一条鲜明的界线,一边是宪政国家——英格兰、法兰西、西班牙和葡萄牙——另一边是东方的正教王朝国家及其意大利和德意志卫星国。保守国家的政府并不喜欢七月革命。1830

年比利时人反抗荷兰国王的叛乱也给他们敲了警钟，但他们无法支援国王，因为英法都支持比利时人，俄国则忙于对付波兰人的起义。比利时直到1839年才确定独立地位，这是1848年以前在维也纳方案所创造的国家体系中惟一重要的变化，不过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内乱掀起了一些波澜，令欧洲外交界感到棘手。

在欧洲东南部，变革的步子迈得更快。当西欧革命迈向高潮之际，一个新的革命时代正在欧洲东南部开启。1804年，一名家境富裕的猪肉商贩领导塞尔维亚同胞在贝尔格莱德发动起义，反抗军纪废弛的土耳其守卫队。彼时，奥斯曼政权愿意容许他的所作所为，以便遏制哗变的士兵、镇压开始屠杀城内穆斯林的基督教农民。但帝国最终所承受的代价是，1817年独立的塞尔维亚君主国成立。当时，土耳其人还把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①]割让给俄国，不得不承认他们对希腊和阿尔巴尼亚大片地区的占领不过是形式上的，真正的控制权在当地帕夏手中。

750

虽然当时几乎看不出来，但这是19世纪东方问题的开端：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后的残骸应由谁、或由什么体制来继承？该问题困扰欧洲一百多年；在巴尔干和帝国的亚洲省份，奥斯曼继承战争至今仍在持续。种族、宗教、意识形态和外交问题从一开始就纠缠在一起。在奥斯曼的广大领土上，各类民族和社群的分布散乱无章，《维也纳条约》没有将这些地区纳入由列强保障的战后体系。当1821年反抗奥斯曼统治的“希腊人”(即苏丹统治下的正教基督徒，有很多是土匪和海盗)“革命”爆发时，俄国抛弃了保守主义立场，决定支持叛军。宗教因素和欧洲东南部自古以来对俄国的战略吸引力使神圣同盟不可能像支持其他君主一样地支持伊斯兰统治者，俄国人最后甚至还与苏丹开战。由外人划定国界的希腊王国于1832年成立，必然会让其他巴尔干民族产生效仿之念，而且在似是而非的民族主义呼声的鼓动下，19世纪的东方问题显然将比18世纪更加复杂。前景相当不妙，因为希腊独立战争从

① 顿涅茨河和普鲁特河之间的区域。——译者注

一开始就引发了君士坦丁堡和士麦那的土耳其人对希腊人的屠杀，希腊人也迅速以牙还牙，屠杀伯罗奔尼撒地区的土耳其人。这类后来被称作“种族清洗”的实例使延续两个多世纪的巴尔干问题从源头开始就遭到败坏。

革命事业在1848年迎来了新的爆发。简言之，1815年体系似乎面临着全方位的危机。很多地区在19世纪40年代面临经济不振、粮食短缺和各种困境，尤其是1846年发生大饥荒的爱尔兰，中欧和法国于1847年步其后尘，有很多城市因贸易不景气而饿殍枕藉。失业现象比比皆是。暴力由此滋长，使各地激进运动获得了新的尖牙利爪。骚乱具有传染性，会在别处引来效仿，削弱了国际安全体系应对更多突发状况的能力。其标志性的开端始于2月的巴黎，发现中产阶级不再支持他继续反对扩大选举权的立场之后，路易·菲利普宣布退位。到了年中，除了伦敦和圣彼得堡之外，所有欧洲大国首都的政府都被推翻或疲于招架。二月革命后，法国成立共和国，令欧洲所有革命者和政治流亡者欢欣鼓舞。密谋者30年来的梦想仿佛触手可及。伟大民族再一次行动起来，大革命的军队也许将重新进发，向世界传播革命理念。然而真正的事实却截然不同。法国作出的外交让步导致自由主义传统关注和同情的对象波兰成为牺牲品，而第二共和国惟一的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教皇，为保守主义事业而战的立场确凿无疑。

751

这是1848年革命大潮特征的体现，各地的革命有着大相径庭的背景和各不相同的目标，所遵循的路线也莫衷一是、杂乱无章。在意大利和中欧大部分地区，革命者觉得缺乏自由，从而认定政府具压迫性质并发动起义；制定保障根本自由的宪法是那片地区最具代表性的要求。就连维也纳都爆发一场如此性质的革命，1815年保守秩序的缔造者、外交大臣梅特涅(Metternich)被迫逃亡英国。革命在维也纳所取得的成功意味着整个中欧的瘫痪，从而导致该地区的解体。德意志人终于可以放手革命，无须害怕奥地利的干涉行动给小国的旧制度提供支持。奥地利领地内的其他民族同样获得了行动自由；意大利人(由一名不乏

野心但谨小慎微的撒丁保守派国王领导)在伦巴第和威尼斯向奥地利军队开战,匈牙利人在布达佩斯起义,布拉格的捷克人发起暴动。这使得局面大大复杂化。很多革命者希望获得民族独立更甚于宪政,不过宪政是王朝专制的敌人,所以一度被视为独立的手段。

如果自由主义者成功地在所有中欧国家首都建立起宪政政府,那么就会诞生一批此前本身从未具备国家结构、至少具备时间不长的民族国家。如果斯拉夫人获得民族解放,那么原本被视为德意志领土的大片土地将被他们夺走,特别是波兰和波希米亚。人们经过一段时间才完全领悟到这一点。德意志自由主义者在1848年突然意识到这一问题,并迅速得出结论,选择了民族自治的道路(一个世纪后的南蒂罗尔争端[1]中,意大利人依然在这一两难面前举棋不定)。德意志的1848年革命遭到了根本性的失败,因为德意志自由主义者认定,要实现德意志民族的自治就需要保留东方的德意志领土。因此,为了德意志民族的未来,他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普鲁士,也必须接受普鲁士的条件。还有其他迹象表明大趋势在1848年末尾将临之际逆转。例如,意大利人已经被奥地利军队控制。巴黎在6月份爆发一场起义,意图使革命朝民主的方向更进一步,但在遭到极为血腥的镇压后失败。毕竟,第二共和国是一个保守主义政体。革命在1849年走向末路。奥地利人击溃撒丁王国的军队,这是惟一能守护意大利革命的力量,亚平宁半岛各地的君主纷纷开始收回失去奥地利庇护时向宪政作出的妥协。在普鲁士的带头之下,德意志的统治者们也如法炮制。克罗地亚人和匈牙利人保持着对哈布斯堡王室的压力,但要面对前来为盟友助阵的俄国军队。

752

自由派视1848年为"民族国家的春天"。即便此言不虚,期间绽放的花朵也很快就纷纷凋零。到1849年底,尽管部分国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欧洲在很大程度上又回到1847年时的正式体制。民族主义无疑

① 南蒂罗尔本属于奥地利,一战后划归意大利,此后墨索里尼上台,在该地推行意大利化运动,并与德国产生一些争议,后因二战爆发暂时搁置。——译者注

是 1848 年广受欢迎的事业，但既没有强大到足以维持革命政府，也没有明显的启蒙作用。其失败表明，指责 1815 年时的政治家“忽视”民族主义、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是错误的；没有任何民族国家在 1848 年诞生，因为没有任何民族为此做好准备。其基本原因在于，虽然民族主义者或许存在，但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民族主义对大众而言依然是抽象的概念；只有相对较少的博学之士或至少受过一定教育的人才会在意。在社会问题也能体现出民族差异的地方，那些因语言、传统或宗教而产生某种归属感的人有时会作出有效的行动，但没有导致新民族国家的成立。例如，1847 年，在获得哈布斯堡政府同意后，加利西亚的罗塞尼亚(Ruthene)农民欢天喜地地处死了他们的波兰地主，于是得到满足，1848 年间一直忠于哈布斯堡王室。

1848 年也爆发了若干起真正具有民众基础的起义。在意大利，它们通常是城市叛乱而非农民暴动；伦巴第农民还对去而复返的奥地利军队表示欢迎，因为领导革命的贵族是他们的地主，他们看不出能从这种革命中得到什么好处。在德意志部分地区——其中大部分都保留传统的土地农业社会结构，农民们采取了和 1789 年的法国前辈一样的行动，将地主的屋宅付之一炬，这不只是出于个人私怨，也是为了毁掉令他们又恨又怕的租金、赋税和劳役记录。城内的自由主义者因此类突发事件所受到的惊吓，不亚于法国中产阶级因巴黎六月起义的走投无路者和失业者引起的暴动所受的惊吓。因为自从 1789 年以来，农民一直(大体上)属于保守主义阵营，政府确信能够获得外省的支持，碾碎为激进主义带来短暂成功的巴黎穷人。但革命运动内部也能找到保守主义痕迹。德意志工人阶级的骚动令上层阶级心生不安，但究其原因，在于德意志工人领导者虽然把“社会主义”挂在嘴边，实际上却希望恢复旧制。他们一心向往行会和学徒制下的安定世界，害怕工厂里的机器、让船夫失业的莱茵河汽船和不受限制的贸易——一言以蔽之，害怕一切一目了然的、市场经济社会兴起时所具有的标志。1848 年的大众革命几乎总能表现出自由主义对大众缺乏吸引力的事实。

753

总的来说，1848 年在社会层面的重要意义和其政治内容一样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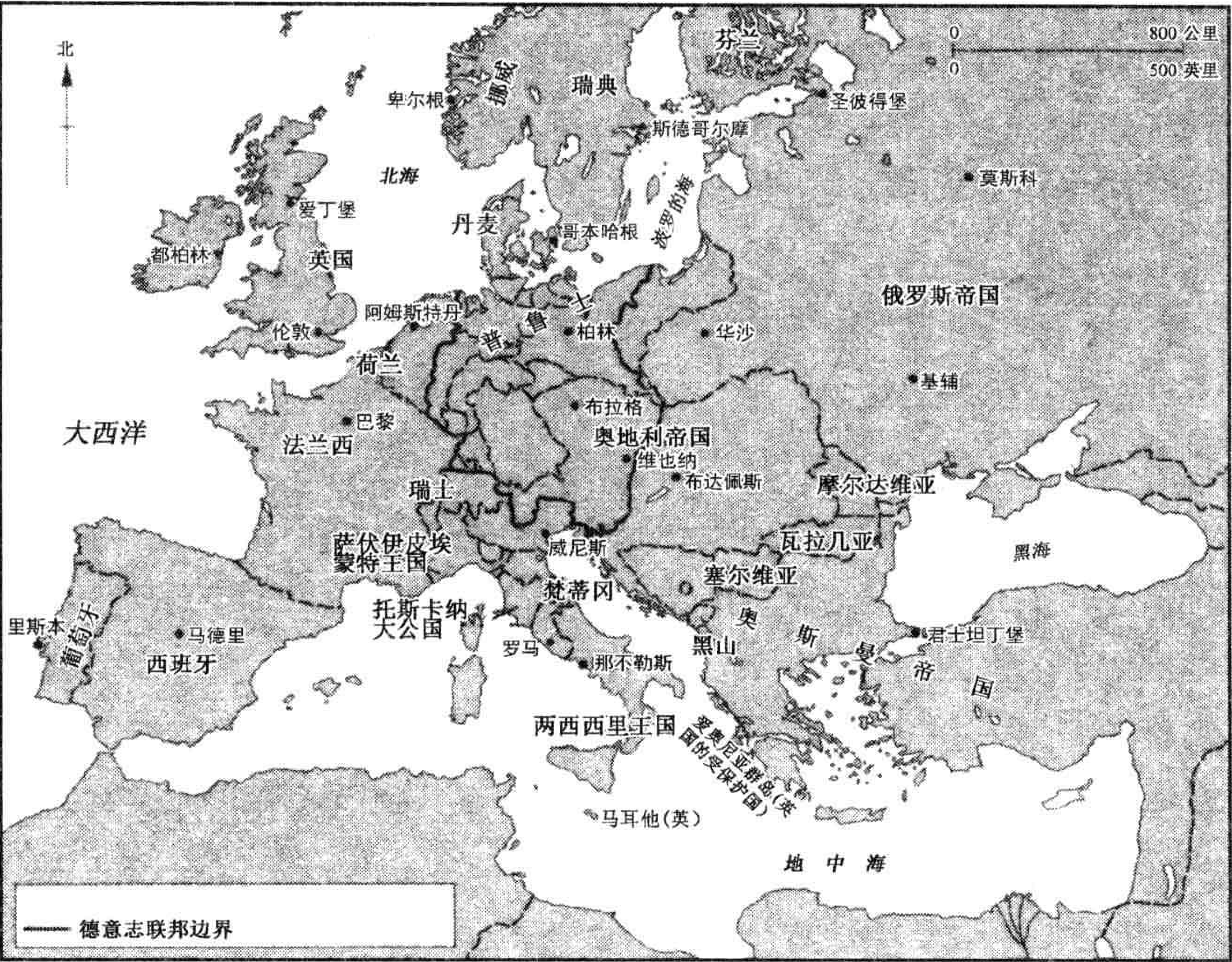
杂,也同样难加以概括。革命中,社会变化最大的地区可能是位于东欧和中欧的农村。在那里,自由主义思想和对大规模暴动的恐惧相结合,使地主作出改变。俄国以外地区所有残存的制度性农民劳役和土地束缚都因1848年的革命而废除,始于60年前的法国的那场农村社会革命在中欧和东欧的大部分地区完成收尾。以个人主义和市场原则重建德意志和多瑙河流域农业生活方式的道路已经开启。虽然很多封建做法和思维习惯依然残留,但整个欧洲的封建体制都切实走到了尽头。不过,法国革命原则中的政治元素还需更长的时间才能崭露头角。

而民族主义元素的显山露水则不用等待太久。1854年,一场针对俄国近东势力所爆发的争端终结了列强之间始于1815年的和平状态。英法两国作为奥斯曼苏丹的盟友共同对抗俄国人,克里米亚战争就此打响,这一战在很多方面都非常引人注目。战场位于俄国南部的波罗的海和克里米亚,后者是大部分关注的焦点。四国盟军[①]所设定的目标是占领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这一海上基地是俄国黑海势力的关键依托。战争的部分结果令人惊讶。英军和盟友及敌人一样作战英勇,但行政安排能力与其他国家相比尤其相形见绌;由此引发的丑闻掀起了国内激进改革的风浪,其意义十分重大。战争还无意间促成了一种受人尊敬的女性职业,那就是护士,因为英国医疗体系的崩溃特别使人震惊。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的工作为体面的女性开创了一条自黑暗时代创建的女性宗教团体以来最醒目的职业道路。另一方面,这场战争也因其现代化特征而引人注目:这是第一次动用蒸汽船和铁路的列强之战,还将电报线铺设到了伊斯坦布尔。

754

其中不乏一些不祥的预兆。但就短期而言,它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不如战争本身来得重要。俄国最终战败,一时失去了对土耳其长期具备的威慑力。再建立一个新基督教国家——罗马尼亚的设想最终于1862年成为现实。民族自决原则又一次在前奥斯曼帝国的土地上扬

① 后来撒丁王国也加入战局。——译者注



1815 年的欧洲

起胜利的旗帜。但战争的关键后果在于神圣同盟的破裂。奥斯曼帝国倒台后如何瓜分巴尔干地区是奥地利和俄罗斯在 18 世纪的老矛盾,如今再度浮出水面,奥地利一边警告俄国不得在战时占领多瑙河诸公国(这是对未来罗马尼亚的称法),一边自己把它占为己有。当时,距俄国粉碎匈牙利人的起义、扶持哈布斯堡王室归位只有五年。这是两大强国友好关系的终点。下一次,当奥地利再度面对威胁,将无法得到作为欧洲保守派警察的俄罗斯人的帮助。

755

双方于 1856 年达成和约,没有多少人料到战争会结束得如此之快。不出十年,奥地利吃到了两场短促而刻骨铭心的败仗,输掉了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霸权,新的民族国家开始在两地组建。民族自决原则确实成为了胜利者,哈布斯堡王室则是它的垫脚石,这场胜利兑现了1848 年革命者的预言,但实现的方式完全出乎意料。并非革命,而是

撒丁和普鲁士这两个传统的扩张型君主国的野心,引导两国以奥地利为垫脚石走向振兴之路,后者当时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奥地利的问题不仅是失去俄国这位盟友,而且 1852 年后,法国迎来了第二个以拿破仑为名的皇帝(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当选为第二共和国总统后,他发动政变废宪,从而登上皇位。单单拿破仑的名字就足以使人胆战心惊,这预示了一场国际范围的重组——或革命。拿破仑三世(作为拿破仑一世之子,二世有名无实,从未行使统治)号召法国人打破 1815 年设立的反法体制,也就必然要打破在意大利和德意志扶持该体制的奥地利强权。他发表的民族主义言论比大部分统治者都更彻底,看起来确实对此深信不疑。他凭借军队和外交推进了分别是撒丁和普鲁士首相的加富尔和俾斯麦这两位伟大外交大师的工作。

1859 年,撒丁王国和法国向奥地利开战;经过短暂的交锋,奥地利人在意大利的地盘就只剩下威尼斯了。加富尔着手将其他意大利邦国纳入撒丁王国版图,但代价之一是要把萨伏依割让给法国。加富尔死于 1861 年,虽然至今依然存在争议,不能确定他究竟想让国家扩张到什么地步,但到了 1871 年,他的后继者已经打造出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由前撒丁国王统治,聊作对他失去王室祖传公爵领地萨伏依的补偿。德意志也在同一年完成统一。统一进程的起点是 1864 年的普鲁士—丹麦战争,俾斯麦又一次煽动德意志民族的自由主义情感为普鲁士的利益服务,发动了这场小规模的血腥战争。两年后,普鲁士在波希米亚的一场闪电战中击败奥地利,最终为腓特烈二世在 1740 年开启的、霍亨索伦—哈布斯堡两王室争夺德意志霸权的对决画上句点。普鲁士的胜利更似对既成事实的确认,而非战争本身的成功,因为与其争夺德意志的奥地利自 1848 年以来已经大大弱化。同样在 1871 年,德意志自由派将王冠授予普鲁士国王,而非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不过 756 有一些国家仍然向维也纳寻求领导和依靠,现在也只能独力面对普鲁士盛气凌人的锋芒。哈布斯堡帝国只剩下多瑙河流域的领地,其外交的侧重点也转到了欧洲东南部及巴尔干地区。1815 年,哈布斯堡王室放弃了尼德兰,1866 年,威尼斯被普鲁士人强行划归意大利,德意志也

脱离帝国自立门户。双方议和后，匈牙利人立即借此良机，在匈牙利王室所属土地上——相当于哈布斯堡的半壁江山，获得实质性的自治地位，在王室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于是，该帝国在 1867 年成为奥地利-匈牙利双头君主国家，这种双头关系无章可循，仅余王朝本身和共同的外交作为联结的纽带。

德意志要实现统一，还需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法国人逐渐认识到，普鲁士势力向莱茵河另一侧的扩张对他们不利；如今他们面对的不再是四分五裂的德意志，而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军事强权统治下的德意志。黎塞留时代已在不知不觉间化为过眼云烟。俾斯麦利用这份心态，以及拿破仑三世在国内的软弱和在国际上的孤立，挑衅法国于 1870 年作出宣战的愚行。此战的胜利成为德意志新落成的民族主义丰碑的封顶石，因为普鲁士是“抵御”法兰西侵犯德意志的中流砥柱——而且当时，依然有活着的德意志人记得上一位拿破仑率领的法军在自己家园中的所作所为。普鲁士军队摧毁法兰西第二帝国(也是该国末代君主政体)，并创立了帝国，史称德意志第二帝国，以便和中世纪的德意志帝国相区别。虽然实质上是披着封建外衣的普鲁士大一统国家，但其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态满足了德国自由派运动的要求。1871 年，以戏剧化而又情理之中的方式，普鲁士国王在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从同侪君主们手中接过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王冠(其前任曾在 1848 年拒绝自由主义者奉上的帝位)。

于是，国际格局在不到 50 年的时间内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将对世界以及欧洲的历史产生重大影响。恰如 17 世纪的法国取代西班牙一样，德国取代法国，成为欧洲大陆上的霸主。这一事实将成为笼罩欧洲国际关系的阴霾，直到这些关系不再取决于欧洲内部局势为止。严格意义上的、狭义的政治革命对这场变化的贡献很小。19 世纪的自发自觉的革命者所取得的成就无一能够和加富尔、俾斯麦和半属身不由己的拿破仑三世相比。考虑到革命在这段时期所点燃的希望和引发的恐惧，这一点很不寻常。大革命的成果几乎仅限于欧洲边陲，而且还显出式微的征兆。回顾 1848 年，革命事件层出不穷，还有各类密谋、策划

757

及名不副实的宣言①来凑热闹。这一切到1848年后就极少见了。又一场波兰革命爆发于1863年,但除此之外,1871年以前各大国均没有发生值得关注的动乱。

可见,当时的革命势头出现衰退是可以理解的。革命在法国以外成果寥寥,给法国则带来了幻灭和独裁。而有人却以其他途径实现了革命的部分目标。加富尔及其同僚打造了一个统一的意大利,但并不是革命党能够认同的意大利,也令马志尼大受打击,俾斯麦则把1848年德意志自由主义者的很多希望变成现实,令德国成为无可争议的列强之一。另一些革命目标是通过经济发展达成的;不管有多么可怕和贫穷,19世纪欧洲毕竟在不断走向富裕,其人民分享到的份额也越来越多。其中还有相当短期的因素发挥作用。1848年后不久,加利福尼亚发现了大量金矿,输出大量金元,刺激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这几十年间的信心增长和失业减少都有利于社会的和谐。

为何革命日渐稀少?究其根本,或许是因为发动革命的困难增加了。政府发现镇压革命变得愈发轻松起来,其中科技因素占了很大的比重。现代警察诞生于19世纪。铁路和电报提供了更好的通信手段,使中央政府在应付偏远地区的叛乱时如虎添翼。而最重要的是,军队相对于起义军的技术优势不断拉大。早在1795年,当时的法国政府就以行动表明,一旦掌握并敢于使用正规军,就可以牢牢控制巴黎的局势。在1815至1848年的漫长和平时期,很多欧洲军队变得更似维稳的工具而非国际竞争的手段,其枪口的潜在目标是本国人民而非外敌。若非武装力量的重要部门存在漏洞,巴黎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成功决计难以成功;一旦政府掌握了如此实力,像1848年六月起义(某位观察家称之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奴隶战争)一般的暴动就注定会以失败收场。自那一年起,只要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力没有被战争或颠覆活动所动摇,且有诉诸武力的决心,人民革命就无法在任何欧洲国家的大城

758

① *pronunciamientos* 也常译作"起义",是由某个团体签字提出的书面抗议或请愿,明述一系列不满或要求,如政府不予理会,抗议或请愿团体就可能起兵叛乱。——译者注

市取得一场胜利。

这一点在1871年得到鲜明而血腥的写照，法国政府仅用一个星期出头的时间便粉碎了一场巴黎暴动，死于暴动者和1793－1794年间恐怖统治时期处决的人数相当。当时，一个吸纳了各类激进派和改革派的人民政权在首都自立为巴黎"公社"，此名称使人回忆起早至中世纪的市政独立传统，更具分量的前例则是1793年公社(或市政议会)，一度成为革命热情所向往的中心。1871年公社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是因为刚在德国人手中吃了败仗的法国政府为了顶住一波对巴黎的围攻而武装了这座城市，但又无法解除武装，同时也因为这场败仗令很多巴黎人怒火中烧，认定政府是失败的罪魁祸首。昙花一现的公社(政府为反扑做了几周的准备工作，所以有一段时期相安无事)几乎没有任何实绩，但孕育出大量左翼辞令，并很快被视为社会革命的化身。镇压行动因此而平添一份狠劲。政府利用遣返战俘组织武力，攻克巴黎，使城市短暂地沦为血腥的街垒战场。正规军再一次压倒工人和店主，碾碎了他们把守的、仓促搭成的街垒。

假如有什么可以打破革命的神话、消除革命带来的恐惧和鼓舞的神秘力量，那这定非巴黎公社的失败莫属。然而事实恰恰与此相反，保守派视其为很好的教训，时刻将巴黎公社铭记在心，关注着始终在社会内部暗流涌动、伺机爆发的危机。革命者则得以为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书写下新的篇章，使1789至1848年间的革命烈士所铸造的传统进一步延续。而且，因为一个已经使左右两派都受到冲击的新要素出现，公社还为革命神话注入了新的活力，那就是社会主义。

该词(如同其派生词"社会主义者")从诞生伊始就包容了大量不同的概念。两词都首先流行于1830年前后的法国，用来形容反对基于市场原则运转社会、反对基于自由放任主义运作经济的理论或人士，他们认为富人是这种社会和经济的主要获益者。经济和社会平等是社会主义理念的基础，大部分社会主义者都能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他们通常相信，一个良好的社会中不应存在利用财富占有来获取优势地位的压迫阶级。此外，所有社会主义者都同意，财产权是社会不公的支柱，

759

毫无神圣性可言;有一部分以完全废除财产权为诉求,也就是共产主义者。“财产即盗窃”[①]这句口号曾获得极大的成功。

这类思想也许令人毛骨悚然,但并不十分新鲜。纵观历史,平等主义思想一直是人类为之神往的主题,欧洲基督教统治者曾毫不费力地通过一种宗教实践让一个财富分配反差巨大的社会达成安定,其最响亮的赞歌是颂扬上帝为穷者带来拯救、向富人关闭天堂的大门。19 世纪早期的不同之处在于此类思想突然变得更加危险,其新形态与革命理念彼此相连,也传播得更为广泛。其他历史发展也催生出对新思想的需求。其中之一是自由主义政治改革的成功,表明仅仅法律平等是不够的,这种平等会由于对经济强势者的依附而徒有其表,或是由于贫穷及相伴的愚昧而改变初衷。另一种是 18 世纪若干思想家早已有之的思想,他们将财富视为与世界极不兼容的非理性存在,因为他们认为应该且能够对社会加以规范、实现大多数人的最大福祉。法国大革命中的部分思想家和煽动者就已经提出了在后世看来属于社会主义思想范畴的激进主张。不过,只有当平等主义思想与新时代的经济社会变革所带来的问题发生冲突——首当其冲的是工业化带来的问题,这份理念才会演变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这往往需要极为敏锐的洞察力,因为这些变化对英国和比利时(惟一一个工业化程度与英国相当的国家)以外地区的冲击来得非常缓慢。但或许是因为两国与传统社会的反差过于彻底,就连资本主义早期的金融和制造业的小规模集中也得到了人们的关注。这类集中化现象对社会组织具有极为重大的潜在意义,而法国贵族克洛德·圣西门(Claude Saint-Simon)是最早领悟到这一点的人之一。他考虑了技术和科技进步对于社会的影响,这对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圣西门认为,这些进步不仅令计划经济成为必然,而且还预示着(更确切地说是强迫)传统统治阶级、贵族和地主被代表新型经济和知识势力

① 来自法国社会主义者、经济学家和无政府主义创始人皮埃尔-约瑟夫·普鲁东的主张。——译者注

的精英所取代。此类观点影响了很多在 19 世纪 30 年代提倡发扬平等 760 主义的思想家(大部分是法国人);他们意图表明,基于理性和道德的双重立场,这些变化是值得期许的。在 1848 年,他们的主张造成了重大的反响,其思想流传甚广,足以令法国有产阶级恐慌,把六月起义看作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者大体上将自己定位为法国大革命传统的一部分,把实现革命理想视为下一阶段的目标,因此有产阶级的误判是可以理解的。

在决定历史进程走向的 1848 年出现了一本小册子,是社会主义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献。这就是《共产党宣言》(但出版时用了其他的标题)。本宣言大部分出自犹太血统(但本人曾受洗)的德国青年卡尔·马克思之手,以此为分水岭,社会主义的历史正式开启。马克思宣称要与他的前人、也就是他所谓的“乌托邦式社会主义”彻底决裂。乌托邦式社会主义者攻讦产业资本主义的理由是认为其中存在非正义;而马克思觉得这一点无关紧要。按他的观点,通过长篇大论使人们认同变革在道义上值得向往是绝无任何希望的。一切都取决于历史前进的方向,在这一方向下,工业社会将切实而不可避免地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工人阶级、在新的工业城市中形成无依无凭的雇佣劳动者,他将这类人统称为工业无产阶级。马克思认为,这一阶级必然会走向革命的道路。在历史的作用下,他们将产生革命的能力和意志。在历史所赋予的条件下,革命将成为惟一合乎逻辑的结果,而且必然能够成功。关键不在于资本主义在道德上站不住脚,而是它已然落后于时代,也就注定了灭亡的命运。马克思断言,任何社会都有某种特定的财产权和阶级关系体系,这些体系又形成了其特定的政治格局。政治必然是经济力量的反映。当社会组织在经济发展的影响下发生变化,政治也将随之而变,因此,就如资本主义彻底扫清封建主义一样,革命迟早会把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形态横扫一空。

马克思的思想远不止如此,但上述言论所造成的震撼和启迪已经足以令他主导此后 20 年间兴起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坚信历史站在他们一边对革命者是很大的鼓舞。不管投身革命的动机是匡扶正义还

是出于嫉妒,革命者都能从注定胜利的前景中得到宽慰。这本质上和宗教信仰没有区别。不管作为一种分析理论存在多少学术上的潜力, 761 马克思主义终究还是一份大众神话。基于一种历史观,声称人类受必然性的束缚,因为其社会体制取决于生产方式的演变,也基于一份信仰,坚信工人阶级是天选之民,将以胜利的凯旋结束在这个罪恶世界的朝圣苦旅,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让必然性的铁则就此失效。社会革命者可以从其严谨而无法推翻的论证中获得信心,相信属于社会主义的新千年必将不可阻挡地到来,但与此同时,虽然此种理论似乎让积极开展革命变得并不必要了,他们仍然坚持积极地革命。马克思本人对于自己的理论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只用它来描述宽泛的、横扫一切的、个人无法阻挡的历史变革,而非历史展开的细节。也许并不算意外的是,就和很多开山鼻祖一样,他并不认同所有的门徒,后来还拒不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种新信仰对工人阶级组织是一份鼓舞。在某些国家已经存在工会和合作社的基础上,第一个国际工人组织——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于1863年。虽然组织内有很多不支持马克思观点的人(无政府主义者是其中之一),但他的影响力还是无可匹敌,并担任协会秘书。协会的名称吓坏了保守派,其中有些人将巴黎公社的诞生归咎于它。无论理由是否充分,他们的直觉是正确的。1848年后的数年间,自由主义的革命传统被社会主义所吸收,一份对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的信念油然而生,而且这份在英格兰以外地区依然几乎不见端倪的信仰还与革命总体上必然正确的传统信念结合到一起。于是,法国大革命所孕育的政治思想形态嫁接到了其他社会,而事实证明这些思想与后者的兼容性将越来越差。马克思将巴黎公社波澜壮阔的进程和神话般的号召力嫁接到社会主义身上,从中可以看出如此移花接木的手段是多么轻而易举。他写了一本笔力千钧的小册子,将巴黎公社的一切并入自己的理论,然而事实上,这场革命是很多错综复杂、各不相同的势力相互作用的结果,表达的平等主义元素极少,更别提“科学的”社会主义。而且,爆发革命的城市虽然巨大,却并非他所预言的、能使无产阶级革命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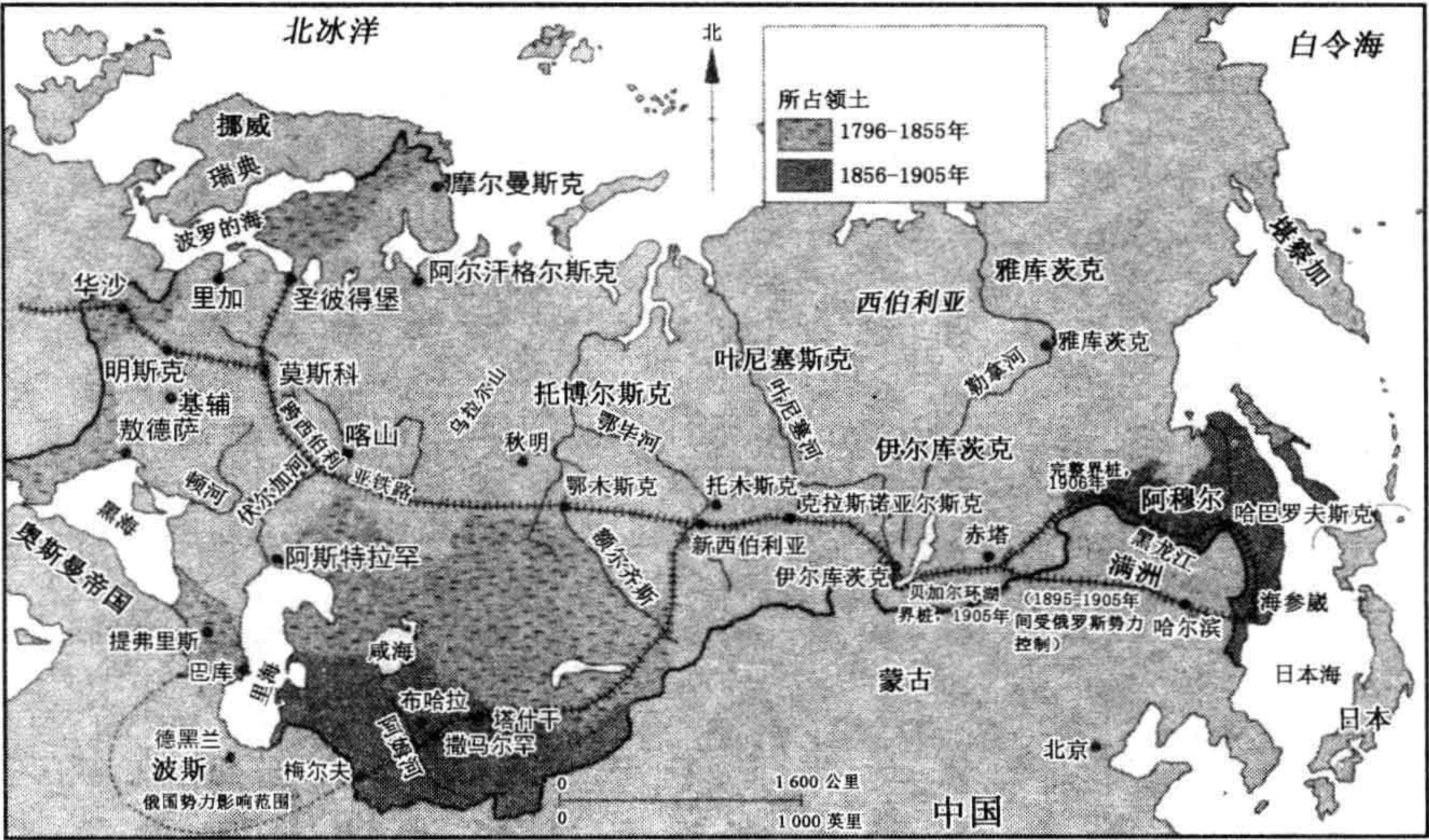
成熟的大型制造中心。恰恰相反,这些社会主义要素一直执拗地没有出现。事实上,公社是革命及巴黎激进主义传统最后也最伟大的实例。这是一场伟大的失败(社会主义也因其引发的镇压遭受挫折),然而马克思却让它成了社会主义神话的核心。

762 俄国似乎对困扰其他欧陆强国(只有波兰地区除外)的动荡免疫。法国大革命,就和封建主义、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等经历一样,对西欧的成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却忽略了俄国的存在。尽管亚历山大里亚一世这位 1812 年拿破仑入侵时的俄国沙皇曾沉迷于自由主义思想,甚至考虑过立宪,但这些事实并没有结出任何果实。俄国体制的解放直到 19 世纪 60 年代才正式开始,而且其源头也并不是革命带来的影响。诚然,在此之前,俄国也并不完全是自由主义和革命意识形态的处女地。亚历山大里亚的统治起到了宛如开启潘多拉魔盒的效果,释放出各种观点,形成一小群视西欧为典范的政体批判者。随追击拿破仑的军队前往巴黎后,部分俄国军官的所见所闻使他们对祖国感到失望;这是俄国政治反对派的起源。在一个专制国家,反对必然意味着密谋。有的人参加秘密结社组织,企图利用 1825 年亚历山大里亚死后局势未定的时期发动政变,史称"十二月党人"运动。虽然这场运动很快被粉碎,但至少令尼古拉一世惊出一身冷汗,这名沙皇对俄国的历史走向起到了决定性的负面影响,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无情地打压政治自由主义,一心想要置其于死地。部分考虑到是他令政治失去了活力,尼古拉一世的统治对俄国未来的影响超过了自彼得大帝以来的任何人。作为专制统治全心全意的信仰者,他巩固了俄国的威权主义官僚传统、对文化生活的管制和秘密警察制度,而其他保守阵营的大国无论多不情愿,当时都在向着相反的方向前进。当然,在已然令俄国专制统治有别于西欧君主制的历史传承的基础上,要改变现状确实需进行大量的工作。但面临当时的巨大挑战,尼古拉在统治期间毅然决然地采取单纯而古老的暴力专制手段作为应对措施。

俄罗斯帝国的民族、语言和地理差异性早就开始提出难题,这远远超出了莫斯科大公国时代继承下来的传统可以应付的难度。帝国人口

本身在1770年后的40年间增加了不止一倍。这个社会始终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但依旧极端落后；城市寥寥无几，在规模巨大的农村扩张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且往往显得无足轻重、朝不保夕，更像是临时的大规模营区，而非长久的文明中心。规模最大的扩张位于南部和东南部；那里的新贵们必须融入帝国体制，而强调正教的宗教纽带是最简单的融入途径之一。与拿破仑的冲突打破了法兰西光环在过去所享有的威望，使人们对该国所象征的启蒙思想产生了怀疑，在此基础上、在尼古拉统治下的俄罗斯帝国新的意识形态基础的演化进程中，宗教获得了一份新的重视。所谓的"正统理念"①以亲斯拉夫和宗教至上为基本信念、以官僚主义为形式，力求为俄罗斯恢复自从跨出作为历史中心的莫斯科大公国后就一直缺失的意识形态上的统一。

763



至1905年为止俄国的扩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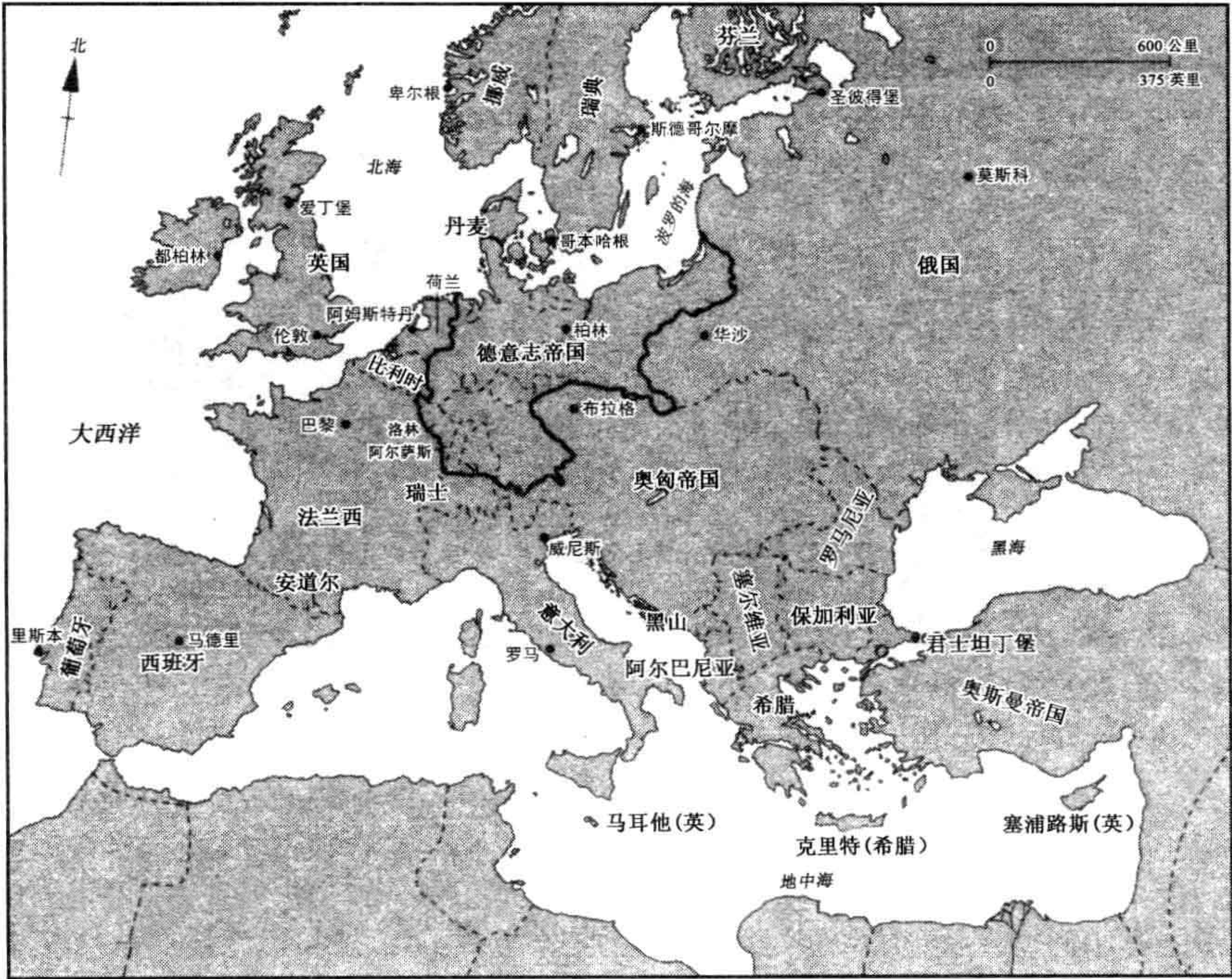
从此以后，正统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将成为俄罗斯和西欧的重大差别之一。直到20世纪最后十年，俄国政府才放弃了意识形态能有力地

① 即尼古拉一世大力推广的三位一体意识形态："信仰正教、忠于专制、民族团结"(Orthodoxy, Autocracy and Nationality)。——译者注

巩固统一的信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俄国在该世纪中期的日常生活(无论是开化阶级还是大批蒙昧民众的),与欧洲东部和中部的其他国家有很大的差别。俄国知识界则为俄国究竟是不是欧洲国家而争论不休,这也不足为奇;俄国有着与更靠西面的国家不一样的根。此外,尼古拉还导致了决定性的转折,在其统治初期的 19 世纪前半叶,其他王朝国家至少开始感受到变革的可能性,而在俄罗斯则被完全扼杀。那是一片特别擅长审查和维稳的土地。就长期而言,这必然会使一些现代化目标无法实现(但扎根于俄罗斯社会的其他障碍也同样重要),不过短期内维稳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整个 19 世纪期间,俄国未曾经历一场革命;1830 — 1831 年和 1863 — 1864 年间的俄属波兰起义遭到无情镇压,由于波兰和俄国人彼此深恶痛绝对方的传统,镇压者更可以毫无顾忌地采取残酷的手段。

764

硬币的另一面是在一个野蛮而原始的农业社会,发生几乎毫无消



公元 1914 年的欧洲

停的暴力和骚乱，以及愈发嚣张和暴力的阴谋传统，这一切或许进一步摧残了俄罗斯的常规政治实践，以及这种实践所需要的共同思维。尼古拉的统治期获得了各种恶评，被形容为冰河时代、瘟疫区和监狱，但在国内维持严酷执拗的专制统治与保持强大的国际地位并没有发生冲突，而且这不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后一次证明这一点。其基础是俄国巨大的军事优势。当军队只能装备前装枪炮、不存在至关重要的武器差距时，俄军庞大的人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 1849 年所示，俄国军事实力是国际反革命保障体系的依靠。但俄国外交政策也取得了其他方面的成功，对中亚诸可汗国和中国保持着持续的压力。黑龙江左岸成为俄国领土，海参崴于 1860 年建立。俄国迫使波斯作出巨大让步，并在 19 世纪期间吞并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一部分。他们甚至还一度决心向北美扩张并付诸行动，曾在阿拉斯加设立要塞，并于加利福尼亚北部建起一些定居点，这些设施一直保留到 19 世纪 40 年代。

765

不过，俄国外交的侧重点还是西南方，针对奥斯曼的欧洲部分。通过 1806 － 1812 年和 1828 年的两场战争，俄国边境越过比萨拉比亚，推进到普鲁特河与多瑙河河口一带。当时的局势已经一目了然，就如 18 世纪的波兰问题一样，瓜分奥斯曼帝国是 19 世纪欧洲外交的核心问题，但两者有一个重要的差异：奥斯曼问题牵扯到更多强国的利益，帝国臣民的民族情感也是一个令问题复杂化的因素，所以各方达成共识要困难得多。如后世所见，奥斯曼帝国苟延残喘的时段比人们预想的要长得多，东方问题依旧让政客们头疼不已。

其中有一些导致问题复杂化的因素引发了克里米亚战争，其开端是俄国对多瑙河下游一带奥斯曼省份的占领。这场战争对俄国内政的重要性超过了其他国家。因此战昭然若揭的事实是，这位 1815 年复活的军事巨人不再享有无可置疑的优势。在自己的领土上吃了败仗后，俄国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其后果之一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放弃了对称霸黑海地区这一传统目标的追求。幸运的是，尼古拉一世在战争期间驾崩，为继位者免去了不少麻烦。失败就意味着必须作出改变，如果俄国想再一次获得与其巨大潜力相称的实力，那么一些体制上的现代化

措施是不可避免的，这些潜力在传统制度下已不可能兑现。当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时，俄罗斯依旧没有在莫斯科以南铺设任何铁路。俄国曾经为欧洲工业生产作出过重大贡献，但自 1800 年以来在这方面已显出颓势，此时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其农业生产力依然处于全球最低下的区间，然而人口一直在稳步增长，对资源造成更加严峻的压力。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俄国最终走上激进变革的道路。虽然其过程不如欧洲其他国家的很多骚乱来得戏剧化，但事实上其革命性要胜过很多冠有革命之名的运动，因为这场变革最终动摇了俄国人生活中最根本的基础，即农奴制。

农奴制的延续是 17 世纪以后的俄国社会史显著的特征。就连尼古拉也承认农奴制是俄国社会罪恶的核心。在他统治期间，农奴起义、袭击地主、焚烧庄稼和摧残牲畜的事件变得越来越频繁。拒不履行劳役几乎是民众抵抗农奴制的方式中最无关痛痒的一种。然而这种体制已经陷入骑虎难下的极端窘境。农奴占俄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不可能单凭几道法令就一夜之间把他们转变成雇佣劳动者或小农，如果放弃采邑体系所发挥的功能，又没有可以取而代之的东西，国家也无法承担突如其来的行政重负。尼古拉不敢迈出这一步，而亚历山大里亚二世做到了。对各种废除方式可能的优劣和相关证据进行几年的研究之后，这名沙皇于 1861 年颁发敕令，标志着俄国历史一个时代的开端，也为他赢得了“解放者沙皇”的名号。无可置疑的专制权威是俄国政府可以打出的一张牌，这一次也被用到了好的方面。

766

敕令授予农奴人身自由，终结了包身工制度，也为他们定量配给土地。但这一切都需要赎金，好让地主们接受变革。为了确保赎金的收取、抵消突然引入自由劳动市场所造成的风险，农民依旧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当地乡村的社区当局，由后者负责按家庭来分配土地配额。

没过多久，这一方案的缺陷就大受诟病。然而个中情形并非三言两语可以尽言，何况以回顾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不啻是一桩巨大的成就。几年后，美国也将解放其黑奴。美国黑奴的数量远远少于俄国农奴，而且他们所在国家能提供的经济机会也大得多，然而直至一个多世

纪后的今日，将这些黑奴抛给劳动力市场、让他们暴露在纯粹的放任主义之下所造成的影响及其最终的后果，依然是美国要努力克服的困难。在俄国，这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社会改造项目没有造成与其规模相当的混乱，而且为地球上潜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打开了现代化的通道。要让农民走出农庄、寻找工业社会的就业机会，这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步。

农奴解放更直接的影响是开启了一个改革的时代；其他措施接踵而至，至 1870 年使俄国具备了地方政府组成的代议制体系，司法也得到改革。1871 年，俄国人借普法战争之机摆脱了 1856 年加诸其身的限制，恢复了在黑海地区的行动自由，这一行动给欧洲带来的警示几乎有图腾般的意味。解决了最大的难题、进入体制现代化的进程之后，俄国再一次向世人宣告——它终究还是能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进入现代史篇章后，俄国恢复其长期坚持追求的扩张政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767

四、政治变革：盎格鲁-撒克逊世界

768 至19世纪末，英国已在欧洲文明圈内创建起一个特色鲜明的小圈子，有着与欧洲大陆不同的历史走向。这个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包括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蓬勃发展的英国人群体(加拿大和南非也包含其他重要的民族群体)，其核心是两个伟大的大西洋国家，它们分别称霸19世纪和20世纪。太多的人乐于不断指出两国的差别，从中所获颇丰，所以很容易忽视年轻的英国和美国在19世纪大部分时期有着多么丰富的相同点。尽管一个为君主制、另一个采取共和制，但两国都先后躲过了欧洲大陆出现的专制主义和革命浪潮。当然，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在19世纪的政治变革与其他任何国家都同样激进。但它们既没有被改变了欧陆国家的政治力量所改变，也没有以和后者同样的方式改变。

不管彼此差别有多大，两国的共同点比它们通常所承认的更多，这是其相似性的部分来源。美国人依然可以称英格兰为母国而不觉荒唐，从中可见其微妙关系之一斑。英国文化和语言的遗产长期以来在美国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开始铺天盖地地涌入北美。虽然到该世纪中期，很多美国人(也许是大多数)的身上已经流淌着其他欧洲民族的血脉，但社会基调依然长

期由英国血统的人设定。直到1837年,美国才有了第一位不带英格兰、苏格兰或爱尔兰姓氏的总统(而下一名符合此标准的总统要到1901年才出现,迄今为止也只有四位)。

后殖民问题造成情感困扰,有时导致暴力,并始终令英美关系保持复杂的状态,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很久以后,但其意义还远不止如此。例如,这些问题与两国经济关系密不可分。分立后,两国的贸易往来不仅没有萎缩,反而节节高升。即便美国有些州政府曾拒不清偿债券,多次给他们留下了不愉快的经历,英国资本家依然觉得美国是投资的好去处。英国资本大量投入美国的铁路、银行和保险业。同时,两国统治层的精英既彼此神往,又相互排斥。一些英国人刻薄地评价美国式生活的低俗和粗鲁,但另一些人仿佛本能地从其活力、乐天和遍地的机遇中感到愉悦;美国人觉得君主制和世袭头衔难以认同,但又孜孜不倦地探究这些制度和头衔背后的英国文化和社会的奥妙和神奇。

769

从欧洲大陆的视角来看,英美两国的共性之多,比双方的巨大差异更令人震惊。归根结底,双方都成功实现了自由和民主政治,获取了令人侧目的财富和实力。虽然实现的环境大相径庭,但至少在孤立的状况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大不列颠与欧洲有海峡相隔,美国则有大西洋作为屏障。长期以来,地理上的偏远蒙蔽了欧洲人的双眼,使他们看不到这个年轻共和国的潜力和它在西部所面临的巨大机遇,对西部的开拓将成为美国民族主义最伟大的成就。1783年的和约中,英国的划境方案保护了美国的利益,使美国必然迎来一段开拓扩张时期;当时不甚明了的只是这次扩张能走得多远,会牵涉到哪些其他势力。这部分缘于地理上的无知,没有人能肯定北美西部究竟有些什么。数十年间,仅东部山脉另一侧、紧挨山脉的巨大空间就可以为扩张提供足够的土地。在1800年,人们心目中的美国依然是个限于俄亥俄河流域的大西洋沿岸国家,其实际状况也基本吻合。

起初,由于政治意义上的边界定义不明,美国被迫与法国、西班牙和英国发生外交往来。尽管如此,假如边境争端可以达成解决方案,那么美国就能获得实质上的孤立状态,因为除了贸易、保护海外同胞和外

部事件对美国内政的影响之外,不存在任何能让美国人卷入别国事务的利益点。法国大革命在短期内成了外部事件影响美国内政的实例写照,导致一番争论,但在共和国的青年时代,美国外交的侧重点几乎一直是边境和贸易问题。而且,两者都能在国内政坛引发强大的声势,往往造成分歧或潜在的分歧局面。

美国人想要置身于外部世界之外的心思在1793年就已昭然若揭,当时,法国革命战争的乱局导致《中立宣言》的诞生,声明如果美国公民参与英法战争,无论支持哪一方都将被绳之以法。这份宣言所体现出的美国政策倾向性在1796年获得了经典的定型。在华盛顿的第二届总统任期行将结束、向"友人和公民同胞"发表的告别演说中,他选择了评述成功的共和国外交政策应采取何种目标和方法这一主题,其言辞对以后的美国政治家和民族心理均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回顾历史,现在看来尤为惊人的是华盛顿的思想中压倒性的负面和悲观论调。"我们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行为",以此为开场白,他说,"应遵循一条伟大的法则,即拓展双方的贸易关系,同时尽可能避免建立任何政治关联"。

770

"欧洲有欧洲的根本利益",他继续道,"但与我们的关系非常遥远或根本没有……我们的地理位置偏远而与世隔绝,这使我们有机会和能力去追求一条不同的道路……与外部世界保持距离,不作任何永久性的结盟,这就是我们真正的政策所在"。不仅如此,华盛顿还警告同胞,不要妄想美国与其他任何国家或民族存在永恒或特别的敌对或友谊关系。从中丝毫看不出美国会成为世界强国的未来命运(华盛顿甚至都没有考虑与欧洲以外地区的关系问题;美国未来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在1796年是想都想不到的)。

总体上,华盛顿之后的各位总统确实为这个年轻的共和国采取了一种务实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外交政策。他们只与其他强国进行了一场战争,即1812年的英美战争。除了助长这一年轻共和国的民族主义情感之外,这场斗争还催生出山姆大叔这一卡通代表形象,以及后来成为美国国歌的"星条旗永不落"的谱写。更重要的是,此战是两国关系演变过程中的重大阶段性标志。战争正式的起因是英国为了对抗

拿破仑的封锁而干涉对美贸易，但部分美国人希望能随着战争的进程征服加拿大。此目标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但最终没有达成，军事扩张的失败对于后来作出与英国和平协商边境问题的决定起到很大作用。虽然战争的爆发让恐英主义在美国再次抬头，但战斗的进程（双方都有蒙羞之处）却让这种情绪烟消云散。在未来的边境争端中，英美双方达成心照不宣的谅解，除非遇到极端的挑衅，否则都不愿考虑动用战争手段。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北部边界的划定工作进展飞快，很快西至“石山”（落基山脉当时的名字），1845 年进一步抵达西海岸，关于缅因州边界的争议当时也已达成共识。

美国领土格局最重大的变化来自对路易斯安那的购买。“路易斯安那”大致相当于密西西比河与落基山脉之间的区域。1803 年，该地区多少有些有名无实地属于法国，是西班牙人在 1800 年割让给他们的。这一变动引起了美国人的关注；如果拿破仑的法兰西有意复兴法属美洲帝国，那么路易斯安那境内的新奥尔良就至关重要，因为该地控制着密西西比河河口，而该河则是美国贸易的命脉。美国开启协商的初衷是为了购买密西西比河的自由通行权，但最终买下了一整块比共和国原有面积更大的区域。在现代地图上，它包括路易斯安那州、阿肯色州、艾奥瓦州、内布拉斯加州、达科他州和明尼苏达州位于密西西比河以西部分、堪萨斯州大部分地区、俄克拉荷马州、蒙大拿州、怀俄明州和科罗拉多州的一大片区域。其购价为 1 125 万美元。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收购，也具有和规模相当的巨大影响，改变了美国历史的走向。向密西西比河对岸的西部地区进发的道路开启后，人口构成和政治平衡格局发生了变动，对年轻共和国的政治产生了事关宏旨的革命性影响。在 19 世纪 20 年代，这一变化已经显出端倪，阿利根尼山以西的常住人口增加了一倍不止。向西班牙购得佛罗里达、完成所有收购后，1819 年的美国对以如下地理坐标为边界的领土拥有主权：大西洋至墨西哥湾岸连线、缅因河至萨宾河连线、雷德河至阿肯色河连线、北美大陆分水岭和与英国协商划定的北纬 49°平行线。

美国当时已经成为美洲最重要的国家。虽然欧洲人还控制着一些地盘，但就如英国人在战争中发现的那样，他们必须投入巨大的努力才能挑战这一现状。尽管如此，欧洲干涉拉美的可能性以及俄国在太平洋西北部的活动所引发的警惕心，令美国表明了该共和国要主宰这片西半球栖息地的决心。这就是1823年发表的"门罗主义"，声称今后不接受欧洲在西半球的一切殖民，欧洲势力对美国事务的干涉将被视为不友好的举动。由于符合英国的利益，门罗主义的推行没有遇到多少困难。英国皇家海军以心照不宣的方式为门罗主义提供保障，如果要和英国海军为敌，任何欧洲势力都无法明目张胆地在美洲采取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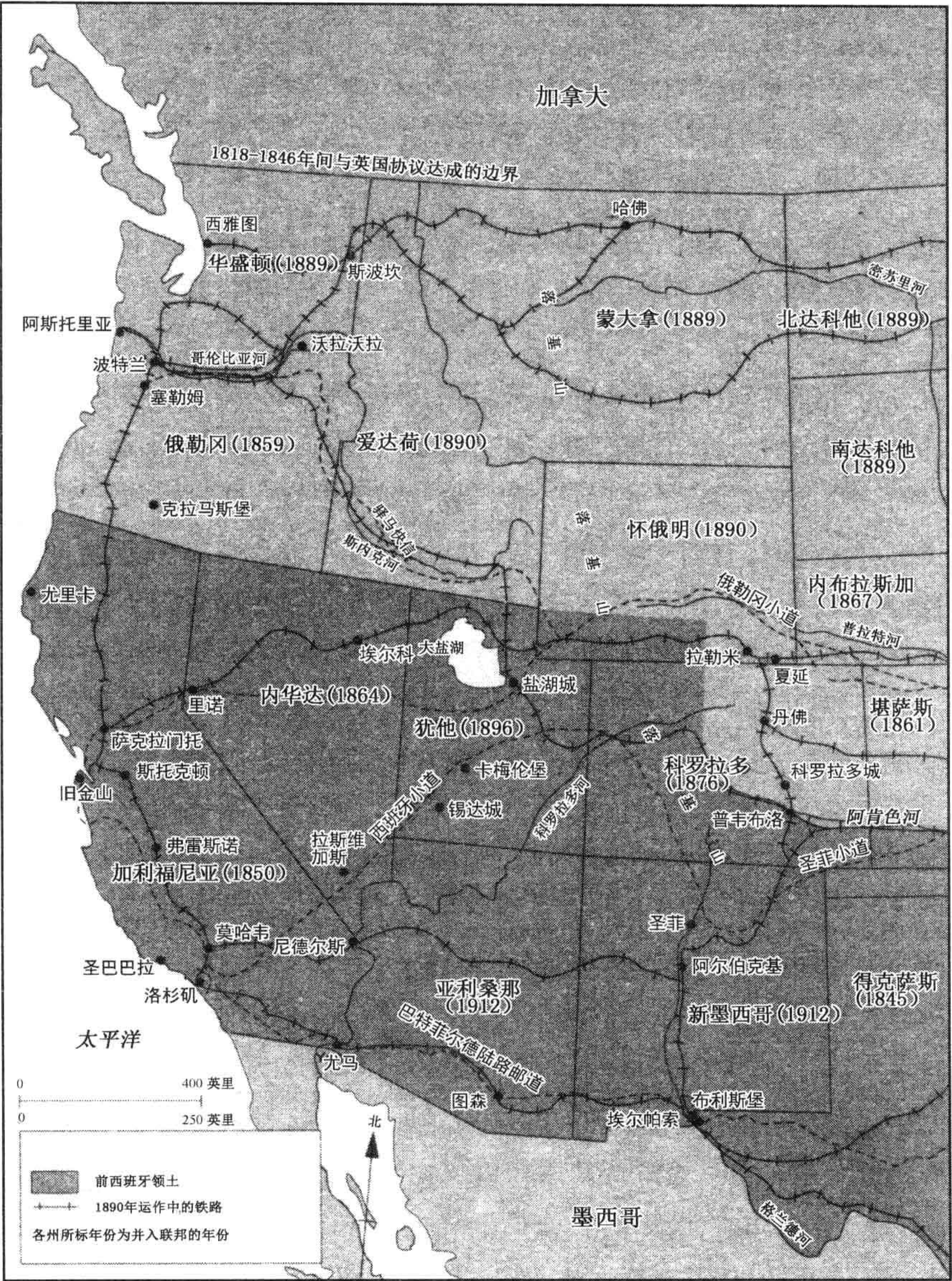
772

门罗主义作为美国西半球外交政策基石的地位一直延续至今。其后果之一是，其他美洲国家在美国面前捍卫自身独立时无法指望来自欧洲的支持。1860年前，这一状况最大的受害者是墨西哥。其境内的美国定居者发动叛乱，建起一个独立的得克萨斯共和国，后被美国吞并。墨西哥在随之而来的战争中一败涂地。因此，在1848年签订的和约中，墨西哥失去了大片土地，相当于未来的亚利桑那州大半、犹他州、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经过这次兼并，再加上1853年从墨西哥购得的少量其他土地，现代美国的版图最终定型。

在《巴黎和约》签署的70年后，通过征服、购买和殖民，这个共和国占据了北美大陆的半壁江山。1790年时不足400万的人口，到1850年已增加到将近2 400万。诚然，其中大部分依然生活在密西西比河以东，也只有大西洋三大港口城市波士顿、纽约和费城的人口超过10万，然而，国家的重心正在向西部转移。在很长一段时期，东部沿海地区的政治、商业和文化精英将继续主导美国社会。但自从俄亥俄河流域出现定居点的那一刻，对西部的兴趣就一直存在；西部的重要性早在华盛顿的告别演说中就得到了承认。此后70年间，西部问题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最终演变为一场美国历史上的最大危机，并决定了它成为世界强国的命运。

领土和经济两方面的扩张对美国历史所造成的深远影响，不亚于其政治体制的民主偏向性。而且这些扩张对政治体制本身的影响力也

773



在西部赢得的土地

十分巨大,有时达到万众瞩目、令体制发生转型的程度。奴隶问题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华盛顿开始总统任期时,合众国领土上共有70万不到的黑奴。这是个不小的数目,但宪政体制的奠基人没有给予特别关注,除非涉及各州之间的政治平衡问题。最后,各方决定,在计算各州在国会中的代表人数时,一名奴隶应算作五分之三个自由民。

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发生了三起令状况发生革命性变化的事件。第一是世界棉花消费飞速增长的驱动(英国的棉纺厂是最大的消费源)令奴隶制的规模极大扩张,导致美国农产量在19世纪20年代翻倍,此后十年间再次翻番:到1860年,美国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二来自棉花。774 这一巨大增幅很大程度上来自开垦新地,而新的种植园则意味着更多的劳力需求。1820年的奴隶数量已达到100万,1860年更增至400万左右。在南方各州,奴隶制已成为经济体系的基础。南方社会因此而更加特立独行,有别于更具商贾气息、更城市化的北方诸州,人们也一直意识到这一点,但当时,那套"独有的制度"(奴隶制的别称)开始被南方人视为当地独特文化不可或缺的核心。到1860年,有很多南方人以一国自居,过着一种被自己所理想化的生活,并相信这份生活正面临被外来暴政横加干涉的威胁。在他们眼里,国会对奴隶制日渐高涨的敌意就是干涉的表现和象征。

第二起改变美国人生活的事件是奴隶制成为一个政治话题。这是一场全方位政治演进的组成部分,也可以在其他方面找到明显例证。共和国早期政治反映出被后人称为"局部"利益的特征,华盛顿的告别演说本身也给人留下如此印象。概言之,这些局部利益产生了两类政治派别,一方反映商人和商业利益,希望建立强有力的联邦政府,进行保护主义立法;另一方反映农民和消费者利益,希望保障各州权利、提倡高发行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在当时那个阶段,奴隶制还算不上是政治话题,尽管随时间推移,政客们不时称之为必须遏制的罪恶(但没人清楚该怎么做)。这种默许状态逐渐发生改变,部分是美国制度内在趋向的结果,部分是社会变化的结果。司法解释极力突出宪法的国家和联邦属性。同时,由于国会获得了新的潜在立法权,法律制定者愈发成

为美国民主的代言人；安德鲁·杰克逊的总统任期被公认为这一发展的关键时期。政治民主的成长是其他变化的反映；美国不受因失去土地而流落街头的城市无产阶级的困扰，因为自给自足的梦想在西部长期都有机会实现；作为一种社会理想，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可以维持美国传统的核心地位。购买路易斯安那为美国人打开了前往西部腹地的道路，这对决定美国政治形态的财富和人口分配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对于北方的工商业发展也同样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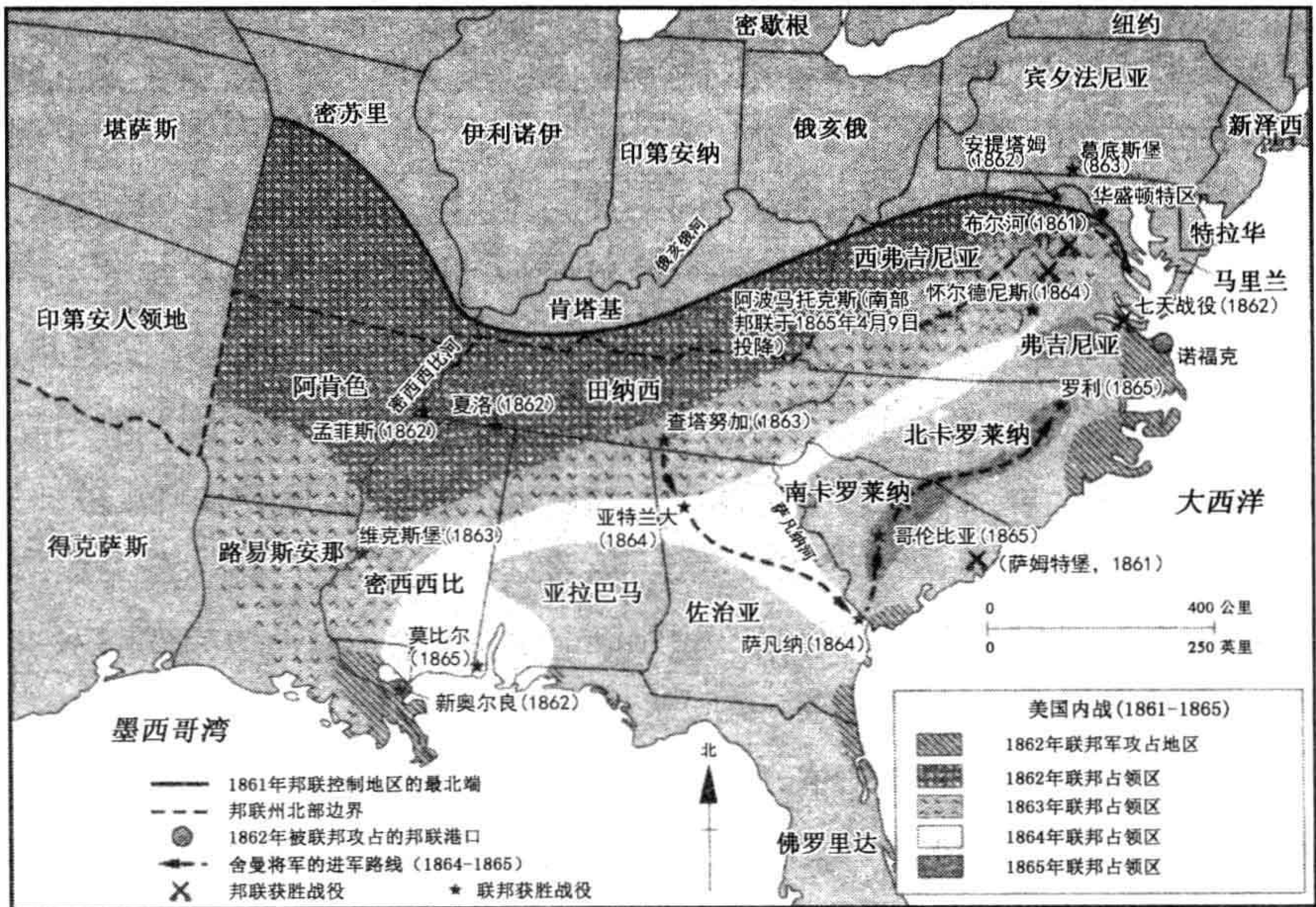
而第三点最为关键：西进道路的开启使奴隶问题发生了转变。关于新领土并入合众国应遵循何种条款，存在极大范围的争议。通过路易斯安那收购和墨西哥战争先后获得领土后，由于必须决定这些地区的组织形式，一个不光彩的问题就必然会摆上台面：新领土内是否允许奴隶制的存在？北方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奴隶制运动，坚持不懈地提升奴隶问题在美国政治议程中的地位，直到一切其他事项都变得次要。这场运动以终结奴隶贸易、最终解放奴隶为纲领，其根源在很大程度上和18世纪末追求同一目标的其他国家的动因是一致的。但美国废奴运动也有重大的区别。首先，它所面对的奴隶制处于发展壮大之中，而在欧化世界的其余地区，这一制度却正走向消亡，所以美国即便不至于倒行逆施，至少也阻碍了历史潮流所向。其次，其中牵涉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宪政问题，因为究竟能对私有财产干涉到何种程度尚存争议，不管是在有地方法律为干涉行为撑腰的各州，还是在尚未建州的领土内。不仅如此，废奴派政治家还提出一个关乎宪法灵魂、事实上关乎所有欧洲国家政治生活核心的问题：谁握有最终话语权？人民是主权的主体，这点毋庸置疑，但"人民"究竟是国会代表中的大多数，还是通过州立法采取行动、甚至违抗国会、宣称自身权利不可剥夺的各州州民？于是，该世纪中期涌现的奴隶问题，几乎与美国政治提出的所有问题都交织在了一起。

775

在南北实力基本旗鼓相当的情况下，这些争端还能得到遏制。虽然北方人口略占优势，但至关重要的议院实力对比还是保持均势（不论人口或面积，每个州都有两个议员席位）。至1819年，合众国以蓄奴州和自由州交替的方式接纳新的州加入，当时两派各有11个州。第一场

危机随之出现,事关密苏里州的准入事宜。在收购路易斯安那之前,法国和西班牙法律允许该地实行奴隶制,州民希望此政策能得到延续。但一名北方的国会议员提出在这个新州的宪法中限制奴隶制的议案,令该州民众和南方各州的代表一齐愤慨。公众为之哗然,就地方特权问题展开激辩;有一些南方人的情绪十分激烈,甚至扬言退出联邦。但其中的道德争议最终偃旗息鼓。双方仍然可以通过"密苏里妥协"对一个政治问题作出政治解答,允许该州保留奴隶制,同时也让缅因地区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以保持席位的平衡,并禁止奴隶制在北纬 36°30′线以北的美国领土内进一步扩张。该方案确认了一条原则,即国会有权选择是否允许奴隶制进入新并入的领土,但当时没有理由相信此类问题会在短期内重新出现。这一预期也得到了一代人的证实。但有些人已经预见到了未来:起草《独立宣言》的前总统托马斯·杰弗逊写道,他"立即意识到这敲响了合众国的丧钟",还有一名未来的总统在日记中写道,密苏里问题"仅仅是序章——是一部宏大悲剧的扉页"。

776



美国内战(1861—1865)

但这场悲剧又过了40年才拉开帷幕。部分原因是，美国人有很多其他问题要考虑——首当其冲的是领土扩张，部分原因是19世纪40年代以前没有适合种植棉花、从而需要奴隶劳力的新领土要并入，也就不存在此类问题。但是能够煽起民意的力量很快出现，只要公众愿意聆听，就将现出威力。1831年，波士顿创办了一份报纸，提倡无条件解放黑人奴隶。这就是“废奴主义”运动的开端，其宣传的愤怒情绪不断升级，在北方造成越来越大的竞选压力，鼓动人们为逃跑的奴隶提供协助，即使法庭要求他们把奴隶交还给主人也拒不执行。在废奴运动的大背景之下，一场对抗于19世纪40年代爆发，其焦点是应以什么条件将墨西哥战争中赢得的领土并入联邦。1850年的一份新协定终结了争端，但效力并不长久。从那时起，遭到迫害和牺牲的感受在南方领导层当中日益滋长，他们捍卫本州人民生活方式的姿态也越来越强硬，政局因此走向紧张局面。全国性政党的支持率已经受到奴隶问题的影响，民主党就把达成1850年协定作为政绩宣扬。

777

此后十年，局势每况愈下，最终演变为一场灾难。在堪萨斯地区建州的需求打破了双方在1850年协定下和平共存的局面，废奴主义者一心想以威吓手段迫使亲蓄奴派的堪萨斯州接受他们的观点，从而导致了第一起流血事件。有人提出，堪萨斯是采取蓄奴制还是自由制，应由该地区的居民决定，共和党就诞生于反对这一提案的过程：因为堪萨斯位于36°30′以北。法律对奴隶主的任何支持都会引来废奴主义者更高涨的怒火——最高法院在1857年作出的一次著名判决（“德雷德·史考特案”）、最终将一名奴隶交还给其主人就是一例。而另一方面，在南方，此类呼吁被视为对黑人的离间和煽动，也是决心利用选举制度侵犯南方人自由的表现——这一观点当然不无道理，因为废奴主义者至少并不是愿意妥协的人，尽管他们得不到共和党的支持。在1860年的总统竞选活动中，仅就奴隶问题的范畴而言，共和党候选人宣扬的未来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从美国所有领土上完全消灭奴隶制。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些南方人能承受的底线。虽然民主党内部存在分化，但1860年的全国投票结果与地方主义立场的分布情况丝毫不

差;在北方各州及太平洋沿岸的两个州的支持下,共和党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历史将证明他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对很多南方人而言,这不啻是末日临头。南卡罗莱纳州正式退出联邦,以抗议本次选举。1861 年 2 月,另外六个州步其后尘,并成立美利坚邦联,其临时政府和总统的就位比林肯于华盛顿宣誓就职还早了一个月。

双方均谴责对方的革命企图和行为,也很难驳斥其中的任何一方。如林肯所见,北方的核心立场是民主至高无上,这一诉求无疑具有无限的潜在革命可能。到最后,北方也确实在南方实现了一场社会革命。另一方面,南方在 1861 年(战争第一枪打响后又有三个州加入其阵营)所坚持的,是他们有权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这份主张和欧洲的波兰或意大利革命者一脉相承。一个不幸的真相是,民族主义主张和自由主义体制之间的一致性从不彻底、很少到位,甚至大多算不上接近,但捍卫奴隶制确实可以和捍卫自决权画上等号。同时,尽管这类重大的原则问题无疑面临挑战,但它们的表现是具体的、个人的和地方的,因此,要在这场由共和国历史和自我认同的重大危机所导致的分裂中,清晰精准地划出各派之间的界线非常困难。这些界线割裂了家族、城镇、乡村、宗教,同时也把不同肤色的人团结到一起。如此内战,也就必然会有如此悲剧。

778

一旦打响,战争本身就具有革命的潜在力量。在这场双方分别称为“叛乱”和“联邦与邦联两国之战”的战争中,所造成的冲击超出了斗争所必需的范畴。联邦耗时四年才打败邦联,在此期间,林肯的目标发生了重大变化。战争之初,他只谈及恢复正当秩序:他告诉民众,南方各州发生了一些状况,“事态过大,无法通过一般司法程序平息”,需要采取军事手段。维护联邦统一和完整的理念是这一立场升级为战争的本质,并得到不断重申;林肯的作战目标是将组成联邦的各州重新捏合到一起。有很长一段时期,这意味着他并没有满足那些希望通过战争来废除奴隶制的人,但他最终还是改变了主意。在 1862 年的一封公开信中,他依然表达了无所谓废奴与否的论调:“如果不用解放一名奴隶就能拯救合众国,我就会这么做;如果解放所有的奴隶可以拯救合众

国，我也会这么做；如果只解放部分奴隶才能拯救合众国，我还是会这么做。"但在那一刻，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向叛乱各州发表解放奴隶宣言。1863年元旦，他把这一决心付诸行动；南方政治家的噩梦终于成真，尽管他们发起的战争才是噩梦的源头。虽然一开始并不非常明显，但这使斗争的性质发生了改变。1865年，一项在美国全境禁止奴隶制的宪法修正案得以通过，迈出了废奴运动的最后一步。此时，邦联已经战败，林肯遇刺身亡，他以不朽名言"民有、民治、民享"所概括的事业已经获得保障。

在战胜之后的余波中，绝非所有美国人都认为这项事业明显具备高贵或正义的秉性，但其胜利不仅为美国、也为人类孕育出重大的意义。这是该世纪惟一的、意义之深远不亚于工业革命的政治事件。这场战争确定了大陆的未来：一个超级大国将继续主宰美洲，开拓这片人类已知的、资源最丰富的未开发领地。这一事实随着历史的进程决定了两场世界大战的最终结果，从而决定了世界历史的走向。联邦军的胜利还使民主体制主宰美国政治成为定局；虽然或许和林肯所指的民主并不总是完全一致，但从根本上保证多数人统治的政治体制此后确实没有遇到直接的挑战。此外还有无心插柳的效果，使美国人总是将民主和物质福利紧密联想到一起；后来，当美国工业资本主义遭遇危机，这份坚定的信念成了重要的力量源泉。

779

这场胜利还在美国国内造成了其他影响，最明显的一例是形成新的种族问题。就某种意义而言，奴隶制存在时，种族问题并不存在。仆役的身份是横亘在绝大多数黑人(其中总有少数自由民)与白人之间的屏障，并得到法律的认可。解放运动肃清了法定的尊卑体系，代之以民主化的平等体制——或神话，而当时做好了准备、能够接受这一神话变成社会现实的美国人寥寥无几。南方的数百万黑人突然获得自由。而且其中大多数人都未受过教育，除了下地的劳工之外，大部分没有受过培训，也缺乏本民族的领导者。有一小段时间，南方各州的黑人学会通过支持联邦占领军获得好处；可当这些靠山被撤走，他们也从南方各州的立法和公共职位上消失，能够觊觎这些职务的短暂时光也戛然而止。

在某些地区,投票点也不再有黑人出现。法律地位的缺失被社会和人身强制力所取代,有时比过去的奴隶制更加残酷。奴隶至少是一份投资,对主人尚有价值,就像其他财产那样得到保护,通常能获得最低限度的保障和生计。当南方大片地区的经济处于荒芜状态、穷困的白人也为生活而挣扎,自由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对黑人而言就是一场灾难。到该世纪末,黑人已被那些对人生失败和奴隶解放满怀恨意的穷苦白人驱逐到了社会下层,处于经济上一无所有的状态。这就是20世纪前往北方的移民潮和新出现的种族问题的根源。

美国保留两党制是战争造成的另一结果。直至今日,总统职位一直被共和党或民主党把持,甚少遇到第三党派的威胁。这种局面在1861年前没有任何实现基础,在那之前有很多党派兴起又消亡,反映着美国社会的各种趋势。战争使民主党和南方的事业牢牢绑在一起,而且起初令该党大受拖累,让它背上了不忠的污名(1885年以前的总统都不是民主党成员)。相应地,战争为共和党赢得了北方诸州的忠诚和激进主义者的寄托,他们将共和党视为合众国和民主的救世主、视为奴隶的解放者。在这种模式化定义的缺陷大白天下之前,两党已在相应阵营的各州深深扎根,占据不可动摇的地位,生存更是不在话下。20世纪的美国政治将随着两大政党内部转型的进程而展开,这一进程长期反映着双方最初的起源。

780

1865年的共和党可谓一时间予取予求。如果林肯还在世,或许他们能找出一条与南方和解的途径。然而木已成舟,他们对吞下败局、满目疮痍的南方所采取的政策令"重建"时期成为一段苦涩的年月。很多共和党人怀着诚意运用手中的权力竭力保障黑人的民主权利,从而也保障了民主党未来在南方的主导权。但他们干得并不算太坏。随着因战争暂时被打断的大拓荒重新恢复活力,经济趋势很快就变得对他们有利起来。

这场拓荒运动已经持续了70年,也已经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果。其最惊人的表现最初在领土方面,但即将转向经济。令美国人均收入成为世界第一的发展阶段始于19世纪70年代。在信心和期望空前高

涨的乐观氛围下，所有政治问题仿佛都得到了一时的解决。在共和党的执政下，美国人开始确信，美国应该办的正事不是政治辩论，而是生意。而这种思维转变并非最后一次发生。南方依然大体上游离于新兴的繁荣局面之外，与北方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一项令民主党能够从其他地区赢得支持的议题出现以前，南方没有任何政治上的有力手段。

而北方和西部则可以满怀自信地回顾过去 70 年间的惊人变化，相信更好的日子就在前方。别国人士也能感受到这一点；因此前往美国的外国人越来越多——仅 19 世纪 50 年代就达 50 万。这些变化养活了数量激增的人口——从 1800 年的 520 多万增长到 1870 年的 4 000 万。其中大约半数生活在阿利根尼山以西，而且绝大多数是农村人口。铁路建设为此前尚未展开的大平原定居和拓荒打通道路。1869 年，标志着第一条大陆铁路完工的金道钉①被打入铁轨。在新开辟的西部，美国实现了其历史上最伟大的农业扩张；得益于战争年代经历的劳动力短缺，已经有不少机械投入使用，使美国向新形态的规模化农业发展，通向世界农业革命的新阶段，将令北美成为欧洲的谷仓（未来还将成为亚洲的谷仓）。战争结束时，仅使用中的收割机就有 20 多万台。工业也将迎来一段辉煌的岁月；美国当时尚非能和大不列颠相提并论的工业国（1870 年，受雇于制造业的美国人依然不足 200 万），但其基础工作已经完成。依托规模庞大、日渐富裕的国内市场，美国的工业前景一片光明。

781

历史上最昂首挺胸的成功时代近在眼前，美国人并没有对败者抱以伪善的关注。可以理解，在美国体系运转良好的普遍心态下，他们发觉这不难做到。南方的黑人和穷苦白人如今成了两个半世纪以来一直处于失败者地位的印第安人的同类，成为被遗忘的失败者。在横向对比之下，日渐扩大的北方城市中新出现的穷人也许不能算作失败者，他们的生活至少不比安达卢西亚或那不勒斯的穷人糟糕，可能还更好。

---

① 是 1869 年 5 月 10 日完工、连接中央太平洋铁路和联合太平洋铁路的第一条大陆铁路上的最后一枚道钉。——译者注

后两座城市的穷人愿意前往美国,这表明美国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吸引力。而且这股吸引力也不仅仅是物质上的。除了"不幸的渣滓",那里还有"渴望呼吸自由的芸芸众生"。[①] 1870 年的美国依然是其他地区的政治激进主义者精神力量的源泉,不过其政治实践和形式对大不列颠的影响也许要大于对欧洲大陆的影响——英国人把民主和英国政治的"美国化"联系在一起,支持者和反对者皆然。

这类跨大西洋的影响和联系是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某些层面的表现,这份令人好奇不已的关系时淡时浓,但始终不曾割裂。双方都经历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方式完全不同。然而,大不列颠在 19 世纪早期的成就或许比美国转型的成功更了不起。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具有潜在颠覆力的社会骚乱中,大不列颠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转型为第一个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同时却得以保持惊人的宪政和政治延续性。此外,英国具有美国尚未染指的世界及欧洲强国的地位,统治着一个伟大的帝国。在此背景下,英国人可以在进行体制民主化的同时保留个人自由的大部分保障。

782

在社会层面,1870 年的英国远不如美国来得民主(但要把黑人排除在外,当作特例看待)。英国社会依靠一整套上下尊卑制度分级(地位来自身世和地产,若不然,也往往能来自金钱);英国统治阶级那种仿佛为统治而生般理所当然的自信令每一位观察者感到震惊。英国没有像美国西部那样的地区,可以用边境式民主的新风来淡化深入人心的、遵从传统的氛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吸引了不安分的移民者,但如此一来也消除了他们改变英国社会基调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政治民主的发展比社会民主更快,尽管美国早就实现的男性普选权直到 1918 年才在英国出现,但英国政治的民主化进程在 1870 年就已经无法回头。

这场宏伟的变化是在数十年内发生的。虽然在制度上有深刻的自由主义痕迹——法律平等、卓有实效的个人自由、代议制体系——但

① 这两句都引自埃玛·拉扎勒斯的诗作《新的巨像》(*The New Colossus*),现刻在一块青铜牌匾上,陈列于自由女神像底座内部的博物馆内。——译者注

1800年的英国宪政并不以民主原则为基础。其基础是特定个人和历史继承地位在社会中的代表权以及国王在议会中的最高地位。利用这些元素，过去的偶然性创造出一个以当时欧洲标准来看算是大规模的选民团体，但晚至1832年，"民主"一词还是贬义的，很少有人觉得那是值得向往的目标。大部分英国人觉得民主就相当于法国大革命和军事暴政。不过，在那个世纪的英国政治史中，朝着民主所迈出的最重要一步发生于1832年，这就是《改革法案》的通过。事实上，法案本身并不民主，而且很多支持者希望它能成为民主的障碍。法案对代议制体系大加修正，消除了体制中的异象（例如实质上被资助者控制的微型选区），让选区分布更好地契合这个工业化城市日益壮大的国家的需要，而最重要的作用是让投票制度更加有序。原本，选举权的分配方式杂乱无章，在不同地区各不相同；现在，选民的主体一目了然，一是农村的自由农，二是拥有或租用地产的城市中产阶级。设想中的标准选民是与国家有一份共同利益的人；但关于获得选举权的确切标准依然有一些未能争出头绪的死角。其直接产物是大约65万人的选民团体和一个与其前身没有太大不同的下议院。然而，纵使下议院依然被贵族把持，这还是标志着英国政治在此后近百年彻底走向民主化的开端，因为一旦宪政朝此方向改变，那么同样的改变就可以再度发生，下议院也会获得越来越多的权利，发出他们应当发出的呼声。1867年，另一项法案使选民人数达到200万左右，随后，1872年又达成了投票应采取不记名方式的决定，这是伟大的一步。

783

这一进程要到20世纪才大功告成，但很快就使英国政治的本质产生了其他变化。传统政治阶级开始缓慢且不乏怨恨地着手应付组建政党的需要，其组织依据不仅仅是裙带关系，也不仅仅是议会中的朋党派系。一个相当庞大的选民团体在1867年出现后，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但在此之前，人们就领会到了其中的意义——公众舆论比有地阶级更有讨好的价值。19世纪所有最伟大的英国议院领袖人物的成功都离不开一项基本能力：不仅聆听下议院的呼声，也能捕捉议院以外的、部分重要社会领域的诉求。最早或许也最显赫的例子是英国保守

主义之父罗伯特·皮尔爵士。他接纳公众舆论的决定,从而赋予保守派一定的弹性,正是这种弹性,总能避免保守主义陷入死不妥协的泥淖,而很多欧洲国家的右派都误入此途。

关于是否废止《谷物法》的政治大争论就体现了这一点。问题的焦点不仅是经济政策,也关乎谁才是国家的统治者,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与1832年以前争取议院改革的斗争彼此呼应。19世纪30年代中期,保守派已在皮尔的带领下接受了1832年法案的结果,到1846年,他堪堪得以让其成员接受保护主义的《谷物法》被废除的事实,法案的撤销表明有地阶级不再享有最终话语权。出于愤怒,其党派旋即与皮尔反目并将他开除。这个由乡绅阶层所组成的强大团体视农业利益为英格兰的化身,也自视为农业利益的守护者。他们正确地预见到,皮尔的政策就整体倾向性而言会导致自由贸易主义的胜利,在他们看来,自由贸易是制造业中产阶级的追求。由于他们的决定,该党发生分裂,陷入长达20年的瘫痪状态,但事实上,皮尔为他们清除了一个可怕的魔魇。他让恢复统一后的保守党得以放下包袱,不必仅仅捍卫一个经济团体的利益,从而在争取选民支持的竞争中获得更大的自由。

在该世纪中段的三十余年间,英国政治朝着改革和自由化的方向进行了全面调整,关税和财务政策向自由贸易倾斜的重新定位只是这一过程的一个方面,但在某种程度上是最显著的一面。在此期间,地方政府改革迈出了第一步(在城镇尤其明显,但乡村的主宰者依然是有地利益群体),一部《济贫法》及其他工厂和矿业法案得以通过,也开始得到有效的监督和贯彻,司法体系经历重建,不信新教者、罗马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自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教会体制对婚姻法的垄断走到了尽头,一套邮政体系建立起来,并成为其他国家所效仿的模型,英国甚至还开始着手处理过去被严重忽视的公共教育问题。与这一切相伴的是史无前例的财富增长,其自信心的标志是1851年万国博览会召开,在伦敦展示了来自全球的奇珍异宝,由女王本人出资、王夫亲自督办。如果说英国人有着如维多利亚中期所表现出的那种自大倾向,那么也可以说他们有自大的资本。看起来,英国的体制和经济

784

都从未比那时更蓬勃向上。

但并非人人都感到高兴。一些人哀叹经济特权的丧失：事实上，英国依然表现出极端的贫富差距，不亚于任何其他国家。对中央化大行其道的恐惧如今也多少有了更多的实质性理由。议院的最高立法权令官僚主义侵入越来越多过去在实践中不受政府干涉的领域。19世纪英格兰政府机构的中央集权力远远没有达到如今在所有国家司空见惯的程度。然而有些人担心国家会走上法兰西的道路，成为行政体制高度中央化的国家，而这种中央化被视为法国在实现平等的同时未能建立自由体制的充分原因。为了遏制这一趋势，维多利亚地方政府改革的作用至关重要，其中部分措施直到该世纪最后20年才执行，但推动政府朝着民主的方向更进一步。

有些外国人为之仰慕，大部分人则感到惊讶——工业城镇的环境如此面目可憎，英国怎么还能控制住大众骚乱的激流？其他国家的经历证明，这股乱流对有序的政府是致命的威胁。当革命的危险在别国历历在目，英国有意识地对体制进行大规模重建，并实现了安全崛起，不仅国力和财富大增，自由主义在政治舞台上甚至还变得更加醒目。英国政治家和历史学者用一句名言一再自豪地强调，国家生活的本质是自由："每一个先例都是对前一个先例的拓宽。"[1]英国人狂热地相信此道，但没有从自由走向放纵。该国没有美国所享受的偏远位置和几乎无限的土地所带来的地理优势——可就连美国也经历过一场包含革命元素的、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那么，大不列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785

这是一个具有诱导性的问题，但也是历史学者们不时提出的问题——他们没有考虑到，此问题本身就暗示着革命的发生需要某些条件，而当时的英国社会也满足这些条件。也许，我们无需认同任何此类观点。也许，这一急速变化的社会从未存在任何潜在的革命威胁。毕

① 这句话原本是描述普通法中可援引为先例的判决，这里是指自由只能拓宽、不能逆转。——译者注

竟,法国大革命带给欧洲的很多基础变化在大不列颠已经存在了几百年。无论覆盖着多少斑斑锈迹或带来麻烦的历史沉积物,英国的基本体制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哪怕在尚未改革的年代,下议院和上议院也不是很多欧洲国家司空见惯的那种封闭的团体机构。不到1832年,两院就表现出满足新需求的能力,哪怕显得缓慢且姗姗来迟;第一部《工厂法案》(其效果诚然不算很好)早在1801年就得以通过。1832年过后,人们更是有理由相信,只要受到足够的外部压力,议院就会执行所需要的一切改革。议院的此类能力不受任何法律限制。就连被压迫阶级和愤愤不平者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19世纪三四十年代(这对穷人是尤其艰难的时期)发生了很多起走投无路者的暴力事件和革命运动,但当时最引人注目也最重要的人民运动是聚集了各形各色抗议者的"宪章运动",其纲领《人民宪章》中提出的要求不是议院的废除,而是让议院对公众需求负起更大的责任。

然而,议院不太可能在人们的呼吁下就采取改革措施,除非受到了其他因素的作用。也许不无重要意义的亮点在于,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的重大改革对中产阶级和大众同样有利,但针对工厂的立法可能除外。英国中产阶级比欧洲大陆的同类阶级更早分享到政治权力,因此能够运用这份力量促成改变;他们没有被诱惑成为革命——走投无路的绝望之徒最后的手段——的盟友。但不管怎么看,英国大众本身也不算非常革命。总而言之,他们未能采取革命行动,这使得后世的左翼历史学者大感沮丧。究竟是因为大众的苦难太深抑或不够深,还是因为工人阶级不同组成部分之间存在太多差异?这一直是饱受争论的话题。但不管是对我们还是对当时的国外人士而言,至少值得一提的是,英格兰传统行为模式不会轻易消亡;这套模式长期令英国人保持尊敬上等社会和人士的习惯,对外国人造成了强烈的震撼——尤其是美国人。更何况,英国还有工人阶级组织,革命并非惟一的选择。这些组织往往具有"维多利亚式"特色,强调自救、审慎、克己、得体等值得敬佩的美德。在伟大的英国工人运动的构成元素中,只有冠以工运之名的政党是1840年以后才出现的;其余元素到19世纪60年代已经相当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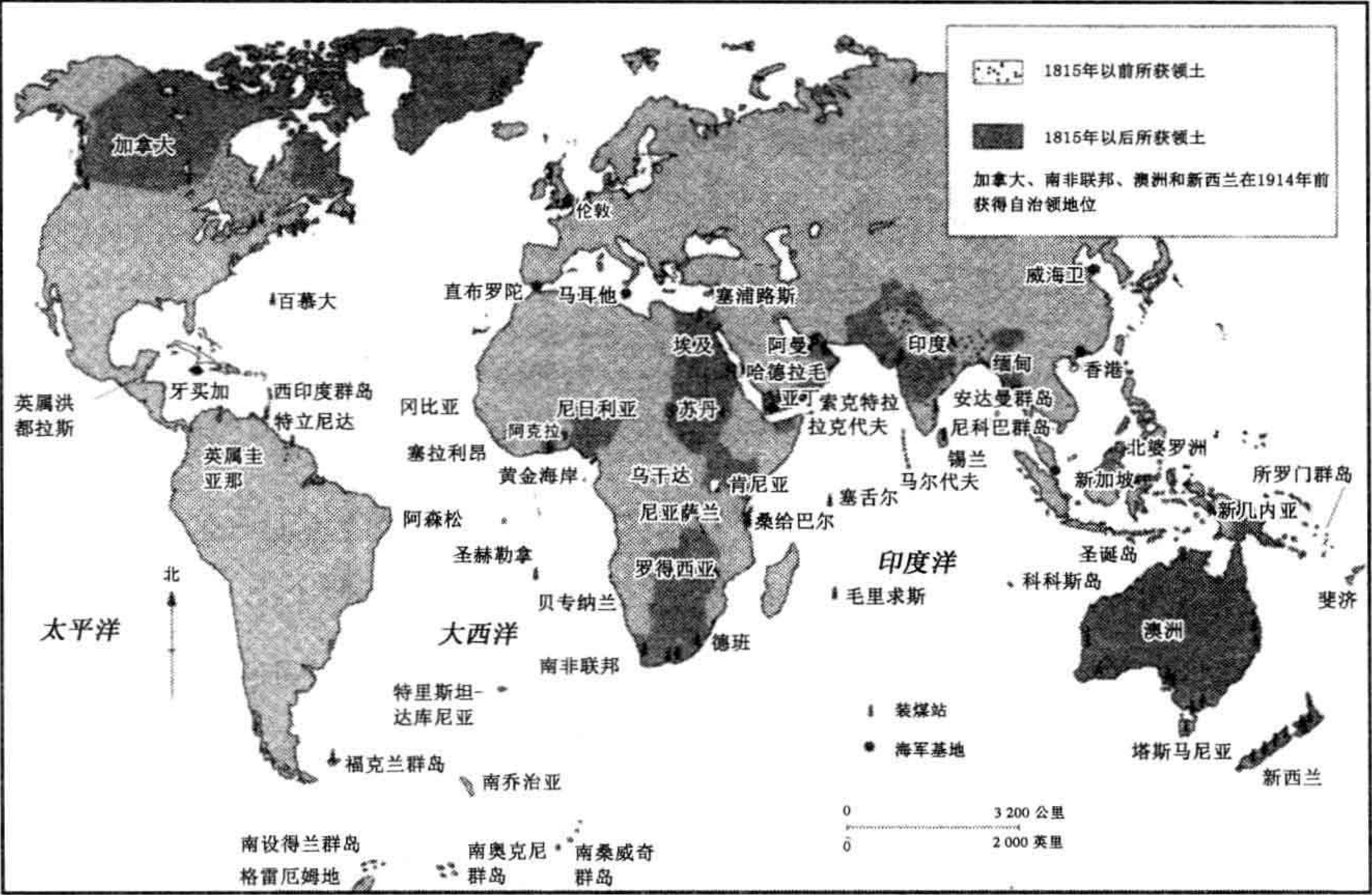
786

熟。为不幸者提供保障的“友谊协会”、互助组织以及作用最突出的工会，都为个人参与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的事业提供了有效的渠道，虽然一开始数量不多，见效也较慢。这一早熟凸显了英国社会主义的内在矛盾性，因为它后来依靠的是一场非常保守和欠缺革命意识的、有很长一段时期在世界上规模无出其右的工会运动。

19 世纪 40 年代刚刚结束，经济趋势就朝着有利于缓和不满的方向发展了。不管怎么说，工人阶级的领袖们经常谈及此事，其心态几乎算得上遗憾；他们至少也认为，生活条件的改善不利于英格兰的革命势头。随着国际经济在 19 世纪 50 年代的升温，英国这座世界工厂的工业化城市及商人、银行家和保险业者都迎来了好时光。随着就业好转和工资上涨，宪章运动所聚起的人气逐渐消散，很快就成了一段回忆中的往事。

如此之多的变化包容在一个不变的形式之中，其象征则是王国的中央体制：议院和国王。威斯敏斯特宫被大火烧毁后，人们在重建时选择了仿中世纪的式样，以突出这座后来被称为“议院之母”的建筑的古典气息。于是，英国历史中最具革命色彩的时代所带来的剧烈变迁依然有一层习俗和传统的外衣笼罩。毕竟，君主制依然在延续。早在维多利亚登基的 1837 年，论历史之悠久，英国国王就已是仅次于教皇的欧洲政治存在；但纵然如此，其现实面依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最昏聩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继位者使君主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其继承人也没有带来很大改观。维多利亚和王夫则令君主权威的消弭成为无可置疑的事实，只有极少数共和主义者不那么认为。这并不完全符合女王的本意；当王室淡出政治斗争舞台，她没有装出一副对政治中立甘之如饴的态度，尽管这种中立适合立宪君主的身份。尽管如此，在世人眼中，王室是在她的在位期间远离政治的。她还使王室变得更平易近人；自年轻的乔治三世以来，“王室家族”第一次成了活生生的、可以眼见为实的真实存在。这是她的德国夫君阿尔伯特(Albert)亲王给予她帮助的诸多方面之一，虽然不领情的英国公众几乎没有为此表示丝毫的谢意。

787



英帝国(及其受保护领土)(1815－1914)

只有爱尔兰人能够带来富于想象力的、总是令不列颠人始料未及的变化,使他们面临一场货真价实的革命威胁,不得不镇压该地1798年的一场叛乱。局势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又平静下来,但缓和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骇人的灾难。于19世纪40年代中期在爱尔兰爆发的马铃薯疫病,导致饥荒和疾病的蔓延,从而以残忍的马尔萨斯所预言的方式解决了爱尔兰的人口过剩问题。当时,要求废除1801年将爱尔兰并入大不列颠王国的《合并法案》的呼声已经噤默,以天主教为主的爱尔兰人对拥护新教的外来者的厌恶感一时蛰伏。这个对远方的、盘剥佃农和劳力的英国地主(或是位于本地但同样贪婪且数量更多的爱尔兰地主)毫无忠诚感的农村社会,也没有发生严重的骚乱。然而问题依然存在,1868年上台的自由派政府开始着手处理其中的一部分;这导致的惟一严重后果是一场新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该运动以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农民为基础,提出"家园自治"的要求。关于这一主张可能带来什么——更别提应该带来什么,政客们争论不休,成为英国政坛挥之不去的阴云,阻碍了各党派的联合,使解决爱尔兰问题的

788

尝试遭受了一个多世纪的挫折。就短期而言，它促进了分别位于南北两地的爱尔兰革命运动，也与自由主义在英国的凋零不无关系。于是，时隔千年之后，爱尔兰又一次成为世界史中显眼的标志，当然，该民族已经在同一世纪早期通过向美国输出大量移民，印下了另一条略微黯淡的足迹。

五、欧洲称霸世界

789 到1900年，欧洲人和海外的欧洲后裔已成为全世界的主宰。他们获取主宰权的方式有很多，一些直截了当，一些手法含蓄，不过事实存在比定性更重要。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对欧洲亦步亦趋，朝着欧洲化的方向不断前进。这是世界史中一段独一无二的时期。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文明使自己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作为其微不足道的后果之一，本书余下部分将越来越关注于一份单一的、全球的历史；实际上，世界在1914年已经达到了后世所称的"全球化"的第一次高潮。

重点在于，不能仅仅考虑欧洲（有人更倾向于用"西方"一词，但如此挑剔并不必要——美洲和大洋洲及周边岛屿的主导文化源自欧洲而非亚洲或非洲；何况"西方"也容易误导，因为该词如今有着狭义的政治内涵）国家对世界上大部分土地的直接正式统治，此外还要考虑其经济和文化霸权。而且欧洲的支配地位不光表现为公然的控制力，也经常表现为影响力。其重点差别在于，欧洲势力具有侵略性、控制欲和塑造世界的能力，而原生文化及民族则是这些力量的受体，往往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对于非欧世界来说，这一状况并不一定是不利的代名词，但他们几乎总是处于劣势的一方，不得不为了适应欧洲世界而作出改变。有时，他们无法抵挡欧洲进步思想的吸引力，或无法抵御欧洲人的教诲及范例以最不可言传的方式所唤醒的期望，并自发自愿地作出相应的改变。

把1900年的欧洲世界想象成一系列同心圆是理解其格局的方法之一。最内层是古老的欧洲本身，得益于先后掌控自身及世界的资源，已经延续了三个世纪的财富和人口增长。欧洲人获取和消费的商品在全世界商品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加，也在掌控环境的过程中表现出相当的能量和技巧，从而在其他文明面前愈发显得鹤立鸡群。欧洲在19世纪就已经是一个富饶的文明体，并且一直在变得更加富庶。工业化确保了他们开发和创造新资源的自给能力，不仅如此，凭借新的财富所带来的实力，他们还能染指世界其余地区的财富。刚果的橡胶、缅甸的柚木或波斯的石油所产生的利润将长期再投入其产出国。欧美的穷人从原材料的低价中获益，死亡率的下降说明工业文明有可能给民众带来更富足的生活。就连欧洲农民也能买到工业化生产的廉价衣物和工具，而同一时代的非洲及印度农民依然生活在石器时代。 790

作为欧洲霸权世界的第二层，移植到海外的欧洲文明得以分享这笔财富。美国是最显著的例子；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南美国家也位居其中。这些地区对旧世界的立场并非全都一致，但有时会和欧洲一并被称为“西方世界”，这种表述对理解没什么帮助，因为它们分散于全球各地。然而它意图表达一个重要的事实：类似的思想和制度是这些地区共同的源头。当然，这不是构成其面貌的全部因素。各地区都有其独特的边境区，都遭遇过特殊的环境挑战和独一无二的历史条件，但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来应对这些挑战。不同的边境开拓区以不同的方式重组，但采用的体制是相同的。他们在形式上都是基督徒——在20世纪以前，没有一名殖民者怀着无神论思想前往新大陆——他们都用欧洲法律体系规范自己的事务，都可以获取欧洲的伟大文化，也共享同样的语言。

1900年的世界有时被称为“开化世界”。采用这种称呼是因为那个世界有共同的标准；使用这一短语的人自信满满，无法轻易看出世上还有很多其他事物也配得上文明的头衔。当他们放眼世界，眼里只有异教的、落后的、未开化的民族或若干努力想要加入文明世界的民族。这是欧洲人取得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那些被视为欧洲思想和价值观

内在优越性证明的事物给他们带来勇气，鼓舞他们向世界发起一波又一波新的攻击，占据一片又一片新的土地。18 世纪的价值观进步提供了证明其优越性的新论据，强化了那些原本来自宗教的优越感。到 1800 年，欧洲人过去对其他文明所秉持的敬意已经消磨大半。他们自身的社会实践似乎明显优于在世界别处发现的、不可理喻的野蛮人。个人权利、出版自由、全民选举权、保护妇孺儿童（甚至还有动物）免受压迫，欧美人在其他大陆对这些观念的推崇和追求一直延续至今，往往完全没有意识到可能水土不服。博爱主义者和进步人士长期保持自信，哪怕一边谴责其他方面的欧洲优越论，也一边相信欧洲文明的价值观应该像其医学和卫生习惯那样普世推行。科学在他们眼中也往往指向同一方向，可以打破迷信、通过合理开发资源造福大众、提供正规教育、制约愚昧落后的社会风俗。当时有一种几乎通行无阻的看法，认为欧洲文明的价值观要好于本土文明（显然，事实往往确实如此），对于欧洲价值观的一切颠覆性效果则基本上视而不见。

791

欧洲人以为，对于那些“阴沉的黑暗依然笼罩”（引自一首维多利亚赞美诗）的土地上的人民而言，在 1900 年往往能直接受欧洲人或欧洲后裔的统治是一桩幸事：这些臣民构成了第三层同心圆，也使欧洲文明进一步向外辐射。在很多殖民地，具有启蒙思想的行政官为了建设铁路、开展西式教育、设立医院、确立法律和秩序辛勤工作，造福那些显然无法从自身体制中获得福祉的民众（他们在更优越的文明所带来的挑战和竞争面前无力抵抗的事实被视为其自身体制存在缺陷的证明）。哪怕本地体制获得保护、得以存续，保护者也是站在殖民势力的文化具有优越性的立场之上。

此类优越感如今不再得到人们的赞赏或认可，即便是私下的想法。然而，在某一方面，这份优越感终结了一种罪恶，哪怕是批判殖民主义最彻底的人、哪怕怀疑其背后的动机，也依然认为这是一件好事。这份被终结的罪恶就是欧洲世界的奴隶制，他们甚至还动用武力和外交手段在不受其控制的地区与奴隶制斗争。废奴运动在 1807 年和 1834 年迈出了关键的两步，首先是英国议院废除奴隶贸易，然后是奴隶制度本

身在英帝国范围内销声匿迹。这一行动投入了大量海军、帝国和贸易力量，具有决定性的效力；其他欧洲国家很快实行了类似的措施，美国也于1865年终结了奴隶制。1888年巴西奴隶的解放也许可以视作这一进程的终点，当时，殖民政府和皇家海军对非洲大陆和印度洋上的阿拉伯奴隶贩子施加了很大的压力。知识界、宗教界、经济界和政治界的很多势力参与了这项伟大的成就，关于各方究竟起到多大的作用，争论仍在持续。或许，值得在此指出的是，虽然大规模奴隶贸易延续了三百多年方得废除，但欧洲也是有史以来惟一一个主动根除自身内部奴隶制的文明。尽管在20世纪，奴隶制曾短暂地在欧洲复辟，但必须靠武力才能维持，也不敢公开承认自身的奴役性质。虽然无法给不幸的受害者带来多少慰藉，但当今时代，强制劳动营的经营者必须付出良心的代价、成为一个伪善者——不管是否认劳动营的存在，还是将奴隶伪装成再教育或司法处罚的对象。 792

在这三层领土以外，其余地区都不受欧洲人的直接控制。但其人民的塑造也受欧洲的影响。有时，他们的道德观和体制因双方的接触而受侵蚀——例如中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情形——这也许会导致间接的欧洲政治干涉，或是本地传统权威的弱化。有时，他们受此类接触的刺激并加以利用，只有一个具有重要地位的民族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那就是日本。而与欧洲绝缘则是完全办不到的事情。单凭忙忙碌碌、熙熙攘攘的欧洲商人，就足以让这一点得到保证。事实上，正是这些不被欧洲人直接统治的地区成为了欧洲霸权最有力的注脚。抱负和妒忌心是一对强有力的翅膀，载着欧洲价值观乘风破浪。地理位置的偏远几乎是惟一能抵御他们的屏障(但就连西藏也在1904年被英国人入侵)。埃塞俄比亚是偏安一隅、保持独立的成功范例，没有在英国人和意大利人19世纪的入侵中沦陷，当然，他们自称为基督教国家的道义立场对生存相当有利，只是该国不属于西方世界，这一千四百多年来对基督教的信仰也是时断时续。

不管是谁开启了这扇大门，整个文明都有可能沿着其脚步鱼贯而入，但在将欧洲文明传往世界各地的媒介中，基督教始终是最重要的之

一,因为它对人类行为的所有层面都抱有无止境的兴趣。有组织的教会势力范围扩张和正式教徒数量的增长使19世纪成为自使徒时代以来基督教最辉煌的扩张时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新兴传教浪潮的结果;天主教会办起新的修道会,新教国家则涌现出支持海外传教事业的社团和学会。然而这一状况导致了有悖于初衷的结果,本应不分种族、类别和条件地属于全人类的信仰却附上了越来越浓郁的欧洲气息。在大部分被动接受基督教的国家,基督教长期以来仅仅被视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而非也能用本地方言来表述的灵魂启迪。一个琐碎但有趣的例子就是传教士往往很在意穿着。17世纪前往中国的耶稣会教士出于审慎的考虑在服装上入乡随俗,而他们19世纪的后辈则狂热地将欧洲服装硬套在班图和所罗门群岛的居民身上,不顾这些服饰与当地人往往很不相宜的事实。这是基督教传教士传递宗教以外信息的方式之一。此外,他们常常带去重要的物质和技术福利:饥荒时期的粮食、农业技术、医院和学校,有一些还具备颠覆当地社会的力量。欧洲作为一个进步文明会产生何种心态,从中不难想象。

793

哪怕退一万步,欧洲人观念上的自信还有一份最后的依靠,不管是传教士还是其余人等,他们都知道别国无法阻挡他们的脚步,即便没有被殖民的国家也一样。只要有意,欧洲人仿佛可以凭借武力成为世界任何地区的主人。19世纪的武器发展给欧洲人带来比葡萄牙人的舷炮在卡利卡特首次轰响时更大的相对优势。即使其他民族也拥有先进的装备,他们也很少能有效加以运用。1898年,在苏丹的恩图曼(Omdurman)之战中,一支英军用当时英国部队标准列装的弹匣式步枪向2000码外的敌人开火。没过多久,榴霰弹和机关枪弹也倾泻而出,将马赫迪派武装撕成碎片,英军的阵线没有受到丝毫冲击。战斗结束后,英埃军队只损失48名士兵,而马赫迪派有一万人阵亡。不过,这并非如某位英国人所说的那样,单纯由于

不管发生什么,我们有
马克沁机枪,而他们没有

因为哈里发的军火库中也有机枪。他还能使用电报装置与部队联络，也有可以炸翻尼罗河上的英国炮艇的电发水雷。但这一切都没有得到恰当的运用，非欧文明若想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仅需要技术转型，也需要转变思维方式。

此外，在另一种更仁慈和温和的意义上，欧洲文明也离不开武力。因为不列颠统治下的和平延续整个19世纪，使欧洲各国无法为争夺非欧世界的主导权而大打出手。尽管现代最大规模的直接殖民统治扩张就此上演，但19世纪毕竟没有重演17至18世纪的殖民战争。所有国家的商人都能在海上畅行无碍。英国海上霸权是欧洲文明非正式扩张的先决条件。

794

这份霸权的首要作用是保障了1900年那个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贸易体系。从17世纪起，古代那种少数商人和敢想敢做的船长在边境地带从事交易的模式逐步被整体性的相互依存关系所取代，这种关系的基础是工业国和非工业国之间广泛的职能差异；成为原料生产国是后者的大势所趋，用来满足前者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人口的需求。但这种粗放的区分方式还需要大量细化。有很多国家不符合该定义；例如美国，在1914年既是原料出产大国，又是世界领先的制造业国家，出口值相当于英法德三国的总和。这一区别也不是欧洲和非欧文明之间严格意义上的分水岭。在1914年，日本和俄国的工业化速度都快于中国或印度，但俄国尽管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却无疑不能算作发达国家；而大部分日本人（就像大部分俄罗斯人一样）依然是农民。欧洲的巴尔干地区也没有任何发达的经济体。惟一可以肯定的是，1914年存在一个由发达国家组成的核心，其社会和经济结构与传统社会差异很大，围绕这一核心的是一个不断向世界主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色迈进的大西洋国家群体。

世界经济的焦点高度集中于伦敦，这里是维持国际贸易流动性的金融服务的中心。全球贸易中的巨大份额是通过英镑汇票完成交易的；而英镑的基础又是国际金本位体系，通过确保主要货币之间维持高度稳定的汇率关系来保持人们的信心。所有大国都有金币，只要持有

一袋亨利七世金币、五美元金币、金法郎或任何其他大国发行的交易媒介，就可以通行世界任何地区，不用担心金币的通用性。

在另一层意义上，伦敦也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因为尽管到了 1914 年，英国若干重要领域的总产值已被美国和德国超越，但它依然是最大贸易国。世界船运贸易大多被英国掌控。作为主要进出口大国，英国也是惟一一个向非欧国家出口工业产品多于欧洲国家的国家。大不列颠还是最大的资本输出国，通过海外投资赢得巨额收入，特别是在美国和南美。以其特殊地位为轴心，国际交换体系大致可以视为三边模式。英国一方面用自身的工业制成品、现金及海外所得作为支付手段，从欧洲购入制成或非制成商品；另一方面，它向世界其余地区出口制成品、资本和服务，收取粮食、原材料和现金作为回报。这一复杂体系表明欧洲和世界其余地区完全不是单纯的制成品和原材料交换关系。当然，美国这个独特的个例一直存在，该国几乎不从事出口，但在国内制成品市场的份额逐步加大，不过依然是一个资本输入国。

795

1914 年时，大部分英国经济学家都相信，这一体系的繁荣和所带来的财富增长展现了自由贸易主义的正确性。在该思想的鼎盛时期，英国的繁荣局面也发展得最为迅猛。亚当·斯密曾预言，如果抛弃封闭的、将贸易保留给母国的帝国主义体系，一帆风顺的经济状况就将持续下去，而在美国的例子中，这一理论很快得到证实，因为 1783 年缔结和平后不过数年，英美贸易马上迎来大爆发式的增长。至 1800 年，英国的大部分出口已经走出欧洲，而且在印度和东亚的最大规模的贸易扩张远未到来。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更针对打开贸易封闭地区的大门，而非可能骑虎难下的占领新殖民地，因为贸易才是国家兴盛的源头。1839 至 1842 年间的鸦片战争是其中丑陋的一例。战争的结果是五个中国口岸对欧洲开放贸易，以及香港被租让给大不列颠，作为贸易管理所不可或缺的司法实践基地。

19 世纪中期的二十来年间，自由贸易思想声势浩大，愿意以此为基础采取行动的政府数量超过了古往今来的任何时期。在此阶段，关税壁垒被废除，英国的相对优势——首先在贸易国当中，然后在工业制

造国当中——得以延续。但这一自由贸易的大好时代在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走向终点。一场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和价格走跌使得 1900 年除大不列颠以外的所有大国再次祭出关税保护的手段,甚至在英国,由于来自德国的竞争日趋激烈,人们也感到不安,历史悠久的自由贸易铁则也开始遭受质疑。

796 不过,以回顾历史的视角来看,1914 年的经济世界依然展现出惊人的经济自由和信心。欧洲漫长的和平提供了让贸易关系得以成熟的土壤。货币的稳定性使全球价格体系的极大灵活性得到保障;外汇管制完全不存在,俄国和中国也已和其他国家一样完全融入了这一市场。货运和保险费用不断走低,粮食价格呈长期下跌走势,工资则长时间保持上涨。利率和税率都不高。资本主义天堂仿佛并非可望而不可即。

随着这一体系的不断壮大,亚非也被涵盖在内,于是该体系也成了一种传播源自欧洲的思想和技术的工具,但这些思想和技术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土壤。通过侵略和模仿,合资企业、银行、商品和证券交易传遍世界,开始取代传统的贸易结构。在部分地区,堪称世界贸易基础设施的码头和铁路建设以及工业雇佣兴起,开始将农民转变为工人。有时,这对地方经济的效果是负面的;例如,当德国和英国制造出合成染料,印度的靛蓝种植业多多少少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英国人引入的橡胶树改变了东南亚的经济史和战略价值,也在无意之中毁掉了巴西的橡胶种植业。世界各地孤立的状态首先被探险家、传教士和士兵动摇,接着被电报和铁路的问世打破;到 20 世纪还将被汽车进一步征服。转变也发生在更深的层次;1869 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不仅决定了英国贸易和战略态势,还赋予地中海过去所不具备的重要地位——不再是某个特定文明世界的中心,而是一条文明的通道。

经济一体化和体制变化与文化接触密不可分。正式的传教机构、教育机构和政府政策只占其中微不足道的篇幅。例如,欧洲官方语言将欧洲理念一同带到非欧国家,使那些地区受过教育的精英群体得以接触到欧洲文化的宝贵财富,不仅包括基督教文明,也包括去宗教化和“启蒙化”的欧洲文明。传教士所传播的不单是教义或医疗及教育服

务,也唤起针对殖民政体本身的批判精神,因为其所作所为和其文化所标榜的内容之间存在落差。

从 20 世纪的视角回顾,在欧洲对世界造成的冲击中,最持久也最重要的部分大多可以从这类无意造成的、一言难尽的影响中寻得踪迹。797 毕竟,模仿这种单纯的冲动始终是存在的,无论是表现为生搬欧洲服饰这种荒唐的做法,或是很多力求抵制欧洲霸权的人所得出的结论——为了达成目的就需要借鉴欧洲的模式,而后者的意义当然重要得多。提倡欧化的激进派和改革家几乎无处不在。1776 年、1789 年和 1848 年革命的思想至今仍对亚非具有实际影响力,关于世界未来走向的辩论也依然在以欧化的术语进行。

这一非同一般的结果频频遭人忽视。在该进程逐渐明朗化的过程中,1900 年只是一个制高点,而非故事的终点。日本是一个具有天赋的民族,继承了精妙的艺术传统,然而他们不仅借鉴了西方工业化主张(这完全可以理解),还采纳了西方艺术范式,更让西方服饰获得比本民族服装更流行的地位。现在,日本人觉得威士忌和干红都属于时尚。马克思是中国官方正式尊崇的偶像,而这位德国哲学家所构造出的思想体系以 19 世纪德国唯心论和英国社会及经济事实为根源,除了表达鄙夷之外,他甚少谈及亚洲,一辈子都没有去过普鲁士以东。这说明了另一个发人深思的事实:文化影响力的资产负债表上显出压倒性的一面倒态势。世界偶尔能回馈给欧洲一些时尚元素,但给不了可以在效果上与欧洲给予世界的那些相提并论的思想或体制。马克思的学说在整个 20 世纪一直有力地影响着亚洲;而最后一名在欧洲具有同等程度的话语权威性的非欧人士却是耶稣。

文化在实体层面传输的实现途径之一是欧洲人向其他大洲的移民。除美国以外,最大的两个海外欧洲社群是(如今依然如故)在南美和前英国殖民地定居的白人,虽然在 19 世纪大部分时期名义上隶属伦敦当局的直接统治,但他们事实上早就成为一批特殊的混血民族,所在地区也不算真正的殖民地。像美国一样,两个群体都在 19 世纪得到大批散居各地的欧洲人的补充,其数量十分惊人,也印证了后来从人口学

角度赋予这一时期的名称：大迁移。1800 年以前，除了英伦三岛之外，欧洲很少有移民前往海外。此后，大约 6 000 万欧洲人远渡重洋，移民潮从 19 世纪 30 年代高涨起来。19 世纪的大部分移民都去了北美，其次是拉美(尤以阿根廷和巴西为多)、澳大利亚和南非。同一时期还有一波涌入俄罗斯帝国的欧洲移民暗流，这个帝国占据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拥有西伯利亚这片吸引移民的广袤空间。欧洲海外移民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达到高峰，1913 年有 150 多万人离开欧洲，其中意大利人占三分之一以上，还有将近 40 万英国人和 20 万西班牙人。而回到 50 年前，意大利人只占一小部分，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才是移民的主力。在任何时期，英伦三岛都贡献了稳定的移民人数；1880 至 1910 年间，有 850 万英国本土居民前往海外，而同一时期的意大利移民只有 600 万出头。 798

前往美国的英国移民占总量的比重最大(1815 至 1900 年间占到 65%左右)，但也有很多人前往自治殖民地；两者的比率自 1900 年开始发生变化，到 1914 年，后者已经成为主流。意大利和西班牙人也大批前往南美，意大利人还会到美国寻求机会。美国始终是所有其他国家民众最大的收容地，从 1820 到 1950 年总共吸纳了超过 2 300 万欧洲人，并且从中获益。

要给如此惊人的人口变迁找出解释并不困难。有时政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 1848 年以后的情况。欧洲人口的膨胀始终对经济构成压力，“失业”现象的产生就表明了这一点。同样的，19 世纪后期的几十年是移民人数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欧洲农民受海外竞争压力最大的时期。归根结底，移民的关键动力在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在其他大陆找到显而易见的机会、找到劳力的需求，而且前往其他大陆的交通也一下子便利和廉价起来。蒸汽船和铁路使人口构成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两者最大的效力都产生于 1880 年后。地方流动性因此而提升，于是劳动力的临时迁移和大陆内部交通都方便了许多。大不列颠输出爱尔兰农民、威尔士矿工和铁匠以及英国农夫；反过来也在 19 世纪末期吸纳了一批东欧的犹太群体，他们此后一直是英国社会中的

醒目元素。在一直堪称边境地区(如法国南部)特色的季节性劳动力迁移之外,如今又增加了长期的人口运动,波兰人前往法国的煤矿打工,意大利招待和冰激凌小贩成了英国的百姓。当政局变迁,北非海岸不再无法触及,该地也被来自欧洲的短途移民所改变;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被吸引到北非的沿海城市定居或从事贸易,从而创造出新的社会,不管是和移民者的母国社会相比、还是和新社群附近的当地社会相比,都存在引人入胜的差异性。

799

出行方式的简化不光给欧洲移民带来便利。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定居点到 1900 年时已形成气候。中国移民还进入东南亚,日本人则前往拉美;澳大利亚人对移民如潮的场面感到恐慌,遂以种族为标准限制移民,力图保留一个“白种人的澳洲”。英帝国提供了一个尺度巨大的框架,印度人群体在此框架下分布于世界各地。这些变动固然意义重大,但也不如欧洲各民族的最后一场大迁移来得显著,就和过去的蛮族入侵一样,这波 19 世纪的移民潮对未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在吸引的移民以意大利和西班牙裔为主的“拉丁美洲”(该术语是 19 世纪中期发明的),南欧人可以找到很多熟悉的景象。那里有天主教所打造的文化和社会生活格局,也有拉丁语种和社会风俗。其政治和法律框架也透射出往日帝国的余韵,在 19 世纪初那段彻底终结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对拉美大陆殖民统治的政治动荡时期,部分机构一直屹立不倒。这场动乱的爆发是缘于欧洲事态所导致的危机,令旧帝国的弱点放大为死穴。

这倒并不是因为缺乏努力,至少西班牙人并非不作为。与北部的英国人相反,西班牙本土的政府曾在 18 世纪试图推行全面彻底的改革。1701 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绝嗣,被波旁王朝所取代,西班牙帝国发展的新时代由此开启,不过要等数十年后才明朗化。变革首先带来重组,然后是“启蒙”改革。1700 年的双总督辖区制改为四个,另外两个位于新格拉纳达及拉普拉塔,前者覆盖巴拿马和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及委内瑞拉所在区域,后者从横贯大陆的拉普拉塔河入口一直延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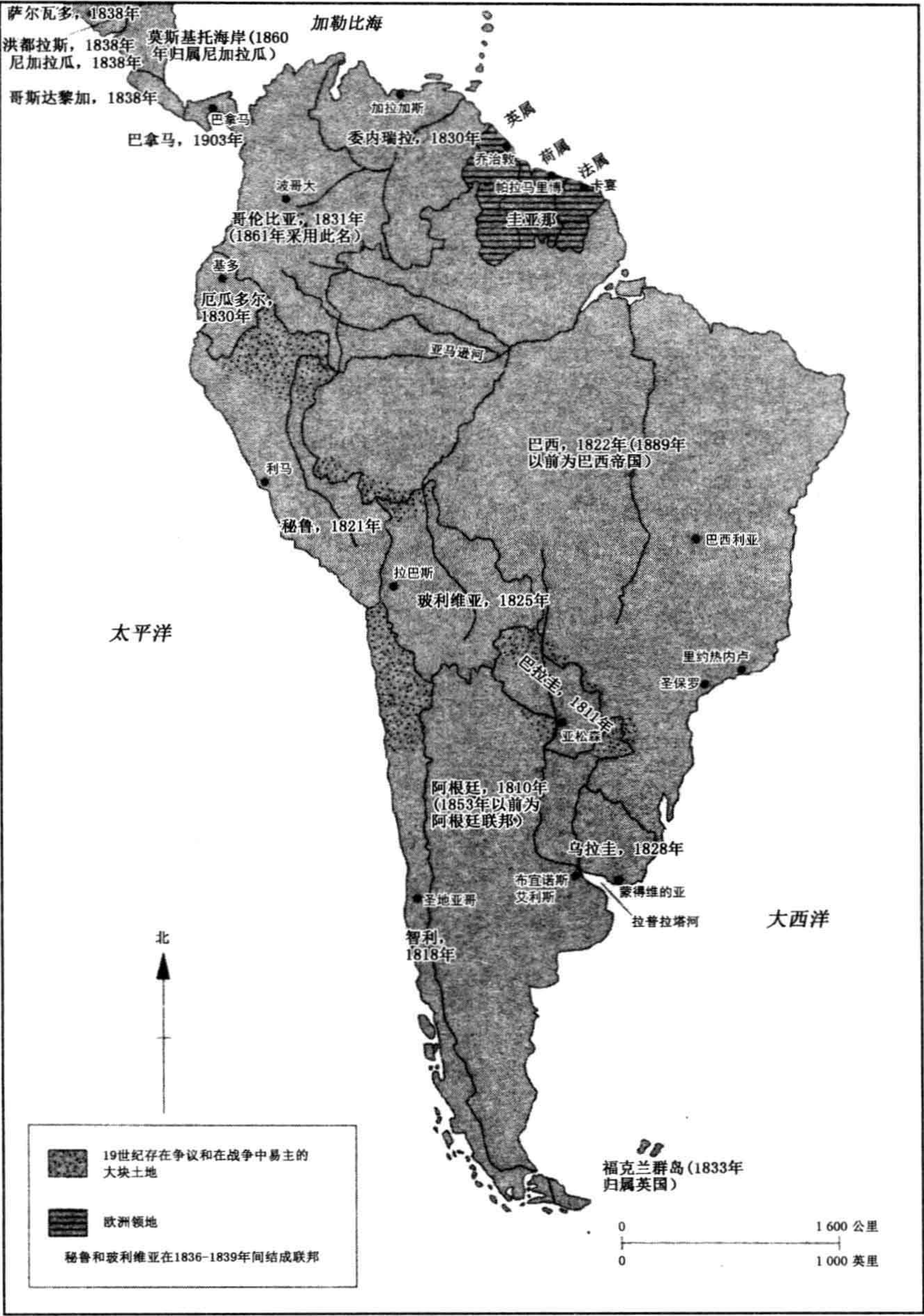
到秘鲁边境。完成使体制更合理化的结构重组后,西班牙对封闭的贸易体系进行松绑,起初是不情不愿的让步,尔后是推动繁荣发展的有意识措施。这些举措刺激了殖民地的经济,也打破了之前被塞维利亚港独享的殖民地贸易垄断,从而使西班牙其他地区(尤其是地中海沿岸)得益。

尽管如此,这些良好的趋势被那些改革无法触及的严重缺陷所抵消。接二连三的暴动揭露了西班牙帝国根深蒂固的流弊。巴拉圭(1721－1735)、哥伦比亚(1781)和秘鲁(1780)的暴动都对殖民政府构成货真价实的威胁,尤以秘鲁最为严重,只有投入大量军力才能控制。由于这些威胁及其他原因的存在,征募殖民地本地武装成为一种需要,这是一柄双刃剑,因为获得军事训练的克里奥尔人(*Creoles*)有可能会对西班牙人反戈一击。西班牙殖民社会最深刻的隔阂在印第安人和西班牙裔殖民者之间,但克里奥尔人和半岛人(*peninsulares*)之间的分歧带来了更直接和迅速的政治效应。随着时间的流逝,双方的分歧不断扩大。由于被禁止担任高等职务,克里奥尔人心怀不满,并注意到北美的英国殖民者成功地动摇了帝国的统治。法国大革命起初也引发了他们的遐想,而非带来警示。

800

随着事态的发展,西班牙当局又在其他方面遇到了麻烦。1790年,一场与英国的角力最终令西班牙放弃了由来已久的号称对南北美洲全境拥有的帝国统治权,在北美大陆禁止别国贸易或殖民的权利被废除,仅限在一处西班牙殖民地方圆30英里的范围内继续保留。战争接踵而至,首先对法国,随后对英国(两次),最后又与拿破仑入侵时期的法国开战。这些战争不仅令西班牙失去圣多明戈、特立尼达和路易斯安那,而且还终结了西班牙当时的王朝,国王本人于1808年在拿破仑的强迫之下逊位。而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地位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就已经终结。当西班牙本土最终也被法国入侵吞并,帝国政府陷入混乱和疲弱的状况时,克里奥尔人决定打破桎梏。1810年,新格拉纳达、拉普拉塔和新西班牙的起义点燃了拉美独立战争的烽火。他们起初并不成功,因为印第安人借机向所有白人开战,他们不得不在墨西哥应付一

801



萨尔瓦多，1838年
洪都拉斯，1838年
尼加拉瓜，1838年
莫斯基托海岸(1860年归属尼加拉瓜)
加勒比海
哥斯达黎加，1838年
巴拿马
巴拿马，1903年
加拉加斯
委内瑞拉，1830年
英属
荷属
法属
乔治敦
帕拉马里博
卡宴
圭亚那
波哥大
哥伦比亚，1831年(1861年采用此名)
基多
厄瓜多尔，1830年
亚马逊河
巴西，1822年(1889年以前为巴西帝国)
利马
秘鲁，1821年
巴西利亚
拉巴斯
玻利维亚，1825年
太平洋
里约热内卢
圣保罗
巴拉圭，1811年
亚松森
阿根廷，1810年(1853年以前为阿根廷联邦)
乌拉圭，1828年
布宜诺斯艾利斯
蒙得维的亚
圣地亚哥
拉普拉塔河
大西洋
北
智利，1818年
19世纪存在争议和在战争中易主的大块土地
欧洲领地
秘鲁和玻利维亚在1836-1839年间结成联邦
福克兰群岛(1833年归属英国)
0 1 600 公里
0 1 000 英里

独立后的南美

场种族战争。但西班牙政府既无力战而胜之,也无力聚集足够的实力粉碎进一步的叛乱势头。在英国海军实力的威慑下,欧洲保守势力无法介入协助西班牙,从而令门罗主义得到贯彻。于是,一批共和国在前西班牙帝国的残骸中成立,其中大部分由军人统治。

在葡萄牙统治的巴西,事态的走向有所不同,虽然法国 1807 年入侵葡萄牙引发了一场新的分裂运动,但这与西班牙帝国的分崩离析并不一样。葡萄牙摄政王本人从里斯本迁到里约热内卢,使该地成为葡萄牙帝国实质上的首都。虽然他于 1820 年以国王的身份重返葡萄牙,但将儿子留在了巴西,后者领导了一场抵抗运动,反对葡萄牙政府重获巴西支配权的企图,并且相对轻松地在 1822 年成为独立后的巴西帝国的皇帝。

现代南美地图能一目了然地揭示出北美和南美革命的诸多重大差异中最明显的一项:南美的独立战争没有诞生出像美国那样的国家。虽然伟大的英雄和领袖人物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对各个新成立的美洲国家于 1826 年在巴拿马召开的大会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此次会议还是一无所成。其原因不难理解。虽然十三个英国殖民地之间存在种种棘手的差异性,但在打败英国人之后,各地区的海上交通相对而言还是比较便利,也没有无法逾越的陆路障碍。而且,早在帝国统治时期,各殖民地就有一定的合作经验,也具备了自我治理的手段。纵然拥有这些优势,各地的分歧依然严重,使宪法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非常有限。所以毫不为奇的是,虽然大部分南方共和国都有相同的西班牙统治背景,这一优势也不足以让它们完成大陆的统一。 802

缺乏统一要素也许未必是一种不利,因为拉美在 19 世纪早期并没有面临迫切需要统一的危险或机遇。不同于美国的是,他们有大不列颠的保护。国内的后殖民时代问题比预想中要严重得多,也不太可能通过人为制造的统一得到更好的缓解。正如一个半世纪后非洲的情形一样,殖民统治留下的弊端之一是地理和社群单元并不总是与旧行政体制所划分的政治单元重合。由于曾为独立运动指引方向的城市少数群体无法控制同胞,这些幅员辽阔、人丁稀少、通过独立战争而成立的

国家不断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有一些也确实因此解体。此外还有种族问题；独立并没有消除由此产生的社会不公。关于这些问题，各个国家的情况并非完全一致。例如，阿根廷的印第安人相对较少，几乎被军队灭绝殆尽。在 19 世纪末，该国还因欧洲血统在其人口中的主导地位堪比欧洲本土而获得赞誉。作为另一个极端，黑人是巴西人口的主体，有很多在独立时依然是奴隶。异族结合是当地的一种传统，因此，在当今世界，那里也许是种族混血带来麻烦最少的地方。最后，一套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是南美殖民时代的一份重要遗产，其改变相当缓慢。这种关系后来将引发对南美大陆经济“依赖性”的批判。但这份遗产也有其另外一面，因为南美的大量财富是殖民的产物。巴西种植园内生长的每一种动植物都是欧洲人从海外带来的——蔗糖、咖啡、可可、牛、小麦。

803

在大量问题面前，新成立的拉美国家没有任何可以依赖的传统自我管治手段，因为殖民地行政属于专制式，没有建立代议制机构。为了寻找能够适用的政治原则，共和国的领袖们主要以法国大革命为借鉴对象，但这些思想过于先进，而在那些国家中，就连规模极小的精英集团内部都无法就接纳何种实践达成共识；他们无法构建相互容忍共存的体制框架。更糟的是，革命思潮很快把教会卷入政治，鉴于教会作为地主和民意引导者的巨大力量，这一结局从长远来看也许无法避免，但不幸的是，反宗教至上运动对当时的这片大陆而言是雪上加霜。在这些状况之下，该世纪大部分时期，每个共和国都很容易受考迪罗(caudillos)的摆布是毫不为奇的，在更强大的对手出现以前，这些军事冒险家连同其党羽所控制的武装力量足以呼风唤雨。

新成立的国家彼此开战，也爆发内战——有几场非常血腥——形成了 1900 年至今仍没有多大变化的版图。前西班牙殖民地中最靠北的墨西哥将北方的大片土地割给了美国。四个共和国在美洲大陆中部成立，还有多米尼加共和国及海地这两个岛国问世。古巴的独立已近在眼前。南方是南美十国，全都采取共和制，其中巴西在 1889 年放弃了君主制。虽然所有国家都经历过严重的国内动荡，但稳定程度和宪

政性质都差别很大。一名印第安人于 19 世纪 50 年代当选墨西哥总统，造成了很大的反响，但印第安人、梅斯蒂索人(*mestizo*，即混血儿)和欧裔(1870 年后因移民潮爆发而声势大增)之间的社会分歧依然无处不在。拉美各国在 1800 年共有大约 1 900 万人口；一个世纪后达 6 300 万。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财富增长的原因。大部分拉美国家都拥有一种或多种重要的自然资源，有时为此你争我夺，因为随着欧洲和美国工业化程度的提高，这类优势的价值也水涨船高。阿根廷拥有广阔的空间和若干全球最优良的牧地，19 世纪 80 年代问世的冷藏船令该国成为英格兰的肉类供应商，随后又成为英国的谷物供应商。在 19 世纪末，该国在拉美各国中的富庶程度首屈一指。智利拥有硝石矿(通过 1879 至 1883 年的“南美太平洋战争”从玻利瓦尔和秘鲁手中夺得)，委内瑞拉有石油；这两种资源的重要性都在 20 世纪有所提高。墨西哥也有石油。巴西实际上什么都不缺(石油除外)，最丰产咖啡和蔗糖。这份列表还能继续延长，但也只是进一步确认上文所表明的状况，即拉美财富增长的首要推动力来自初级产品。开发资源的资本来自欧洲和美国，从而在这些欧洲海外国家和欧洲自身之间结成了新的纽带。

804

不过，这种财富增长方式带来了两方面的副作用。其一是无助于降低这些国家的贫富差距，甚至可能有所增加。因此，社会与种族的紧张局面依然得不到充分的缓解。一个明显欧洲化的城市精英群体过着一种完全脱离印第安和梅斯蒂索大众的生活。拉美对海外资本的依赖性使这一矛盾更加尖锐。海外投资者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投资环境，这也合情合理。他们绝非始终能够如愿，但会在这种倾向性的引导下支持既有的社会和政治当局，从而使后者更加富得流油。仅仅进入 20 世纪后数年，这些状况所导致的局面就使得墨西哥发生社会革命。

因这些混乱而无法收回债款的海外投资人在气愤和失望的双重作用下引发一些外交冲突，有时甚至导致武装干涉。在该世纪期间，欧洲各国政府多次发出强硬的声明并用武力兑现，但追债一事至少没有被看成是殖民主义的复辟。1902 年，英德意共同发起对委内瑞拉的海上

封锁,意图为在委内瑞拉革命中受到损失的本国国民收回债款,美国对此作出了比门罗主义更进一步的回应。

从得州共和国时代起,美国与邻邦的关系就一直紧张,至今仍不安逸。使问题复杂化的因素实在太多。门罗主义表达了美国的根本利益,即避免欧洲干涉西半球。美国在 1889 年组织的第一届泛美国家大会是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另一步。但这再也无法阻止欧洲与西半球经济关系的强化,正如独立战争无法割裂美国与英国的往来(南美各国的投资人中也不乏北美人士,他们很快向政府提出了自身的特殊诉求)。况且,当世纪末来临,作为门罗主义背景的战略局势显然已发生变化。805 由于蒸汽船的问世和美国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利益份额的提升,美国变得大为敏感,尤其关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一带的局势发展,因为当地开凿巴拿马运河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20 世纪早期,美国对邻邦的政策因此而变得更为拙劣乃至傲慢。经过一场与西班牙的短促战争后,美国帮助古巴赢得独立(还从西班牙人手中夺走波多黎各),在新建立的古巴宪政中设立了专门的限制措施,以确保古巴维持美国卫星国的地位。通过干涉哥伦比亚内政,美国又得到了巴拿马运河一带的领土。委内瑞拉债务风波之后,美国以更强硬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和实力——即所谓的门罗主义“推论”。这份声明表示(也几乎马上就用行动在古巴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兑现),如果任何西半球国家的内政处于混乱局面、可能引发欧洲的介入,美国将有权对其进行干涉。随后,一名美国总统以此为依据于 1912 年向尼加拉瓜派遣海军陆战队,另一任总统在 1914 年占领墨西哥港口韦拉克鲁斯,以此逼迫墨西哥政府就范。1915 年,美国与海地签署协议成为其保护国,协议效力将延续 40 年。

这并非美国与邻邦的不和睦关系史的全部,但对本书来讲已经完全足够。不管怎么说,这些历史是拉美各国与欧洲关系定义模糊所造成的症候,因此才显得重要。这些国家的文化以欧洲为根、经济与欧洲相联,然而却在政治上受限,无法与欧洲互通有无。当然,在欧洲文化圈内外的差异和界线越来越分明的情况下,这并不意味着拉美各国不

属于白人的阵营，至少欧洲人是这样认为的。当欧洲人脑海中浮现出“拉美”一词，他们想到的是欧洲人的后裔、是少数受过教育的城市特权精英阶层，而非广大印第安人和黑人。

十三个殖民地反叛后不久，西班牙帝国即告垮台，这使很多人预期英帝国的其他殖民地也会很快挣脱伦敦的统治。这一结果确实发生了，但方式与预想中完全不同。19 世纪末，英国杂志《笨拙》(*Punch*)[①]刊印了一张爱国漫画，象征英国的狮子在图中心满意足地审视着一列荷枪实弹、制服披身、代表海外殖民地的狮崽。这幅图景相当合宜，因为当时英国在南非有一场至关重要的战争，而打仗的士兵是来自帝国各地的志愿从军者。一个世纪前，没有人敢预言宗主国能够从殖民地得到哪怕一个士兵。1783 年所发生的一切在英国政治家的脑海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们从中吸取教训，认为殖民地是棘手的东西，耗费财力、得益寥寥，让宗主国卷入与别国和土著民的毫无意义的争斗，到头来往往还被受施舍的对象反咬一口。此类观点产生了对投身殖民事业的怀疑态度，推动英帝国在 18 世纪末将利益着眼点转向亚洲贸易的可行性。远东没有欧洲殖民地，也就没有相应的复杂局面，而且东方的海域无需代价不菲的武力来保障，这是皇家海军无法轻易满足的要求。

806

总的来说，这将是英国官方在整个 19 世纪的主流态度。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他们处理任何一块殖民地的复杂局面时总以经济利益和避免麻烦为首要追求。在幅员辽阔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种方针疾风骤雨般地导致了各殖民地最终的统一，在联邦结构下享有各自独立的政府权责。1867 年，加拿大自治领成立，随后澳大利亚联邦于 1901 年问世。在两个国家统一之前，土著殖民地都建立了责任制政府，也都遇到过一些特有的困难。加拿大的突出问题之一是魁北克省的法国社群，澳洲的一大问题是殖民者和流放犯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其中最后一批犯人抵达于 1867 年。此外，两国都面积巨大而人口稀薄，只能通过

① 创办于 1841 年的幽默讽刺杂志，杂志名是指传统木偶戏《庞奇和朱迪》中的驼背丑角。——译者注

逐步的推动和聚合才能形成国家意识。两国的统一进程都相当缓慢:直到 1885 年,加拿大首条横跨大陆的铁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才打下最后一根道钉,澳大利亚的越洲铁路则因各州标准轨距不同而延误了很长的工期。到头来,对潜在外部威胁——来自美国的经济实力和亚洲移民——的关注度的提升,当然还有与英国的摩擦促成国家意识的成型。

新西兰也建立了责任制政府,但中央化程度更高,与其较小的面积相得益彰。欧洲人从 18 世纪 90 年代开始涉足该地,这些来客接触到当地的毛利土著民,并开始败坏他们发达而复杂的文化。传教士随后抵达,尽全力阻止殖民者和商人上岛,但收效甚微。当一名法国产业家将新西兰纳入法国利益圈的可能性凸显,英政府终于勉强让步于传教士和部分殖民者的压力,于 1840 年宣布对该岛拥有主权。1856 年,该殖民地被赋予责任制政府,与毛利人作战是英军撤离推迟到 1870 年的惟一原因。此后,旧省份马上失去了其残余的立法权。该世纪余下的岁月中,新西兰政府展现了出众的独立性,为追求高社会福利政策投入大量精力,并在 1907 年实现完全的自我管理。

807

一年前在伦敦召开的殖民大会决定把"自治领"这一称谓授予将来所有实行自治的属地,实际上,自治属地就等同于白人定居的殖民地。1914 年以前,还有一片地区会取得这一地位,即 1910 年成立的南非联邦。这是一段漫长而不幸的篇章的终点——英帝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章,而且这一章的终结仅仅换来非洲历史中的另一段不幸篇章的开始,有那么几十年比上一章显得更为凄惨。

1814 年,大不列颠出于战略考虑,保留了位于好望角的前荷兰殖民地,从此,英国殖民者才开始在南非定居。这片地区被称作"开普殖民地",很快来了大约几千英国人定居,虽然人数上不及荷兰人,但该地引入英国的法律和行事方式,所以他们能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此后一段时期,布尔人的特权逐步被蚕食——所谓布尔人就是荷兰农民的叫法。特别是,一旦随心所欲地处置非洲土著的自由受到任何限制,他们就尤其感到不满和激动。当英帝国在所有领土全面废除奴隶制时,

大约3.5万名属于布尔人名下的黑人获得自由,据说赔偿并不够数,从而引发一场别样的民愤。确信英国不会放弃这项偏袒非洲土著的政策后——鉴于英政府受到的压力,这是合乎逻辑的见解——布尔人于1835年大批离去。这场从北向南穿越奥兰治河的“大迁移”从根本上确立了南非白人的自我归属意识。一段漫长的时期就此开始,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布尔人在争斗中时分时合,始终心存芥蒂,在此过程中,他们的决断也将第三方卷入这场关乎非洲黑人未来命运的对立。

英国很快把一个位于纳塔尔[①](Natal)的布尔共和国纳为殖民地,用来保护非洲人免受压迫,防止一座荷兰港口的落成,以免将来某一天被敌对势力利用、威胁到英国与远东往来的航线。布尔人随即再次出走,这次远至瓦尔(Vaal)河以北。这是英国在南非的第一次领土扩张,该模式将来还会被重复使用。虽然英国政府和当地的英国殖民者有人道主义的一面,但由于必须和非洲人建立良好关系,他们也感到恼火。否则(就如祖鲁族对待布尔人的方式所表明)非洲土著会成为挥之不去的安全隐患,与印第安人在上个世纪对美洲殖民地的威胁不无相似之处。该世纪中期,北方存在两个布尔人的共和国(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开普殖民地和纳塔尔处于英国治下,拥有选举产生的议会,少数达到经济要求的黑人可以参与投票。此外还有受英国保护的土著邦国。在其中一个名叫巴苏陀兰(Basutoland)[②]的国家,布尔人还得受黑人的司法管辖,这种受制于人的状况使他们尤为不快。

808

如此状况之下,双方不太可能保持融洽的关系,而且不管怎样,英国政府常常与开普的殖民者意见相左,后者自1872年开始也有了自己的责任制政府。此外还有新的因素出现。钻石的发现使英国又吞并了一块领土,由于该地与奥兰治自治领的北部接壤,故而惹怒了布尔人。英国人向败给布尔人的巴苏陀兰人提供支持,使他们的怒气有增无减。开普殖民地政府又吞并德兰士瓦,这一愚行成了最后一根稻草。在布

① 南非东南部旧省,1497年得名。——译者注

② 莱索托的旧称。——译者注

尔人发动一场成功的起义、英军遭遇一场惨败之后,英国政府识时务地选择放弃,于 1881 年恢复了共和国的独立,但从此以后,布尔人对英国南非政策的不信任感也许再也无法抹除。

不到 20 年,这份不信任感就导致了战争,其主要原因是两起出人意料的变化和发展。一是德兰士瓦发生了一场小规模工业革命。该国于 1886 年发现金矿,从而导致海量矿工和投机者涌入,并吸引外部金融利益集团涉足南非,给这个南非白人国家提供了有可能摆脱英国宗主控制的财政资源,而这种从属地位他们原本就不愿接受。约翰内斯堡是此后事态发展的指标,在数年之内,该城就发展为赞比西河以南惟一人口达到 10 万的非洲城市。第二场变化是非洲其他地区在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被其他欧洲国家吞并,英国政府以更强硬的姿态和决心作为应对,确保其开普势力范围绝不动摇,他们认为该地是控制东方航路必不可少的要冲,并愈发依赖从往来德兰士瓦的贸易中得到的收入。总的来说,这一立场的结果就是英国政府容不得德兰士瓦获得印度洋独立入海口,哪怕一点可能性都不行。于是,英政府成了一个组合怪异的群体口诛笔伐的对象,其中有不切实际的帝国主义者、开普的政客、英国的煽动家和用心不良的金融家。在他们的鼓动下,布尔人于 1899 年发难,最终,德兰士瓦总统保罗·克鲁格 (Paul Kruger)发布最后通牒,布尔战争就此爆发。克鲁格童年时曾亲身经历前往北方的大迁移,对英国人的厌恶根深蒂固。

809

维多利亚时代众所周知的英军传统在这场女王统治期的最后之战中依然显露无遗,不管是若干高级指挥官和行政官僚的无能和拙劣,还是步兵团官兵面对勇敢且武装精良的敌人、在所受训练不足以战而胜之的情况下所表现出的英勇气概。但战争的结果毫无疑问;女王本人也以比若干臣子更高明的战略眼光评价道,失败的可能并不存在。南非战场被英国海上力量封锁,布尔人无法得到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的帮助,被占压倒性优势的人数和资源拖垮只是时间问题。英国人付出的代价十分高昂——超过 25 万士兵被送往南非,国内政坛频频发生尖锐的争执;而且在别国心目中的形象也算不得十分光彩。布尔人被视为

受压迫民族;话虽不假,但19世纪自由派思想对民族主义的迷恋蒙蔽了观察者的双眼,就和其他事件中的情形一样,使他们看不到民族主义掩盖下的真相。所幸英国政府充分恢复理智,拿出英明决断,在1902年以条款优厚的和约同已经败北的布尔人停战。

布尔共和国就此消失。但英国方面迅速作出让步;1906年,德兰士瓦已拥有自己的责任制政府,虽然矿业给当地带来大量非布尔人口,但布尔人还是通过次年的选举胜利控制了政府。甫一掌权,布尔人几乎马不停蹄地着手立法限制亚洲移民,尤以印度人为主(当时只有年轻的印度律师莫汉迪斯·甘地打入南非政界,担当同胞们的守护者)。1909年,为南非联盟起草的宪章得到各方认同,宪章的首要意义是为政府提供了经选举产生的议会,所依据的选举条例由各省敲定,此外也确定了荷兰语和英语的平等地位。在布尔人的省份,选举权仅限白人享有。

这一安置方案在当时引来大量评议。那时人们所谈论的南非"种族问题"是指英国人和布尔人的关系问题,让双方达成和解看起来是最为迫切的需求。此方案的缺陷要经过一段时间才显山露水。问题之所以最终暴露,不仅是因为南非白人的历史观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容易变通,而且也因为始于兰德(Rand)[①]工业化的南非社会转型无法停止,将给非洲黑人问题带来不可阻挡的冲力。 810

在这一方面,南非的未来,就像所有其他英国白人属地的未来一样,已经受到世界经济整体趋势的决定性影响。和美国一样,在平原上建成铁路之后,加拿大已成为欧洲的一大谷仓。澳洲和新西兰首先利用辽阔的牧场资源生产羊毛,越来越多的欧洲工厂成为其买家;随后,他们又在冷藏技术发明后将其用于肉类,新西兰还将之用于奶制品。以这种方式,这些新兴国家找到了维持经济的支柱产业,与17世纪种植园的烟草和靛蓝相比,这些产品能够支撑起的经济规模

① 威特沃特斯兰德(Witwatersrand)的简称,又译作金山,于1886年发现丰富的金矿,随后引来大批移民。——译者注

要大得多。南非的情形有所不同,因为其矿产国的形象是逐步显露出来的(和很久以后的澳洲一样)。钻石产业是其开端,但令矿产业突飞猛进的是19世纪80年代发现的兰德金矿。该金矿的开采活动吸引到资金和专业人才,为最终开发其他矿产打下了基础。南非给予的回报不仅是欧洲公司和股东所获得的利润,还有全球黄金供应量的扩大,这与1849年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一样大大刺激了欧洲的贸易活动。

由于英国人道主义和传教意识的增强,以及帝国殖民局怀疑殖民者要求这一由来已久的传统,英国人比在大平原上扫荡印第安人的美国人更难以无视白人统治区的土著民。然而在若干英国殖民地,受现代化冲击的不仅是古代文明——类似印度和南美的那些,而且还包括土著社会——若干土著群落文明程度极低,只达到旧石器或新时期时代的水平,也相应地非常脆弱。加拿大的印第安人和爱斯基摩人数量相对稀少,对西部和西北部的开拓所造成的阻碍不像为保护狩猎场而抗争的大平原印第安人那般严重。澳洲的历程则血腥得多。殖民活动惊扰了采集狩猎型社会中的原住民,无法理解当地部落的澳大利亚白人引发了这些部落的对抗和暴力行为,新型外来疾病又令他们人数锐减。每个澳洲殖民地的早期历史都染上了被屠杀原住民的鲜血;此后的历史也因对幸存者的无视、欺凌和压榨而恶名昭著。

811　也许,在前英帝国领土中,没有任何其他民族像他们一样遭受了与北美印第安人如此相似的悲惨命运。首批抵达新西兰的白人给毛利人带来枪炮,他们起先用这些武器彼此交战,对自身社会造成了颠覆性的后果。后来,毛利人和殖民政府多次开战,战争的根本起因在于殖民者要将他们驱逐出属于毛利人的土地。硝烟散尽后,政府采取措施保护部落领地以免再遭剥夺,但英国个人所有制观念的引入令部落财产分崩瓦解,到该世纪末已使他们的土地受到实质上的损失。毛利人的数量也有所减少,但不像澳洲原住民那样剧烈和不可逆转。如今的毛利人比1900年时多得多,其人口增长也快于欧裔的

新西兰人。

南非的情况则存在两面性。在英国的保护下,部分土著民得以在祖先的土地上存续到 20 世纪,生活方式的变化相当缓慢。另一些民族则被驱逐或灭绝。但无论何种情况下,南非与任何地区同然,问题的症结在于土著居民从来都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的生存取决于政府的利益和慈悲心肠、殖民者的需要和传统、经济机遇和危机在当地角力的结果。虽然从短期来看,他们有时会构成严峻的军事威胁(例如塞奇瓦约[Cetewayo][①]率领的祖鲁人或毛利人的游击战),但最终还是无法依靠自身的资源找到比阿兹特克人对付科尔特斯更有效的抵抗方式。非欧民族想要抵抗欧洲人入侵,就不得不接受欧化。在海外建立新欧洲国家的代价始终要由土著居民承担,还往往高到他们几乎不能承受的地步。

但我们的讲述不应就此为止,因为还有一个谜团未解:欧洲人亲眼见证这一切发生而没有加以阻止,他们该如何为此辩白?以他们都是贪婪的恶徒作为解释太过简单化(不管怎么说,其中也有作出不少善举的人道主义者,所以这一最黑暗的判断是站不住脚的)。答案一定隐藏在欧洲人的心理状态之中。有一部分原因是见识的浅薄或单纯的无知。有很多欧洲人能够意识到原住民受了伤害——哪怕白人与他们的接触是出于善意。但我们无法指望他们能理解欧洲文化对既有体制的侵蚀作用,这需要对人类学的了解和深刻领悟,而欧洲人尚未达到这一层次。令问题雪上加霜的是,很多土著文明看起来显然只是蛮族,欧洲人又有强烈的宗教自信。他们认定自己属于进步和改良的阵营,也很有可能相信上帝站在自己的一边。这份自信遍布欧洲扩张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在白人定居的殖民地、欧洲直接统治地区,还是在与依附国和"被保护"社会达成的安置方案之中。这份隶属于更高等文明的自信成了一把尚方宝剑,不仅令欧洲人养成与过去的基督徒相似的劫掠习

812

① 祖鲁族末代国王,1872－1879 年在位,有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被视为英国殖民统治的威胁。——译者注

气，也让他们油然而生一股在很多情况下和十字军相似的无耻豪情。正是由于认定给当地居民带去某些改良的心态一再蒙蔽了欧洲人，让他们无视于确凿发生的真实后果，看不到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让个人产权替代部落权益，将一无身外之物的猎人和采集者转变为雇佣劳力。

六、欧洲帝国主义和帝国统治

欧洲对异族人民和土地的统治是他们掌握世界最突出的证明。对于帝国主义过去和现在的定义，争论一直都没有停止，但姑且用“直接且正式的最高统治权”这一简单的概念作为开篇应不无可取之处，尽管这一定义模糊了非欧世界可能存在的其他欧洲权力形式之间的界线。关于人们投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著述和思考的帝国主义成因或动机，该定义既没有提出问题、也没有解答问题。从一开始，就有各种不断变化的成因在发挥作用，而且并非所有的动机都是见不得人或自欺欺人的。帝国主义所展现的不仅仅是一个时代，因为它纵贯历史的始终；帝国主义也不仅仅局限于欧洲和非欧世界的关系，因为这种统治形式遍布大洲大洋，欧洲国家也曾被其他欧洲或非欧国家所统治。然而，在 19 和 20 世纪，这一术语特指欧洲扩张及欧洲人对世界其余地区的直接主宰，当时，这一趋势比以往都要明显得多。虽然美国独立战争暗示着此前三个世纪中建立起来的欧洲帝国正在走向衰亡，但接下来的一百年间，欧洲帝国主义还将大踏步前进，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其过程可以分为两个泾渭分明的阶段，第一阶段显然是到 1870 年左右为止。当时，部分古老的帝国主义势力依然在大张旗鼓地扩张；例如俄国、法国和大不列颠。另一些帝国止步不前或今不如昔；荷兰、西班牙和葡萄牙属于这一集团。 813

乍看之下，俄罗斯的扩张与美国蚕食北美大陆、压倒弱小邻邦以及英国在印度的经历都有些相似之处，但它实际上属于相当特别的个例。俄国的西面是成熟且站稳脚跟的欧洲各国，从那里夺取土地的希望十分渺茫。对多瑙河流域的土耳其领地进行扩张的前景也好不了多少，因为其他国家始终有可能因涉及自身利益而介入，最终阻止俄国的脚步。该国在南部和东部的行动则要自由得多，并在19世纪的头七十多年取得巨大收获。打赢波斯人(1826－1828)令俄国人建立起里海的海上力量，也获得了亚美尼亚的领土。他们在中亚的扩张脚步几乎一刻不停，深入突厥斯坦、杀向亚洲中部的布哈拉和希瓦，并以1881年吞并整个外里海(Transcaspia)作为收尾。在塞尔维亚地区进行咄咄逼人的扩张之后，俄国又从中国手中攫取南抵海岸线的黑龙江左岸土地，在1860年建立远东首府海参崴。很快，俄国人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以甩掉在美洲的包袱，这或许表明他们有意称雄亚太，但无意染指美洲。

814

作为这一时期另两个活跃的帝国主义国家，英法在海外进行扩张。但英国的很多获利以法国的损失为代价，就此而言，历史表明，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是英法之间这场始于18世纪的旷世殖民对抗的最终回合。就和1714年和1763年的情形一样，英国通过1815年的城下之盟所取得的大量权益以强化其海上实力为意图。它保留马耳他、圣卢西亚、爱奥尼亚群岛、好望角、毛里求斯和亭可马里的所有权都是出于这一理由。不久之后，蒸汽船开始在皇家海军中服役，煤炭供应成为基地网络组建所必须考虑的问题，于是导致了新的占领行动。1839年，英国人借奥斯曼帝国内乱之机夺取亚丁这座在印度航线中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基地，其他兼并也随之而来。特拉法尔加战役之后，没有一个国家有成功对抗此类行动的能力。究其原因，并非是别国没有足够的资源——如果能动员起来，也可以夺走大不列颠的海上霸权。但这需要很大的投入。其他国家拥有的船只和海港都不够多，并不值得为此挑战这位海上巨人。对其他国家而言，有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国负责海上治安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

在制海权的保护下,英国各殖民地参与到当时飞速发展的贸易体系之中。美国独立战争之前,英国的政策就比西班牙或法国更鼓励商业冒险活动。所以,殖民地在早期就积累了财富和成功,使后来的自治领从中得益。另一方面,美国独立战争以后,伦敦当局对定居型殖民丧失兴趣,主要将它们视为麻烦和开支的源头。然而大不列颠却是 19 世纪早期惟一向既有殖民地遣送新居民的欧洲国家,那些殖民地有时还吸引母国进一步扩大对异国的领土统治。

815

在部分新领土(尤其是南非),人们对于亚非两地的交通和战略状况产生了一种新的不安。建立帝国是一桩复杂的工作。美国独立和门罗主义无疑减少了西半球对帝国扩张的吸引力,但英国利益关注点向东转移的源头始见于 1783 年以前,即南太平洋航路打通和亚洲贸易见长的时候。与当时依附于法国的荷兰所发生的战争又使英国获得了马来亚和印尼的新基业。最重要的是,英国在印度的活动一直处于持续深化状态。到 1800 年,印度贸易的重要性已经成为英国贸易和殖民思维中不言自明的核心。1850 年已有人力陈,帝国大片领土的取得完全要归功于来自印度的战略推动力。当时,英国对印度次大陆本身也已经实现完全的控制。该地区将一直是英帝国的核心部分。

这完全不是期望的产物,甚至难以预见。1784 年设立"双头控制"体系的同时,英政府还决定制止印度领土的扩大化;美洲叛乱的经历强化了他们要避免背上新包袱的观念。然而有一个问题挥之不去,因为东印度公司的收益管理活动使该公司不可避免地卷入当地的行政和政治事务之中。于是,避免公司成员私自作出越界之举——例如那些过去的私人贸易时代可以容忍的行为——变得更加重要;议会逐步达成共识,认为控制印度政府符合英国利益,不仅因为这可以带来很多生意,也因为伦敦政府有责任为印度人提供良好的政府管治。于是从中开始酝酿出一种托管的概念。不用感到吃惊的是,经过一个世纪,政府应为被管治民众带来福利的观念在欧洲不断深入人心,或早或晚,殖民地统治也将会援用这一原则。自德拉斯卡萨斯的时代以来,压迫原住民的行径已遭受过猛烈的口诛笔伐。18 世纪中期,一本雷纳尔神父

(Abbé Raynal)[①]所著畅销书(在 20 年内付印 30 版并出现大量语种的译本)用世俗化的启蒙人道主义立场表达了教会人士的批判。以这一深厚的历史积淀为背景,埃德蒙·伯克在 1783 年的一场关于印度问题的下议院辩论中指出,“在行使所有高于人民的政治权力时……应当想方设法使人民成为最终的受益者”。

816

所以,印度问题的背景是不断变化的。经过两个世纪,第一批抵达印度次大陆的商人对莫卧儿王朝的敬畏和惊奇迅速被鄙夷所取代,因为他们近距离观察和熟悉之后所看到的是落后、迷信和拙劣。但另一种变化的迹象已经出现。普拉西之战的胜利者克莱夫一生从未把任何印度方言学到流利的程度,而首任印度总督瓦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却竭力说服牛津大学设立一个波斯文化教授职位,促成第一家印刷媒体落户印度,并制作了第一套通俗语(孟加拉语)活字。印度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获得了更多的欣赏。1789 年,第一份东方研究学刊《亚洲研究》(*Asiatick Researches*)在加尔各答出版。同时,在更务实的政府层面,东印度公司的法官已受命在涉及穆斯林的家族案例中遵循伊斯兰律法,马德拉斯财政当局也对印度教庙宇和节日进行规范和资助。1806 年起,东印度公司的黑利伯里(Haileybury)学院开始教授印度语。

因此,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定期更新以英印关系的影响和前提不断变化的局面为背景。同时,政府责任亦有所增加。1813 年,伦敦当局进一步强化管控,废除该公司对印度贸易的垄断。当时,英国已经随着对法战争的进程将势力扩张到印度南部,其手段是吞并和与当地统治者达成的条约——旨在控制这些地方统治者的外交政策。当公司特许状于 1833 年再度更新时,只有西北部的地区不受公司直接或间接统治,成为领土上惟一的显著空白。随后,旁遮普和信德于 19 世纪 40 年代并入帝国版图,加上已在克什米尔确立的最高裁断权,英国人实质上

---

① 全名纪尧姆·托马斯·雷纳尔(Guillaume Thomas Raynal),其著述皆出版于1747－1762 年间,故无法确定究竟为哪一部。——译者注

控制了整片次大陆。

当时，东印度公司已经不再是商业机构，而是一家政府。1833 年特许状取消了公司的贸易功能(不光是与印度的贸易，还包括对中国贸易的垄断权)，将其职能限定在行政范畴之内；亚洲贸易从此实现自由化，这也切合当时的思想潮流。一条道路由此开启，使印度终于在众多现实和象征性的层面彻底告别过去，也让次大陆最终融入世界、融入现代化进程。作为一种象征，莫卧儿皇帝的名讳从钱币上消失，而档案及司法工作不再将波斯语作为正式法律语种使用则不仅仅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该举措不仅标志着英语一跃成为印度的官方语言(英语教育也随之成为官方教育语种)，而且还搅乱了印度各社群之间的势力平衡。事实证明，英化的印度人将比进取心较弱的穆斯林过得更好。在一片如此多元、多元化方式又如此纷杂的次大陆，把英语设为行政语种的规定还伴随着一个重要的决策，即初级教育原则上应使用英语讲课，尽管接受教育的印度人寥寥无几。

817

同一时期，接连几任总督实施的启蒙专制开始为印度带来物质和体制改善。公路和运河纷纷建成，随后第一条铁路也在 1853 年问世。各类法典开始生效。为公司效力的英国官员开始到为此目的而设立的学院接受专门培训。印度最早的三所大学成立于 1857 年。另外也有其他教育机构；早在 1791 年，一名苏格兰人就于贝拿勒斯兴办了一所梵文学院，令该地成为印度教徒心目中的卢尔德(Lourdes)。[①] 在印度逐步经历的转型当中，有很多并非直接来自政府的工作，而是来自越来越大的自由，让上述及其他机构得以放手发挥。传教士从 1813 年开始进入印度(此前一直被东印度公司禁止踏足)，并逐步在英国国内培养出另一批与印度事态存在利益关系的支持者——其立场往往令印度官方为难。在实际层面，有两种教会哲学为控制政府行动而展开积极竞争。一是实用主义，意在促进民众福祉；二是福音主义，旨在让人们得

① 位于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山中部的城镇。1858 年，一名少女宣称在城镇附近洞穴中多次幻见圣母马利亚，1862 年教皇宣布此事可信，从而使该地成为天主教圣地。——译者注

到灵魂的拯救。双方都自大地认定他们知道对印度最好的选择是什么。随着时光推移，两者都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英国人对印度的态度。

蒸汽船的出现也有其影响，令印度与英国靠得更近。更多的英国人和苏格兰人开始前往印度生活和开展职业生涯，使英国本身的面貌逐渐转变。18 世纪东印度公司数量相对较少的官员满足于流放海外的生活，通过商业机会寻求回报，在用来放松身心的社会生活中，他们有时与印度人关系十分密切。他们的生活往往与印度绅士极为相似，有的改吃印度食物、改穿印度服装，有的还娶了印度妻妾。而具有改革精神、旨在根除落后野蛮的当地习俗——就杀女婴和萨蒂（*suttee*）这类习俗而言，他们的想法很有道理——的官员，传播某种教义、对印度教或穆斯林社会的完整体系造成破坏的传教士，还有跟随在印度工作的丈夫前来安家的英国妇女——尤以她们最为突出，往往并不认同约翰勋爵[①]时代的公司成员那老一套的行事方式。他们改变了英国群体的脾性，与当地人愈发疏远，对自身的道德优越性愈发确信，由此认定有资格去统治文化和道德水准都较为低下的印度人。统治者有意识地与被统治者拉开距离。其中一人赞许有加地称自己的同胞为"好斗文明"的代表，将他们的使命定义为"把欧洲文明的精华带给一个人口稠密的国家，这些人极度无知，堕入偶像崇拜式迷信的深渊，慵懒无为、相信宿命，对大部分我们视为邪恶的生活场景视而不见，宁愿向这些罪恶屈服，也不愿去承受正视和消除罪恶的负担"。这份坚定的信念显得比上个世纪的英国人更有抱负，那些前辈在印度只顾一心一意地赚钱，没有任何其他想法。现在，虽然新的法律引起地方利益群体的强烈反对，英国人与印度人的社会接触却越来越少；他们逐步将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所能担当的行政职位限制在较低级别，自己则隐入一个封闭的世界，过着充满特权的生活。早期的征服者或多或少地被印度社会所同化；而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得益于现代科技，能够不断保持与祖国的联系，

8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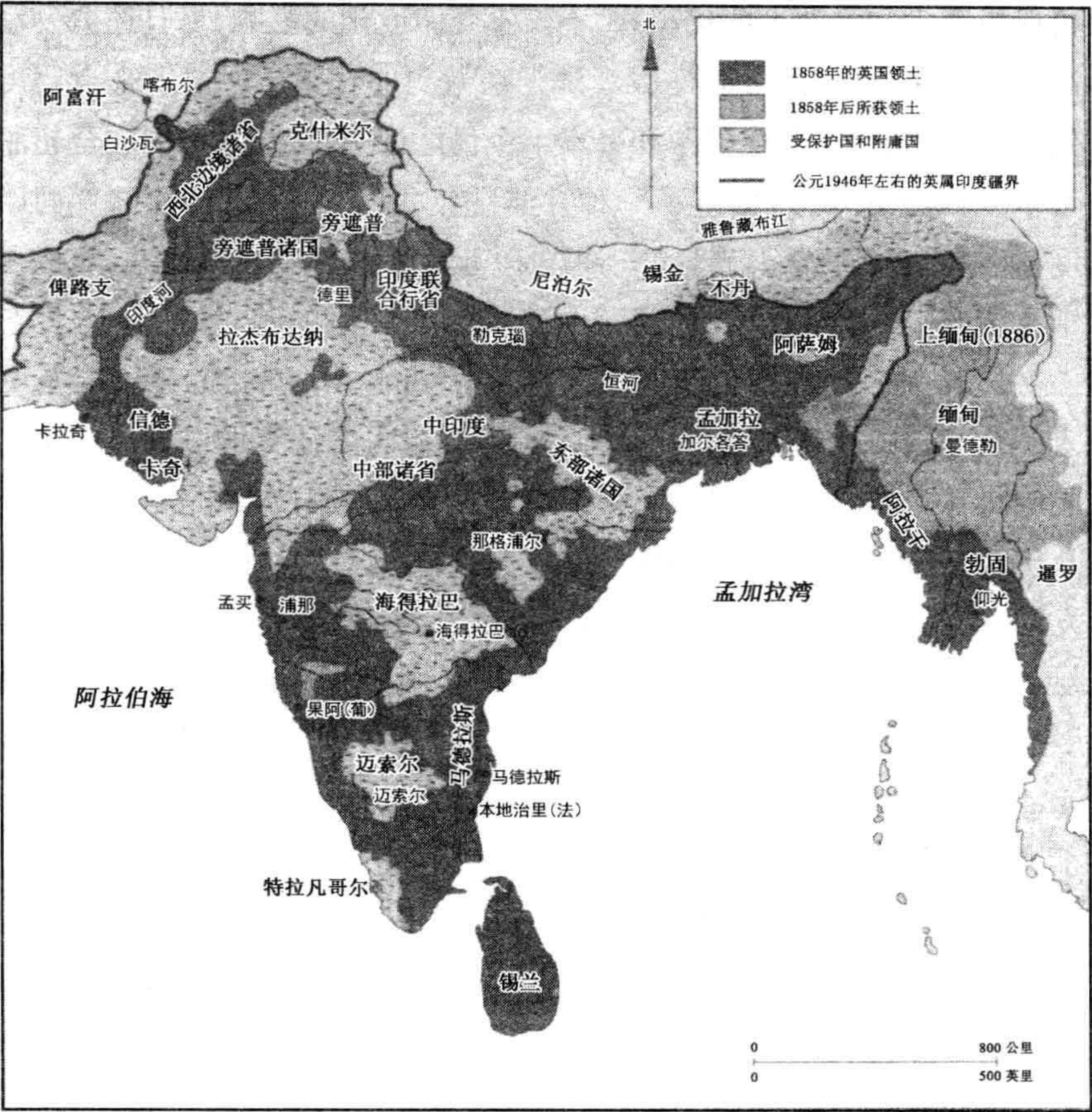
① 17 世纪的大商人和东印度公司总督约翰·班克斯勋爵，这里是指英国人充分融入印度社会的时代。——译者注

也保持智力和宗教上的优越感，不仅不受印度化的影响，而且还愈发高高在上，这是任何过去的征服者都无法做到的。英语中很多来自印度殖民时代的遗产，英式早茶和餐桌至今仍能证明，他们并不能完全超脱于印度社会之外，但创造了一种并非纯英式的文明，而且能够直面印度、视之为一种挑战；“英印”一词在19世纪不仅适用于混血儿，也适用于在印度工作的英国人，还蕴含一种独特的文化和社会气息。

1857年一场被称为印度军队哗变(Indian Mutiny)的骚乱对英国人的信心造成严重打击，从而令英印社会与印度社会形成彻头彻尾的隔绝状态。本质上，这是一系列暴动的连锁反应，导火索是一群印度士兵害怕一种要采用动物油脂上油的新型子弹会玷污他们的信仰，于是发动哗变。骚乱的细节能说明很多问题。大部分叛乱行为是传统社会对创新和现代化的自发反应，是反对进步的。当地统治者的怨气也是强化叛乱的因素，其中既有穆斯林也有印度教势力，他们对丧失的特权无法释怀，认为恢复独立的机会或许已经到来；毕竟英国人的数量极为稀少。而那些寥寥无几的英国人以迅速而无情的方式作出了回应。他们在忠于自己的印度士兵的帮助下粉碎了叛乱，尽管英国俘虏还是遭到了几次屠杀，一支英军曾在叛军控制区内的勒克瑙(Lucknow)被围困了数月。

819

这场叛乱以及镇压行动对英属印度来说是灾难性的，但还不算是彻底的灾难。莫卧儿帝国被英国人正式终结的最后结果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德里的叛军曾将其末代皇帝推为领袖)。这也并不像后来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所提出的那样是一场被彻底粉碎、其结局对印度而言堪称悲剧的民族解放运动。就像各民族史话中的很多重要篇章一样，这场叛变将作为一篇神话和启迪人心的传说而具备重大的意义；它在后世心目中的面貌比其真实面貌——蜂拥而上、本质上反动的抗议行为——要来得重要。其真正灾难性的重要影响是对英国人的善意和自信所造成的创伤。无论英国政策表现出何种意图，从那时起，在印英国人的心态就将被这段回忆所折磨，因为印度人的背信几乎造成致命的后果。这场叛变的意义犹如传说一般在印度英裔和本地人当中随着岁



英属印度(1858－1947)

820 月流逝而滋长。叛乱者实际犯下的暴行确实相当令人发指,但还有一些实际上未曾发生的罪名也被按在他们头上,作为实行压迫和排挤政策的依据。印度叛变也立即成为一个时代的体制性标志,因为它终结了东印度公司的统治。公司总督成了女王的总督,对一名英国内阁大臣负责。作为英属印度的体制框架,这一格局延续了 90 年。

这场叛乱由此改变了印度的历史,但只是推动它更坚定地朝着已经设好的方向前进。另一桩对印度具有同等革命效力的事实则是逐步发挥作用的。那就是与大不列颠的经济关系在 19 世纪的兴旺发展。贸易是英国次大陆势力的根基,也一如既往地决定着该国的命运。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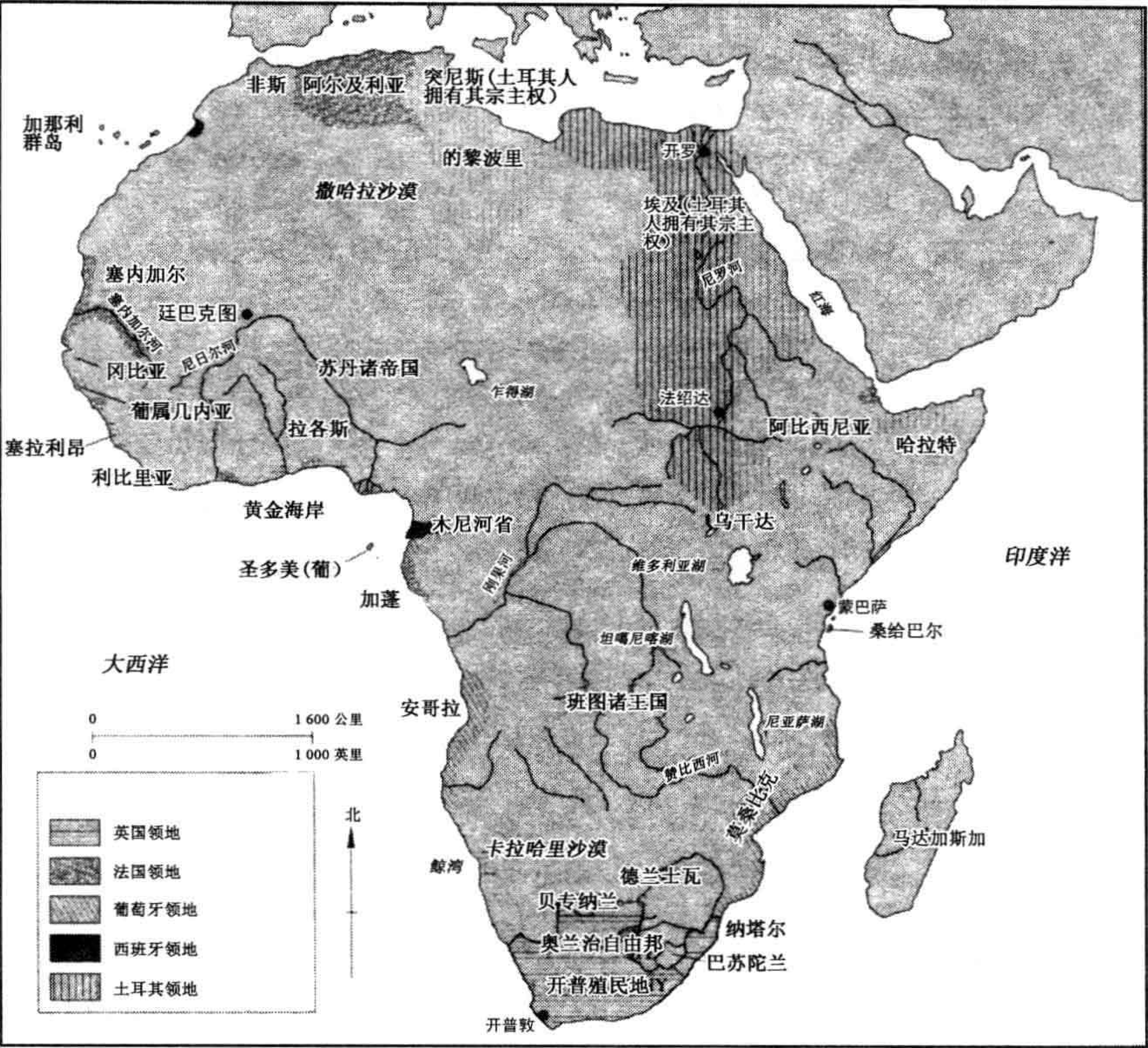
度成为对华贸易不可或缺的基地是英印经济关系中的第一个重大发展。其最大的规模扩张发生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由于一系列原因,进入中国变得容易了很多。大约同一时期,英国对印度的出口经历了第一次急速增长,尤其是纺织业,因此,叛乱发生之时,印度关系到重大的商业利益,相比过去的东印度公司,牵涉其中的英国人和英国商行要多得多。

此时,英印贸易的历程已与英国制造业霸权及世界贸易的整体扩张紧密契合在一起。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前往亚洲的货运成本得到巨额削减。到该世纪末,英印贸易额已翻了四倍不止,两国都能感受到贸易扩大化的效应,但对印度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因为倘若没有英国竞争所构成的障碍,他们的工业化进程也许会走得更为迅猛。因此颇为矛盾的是,贸易的增长反而拖延了印度现代化和告别过去的进程。但也有其他因素在推动印度的现代化。至该世纪末,在英属印度帝国所提供的体制框架和因此而得以实现的文化影响力的促进之下,现代化已成为印度存续不可或缺的条件。

19世纪早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像英国那样将自己的帝国扩张得如此庞大,但法国人也在1815年余下的帝国基业的基础上收获颇丰。此后半个世纪,法国在其他地区的权益(例如西非和南太平洋)依然值得一提,但法兰西帝国复兴的首个明显标志出现在阿尔及利亚。奥斯曼苏丹在该地统治力的衰微令整个北非对欧洲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扩张都不设防。在地中海东南沿岸一带,有人还提出了把土耳其人的国家解体的可能性。法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点其来有自,可追溯至该国18世纪在黎凡特的大规模贸易扩张。但更精确的界标应该是1798年在波拿巴率领下对埃及的远征,这是奥斯曼欧洲以外领土继承问题的开端。

821

1830年可以视为征服阿尔及利亚的起点,但并不确凿。此后发生了一连串的战争,直到1870年该国大体屈服为止,法国的敌人既有土著民,也有摩洛哥的苏丹。而这事实上开启了新一轮的扩张,因为突尼斯于1881年承认为法国的受保护国,从而成了法国人关注的目标。从此,欧洲移民开始涌入这些时而依附于奥斯曼的地区,规模一直相当稳



1880 年的非洲

822 定,他们不仅来自法国,也来自意大利,后来还包括西班牙移民。这些移民在若干城市形成了数目可观的定居人口,使得法国统治的史话更为复杂和曲折。非洲裔阿尔及利亚人可能像阿兹特克人、美洲印第安人或澳洲原住民那样被灭绝或濒临灭绝的时代已经过去。不管怎么说,其社会更具韧性,经受过那个一度与基督教世界棋逢对手的伊斯兰文明的熔炼。但法国统治依然使他们承受苦痛,特别是新土地法的引入打破了传统的土地使用方式,将农民完全暴露在市场经济的威力之下,从而变得更加贫苦。

在非洲最东面的沿海一带,首位不属于欧洲世界的现代民族主义领袖和伟人从埃及的民族觉醒中诞生,他就是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

里(Mehemet Ali)。他仰慕欧洲,力图借鉴欧洲的观念和技术,同时确保苏丹的独立地位。当他被苏丹召去为平定希腊人的叛乱出力时,穆罕默德·阿里萌生了夺占叙利亚的想法。这一举动构成对奥斯曼帝国的威胁,在19世纪30年代引发一场国际危机,法国则站在穆罕默德的一边。他们的企图并不成功,但在黎凡特和叙利亚地区追求利益的政策被法国沿用下来,并最终于20世纪换得了昙花一现的成果,表现为法国在该地区短暂的存在。

眼看英法两国趁着19世纪初期的大好机会收获颇丰,无疑是其他国家在1870年以后试图如法炮制的原因之一。但嫉妒心的刺激并不能完全解释各国在19世纪晚期的所谓"帝国主义浪潮"中表现出的非同一般的突然性和活力。到1914年,除南极圈和北极圈以外,全世界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土地没有服膺于欧洲或欧洲殖民国家的旗帜之下;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地区中,只有日本、埃塞俄比亚和暹罗享有真正的自主地位。

世人对其原因进行了大量的争论。纯粹的实力积累显然是欧洲帝国主义的一方面。欧洲霸权以自身的实力为基础,因此越来越难以抗拒。帝国主义理论和意识形态只不过是欧洲世界对自身拥有的巨大力量突然醒悟的产物,是合乎逻辑的结果。例如,从实际角度出发,当医学界能够控制热带传染病、蒸汽船提供了更迅捷的交通,在非洲建立永久据点并深入内陆就变得更容易了;这片黑暗大陆长久以来一直是欧洲人感兴趣的对象,但探索活动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开始具有可行性。由于这类技术发展,扩张能够促进和保护贸易投资的欧洲统治范围成为可能和诱人的事业。因为这类可能性而燃起的希望往往缺乏依据,结果也通常令人失望。不管非洲的"未开发地产"(一名英国政客出于想象的误导之辞)或是千百万一文不名的中国大众所构成的假想中的巨大消费品市场看起来多么诱人,各工业国最好的顾客和贸易伙伴依然是其他工业国家。曾经的或尚存的殖民地能比新占到的领土吸引到更多的海外投资。在当时,英国资本大多流向美国和南美,法国投资者对俄国的喜好大于非洲,德国资本多流向土耳其。

823

另一方面，有很多人为经济前景感到激动。因为他们的缘故，帝国扩张总是存在一份随机因素，从而难以概括。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探险者、商人和冒险家的行动多次导致政府获取更多地盘。他们往往是受人欢迎的英雄，因为这段欧洲帝国主义最活跃的时期也恰好是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提高最显著的时期。通过购买报纸、投票或在街头欢呼等形式，大众的政治参与度越来越高，而政治则把帝国主义竞争视为一种重要的民族竞争手段。新生的廉价媒体常常投其所好，给探险和殖民战争抹上戏剧化的色彩。有人还考虑，让国旗在更多新领土上空飘扬的遐想能够缓和社会不满，尽管相关人士明知这么做除了增加开支以外将一无所获。

但消极主义和利益驱动同样不是当时帝国主义的全貌。激励着部分帝国主义者的理想主义精神无疑使很多人的良心得到安慰。如果认为自己拥有真正的文明，就必然会觉得为了其他民族的福祉而实行统治是一份责任。吉卜林(Kipling)[①]就曾用一首著名的诗篇敦促美国人挑起白人的责任而非战利品。

因此，以 1870 年以后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为背景，有多种各不相同的元素彼此交融，以自身的逻辑对殖民事务施加影响。其细节无需赘述，但有两个长期存在的突出主题。一是大不列颠——作为惟一货真价实的全球帝国，领地无处不在——与其他国家针对殖民问题所发生的争执是最多的。印度越来越上升为英国的关注焦点；他们为确保开普海角的航路和夺取新开通的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而占据非洲领地，而且频频对印度西北部和西部开阔地所面临的威胁感到紧张，这都表明了英国人对印度的关注。1870 至 1914 年间，除了俄国涉足阿富汗以及法国试图在尼罗河上游立足之外，没有任何可能令大不列颠与其他列强开战的危机是属于欧洲以外地区的。此外，英国官方也非常关注法国在西非和印度支那的扩张以及俄国在波斯地区的影响力。

---

①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小说家和诗人，此诗名为《白人的责任》(*The White Man's Burden*)。——译者注

这些事实点明了第二个延续不间断的主题。虽然欧洲各国为海外局势彼此争吵了四十多年、虽然美国与其中之一(西班牙)开启战端,但列强对非欧世界的瓜分是在令人吃惊的和平态势下完成的。1914 年伟大战争爆发时,三个彼此为帝国霸业争斗得最激烈的国家大不列颠、俄国和法国都站在同一阵营,海外殖民地争夺并不是冲突的起因。1900 年后,惟一一场由于两个欧洲大国对非欧地区的领土争议而导致的战争危机发生在摩洛哥,这也并非货真价实的殖民地争端,而是德国能否威慑住法国、是否惧怕后者得到别国支持的问题。1914 年以前,对非欧问题的争议实际上或许是好事,让欧洲人无暇顾及更为危险的欧洲本土对抗,反倒有利于维护欧洲的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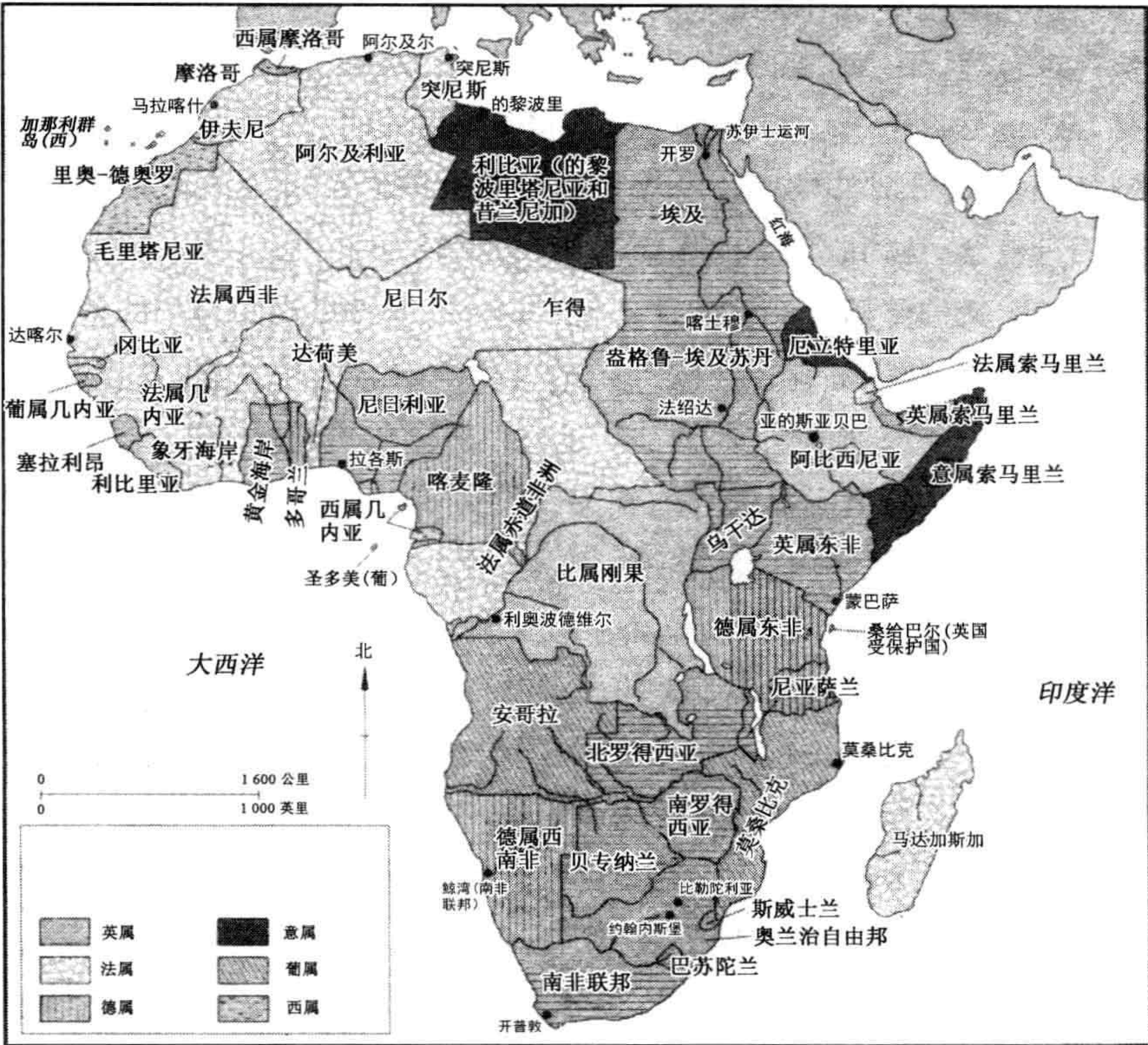
824

帝国主义对立有源于其自身的动力。当一个强国占得新的领土或殖民地,这几乎总会刺激别国去寻找更好的猎物。帝国主义浪潮以这种方式产生自激力。到 1914 年,其最令人震惊的结果可以在非洲看到。19 世纪早期,探险家、传教士和反奴隶制倡议者的活动已经培育出一种信念,认为欧洲人的统治向“黑暗大陆”的扩张应带来启蒙精神和人道主义的传播——也就是文明的福音。非洲沿海数百年的贸易历史已经表明,其内陆存在让欧洲人感兴趣的产品。开普殖民地的白人已经在朝内陆深处推进(他们往往是憎恨英国统治的布尔人)。这类事实构成了一种暗流汹涌的混沌状态,并在 1881 年爆发,一支英军被遣到埃及,以确保该国政府能够镇压一场民族主义革命,(英国人害怕)革命的成功可能威胁到苏伊士运河的安全。于是,欧洲文化的侵蚀力量——因为这是埃及民族主义的理念源泉——不仅让奥斯曼帝国的衰亡以轰轰烈烈的方式迈入下一阶段(当时埃及还是该帝国的一部分),而且还开启了所谓“掠夺非洲”的进程。

英国人原本希望能马上把士兵撤出埃及,可到 1914 年他们还陷在那里。当时,埃及行政实质上由英国官员控制,英埃两国的统治范围已经向南深入到苏丹一带。同时,位于利比亚和的黎波里的土耳其西部省份已被意大利人占取(突尼斯为法属领地,他们无法染指那片地区,并为此耿耿于怀),法国人则拥有阿尔及利亚,还能在摩洛哥予取予求,

825

只有西班牙人立足的地方例外。摩洛哥以南至好望角一带的沿海地区几乎完全被英、法、德、西、葡、比所瓜分，只有孤零零的黑人共和国利比里亚是惟一的例外。空无一人的撒哈拉沙漠、塞内加尔盆地和刚果以北大片土地都属于法国。刚果余下地区被比利时人占领，并很快勘探出非洲最丰产的几片矿区。再东面是英国领地，从开普往北一直延伸到罗得西亚和刚果边境。在东海岸，英国人的入海口被德属坦噶尼喀和葡属东非所阻断。一条带状的英国领地从肯尼亚港口蒙巴萨开始一路往北，穿过乌干达，直抵苏丹边境和尼罗河上游。被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英、意、法三国统治）包围的是除利比里亚之外惟一依然保持独立的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他们的皇帝领导着这个信奉基督教的古老国



瓜分非洲：1914 年的欧洲统治区域（在埃及成为英国受保护国之后）

家于1896年在阿杜瓦歼灭一支意大利军队，成为19世纪惟一一位能够凭借军事上的胜利避免殖民威胁的非欧洲统治者。其他非洲国家则无力抵挡，无论是法国人镇压阿尔及利亚人1871年的起义、葡萄牙人(不无困难地)平定安哥拉在1902年和1907年两度爆发的叛乱，还是最令人发指的、德国人1907年在非洲西南部的埃雷罗角的屠杀行径，都无不表明了这一点。

826

这场欧洲势力的巨大扩张主要发生在1881年以后，非洲历史由此转型。这是自伊斯兰教进入该大陆后最为重大的改变。欧洲使者的讨价还价、意外的发现和便利的殖民管理最终决定了现代化降临到非洲的方式。由于平息了部落间的战争，以及采用了哪怕只是初级的医护手段，部分地区的人口增长潜力得到释放。就如数百年前的美洲，新农作物的引入得以养活更多的非洲人口。然而，不同殖民体制造成了不同的文化和经济影响。殖民者离去后许久，各国——例如法国行政或英国司法实践已然扎根的国家——之间依然存在巨大的差异。整片大陆上的非洲人都找到了获取生计的新模式，通过殖民体制下的欧洲学校或福利学到了一些欧洲人的行事方式，他们的生活开始被白人的那一套所左右，并从中见识到可敬或可恨的别样事物。即使殖民者开始大加重视通过当地机构实行统治的方针之后——例如某些英国领地——这些影响力在新的背景下依然发挥着作用。部落和地方团体坚持自我，并成为非洲独立后的宝贵精神遗产，但它们要面对越来越大的、来自殖民主义下新体制的阻力。基督教的一夫一妻制、进取精神、新知识(在各种文化移植中，欧洲语言的移植最为重要，并开辟了非洲获取新知的渠道)，都有助于新的自我认同意识和更显著的个人主义精神的最终成型。20世纪的新一代非洲精英就是在这类环境下崛起的。不管帝国主义是好是坏，没有帝国主义，这些因素就永远无法施加如此有效、如此迅速的影响力。

相比之下，欧洲人几乎没有因在非洲的冒险事业而发生丝毫变化。欧洲人能够染指更易于掠夺的财富，这点诚然重要，但因为从非洲所得到的资源而使国家的未来发生改变的，也许只有比利时一例。有时，对

非洲的剥削也会引发欧洲国家之间的政治对立;其影响力是19世纪后期某些征服者和冒险家的所作所为无法比拟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对刚果的统治手段,以及葡萄牙属非洲的强制劳役都是声名狼藉的范例,但除此之外,欧洲人还借帝国权威之利疯狂剥削及掠夺其他非洲地区的丰富自然资源——包括人和物两方面,这种行径很快导致一场反殖民主义运动的爆发。部分国家征募非洲士兵,但没有送到欧洲服役,只有法国人例外,因为他们需要抵消德国人数量上的优势。部分国家希望利用非洲吸纳移民以缓解社会问题,但非洲为欧洲人提供的定居环境非常复杂。南部有两片大型白人聚居区,英国人后来又打开肯尼亚和罗得西亚的国门,两地都适合白人农民生息。除此之外,法属北非的城市中有欧洲人,安哥拉的葡萄牙种植园主也形成一个不断壮大的社群。而另一方面,意大利人将非洲作为移民安置地的希望遭到破灭,德国移民数量也微乎其微,而且几乎都属于暂居性质。部分欧洲国家——俄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则根本没有一人前往非洲定居。

827

当然,除了非洲之外,19世纪帝国主义史话中还有大量其他元素。太平洋的瓜分过程更平淡一些,但最终没有给这片大洋上的岛民留下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英法俄三国在亚洲的地盘也大大扩张。法国人控制印度支那,英国人则为了印度的安全及交通而占据马来亚和缅甸。英法两强认为双方的领地之间应该有所缓冲,因此暹罗依然保持独立。基于确保印度安全的类似考虑,英国还远征西藏,凸显自身的霸权。其中大部分区域,就像俄国人的大片陆上扩张区一样,之前都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两国的这段经历是中华帝国衰亡史的一部分,与奥斯曼、摩洛哥和波斯等其他帝国的式微平行发展,都与欧洲的影响有关,但中国的没落对世界史有着更重大的意义。“掠夺非洲”的局面一度仿佛将要重演,使该国也遭受被瓜分的命运。这段历史更适合放在别处讨论。眼下不妨一提的是,因为美国的参与,中国及太平洋一带的帝国主义浪潮也和非洲有着重大的差异。

在美洲这片美国人长期认为是上帝赐予他们的大陆之外,他们对

帝国主义冒险始终怀有不安和不信任的态度。即便在该国最为倨傲狂妄的时期,帝国主义思想也不得不采取在欧洲不必要的遮遮掩掩、欲露还藏的表达方式。美国本身的立国就是对帝国主义强国叛乱成功后的产物。其宪法不包括任何统治殖民领地的条款,也始终很难想见有任何领土可以被该宪法所接纳,除非以设立一个具有充分权限的州为最终目标,更不用提让非美国人受美国人的统治。而另一方面,美国19世纪的领土扩张有大量与帝国主义几乎别无二致的元素,尽管当时美国人也许不会承认这点,而将其笼统地定义为"昭彰天命"。[1] 1812年的英美战争和该世纪中期的美墨战争是其中最明目张胆的例证。但他们抢夺印第安人家园的行径和门罗主义的称霸姿态也不能忽视。

828

美国的陆地扩张完成于19世纪最后十年。政府宣布过去一直存在的边境居住区已成为历史。此时,由于经济的不断增长,商业利益对美国政府具有重大的影响力,有时表现为经济民族主义和高关税保护政策。一些商业利益将美国公众的注意力导向海外,特别是亚洲。有些人认为美国面临着被欧洲各国排除在贸易之外的风险。美国与东方有着为时不短的渊源(第一支美国远东船队始发于19世纪20年代),如今这份联系正面临断绝的危险,一个新时代已经开启,随着加利福尼亚州人口的急速增长,对太平洋地区的关注也与日俱增。人们对于一条横贯南北美洲之间的运河津津乐道了半个世纪,这一设想于该世纪末得以实现,也引起了部分战略家的兴趣,他们秉持这样一种主张,认为美国可能需要建立海上缓冲带才能贯彻门罗主义的方针。

这一切趋势汇成一股对外扩张的洪流,至今依然是美国对外帝国主义扩张史中独一无二的范例,因为它一度抛弃了对于获取海外新领土的传统限制。其开端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日两国对美国贸易的日益开放,以及美英德三国对萨摩亚的共管(美国在1878年建立了海军基地并一直保有控制权)。随后的20年间,美国对夏威夷王国的干

① Manifest Destiny,19世纪时流行美国的政治警句,后来成为一个历史名词,指美国有神授天命,必然要对外扩张、散播民主自由的信念。——译者注

涉不断升级，始于 19 世纪 40 年代的保护权限日益扩大。大量美国商人和传教士在那里扎根。于是，到 19 世纪最后十年，原本保护夏威夷人的善意被策划吞并该国的阴谋所取代。当时华盛顿已经在把珍珠港当作海军基地使用，但一场叛乱进一步导致海军陆战队的登岛。政府最终只能让步于美国岛民所掀起的声势，于 1898 年将短命的夏威夷共和国兼并为美国领土。

同年的哈瓦那港，一场神秘的爆炸案使美国巡洋舰缅因号沉毁，成了美国与西班牙开战的口实。这场战争有两方面的背景，一是西班牙长期无法平定古巴的叛乱，而美国人在那里拥有显著的商业利益，于是群情激愤；二是他们越来越意识到控制加勒比入海口的重要性，因为将来那里会有一条连通地峡的运河。在亚洲，美国人则协助菲律宾的另一场反抗西班牙人的起义。当美国取代西班牙、成为马尼拉的统治者，叛军把枪口转向过去的盟友，一场游击战就此爆发。这是美国摆脱其第一个亚洲殖民地的漫长而艰难的历程中的第一阶段。当时，鉴于中华帝国存在覆亡的可能，坚守不退看起来是华盛顿当局最好的选择。在加勒比海，西班牙美洲帝国的漫长历史终于走向终点。波多黎各转入美国之手，古巴以接受美国的控制为代价取得独立。1906 至 1909 年间以及 1917 年，美方势力两度以此条款为依据占领该岛。

829

这是美国帝国主义扩张的最后一波大潮的序曲。人们从 19 世纪中期就产生了兴建地峡运河的向往，苏伊士运河的完工更是增添了他们的信心。美国利用外交手段排除了英国人可能插手的障碍，一切看起来都顺风顺水，但 1903 年出了岔子，哥伦比亚人拒绝了一份为了获取运河区而向他们开出的协议。在将要成为运河通行区的巴拿马，一场革命正在酝酿。由于美国人的阻挠，哥伦比亚政府未能平息叛乱，全新的巴拿马共和国就此诞生，并投桃报李地向美国赠与他们需要的领地以及维持巴拿马秩序的干涉权。于是，运河的挖掘工作得以从 1914 年开始。能够迅速在两大洋之间调配船只的便利给美国的战略带来极大的不同。此外，这也是罗斯福总统提出的门罗主义“推论”所依赖的背景；当运河区成为西半球海上防御的关键，确保其政府稳定性和美国

在加勒比海的主导权变得前所未有地重要。美国也很快就明显加大了对这些地区干涉的力度。

尽管动机和手法存在差异——例如,美国的新领土上根本没有永久性的美国定居点——但美国的行为可以被视为欧洲民族最后一波领土占领大潮中的组成部分。除了南美,几乎所有欧洲或欧裔国家都参与其中,就连昆士兰也曾试图吞并新几内亚。到 1914 年,英俄两国的国旗插满了世界三分之一的土地和海洋(当然,究竟有多少俄国领土可算作殖民地并没有定论)。把俄国排除在外的话,1914 年的英国在本国领土以外统治着 4 亿臣民,法国有 5 000 多万,德国和意大利各有 1 400 万左右;这种正式对外统治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 830

不过,当时已经出现迹象,表明帝国主义在海外已成无源之水。虽然德国和大不列颠讨论过瓜分看似要步西班牙后尘的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可能性,但结果表明中国的现实状况令人失望,也没什么值得掠夺的对象。最有可能供欧洲帝国主义势力进一步扩张的对象是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1912 年,意大利人夺取的黎波里,次年,为反土而结成的巴尔干同盟又占领了该帝国几乎所有余下的欧洲部分,其灭亡看来已近在眼前。瓜分非洲没有引发大国之间的冲突,但奥斯曼问题的前景看来并不会如此风平浪静;毕竟对他们来说,此事牵扯到的重大利益问题要多得多。

七、亚洲对欧化世界的回应

831 眼光锐利的中国人也许能从耶稣会士在康熙宫廷所做的不合宜行止中看出一些端倪,正是这些起初令人甘之如饴的行为,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危机。一个多世纪间,这些才干出众的人士明智而审慎地努力取悦着东道主。起初他们只满足于学习中国的语言,甚至都不谈宗教。他们还穿起中式服装,据说给当地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这些做法换来了极大的成果,然而传教工作也顿时失去了效力,他们接受中国的礼仪和信仰、传播中国化的基督教,导致教皇两度向中国派遣使节,意图阻止这种不成体统的变通。如果当时的人无法看出,至少历史学者能够发现,这表明欧洲人和其他入侵民族不同,或许不会最终屈服于中国的文化同化力量。

其中有一份传递给所有亚洲民族的讯息,揭露了欧洲文化的强硬态度。亚洲将要发生的一切(而且也已经成为现在时)甚至比这些新来者所具备的科学技术更为重要。这无疑比东方各帝国任何暂时或特别的弱点(例如中国本身的历史所展现的那些)更具决定性的效力。在康熙之后几位皇帝的统治下,清帝国已经开始走下坡;考虑到中国以往各王朝兴衰循环的模式,其缓慢而最终致命的衰亡本身并不令人惊讶。令清朝的命运与过往朝代不同的是,该王朝存续时间够长,足以确立统治的权威,然而又要面临一个比中华传统更强势的文化所带来的新威

胁。经历近两千年的一成不变后,中国社会必须作出改变,而且并非缘于新一波蛮族征服者所强加的异族文化,这是破天荒的头一回。中国的革命即将开始。

任何 18 世纪的中国官僚都不可能预料到这一点。1793 年,当马嘎尔尼勋爵[①](Lord Macartney)提出平等外交和自由贸易的要求时,中华上下数千年文明积淀而成的自信完全没有动摇。西方世界的第一次试探和侵入被成功地加以排斥或限制。英王乔治三世的使者[②]仅仅带回了礼貌但强硬的回绝,中国皇帝并不介意称他为"远在重洋"的"咨尔国王"。[③] 此外还嘉许乔治"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并鼓励他"永矢恭顺",这当然不会让敕谕的措辞显得更合人心意。

832

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自然会产生文化和道德上的优越感,就像下个世纪的欧美传教士和博爱家,无意识地对想要服务的对象拿出了屈尊俯就的姿态。这体现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一切民族和国家都要向奉天承运的皇帝瞻觐朝贡,并理所当然地以为中国已经拥有一切最高等文明所需的物产和技术,只能容许在广州和欧洲人(在 1800 年可能有 1 000人左右)开展有限的贸易,除此以外的任何关系发展只是一种浪费时间精力、迁就欧洲的做法。这种想法也并不十分荒诞。经过将近三个世纪的贸易往来后,只有机械玩具和钟表令中国人啧啧称奇,其他欧洲制造业产品没有赢得任何需求。欧洲对华贸易依赖于向中国出口白银或其他亚洲物产。如某位英国商人在 18 世纪中期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东印度贸易 …… 消耗了我们的金银,输出的产品或制造业产能却微乎其微,反而输入了做工精湛的商品,阻碍了我们自己生产的产品的消费。"

但以回顾历史的眼光来看,不管中国朝廷对自身内部体制和文化优越性拥有多么巨大的自信,当时依然存在某些预示着未来困境的征

---

① 英国派往清朝的第一名使节。——译者注

② 即前文提到的马嘎尔尼勋爵。——译者注

③ 引自乾隆《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译者注

兆。秘密结社和密教崇拜一直在煽动排外式的民族仇恨,并且依然有其生命力,甚至更为茁壮。无法抑制的人口激增给这些组织带来了新的支持者;人口在一个世纪间翻了一倍不止,于 1850 年达到 4.3 亿左右。因为能够增加的土地极为有限,耕地压力显著激增,年景每况愈下,大量农民的生计变得越来越悲惨。18 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过危险的信号,就和过去那些屡屡标志着王朝衰落的暴动一样,大规模起义打破了此前一个世纪的国内和平状态。下个世纪早期,暴乱变得更加频繁、更具破坏力。雪上加霜的是,经济状况的恶化也伴随而来,银价飞涨,而赋税又必须用白银缴纳。大多数日常交易(包括工钱的支付)都使用铜钱,所以给本就困苦不堪的穷人增添了难以承受的重负。但这似乎并不算致命的问题,也许只有对朝廷除外。一切都没有脱离中国传统的历史循环模式。朝廷只需要地主乡绅依旧保持忠诚,即使不然,虽然清朝或许将被推翻,但没有理由怀疑另一个朝代不会按部就班地取而代之,重新获取他们的效忠,并保留中国那一成不变的帝制格局。然而这一次,因为 19 世纪西方蛮夷的威胁带来了驱动和能量,历史的进程将有所不同。

833

银价飞涨本身就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不到几十年,马嘎尔尼所得到的回复便成了一纸空文。1800 年前,除了白银之外,西方拿不出任何中国所需要的东西,但这一局面在 19 世纪接下来的 30 年间成为过去式,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英国商人终于发现了一种中国人想要而印度可以供应的商品:鸦片。向中国销售这类毒品(尽管起初受到一定限制)的大门是远征舰队轰开的,但奠定中西方关系根本变化的是始于 1839 年的“鸦片战争”在 1842 年终战时的一纸条文。广州的贸易垄断和外国人的朝贡身份一同被取消。一俟英国人踢开了对中国开展贸易的门户,其他国家也纷纷拾阶而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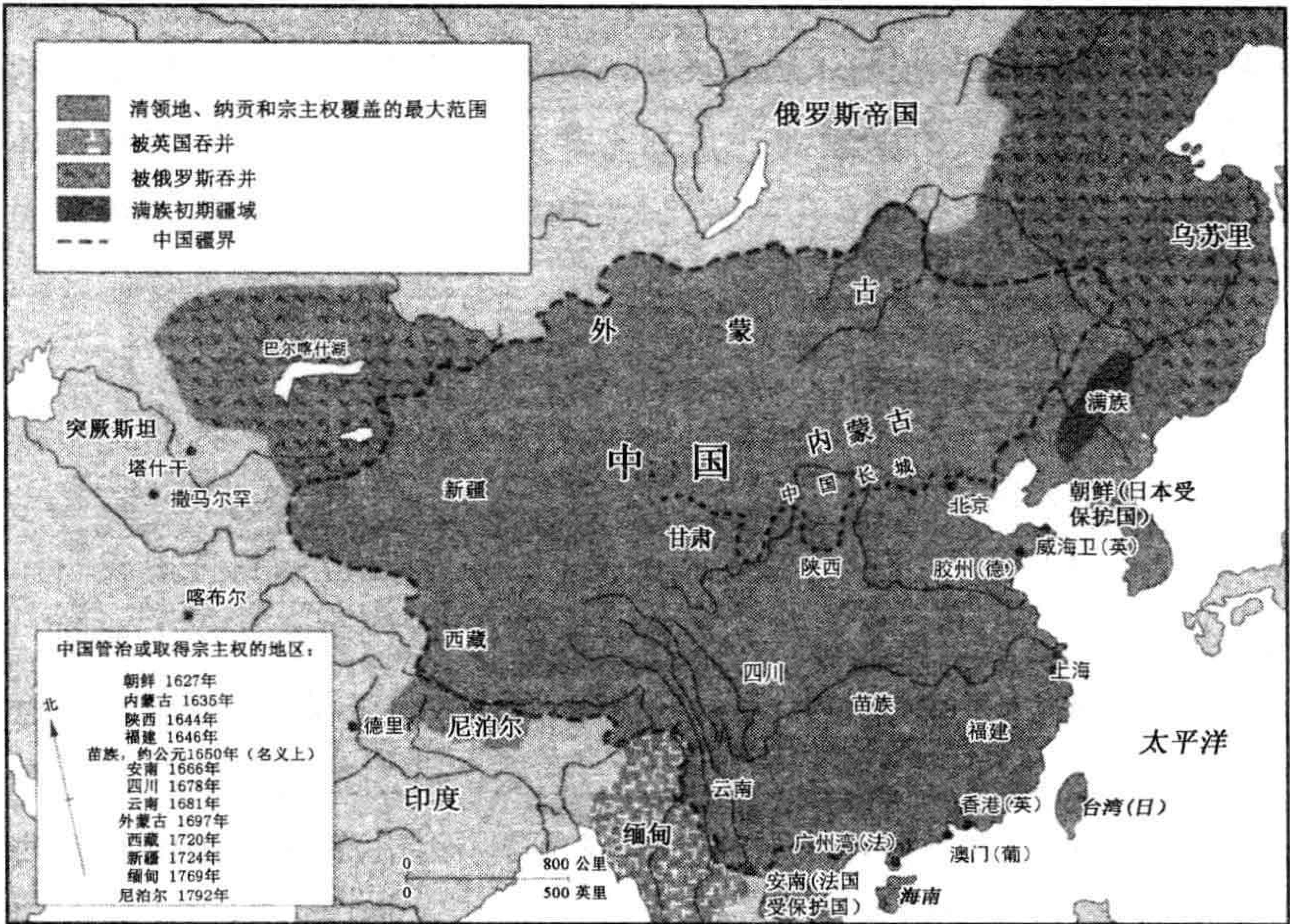
无意之间,维多利亚女王政府掀起了中国的革命。19 世纪 40 年代是长达百年的乱世的开端。这场革命将慢慢展现出两方面的排斥力,不仅针对外国人,也针对中国往日的大量传统。前一种抵制日益表现为属于进步阵营的欧式民族主义模式和论调。由于传统体制框架无

法包容这类意识形态的力量，当中国人力求排除现代化和奋发图强的阻碍时，它们最终将敲响体制的丧钟。鸦片战争结束一个多世纪之后，中国革命最终永久地埋葬了一套数千年来构成其生活基础的社会体系。但旧中国的大量元素在当时已经不复存在，而且，中国的困境在当时也已经成为一场波及范围更广的动荡、一场亚洲与西方的百年之战的组成部分，而20世纪早期正是这场战争的转折点。

但这些效果只是慢慢成形的。起初，西方对中国的蚕食通常只造成单纯的、排外的敌意，就连这种情绪也不是无所不在的。毕竟，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只有极少数中国人对异邦人的出现感到直接或明显的担忧。有些人(尤其是参与对外贸易的广州商人)甚至还努力地迎合他们。城镇暴民和农村地主的反英情绪是敌意的来源。一开始，官僚们并没有把它当成一场全方位的危机：这只是帝国黎民百姓对某种毒品上瘾的问题。尤其使他们蒙羞的是该问题揭示出的本国国民及行政体系中的弱点；鸦片贸易涉及大量贪赃枉法、丑恶腐败的勾当。他们起先没有看到未来将要面对更深刻的问题——即整个社会的体制将遭受质疑，也没有感受到文化上的威胁——中国过去也经历过失败，但其文化一直毫发未伤地存续至今。 834

19世纪40年代，清朝政府不得不承认传教活动的合法性，这是更深刻的危机到来的第一个征兆。尽管依然受到限制，但传教的合法化显然有损于传统的维护。有些受儒家思想浸淫的官僚感觉到其中的危险，在民间激起反对传教的情绪——传教士成为易受攻击的对象——令19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大量反教骚乱。这种表达情绪的方式往往使情况变得更糟。有时外国领事也会被卷入，偶尔还有炮舰被派去平乱。中国政府为此外递歉书、内惩罪人，在民众心目中的威望屡屡受损。同时，传教士们传扬着中国传统所陌生的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提供使人们趋之若鹜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以更直接和循循善诱的方式不断蚕食着传统社会的根基。清朝政府无法肃清基督教，这种无能有力地表明了其力量的局限。 835

中国的衰亡过程也受军事和海上力量的直接推动，被武力进一步



清朝统治下的中国

强加妥协。但中国的回应也愈发显得意义不明。官府对夷人的到来并不总是持抵制态度。这些外国士兵对朝廷未必没有价值，首先有此想法的是洋人周边地区的地主乡绅，随后北京政府也意识到这一点。社会动乱正在不断滋生，中国正步入一个周期性的、整个人类史上最为壮大的农民起义阶段。把这股力量的矛头完全引到洋人身上是不可能的，它总会威胁到现有体制。该世纪中期，流寇、邪教等耳熟能详的症候在各地大量涌现。19 世纪 50 年代的“红巾军”虽被镇压，但让官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此类麻烦令当局坐卧不安、四处救火，无力抵挡西方世界步步进逼的獠牙。对土地的渴求是这些声势浩大的暴乱最根本的起因，其中最重要和具有决定性的是从 1850 年延续到 1864 年的太平天国起义，但称之为一场革命更为合宜。

这场浩劫夺走的人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总和更多，其核心是传统的农民起义。歉收和一系列自然灾害对其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土地的渴求、对苛捐杂税的憎恨、对上流社会的妒忌和对满

人的民族憎恨(尽管几乎看不出有何实际意义,因为从事帝国行政工作的大部分官僚当然都是汉人)共同构成了起义的动机。这场动乱还具有地方色彩,源于南部,但发起者是一小批来自北方、被孤立的定居者。起义的背后存在一些新的特征,其中之一是叛军领袖洪秀全对基督教的美国新教分支相当熟稔,虽然不乏迷信色彩,但依然使人侧目,这令中国人和欧洲人都无法给动乱的本质作出定义。因此,他不仅以孝道和虔敬为新的关注点重新编写了摩西十诫,而且还谴责对其他神灵的崇拜、打破偶像、宣称要在地上建立皇上帝的王国,另外还推行其他与基督教有关的举措。他曾在出身寒门的中国人获取功名的科举考试中名落孙山,因此觉得自己被所属的文化抛弃。这是一场旧中国并不陌生的周期性农民暴动,并没有脱离那个熟悉的框架,但其中有一份新的意识形态在发生作用,并表现出对传统文化和国体的颠覆力。太平天国的部分对手立刻察觉到这一点,不仅把这场运动视为社会层面的挑战,也视为意识形态上的挑战。因此,可以把太平天国起义看作西方打乱中国传统秩序的过程中的一场划时代的事件。

836

太平军起初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胜利。1853 年,他们已占领南京,洪秀全自封为"天王",并在此开国立朝。北方朝野为之惊动,然而这就是他们所取得的最大成果。1856 年后,革命军开始转入守势。尽管如此,太平天国还是颁布了重要的社会变革方案(并得到后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赞扬),而且,尽管完全不清楚这些政策的有效范围乃至受欢迎范围究竟有多广,但的确对意识形态观念造成了实实在在的颠覆效果。太平天国社会的基本原则不是私人财产制,而是满足一般需求的集体供应制。土地理论上应分成小块分配,按品质分级,向众人提供公平的份额。更为革命的是,太平天国还宣布女性也拥有社会和教育平等。传统的裹脚习俗被禁止,某种程度的禁欲风气也体现了该运动的追求(尽管"天王"本人并不收敛)。这一切都体现出宗教和社会元素的混合,是太平教的根本所在,也对传统构成威胁。

起初,清朝军队因为败在欧洲人手里而士气低下,中国的中央政府对偏远地区又往往鞭长莫及,两者都使太平天国运动从中得益。随着

时间的推移,清军得到了更得力的将领(有时是欧洲人),太平军的弓箭长矛就不足以对抗了。洋人也开始觉得这场运动是一种威胁,但在与太平军对阵的同时一直保持着对朝廷的压力。大不列颠与中国签下条约后,法美也如法炮制,使基督教传教活动得到容许,并开始争取由领事和混合法庭负责审理洋人案件的领事裁判权。太平天国运动的威胁令清政府作出更多让步,开放更多中国口岸供外国贸易之用,让洋人掌管中国的海关,给鸦片销售赋予合法地位并向俄国割让后来海参崴落成所在的省份。因此,中国人在 1861 年决定成立一个全新的外交事务部门也就完全不足为奇了。那个全世界都认可"奉天承运"的皇帝、应该向中华帝国的宫廷进贡的老朽神话也就此破灭。

837 最后,外国势力加入反对太平天国的阵营。很难说终结这场动乱是否离不开他们的帮助,因为当时太平天国运动无疑已经在走下坡路。1864 年,洪秀全亡故,随后南京很快被清军攻占。这是属于中国传统的胜利:封建地主官僚的统治再一次顶住来自下层的威胁,得以延续其生命。尽管如此,历史已经走过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场动乱指出了一条革命的方向、宣告了一种新的威胁的诞生:对尊崇孔教的中国传统具有严重颠覆力的外来意识形态也许能令农民起义这一推翻统治的古老手段如虎添翼。太平天国动乱的终结也没有带来国内的和平;从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始、直到 70 年代后期,西北和西南地区一直有规模浩大的回民起义运动,其他叛乱也层出不穷。

突然之间,中国在西方蛮夷面前变得更为弱不禁风。大片土地在战火中荒芜;军阀在很多地方坐大,对官僚机构的掌控力构成威胁。就算人口的极大损失多少有助于减少土地所承受的压力,这一效应可能也被朝廷权威和声望的跌落所抵消。由于受这些不利状况的压迫,清朝早就别无选择地对西方列强作出让步;1856 至 1860 年间,英法势力每年都与中国发生摩擦。1861 年,两国与清朝签订条约,向西方商人开放的"通商口岸"增加到 19 个,常驻英国使馆也在北京设立。同时,俄国借英法得势之机获得了整条中俄边境的贸易开放权。此后还会有更多的让步。显然,曾经拔掉游牧族入侵者獠牙的方法不太可能对自

信满满的欧洲人起效，其意识形态保障和不断拉大的科技优势能够保护他们免受中华文明的诱惑。罗马天主教传教士获得购置土地和兴建楼宇的权利后，基督教与经济渗透发生了联系；没过多久，保护皈依者的愿望使他们插手干涉有关公共秩序和治安的内政事务。中国主权缓慢但不间断的沦丧是不可能遏制的。虽然从未正式成为殖民地，但中国开始沦入某种程度的被殖民状态。

此后，中国国土在该世纪余下岁月中逐步沦丧。俄国人在 19 世纪 70 年代夺取伊犁河流域（但后来又归还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此后十年间，法国人在安南扶植起一个傀儡政权。中国对周边国家松散但历史悠久的宗主权被横扫一空；法国人开始侵吞印度支那，英国人于 1886 年兼并缅甸。最沉重的打击来自另一个亚洲国家。在 1894 至 1895 年的战争中，日本人夺走台湾和钓鱼岛，而且中国不得不承认自 17 世纪以来一直纳贡的朝鲜取得独立。日本人的成功引来了其他列强的进一步蚕食，俄国人率先发难，夺占旅顺口。英法德都在该世纪末强迫清政府签下若干港口的长期租约。在此之前，比其他欧洲人来得更早的葡萄牙人已经将他们对澳门的租借变成了赤裸裸的占领。就连意大利人也来分一杯羹，尽管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利益。早在这一切发生之前，西方列强已经强迫清政府作出妥协、提供借款、签订协议，以此保护和促进其自身的经济和财政利益。所以毫不奇怪的是，该世纪末的一名英国首相会把国家分为两类，即“生存的和死去的”，中国被视作后者的突出范例。政客们开始谋划瓜分中国的方案。

838

19 世纪临近尾声时，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僚开始明白，传统秩序能够产生的能量不足以抵抗这些新来的蛮夷。因循古法的尝试以失败告终，新的潮流开始涌现。清朝政府内出现一批“洋务派”，认为西方思想和发明也许不无裨益。其领导者以彼得大帝及同时代的日本改革家所取得的成就为依据，后者的例证更具说服力，因为日本在 1895 年的战争中显现出相对中国的优越性。虽然这些未来的改革家有意为儒家学说加以净化、注入活力，但依然不希望动摇孔教的根基。他们是地主阶级的成员，并赢得了皇帝的认可，得以在传统体制框架和权力机制

下开展工作,在无损于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基础的前提下推行行政和科技革新。

不幸的是,这意味着 1898 年的百日维新(这一短暂的改革所得到的称号)几乎从一开始就陷入宫廷政治的漩涡,卷入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的对抗,更不用提汉人与满人的敌对关系。虽然颁布了一系列带有改革性质的圣旨,但很快就被太后发动的政变所推翻,皇帝本人也被软禁。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改革者的政治手段相当幼稚,从而激起了反对派的行动。然而,尽管遭受失败,他们毕竟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这必将成为极大的刺激,促使中国人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进行更广泛、更深刻的思考。

不过在当时,中国似乎又走回了老路,以更老套的手段来应对外部威胁,作为一段夸张的插曲,"义和团"运动就表明了这一点。这场运动本质上是固步自封、盲目排外的民众暴乱,但被慈禧太后加以利用,得到了官府的鼓励。拳民杀害传教士和信徒,刺杀德国大使,还围攻北京的外国公使馆;他们的行为再次揭示了中国存在随时可资利用的、对洋人的恨意。然而,他们的行为也表明旧制度完全指望不上,因为该运动由组织中最保守的势力主导,而非寥寥无几的改革派成员。义和团运动最终被外来军事干涉力量所镇压,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次所有列强在同一指挥体系(统帅是一名德国人)下联合行动的范例,也令中国蒙受了又一次外交上的耻辱;清廷被迫向洋人交出海关控制权,用来支付这场动乱的巨额赔偿金。

839

义和团运动的终结令中国陷入更为动荡的境地。改革已经在 1898 年失败,反动势力控制着国家的未来。也许革命是惟一的出路。经历过整编、接受过西方军事培训的部分军官开始思考这一问题。流亡中的学子也早就开始会面和探讨国家的未来,这类活动在东京最为活跃。日本乐于支持有利于削弱邻国的颠覆运动;1898 年,他们创立"东亚同文会",打出"亚人治亚"的口号。在中国青年激进派眼里,日本人极富威望,作为亚洲人,他们挣脱了传统的桎梏,没有像印度那样被落后的传统拖入深渊,而中国当时也快要被吞噬,日本却能够以平等的

立场面对西方。另一些学子在别处寻求支持,还有一些求助于历史悠久的秘密社团。其中有一位名叫孙中山的青年。尽管他的成就往往被后人所夸大,但毕竟发起了整整十次革命尝试。19 世纪 90 年代,他和同仁们的要求仅仅是成立立宪君主制政府,但在当时,这是一项非常激进的主张。

不满的流亡分子得到海外华商的支持,他们的数量不少,因为华人一直非常擅长做生意。1905 年,在这些商人的帮助下,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了名为兴中会的革命团体,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和土地改革为目标。兴中会打算与洋人和解,在当时的局势下,这是明智的举措。其纲领体现出受西方思想家影响的痕迹(尤其是英国激进主义者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美国经济改革家亨利·乔治[Henry George])。西方再次为一场中国的改革运动提供了激励和部分理念武装,中华民国的执政党最终将从这场运动中崛起。

840

不过,兴中会成立的意义也许不如同年的另一事件来得重要:传统科举制度的废除。科举制度的选拔方式为官僚体制提供了内部的一致性和凝聚力,比任何其他制度都更有力地承载着中国文明的传统。其消亡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中国大众和特权统治阶级之间的差异终于不复存在。同时,留洋归来的学子不满于他们的所见所闻,而且无需参加科举考试就能进入政府,不必为环境改变自己,从而造成了颠覆性的深远影响。他们大大加快了中国社会受西方思想影响的速度,再加上一支现代化军队中的士兵,越来越多的人认为革命就是前方的出路。

慈禧太后和傀儡皇帝相继死于 1908 年,此前已经发生过多起革命。时局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清政府的改革步伐依然迟滞不决。清廷作出了重大的原则性让步,支持更多的学生出洋深造,但也无法与过去彻底决裂,又不能放弃任何属于满族人的帝国特权。也许对清朝政府是无法提出更多的要求了。到 1911 年,局势已经变得相当恶劣。地主阶级显露出失去凝聚力的迹象:面对颠覆势力,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支持官府。朝廷内部存在几乎僵持不下的派系斗争,清王朝只能有效控制一部分中国领土。汉口的革命指挥部在 10 月因意外暴露,于

是匆忙发动起义。当年早些时候,革命派已经发起过几次暴动,但都遭到不同程度的镇压,而这一仓促之举却取得了成功。当时身处美国的孙中山也吃了一惊,他的名号曾被之前的起义者所借用。

政府军事领导人的变节决定了革命的进程。其中最重大的事件是袁世凯的倒戈,当他掉转枪口,清朝的失败就已经注定。“奉天承运”不复存在,1912 年 2 月 12 日,时年 6 岁的清朝末代皇帝被废。以孙中山为临时总统的共和国当时已经宣告成立,一个崭新的民族主义政党很快在他身后成型。3 月,他将总统职位让予袁世凯,以此承认新共和国权力的真正归属,并开启了中国政治的新篇章——位于北京的中央政府支持宪政,但各地军阀才是中国实质上的控制者,双方的对抗成为中国政治一下阶段的主题。在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之前,中国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这个国家已经迈上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征程,最终将恢复 19 世纪丧于洋人之手的独立地位。

841

对于一名眼力不深的观察者而言,面对来自西方的挑战,19 世纪初的日本不比中国更有成功的把握。该国所显示出的一切都带有根深蒂固的保守痕迹。然而,自从幕府成立以来,很多状况都发生了改变,而且更深刻、更迅速的变化即将来临的征兆也已经出现。矛盾的是,德川幕府本身所取得的成功是造成变化的一部分原因。这一时代为日本带来了和平,其明显后果之一是令日本的军事体制变得过时而低效。武士们显然属于寄生阶级;作为战士,他们只能无所事事地聚集在所属大名的城堡内,空事消费而不事生产,造成社会和经济上的难题。漫长的和平时期还导致生产力的激增,对德川幕府时代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日本当时已经是具有一定发展水平的多样型社会,具备货币经济,其农业萌发了对旧有封建关系造成冲击的准资本主义体制萌芽,而且城市人口也在增长之中。幕府末年,日本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大阪有三四十万居民,东京人口可能已突破 100 万。自 17 世纪以来,金融和贸易格局的规模和复杂程度都获得极大增长,为这些大型消费中心提供了存在的保障。这些地方欣欣向荣的景象对商贩低人一等的陈旧观念发出了无声的嘲笑。甚至连他们的营销技巧也是现代式的;早在 18

世纪,三井家族(两个世纪后依然是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大支柱)就向因下雨困在店内的顾客赠送饰有自家商标的雨伞。

有很多此类变化为新财富的创造奠定契机,而幕府并没有从中获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需求的增长依然保持着原有的步调,无法从改变中获得好处。幕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自各大名上缴的米税,其税率一直固定不变,按 17 世纪的生产水平估算制定。因此,耕种和土地开垦水平的提升带来了新的财富,但增加的财富没有表现为税率的提升,而是保留在富农和村长手里,从而加大了农村的贫富差距。贫农经常被迫进入城镇的劳力市场,这是封建社会解体的又一个标志。幕府大量铸币,令城市的通货膨胀更加严重,只有商人能活得滋润。最后一次经济改革的尝试在 19 世纪 40 年代遭受失败。大名的财力日渐窘迫,使手下失去信心;德川幕府末期,部分武士开始涉足他们所不擅长的贸易领域。大名的税收所得依然和 17 世纪的前辈一样,一文不名、对时局不满的浪人随处可见——还有一些名门家道中落,只能回忆往昔与德川家族平起平坐的时光。

842

由于对西方思想的封闭早已不是铁板一块,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的暗流变得更为凶险。一些书籍通过对荷兰开放的一小片通商口岸进入日本,使若干博学之士产生兴趣。在技术的接受能力上,日本与中国有着很大的差别。“日本人才思敏锐,对所见到的一切都能迅速加以学习。”一名 16 世纪的荷兰人如是说。他们很快掌握并利用欧洲火器的优势——而中国人从未这么做,并开始自行大批量生产。他们仿制欧洲钟表,而中国人则视之为玩具。他们渴求来自欧洲的知识,没有被自己的传统所局限,而中国人却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大名的采邑内设有显赫的学府或“荷兰学术”研究中心。幕府本身也批准翻译外文书籍,对于日本这个文化普及率如此之高的社会,这是意义重大的举措,因为幕府时代的教育实在太过成功:就连年轻武士也开始探求西方的思想。这个岛国相对较小,交通状况也不错,便于新思想的流传。所以,当突然面对前所未有的、来自西方的新挑战时,日本的境况就不像中国那般糟糕。

西方与日本接触的第一阶段终于17世纪，只有少数荷兰人被允许在长崎岛上从事贸易。欧洲人还无法对这一结果发起挑战。19世纪40年代，中国的命运表明这种状况不会一直持续下去，部分日本统治者看在眼里，危机感不断提升。欧洲和北美人都对打开亚洲贸易的大门产生了新的兴趣，也具备了无法抵抗的新力量。荷兰国王警告幕府将军，闭关锁国的政策将不再现实。但关于抵抗和妥协究竟何为上策，日本大名之间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最后，美国总统在1851年派海军准将佩里去打开日本的国门。第一支驶入日本海域的外国船队在他的率领下于1853年抵达江户湾。次年，佩里再次来袭，并让幕府破天荒地与外国列强签下一系列条约。

843 以儒家的眼光来看，佩里的到来是幕府末日将临的征兆。毫无疑问，有些日本人也是这么看待的。但幕府并没有马上灭亡，面对入侵者的威胁，他们在若干年内的反应显得混乱而不统一。日本统治者没有直截了当地推行彻头彻尾的妥协政策（也没有驱逐国外势力的进一步尝试），这个岛国未来的方向直到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才确定。不过，在数年之内，西方还是取得了以一系列所谓“不平等条约”为体现和象征的成果。贸易特权、西方居住者的治外法权、常驻外交代表和限制日本鸦片出口是美、英、法、俄和尼德兰从日本赢得的主要让步。此后，幕府很快走到了穷途末路；无力抵抗蛮夷是促成其倒台的因素之一，另一因素是两大封建势力的严重扩张威胁，他们借鉴西方军事技术，力图用一套亲手控制、更有效和中央化的体制来取代德川幕府。德川幕府和敌对派之间爆发冲突，但随之而来的并不是向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倒退，而是天皇权力的复归和新政体的建立，即始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

天皇在当了数百年有名无实的装饰品之后重掌实权，随后，民众广泛接受改革自新的革命主张，其中最大的动力来自一批最有学识的日本学者，他们热切地渴望逃离相对西方“可耻的低人一等”的状态，这种状态可能令他们落入与中国和印度相同的命运。19世纪60年代，幕府和若干藩属已经向欧洲派出好几批使节。攘夷的骚动平息下来，以

便向西方学习其强大的秘密。其中存在一种悖论,就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情况一样,根植于保守主义社会观的民族主义将会为捍卫传统而发展自我,到头来却使传统大量消亡。

皇宫迁至江户,作为开启明治"维新"和日本重生的象征;而废除封建制是第一步,也是不可或缺的第一阶段。四大藩自愿归顺天皇、交出领地,令这一原本困难而血腥的工作得以轻易完成,并在一篇交给天皇的呈文中表明了自己的动机。呈文中说,他们是将本就属于天皇的东西交还,"以利政行一统,方可与举世之国同侪"。这是一种爱国道德观的朴素体现,正是这份道德观激励着此后半个世纪的日本政府,也在这个文化高度普及的国家广为传播,使地方政府可以让民众对举国目标的接受程度达到别国不可能达到的高度。诚然,这类表现在其他国家也并不罕见。日本所特有的,是看到中国的命运所带来的紧迫感、日本社会与道德传统对该理念感情上的支持,以及天皇本人可以成为现有体制合乎道义的、不仅仅执着于守成的权威这一事实。这些条件促成了一场日本式的光荣革命:由保守派发起的革命开启了激进变革的道路。

844

日本以极快的速度借鉴了西方政府和社会的大量体制元素。县级行政结构、邮政、日报、教育部、征兵制、第一条铁路、宗教宽容和改换阳历都在明治维新的前五年实现。地方政府的代议制体系在 1879 年设立,十年后,一个两院制的帝国议会在新宪法下成立(并已为上议院的组织准备了一批贵族)。事实上,鉴于宪法行文中强烈的权力主义倾向,这套体制并不如表面上看来那般革命。大约同一时期,创新的激情也开始显露端倪;对西方事物的狂热期已过,这种热情直到 20 世纪后半才在日本重现。1890 年,帝国政府发布《教育敕语》,被日本辉煌时代的几代学子所诵读,向他们注入了传统儒家式的忠孝意识、服从精神和必要时为国家牺牲自我的觉悟。

旧日本的大部分元素——也许是最重要的部分——都在明治维新中保留了下来,而且仍然有非常明显的存在感;这是现代日本成功的秘密之一。不复存在的部分也很多。尽管政府以公债的形式为大名提供

了慷慨的补偿,但封建制度再也无法复辟。该国走上新道路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旧阶级体系的废除。可以看出,明治政府为取消武士特权下了不少工夫,部分武士可以从他们所获得的新机遇中得到补偿,例如新的官僚体制、从事生意——不再是下贱的行当——以及现代陆军和海军。在创建这些机构时,日本借鉴了国外的制度,因为他们希望使用经实践证明的优秀体制。普法战争后,他们逐渐抛弃法国的军事顾问,开始沿袭德制;英国人则为他们的海军出谋划策。日本青年被派往海外求学,了解西方的卓越和咄咄逼人的强大背后的其他秘密。在这批青年及其长辈中,有很多人展现出了令人难以不为之动容的热忱,他们的成就也使人无法不为之侧目,远远超越了日本当时的水平。部分最具热情和决心的改革活动家被称为维新志士,并激励了印度、中国等亚洲各地的后世民族主义领导人。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他们的精神依然鼓舞着当时的日本年轻军官,掀起最后的、最具破坏力的帝国主义侵略浪潮。

845

作为衡量改革家成果的指标,经济成就是最粗略的一种,但确实非常震撼。他们比在幕府时代的和平所造就的经济基础上有进一步提高。这不光包括借鉴西方科技和经验、确保日本释放出一波没有任何其他非西方国家能成就的增长高潮。该国还幸运地拥有大量将利益动机视为天经地义的企业家,也无疑比中国等其他亚洲国家更富裕。另外,抑制通货膨胀、解除令日本难以发挥全部潜力的封建桎梏也是实现这一伟大迈进的部分原因。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升是变化来临的第一个标志,不过从中获益的农民少之又少,他们在 1868 年占总人口的五分之四。通过扩大水稻用耕地和提高土地的耕作密集度,日本得以养活了 19 世纪不断增加的人口。虽然其他财政来源所占份额的提升令政府对土地税的依赖有所降低,但农民依旧是这个重获新生的国家中负担最重的那部分人。直到 1941 年,日本农民依然没有从现代化中得到多少收获。他们落后于其他阶级,仅仅一个世纪前,其祖先在预期寿命和收入上还与英国农民大体持平,但才到 1900 年,这种描述就远远不能反映事实了。日本的非农业资源很少。节节升高的土地税成为

国家产业投资的来源。消费水平一直不高,虽然还没到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工业化时期那般痛苦的地步。较高的储蓄率(1900 年为 12%)令日本不用依赖外国贷款,但同样抑制了消费。扩张政策的好处一目了然:到 1914 年,日本已具备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国产化的军工、在外国投资者眼中通常较高的信用等级,并完成棉纺及其他纺织业的大幅扩张。但上文也表现出了该政策不利的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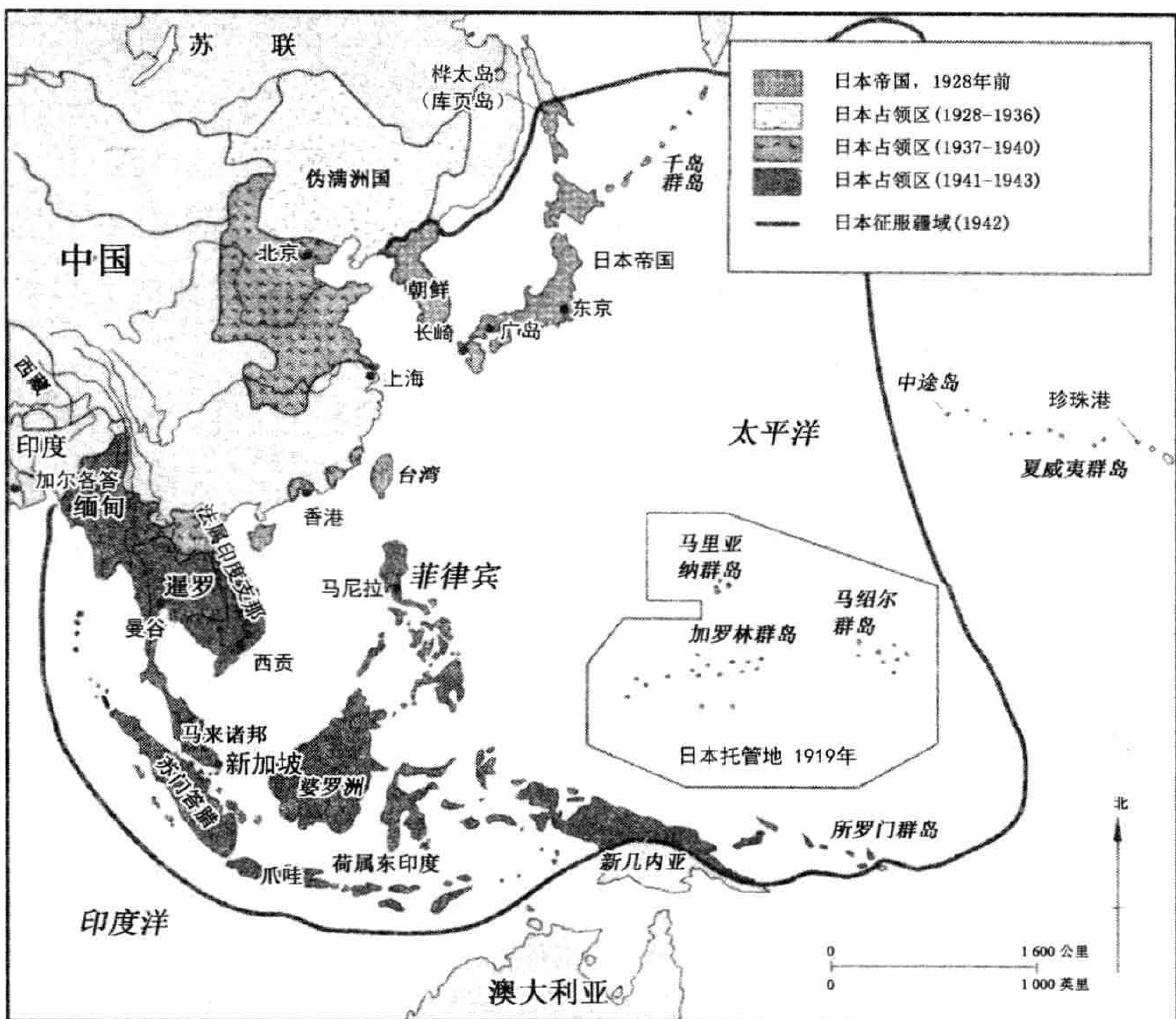
到头来,日本不得不为这些成果付出沉重的精神代价。他们甚至在学习西方的同时也依然保持排外。儒家学说的"外来"宗教影响,乃至最早的佛教都遭到日本国教神道教教徒的攻击,早在幕府时期,他们就开始强调天皇作为神祇化身的地位。忠于天皇成为大和民族关注的焦点,取代了新宪法所体现的原则主张,如果不是那样的文化背景,日本宪政原本是可能朝着自由主义的方向发展的。该政体的特征更多表现为帝国警察的镇压行动,而非自由化的制度。然而,鉴于明治维新时代的政治家所面临的两项重大使命,事实上很难找出不倚重权力主义的办法。经济现代化并不是指现代意义上的经济规划,而是政府的强力措施和严厉的财政政策。另一个问题是秩序。曾因无力抵抗来自边境的威胁而一度失势的皇室现在又遇到了新的危机,因为并非所有保守派都能说服自己接受新的国家模式。麻烦的源头之一是心怀不满的浪人——即没有主人可依附的武士。另一源头是农民的悲惨境地;明治时代头十年发生的农民起义达将近两百起。[①] 在 1877 年的萨摩藩叛乱中,政府的新式征兵制军队展现出了高出保守派一筹的实力。这是最后几场反维新叛乱之一,也是保守派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反扑。

846

武士中的不满分子逐渐把精力投入到新政府的工作当中,但这对日本来说只能算是喜忧参半。他们在特定领域的国民生活中强化了刚硬的民族主义精神,最终使日本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在第一时间,这份精神不仅倾向于表现为对西方的憎恨,也会表现为直接针对毗邻亚洲大陆的侵略野心。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内的现代化进程和对外的

① 原文意为"好几打",不合中文语境,经查证为 190 余起,故如此改动。——译者注

847



日本扩张(1895－1942)

军事冒险往往彼此制肘，但从长期来看，两者的方向是一致的，即帝国主义。群众和民主运动尤其能感受到帝国主义的压制。

中国最终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受害者，相比于西方各国所施加的苦痛，其亚洲同胞带来的折磨要严重得多。起初，日本只构成间接的威胁。欧洲人动摇了中国对周边附庸国的统治地位，势力范围覆盖西藏、缅甸和印度支那，日本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进犯长久以来一直向北京纳贡的古国朝鲜，从那里对中国本土发起威胁。日本对该地的利益诉求由来已久。其部分理由属于战略层面；在对马海峡，日本到亚洲大陆的距离是最短的。但日本也对俄国可能存在的远东扩张野心有所顾虑，尤其是满洲一带，并担心中国无力抵挡。他们于 1876 年对朝鲜公然采取行动；在陆海军联合进逼(就像欧洲对中国、佩里对日本所

发动的行动一样)的威胁之下,朝鲜同意对日本开放三个港口并互派外交代表。这是对中国的挑衅,日本对待朝鲜的方式与对待独立国家无贰,并直接与其谈判,将宣称对朝鲜握有主权的清廷视为无物。有些日本人甚至想得到更多。他们还记得日本过去对朝鲜的入侵和在沿海成功开展海盗活动的历史,并觊觎该国的矿产和自然资源。维新政治家没有立刻屈服于这种压力,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只能延缓而不能终止这股势头。19 世纪最后十年间,日本更进一步,以中国为对手发动了明治维新以来的第一场大规模战争。他们赢得了完全的胜利,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场国耻,1895 年,西方列强集团强迫日本接受一份和约,其条款对日本而言远远不如中国已被迫接受的那份(其中包括公开承认朝鲜的独立地位)来得优厚。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日本对西方的憎恨与侵占亚洲的扩张野心融合到了一起。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就已经令民众的不满情绪甚嚣尘上,1895 年调停结果所带来的失望更是使民意沸腾到顶点。日本政府本就打着自己的算盘支持中国的革命运动,现在更为后者打出一条“亚人治亚”的口号。另外,西方列强也开始看清,与日本打交道和欺凌中国完全是两回事。日本逐步被认可为“开化”国家,不会受到和其他非欧国家同样的对待。变化来临的象征之一是治外法权的废除,1899 年,这个代表欧洲强权的屈辱标志终于不复存在。随后是 1902 年的英日同盟,日本以十分明确的方式被接纳为西方的一员。按当时的说法,日本成了欧洲的同伴。

848

当时,俄国是远东最强大的欧洲势力。该国在 1895 年的远东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后的势力推进更让日本人看清,如果不抓紧行动,觊觎已久的朝鲜就可能成为别人的盘中餐。满洲的铁路建设、海参崴的开发、俄国人在朝鲜——亲俄派和亲日派的斗争就是该国政治的全部——的商业活动都使他们产生警觉。最严峻的威胁在于,俄罗斯人已经从孱弱的中国政府手中拿到了旅顺港的租用权。1904 年,日本向俄国的远东势力开战,双方在满洲交战一年,以俄国遭受屈辱性的失败作结。沙皇对朝鲜和南满州的野心就此灰飞烟灭,日本的影响力开始

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地区也被日本所控制，并持续到 1945 年。但这场战争的意义不仅仅是日本的获胜，这是自中世纪以来，非欧洲势力第一次在一场大型战争中打败欧洲强国，其反响和震荡十分巨大。

1910 年，日本正式吞并朝鲜，次年，中国革命爆发，清朝统治灭亡，从现在来看，这两起事件可以看作一个里程碑、也是一个转折点，是亚洲回应西方挑战的第一阶段的收尾。亚洲各民族的反应有着很大的差异。作为该世纪后半将成为亚洲强国的两个国家之一，日本通过接种现代化的病毒使自己免疫于西方的威胁。而另一个国家中国则长期竭力避免现代化的戕害。

不论对哪一方，西方都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刺激，导致两国的混乱，不过只有一个国家成功地控制住乱局。而且，不论是哪个国家，决定这两个亚洲未来强国命运的都不仅仅是其各自的回应方式，还有西方列强之间的关系。他们争先恐后地瓜分中国，对日本造成了莫大的警示和诱惑。在英日同盟的保障下，日本可以安心攻击其大敌俄国，不必担心后者得到援手。若干年后，日中都成为一战参战国，在形式上与其他列强平等。同时，日本为其他亚洲国家树立了典范，战胜俄国更是无与伦比的激励，是各国开始思索被欧洲统治的命运是否必然的最大缘由。1905 年的美国学者已然会把日本称为“西方人的同道”；而他们所做到的一切——用欧洲的技术和思想来对抗欧洲，难道其他亚洲民族就做不到吗？

849

亚洲各地的欧洲代理人无不推行或协助变革，而这些变化却加速了欧洲政治霸权的衰退。他们带来了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理念，通过基督教传教活动颠覆了当地社会习俗和信仰，开辟出一片不被传统见容的新天地；这一切都有助于点燃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火种。印度军队哗变或义和团运动等近乎盲目的本能反应是这些影响最早、最明显的结果，但此后还有其他意义重要得多的发展，而这句话尤其准确地描述了最大也最举足轻重的殖民地印度的情况。

1877 年，议会授予维多利亚女王“印度女皇”的头衔，嘲笑的英国人有之，失望的英国人有之，但认为此事意义重大的英国人并不多。大

部分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英国的霸权地位是永久或近乎永久性的，所以并不十分在意名号。他们会认同某位同胞的言论“我们不是为了取悦自己才来到印度”，[1]并相信只有强硬而坚定的政府才能保证避免又一场叛乱。还有一些英国人则会同意英国驻印度总督[2]在20世纪初的宣言“只要统治着印度，我们就是世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失去印度，我们就会径直沦为三流”。有两大事实是这番论断的依据。其一，印度纳税人为英帝国提供了大量防卫开支；从马耳他到中国，卫戍帝国领土的士兵中都有印度人的身影，而且次大陆本身始终是一个战略储备区。第二点在于印度的关税政策受英国控制，服从其贸易和工业的实际需求。

这都是严酷无情的事实，其分量也越来越难以忽视，但并没有囊括英属印度的全貌。这个统治着全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政府不仅仅是恐惧、贪婪、怀疑或权力欲的化身。如果没有某种神话作为凭依，就难以让人们保持一致的追求；在印度的英国人也一样。有的人受古典式教育的熏陶，尊崇罗马人，并自视为以斯多噶式的坚韧忍受着异乡离土的孤寂生活、为战乱之地带去和平、为无法可靠的人民送去法律的罗马人后裔。还有的人把基督教看作一份弥足珍贵的礼物，决心以此为武器捣毁偶像、涤净邪恶的习俗。另一些人从未形成如此明确的观念，只是单纯地相信他们所带来的比他们所见到的更好，因此其所作所为属于善举。这一切观念的基础是一份对自身优越性的确信，而这也不足为奇；如此自信总是一些帝国主义者动力的源泉。但到了19世纪后期，当时蔚为风尚的种族主义观念，以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学理论所带来的纷纷扰扰的思想尤其强化了这份自信。此类观念成了另一种理性依据，在印度叛变的震荡之后，让英国人与当地印度人的社会隔阂大大增加。尽管不乏少数印度地主和当地领导人通过引荐进入政府的立法部门，但直到该世纪临近尾声，才有印度人通过选举获得同样的位

850

① 引自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的《印度之旅》。——译者注
② 寇松(Curzon)勋爵。——译者注

置。不仅如此，虽然印度人可以竞争公职岗位，但在现实层面上，他们通往决策层的仕途却存在重重障碍。军队里，印度人也被排除在高级军官的行列之外。

为了确保叛乱不再发生，英国在印度的驻军始终是规模最大的，忠诚可靠，也是印度地区惟一配备火炮的武装力量，而且印度步兵团都由欧洲人担任军官。不管怎么说，铁路、电报和更先进的武器的问世都有利于印度政府，就像任何欧洲国家的情况一样。但英国人对其统治地位的自信不能用武力来解释，正如不能用种族优越感来解释一样。按1901年普查报告的记载，印度人口已将近3亿。他们的管理者是900来个担任公职的白人。通常情况下，英国士兵对印度人的比例是1∶4000。正如一名英国人绘声绘色的描述，如果所有印度人同时吐口水，其当地同胞就会被统统淹死。

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也有赖于细致谨慎的行政政策。叛变事件之后，英国人认为印度社会所受干涉应越少越好，这是推行慎重政策的依据之一。杀害女婴属于谋杀行为，因此被禁止，但英政府没有任何禁止一夫多妻制或童婚现象的尝试(不过1891年后，法律禁止与12岁以下的妻子行房)。法律不插足印度教所认可的行为。这种保守主义还体现在对待印度当地统治者的新态度上。叛乱事件表明他们普遍是忠诚的；反抗政府的那部分是出于国土被英国吞并的仇恨。因此，叛乱平息后，他们的权利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照；国王们独立统治着自己的王国，实际上不对英国政府承担任何责任，只有对客居其宫廷的英国政治家的敬畏才能使他们有所忌惮。这些土著国家有全印度五分之一的人口。在这些放任无为的政策之余，英国人也与本地贵族和地主结交。这是寻求印度关键势力团体支持的尝试之一，但常常使英国人倒向那些统治权力被社会变革所削弱的派系。然而，让英国人付出代价但有利于农民的启蒙专制(就像该世纪早期那样)已经不复存在。这些都是印度叛变事件所导致的不良后果。

851

然而，论及永久性地防止变革的门道，英属印度帝国并不比任何其他帝国政府更为擅长。其本身的成功就不利于避免变化的形成。和平

有利于人口增长——其后果之一是更为频繁的饥荒。但是,由于印度在通往工业化的道路中面临障碍,创造农业以外的谋生手段(这是有可能缓解农村人口过剩问题的)存在很大的困难。很大程度上,其原因是以英国制造业利益为根本的关税政策。因此,缓步崛起的印度实业阶级对政府并无好感、敌意愈盛。越来越多的印度人接受英式教育,从而对印度英国社群的实际行为与书本中的理念之间的差异感到愤怒,因此也对政府产生疏离感。还有一些人到英国的牛津、剑桥或律师学院求学,他们对所见到的反差尤其义愤填膺:19 世纪晚期,英国的印度人甚至能加入议会,而与此同时,毕业于本国的印度人则要忍受英国大兵的轻侮。19 世纪 80 年代,有位总督希望消除一种"使人深恶痛绝的区别对待",即不让欧洲人接受印度法官的审理,这在印度的英国居民当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也有一些人就着导师开出的阅读书目沉思起来;于是,约翰·斯图亚特·米尔和马志尼在印度形成巨大的影响力,并通过该国的领袖人物传播到亚洲其他地区。

作为印度首都加尔各答所在地,孟加拉邦是英国势力的传统中心,那里的印度人对殖民者的恨意特别突出。1905 年,该邦被一分为二。这次分治给英属印度带来了严重的冲突,以及某种 1857 年以前所不存在的元素,即一场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

民族主义情感的成长是缓慢、不连贯和缺乏整体性的。这是印度现代政治成型的一系列复杂进程中的组成部分,但在不同地区和众多层面都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不仅如此,在其成长的每一阶段,民族主义情感本身都受到非印度势力的强烈影响。英国的东方学者在 19 世纪初重新发掘出印度古典文化的价值,这对印度民族主义的自尊和克服次大陆内部的巨大多样性都是不可或缺的。在欧洲人的指导下,印度学者开始解读被遗忘的梵语镌文,使其中的文化和宗教内容重见天日;他们通过这些工作所描绘出的印度教,与普遍流行的那种内容丰富、天马行空但充满迷信色彩的印度教大相径庭。到 19 世纪末,这一关于雅利安与吠陀文明的发现成果——伊斯兰控制下的印度被彻底忽视——已经发展到足以让印度人自信地直面基督教传教士的指责,并从文化

852

角度加以反击的程度;1893 年,一位前往芝加哥参与“世界宗教议会”的印度教使节以个人表现赢得了莫大的尊敬,他的宣言——印度教是一种能够为其他文化的精神生活注入新生的伟大宗教——也得到严肃的对待,不仅如此,他还成功地赢得了人们的皈依。

有很长一段时期,只有少数印度人拥有民族意识,也只有少数印度人从事被这份意识所强化的政治活动。他们提出让印地语成为印度的官方语言,这非常不切实际,在被数百种语言和方言割裂得支离破碎的印度社会中,印地语只会对少数力图强化次大陆向心力的精英产生吸引力。精英身份的定义取决于教育更胜于财富:其主干是那些满腹经纶、却无法获得管理印度的应有机会,对此尤其感到失望的印度人,他们往往来自孟加拉地区;到 1887 年,只有十来个印度人通过选拔性考核进入印度公职部门。英属印度政府似乎铁了心要维持欧洲人的种族统治地位、以王公贵族和地主等保守势力为依靠,从而将巴布(*babu*)——即受过教育的印度城市中产阶级——排除在外,甚至没有给予尊重,而不尊重造成的后果可能也更为严重。

印度人形成了一份源于文化的新自尊,因受到藐视、得不到应得的回报所产生的不满情绪也不断滋长,这构成印度国民大会党建党的背景。让法庭平等对待印度人和欧洲人的政府提案遭到失败,引来民众一片哗然,成为该党诞生前夕的序曲。在失望情绪的推引下,一名曾担任公职的英国人采取行动,促成了 1885 年 12 月印度国民大会党第一次会议在孟买的召开。对此,总督府的举措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该党管理层长期被欧洲人把持,他们在伦敦的保护和建议下为该党提供支持的时间则要更久。部分印度代表身穿欧式服装出席会议,虽然不太可能穿戴在本国环境下特别乖张而格格不入的晨礼服和高帽,但至少穿着属于其统治者的正装。关于欧洲人对印度的深刻影响所具备的复杂性,这是一个恰到好处的象征。

853

国民大会党很快发布纲领,宣称将致力于民族团结和重生:就和日本已经实现的、中国和诸多其他国家将要实现的那样,这是欧洲思想冲击下的经典产物。但起先这一纲领并没有以自治为目标。该党的追

求更偏向于提供一种向总督府传达印度人想法的途径,并公开表达了对英王“毫不动摇的忠诚”。直到20年后,当大大极端化的民族主义观点赢得部分印度人的追随后,该党才考虑国家独立的可能性。这段时期内,英国居民宣称国民大会党不具备代表资格,并批评政府偏向于采用传统和保守的社会势力开展工作,成了印度民族主义观念的守护者。如此抨击使该党的态度逐步乖戾和强硬起来,极端主义者更加一意孤行。1904年,日本战胜俄国的消息鼓舞了整个亚洲。于是,1905年的孟加拉分治事件便成了冲突的导火索。

分治孟加拉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方面,分治后的行政工作会更为便利;另一方面,制造一个以印度人为主体的西孟加拉和一个以穆斯林为主体的东孟加拉可以削弱该地区的民族主义势头。长期紧张局势下积蓄已久的压力被此事件引爆,造成轩然大波。国大党内部旋即发生一场权力斗争。起初,以独立自治(*swaraj*)为目标的共识避免了党派内部的分裂,这一术语在实践中意味着白人辖区所享有的那种独立自治权,这些白人辖区是颇具启发性的范例。反对分治孟加拉的暴动使极端主义者大受鼓舞。印度人向英国祭出了商品抵制这一新武器,并希望能扩展为其他非暴力不合作的抵抗形式,例如拒绝缴税和士兵抗命。到1908年,极端主义者被国大党排除在外。此时,分治事件的第二个后果也已经浮出水面:极端主义正在滋生恐怖主义。对此,国外的榜样又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俄国的恐怖主义革命理论如今有了新的同伴——马志尼的著述和意大利独立运动英雄人物、游击队领袖加里波第的自传,两者共同影响了印度建国的形态。极端主义者主张,政治谋杀并不是普通的谋杀。因为暗杀和炸弹袭击会遭到有针对性的镇压。

分治的第三个后果或许是最严重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由此走向公开的分裂。印度叛变事件之前,阿拉伯瓦哈比(Wahhabi)教派[①]发动的伊斯兰改革运动对印度的穆斯林社群进行了净化,由于这一原因,在 854

① 18世纪创立的伊斯兰教派一支,主张恪守《古兰经》和圣训。——译者注

这一百年间,印度的穆斯林越来越感受到自己与印度教徒的不同。1857年,该教派试图复辟莫卧儿帝国,从而失去英国人的信赖,因此其教徒很少担任政府官员或法官。对于英属印度政府提供的教育机会,印度教徒表现得比穆斯林更为渴求;他们在商界的地位比穆斯林更高,对政府的影响力也更大。但穆斯林也得到英国人的帮助,成立了一所新的穆斯林学府,提供与印度教徒竞争所需的英语教育,并建立起穆斯林的政治组织。部分英国官员抓住这一潜在的机会,试图制衡印度人对英属印度政府所造成的压力。印度教徒相应加大了宗教活动的力度,例如护牛运动,但除了加深两个群体的隔阂之外不太可能取得任何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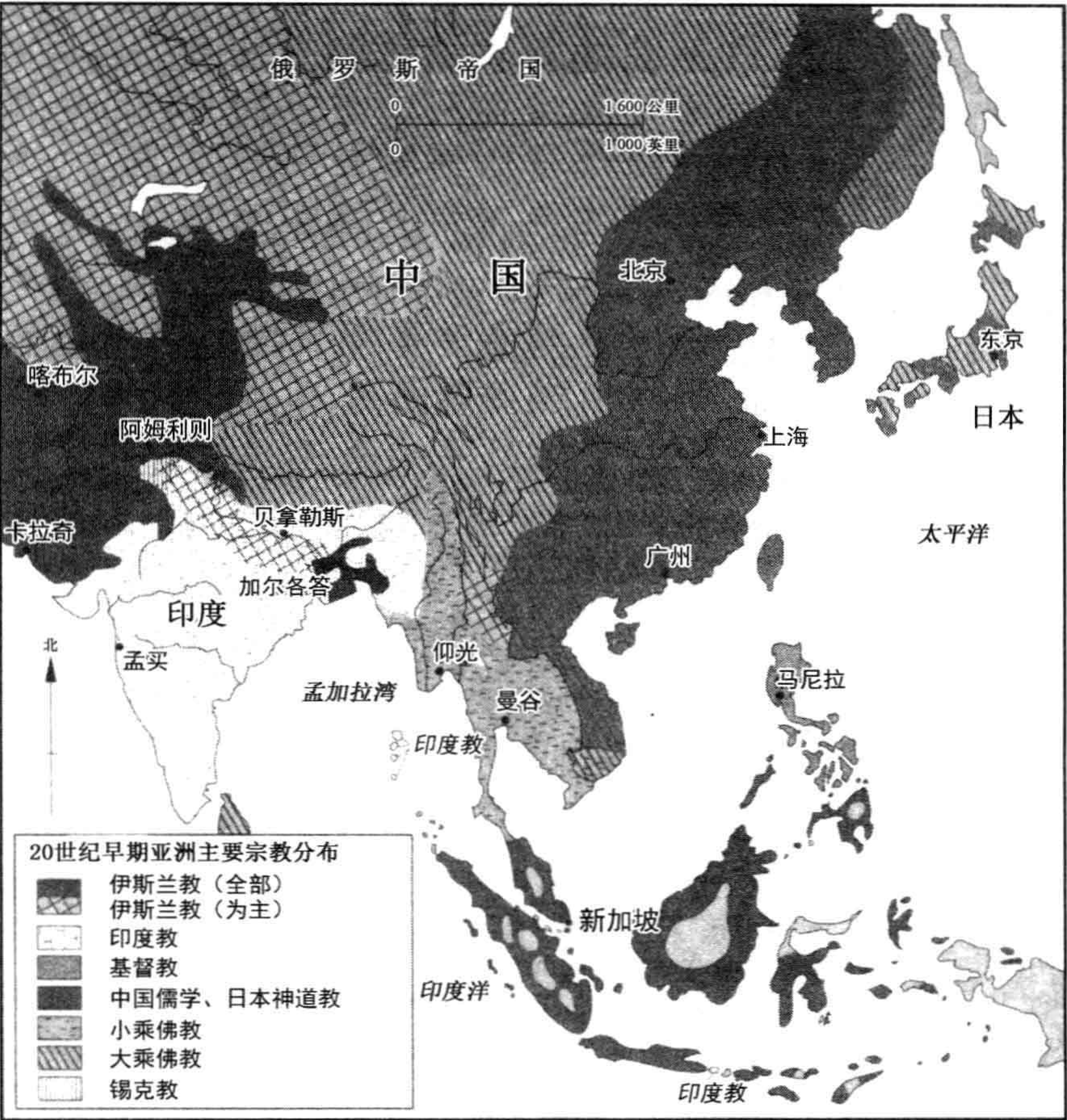
不过,直到1905年,这条裂痕才成为次大陆政治的根本问题并一直延续下去。反分治派发起活动,声嘶力竭地打出印度教的象征和标语。东孟加拉的英国省长支持穆斯林反对印度教,努力使他们成为新省份的既得利益群体。他随后被解职,但种子已经种下,孟加拉的穆斯林为他的离去而愤愤不平。盎格鲁和穆斯林看起来正在达成某种相互谅解,这进一步激怒了印度恐怖分子。火上浇油的是,这一切都发生在1906至1910年间,而这五年是印度叛变之后物价上涨最快的时期。

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改革在1909年宣告失败,除了略微改变政坛的运作形式之外毫无成果,这一形式此后一直主导着印度历史,直到将近40年后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结束为止。印度人第一次跻身议会,能够向对印度负责的英国大臣提出建议,而且更重要的是,立法会为印度人提供了更多可通过选举进入的席位。但选举必须以社区为基础进行,也就是说,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分裂被体制化了。

1911年,当时的英国国王造访印度,此事堪称空前绝后。一场盛855 大的加冕礼[①](durbar)在过去的莫卧儿统治中心德里举行,同时,英属

① 源自莫卧儿帝国所用的波斯语,意指国王的宫廷,后成为英国国王或女王在印度加冕的仪式的称法,在德里的加冕公园举行,历史上一共举行过三次,分别是1877年、1903年和1911年。——译者注

印度首府也从加尔各答迁至此地。各路印度王储前来朝觐；国大党对君主的责任心也没有动摇。是年，乔治五世的登基还带来了种种实质及象征意义上的好处，其中最令人瞩目、政治意义最为重大的就是孟加拉的重新整合。如果英属印度曾有过最辉煌的顶峰，那就是这一时刻。



20 世纪早期亚洲主要信仰分布

但印度的局势还远未平复，恐怖主义和颠覆煽动依然在持续。偏袒穆斯林的政策令印度教徒更加愤恨，而穆斯林则开始觉得政府收回了之前与他们达成的谅解、打算放弃分治孟加拉的方案。他们害怕卷土重来的印度教将控制该省。另一方面，印度教徒将此让步看作抵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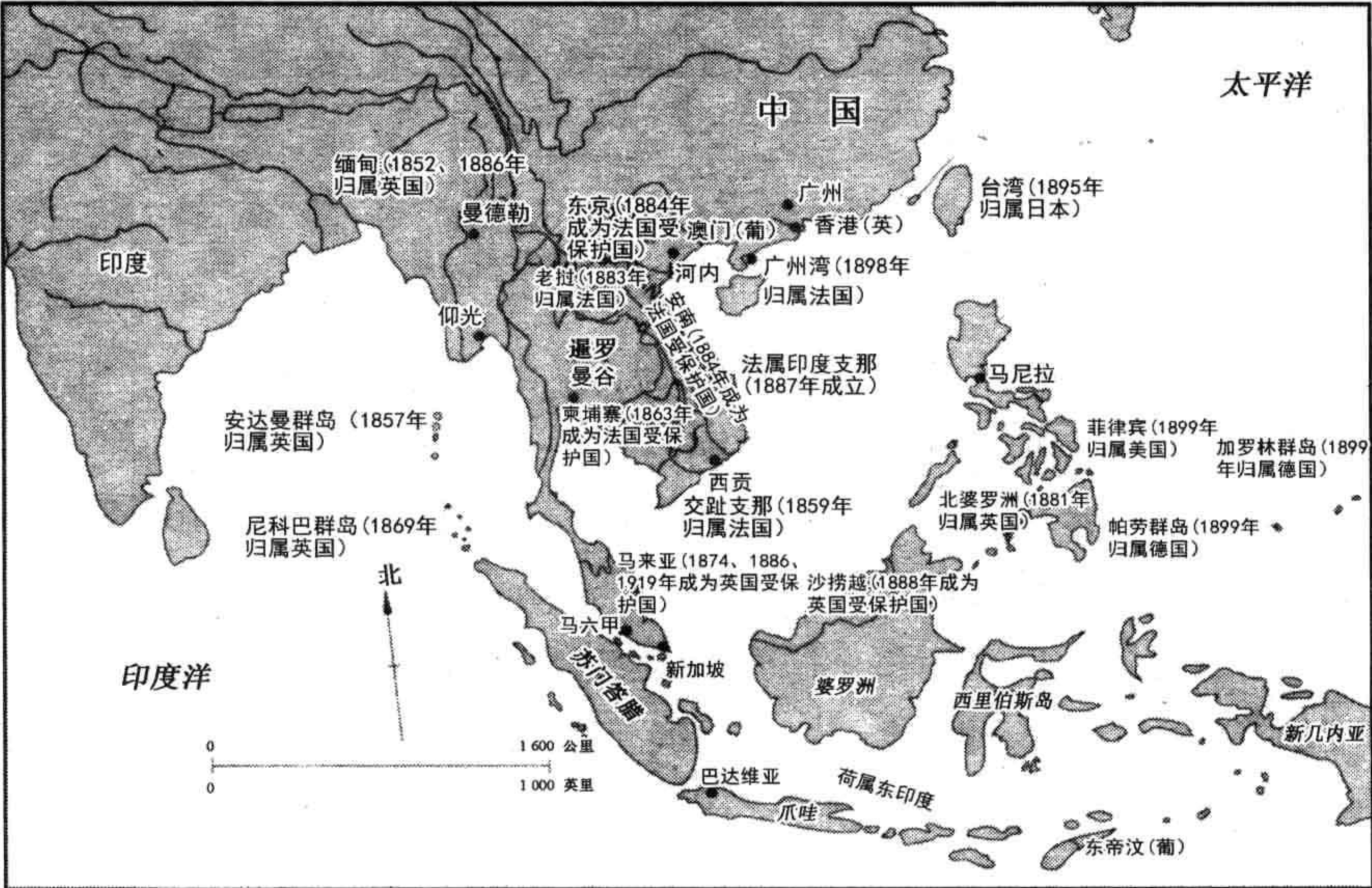
行动生效的证明,开始进一步施压,要求废除按社区划分选区这一穆斯林所看重的制度。于是,英国人一方面使穆斯林大为疏远,另一方面导致了新一轮的压力。本来支持与英国人合作的印度穆斯林精英所遭受的压力与日俱增,这些压力来自穆斯林中产阶级,其中越来越多的人被这场泛伊斯兰教运动所表现出的暴力气息感染。泛伊斯兰教主义者可以指出英国人对孟加拉的穆斯林弃之不顾的事实,但也提到基督教国家曾在 1912 年、1913 年的巴尔干和的黎波里(曾在 1911 年遭到意大利人的进犯)侵略土耳其,那是哈里发的王座、是伊斯兰教精神领导力的体制化身;而不容置疑的是,大不列颠也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印度下层穆斯林极易被各种外部影响所左右,他们的激亢情绪已经发展到离谱的地步,就连波及清真寺的街道整修方案也会被视为蓄意针对伊斯兰教的阴谋。1914 年,土耳其决定与英国开战,虽然穆斯林联盟[①]依然忠于英国,但部分印度的穆斯林得出哈里发才是最高统治者的结论,开始准备反抗英国统治者的革命。他们的人数寥寥无几。对未来意义更加重要的是,到那一年,决定印度政局的势力从两股变成三股:英国、印度教和穆斯林。这是次大陆经历空前绝后的全面政治统一之后走向未来分裂的起源,就和统一本身一样,分裂也是印度和非印度势力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856

印度是亚洲最大的由欧洲人统治的非欧洲人口及领土聚集体,但在属于印度文化圈的东南亚和印尼还有一片英帝国的领地。对这片如此巨大、包容民族和宗教如此之多的区域进行概括相当困难,但该地区有一个不利的事实是显见的:1914 年以前,欧洲各国在亚洲的其他领地都没有发生像印度那样的转型,尽管现代化进程已经开始侵蚀所有领地的当地传统。这种侵蚀力的源头是那些已经在其他地区发挥效力的元素:欧洲的侵略、日本的表率和欧洲文化的传播。但 1914 年以前,东南亚和印尼受其中第一和第三点作用的时间要短于中国和印度。1880 年,东南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依然被土著国王统治,尽管他们不

857

① 可能指 1906 年成立的政党——全印度穆斯林联盟。——译者注



帝国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1850－1914)

得不以“不平等条约”的形式对欧洲列强作出让步,但依然是独立的统治者。随后的十年间,英国兼并缅甸,法国进一步向印度支那扩张,使这一状况迅速发生改变。马来亚的诸位苏丹允许英国人客居宫廷,通过地方行政体系指导政策,“海峡殖民地”则直接受英国的殖民统治。到 1900 年,该地区只剩下暹罗依然是独立王国,印度支那的国家都已在法国的帝国主义侵略下屈服。

柬埔寨和老挝受到印度宗教和艺术的深刻影响,但有一个印度支那国家在文化上和中国的联系要密切得多,那就是越南。该国分为三部分:北部的东京(Tonkin)、中部的安南(Annam)和南部的科钦(Cochin)。越南有着长期的民族意识传统,也有一部反抗中华帝国统治的民族起义史。因此,该国对欧洲化的抵抗最为突出也就不足为奇了。欧洲与印度支那的联系始于 17 世纪的法国基督教传教士(其中一员设计了第一套越南语的罗马化方案),19 世纪 50 年代,法国以基督徒遭到迫害为借口发动远征(得到西班牙军队的短暂协助),与中国的外交冲突随之而来,因为中国宣称是越南的宗主国。1863 年,安南皇

帝被迫将科钦的部分地区割让给法国,柬埔寨也接受了成为法国保护领地的命运。此后,法国的进一步扩张激起了印度支那各国的抵抗。法国人于 19 世纪 70 年代占领红河三角洲,又旋即与当地最强大的势力中国发生了另一些摩擦,从而开启战端,后者最终承认了法国对印度支那的控制权。1887 年,法国人建立印度支那联盟,其背后的实质是保护领体系下的中央集权化政体。虽然土著(安南皇帝、柬埔寨国王和老挝国王)统治者因此得以保留,但同化始终是法国殖民政策的目标所在。新的法国臣民将被灌输法国文化,其中的精英将被高卢化,这被视为促进现代化和开化的最佳手段。

法国当局的中央集权化倾向很快表明当地自治只是徒有其表。无意之中,法国人使当地行政体制成为空壳,又没有用其他能赢得民心的机构取而代之。这是一种危险的趋势。法国人的出现也带来了其他重大的副作用,例如减缓当地工业化进程的法国关税政策。印支一带的商人最终像印度同行那样开始怀疑,他们的国家究竟为谁的利益服务。更甚于此的是,印度支那属于法国、该地居民的身份要转换为法国臣民的构想也造成了麻烦。法国当局陷入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因为向当地人灌输法国教育就必然会让他们思考第三共和国政府建筑和文件上的座右铭:“自由、平等、友爱”。法国的法律和财产观念最终打破乡村土地所有结构,让放贷人和地主阶级得势。随着稻米种植区人口的不断增长,这将给未来的革命性变化打下潜在的基础。

858

中日两国的境遇成为印度支那人民不满情绪的催化剂,这份情绪在这些事实中得以体现,人们也很快就感受到越南民族主义传统的成型。看到日本战胜俄国,一些越南青年前往东京,并结识了孙中山和“亚人治亚”的日本支持者。1911 年中国爆发革命后,这些青年中的一人组织起一个以成立越南共和国为宗旨的社团。1914 年以前,这一切都没有给法国人造成太多麻烦,他们对于控制此类反抗行为驾轻就熟,但越南儒家学者群体也在同时发出来自保守派的反对声浪,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巧合。他们在 1907 年开办了一所大学,但因为害怕知识分子爆发骚动,法国人不得不几乎立即将其关闭,直到 1918 年才重开。

为期数十年的法国统治已经深刻改变了越南人观念中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

在更南面的印尼,法国统治史也已经造成了间接的影响。19 世纪末的印尼人有大约 6 000 万;未来将爆发的人口压力还没有涌现,但这是除印度以外欧洲人统治下最大的非欧群体。他们的祖先在荷兰人的统治下度过了两百年,其中不乏苦涩的时光,直到法国大革命引发联合行省王国的入侵,1795 年在该地成立一个革命性质的共和国。荷属东印度公司也同时解体,此后不久,英国人占领了爪哇。英国人对财政收入体系作出重大改动,在印尼掀起波澜,但也有其他因素促成了当地的骚乱。虽然起初属于印度文明的分支,但该地也是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有大量居民至少在名义上是穆斯林,与阿拉伯也有贸易往来。19 世纪早期,这一现实拥有了新的重大意义。前往麦加的印尼朝圣者中有一部分随后来到埃及和土耳其,其中不乏地位和出身相当高贵的人物。他们在那里直面接触到源自西方的改革思潮。

859

荷兰人返回爪哇后,局势的不稳定昭然若揭,1825 年,他们与一名政见相左的封建君主[①]开战,打了一场为期五年的"爪哇战争"。战争破坏了岛国的财政,迫使荷兰人进一步求变。由此产生了一套强迫农民为政府耕种的农业体系。该体系对农民构成严重剥削,在 19 世纪后期的荷兰人当中引发忧虑,怀疑其殖民政府的行为是否正当。这种情绪汇聚为观念的大幅度转折;1901 年,政府颁布一套新的"道德政策",表明去中央化和通过建立村级政府来改善现状的方针。但该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体现出家长式和干涉主义的作风,所以有时也会引发敌意。这一点被首批印尼民族主义者所利用,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受了印度人的感召。1908 年,这些民族主义者形成一个组织,倡导本民族化的教育。三年后,一个伊斯兰教团体问世,其早期活动不仅将矛头对准荷兰人,也同样针对中国的商人。到 1916 年,该团体已经提出了在依旧隶属于尼德兰联合王国的基础上获取自治权的要求。但此前,一

① 名为蒂博·尼哥罗,此战又称蒂博·尼哥罗起义。——译者注

个真正的独立派政党已在1912年成立。该党自诩为一切种族的印尼本地人的代表，反对荷兰当局；其三位奠基人之一是荷兰人，也赢得了别人的追随。1916年，荷兰朝着满足这些团体要求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批准成立议会，让印尼获得有限的权力。

20世纪早期，虽然欧洲的民族主义思想几乎在所有亚洲国家生根发芽，但根据各地所蕴藏的不同可能性，该思想也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各地殖民当局的表现不一而足。英国人对缅甸的民族主义运动持鼓励态度；美国人在菲律宾坚持不懈地奉行基于善意的家长式统治方针，但此前也镇压过起初针对其前任——西班牙的暴动。这同一批西班牙人，就像亚洲其他地方的葡萄牙人一样，曾积极推进基督教传教事业，而英属印度政府则对干涉本地宗教持非常慎重的态度。形形色色的欧洲政体带来各不相同的传统积淀，所以这段历史也决定了亚洲殖民地的未来。从日本和中国的经历中，可以看出历史可能性和惯性的力量，而欧洲影响所带来的效果也十分惊人，完全不亚于在他们直接统治的印度和越南所显现出的能量。不论在哪个例子中，欧洲影响力发生作用的大环境都是决定未来的根本因素；当欧洲人在亚洲从事了数百年的活动、其亚洲活动史临近尾声的时候，这一大环境依然大体如故。约定俗成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依然有巨量的残余保持原样。亚洲有着太多、太厚重的历史，单凭欧洲扩张本身不足以解释其20世纪的模样。不过，正是这场扩张带来了催化和解放的力量，推动亚洲迈向现代纪元。

860

第七卷

欧洲时代的终结

导　论

在 1900 年，当欧洲人回顾欧洲近两三百年惊人的增长时，大多数人都会说，这种增长是为了追求更好的发展，即一种进步。从中世纪开始，他们的历史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不断前进的历程，其目标明显是值得奋斗且很少受到质疑的。无论评判的标准是从知识的、科学的角度，或是从物质的、经济的角度（甚至是从道德和美学角度，有人说，进步的就是有说服力的），对过去的回顾使欧洲人相信，他们开启的是进步的历程，这也意味着整个世界都在进步，因为欧洲的文明已经传遍全世界。还有，他们相信未来的进步空间无限大。1900 年的欧洲人在面对他们不断取得成功的文化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自信，和中国的士大夫在一个世纪以前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来的自信是一样的。对于过去，欧洲人是肯定的，过去的辉煌也证明他们是正确的。 861

尽管如此，也有一部分人对此并不自信。这些人认为这些现象同样也包含着悲观的结局。虽然悲观者的人数远远少于乐观者，但其观点和思想的影响更大。他们中的有些人认为，现在人类所处的文明已经开始展示出自我毁灭的潜能，而且自我毁灭的时代离现在并不遥远。一些人则看到，现在的文明越来越脱离宗教和道德绝对准则的约束，伴随着物质主义和野蛮，可能走向大的灾难。

结果表明，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都不完全正确，也许是因为他

们的眼光都紧紧地盯在他们所认为的欧洲文明的特点上。他们看到了欧洲文明指引未来的内在动力、发展趋势和缺点，但很多人没注意到欧洲正在改变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欧洲文明已建立了优势地位，因此将 862 再次改变几大文明中心之间的平衡。除了那些心理不平衡的狂人对"黄祸"论小题大做外，很少有人关注欧洲以外的世界，尽管拿破仑也在一个多世纪前就警告说，中国是一个沉睡的东方巨人[①]。

通过对过去的回顾来说明悲观主义者的观点是最好的，这种做法是有诱惑力的。但是事后觉悟有时也是历史学家的一个弱点，这样会让他们看不到乐观主义者当时如何对自己观点如此的肯定。所以我们必须努力做到这样：首先，认识到乐观主义者当中有一些人是具有远见和洞察力的；另外，乐观主义长期以来对解决 20 世纪的某些问题都是一种障碍，以至于它完全有资格被理解为一种历史的力量。但悲观主义者很多说法也是错误的。尽管对 20 世纪的灾难充满恐惧，但他们所处的这个社会比先前脆弱的社会更具弹性，因而悲观主义者们也不再像一个世纪以前那么恐惧了。1900 年，乐观主义者们和悲观主义者们都一样，必须和资料打交道，资料可以以多种方式解读。他们发现准确地对未来作出判断是如此的困难，这不是在抱怨，只是觉得有点悲痛而已。而尽管有了更多的信息资源，但我们仍然不能成功地对不久的将来作出预测，因此我们也没有立场去谴责他们。

---

① 原文如此，拿破仑原话是将中国形容为睡狮。——编者注

一、体系内的压力

20世纪发端时，一个明显的历史趋势是欧洲世界的人口不断增长。1900年，欧洲本身大约有4亿居民，三分之一是俄罗斯人，美国人口大约有7 600万，其中英国侨民有150万左右。这使占主导地位的欧洲文明在世界人口中保持高比例。另一方面，在20世纪的前10年，一些国家的发展速度也开始降下来。这种现象在那些处于西欧中心的发达国家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些国家经济的增长越来越依赖死亡率的下降。在这些国家里面，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维持小的家庭规模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向社会底层蔓延的习俗。传统的节育知识早就在社会推广，但19世纪已经引进一种更好、更有效的技术。社会越广泛地采用这种技术(很快就有迹象表明确实如此)，对欧洲人口结构的影响就越大。 8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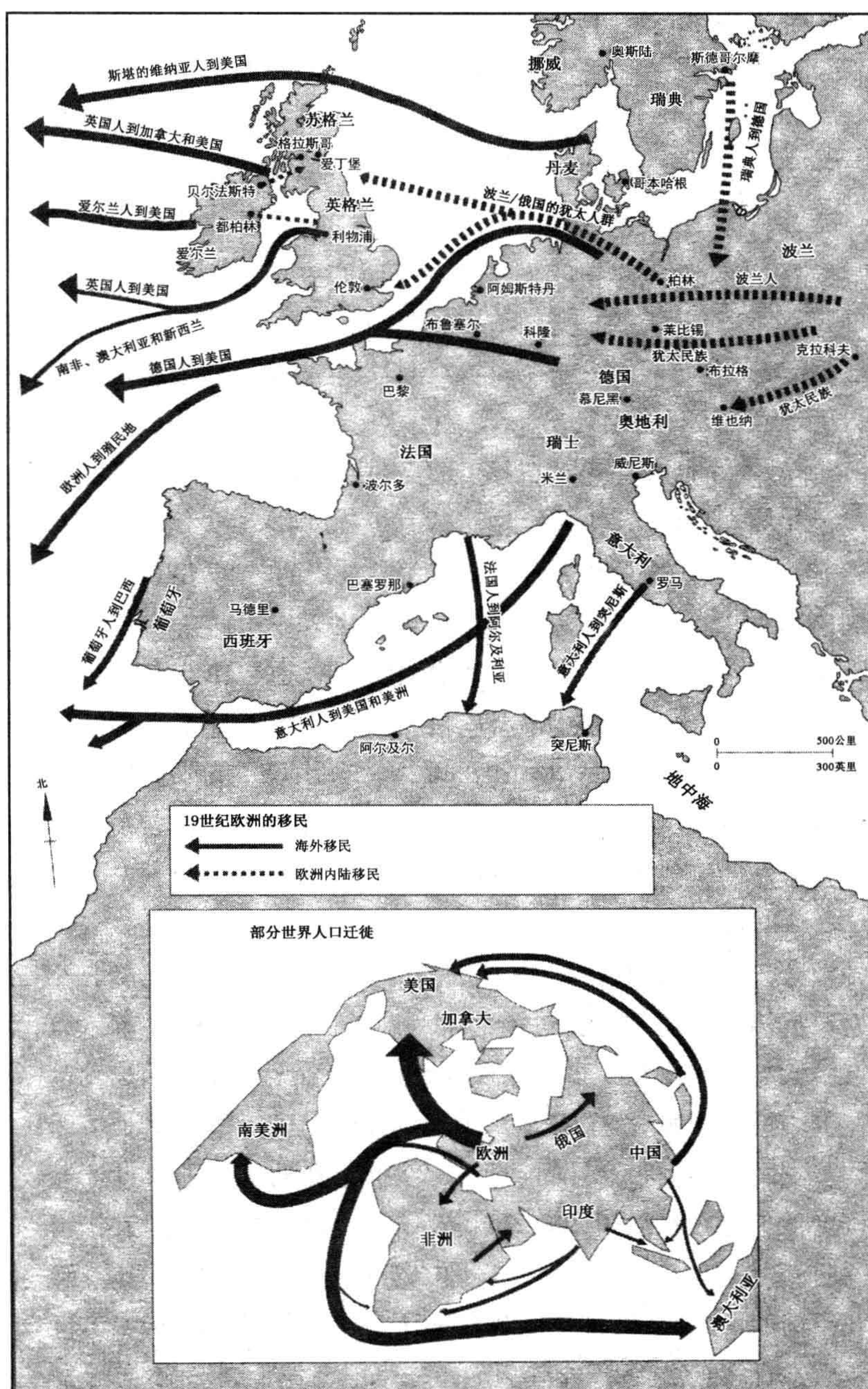
另外，在东欧和地中海地区，节育技术对人口结构产生的影响很小。在那里，快速的人口增长只不过刚开始制造严重的压力。19世纪时越来越多的出路出现，移民使克服人口问题成为可能，但一旦这些出路不畅，麻烦就又来了。在考虑到致力于降低死亡率的相关机构开始从欧洲扩展到远方的亚洲和非洲将产生的后果，很多悲观的反应将被激发出来。在19世纪所创造出来的世界文明中，这是无法避免的。这样的话，欧洲的成功扩张最终却会导致它新近在人口控制方面的优势

将丧失,而这种优势本来可强化其在技术上的主导地位。更糟的是,马尔萨斯人口危机论曾经所担心的恐慌(没有出现是因为19世纪的经济奇迹转移了人们对人口过剩的恐慌)可能最后会变成现实。

864 把马尔萨斯的警告搁在一旁是完全可能的,因为19世纪产生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的财富创造浪潮。在1900年,各种资源集中在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欧洲,潜藏于经济快速增长背后的技术更是取之不竭的。一个世纪以前,这里就已经出现一个广阔的但相对规模较小的商品快速流通的市场,但所有类型的商品都已经出现了。石油和电已经连同煤、木材、风能和水能成为一种能源。化学工业的产生在1800年是不可想象的。人类不断提高的能力和财富被用于开发看似取之不竭的自然资源,不只在农业和矿业领域——也不只欧洲这样。对原材料的需求改变了其他大陆的经济。对新的电力产业的需求给巴西带来了短暂的橡胶业的繁荣,甚至改变了马来西亚和印度支那的历史。

成千上万人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铁路、有轨电车、蒸汽轮船、汽车和自行车使每一个人能够支配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他们能快速地到处旅游,这也是人类自几千年以前开始用动物拉车后首次对陆地交通工具的速度实现的大变革。这些改变产生的结果是,在很多国家人口增长轻易地带动了更快的财富增长。比如,从1870年到1900年,德国的生铁产量增长了六倍,但它的人口大约只增长了三分之一。从消费的角度,或是从人们所能得到的服务,或是从健康状况等角度看,发达国家的民众在1900年的生活是远远好于100年前他们的前辈的。但俄国人或安达卢西亚农民并没赶上这样的好日子(尽管评估他们生活条件的标准很难制订)。然而,对他们来说前面的道路看来依然是光明的,因为如何走向繁荣的答案已经被找到了,并且可以在所有国家实现。

即使面对这令人欢欣的场景,疑惑还是可能产生。即使忽略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对新财富的成本的预算和对社会正义分布的疑惑都能带来麻烦。大部分人还是相当贫困,无论他们是否居住在富裕的国家里,现在,这些国家这种贫富差距的不协调状况比早些时期更加严


斯堪的维纳亚人到美国
英国人到加拿大和美国
爱尔兰人到美国
英国人到美国
南非、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德国人到美国
欧洲人到殖民地
苏格兰
格拉斯哥
爱丁堡
贝尔法斯特
都柏林
爱尔兰
英格兰
利物浦
伦敦
挪威
奥斯陆
斯德哥尔摩
瑞典
瑞典人到德国
丹麦
哥本哈根
波兰/俄国的犹太人群
柏林
波兰人
波兰
阿姆斯特丹
布鲁塞尔
科隆
莱比锡
犹太民族
克拉科夫
布拉格
德国
幕尼黑
奥地利
维也纳
犹太民族
巴黎
法国
瑞士
威尼斯
米兰
波尔多
意大利
罗马
葡萄牙人到巴西
葡萄牙
巴塞罗那
马德里
西班牙
法国人到阿尔及利亚
意大利人到突尼斯
意大利人到美国和美洲
阿尔及尔
突尼斯
地中海
0 500公里
0 300英里
北
19世纪欧洲的移民
海外移民
欧洲内陆移民
部分世界人口迁徙
美国
加拿大
南美洲
欧洲
俄国
中国
非洲
印度
澳大利亚

19 世纪的移民路线

重。当社会表现出更明显的创造新财富的力量时,贫困就更加地折磨人。一种变化开始了,输入革命出现在了人们的期望中。另一种变化是人们思考自身处境的方式变了,其焦点是如何看待人们获取谋生手段的能力。人会无所事事不是什么新鲜事。新的情况是,经济景气的866 无规律起伏波动导致数以百万计没有工作的人聚集在大城镇。这就是"失业",这种新的现象使我们需要这个新的单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失业是资本主义的伴随物,是不可避免的。此外,有些邪恶的事物使工业化社会最初的观察者们大为吃惊,同样,城市至今也没能摆脱所有这些邪恶的东西。到了 1900 年,大部分的西欧人是城镇居民。到 1914 年,有 140 多个城市的居民超过 10 万。其中数以百万计的人缺少自由活动的空间和居所,缺少学校和清新的空气,除了街头娱乐外没有什么消遣,而这些在社会催生的富人中是司空见惯的。"贫民窟"是 19 世纪发明的另一个新词。细想这些现象,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密不可分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是恐惧,很多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在 19 世纪末仍然对城市充满戒备,认为其是发生革命危险、犯罪和邪恶的中心。另一种结论是充满希望,城市的状况使有些人坚信:反对不公正社会和经济秩序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这两种反应都忽视了不断积累的经验证据:西欧爆发革命的可能性事实上是越来越小了。

社会骚乱加深了人们对革命的恐惧,尽管革命的本性被错误地传递并被夸大。俄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比较,它很明显是欧洲的一部分,但它没有沿着经济和社会进步的主线向前快速地发展,改革还没有走多远就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革命运动。革命在恐怖主义中爆发——沙皇是其中的一个牺牲者,各地土地运动连续地同时爆发助长了革命的火焰。农民对地主和管家的袭击在 20 世纪初期达到了顶点。当俄国人确定他们已经在战争中败给日本人,刹那间动摇了对国家体制的信心,结果就是 1905 年革命爆发。俄国无疑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但是意大利也是,有一些迹象让一位观察家认为在 1898 年和 1914 年包含着革命因素,而西班牙的一个伟大城市——巴塞罗那在 1909 年爆发了血腥的巷战。罢工和示威游行在没有革命传统的工业化国家里也能变成

暴力活动,1890 年的美国充分表现了这一点。甚至在英国,很多时候也因此而出现了伤亡。有这样一种数据,当把它们和偶发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能让警察和正派的市民保持警觉。无政府主义者们尤其擅长让自己成为公众的关注点。他们在 1890 年的恐怖主义行为和暗杀行动获得广泛的公众注意,这些行为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成功或失败本身,因为媒体的发展已经意味着一个手榴弹或是一把刺人的匕首都能提取出巨大的公众关注价值。在采用这些方法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无政府组织者都会有共同的目标。但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他们抗议的不止是一个国家里的政府,也反对整个社会里面他们认为不公正的一切。无政府主义者们有利于让人们保持对革命一贯的恐惧感,哪怕他们的煽动性也许没有他们的对手——马克思主义者强。

867

到了 1900 年,几乎各地的社会主义都意味着是马克思主义。只有在英格兰,才存在着可选择的信仰,那里很多工会运动早就取得发展,通过建立政党进行斗争是可能实现的,这使得他们青睐一种非革命性的激进主义。在欧洲大陆社会主义学派中,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然而,马克思主义得到正式表述是在 1896 年。那时,第二国际,一个在七年前为了协调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活动而建立起来的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组织,驱逐了在此之前属于它的无政府主义者。四年后,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设了一个固定办公室。在这些社会主义活动里,德国社会民主党凭借人数上的优势、经费和理论的贡献占据了优势地位。尽管存在政治迫害现象,但由于德国快速的工业化进程,这个政党还是快速成长起来。到 1900 年,这个党的存在已经成为德国政治生活里的既成事实,它是德国第一个真正的群众政党。仅仅是人数和经费本身就让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官方信条——马克思主义有可能成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信条,但是马克思主义也有自身理论和情感上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尤其存在于世界正朝着社会主义者所期望的方向发展的形势中,以及参加阶级斗争所带来的情感满足中,而马克思主义者坚信阶级斗争必将在暴力革命中终结。

尽管马克思主义使人们强烈地对现存秩序感到担忧,一些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意识到,1880 年以后的社会状况都不能支撑这个理论了。明显地,大批人已经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获得高质量的生活水平。马克思曾经预测的两个阶级的尖锐斗争不能囊括资本主义体制所展示出来的复杂性。另外,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也已经能够服务于工人阶级,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德国,同样也在英格兰,社会主义者抓住议会制这一机遇已经取得重要的优势。选票就如武器一样容易获得,就算在等待革命,人们也没有忘记拉选票。这些情况的出现使得一些社会主义者试图去重新表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以便能够符合这些趋势,这些人被称为“修正主义者”,他们宣扬的是通过和平的方式促使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人们喜欢称这种转型为革命,那就只涉及革命这个词的用法争议了。在这个主张及其激发的冲突内部,有一个现实问题在 19 世纪末开始凸显出来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府里社会主义者该不该成为内阁成员。

868

由这个问题引起的争论恐怕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解决。后来就出现了对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毫不隐讳的批判,而各国的工人党,特别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继续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按照适合他们的方式处理与现存体制的关系。但是一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坚持革命道路。很多社会主义者甚至想通过抵制参加战争,如果政府强迫征募的士兵作战的话,就让革命变成现实。其中一个社会主义派别,主要是俄国的,继续猛烈地指责修正主义并且宣扬暴力革命,这反映了俄国独特的社会状况,那就是在俄国借助议会制政治进行革命是没有可能的,另外俄国也具有深厚的革命和武装斗争传统。这个派别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在俄语中的意思是多数派。

社会主义者宣称他们为广大群众说话。他们是否真的这么做了呢?到了 1900 年,很多保守人士开始担心,19 世纪由自由主义和民主取得的进步会证明只有暴力革命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仍然生活在 19 世纪前的精神世界里,而不是 20 世纪前的精神世界里。在东欧,很多准家长制关系和传统的地主所有制仍然没有被触动。

这样的社会将继续制造贵族阶层的保守者，这些人不仅反对侵犯他们的物质特权，而且反对一切“市场社会”的价值观和设想。但这条线也越来越模糊了，因为大部分保守主义的思想倾向于保护资本，这种观点早在半个世纪前在很多地方就因为个人主义者的提倡而被看作是极端的自由。资本家的、工业化的和保守的欧洲越来越反对国家对个人财富的干涉，而这种干涉随着国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越来越大的管理者角色而稳步增强。1911 年，这个问题在英国引发了一场危机，结果导致了对 1688 年宪章的革命性改变，英国上议院约束民选的下议院的权力遭到削弱。有大量事项与此相关联，其中包括让富人为社会服务缴纳较高的税额。即使在法国，到了 1914 年，人们也接受了个人所得税的原则。

869

这些变化显示了发达国家政治民主化的逻辑。到 1914 年，法国普通的成年男子都有选举权，在德国、一些较小的欧洲国家、英国和意大利也有数量足够多的选民去接近民主的标准。这也产生了另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如果男人在国家政治中有了选举权，那么妇女不应该也有这样的权利吗？这个问题已经在英国的政治中引起了骚乱。但在欧洲，只有芬兰和挪威到 1914 年让妇女成为议会选举的选民，尽管如此，新西兰、澳大利亚的两个州、美国的一些州也随后给妇女以选举权。在随后 30 年里很多国家都开放了妇女的选举权。

在一个歧视妇女的社会里，政治权利是妇女权利这个大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前的文明都倾向维护男子利益和价值观。欧洲讨论妇女在社会中的作用始于 18 世纪，不久，欧洲社会长期存在的一系列假设的缺陷便显露出来。妇女的受教育权利、就业权、对自己财产的支配权、道德独立，甚至去穿更舒服服装的要求在 19 世纪引起热烈的讨论。易卜生的剧作《玩偶之家》就被理解为对妇女解放的高声呼吁，而不仅仅是作者为了个别女性的请求。这些情况的发展背后蕴藏着一种真正的革命。在欧洲和北美，妇女要求各种合法权利的主张威胁着几百甚至近千年的制度化的假设和态度。这些主张激起了复杂的情感，因为它们和根深蒂固的家庭观念和性别观念相联系。她们的觉醒

困扰了一些人,因此产生的影响比社会革命和政治民主对这些人的威胁更深刻。人们这样看待这个问题,那就对了。在早期,欧洲女权运动就像是一粒种子一样,当它作为西方价值观的一部分冲击其他文明的时候,就发展为更具有爆炸性的内容了。

妇女参与政治,抨击让妇女备受压迫的法律和制度结构,也许这并不能给妇女带来什么。但以下三个方面的缓慢发展最终将对削弱传统的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第一种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到 1914 年时,在一些国家,妇女已经可以从事很多新领域的工作,比如打字员、文秘、电话通讯员、工人、销售员和教师。而这些在一个世纪前是不存在的。这种变化给妇女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权:如果她们能靠自己的劳动谋生,则这意味着她们已经开始走在一条最终改变家庭结构的道路上。很快地,在工业社会里对社会福利的需求会加速这种进步,因为对劳动力的需求为她们打开了更广阔的就业范围。同时,到 1900 年时,越来越多的女孩能在工业行业和商业行业中工作,这意味着她们有机会能逃离父母的控制和不幸的婚姻。直到 1914 年,仍有大部分妇女没有得到这种好处,但是这个进程在加速发展,因为这些进步也会激发她们的其他需求,比如教育培训和职业培训。

870

第二种大变革的动力到 1914 年更加展现了它改变妇女生活的巨大潜力,那就是避孕技术。避孕技术已经对人口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接下来妇女将在权力和社会地位方面进行革命,因为她们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她们能控制生育和养育,生育和养育贯穿人类历史,且直到现在仍然是女性生活的最主要内容。除此还将有另外一个更深刻的改变,在 1914 年也开始明晰起来,那就是女性意识到她们没有必要履行终身的婚姻义务,她们可以追求性满足。

第三种把女性悄悄但不可抗拒地从旧生活中解放出来的动力,也许很难用一个单一的名称表述,但如果这种动力有支配性原理,那就是科技。科技是由不计其数的创新组成的,其中一些发明创造在 1900 年的前几十年就已经开始积累起来,所有这些都开始打断原先女性固定

的从事家庭琐事的时间表，尽管这些刚开始看来并不重要。自来水、可用于取暖和照明的煤气的出现都是当时的例子；电能具有清洁和灵活的特点，所以后来对人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更明显的影响。大商店是零售领域大变革的前线，大商店不只告诉了人们什么是奢华，而且更便利了家庭的物品需求得到满足。随着食品加工技术和保存技术的发展，引进的食品也慢慢改变了人民的饮食习惯，人们不再需要像印度人和非洲人一样，一天去一两趟市场。1900 年时世界上还没出现洗涤剂和容易清洗的人工纤维，但和一个世纪前相比，已经可以很容易就买到肥皂和洗涤碱，价格也很便宜。而第一批家用电器——煤气炉、真空吸尘器、洗衣机也在 20 世纪早期开始出现在富人的家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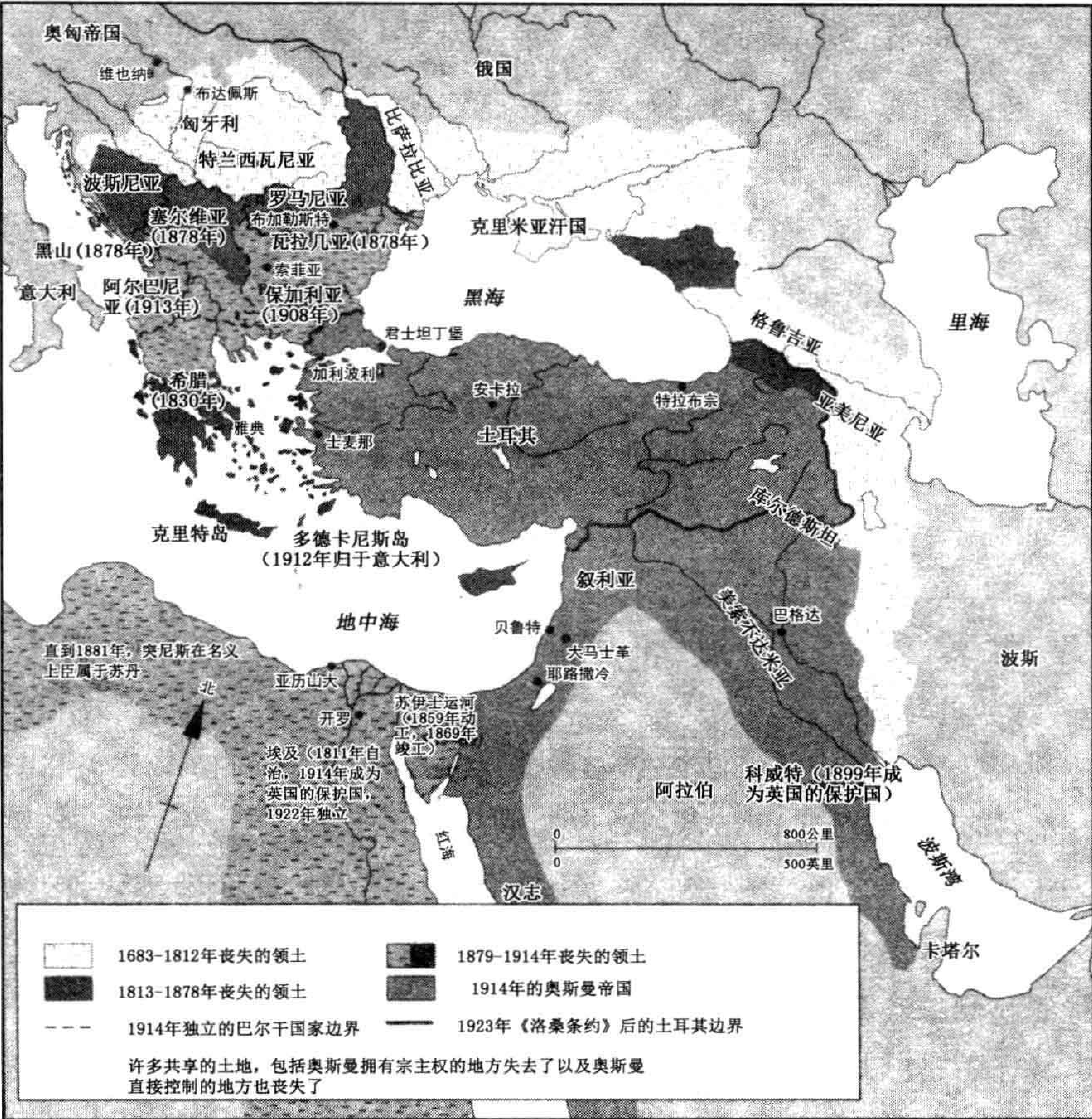
那些在以前很快认识到采用马镫和车床对促进当时社会进步重要性的历史学家们，却没有发现这些普通的商品和器具对社会进步也具有和马镫和车床一样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意味着这个社会的另一半——女性世界的革命。这就不难理解在 20 世纪初期，为何傻里傻气的“妇女参政权论者”(suffragettes)——英格兰人对争取选举权的妇女的称呼，对这些普通的东西比一般人更关注。自由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很快加速了女权运动。这就是女权运动兴起的背景。理论上，跨越性别界线一起追求民主是有理由的，因为这意味着全体选民的人数会翻倍。 871

但是正式合法的政治结构并不足以完全表达民众想要的具有“大众”性质的政治倾向。大众必须得组织起来。到 1900 年，现代政党的出现满足了这个要求。政党简化了它的一些议题，向人们展示它是明智的选择，它是为了传播政治意识和培养特殊兴趣的。政党从欧洲、美国传遍全世界。思想守旧的政治家们强烈反对这种新团体模式，因为这是大众社会到来的另一个标志，意味着腐败现象可以被大众讨论，传统的政治精英必须根据大众的要求调整其政治观点。

在 19 世纪早期的英格兰，公众意见的重要性已经被政府意识到。在民众对《谷物法》展开的斗争中，可以看出民意对政府决策具有决定性意义。到 1870 年，法国的皇帝也意识到他无法抵抗民众对他所害怕

并且将会输掉的那场战争的呼声。俾斯麦,一个典型的保守政治家,很快意识到他必须向民意妥协,拓展德国的殖民利益。对民意的掌控,很快也将成为可能(至少很多报纸老板和政治家都这样认为)。扩大文化教育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认为,为了让群众正确行使他们的投票权,得让民众文明开化,因而对民众教育进行投资是必需的。民众文化程度提高的结果是廉价的报纸有了市场,报纸经常迎合读者的情绪和感觉,卖报者和广告设计者也有了市场,这也是 19 世纪的另一项发明。

872



1683—1923 年奥斯曼的衰落和现代土耳其的出现

民族主义仍然是一个不容置疑并最具大众吸引力的政治原则。而且,它总能保持革命的潜力。这种现象在一些地方很明显,在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从克里米亚战争开始,民族主义者成功打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建立新国家的浪潮没有停息。塞尔维亚、希腊和罗马尼亚民族国家也在 1870 年牢固地建立起来。到 19 世纪末保加利亚和黑山也成立了。

1913 年,在欧洲冲突完全掩盖土耳其问题之前,爆发了巴尔干同盟对抗土耳其的最后一次战争,阿尔巴尼亚在这时成立了,接着出现了一个由希腊人管理的自治的克里特岛。这些民族主义活动很多次把一个国家拉进动乱的泥潭,它们是和平的潜在威胁。但在俄罗斯帝国境内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却不完全是这样的,尽管在那里,波兰人、犹太人、乌克兰人、立陶宛人都觉得他们深受俄罗斯人的压迫。在奥匈帝国,战争看似是关系紧张的必然结果,在匈牙利一半以上的国土范围内都出现了真正的革命苗头。匈牙利的大部分斯拉夫人跨越国界到塞尔维亚去帮忙反抗匈牙利人的压迫。在奥匈帝国的其他地方,比如在波希米亚和斯洛文尼亚,民族情绪没有这么高涨,但民族主义仍然是主要问题。英国的民族问题没有像这些国家那么严重,但它在爱尔兰也有民族问题。实际上,它面临两个民族问题。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在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英国一个明显的民族问题。英国政府作出让步并答应进行改革,但爱尔兰人还是没能实行英国自由党所承诺的地方自治。然而到 1900 年,农业改革和经济状况的好转大大降低了爱尔兰问题对英国的危害性,尽管很快又被新出现的另一个爱尔兰民族主义问题困扰,即占北爱尔兰省人口绝大部分的新教徒威胁说,如果英国政府给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民族主义者们以地方自治的权利,他们就要起来革命,这是个令英国政府非常头疼的问题。在 1914 年,当英国的民主体制最终通过地方自治的法令时,一些国外的观察家误以为英国的这一政策肯定会被因为干预欧洲事务而引发的国内革命阻止。

873

所有支持民族主义言论的人都认为自己这么做多少是有正当理由的,是为了被压迫的人们。但力量强大的民族主义同时也是一股分裂

的力量。阿尔萨斯和洛林在1871年被割让给德国后,法国和德国心理上的裂痕更深了。法国的政治家迎合法国人民的心理,积极培养人民的复仇情绪。法国的民族主义给其带来不少苦果,引起诸多政治争吵,因为他们把问题上升到对国家制度的忠诚层面。就连最冷静严肃的英国人也会不时被民族主义情绪鼓动,他们对帝国主义和保持英国海军至高无上的地位都很狂热。德国充满旺盛活力的经济越来越威胁到英国世界商业中心的地位。尽管这两个国家是彼此最好的伙伴,但更重要的是在很多方面它们的利益开始发生冲突了。在德国第三位皇帝威廉二世的统治下,德国的民族主义具有了另一种新特色,威廉注意到了民族主义所蕴藏的巨大力量,他想真正地让这种民族主义得到发泄,而不是象征性的。首先他想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这一点尤其让英国恼火,英国人无法接受这一点,认为建海军是针对英国的。人们开始发现在欧洲事务上德国人越来越盛气凌人,不管是有理还是没理。民族的模式化观念很难用一个词表达,但是因为它们能对公众的反应进行可怕的简化,因此成为20世纪初作为破坏性力量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一部分。

874 对当时的历史感到乐观的人指出,在19世纪,国际暴力减少了,自从1876年(俄国和土耳其打起来)后欧洲几个强国之间就没有战争,但不幸的是,欧洲的士兵和政治家们并没有看到美国将爆发南北战争的征兆,在这场战争中,由于铁路和电报机的出现,一个指挥官第一次能控制超过100万的人,也第一次向人类展示了大量生产的现代武器能够带来巨大的伤亡。然而这些危害性的事实都被忽略了,1899年和1907年召集了代表大会以阻止欧洲出现的军备竞赛,尽管失败了,但这种努力是积极的。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国际仲裁惯例和对野蛮战争的一些限制。当德国皇帝派遣军队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时,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被中国人反抗欧洲人暴动的报道所激怒,威廉告诉他的士兵们要像匈奴人一样凶残。这句话深刻地印在人们的记忆中。很多人都觉得他这样说太过分,尽管在那时他认为这种指示是有必要的。根本没人会对17世纪的军队说要像匈奴人一样凶

残，因为不用说他们自然就会这么做。到1900年，没有人再期望德国军队这样做了，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人性化的战争已经产生了。“文明的战争”是一个19世纪的概念，不仅仅只是一个矛盾的术语。1899年，各国都同意禁止使用毒气、达姆弹，甚至禁止从空中向下扔手榴弹，即使这种禁止只是在有限的一段时间内有效。

除了抵制革命的共识外，伴随着基督教世界观念的崩溃，欧洲统治者因意识到彼此息息相关而受到的约束很久前就瓦解了。19世纪的宗教在国际关系中是一种缓和矛盾的次要的非直接的动力，也有利于加强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基督教已经证明了其在控制暴力上的力量是微弱的，正如社会主义者的希望——全世界的工人为了社会主义目标不要互相斗争一样是不可能的。这是否是缺乏一种有组织的教会力量的结果，这一点还不太清楚。到1900年时，宗教对人们行为的控制力在不断下降，这使人更加担忧。这并不是因为一种新的宗教形式挑战了基督教教义，而是因为出现了一种趋势，这种趋势从18世纪开始就可观察到，自法国大革命后就越趋明显了。几乎所有的基督教教派都越来越受到社会进步和人文精神冲击，它们也没有能力开发出新的东西来改变这种状况，比如在19世纪晚期大量发行的报纸也许可以帮助它们。当然，它们中的一些教派，尤其是罗马天主教，极其怀疑这些进步。

875

尽管所有的教派都感觉到了时代产生的这种对它们不利的潮流，但罗马天主教是最明显的牺牲者，教皇在位期间的权力和威望就已经被严重削弱。罗马天主教也公开声明它对进步、理性和自由的敌视，这些声明也成为宗教教条、教义的一部分。从政治上来说，在1790年时，当法国大革命的军队把革命的精神带到意大利，改变了意大利的领土，入侵教皇的领地时，罗马天主教的世俗权力就开始被削减。随后，对教皇权利的侵犯从时代的主导理念——民主、自由、民族主义来看也被证明是有理的。最终，在1870年，梵蒂冈外的老教皇国的最后一块领土也被意大利的新国王收回来，教皇就几乎完全成为纯粹的教会精神领袖。可追溯至梅罗文加王朝时期的教皇享有世俗权力的时代结束了，

有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件可耻的事,因为这种宗教习俗一直都是欧洲文明和历史的中心。

事实上,这被历史证明是一种福祉。然而,在那时,对教会权力的强夺强化了教皇对该世纪几种力量的敌意,也强化了进步思想家所持有的嘲笑态度。1870 年教皇谈到信仰和道德方面的最高权威,认为自己是这方面的绝对权威,这成为教会教条的一部分。这时双方的对立达到新的高度。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政治生活里,反教权主义和攻击神父变得比以前更重要。在很多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国家里(除了波兰),民族情绪被调动起来反对教会。政府在反教皇运动中占据优势地位,这有利于政府对教会行使其合法权力,政府把权力扩展到教会原先最重视的教育领域,首先是基础教育和中学教育。

迫害催生了政治上的不妥协。矛盾的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无论人们对罗马天主教教义的地位持怎样的观点,天主教在忠实的信徒中依然能获得大量的支持。还有,由于天主教在海外的传播,很多人皈依了天主教,信徒的人数很快大量增长了。尽管在欧洲新出现的众多城市居民中,这些有组织的宗教并没有取得多大的发展,基督教不合时代的教条没有打动他们,这些人原先生活的世俗文化环境也让他们成为不信教的人,但作为一股政治和社会力量,天主教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更别说它会消亡了。事实上,把教皇从世俗角色中解放出来,使罗马天主教徒更觉得应该对他绝对忠诚。

876

罗马天主教是对教徒要求最多的基督教教派之一,处于那个时代教权和政权斗争的最前线,但上帝的启示录和教士、牧师的权威在到处受到质疑。这是 19 世纪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很多欧洲人和美国人仍然相信他们教派教义中简单的和原义的信条,还记得《圣经》中所说的故事。当这些信条被威胁到时,他们感到极为不安,但这些信条在越来越多的国家里受到了挑战。传统的宗教信条最初只是在知识分子中受到质疑批判,知识分子从启蒙运动中吸取很多新思想:“伏尔泰的”是 19 世纪一个最受欢迎的形容词,用来表明反宗教和怀疑精神的观点。随

着 19 世纪的推进,这些思想被另外两股知识潮流加强了,这两股潮流刚开始都是知识分子关注的,但随着大众教育和廉价报纸的推广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一个挑战来自研究圣经的学者们,他们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德国人,他们从 1840 年开始不仅仅推翻了很多把《圣经》当作历史证据的假设,起更根本作用的是,使人们对圣经的态度从心理上改变了。其实这使以后简单地把《圣经》当作客观的历史材料的行为都会受到人们的批判。法国学者欧内斯特・勒南在 1863 年出版的一部非常成功的且引发丑闻的书《耶稣传》,把这种看法带给了更多的人。《圣经》自从中世纪出现以来一直是欧洲文明的核心文献,但此后再也未能恢复到这种地位。

第二种来源是自然科学破坏了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对长久以来基督假设中固定的道德观、政治观、经济观思想的信仰。攻击宗教学说中不合逻辑的种种说法,对民众进行启发已经变得很急迫了,这时科学开始提供经验性的证据来证明《圣经》所说的大部分都不符合观察到的现实。起点就是地质学,自 18 世纪末期开始,有关地质学的知识自苏格兰科学家查尔斯・赖尔的《地质学原理》一书在 1830 年出版后就得到广泛关注。这本书从自然力的角度解释地壳变化的原因,认为地壳运动和地表变化不是由于超自然力量或巨大灾变,而是由于风、雨等自然力的作用。赖尔还指出,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在不同的地质层存在的不同生命体的化石意味着在每一个地质时代,总是不断出现新物种。如果这个理论也是正确的,那《圣经》所说的神造万物的说法就陷入困境了。在英国石洞发现的石器和一些已经灭亡的动物骨头化石越来越表明,《圣经》中关于人的年表很明显是错误的。人其实出现得比《圣经》所阐述的早得多这个观点可能在 1859 年就得到正式的承认,那时英国学会听取并出版报纸证实"在远于人类迄今为止能证明的远古时期",人类在旧石器时代早已生活在索姆河谷(Somme)。

877

在同一年,从另一种渠道让解决这些问题变得非常急迫的是生物学。英国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在 1859 年出版了一本对现代文明影

响深远的书，简称《物种起源》，这本书也许过于简单，但大体上没歪曲事实。他的书很快就出版并在全国范围内几乎引起骚乱，公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做好了准备，对宗教主导一切(比如教育)的合理性的质疑传开了。公众对“进化”这个词很快变得熟悉起来，但达尔文一直试图避免用这个词，直到《物种起源》出到第十五版，也就是第一版出版的10 年后。然而，这本书对进化假设的论述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生物是从简单的物种经过长期的演变才变成它们现在的样子的。当然，这一点也包括人，他在另一本书——1871 年的《人类的由来》中有详细的解释。这种进化是怎样发生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达尔文受到了马尔萨斯的人类为了食物存在残忍竞争的观点的影响，认为生物界体现了这些原则，在残酷的环境下，生物之间优胜劣汰，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个观点在“适者生存”这句话被用作口号时就变得通俗化了(还被严重曲解)。但是，尽管这部著作的很多观点激发了新思想的产生，但更重要的是达尔文沉重打击了广为流传的《圣经》中的神造论(也打击了人类是独一无二的说法)。达尔文的书把对《圣经》的评判和地质学结合起来，使任何严谨和有思想的人都难以再认为《圣经》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 1800 年的时候这是可能的。

878

科学影响人们已经形成的信仰最有效的惟一方法是削弱《圣经》的权威。另一点也很重要，就是一种新的含糊的但是不断壮大的威望形成，科学已经在社会上得到前所未有的广泛认可。这是因为科学获得了控制自然的最强大工具的新地位，自然被认为日益无力抵抗科学的强大力量。这就是科学开始创造神话的开始。事实上，它的本质在于17 世纪科学的伟大进步并没有经常导致普通百姓生活的改变，而 19世纪的科学进步越来越表现出这一点。尽管不明白开创外科手术使用防腐剂(或者防腐技术)的约瑟夫・李斯特所写的理论，或者超出任何其他人使得电流发电成为可能的迈克尔・法拉第所写的理论，人们依然知道 1900 年的医学不同于他们祖父那个时候，并且经常在工作中和家里看到电力使用。到 1914 年，无线电信息的发送可以跨越大西洋，不依赖由低于空气密度的袋装气体支撑的飞机也变得普通了，阿司匹

林也很容易买到,美国的制造厂开始出售第一批大规模生产的廉价汽车。这些并不能充分展现出科学的无穷力量和不断拓展的领域,但是这些类型的物质进步使普通老百姓印象深刻,也让人们开始崇拜科学这个新的圣地。

科学体现于技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科学对大多数人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就是通过技术的发明革新体现出来的。大机器和各种产品带给人们的生活改变越来越多,人们对此感到很满意,即使现在科学已经通过多种方式去改变人类社会了,但通过工业生产还是它最明显的一种方式。社会进步和世界主要文明深深地缠绕交织在一起,科学的发展不仅仅意味着人类实力的增强。在 1914 年后的时间里,科学的发展已经为 20 世纪下半叶的明显特征打好了基础,科学成为世界主导文化发展的主要原因。科学进步是如此的快以至于人类生活的每一部分都受到它的影响,同时人们仍然试图去抓住科学最基本的哲学含意。

对这种改变最不费力的观察(最容易当作起点的)是把科学本身当作一种社会和物质现象。在 17 世纪,当物理学实现第一个伟大的进步时,科学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实。一些研究机构很快被建立起来,在那里,研究人员集中起来用一种后来被认为是科学的方法去研究自然界,甚至有时统治者还雇请科学家,利用他们的专长解决相关的特殊问题。很明显,一些有用的技能——它们经常被称作技能而不是科学——比如航海和农业,由那些本身不是从事这个职业的技术人员作出的种种尝试,也能作出有用的贡献。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来帮助人们正确地把这个时代和 19 世纪及此后的时代划分开来,在这个时候科学家被称为"自然哲学家"。"科学家"这个词直到 19 世纪走过三分之一的时候才被发明,当时人们觉得有必要把对自然界的研究区分为建立在严密的实验和观察上的研究和通过未经检验的理由对自然界进行猜测的研究。然而那时,在大部分人的头脑里,人们认为进行臆测研究的人和进行应用研究的科学家或技术专家没多大区别,技术专家在那个大机器、煤矿和制造业都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的时代更能明显地代表科学。

879

19 世纪也是第一个这样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科学被理所当然

地视为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从事的专业研究，这些研究者都有专业的身份。科学在教育中获得更高的地位，在已有的大学里面开设新的系。在一些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成立了一些特殊的科学和技术的研究机构，科学在社会上的地位更加突出了。专业研究也包含了更大的科学成分。科学在教育领域的发展加快了对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影响，效果越来越明显。科学产生的总的效果使早已形成的社会发展趋势取得更进一步发展。大约从 1700 年开始，全世界的科学家人数经历着稳定的指数式的增长：科学家的数量大概每 15 年就增加一倍（这说明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从那以后，在任何时候，活着的科学家都比去世的多）。在 19 世纪，其他科学的测量方法也被采用了（比如，天文台的建立），还提供了指数曲线。

科学的进步是人类能够不断增强对生存环境的控制力和改善生活的真正原因，外行人也能抓住这一发展机遇改善生活。就是这些原因让 19 世纪成为第一个让科学真正变成信仰的对象——也许是崇拜对象的世纪。到 1914 年，受过良好教育的欧洲人和美国人都把麻醉剂、汽车、蒸汽涡轮机、坚硬的特制钢材、飞机、电话、无线电还有其他很多在一个世纪前还不存在的奇迹看作理所当然，但这些东西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已经非常巨大了。或许最广泛和显而易见的影响是由于使用廉价电能所带来的影响，郊区的居民能乘坐火车和有轨电车，工厂里劳动的工人使用电动机，电灯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电能的使用塑造着新的城市生活。就连动物的数量也深受影响，1900 年的时候，在英国有 3.6 万匹马在拉车，到 1914 年，只有 900 匹马在拉车了。当然，科学的实际应用已经不是新鲜事了。自 17 世纪之后每一个时期都受到科学活动附带的技术产品的影响，尽管起初的科学活动很大程度上只被局限在弹道学、航海术和地图制造、农业和一些基本的工业加工这些领域。但只有在 19 世纪，科学才在维持生命和改变社会上扮演真正重要的角色，而不是仅仅通过一些令人惊叹的和新奇的技能。比如，化学染色工艺就是在 19 世纪的科学研究推动下产生的包罗万象的新领域，这种技术被很多行业采用，比如制药业、制炸药、抗菌剂的行业等。这些

880

都对人、社会和经济产生很大作用。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染色工艺影响了成千上万的人们，印度靛蓝原料种植者们悲伤地发现他们破产了，西方的工人阶级发现他们可以购买色彩稍微丰富一些的衣服，就这样，随着衣服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人造纤维的迅速发展，不同阶级的人的衣服原先明显的差别开始慢慢消失了。

这些变化已经让我们跨越维持生命的界线开始去改变生活。基础学科将继续改变我们的社会，尽管在1914年以前，一些学科就已经开始改变社会了，比如物理学，这最好留到晚点再讨论。另一个影响比较容易测量的学科是医学。到1914年，医学领域已经取得巨大的进步。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它由一种技能发展成了一个学科。理论发展和控制感染成为医学的桥头堡，抗菌剂在数十年后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在19世纪60年代仅被赖斯特介绍过；赖斯特和他的朋友巴斯德·路易斯(法国最伟大、最著名的化学家)一起打下了细菌学的基础。维多利亚女王是宣传新医学方法的先锋，在生王子和公主的时候采用抗菌剂，这对促进人们早日接受这种在1840年刚刚起步的技术是非常重要的。1909年发明的洒尔佛散标志着选择性处理感染的发展，验明疟疾携带者的技术发明，或者X射线的发明，让少数人已经认识到医学上取得这些成就的重要性。然而尽管这些进步是很重要的，在接下来的50年里都被其他的发明给远远超越了，顺便提一下，医疗的费用也大大提高了。

881

科学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科学创造神话这个结论在1914年之前被证明是合理的。在这句话的语境里，“神话”含有不是虚构或想象出来的意思。这样方便把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科学的真实性上，大部分科学结论都被实验证实，所以它是正确的，同样它也改变了人们看待外部世界的方式，就像宗教在以前影响着人们看世界一样。也就是说，这已经比它为人类提供开发和控制自然的方法更加重要了。在处理超自然的问题上，科学给人类提供指导，科学也告诉人们该去追求什么样的目标，该用什么样的标准约束人类的行为。尤其在塑造公众态度上它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当然，所有这些和追求成为科学家是没

有内在和必然的联系的。但从最长远观点来看,结果就是一个文明里的精英人物没有显著的宗教信仰或卓越的理想。这个文明的核心,无论是否被清楚地表达出来,就存在于这样一个信念里,这个信念就是期望人类控制自然后能再做些什么。理论上,人们认为有如此丰富的智力资源和财富,没有什么问题是不可以解决的,但人们也给还没弄清楚的领域留下继续发现的空间,而不认为那是神秘的。很多科学家在这个结论上已经开始退缩了。自然界包含的很多现象还难以被理解。但是现在的主要世界观就是基于这个假设上的,它的基本要素在 1914 年以前就已经形成。

对科学的极端信心已经被称为"科学至上主义",但也许很少人完全明确并无限制地支持"科学至上",即使在它最为流行的 19 世纪晚期。科学方法的威望的另一个合适的证明,是知识分子希望把科学方法拓展到自然科学以外的领域。寻找"社会科学"的心愿最早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从英国的改革家和知识分子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的追随者那里找到。边沁希望把社会管理建立在人对痛苦和快乐的反应原理的适当应用的基础上,而快乐应该最大化,痛苦应该最小化,人的各种感受和感受的激烈程度都应该被考虑进来。19 世纪,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给关于社会的学科取名为——社会学;马克思在自己的葬礼上被描述为社会学领域的"达尔文"。这些人(还有其他很多人)力图效仿自然科学寻找普遍的类似机械的规律;在那时自然科学沉迷于探寻这些规律并不能说明什么,这种探求本身仍然证明了科学模式的声望。

882

反常的是,到了 1914 年,科学给欧洲文明造成了一种莫名的紧张。这种紧张在关于传统宗教的问题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在其他问题上有时比较微妙,比如宿命论里很多思想是吸收了达尔文的学说,或者吸取了人类学的相对论,或者从对人的思想的研究中得到启发的,科学本身就已经逐步削弱了人们对客观性和合理性的信心。从 18 世纪开始,科学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就是非常重要的,到了 1914 年,有征兆表明,自由、理性、开明的欧洲会像传统、宗教化、保守的欧洲一样气氛紧张。

对欧洲未来的质疑不应放大。最明显的事实是,在 20 世纪早期的欧洲,尽管一些欧洲人对欧洲的未来感到怀疑和担忧,但毫不影响欧洲继续是世界事务中心的地位,是全球政治权力最集中的地方,是世界命运的真正主宰者。从外交上和政治上来说,欧洲的政治家经常忽略世界其他地方,西半球的美国除外,这是一个有欧洲血统的国家,这个国家对欧洲来说是很重要的,而在远东地区,日本变得越来越重要,而美国在此的利益,需要其他国家的尊重。这就是在 1900 年让欧洲政治家极感兴趣的国家间关系;对大部分欧洲的政治家而言,这时没有什么其他重要的事情能让他们费心。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883 自1870年起,欧洲就成功避免发生大的战争。与这一明确的事实相反,国际上的一些现象表明,在1900年之前欧洲依然存在越来越明显的不稳定因素。一些大国国内存在严重的问题,举例来说,这些问题可能暗指外部势力的影响。这些国家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不同,比如,德意志帝国和意大利王国是新兴国家,40年前它们还不存在,这使得它们的统治者对内部的分裂势力尤其敏感,结果是宁愿讨好国民的沙文主义情绪。一些意大利领袖参加残酷的殖民地冒险,但仍然怀疑奥匈帝国(是意大利正式的盟友,但意大利人认为奥匈帝国的统治者是未被救赎的)而且对它不友好,这最终在1911年时把意大利推入与土耳其的战争中。德国有工业优势和成功的经济来支持,在谨慎的俾斯麦退休后,正如一些德国人所总结的,执行他的外交政策的人越来越着眼于赢得尊敬和声望的战利品——"阳光下的地盘"。德国也要面对工业化的影响。德国新产生的众多经济势力、社会势力逐渐和德国制度的保守特征难以协调,这个保守的制度给帝国的政府太多的权力,帝国是一个半封建的国家。

不仅新国家存在国内关系紧张的情况。俄国和奥匈帝国这两个庞大的帝国都面临严重的国内问题;它们比其他任何国家更适合神圣同盟时代的设想,政府本质上是国民的对手。尽管它们的政体有明显的

连续性，但这两个国家都经历了巨大的改变。哈布斯堡皇室君主政体以新的、两国共主的形式出现，这是马扎尔人[①]自己的民族主义的成功产物。在20世纪的早些年，有迹象表明，想要在不激怒国内其他民族的情况下永久使二元君主制发挥作用越来越难。工业化的进行（在波希米亚和奥地利）给旧社会制度带来新的紧张因素。俄国，正像被指出的那样，在1905年爆发政治革命，现在俄国社会的变化更加深刻。独裁政治和恐怖主义破坏了亚历山大里亚二世进行自由主义改革的希望，但是直到那个世纪末并没有阻止快速发展的工业化的进行。这是经济革命的开始，在此之前，伟大的农奴解放运动是最基本的准备工作。政府设计政策从农民那里获取粮食，为出口提供商品，从而还清对外借款。在20世纪，俄国开始表现出惊人的经济发展速度。它的生产规模仍然较小——1910年，俄国的生铁产量不足英国的三分之一，全国产量只有德国的四分之一。但是这些数量的生产是以非常快的速度实现的。更重要的是，有迹象显示，到1914年，俄国的农业生产已经转危为安，而且有能力实现农作物的生产速度比人口增长的速度更快。一位大臣做了一个决定性的努力，就是去除对个人主义的最后限制和废除农奴制，为俄国提供了一个经济实力强的独立的农民阶级，农民的收益与提高生产力联系在一起。但是仍有很多落后的因素要去克服。在1914年，俄国不足10%的人口居住在城镇，而且超过1.5亿的总人口中只有大约300万的人从事工业生产。债权国仍然对俄国的进步感到不太乐观。它可能是一个具有潜力的巨人，但也是一个严重的残疾人。专制体制下的俄国管理糟糕，不情愿进行改革，而且反对所有的改变（虽然被迫在1905年对立宪作出让步）。文化总体水平落后，且没有前途；工业化需要配套进行大量教育，而且那会引起新的紧张。自由主义的传统很弱，而恐怖分子势力和独裁的传统却很强。俄国仍然依赖外国给它提供所需的资金。

884

资金大部分来自它的盟友法国。和英国、意大利一起，第三共和国

---

① Magyars，匈牙利主体民族。——译者注

在欧洲强国中代表了自由主义和合乎宪法的原则。尽管法国思想有活力、不安分且有自知之明,但它的社会是保守的。一方面,法国表面的不安定是政客之间激烈讨价还价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因为有人想努力保存革命的传统。然而工人阶级的活动基础薄弱,法国只有慢慢走向工业化,事实上,第三共和国这时也像欧洲的其他政权一样稳定了,但是工业发展的缓慢表明了法国人非常清楚的另一个缺陷,就是他们的军事劣势。1870 年的德法战争已经表明,法国人无法凭他们自己的军队打败德国军队。从那之后,这两个国家地位的悬殊越来越大。在人力资源方面,法国远远落后于德国,在经济上的情况也一样;和它的邻居相比,法国显得相形见绌了。仅仅在 1914 年之前,法国仅能生产大约相当于德国六分之一的煤,不到德国三分之一的生铁和四分之一的钢铁。如果要回到 1870 年的竞争态势,法国人知道他们需要盟友。

885

在 1900 年,没有人会考虑跨越海峡。这主要是因为殖民地问题。法国(正如俄国)在全球许多地方和英国在当地的利益发生冲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英国发现它能摆脱与欧洲大陆的纠缠;这是一个优势,但是它在国内也有麻烦。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是工人阶级暴动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且也是相对力量优势最不稳定的国家之一。到 1900 年,一些英国商人很清楚德国是他们的主要对手;在技术和方法上,德国工业明显优于英国。以前很有把握的事现在也开始退却了;自由贸易被质疑。在北爱尔兰人和妇女参政论者的暴力活动中,在与上议院决定保卫财富利益的社会立法进行的残酷斗争中,甚至有迹象显示,议会制可能受到威胁。在维多利亚王朝中期的政治中,不再有维持共识的意识。然而英国的制度和政治习惯令人很放心。议会制君主立宪制已经证明了在自 1832 年以来英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它能控制自如,而且大部分人都相信它能继续这样下去。

那时的英国发现,只有一种前景难以认清。这揭示了在前半个世纪里,英国在国际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点可以从日本或者美国这两个欧洲以外的大国看到。日本的预兆在这两者中更容易辨别,也许,因为它在和俄国的战争中取得了军事胜利。然而会有迹象提

供给人们解释，为什么美国不久后会成为令欧洲相形见绌的强国，并且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19世纪的扩张已经达到高潮，它在西半球凭借自己无可置疑的实力建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建设巴拿马运河以及与西班牙作战已经圆满结束了。19世纪中期的大危机被美国克服了，美国的国内环境、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决定了美国的政治制度能很快处理它面临的这些问题。在这些问题当中，最严重的一些是由工业化造成的。只要经济实力强大到足以把其他国家打得无还手之力，一切就会很好，这种说法在19世纪末第一次遭到质疑。但是在大规模的工业机器成熟之后，这成为了现实。成熟的大规模的工业机器成为未来美国力量的坚实基础。到1914年，美国生产的生铁和钢是英国和德国两国总产量的两倍多；美国挖掘的煤的数量也超过它们，而且制造的汽车比世界的其他国家制造的总和都多。同时，美国公民的生活质量对移民来说仍然充满了吸引力；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源源不断的廉价的被高度激励的劳动力是美国经济实力的两个来源。另外的原因就是对外的投资。它是最大的债权国。

886

到1914年，除了英国或者俄国外，虽然美国的政治制度比任何主要欧洲国家都古老，但是新移民的到来赋予了美国一个新国家的心理和特征。整合新国民的需要时常引发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宣泄。但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和排斥欧洲的传统，以及美国政府和商业被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精英持续主导，使美国不会参与西半球外的暴力活动。美国在1914年仍然是有待展翼的年轻的巨头，当欧洲需要美国介入它们之间的争吵时，美国的重要性就会完全体现出来。

在那年有一场战争是由于那些争吵开始的。虽然它不是最血腥的也不是历史上最长的战争，也不是严格意义的“第一次”世界战争，但它是到那时为止最激烈、波及地理范围最广的战争。来自每个大陆的国家都参加了。它也比任何较早的战争花费都多，而且对资源的要求是前所未有的。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打仗，一方面是因为它是第一次由机器发挥最重要功能的战争；战争第一次被科学改变。最适合形容这场战争的名字还是那些参战者取的那个简单的名字：大战。这充分

表现了它对人类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心理影响。

它也是两场以控制德国实力为中心的战争的第一场。这两场战争的结果,就是结束了欧洲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至高权威。每一次冲突都是根源于欧洲问题,而且战争总是有明显的欧洲特征。正如被德国引爆的下一场战争,它把其他矛盾也吸引进来,把很多矛盾掺杂在一起。但欧洲是这些事情的中心,最终的大战对欧洲本身造成的巨大破坏使它丢失了世界霸权。欧洲的霸权直到 1918 年才丧失,当大战结束时(无法弥补的损害在那时已经造成),遭到严重打击的欧洲直到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恢复。这也使 1914 年前欧洲所形成的秩序消失了。因而一些历史学家说从 1914 至 1945 年的这个时期,是欧洲人的内战期——这是一个不错的比喻。欧洲从没有远离战争太久,欧洲大陆内部的混乱首先源于将其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假设,但欧洲从没统一过,因此没有所谓的国内战争。但它是欧洲共同文明的发源地。欧洲人认为所有欧洲人都是一样的,而与黑头发、褐皮肤或黄皮肤的人不同。此外,欧洲的实力是整个体系的实力——在 1914 年它是经济统一体而且维持了最长时间的和平。这些现象在 1945 年之前都消失了,这使内战的比喻更加生动和合理,它表现了欧洲文明自我毁灭的疯狂。

887

欧洲平衡地保持大国间和平超过了 40 年。但到了 1914 年,这种和平被严重扰乱了。很多人开始觉得战争带来的机会可能比继续维持和平更多,尤其是在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的统治范围内。当他们开始注意到这点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国家之间的义务和利益使矛盾一旦产生就不可能只限制在两个或少数国家的范围内。另外一个造成欧洲不稳定的因素是小国的存在,它们喜欢和大国发展特别关系,其中一些能够从那些必须参加大战的国家手中获得影响决策的权力。

1914 年以前当权的政治家从心理上把这原本就微妙的情况变得更危险了。这是一个大众情绪容易被激起的年代,尤其是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煽动下。他们都忽略了战争的危险性,因为没有人(除极

少的少数人外)能预见这场战争和1870年的战争是很不相同的，他们记得那年的法国战争，却忘记了早几年在弗吉尼亚和田纳西州，现代化战争如何展现它长期杀戮和劳民伤财的面目(在内战中牺牲的美国人比其他所有美国参加过的战争所牺牲的人数都多，甚至到今天也没被突破)。大家都知道战争是具有毁灭性和暴力性的，确实，但是也相信在20世纪内它们会很快地结束。巨大的军火开支使文明国家觉得维持同拿破仑时期和法国作战那样的长期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复杂的世界经济和纳税人都将无法幸存。这也许减少了对危险的担忧。甚至有迹象显示，许多雄辩的欧洲人厌倦了1914年的生活，把战争看做清除他们堕落感和枯燥感的一种情感的发泄。由于考虑到国际冲突可能带来的机遇，所以革命者对国际出现紧张局势是欢迎的。最后，值得我们记得的经验是，外交官在没有战争重大危机的谈判中如果长期取得胜利，这是很危险的。协调欧洲国家间关系的机制运作了许多次了，以致当它遇到一些倔强不合作的事情时，比如在1914年7月发生的事，它的重要作用就约束不了这些当事国了。在冲突的前夕，很多政治家还不明白，为什么召开另一个大使会议或甚至召开欧洲大会都不能让他们从这些问题中解脱。

888

在1914年一个即将爆发的冲突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东南欧，奥匈帝国和俄国进行着长期的争斗。它们敌对的根源深植在18世纪中，自克里米亚战争后奥斯曼帝国的加速崩溃主导着争斗的最后阶段。根据这个理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从另一个角度上看是奥斯曼战争的延续。1878年柏林会议后，欧洲已经渡过危险的时刻，哈布斯堡王朝和罗曼诺夫王朝的政策使得到1890年时，它们之间的关系平静下来，还达成了一定的互相理解。这种关系一直持续，直到日本阻止了俄国在远东地区的野心后，俄国把目光移到多瑙河流域，俄国在这里的势力开始复兴。在那个时候，哈布斯堡和土耳其帝国之外的事件也正在挑衅奥匈帝国的政策。

这种情况的根源是革命的民族主义。一场看似要把奥斯曼帝国重新统一的改革运动激起了巴尔干国家想要打破由欧洲强国建立起来的

边界现状，奥地利人也想在这动荡的国际形势中寻找他们的利益。在1909年，通过对奥斯曼的波斯尼亚省的不当合并，他们冒犯了俄国人。俄国人也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合并波斯尼亚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二元君主制获得了斯拉夫臣民。在君主制下的臣民已有一些对国家不满了，特别是生活在匈牙利人统治下的斯拉夫人。在越来越强烈的匈牙利人利益的压力之下，维也纳政府十分敌视塞尔维亚共和国，该国的斯拉夫人积极寻求支持。他们中的一些人视塞尔维亚共和国为支持建立包含所有南部斯拉夫人的国家的核心，塞尔维亚的统治者似乎无力（和也许不愿意）制止南部斯拉夫人的革命者以贝尔格莱德作为在波斯尼亚进行恐怖和颠覆活动的基地。历史的教训通常是不幸的，维也纳政府仅仅愿意得出这样的结论：塞尔维亚共和国可能在多瑙河谷发挥与撒丁王国在意大利统一中相同的作用。帝国中的许多工作人员感到，除非阴谋被阻止，哈布斯堡领土将会丢掉另一块领土。曾经被普鲁士排除在德意志之外的历史和被撒丁王国排除在意大利之外的历史，使一些哈布斯堡的顾问将一个潜在的新生的南部斯拉夫人的国家（一个更大的塞尔维亚或其他国家），看成将帝国排除在多瑙河谷低地区域之外的威胁。这将意味着奥匈帝国不再是一个大国，马扎尔人在匈牙利不再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南部斯拉夫人坚持认为，留在匈牙利境内的斯拉夫人应得到更公正的对待。于是土耳其帝国的持续衰弱只有利于俄国。俄国支持塞尔维亚共和国，这决定了1909年时的情况不会再发生。

889

其他国家在利益、选择、情绪和正式同盟的推动下卷入这种复杂的局势。在这些当中，最后一个卷入的国家也许没有此前预期的那么重要了。俾斯麦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努力确保了法国的被孤立和德国的至高地位，产生了在和平时期一个独特的同盟体系。通常的特点是盟约规定了盟国诉诸战争支援彼此的情况，而且这似乎阻碍外交发挥作用。但是最后它们没有依照计划操作。这不意味着它们没有成为战争来临的因素，但是只有当人们想要它们成为有效的正式的安排，它们才可能是有效的，而且其他因素决定了1914年的形势。

同盟的根源是1871年德国从法国手中获得阿尔萨斯和洛林，和随之发生的法国为报仇而产生的躁动。为了防止法国复仇，俾斯麦基于抵制王朝面临的革命和被颠覆危险的共同基础，首次将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纠集在一起。法国是大国中惟一的共和制国家，被认为是这种威胁的典型；出生于1789年前并在1871年仍活着的人和许多其他的人会记得大革命期间人们的言论，而巴黎公社的动荡又重新引起所有从前的对国际范围内社会秩序颠覆的恐惧感。1880年保守同盟的势力依然在消退，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俾斯麦觉得如果俄国和德国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他最后必须求助于奥匈帝国。很快意大利就加入德国和奥匈帝国的行列，于是，1882年，三国同盟成立。但俾斯麦仍然维持着和俄国的单独的"再保险"条约，尽管他已经对俄国和奥匈帝国之间用这种方式保持和平的前景感到不安。 890

然而他们之间的矛盾直到1909年以后才爆发出来。不久后，俾斯麦的继任者却没发挥好他和俄国的再保险政策，俄国在1892年成为法国的盟友。从那一天起，德国就越来越偏离俾斯麦的欧洲大陆政策。俾斯麦的欧洲政策以德国为中心，保持德国和其他所有国家之间的平衡，而现在欧洲划分成两个阵营。德国的政策使分裂的情况更严重。在一系列的危机中，德国想通过表现出不快来吓唬其他国家，从而使大家感觉到它的尊严。特别是在1905年和1911年，德国的愤怒直接指向法国，它把商业问题和殖民问题作为军事演习的借口，以表达它对法国忽略德国的意愿而去和俄国结盟的强烈不满。到1900年，德国的军事计划就已经接受进行两线作战的需求，如果有必要的话，并且当俄国的各种资源还在被缓慢动员起来时，通过迅速推翻法国为两线作战做准备。

进入20世纪，如果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爆发战争，那么德国和法国极有可能会加入。另外，在短短几年里，由于德国开始庇护土耳其，使得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德国的这些行为比先前的行为更加引起俄国的警惕，因为从俄国的黑海港口出口的粮食快速增长，这些都必须经过土耳其的海峡。俄国人也开始提高他们的战斗力。提高战斗力一个最

根本的措施就是建成一个可以快速动员和运送俄国庞大的军队到东欧战场的铁路交通网络。

这些国家之间的行为,对英国来说,没必要引起它的担忧,因为德国的政策并不是非要与它为敌不可。在19世纪末期,和英国有矛盾的国家主要是法国和俄国。当这些帝国的野心互相冲突时,斗争就产生了,这些国家在非洲、中亚和东南亚地区都激烈地争夺利益。英德关系比较容易解决,偶尔比较棘手。进入新世纪的英国仍然专注于维护它庞大的殖民帝国,而不是欧洲。自从18世纪以来,在和平时期它的第一个盟友就是日本,为了维护它在远东的利益它和日本结盟。1904年,它和法国之间的一个长期纠纷也得到解决。这其实是一个关于非洲的协议,在非洲,英国同意法国在摩洛哥放手大干,作为回报,法国同意英国得到埃及——这是另一种解决奥斯曼帝国继承权的方法,但也把世界其他地方的殖民争吵聚拢过来了,一些国家越来越背离乌得勒支和约。几年后,英国和俄国签订了一个相似的协议(尽管没那么成功),这个协议和它们各自在波斯的利益范围有关。但是英法和解就不只是清除了产生纠纷的原因,它变成了一种协约国关系(entente),或者说一种特殊的关系。

891

而德国的反应是这样的。德国被英法协议激怒了,德国政府决定让法国人知道在摩洛哥问题上它还是有发言权的。德国采取行动了,这迫使法国加强协约国关系,这时,英国在10年里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必须关心大陆均势政策了。如果不这么做,德国很快就会成为主宰者。若任凭德国这样走下去,英国最终将不得不接受它作为欧洲大陆军事强国的地位,那么英国从路易十四和马尔伯勒(Marlborough)时期就一直采取的对外战略就得改变,已经到了英国必须把自己主要的精力放在扩展它对欧洲大陆的影响的时候了。英国和法国进行秘密军事对话以寻找阻止德军经过比利时入侵法国的方法。英法的计划还没开展多久,德国就抛弃取得英国公众舆论支持的机会,加紧推进建立一支强大海军的计划。德国的这一举措是直接对付除了英国以外的其他任何强国的,这一说法令人难以置信。接下来的结果就是英德之间的海军竞

赛，大部分英国人下决心要赢（如果不能结束这场竞赛），因此公众的情绪更加激动了。1911 年是两国舰队实力最为接近的时期，在英国国内，大部分人觉得德国的外交政策激起了另一场摩洛哥危机。这一次，一个英国官员公开说的一些话听起来像是在宣布英国会为了保护法国而参加战争。

战争真的到来了，但爆发在南斯拉夫的土地上。塞尔维亚在 1912 至 1913 年的"巴尔干战争"中取得胜利，在这场战争中，新的巴尔干国家首先掠夺奥斯曼帝国遗留在欧洲的领土，接着又为瓜分战利品而陷入争吵。但塞尔维亚得到的战利品是比较多的，而奥地利对此没有抗议。在塞尔维亚的身后，有俄国给它撑腰，俄国发起了一项重建和扩充军队的计划，但还需要三至四年才能取得成效。如果南斯拉夫能看到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羞辱，那么他们就不会希望得到塞尔维亚的支持了，越快让南斯拉夫明白越好。考虑到德国是奥匈帝国的支持者，那么，德国就没可能会在它还觉得有时间取胜的条件下去寻求避免战争的解决方法。

1914 年 6 月，奥地利王储在萨拉热窝被一个波斯尼亚恐怖分子刺杀，危机就爆发了。奥地利人认为塞尔维亚是幕后指使者。他们认为是时候教训塞尔维亚了，顺便扼杀它的泛斯拉夫主义煽动活动。德国人支持奥地利这么做。6 月 28 日，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一周之后，所有的大国都卷入战争（很有讽刺性的是，此时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还保持和平，到 8 月 6 日，奥匈帝国才向它的老对手俄国宣战）。德国的已经制订好军事行动的时间表。早在几年前，德国就决定先对付法国，再对付俄国。德国的军事计划想突袭法国，这就得经过比利时。比利时是个中立国，它的中立身份已经得到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保证。后来事情的结果都自动有条不紊地产生。当俄国为了保护塞尔维亚而向奥匈帝国施加压力时，德国向俄国宣战。做完这些后，德国必须找个借口袭击法国，正式向法国宣战。当时，法国和俄国的联盟事实上还没真正开始。当德国违反比利时中立原则时，英国政府对德国将袭击法国感到不安，但又找不到明确的正当借口来干涉并阻止德国的行为，但

892

它却找到了号召国内团结的理由，并在8月4日加入战争反对德国。

战争持续的时间和强烈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它蔓延的地理范围也出人意料的广阔。爆发后不久，日本和奥斯曼帝国也加入战争。日本是在协约国（包括法国、英国和俄国）这一边，而土耳其加入同盟国（德国和奥匈帝国）这一边。意大利在1915年的时候加入协约国，协约国承诺胜利后给它奥地利的领土作为回报，或者承诺胜利后可以获得金钱，以此来吸引新的支持者加入阵营。保加利亚在1915年9月加入同盟国，而罗马尼亚在1916年加入协约国。希腊在1917年也加入协约国的行列。葡萄牙政府在1914年就想加入战争，但由于国内的麻烦而没办法参战，最终，在1916年时德国也向葡萄牙宣战。这样，到1916年年底，原先欧洲大陆上的法德问题和俄奥问题围绕已经完全被其他斗争打乱了。巴尔干国家此时也正在进行第三次巴尔干战争（围绕继承奥斯曼在欧洲的领土展开），英国发动反对德国海军和商业权力的战争，意大利进行最后的文化复兴战争。在欧洲以外，英国、俄国和阿拉伯国家正在开始一场分割奥斯曼领土的战争，而日本走了一步成本低、回报高的棋，宣布了它在远东的霸权地位。

893 在1915年和1916年，参战国都在寻求同盟者，原因在于战争陷入无人曾预料到的僵局中。战争的残酷状况已经让每一个人都感到震惊。这场战争随着德军在法国北部的大规模扫荡开始了。德国对法国的袭击没有达到它闪电式胜利的目标，但是它占有了比利时的一小片领土和法国的一些领土。在东线，俄国的进攻被德国和奥地利阻止了。在那之后，尽管西线战场比东线更引人注目，但战争很快进入前所未有的阵地战时期。这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现代武器的巨大杀伤力。带弹匣的步枪、机关枪和带刺铁丝网可以阻止任何步兵的袭击，如果他们没有事先进行粉碎性轰炸的话。以下这些数据都证明了现代武器的大杀伤力。到1915年底，法国军队就有30万士兵牺牲，这已经够糟了，但在1916年，在凡尔登战役之前一场持续七个月的战争又让31.5万法国士兵牺牲了。也是在这一场战争中，28万德国士兵牺牲。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在法国北部的另一场战争索姆河战役中，英国

有 42 万的人员伤亡,德军伤亡人数也差不多。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7 月 1 日,是英军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那一天它有 6 万人伤亡,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最后死了。

当人们自以为可以先预测战争的成本然后把战争尽量缩短时,这些数字让他们的预测变得毫无意义。这就反映了第二个让人惊讶的地方:工业社会有很大的制造战争的能耐。到 1916 年年末,战争已经让很多人都疲惫不堪了,但这时参战国却展现出超乎人们想象的组织能力,前所未有地动员人民为战争进行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物质生产,并招募新兵补充军力。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反对他们的敌人,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这时没人想起,因为所有的抵制都指向他们的敌国。

战场上交战双方的势均力敌促进了战争战略和技术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外交官寻求新的盟友和不断开辟新战场的原因。1915 年,协约国在达达尼尔对土耳其发动袭击,本想不让土耳其发现就把它踢出战争并且通过黑海和俄国联系。不久,为打破法国战场的僵局,又在萨洛尼卡(Salonika)开辟了一个新巴尔干战场。这个新战场取代了在塞尔维亚被占领后崩溃的那一战场。殖民地的存在,从一开始就注定全球范围内的殖民地都会发生战争,哪怕只是小规模战争。德国的殖民地大都轻易就被夺走,这有赖于英国对海洋的控制权,尽管非洲的一些殖民地仍出现了长期的斗争。最重要和相当多的欧洲之外的行动发生在土耳其帝国的东部和南部。一支英国和印度军队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另一支军队从苏伊士运河出发向巴勒斯坦前进。在阿拉伯沙漠,阿拉伯人起义反对土耳其的统治,这为缓解粗鲁卑劣的工业国家之间的战争提供了一段浪漫的小插曲。 894

在战争造成的工业影响和行为标准的倒退中,它所带来的技术扩展是最显著的。半个世纪以前的美国南北战争就已经预示了这一点,也揭示了民主时期大规模战争的经济需求。欧洲的工厂、煤矿、熔炉现在都以前所未有的活力运转着。美国和日本国内的工业部门也是这样不断地日夜工作着。得益于英国的制海权,物资从这些国家不断运往协约国,而不是同盟国。庞大的部队不仅需要武器和军火,同样需要大

量食物、衣服、药品和机器。尽管这场战争需要数以万计的动物，但它也是第一场使用内燃发动机的战争，货车、牵引机像马、骡子吃饲料那样贪婪地吞咽汽油。很多数据都表明了这场战争的规模，但有一个数据就足够证明这一点：1914 年，整个大英帝国的医院只有 1.8 万个床位，四年后，有 63 万个床位。

由战争引起的需求大增席卷了整个社会，导致各国政府采用不同的手段去控制经济，征募劳动者入伍，各国改革女性的雇佣制，引进健康和福利服务。战争的影响也波及欧洲以外。美国不再是一个债务国，协约国清算了它们的投资来购买它们需要的物资，现在反过来成为债务国了。印度的工业获得了长久以来就急需的推动力。经济繁荣影响到了阿根廷的农民和工人以及英国的白人自治领。后者需要承担军事任务，运送士兵到欧洲及其殖民地上和德国人战斗。

技术扩展也让战争变得更加恐怖。这不只因为机关枪和爆炸性武器的出现使杀戮变得很血腥恐怖，也不仅因为毒气、火焰喷射器、坦克等新武器的出现有利于打破战场的僵局，扭转局势。它还因为整个社会的人都被卷入战争，从而使所有人都成为交战中敌方的攻击目标。对工人和选民的士气、健康以及生产能力进行破坏成为一种可取的策略。当这些行为受到谴责时，这些谴责本身就能被另一个阵营利用，变成一种宣传。大众的文化程度和近来兴起的电影产业相互补充，超越了在过去的宣传战中神职人员和学校发挥的作用。英国控告德国用飞艇在伦敦开展原始的炸弹袭击，并称它是"婴儿杀手"，德国反驳说帮助英国维持封锁的那些船员也是婴儿杀手，德国婴儿死亡率的攀升就是证据。

895

英国的海上封锁政策虽然见效慢，但成功却是势不可挡的。另外，英国也不愿意让它的舰队冒险，因为这些舰队的威力对敌国有很好的威慑作用，对于本国又可以鼓舞人心。德国最高统帅部设计出一种新武器，它的威力在 1914 年时被大家低估了。这就是潜水艇。它对协约国的船、中立国供给协约国的船发动袭击，通常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就发动攻击，还进攻没有武装的船只。潜水艇的攻击早在 1915

年的时候就有了，尽管不久后就有少数的潜水艇，但是它们没造成多大的损害。1915 年，一艘英国客轮遭到鱼雷攻击，1 200 人遇难，其中大部分是美国人，国际上公开谴责德国的潜水艇，接着德国取消不受限制地击沉船只这一政策。1917 年，这一政策又恢复了。那时候，很明显如果德国不能先掐断英国的补给，那么它就会由于英国的封锁而窒息。那一年冬天，巴尔干国家发生饥荒，维也纳郊区的人民都在挨饿。法国那个时候有 335 万伤亡数，而英国的伤亡人数也超过 100 万，德国丧失近 250 万人口，而且仍然在两线作战。农作物价格疯长，工人罢工也越来越频繁。婴儿的死亡率比 1915 年上升了 50%。我们看不出东西两线作战的德军会有可能击败英国和法国，也看不出有什么有利于它打防御战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总参谋部选择恢复无限制潜水艇战争，这导致了战争在 1917 年迎来第一个大转折——美国参战。德国人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但想赌一把，在美国的势力发挥决定性作用之前让英国屈服，接着让法国屈服。

1914 年，美国的看法绝不偏向任何一方，并且从 1914 年起一直坚持这样。协约国的宣传和购买美国战争物资对推动美国参战有帮助，还有德国第一个潜水艇战役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协约国政府开始讨论战争目标时，它们谈及在维护各民族国家利益的基础上重建欧洲，这主要源自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美国人来说很有吸引力。无限制潜水艇战争策略的恢复对此有决定性作用，这个策略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和它的国民的安全。当美国政府知道德国希望和墨西哥、日本谈判结盟反对美国时，由潜水艇引起的美国人的愤恨敌意又被挑起来。不久，一艘美国的轮船在没有收到警告的情况下就被击沉了，该事件之后美国很快就对德宣战。

896

除了全面参战，其他方式是不可能打破欧洲僵局的，于是美国卷入旧大陆的混战中，这几乎违背了美国的本意。协约国非常高兴，因为胜利现在有保证了。尽管不久它们就将面临对它们来说黑暗的一年。1917 年对英国和法国来说甚至比 1916 年更加令人失望。协约国不仅需要数月时间来控制潜艇带来的问题，而且在法国境内进行的一系列

恐怖的战争(通常被称为帕斯尚尔战役,Passchendaele)给英国的民族意识带来不能消除的伤疤:为了几英里的土地,40 万英国士兵牺牲了。1916 年,士兵的英勇斗志已经耗尽,法国军队接连发生叛乱。对协约国来说最糟的是,俄国沙皇帝国瓦解了,俄国停战了,同一年年底,俄国又展现它成为未来强国的潜力。

俄国是被战争摧毁的。俄罗斯帝国的崩溃也是中欧和东欧发生革命性大变化的开始。引起俄国于 1917 年 2 月发生翻天覆地巨变的是德国的军队。由于交通运输系统被德军破坏,城市被围困陷入饥荒,再加上俄国政府的无能腐败,统治阶级像畏惧战败一样畏惧自由主义和立宪,最终长期坚持抗争的俄国士兵的斗志也被德军击垮了。从 1917 年开始,保卫安全的部队已经不能依靠了。兵变不久紧接着就是粮食骚乱,专制政权似乎一下子就变得虚弱无力。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组成临时政府,沙皇退位。但是新政府很快就解体了,主要原因就是它想继续参加战争,但是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比如列宁,想要的是和平和温饱。他决定从温和的临时政府夺取领导权是临时政府很快失败的第二个原因。临时政府在一个混乱的国家里主持大局,组建政府和军队,城市还面临尚未解决的贫困问题。在又一次的政变中(被称为“十月革命”),临时政府被推翻了。十月革命连同美国参战被视为欧洲两个时代的分界点。以前欧洲独立处理事务,然而现在看来,美国注定要主导欧洲的未来。美国是遵循着其创始人要破坏整个旧欧洲的秩序成为一个真正的自觉的世界政治进步中心的信念而建立的。

897

现在的俄罗斯以前被称为苏联,革命后工农兵委员会是基本政治权力机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建立的直接和显而易见的结果是形成了新的战略态势。布尔什维克通过废除旧的全民选举产生的代表机构(因为布尔什维克从未控制它)、通过承诺和平与土地以确保农民的拥护巩固了统治,这是生存所必需的,布尔什维克政党的领导者竭力宣称他们是俄国一些城市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只有和平才能提供安全稳定的基础。起初德国人的条约要求苛刻,以至于俄国人终止了谈判,随后他们遭受到更为严重的惩罚,这就是 1918 年 3 月签署的《布列斯特

和约》。苏俄损失了领土,但却换来了稳定、和平,争取了时间来处理国内出现的危机。

协约国很不高兴,他们把布尔什维克党的行为看作是奸诈的背叛,针对苏俄向其民众宣传的不可调和的革命形势,他们对这个新政权的态度更加强硬。苏俄领导人期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进行革命,这给想介入俄国事务的协约国发动一系列的军事干预制造了借口,他们最初的目的是战略性的,希望阻止德国利用结束东线战线带来的优势。但是他们的行为很快被认为是反共产主义的运动,遭到了国内人民和所有布尔什维克的反对。更为糟糕的是,他们陷入了看似要摧毁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内战中。即使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列宁及其同志们世界观的指导,这些事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会恶化苏俄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一旦转化为马克思主义术语,这些事件看起来就是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根本的、无法改变的敌视的证明。这段历史的记忆影响了此后 50 年的苏联领导人。对外国干涉者恢复旧秩序以及庇护地主阶级的担心,再加上俄国专制独裁和警察恐怖统治的传统共同扼杀了新制度的任何自由化因素。 898

俄国共产党相信革命必定在中西欧发生,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正确的,但在现实中却事与愿违。战争的最后一年,潜在的革命因素变得微乎其微,战争以民族之间而非阶级之间斗争的形式出现。协约国改变了它们的作战策略。1917 年战争形势不容乐观,没有俄国的牵制,在 1918 年春,协约国将面临德国从法国发起的进攻,而大批的美国军队到达法国战场支援它们需要很长时间。但它们采用了革命的策略。它们呼吁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各个国家不必遵守与沙皇俄国的条约。没有沙皇制度的束缚,以美国的立场看来强调意识形态的一致性对于协约国的事业有额外的好处。与此同时,1918 年,颠覆性的宣传指向奥匈帝国军队,处于驱逐之中的捷克人、南斯拉夫人大受鼓动。德国投降之前,奥匈帝国双元君主立宪制在被再次唤醒的民族情感和最终开始不断胜利的巴尔干运动共同作用下,已经走向解体。这是古老欧洲遭受的第二次打击。以乌拉尔、波罗的海到多瑙河为界的整个地区中,旧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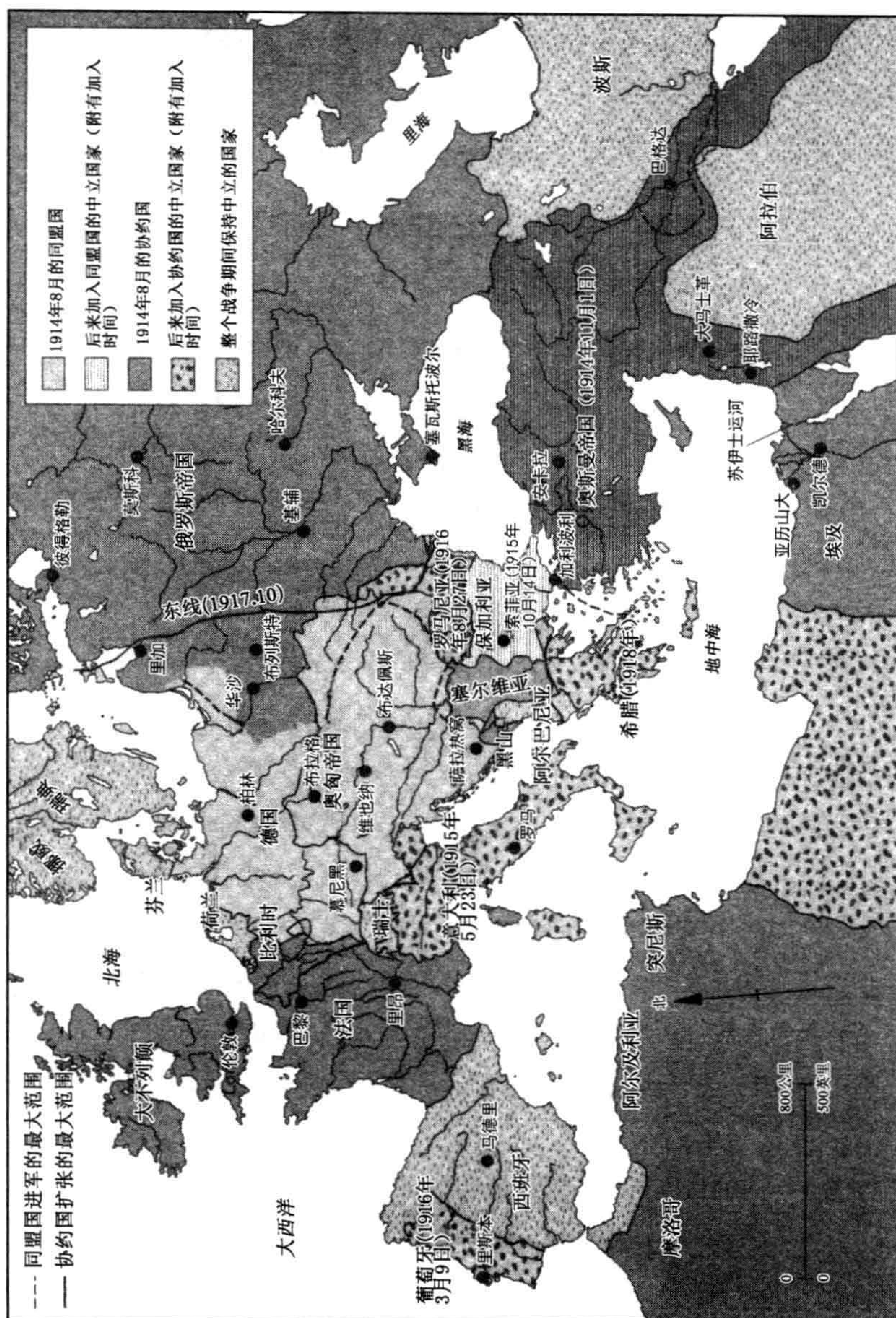
的政治体制受到几个世纪以来前所未有的质疑。波兰军队再次建立，波兰曾经是德国反对俄国的武器。当美国总统宣布波兰是协约国缔造和平的核心时，过去世纪的所有一切似乎都烟消云散。

为了镇压日益增长的革命形势，关键战役持续进行。夏末，协约国已经成功击败德国的最后进攻，胜利在望，但还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协约国军队继续发动进攻时，德国领导人也看到了战争的最后结局，国内革命迹象明显。当德皇宣告战败时，第三帝国瓦解了，汉堡沦陷，霍亨索伦王朝放弃了最后的抵抗。新的德国政府请求停战，战争结束了。

战争损失无法计算，下列数字充分显示了战争规模：大约 1 000 万人死于战争，在巴尔干一次战争中的伤寒就夺取了 100 万人的生命。这些可怕的数字还不能表明无数人致残、致盲或许多家庭失去了丈夫和父亲这些有形的损失，以及对理想、自信、愿望产生的精神上的巨大破坏。欧洲人望着巨大的墓地，一想到他们做过的事情就不寒而栗。经济损失也是巨大的，大批欧洲人死于饥饿。战后一年工业产量低于 1914 年的四分之一，苏俄仅为战前的 20%，一些国家的交通处于瘫痪状态，此外，所有精密轻巧的国际通讯设施遭到破坏，其中一些是不能取代的。曾经是欧洲经济发动机的德国满目疮痍、筋疲力尽。年轻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 M. Keynes)在一次和平会议上说：我们处于死亡之际，超越物质的精神关怀消失了，我们长久被折腾，现在需要休养生息，人类关怀世界的情怀从未像现在一样燃烧殆尽。

899

1918 年底，参加和会的代表汇聚巴黎。人们曾经一度抱怨强调他们的过错，然而现在由于对他们所担负任务重要性的客观判断和认识，人们又对他们正在做的事给予了一定的敬意。这是 1815 年以来最重要的协议，它必须使无法改变的事实与巨大的期待相一致。作出关键决定的国家受到高度关注：英国首相、法国总理和美国总统威尔逊主导了这次谈判，这是胜利者之间的谈判，战败的德国只有接受条约的份。法国和英美在欧洲安全的中心问题上存在利益分歧：法国存在再次遭到德国入侵的危险，而英美不存在这种危险。但是欧洲安全的中心问题被外围的其他问题淹没了。这是一份世界和平协议。它不仅是


1914年8月的同盟国
后来加入同盟国的中立国家（附有加入时间）
1914年8月的协约国
后来加入协约国的中立国家（附有加入时间）
整个战争期间保持中立的国家
同盟国进军的最大范围
协约国扩张的最大范围
大西洋
北海
大不列颠
伦敦
巴黎
法国
里昂
比利时
荷兰
芬兰
挪威
瑞典
德国
柏林
慕尼黑
瑞士
意大利(1915年5月23日)
罗马
奥匈帝国
维也纳
布拉格
布达佩斯
萨拉热窝
黑山
阿尔巴尼亚
塞尔维亚
希腊(1918年)
保加利亚
索菲亚(1915年10月14日)
罗马尼亚(1916年8月27日)
华沙
布列斯特
里加
东线(1917.10)
彼得格勒
莫斯科
俄罗斯帝国
基辅
哈尔科夫
塞瓦斯托波尔
黑海
里海
波斯
巴格达
阿拉伯
大马士革
耶路撒冷
奥斯曼帝国（1914年11月1日）
安卡拉
加利波利
苏伊士运河
亚历山大
凯尔德
埃及
地中海
突尼斯
阿尔及利亚
摩洛哥
西班牙
马德里
葡萄牙(1916年3月9日)
里斯本
北
0
800公里
0
500英里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次重新划分欧洲外领土的协议,正如以前重要的协议那样,而且在协议制定过程中,许多欧洲以外的国家发表了意见。与会 27 个国家代表签署了主要条款,17 个国家是欧洲以外的国家,占大多数,美国是其中最大的国家。它同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组成了这次会议的战胜国大国集团。对于一个世界协议来说,领土横跨欧亚的俄国却没有参加,这是不祥的。

技术上,凡尔赛和约包含一系列不同的条约,涉及德国、保加利亚、土耳其以及由奥匈帝国分裂而成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当中,一个被恢复的波兰,一个被扩大的塞尔维亚共和国(也被称作“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王国”,后也被称为“南斯拉夫”)和一个全新的捷克作为盟友出席会议,而一个力量被大幅削减的匈牙利和作为日耳曼民族中心区的奥地利被当作击败的敌人。所有这些造成了复杂的问题。但巴黎和会的主要关切是与德国的条约,这个问题在 1919 年 6 月签署的《凡尔赛条约》中具体表现出来。

901

这是一个惩罚性的条约,而且明确地规定了德国人需要为战争的爆发负责。但是大部分最严厉的条约不是从道德负罪感得来的,而是来自法国的希望:如果有任何可能,尽量束缚德国使任何第三次德国入侵法国的战争变得不可想象。这是经济赔款的目的,同时也是整个条约最令人不满意的部分。它们激怒了德国人,让接受失败变得更难了。而且在经济上它们也是无意义的。同时这一条约没有处罚德国的安排以防止德国有一天凭借军事力量推翻《凡尔赛条约》,这激怒了法国人。德国的土地损失,显而易见,包括阿尔萨斯和洛林,但是在东部损失最大,大都划给了波兰。在西部,法国人仅得到莱茵河德国一侧应该被“解除武装”的保证。

和平的第二个主要特性是它尽可能地遵循自决和民族原则。在许多地方,这只意味着承认现有的事实:波兰和捷克在和平会议之前已经存在,而且南斯拉夫以原塞尔维亚共和国为核心已经建立起来。因此,到 1918 年年底,这些原则已经在原奥匈帝国的许多区域推行(而且在前俄属波罗的海地区也很快如此)。在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之后,哈

布斯堡王朝终于消失了,在它曾经统治的地方出现了新的国家,虽然出现了反复,但在这个世纪的余下时间内一些国家都幸存下来。自决原则也得到遵循,特定边界地域的命运由本地区公民投票决定。

不幸的是,民族原则没有一直被遵守。地理、历史、文化以及经济的现实性影响着它。当民族原则凌驾于这些因素之上时,会产生负面的结果,它会破坏多瑙河经济体;当民族原则不被遵循时,也会产生坏的结果,有些民族会感到愤愤不平。中东欧地区有许多少数民族对所在民族国家没有忠诚感。三分之一波兰人口不说波兰语;超过三分之一的捷克人口由波兰人、俄国人、德国人、匈牙利人和鲁塞尼亚人(Ruthenes)等少数民族组成;一个被扩大的罗马尼亚现在包含超过百万的匈牙利人。在一些地方,民族原则造成的侵权明显不公正。德国人对“波兰走廊”的存在愤愤不平,它跨过德国土地,使波兰与波罗的海相连;协约国在需要意大利帮助时提出的亚得里亚海战利品未兑现,意大利人对此十分失望,而且最终爱尔兰人仍然没有得到地方自治。 902

最明显的非欧洲问题与对德国殖民地的处置有关。在这里有一种重要的创新。美国不能接受对殖民地毫不掩饰的贪欲,取而代之的是从前处于德国或土耳其统治之下的非欧洲民族,对它们的保护由托管机构提供。当这些地方准备好了自治的时候,战胜国被国际联盟授权(虽然美国婉拒了这些权力)来管理这些领土。尽管是掩饰欧洲帝国主义最后一次重大的殖民扩张的遮羞布,它仍是《凡尔赛和约》中最具有想象力的主张。

国际联盟的成立主要归功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热情,他十分骄傲的是保证了国联盟约作为凡尔赛和约的第一部分。这是一个超越了民族主义条约的例证(大英帝国成员作为一个个单独的主体出现,印度是其中一个重要主体),它同样也超越了欧洲观念,它是新时代的又一个信号:联盟的 42 个创始会员国中有 26 个是欧洲以外的国家。不幸的是,因为威尔逊没有考虑到国内政治因素,最终美国没有参加国联。这是让国联不可能实现它最初设想的最致命的弱点。考虑到世界政治力量的现实状况,也许这些期待大都不可能实现。尽管如此,

国联还是成功地处理了一些问题,没有国联的干预,这些问题会变得危险。假如人们怀有极大希望,愿它能做得更多,这也并不意味着它不是一个可行的、伟大的和具有想象力的想法。

苏俄没加入国际联盟,正如它缺席巴黎和会一样。或许后者影响更深远。塑造欧洲历史下一个阶段的政治安排在没有与苏俄商议下就进行了,尽管在欧洲东部,这一政治安排意味着任何俄国政府必定都十903 分感兴趣的边界划分。事实是,布尔什维克领袖会尽可能地提出理由排斥这种划分。他们通过革命的宣传损坏了与主要国家的关系,因为他们相信资本主义国家下定决心推翻他们。同他们大部分的同僚和选民在处理俄国问题方面相比,英国首相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和威尔逊事实上更灵活——甚至有同情心。另一方面他们的法国同僚克莱蒙梭(Clemenceau)强烈反对布尔什维克,而且获得了多数退伍军人和投资者的支持;《凡尔赛和约》是由掌权者制定的第一个伟大的欧洲和平条约,他们对失望选民的危险有清醒认识。但是无论责任如何划分,结果是俄国这个曾经在欧洲大陆说话最有分量的国家,被排除在塑造新欧洲的过程之外。虽然一段时间里确实没有采取行动,俄国最终必定会加入到希望修订或者推翻条约的国家行列中。这只让它的统治者更加厌恶了它原本要保护的社会制度。

人们对和约抱有极大希望。这些希望时常是不切实际的,然而尽管和约有明显缺陷,它仍然受到了过分的谴责,因为它也有许多好的方面。它的失败是由于失败原因的大部分超出了其缔造者的控制。首先,在狭义的政治意义上,欧洲世界霸权的日子已经结束了。1919 年的和平条约对保证未来欧洲的安全没有太大作用。旧帝国警察现在一些太弱了而无法在欧洲发挥他们的作用,更不用说在外面了;另一些则完全消失。最后,需要美国确保德国的战败国地位,但是现在美国陷入了一个人为的孤立时期。苏俄也不希望卷入维持大陆稳定的事务中。美国的孤立主义和另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过滤使欧洲变得不完全了。当欧洲没有革命爆发时,俄国人转向他们自己;当威尔逊给了美国人一个机会涉入欧洲的和平维护时,他们拒绝了它。两者的决定是可理解

的，但是他们共同的效果将保留一个欧洲自治的幻影——不再是真实而且不再是处理它的问题的适当架构。最后，体系最严重也最近在眼前的弱点存在于作为先决条件的新结构的经济脆弱性上。条约的条款更容易陷入争论：自决在经济学上经常毫无意义。但是自决在什么基础上可能被搁置很难看清楚。1922 年自由独立的爱尔兰国家出现后的 80 年里，爱尔兰问题仍然存在。

904

因为在欧洲有许多幻想依然存在，并且还有新的幻想产生，所以形势可能更加不稳定。协约国的胜利和创造和平的说辞使许多人认为这是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的伟大胜利。四个独裁的反对民族主义的狭隘帝国也已倒塌，毕竟，到这天为止和平条约保持了历史上惟一一个全部由民主政治国家制定的条约的鲜明特点。自由主义的乐观主义也从战争期间威尔逊浮华的立场中汲取力量。他尽可能使美国的参战和其他盟友在本质上不同：美国受到高尚的理想和信念支配。他反复地说：如果其他国家会放弃他们的坏的旧方法，民主可能给世界带来安全。一些人认为他已经被证明是对的，新成立的国家，最重要的是新德国，采用了自由、议会制的组织制度，并且也采用了共和制政体。最后，国联的幻想，一个新的国际权威，而不是一个帝国，似乎成为了现实。

然而这些完全根植于谬见和错误的前提中。因为和平缔造者除了推崇自由主义的原则外，还有更多的事要做——他们也要支付债务，保护既有利益，考虑难对付的事实，在实践中那些原则变得模糊了。最重要的是，他们遗留了许多对德国不满的民族主义而且在德国滋生了新的、凶猛的民族主义者的怨恨。也许这些是无益的，但是它成为除了自由主义之外的其他思潮成长的土壤。此外，新生国家的民主制度——老牌民主国家，就这件事而言也是如此——是建立在经济结构严重毁坏的世界中的。满目的贫穷、艰难和失业加剧了政治上的斗争，在许多地方，由于尊重民族国家的主权而产生的特殊的混乱使局势更加恶化。在战争中旧的经济变换模式的崩溃也让处理像农民贫穷和失业这样的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俄国曾经是西欧许多国家的谷仓，现在经济上也很困难。这是革命者会利用的背景。共产主义者快乐地准备着革命，因

为他们相信历史赋予了他们这一角色，而且很快他们的努力被一些国家另外的激进现象——法西斯主义加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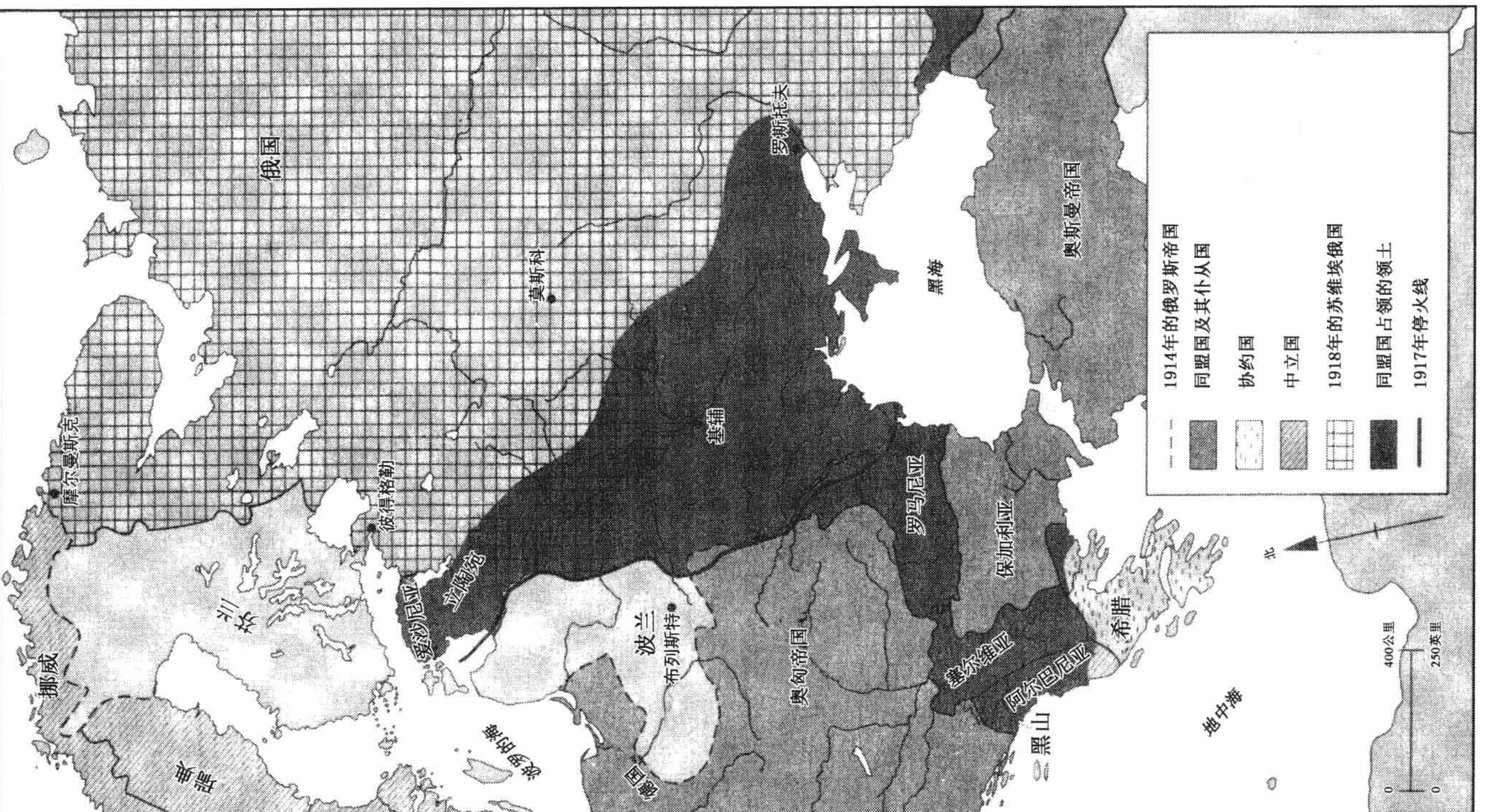
共产主义以两种方式威胁着新欧洲。每个国家内部很快都成立了一个革命的共产党。它们的积极影响很少，但是引起了很大的警觉。它们也尽量避免强大的进步政党的出现，这是因为它们的出生环境所致。1919 年 3 月，俄国人创建“共产国际”(Comintern)或“第三国际”来指导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否则，他们担心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会回到那些旧的领导者手中，后者缺乏革命热忱，未能利用战争的机会。对列宁来说，检验社会主义运动的标准就是忠于共产国际，他认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必须符合这些要求，严格、守纪、坚定。几乎在每一个国家，这些原则都把社会主义者分成两派。一派忠诚于共产国际称呼自己为共产主义者，另一派尽管仍声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主要是民族政党和民族运动的残余分子。这两派极力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并且相互残酷斗争。

905

左派的新的革命威胁经常使很多欧洲人提心吊胆，因为这里有太多可供共产主义者利用的革命可能。最明显的是在匈牙利成立了布尔什维克政府，但更令人震惊的是，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在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竟也一下子就取得成功。现在德国的情形特别具有讽刺意味，因为一战战败后成立的新共和国政府现在被共产主义者控制着，为了防止革命，新共和国政府被迫依靠保守势力——特别是旧军队的职业军人。甚至在共产国际成立之前，这些事情就发生了，这给德国左派的不同派别带来了严重的苦难。但是各地的共产主义政策都让团结抵抗保守主义变得困难，革命的花言巧语和阴谋把中间人士都吓跑了。

在东欧，社会主义威胁通常也被看作是苏俄的威胁。共产国际作为苏俄外交政策的傀儡被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控制着，他们为此给出的正当理由是，俄国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工人阶级的堡垒，世界革命的未来取决于能否把俄国保卫好。在发生国内战争的前几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势力在慢慢得到巩固后，这个信念导致很多国家都煽起对本国政府的不满情绪，以便夺取资本主义的政权。但在东欧

906



1918年的俄国

和中欧，人民的不满表现得更激烈，因为在凡尔赛条约之后很长时间里，那个地方的领土纠纷问题仍没得到解决。直到 1921 年 3 月，苏俄和波兰共和国签订了和平协议，确定了持续到 1939 年的边境线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那里才结束。波兰历来最具反俄国的传统，那里的宗教最反布尔什维克，波兰也是最大最有野心的新生国家。这些地区的国家都感受到俄国复兴的威胁，特别是现在它和社会主义革命联系紧密。这些联系使很多国家在 1939 年之前都转向支持独裁和有武装力量的政府，这样至少可以提供一条强大的反共产主义防线。

907

在东欧和中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恐惧在战后的前几年里最明显，因为当时社会经济崩溃，对于俄国和波兰战争（曾一度威胁到华沙）的结果感到不确定。1921 年，和平最终来了，苏俄和英国象征性地建立了官方关系，两国的关系明显缓和。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当时苏俄政府在国内战争中感觉到的严重威胁有关。在外交礼仪方面它没有关注太多，但革命宣传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开谴责却没有停止，但是现在布尔什维克政府可以把精力放在重建国家上面了。1921 年，俄国的生铁产量大约是 1913 年的五分之一，煤的产量大概是 1913 年的 3%，而在铁路上运行的火车数量还不到一战刚开始时的一半。牲口下降的数量超过四分之一，谷物产量还不到 1916 年的五分之二。1921 年，在这个贫穷的国家，俄国南部发生了干旱，超过 200 万人死于饥荒，据说甚至还发生了吃人肉这样的事。

经济自由化扭转了这种局面。到 1927 年，农业和工业产量都差不多恢复到战前水平。新政权在这几年里的统治经历了很多变数，这在 1924 年列宁去世前就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但一个在布尔什维克内具有强大威望并能维持各方势力平衡的领导者的逝去，使布尔什维克在领导权问题上开始分化，发生争议。争论的问题不是关于 1917 年革命中开始表现出来的政权的集权和独裁性质，因为没有一个领导人认为政治自由是可行的，没一个领导人认为在一个存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里，可以不实行秘密警察和一党专政。但他们在经济政策和策略上看法不同，个人的竞争有时给这些带来额外的优势。

广泛地说，当时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强调革命取决于俄国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好感；虽然农民最先分到土地，但由于农民的劳动成果要不计一切先供养城市，这使农民和城市敌对起来，接下来又有了经济自由化再次对他们进行安抚，就是我们所说的"新经济政策"，这是列宁以前提出的权宜之计。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农民就可以有自己的收益了，他们开始种植越来越多的粮食作物然后卖到城市里。另一种观点从更长远的角度陈述了同样的事实。让农民满意会降低俄国工业化的速度，而俄国需要实现工业化以便能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存活。持这个观点的人认为，俄国正确的发展历程应该是依靠城市的革命激进分子，为了这些人的利益去剥削那些还没布尔什维克化的农民，同时加快工业化速度并促进国外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托洛茨基(Trotsky)就持这种观点。

908

当时发生的事情大致是托洛茨基被排挤了，但他的观点占了上风。从党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最终获胜的是约瑟夫·斯大林，一个魅力和才智都远不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人。他相当的冷酷无情，但他的出现却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斯大林逐渐用权力把自己武装起来，他用权力对付他的同僚和老布尔什维克，就像他对付敌人一样自然，布尔什维克夺得权力为斯大林开展真正的俄国革命铺好了道路，也为新俄国打好了根基，提供了新的中坚分子。对于斯大林来说，工业化是最重要的。工业化的出路在于让农民为国家的工业化买单，也就是得让农民供应那部分收益低得他们宁愿自己吃掉的农产品。苏联从 1928 年开始实行两个"五年计划"，以农业集体化为基础，开始工业化的计划。这是共产党第一次战胜农村。在这场新的国内战争中，成千上万的农民被杀害或者流放，谷物征税导致了再度饥荒。但是城镇的温饱都得到满足，尽管警察机关已经把消费水平控制到最低。工资水平也下降了。但到了 1937 年，80％的苏联工业产量都来自 1928 年就建立的工厂。昔日的俄国再次成为一个强国，这个影响本身就能保证斯大林在历史上的地位。

但是工业化的代价也很大。

其他国家对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经常以苏联为例，批判者们把苏联想得很美好，认为它在实现社会进步、复兴文化和道德生活的方法方面是个典范。但对于那些对西方文明感到失望的人来说，这种模式不是惟一的。1920年，意大利出现了一个叫法西斯的运动。法西斯把它的名字借给在其他国家的一些组织松散的和它有关联的激进组织，这些组织都共同反对自由主义和强烈反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大战让合乎宪法的意大利变得岌岌可危。尽管意大利在1914年被称为强国，但它比其他强国穷些，可是在战争中它却承担了和它的国力不相称的重担，而且经常失败，很多场战争还都发生在意大利的领土内。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不平等就使社会分裂成为突出问题。和平来得比通货膨胀还快，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资本家，还是那些因为劳力短缺而可以要高一些报酬的工人，他们在对待意大利的宪法问题上比中产阶级和那些依靠投资和固定收入生活的人群更坚决。这些人总体上都是1870年意大利统一的忠实支持者。当保守的罗马天主教徒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长期以来都在反对这个合乎宪法的自由的国家时，他们却一直都支持着。他们把意大利在1915年参加战争看作是意大利复兴运动的延伸。复兴运动是19世纪意大利为了统一而掀起的运动，这场运动把奥地利从它统治的最后一块居住的是意大利血统或说意大利语的人的土地上赶出去。像民族主义一样，这是个乱七八糟且不科学的想法，但它力量很强。

909

战后和平带给意大利人幻想的破灭和失望；很多民族主义者的梦想都无法实现了。另外，随着战后经济危机的迅速加剧，国会里面的社会主义势力迅速壮大，由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政权的存在，威胁似乎更大。失望、恐惧和对社会主义者的反民族主义的厌倦，导致很多意大利人开始抛弃自由主义的代议制民主，重新寻找一条不让意大利失望的发展道路。很多意大利人都同情在海外进行不妥协的民族主义斗争（比如，民族主义分子冒险夺取巴黎和会没有给意大利的亚得里亚海的阜姆港口）和国内暴力反马克思主义运动。后者注定对那些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国家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新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领导阶层不

仅仅来自传统的保守教派。

墨索里尼是一个记者，也是一个退役的军人，在一战前他就已经是一个极端社会主义者。1919 年，他成立了一个名为"fescio di combattimento"的组织，大概能把它译为"战斗的法西斯"。这个组织利用一切手段去获取权力，他们中有一群年轻的暴徒经常使用暴力，他们的目标是首先对付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组织，其次是选举出来的政府官员。这个运动发展迅速，意大利合乎宪法的政治家既不能控制它也不能用合作来驯服它。很快地，法西斯分子(他们开始被这样称呼)能够常常得到官方和半官方机构的支持，也受到地方政府和警察部门的保护。暴徒的犯罪行为已经半制度化了。到 1922 年，他们不但在选举上获得重要的成功，而且还在一些地方通过恐吓他们的政治敌人，特别是共产主义者而实现对政府的有序管理。在那个时期，其他的政客都已经无法应对法西斯的挑战，国王召见墨索里尼让他组成一个新政府。以结成同盟为基础，墨索里尼组建了新政府，暴力活动也停止了。这在接下来的法西斯神话中被称为"向罗马进军"，但这还不是意大利宪政制度的终结。墨索里尼慢慢地走向独裁。1926 年，独裁政府逐渐开始形成，选举被废止。那时已经不存在多少反对的声音了。

910

这个新政权是以很多恐怖主义活动为基础的，而且它明确公开指责自由主义思想，然而墨索里尼的统治还远没达到极权主义的程度。无疑，他是有志要在意大利进行彻底革命的，而且他的许多追随者进行革命的愿望更强烈，但是革命在实践中表现为大规模地宣传主张。墨索里尼喜怒无常地想要改造这个让他觉得受排斥的社会，当然也由于在这个运动中激进主义带来的压力。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很少达到一致，相反，它反映出新国家里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势力。意大利在国内事务上实行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和教皇达成外交上的协议，相应地，教皇不再坚持教会在意大利人生活中的权威地位(那天之前它一直是)，并首次正式承认了意大利国家政权。所有法西斯的革命言论都宣称，1929 年的《拉特兰条约》(the Lateran treaties)包含这

一协议，该条约是对意大利最大保守势力的一个妥协。“我们已经把上帝还给意大利，也把意大利还给上帝了”，教皇说。正如法西斯对自由企业进行批判，个人利益从属于国家的观念引发了国家剥夺工会保护它的成员利益的权力。因为很少对雇佣者的自由进行抑制，所以法西斯的经济计划没多少价值，只有农业生产明显改善了。

在其他地方发生的被称为法西斯的运动中，法西斯的风格和抱负以及它的成就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尽管这些运动确实反映了新式和后自由主义的事物，但除了把它当做大众社会的表述外，在现实中这些事物是不可想象的，且这些运动在实际中经常对保守势力作出妥协。

911

这让我们难以准确地讨论这种“法西斯”现象。在很多国家出现的政权都是专制的，甚至希望能够达到极权，这些政权都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和反马克思主义倾向。但法西斯并不是这些思想的惟一来源。比如，出现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政府，它们利用传统和保守势力，而不是利用从大众政治这种新现象中产生的力量。在这些人中，真正的法西斯激进分子经常对为维护现在的社会秩序而作出的妥协感到不满。只有在德国，一个也被称为“法西斯”的运动最终在革命中取得成功，这个法西斯势力控制住了过去的保守主义势力。由于这些原因，法西斯的称号有时和它所澄清的主张一样令人困惑不解。

也许只有它能最好地区分 1918 年后二十年里两个独立的现象。第一个现象是思想家和活动家的出现(甚至在像英国和法国这样稳定的民主国家也曾出现)。他们谈论新的、激进的政治，强调理想主义、意志力和牺牲，盼望能从新的起点上重建社会和国家，不管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也不用向物质主义妥协。这种现象尽管广泛，但只在两个国家取得胜利，这就是意大利和德国。经济崩溃、民族主义情绪激烈和反马克思主义，这些都是该现象在这两个国家成功的原因。尽管德国法西斯到 1933 年才取得成功，如果想用一个词来表达这种现象，那肯定是法西斯。在其他国家，经常是在那些经济落后的国家，特别是东欧，它们的政权可能说专制比说法西斯更恰当。在这些国家里面，庞大的农业人口引发了不少问题，这些问题由于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反而加剧了。

有时候外国少数民族似乎威胁到这些国家。这些新国家中有很多只是移植了自由主义制度的表皮,传统保守社会势力和宗教势力仍然很强大。就如在拉丁美洲国家,它们的经济基础和这些国家很相似,它们的立宪制度很明显迟早也会让路给政治强人和军人的统治。在 1939 年之前,波罗的海的新国家中,波兰和所有从奥匈帝国中分解出来的国家就是例证,捷克斯洛伐克是中欧地区或巴尔干地区真正实行民主政治的例外。这些国家对这种独裁政权的依赖,表明 1918 年时对它们政治成熟的不现实的希望以及新增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恐惧,与俄国毗邻的国家的这种恐惧特别强烈。在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存在着这样的压力,尽管没有像这些国家这么严重。但这两个国家传统保守势力甚至更强大,天主教思想比法西斯更加强大。

两战间隔期中民主制度的失败并没有平稳地持续下去。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时,世界的经济形势都不好,随后除了俄国外,欧洲大部分国家的经济逐渐复苏。从 1925 年到 1929 年,欧洲国家的经济总体向好。这就使这些国家对未来的新民主政治感到乐观。20 年代头五年里欧洲国家出现了骇人的通货膨胀,之后货币又再次稳定。很多国家重新使用金本位制,这是一个乐观的标志,表明 1914 年前那种好的经济形势回来了。1925 年,欧洲的食品生产和原材料生产第一次超过 1913 年的数量,制造业也在恢复。在美国投资和逐步恢复的世界贸易的帮助下,到 1929 年时,作为资本输出地的欧洲的贸易水平达到的高度直到 1954 年才被打破。

912

然而接下来经济又崩溃了。之前经济恢复的基础并不稳定,所以一旦面临突发的危机,这些繁华的现象就又一下子瓦解了。现在不仅欧洲发生经济危机,而是整个世界都发生经济危机,这是在一战和二战之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

1914 年的那种复杂而效果明显的经济系统事实上已经被毁坏得无法挽救了,战后新成立的国家为了保护它们脆弱的经济,纷纷采取关税壁垒和控制汇率的措施,老牌的强国也纷纷努力修复衰微的经济,这些限制措施严重阻碍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凡尔赛条约使国际情况变得

更糟,因为它要求德国这个欧洲最重要的工业国,以实物和现金的方式偿还对战胜国的赔款,这给德国造成一个无限期的负担。这不仅使德国的经济不能正常运转,而且至少让它的复苏推后好几年,还让它的经济丧失发展的动力。欧洲东部是德国最大的潜在市场,而俄国这时已经用一条任何贸易也渗透不进去的经济防线,把自己与外部隔离开来。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地区原本是德国企业的另一块领地,现在也被隔开了,而且现在这里变得贫穷了。这些困难暂时可以在得到美国的资金后逐步克服,而美国也乐意提供这些资金(尽管它不会买欧洲的商品,而在欧洲的关税壁垒下很多美国人下岗了)。这会让欧洲对美国持续繁荣的经济产生严重的依赖。

1920 年,美国生产了全世界 40%的煤,以及占世界一半的商品。战争对物资的需求使美国的财富急剧增长,美国人的生活也改变了,美国人是世界上最先拥有私家车的国民。不幸的是,美国国内经济的繁荣支撑着整个世界。由于很多国家的经济都依赖它,这让美国很自信,这种自信使美国对外大量输出资金。也由于这一点,商业循环中美国经济的一个摇晃就会给世界经济带来灾难。1928 年,在美国开始很难得到短期资金。一些迹象表明,随着商品价格开始下跌,长期的繁荣快接近尾声了。这两个因素导致欧洲呼吁向美国贷款,很快欧洲一些借钱的国家就陷入困境。同时,美国国内的需求也降低了,因为美国人开始认为一次严重的经济萧条又快来了。这一次,联邦储备银行通过提高利率并持续这一政策来对付这场经济危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929 年 10 月股票市场突然一下子就崩溃了。在这之后尽管经济有短暂的恢复而且各大银行都买入股票来重建信心,但这对经济复苏都没多大效果。这是美国海外投资和商业自信的终结。在 1930 年美国经济最后一次短暂复苏后,美国用于海外投资的资金都枯竭了。世界经济又开始萧条。

913

投资的突然失败使经济增长走向末路,但另一个因素的作用很快就加速灾难的扩大。负债国开始整顿它们的账目,削减进口量。这些举措导致了世界商品价格的下跌,以致那些主要商品生产国都买不起

国外的东西。同时，更重要的是，美国和欧洲也陷入金融危机，各国都尽一切努力，但还是无法成功稳定它们国家的货币和黄金的关系(即一种国际承认的兑换方法——金本位制)，它们试图采取通货紧缩的政策去平衡账目，所以它们再次削减需求。政府的介入使经济萧条变为一场灾难。到1933年，所有主要的货币(除了法郎)都和黄金脱节。这就是这场悲剧的标志性表现，自由经济的旧偶像被抛弃了。这场悲剧的现实就是，在工业化的世界里，失业人数可能达到3 000万。1932年(对工业国来说形势最严峻的一年)，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生产指数分别都只有本国1929年时的一半。

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可怕且难以抵抗的威力席卷着其他领域。1920年所增加的社会财富，当时使很多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但现在全没了。所有国家都对失业束手无策，尽管美国和德国的情况是最糟的，但失业以隐秘的方式波及全世界的农村和主要的农业生产者。在1929年和1932年间，美国的国内生产降了38%，这是制造业商品价格下跌的准确数据，同时，原材料价格下降56%，食品价格下降48%。同时，世界各地的穷国和成熟经济体的穷部门并未受到相应的冲击。也许它们受到的影响并不会像欧美国家那么严重，因为它们的经济没怎么下滑。一个东欧人或者一个阿根廷农民的生活情况也许并没变差多少，因为他们的生活本来就已经够差了，而一个失业的德国文员或者工人的生活肯定就很明显变差了，他们对经济危机的体会也很深刻。 914

在另一场世界大战到来之前，世界经济不会恢复。各国都在用关税壁垒(1930年美国进口税平均提高59%)把自己保护起来，各国政府纷纷通过加强对经济生活的控制来实现经济的自足。有一些国家做得很成功，有一些却失败了。这场经济大灾难像是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之间的斗争设置好的舞台，它们都期望或宣称自由文明的垮台，而且现在开始期望能继续拍打自由主义的衰弱的躯体。金本位制和不干预经济的信念的结束标志着世界经济秩序的崩溃，极权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对政治的破坏已达到顶端。自由文明已经失去它控制所有事情的

力量。很多欧洲人仍然很难接受这一点,他们继续梦想着能够恢复到他们的文明不会被质疑并且至高无上的时代。他们忘记他们的文明是取决于政治和经济的霸权,很明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情况是这样的,但是现在,他们的文明已经在全世界范围里开始衰退。

三、新亚洲的形成

欧洲的困难不可能只局限在欧洲大陆上。欧洲的强国很快必定会凭自身的实力去主导世界其他地方的事务,这种现象最早出现在亚洲。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欧洲在亚洲的殖民力量,只在短时期内是不可挑战的,也未受到挑战。但到 1914 年,欧洲的强国英国为维护其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和日本结盟,而不再只依靠自己了。另外,在日俄战争中被日本打败后,俄国不得不停止对黄海 20 年的觊觎,把眼光转回欧洲。义和团的反抗给侵略者们狠狠一击后,西方列强对中国长达一个世纪的欺凌也走到了尽头。从那以后,中国不再割让土地给欧洲的帝国主义者。不像印度和非洲,中国以自己的方式坚持着民族独立的斗争,直到欧洲殖民势力在亚洲消退。随着欧洲局势的紧张,压制日本的侵略野心也越来越困难,欧洲的政治家开始意识到争夺新港口和分割"东亚病夫"的时代结束了。事实上,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能让所有国家都寻求到自己的商业优势。这种优势,听起来没有 1890 年时想象中的那样激动人心,但它是各国在远东地区维持相安无事状态的另一个原因。 915

到 1914 年,欧洲进攻亚洲的高潮过去了,殖民主义给亚洲带来彻底变革,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作用和经济实力已经使亚洲产生了值得列强严肃对待的防御的本能反应。早在 1881 年,夏威夷的一个国王就向

明治天皇提议成立亚洲国家和元首的联盟及协会;这只是一个苗头而已,但这种反应现在在日本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他们的直接行动就是促进现代化建设,为远东和亚洲的军事力量提供帮助,以便在下一个时期——下一个百年的东西方战争中领先。在 20 世纪的前 40 年里,日本的活力主导了亚洲的历史,中国的革命则没有这么大的影响,直到 1945 年后,中国才连同国外的新的变革力量,再一次超越日本成为亚洲事务的塑造者。它将结束亚洲的西方时代。

916

日本的劲头表现在经济的增长和领土的扩张上。在很长的时间里,经济增长更明显。这些都是日本整个"西化"过程中的一部分,"西化"使日本在 20 世纪 20 年代保持着自由主义的希望,这一点也掩饰了日本的帝国主义性质。1925 年普遍选举权被引进日本,尽管欧洲的很多事实都证明普选权和自由主义或自我节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它似乎又一次证实这是 19 世纪就开始的法治的进步。

由于日本工业的快速发展,外国人和日本人都对日本充满信心,特别是一战唤醒了日本人不断膨胀的乐观情绪,他们认为战争给日本带来了很多机遇:市场(特别是在亚洲的市场)。在亚洲市场,日本原来面临来自西方的激烈竞争,但当这些前任开发商发现他们无法满足国内在战争期间对物资的需求时,他们放弃了亚洲的市场。协约国政府向日本工厂订购了大量的军需品;世界船运短缺使日本建起很多新的船坞来满足它。在战争期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上升了 40%。尽管日本的扩张活动在 1920 年时中断了,但不到十年,扩张活动又重新开始,1929 年日本的工业(尽管从事工业生产的人口不到日本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在 20 年里发展迅速,钢铁的产量就增长 10 倍,纺织品生产增长 3 倍,煤产量增长 2 倍。日本的制造部门也开始影响到亚洲其他国家:它从中国和马来亚进口铁矿石,从中国进口煤。尽管和欧洲列强相比,日本的制造工业还是规模不大,尽管它的工业体系里长期存在小规模的工匠部门,但在 1920 年时日本的新工业力量已经开始影响国内的政治和外交关系,特别是影响了日本和亚洲大陆的关系。

和日本开始受尊崇、充满活力的形象相比,中国就黯然失色了,尽

管它可能是亚洲和世界潜在的强国。1911 年的辛亥革命对中国很重要,但无法阻止中国的没落。理论上,辛亥革命从根本上比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更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它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大一统,结束了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两千多年的统治。917 儒家学说曾和法律秩序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被统治者结合起来利用。1911 年的辛亥革命正式宣布中国封建统治终结。另外,辛亥革命也有局限性,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方面,它是破坏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君主制度在此之前把一个辽阔的国家统一起来,事实上几乎统一了一块大陆,涵括了广阔的不同区域。君主制的崩溃意味着中国历史上常出现的地方割据现象将再次猖獗。很多革命者因为对北京中央政府的不信任和忌恨,而更受激励去从事革命事业。各种秘密社团暗中成立,上层人士和军队的指挥官都时刻准备着采取行动以控制他们辖区内的一切事务。这些割据倾向在袁世凯当政时期还不太明显,但不久就爆发了。革命者分裂为两派,一派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国民党,而另一派则支持通过议会制建立北京中央政府。孙中山的支持者主要是广东的商人和一些南方的士兵。在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军阀非常猖獗。这些军阀的首领以前都是军队里的士兵,趁中央政府衰落,夺取军队实权,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1912 至 1928 年之间,中国有 1 300 多个大小军阀,他们控制了中国的主要地区。他们中有一些在控制区内实行改革;有一些纯粹就是土匪;有一些实力相当强也有很高的威望,所以觊觎中央政府的权力。这个时候的中国有点像罗马帝国晚期,尽管这种军阀割据的状况不久后就结束了,没有拖延得像罗马帝国那么久。当没人取代士大夫们管理国家时,军人会迅速填补这个空缺。袁世凯本人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这也反映了 1911 年辛亥革命的第二个局限性:革命派没有为革命后的进一步发展达成协议。孙中山曾经说过解决民族问题比解决社会问题更重要,但他们也没有就民族未来该怎样塑造达成一致意见。在推翻封建王朝这个共同的敌人后,革命派内部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尽管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富有创造力的,但他们在这时的困惑表明,在

辛亥革命后不到十年里,革命者们已经严重分裂了,这也预示着承担改变中国这个艰巨任务的是未来的革新者。

从 1916 年开始,一群文化革新者开始聚集到北京大学。1915 年,这些新文化倡导者中的一员——陈独秀,创办了一本叫《新青年》的杂志,这本杂志成为新旧文化辩论的阵地。陈独秀向中国的青年传播新思想,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命运掌握在年轻人手里,必须完全否定旧中国的传统文化。像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陈独秀也谈到了赫胥黎、杜威,他把易卜生的著作介绍给他困惑的同胞,这时的陈独秀仍然认为解救中国命运的钥匙还是在西方,在达尔文主义的斗争意识中,在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中,西方似乎依然指明了前进的道路。虽然这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是很重要的,他们的支持者也都富有激情,但是强调对中国进行西方文化再教育已经显得先天不足了。不仅很多受过教育并爱国的中国人的思想都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西方思想仅在中国社会最不典型的阶层中受到欢迎,即居住在沿海城市的商人和他们大都留学海外的后代。广大的中国群众并不理解西方的这些思想,也不受西方文化吸引,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进行白话文改革的原因之一。

918

被强烈的民族情绪所感染,中国人开始反对西方文明,反对在西方发源的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对他们中大部分人来说就意味着增加了一种剥削方式,资本主义是西方文明最明显的组成部分,一些要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改革者敦促人民接受这种制度。但中国大部分农民在 1911 年后对革命更没热情了,他们对国内的大事都很冷漠,也不会被已经西化的年轻人激昂的鼓动所触动。要概括中国农民的经济状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太大、太复杂了。而且中国社会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随着人口的稳步增长,关乎农民生存的土地问题却一点也没得到改善;负债和无地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们悲惨的生活由于频繁的战争变得更加令人无法忍受,无论是战争的直接破坏,还是伴随战争的饥荒和疾病,都让人民生活痛苦不堪。中国的革命能否真正胜利取决于革命能否触动这些人。革新者不愿意考虑中国革命必需的实际政治步骤,但他们对文化的强调时常掩盖了这一点。

中国的孱弱对日本来说就是机遇。一场世界战争是助长日本19世纪的野心的一个偶然因素。日本利用了欧洲各国互相打斗给它带来的有利时机。日本的盟友不会反对它去占领德国在中国的港口,就算日本真的这么做了,他们也不能怎么样,因为这时他们需要日本的船只和工业制品。日本的欧洲盟友还在希望日本能派遣部队到欧洲去参加战争,尽管这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日本巧妙地利用了协约国担心日本单独与德国媾和的心理,并且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步伐。

1915年刚开始的时候,日本政府就向中国政府递交了包括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发出最后通牒。事实上,这意味着建议让日本成为中国的保护国。英国和美国尽一切外交努力去减少日本对中国的野心,但是最终,日本还是得到了它想要的利益,还进一步确定了它在满洲的特殊商业权和租借权。中国的爱国者们被日本的侵略行为激怒了,但此时他们却做不了什么,因为这时中国国内的政治一片混乱。他们很困惑,确实,这时孙中山自己也在向日本寻求支持。1916年,日本再次干预中国的政治,当时日本对英国施加压力,不让英国同意袁世凯通过称帝来恢复国内稳定的企图。接下来的几年里,中国又和日本签了另一个条约,承认日本的特殊利益拓展到内蒙古地区。

919

1917年8月,中国政府和德国开战了,中国参战的原因部分是为了赢得协约国的好感和支持,以便在战后和平时期能保证中国的独立地位。但是仅仅几个月以后美国就正式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日本则以赞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和同意维持中国的完整和独立作为回报。中国从协约国集团得到的只有结束德国和奥地利的治外法权,和推迟还清庚子赔款的期限。另外,日本紧握着在1917年和1918年从与中国签订的密约中取得的特权和利益不放。

然而,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它让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感到很失望。日本现在毋庸置疑是世界强国之一,在1918年时它的海军实力已经在世界排名第三。确实,在和平时日本所能获得的利益是牢固的:它继承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1917年英国和法国承诺给的),并被授权接管德国在太平洋的岛屿,成为国际联盟中的常任理事国之一。日本得

到的这些承认和荣誉使日本脸上有光,但从亚洲人的角度看,日本脸上的光彩被抵消了,因为它提议把种族平等写进国联的盟约却遭到拒绝。在种族平等这一点上(巴黎和会上惟一让中国和日本一致的地方),伍德罗·威尔逊不承认绝大多数人的投票,坚持必须全体意见一致才生效,再加上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反对,这个提议很快就被大家抛诸脑后。巴黎和会上中国人感到很委屈,因为尽管各国(特别是美国)都普遍同情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但他们还是不能扭转关于山东的决定。由于对美国未能给予外交支持感到失望,以及中国代表团里面代表北京政府的成员和代表广东国民党的成员之间的分歧,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920 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整个中国陷入大动乱,一些评论家认为这场动乱和 1911 年辛亥革命一样重要,一样伟大。这就是 1919 年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起源于北京学生反对巴黎和会的示威游行,原本这场游行定在 5 月 7 日举行,为了纪念中国在 1915 年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这一国耻,但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让示威游行提前了。尽管刚开始只引发小骚乱和大学校长辞职,五四运动此后不断升级。这场运动不久就发展为全国性的学生运动(这是 1911 年之后在中国广泛建立的新大专、大学发起的第一次政治反思运动)。这场运动也扩展到学生以外的其他领域,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人民开始抵制日货。一场原本由知识分子和学生开始的运动扩展到其他城市的居民、工人和从一战中发家的新资本家这些人群中。这也表明了亚洲对欧洲不断上升的抗拒情绪。

这是一个工业化的中国第一次登上历史的舞台。像日本一样,中国在战争时期经济迅速发展。尽管中国进口欧洲的商品减少了,大部分转由美国进口和日本进口,但在港口的中国企业家还是发现在国内市场投资商品生产有利可图。满洲以外第一个重要的工业区开始出现了。这些工业属于进步的中国民族资本家,他们支持革命的思想,特别是当战后西方商品强有力的竞争力重新复兴,而他们又发现在外国人的指导下中国无法实现解放时。工人对外国产品的涌入也感到愤恨:

他们的工作岗位受到威胁。很多工人都是第一代的城镇居民,提供工作的保证使他们从农村涌进了新兴的工业区。把中国的农民从土地上分离出来甚至比改革古老的欧洲制度更重要。在中国,家族和农村的联系更牢固。迁徙到城镇去,就脱离了封建家长制的控制以及独立生产单位的相互义务,脱离了传统的大家庭:这更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古老的封建统治根基,这种封建传统经过革命的洗礼仍然幸存下来,仍然把中国和过去连接起来。新的物质基础的形成促进了新意识形态的传播。

五四运动第一次向人们显示中国的革命可以联合各阶级,形成广泛的社会基础。进步的西方自由主义已经不足以拯救中国,文化革新者对五四运动取得的不明显成果感到失望。中国政府在日本强权面前的无助,已经揭穿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现在,中国政府在处理国内事务时面临另一个尴尬:对日货的抵制和示威游行迫使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和辞退亲日官员。但这一点不是五四运动惟一的重要成果。对于新文化倡导者来说,他们自身的力量对政治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但有了学生的参与,他们第一次把革新活动变成一场全社会的行动。这给人民以很大的鼓舞,也前所未有地唤醒了人民的政治意识。这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可以说明中国当代史开始于 1919 年而不是 1911 年。

然而最终,由于日本的侵略野心,战争还是爆发了。日本这股外来势力对中国来说并不陌生,早在 1919 年以前它就开始肆虐在传统文化迅速消融的中国大地上。科举制的废除,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的回归,新旧文化文学在战争时期的大辩论,这些都推动了中国不断前进,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封闭落后的国家了。军阀未能树立和正统观念一样的新权威。现在虽然儒家思想被摒弃了,但是西方的自由主义也受到攻击,因为它和外国剥削者有很大的关联。西方自由主义对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并没有吸引力;现在它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也遭到另一种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的威胁,马克思主义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给了马克思主义一个家园,所有来自世界各地

的拥护者能在这个家园里得到鼓舞、指导、领导甚至物质支持，这个新的因素就这样被引进那个即将消逝的历史时代，它必将加速旧时代的灭亡。

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使《新青年》的创立者之一李大钊感到欢欣鼓舞。他于 1918 年开始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很快就领悟到了马克思主义世界革命理论的原动力和发动中国农民起来革命的方法。从那个时候开始，李大钊就不再对西方模式抱有幻想，俄国模式在中国学生中很受欢迎。似乎沙皇的后继者们已经驱除了心中热爱扩张的魔鬼，苏联政府成立后最先做事情之一，就是正式声明放弃沙皇俄国以前所得到的治外法权和司法权。在民族主义者的眼中，苏联因此是清白的。此外，俄国的革命，一场爆发在农民人口占大多数的社会里的革命，宣称它的胜利是建立在马克思理论的指导上，这一学说看起来对在一战中开始工业化的中国也有很大的适用性。1918 年，北京大学出现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它的一些成员都是五四运动中的佼佼者。其中一个是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毛泽东。到 1920 年，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译文开始出现在学生杂志中，也是在这一年，第一版《共产主义宣言》的完整中译本出版了。接下来，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第一个运用就是尝试组织工人罢工以支持五四运动。

922

然而，由于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不同，这些新文化运动领导者产生了分歧。陈独秀把马克思主义当作 20 世纪 20 年代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他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帮忙组织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左翼力量。自由主义者开始被抛在后面。共产国际注意到中国国内的革命新动向，在 1919 年派了第一个代表到中国来帮助陈独秀和李大钊。但结果并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他们之间存在争议。然而，在前途仍然不明朗的情况下，1921 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我们也不清楚确切的地点和日期)成立了，与会代表们来自全国各地(其中包括毛泽东)。

中国革命的最后阶段就这样开始了，它最终不可思议地扭转了一直贯穿于欧洲和亚洲之间关系的辩证逻辑。马克思主义，一种来自西

方的外来学说，其诞生和形成于与传统的东方完全不同的社会里，它的思想来源扎根于犹太-基督教文化，但被亚洲人民采纳并根据他们的实际去应用了。为在中国实现现代化、提高社会效率和尊重人的尊严、实现人人平等，马克思主义不仅被运用来反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也被用来反对它的发源地——欧洲。 923

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成功，主要归因于资本主义在这里经常被认为与外国剥削和侵略联系在一起。1920 年，中国的分裂使它在国际事务中得不到什么好处，尽管九个在亚洲有利益的国家都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日本也同意交回它在一战中夺得的德国在中国的领土。这只是华盛顿会议上达成的复杂的协议里面的一部分，华盛顿会议的核心问题是对各国海军力量进行限制（由于对军费的担忧）；这些最后都让日本相对变得更强了。四个主要的强国之间互相承认在战争中取得的权益，这体面地葬送了英日同盟。英日同盟的结束是美国一直都希望的。但对于中国的保证，每个人都知道，不值得美国为了支持它而去打仗，条约已经迫使英国不能在香港建立海军基地。同时，外国人继续支配着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的海关和税收，这些收入是北洋政府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在很多时候外国机构和外国商人直接和军阀打交道就可以了。虽然美国的政策进一步削弱了欧洲在亚洲的地位，但这在中国却表现得不明显。 924

列强对中国明显而持续的控制是马克思主义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远远超出在它指导下的正式组织——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原因。孙中山强调他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不一致，但他采用了马克思主义中有利于国民党脱离传统自由主义学说的理论，并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努力。在他看来，俄国、德国和亚洲作为被剥削者在反对压迫者和敌人——四个帝国主义国家（在 1921 年德国保证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和中国建立关系后得到好评）的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他创造了一个新词“次生殖民地”（hypo-colony）用来描述这样一种状况：中国从未成为任何国家的附属国，也就是在和其他国家没有正式的从属关系的条件下被其他国家剥削。他的结论是集体主义：我们绝不给予个人更多的自由，他

写道,让我们保卫国家而不是自由。这是对否定个人自由的新的公开赞同,这种赞同经常出现在中国古典观念和传统中。家庭、宗族和国家的诉求是最重要的,所以孙中山设想在一段时期内实行一党专政,以便进行大众灌输使人民重新认可对家庭、宗族和国家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已处于被西方思想腐蚀的危险之中。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没有多大障碍。西方列强和军阀是他们共同的敌人,苏联政府也大力推动国共合作。中国和这个与它有着最长边境线的反帝国主义强国进行合作是有先见之明的,这对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共产国际来说,支持与国民党的合作可以维护苏联在蒙古的利益,也是拖延日本的一个措施。苏联已经被排除在华盛顿会议之外,尽管华盛顿会议上的国家没有一个在亚洲比它有更大的领土利益。对于苏联来说,和中国最有可能获胜的一方合作是必须做的一个环节,就算他们的政策和马克思主义不完全相符。在苏联的帮助下,从1924 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和国民党进行合作,尽管一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们对此感到怀疑。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孙中山把他身边年轻能干的蒋介石送去苏联学习,然后在中国建立军事学校,为革命战士提供军事教学和思想教育。

925

1925 年孙中山逝世后,他的追随者继续和共产党合作,统一战线仍然存在。孙中山的遗嘱中写道:革命尚未成功(中国孩子都会背诵),而共产党在一些省份开展的革命运动取得重大进展,赢得了农民的支持,有理想的年轻军官带领的革命新军也在和军阀的北伐战争中取得重大成果。到 1927 年在国民党的领导下,中国已经恢复了表面上的团结。反帝国主义情绪使人们成功地抵制英货,这让英国政府开始警惕苏联对中国的强大影响力,英国宣布放弃在汉口和九江取得的特权。在此之前英国已经承诺把威海卫交还给中国,而美国也宣布放弃庚子赔款中美国的部分。这些成就都表明中国终于行动了。

这场革命有一个方面长期未被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无产阶级是必不可少的革命角色。中国共产党使城市工人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并参与政治活动,这一点已取得较大进步,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引以

为豪的,但是中国的群众大部分都是农民。中国的情况也走不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困局:人口激增和土地短缺,以及中国一个世纪以来所遭受的苦难,在军阀统治和中央权威瓦解的情况下加剧了。一些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已经看到了农民身上蕴藏的巨大革命潜能,他们认为尽管这一点不符合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莫斯科的理论家所转述的马克思主义),但它依然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毛泽东就是其中之一。他和那些早在 1920 年就赞成他的观点——把革命的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共产主义者,已经在农村动员了广大群众参加革命,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矛盾的是,毛泽东和国民党合作的时间似乎比其他的共产党人都长,因为国民党比他的党更重视组织农民。

接下来农民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进步,特别是在湖南,总共有大约1 000万左右的农民连同他们的家庭在 1927 年前就被共产党组织起来。毛泽东写道,在短短几个月内,农民已经完成孙中山先生全身投入民族革命 40 年想要完成但没完成的事业。有组织的农民现在可以把困扰他们多年的难题解决了。地主没有被撵走,但是地租大大减少了。高利贷的利率也降低到合理的水平。农村革命避免了以前的中国革命活动所犯的错误——毛泽东认为没有发动农民起来革命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缺陷;这次共产党能成功达到他们的目标就在于他们发现并激发了农民身上巨大的革命潜能。这对未来的革命来说有重大的意义,因为它预示着整个亚洲的历史发展进程将有重大突破。毛泽东深深地领会了这一点。他写道,如果给中国的革命打十分,那么城市居民和部队的成绩只占三分,而剩下的七分都属于农村农民的革命。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毛泽东两次把农民比作强大的动力,认为其攻击的形势,简直是疾风骤雨,顺之者存,逆之者亡。这个比喻意义重大,中国社会封建传统确实根深蒂固,长期存在反对地主和土豪劣绅的斗争。如果共产党试图通过破除迷信和摧毁封建家长制来消灭封建传统,他们仍然也能借鉴这一点。 926

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共产党在孙中山逝世后国共关系恶化情况下仍能生存的关键因素。孙中山的离去使国民党内部开始分裂为“右翼”和

"左翼"。年轻的蒋介石,曾经被视为进步分子的他,现在以右翼军队代表的身份登场。他们主要代表了大资本家,也间接代表了大地主的利益。蒋介石控制军队后,在城市里全力摧毁左派人士和共产党的组织,至此国民党内部在战略问题上的分歧才得到解决。1927年在上海和南京,当着被派到中国维护其在华权益的美国士兵和欧洲代表团的面,这场反革命政变血腥收场。共产党正式宣布国共合作结束,但事实上国共合作还没真正结束,在全国的一些地方,国共合作还继续了几个月,因为苏联还不想在这个时候和蒋介石关系破裂。这使得城市里的共产党员更加容易受到蒋介石的迫害;共产国际在中国,像在其他地方一样,短视地追求它所认为的对苏联有利的利益,这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维护斯大林的利益是首要的,在外部事务上,斯大林希望中国能有人站起来反抗英国这个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而国民党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些选择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资产阶级革命先于无产阶级革命。在国民党铲除异己即将胜利的时候,苏联调回了派往中共的苏联顾问,中国共产党最后只能放弃公开的政治活动,转为地下组织,进行地下活动。

927　事实上,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的民族革命也开展得很好。然而,国民党面临着一大堆问题。那时战争的主动权还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如果革命想要继续下去,它就必须满足广大群众的要求。在北伐进程中,国共的分裂造成倒退,这使得彻底消灭军阀变得不可能,更严重的是,它削弱了反抗外国侵略的统一战线。在日本交还胶州湾后,中日之间的关系得到短暂的缓和,但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又面临来自日本的压力。日本的国内情况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1920年,日本在一战时期快速发展的经济势头开始停下来,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困难和越来越紧张的社会矛盾,甚至在世界经济危机还没开始之前,日本国内的情况就已经不乐观了。到1931年,日本一半的工厂已经停工;欧洲殖民地市场的消失,关税壁垒筑起的鸿沟,都给日本的商品出口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日本的商品出口下降了三分之二。亚洲市场对于日本的出口至关重要,任何威胁到日本的市场的行为都会激起它的强烈恼怒。在

日本国内,农民的状况日益恶化,成千上万的人破产了,为了生存他们把自己的女儿卖去当妓女。重大的政治后果也很快显现出来,日本爆发了强烈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这比当时的阶级矛盾更加激烈。促使这种极端民族主义产生的动力就来自长期以来日本热衷于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日本需要为国内市场寻找新的出路,在经济大萧条时期西方工业资本主义采取了残酷的措施,这为他们的反西方情绪提供了新动力。

当时的环境都对日本进一步侵略亚洲是有利的。西方殖民势力现在如果不是全面撤退,很明显也是处于守势。1920 年,荷兰面临爪哇人民和苏门答腊岛人民的反抗,1930 年,越南人开始反抗法国人。在这两个地方,都有共产主义者帮助当地的民族主义造反者。在印度,英国没遇到这么大的挑战。英国人当时还不赞同印度自治,这是他们宣布的政策。在中国,1920 年时英国就已经表明他们只想和难以估计的民族主义运动平静和解,只要不让英国太没面子就好。在经济崩溃后,英国的远东政策看起来更虚弱无力了,它把美国到手的肥肉敲出来给了美国的对手——日本。最后,苏联一直试图影响中国的国内事务,现在似乎影响力开始消退了。相反,中国的民族主义获得明显的成功,不但没有一点退却的迹象,而且已经开始威胁到日本在满洲的存在。这些因素都显示在日本政治家根据经济恶化作出的预测结果中。

满洲是个非常重要的地域。日本人从 1905 年就开始经营那里,并进行大量的投资。刚开始中国人还勉强同意,但到了 1920 年在苏俄的支持下中国政府开始过问这个问题,苏俄已经预见到日本把影响力推进到内蒙古会带给它的威胁。事实上,1929 年,当时中国和苏联在经过满洲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控制权问题上已经出现矛盾,这些使日本人对中国的新力量印象深刻,而国民党再次申明中国的领土和清朝的国土一样大。在 1928 年的时候日本和国民党就发生过军事冲突,当时日本试图阻止国民党军队对付它扶植的北方军阀。最后,日本政府明确地控制了满洲。在满洲,实际的控制权掌握在驻扎在那里的日本军队指挥官手里,1931 年,驻满洲的日本人在奉天附近制造了一 928

起事件，他们想以此作为夺取整个地区的借口，但一些在东京的日本官员并不希望他们这么做。

接下来日本在满洲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由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统治），国际联盟公开反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军国主义分子在东京制造了多起暗杀事件，深受军国主义影响的政府上台了，日本和中国的矛盾进一步激化。1932 年，针对中国人抵制日货，日本派军队登陆上海作为回应。接下来几年里，日本的侵略势力南下进入到长城以内的中国地区，在那里进行实际控制，并多次密谋把中国北方从中国分离出去，但都没取得成功。直到 1937 年，日本在那里一直不断地制造是非。

国民党政府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上表现得差强人意。然而，从它的新首都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着有效的统治并控制了一些边境地区。国民政府逐步摆脱条约中的劣势地位，西方国家也开始重新调整他们和国民政府的关系，因为他们想依靠国民党的力量来对抗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展。尽管国民党的执政在外交上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不能掩盖它存在的缺陷，这些缺陷使它不能成功处理国内的问题。中国国内当时的关键问题就是政治革命仍在继续，但社会改革却已经停止了，知识分子不再支持不容纳改革的政体，因为在当时社会实行土地改革是很迫切的。农民不会拥护国民党，因为他们已经拥护共产党了。不幸的是，在政府管理方面，蒋介石在管理部下这个关键问题上越来越退步，在这个封建传统已经衰落的时代他却表现得越来越保守。国民党政府已经变质，在国家财政问题上存在的贪污腐败达到历史最高峰。依靠国民党建立强大新中国的希望看起来是渺茫的。它将面临强大的竞争对手。

929

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的一些人仍对城市起义抱有希望。但在一些省份，个别的共产党领导人仍在沿着毛泽东在湖南提出的革命路线奋斗着。这些共产党人没收逃跑地主的土地，组织地方苏维埃，他们都非常精明，看到并重视传统农民斗争的价值。到了 1930 年，共产党在这方面做得更好更娴熟了，他们在江西组织了一支军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那里统治着 500 多万人口。1932 年，中共的领导放弃上海来到江西

和毛泽东会师。此时国民党的精力转向了剿灭共产党军队，但经常以失败告终。这意味着在日本对中国造成最大压力的时候，中国国内还在另一条战线上进行争斗。国民党的最后一次围剿，迫使共产党从根据地转移，在1934年的时候开始长征前往陕西。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大壮举，也前所未有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在陕西，7 000多名幸存者得到当地共产党的支持，但他们仍不安全，不过，人民抗日的呼声使国民党减少了对他们的围剿。

由于对外部威胁的担忧，1930年下半年，中国国内出现了试探国共再次合作抗日的文章。这也得归功于共产国际政策的改变；现在是"人民阵线"的时代，这使得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都联合起来。在这条反西方阵线面前，国民党也只能沉默，这也使国民党得到英国，特别是美国的同情和支持。当日本在1937年向中国发动进攻的时候，无论是和共产党的合作还是西方自由主义者的同情，都有助于民族主义力量兴起以抵御入侵。

日本人所谓的"中国战役"花了中国人八年的时间去战斗，给中国社会和物质上带来巨大的伤害。抗日战争也被认为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1937年年底，为了安全着想，南京政府迁至西部的重庆，当时日本已经占领北方和沿海的重要地区。对日本的联合谴责和苏联派出的飞机示威都不能阻止日本的猛烈进攻。在战争黑暗的第一年里，惟一可喜的事就是中国的爱国统一战线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共产党、国民党和民主党派同样看到中国的民族革命危在旦夕。日本人也觉得中国的革命快到尽头了。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的占领区内，日本人鼓励重建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西方国家对此感到无奈，但又没法介入。西方国家的抗议，即便是在他们的国民受到威胁和虐待时发出的抗议，日本人也不放在眼里。到1939年，日本就明确宣布，如果它关于建立亚洲新秩序的主张不被承认，日本将开始封锁外国侨民的居住区。英国和法国的软弱很容易解释清楚：它们到处都有麻烦。美国人在这时的无所作为是有深层原因的：这时美国又恢复到以前长期实行的孤立主义状态，尽管美国仍会讨论亚洲大陆的问题，但不会为了它去

930

打仗。甚至,当日本炸沉美国停在南京的炮舰时,美国国会气得咬牙切齿,但最终还是咽下这口气,接受了日本所谓的解释。现在美国人的态度已经和四十年前在哈瓦那发生"缅因号"事件那时不同了,尽管他们仍给蒋介石提供物资支援。

到了 1941 年,在盟国救援前夕,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外面的世界是分隔开的,直到这一年年底它才和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联合到一起,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组成部分。然而这时中国已损失惨重。在日本和它在亚洲潜在对手的长期斗争中,日本这时看起来是赢家。一方面,日本必须考虑到它的军队在侵华战争中的经济开支和日益增大的难度;另一方面,它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通过羞辱在中国的西方人,如 1940 年迫使英国关闭运送援助物资到中国的缅甸公路,迫使法国同意日军入侵印度支那等嚣张行为体现出来。日本强大的野心诱使它进一步冒险,从 1930 年年中开始,日本军国主义的威望和在政府中的影响力达到顶峰,这使日本的侵略野心丝毫不减。

但这对日本也有副作用。侵略战争使日本必须加紧掠夺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资源。另外,美国人也慢慢做好了用武力维护自身利益的心理准备。很明显到 1941 年时,美国必须尽快决定它是否想最终成为亚洲的一支力量,如果想那意味着什么。当时的背景下,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对于侵略中国的行为,日本打着粉饰的"亚洲人的亚洲"的旗号进一步向西方在亚洲不断衰退的势力发起进攻。就像 1905 年打败俄国一样,这标志着亚洲和欧洲的关系从心理上进入一个新时代,也标志着日本在 1938 至 1941 年这段时期的独立和能力进入新阶段。接下来对欧洲的殖民统治的推翻就标志着非殖民化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是由一个在那时已经成功西化的亚洲国家开启的。

931

四、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和西方的伊斯兰地区

19 世纪期间，奥斯曼帝国几乎在欧洲和非洲消失，造成这一结果的基本原因是相同的：民族主义带来的分裂影响和欧洲国家的掠夺活动。1804 年的塞尔维亚起义和穆罕默德·阿里在 1805 年亲自担任埃及总督，共同标志着土耳其进入了衰落的最后时期，尽管这个时间大大延长了。欧洲下一个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希腊起义。从那时起，奥斯曼帝国的故事便告终结，在欧洲开始了新的民族国家传奇，到 1914 年，欧洲的土耳其就仅仅指东色雷斯了。在伊斯兰非洲，奥斯曼帝国力量的衰落更加迅速和剧烈，到 19 世纪，非洲北部的大部分国家事实上已经摆脱了苏丹的统治。 932

一个原因是，在伊斯兰非洲出现民族主义的时候，它更多针对的是欧洲而不是奥斯曼帝国。它也与文化革新有关。这个故事还得从穆罕默德·阿里讲起。尽管他从来没有去过出生地鲁梅利亚的卡瓦拉以西更远的地方，但他羡慕欧洲文明并且相信埃及能够从中学到东西。他引进技术顾问，雇用外国人员指导健康和卫生方面的措施，翻译、印刷欧洲技术领域的书籍和文章，同时派幼童去法国和英国留学。然而事与愿违，尽管他打开了欧洲，尤其是法国对埃及影响的大门，但实际取得的成绩让他失望。欧洲的影响通过教育和技术机构渗透进来，并且

反映了法国在奥斯曼帝国贸易和事务方面的传统利益。法语很快就成为受教育的埃及人的第二语言,同时在亚历山大里亚出现一大批法国人居住地。这座城市是地中海地区的大都市之一。

非欧洲世界里具有现代意识的政治家,很难将学习西方局限于技术知识领域。不久,年轻的埃及人也开始学习西方的政治理念,而这在法国有大量现成的可学对象。一个混合物开始慢慢地形成,它在最后将帮助改变欧洲跟埃及的关系。埃及人就像印度人、日本人、中国人一样吸取了同样的教训:患上欧洲病是为了生出必要的抗体以抵抗它。所以现代化和民族主义无法摆脱地纠缠在一起。这也是中东地区民族主义的长期弱点的来源。先进精英阶层的理念长期以来使他们与社会脱离,社会中的大众仍生活在未受到西方思想腐蚀的伊斯兰文明中。矛盾的是,民族主义者通常是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社会中最欧化的成员,直到20世纪仍然是这样。然而他们的观点获得了更多的共鸣。在叙利亚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中,最早出现了泛阿拉伯主义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相对于埃及民族主义、叙利亚民族主义或者其他),其主张所有的阿拉伯人,无论他们在哪里都应该组建成一个国家。泛阿拉伯主义是区别于穆斯林兄弟会的一种概念,后者不仅包含了很多非阿拉伯人,也同时排除了很多不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这种实际上想在实践中尝试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想法,就像其他泛阿拉伯主义思想一样存在弱点,其潜在问题直到20世纪才暴露出来。

933

奥斯曼帝国领土上另外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是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修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尽管是间接性的,但它与任何其他单独的事件相比,给埃及带来了更多的国外干涉的厄运。然而运河修建的直接原因并不是19世纪欧洲人开始干涉埃及政府。其发生的原因是由于伊斯梅尔的作为,伊斯梅尔是从苏丹那里得到埃及总督头衔的第一位统治者。伊斯梅尔接受了法国教育,他喜欢法国人和现代化的想法,同时多次游历欧洲。他非常奢侈。当他在1863年成为执政者时,埃及的主要出口项目棉花的价格非常高,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爆发独立战争,另一方面出于伊斯梅尔的经济保护措施,因此形势看起来

非常好。不幸的是,他的财政管理措施少了些规范性,结果导致埃及的国债增加:在伊斯梅尔就职时国债是700万美元,13年后几乎达到了一亿美元。埃及一年的利息费用总计500万,在那个年代这些数额会带来麻烦。1876年埃及政府破产,同时停止支付债务,所以外国管理者开始被派遣进来。两个管理者一个是英国人,一个是法国人,他们被授权以确保伊斯梅尔的儿子能管理埃及,并保障收入并且优先考虑清付债务。很快他们就受到了民族主义者的批评,因为巨大的税收负担导致埃及陷入贫困,而这些税收收益是用于支付债务利息。民族主义者同时也对经济状况提出了批评,例如削减政府工资。在民族主义者的眼里,那些以埃及总督名义而工作的欧洲官员,仅仅只是国外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许多在埃及的外国人具有合法的特权地位并且有自己特殊的法庭,对此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不满。 934

这些怨恨导致民族主义者密谋策划并且最终进行了革命。西化过程中的排外和其他因素促进了伊斯兰的改革,即穆斯林世界的统一和适应现代化生活的泛伊斯兰主义运动。有些人仅仅是因为埃及总督的随从中土耳其人在数量上占优势而反感。但是这种区别在1882年英国人对一场革命进行了令人沮丧的干预之后变得无关紧要了。这并不是因为财政原因而进行的干涉,而是因为英国的政策。英国时任首相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对奥斯曼帝国其他部分的民族主义很感兴趣,但他不能接受这种危险:一个不友好的开罗政府会对英国到印度的运河通道安全产生危害。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受这种战略信条所累,英国军队一直到1956年才最后离开埃及。

因此,1882年以后,英国人成了埃及民族主义者首要的攻击对象。英国人说一旦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府,他们就马上撤离,但是他们不可能这样做,因为没有一个埃及人被他们所接受,相反,英国行政官员接管了埃及政府越来越多的权力。英国人带来的也不全都是悲惨的事,他们减少了债务,并且建好了灌溉系统,灌溉系统使得供养增长的人口成为可能。在1880至1914年间,人口增长了两倍,达到1 200万。英国人引起了埃及人的反感,所以埃及人尽量让他们远离具有经济利益的

政府服务系统,同时对外国人课以重税。1900 年以后,发生了更多的动乱和暴力行为,英国人和他们的埃及傀儡政权,开始坚决地打击煽动活动,同时试图通过改革找寻出路。首先是行政方面的改革,这导致 1913 年出现了一部新的宪法,提供了更多的代表选举,形成了一个更强有力的立法机构。不幸的是,立法议会只维持了几个月,就因战争的爆发而被迫中止。埃及政府被拉进了与土耳其的战争中,一个埃及总督因为被怀疑密谋反对英国而被撤换。在这一年末,英国宣告埃及为受保护国,英国总督从此取代了苏丹。

那时,奥斯曼政府已经将的黎波里塔尼亚(Tripolitania)割给了于 1911 年入侵进来的意大利,部分原因是另一场主张改革的民族主义运动,这次运动发生在土耳其本土。1907 年,“青年土耳其运动”领导了一次成功的叛乱。这个组织的历史很复杂,但是目的却简单。像一个土耳其青年说的那样,我们沿着欧洲描绘的道路走下去……以我们拒绝接受外国干涉的方式。这句话的前半部分意味着他们希望结束阿卜杜勒·哈米德的专制统治,并且废除 1876 年以后的宪法,重建 1876 年颁布的自由宪法。但是他们期望的目的比宪法本身更多,因为他们认为宪法可以改革、复兴整个帝国,做到尽可能的现代化,同时还可以阻止王朝衰落。无论是这个计划或是土耳其青年运动理论都要归功于欧洲。比如说,他们利用共济会地方分会作为蓝本,组织秘密社团,而这些在神圣同盟时期的欧洲自由主义者中间已经十分兴盛了。但是,他们怨恨欧洲人不断增加的对奥斯曼内部事务的干涉,这明显表现在对财政的管理上,例如,在埃及,为国内发展而进行的货币借贷利息的担保是以国家独立性的损失为代价的。他们认为欧洲人对他们的欺侮已经导致奥斯曼政府长期的、屈辱的从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半岛后退。

935

在一系列哗变和反叛之后,1908 年苏丹向宪法作出了让步。海外的自由主义者赞许法制化的土耳其;看起来,暴政走向了末路。但是一个尝试性的反革命活动导致了土耳其青年运动的政变,他们废黜了阿卜杜勒·哈米德,同时建立了一个实质上的专制政府。从 1909 至 1914 年随着革命者的统治越来越独裁,意味着专制主义从君主立宪制

外表背后显现出来。不祥的是，他们中的一个宣称：从此不再有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和穆斯林，我们自豪地成为土耳其人，这种论调非常的新颖。这是古代多民族政权终结的宣告。

事后看来，青年土耳其运动的理论看起来比他们当时的行为更容易理解。他们面对的问题就像许多非欧洲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一样，同时他们受现实或想象中需要的刺激而采用了暴力方法。他们醉心于对政府各部门的改革（引进了很多欧洲顾问）。例如说，寻求提高女孩的教育在一个伊斯兰国家是一个重大的姿态。但他们是在一个尽显落后的帝国中掌权，而且在一连串外交耻辱的损害下，他们的吸引力受到削弱，并且开始依赖武力。这些外交耻辱是：在哈布斯堡王室兼并了波斯尼亚后，保加利亚的执政者赢得了对其独立地位的认可；克里特岛人宣称他们与希腊人组成联盟；在意大利攻击的黎波里短暂的间歇之后，是巴尔干战争和进一步的军事失败。

936

在这样的压力下，自由主义者所期待的改革后各民族的和睦相处很明显不过是一个妄想。宗教、语言、社会习俗和民族性仍然还很牢固，这些都是帝国的遗物，青年土耳其越来越倒退到单一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当然，这也导致了其他民族怨恨。结果就是君士坦丁堡古老的统治手段——屠杀、暴政和暗杀再次出现。从 1913 年开始直到一战爆发，青年土耳其党的三人执政都使用这些统治手段实行集体专制。

尽管他们让很多崇拜者失望，但他们这一派还是有前途的。他们代表的思想是有朝一日可以再造奥斯曼帝国的遗产：民族主义和现代化。为了向这个目标迈进，他们甚至不顾一切地放弃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留下的微不足道的遗产，不过这也使他们从重负中解脱出来。但是在 1914 年，他们的遗产仍然带来许多困扰。在他们面前，没有比民族主义更适合作为改革手段的选择。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很小，1914 年以后奥斯曼保留下来的最大一块领土（亚洲最大的穆斯林地区）内发生的事情将此体现出来。

在 1914 年，存在着一个巨大并且在战略上非常重要的区域，即沿着波斯的边界从高加索延伸到巴士拉附近的海湾——底格里斯河河

口。在海湾的南岸,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范围延至科威特(有一个独立的阿拉伯酋长,置于英国保护下),然后回转到海岸向南延伸到卡塔尔。从阿拉伯半岛的海岸到红海的入海口地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受到英国的影响,但是整个内陆地区和红海海岸都是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在英国的压力下,西奈地区已经于几年前屈服于埃及,但是巴勒斯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这些古老土地仍然属于土耳其,这些都是历史上伊斯兰的核心区域,同时苏丹仍然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哈里发(caliph)。

这份遗产在战争战略和政治的作用下日趋衰落。即使在伊斯兰的历史核心区内,于 1914 年前已有迹象表明,新的政治力量在活动。他们部分源于受到早已建立的欧洲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表现得比埃及更加强烈。当美国的传教士不断的努力和建立学校、接收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男孩进入大学时,法国的影响已经进入这些国家了。黎凡特地区的文化先进,人们有文化。在一战前夕,数百份阿拉伯报纸都是在奥斯曼帝国外的埃及出版的。

937

伴随着青年土耳其的胜利和他们土耳其化的趋势,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结果,不同政见者的秘密社团和公开组织在流亡的阿拉伯人中形成了,特别是在巴黎和开罗。在这种背景中有另外一个不确定的因素:阿拉伯半岛的执政者对苏丹的忠诚已经动摇了。他们中最重要的人是麦加的侯赛因,到 1914 年的土耳其政府对他失去信心。一年之前在波斯召开的探讨伊拉克独立问题的阿拉伯大会上就已经有了不祥的征兆。与之相反,土耳其人只是希望在阿拉伯人中代表不同利益的分歧可以维持现状。

最后,尽管没有马上表现出危险,最后转向地域民族主义文化的是犹太人。在 1897 年,犹太人历史发生了新的转折,这一年他们召开了一个犹太人复国运动大会,目标是获得一个民族家园。因此,在犹太人漫长的历史中,民族同化(法国大革命解放时代后,许多欧洲国家依然未能实现)在当时被民族主义理想所取代。设想中建立家园的地点一时间还定不下来;人们在不同的时间曾建议选择阿根廷和乌拉圭,但

是，在这个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者最终确定在巴勒斯坦建立家园。犹太人开始向那里移民，尽管规模不是很大。战争的开始将改变这种移民的意义。

1914 年，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出现了惊人的相似之处。双方都在寻求战争，将战争看作解决他们自身的手段。然而，两个王朝都必定在战争中受损，因为国内外太多的民族都将战争看作获得优势的机会。结果，两个帝国都被战争摧毁。甚至自土耳其加入战争伊始，土耳其历史上的敌人——俄国就看到有利可图。俄国已最终放弃抵抗英法，转而谋求在君士坦丁堡建立沙皇权力的传统。就法国来说，法国在中东地区有自己的事要做，英法协约的签订以及法国在摩洛哥的不受拘束，稍微平息了法国对英国在埃及的存在所引发的愤怒，但法国一直以来在黎凡特具有特殊的地位。一些狂热者鼓吹唤醒圣路易斯和十字军，不过这并没有被认真考虑。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国政府 100 年来一直宣称对奥斯曼帝国的天主教徒发挥着特殊的保护作用（尤其是对叙利亚的），拿破仑三世曾经在 19 世纪 60 年代向这里派出一支法国军队。法国在这里也有文化优势，在黎凡特受教育人中法语的广泛普及就表明了这一点，同时法国的大部分资金也投资于此，这些力量都不能被忽略。

938

然而在 1914 年，土耳其在欧洲外最主要的军事对手可能有高加索地区的俄国和在苏伊士的英国。对运河的保护是英国在这一地区战略思考的基础，但是不久形势清楚表明运河安全没有遭遇大的威胁。接着发生的事情揭示了使近东和中东最终陷入混乱的新因素。1914 年末，一支英印混合军队在巴士拉登陆，以保护波斯的石油供给不受影响。这是该区域历史命运中石油与政治相互作用的开端，尽管在奥斯曼帝国退出历史舞台前并没有完全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埃及的英国总督于 1914 年 10 月用一种方法使侯赛因快速地获得胜利，这是他第一次尝试运用阿拉伯民族主义这一武器。

当欧洲的战斗血腥和犹豫地进行时，对德国同盟国发动一次打击的吸引力变得更大了。1915 年，它们曾经尝试海军和陆军联合行动出

兵达达尼尔海峡以占领君士坦丁堡,结果这次行动陷入困境。那时欧洲国家间的混战已经开始培养出有朝一日将反对它们的力量。但这为阿拉伯盟友提供的东西非常有限。直到 1916 年初,它们才与侯赛因达成一致。他要求北纬 37 度以南的阿拉伯世界必须获得独立,就是从阿勒波到摩苏尔以北大概 80 公里,事实上包括土耳其和库尔德斯坦以外的所有的奥斯曼帝国地区。这大大超过了英国的范围,因为法国在叙利亚具有特殊的利益,所以也征询了法国的意见。当英法之间对于分割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达成协议时仍然为未来留下了很多问题,其中包括伊拉克的地位,但是一个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政治计划看起来好像正在变成现实。

这种事业的未来很快就遭到质疑。阿拉伯的反抗开始于 1916 年 6 月,他们对驻守在麦地那的土耳其安全部队发动进攻,叛乱没有让英法从战争的主要威胁中分散精力,但是起义逐渐壮大,最后成为了一个传奇。不久英国人感到他们必须更加认真地对待阿拉伯人;侯赛因被认为是汉志的国王。英军于 1917 年大举推进到巴勒斯坦,占领了耶路撒冷。在 1918 年,他们与阿拉伯人共同进入大马士革。不过在这之前另外两件事已经让情况进一步变得更加复杂,一件是美国参加战争:在一份战争目标的陈述中,威尔逊总统说,他赞成为奥斯曼帝国内的非土耳其人提供一个完全不受干预的发展机会。另一件事是布尔什维克发布了他们先前的秘密外交文件,这份文件揭示出了英法对划分中东势力范围的提议。这项协议中的一部分规定了巴勒斯坦应该被国际共管。除此之外,另外一个刺激因素是英国宣称其政策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家园。"贝尔福宣言"可以算得上是那个时代犹太复国运动最大的成功。这绝对与他们曾经跟阿拉伯人说的不一致。威尔逊总统也加入其中,他宣称自己保护犹太人,但是根本无法想象这可以不受挑战地得到执行,尤其是英法随后在 1918 年进一步对阿拉伯人的强烈愿望表达美好意愿。在土耳其人失败的前夜,未来的前景完全是模糊不清的。

939

大英帝国在那时认为侯赛因是阿拉伯人的国王,但是这一想法对

侯赛因没有任何作用。不是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而是英国和法国在国联的帮助下,设计出现代阿拉伯世界的地图。在这混乱的20年里,英国和法国与阿拉伯人卷在一起,他们变戏法般地使阿拉伯人登上了世界政治的舞台,而阿拉伯的领导人之间还存在分歧。伊斯兰联合的幻景再一次破灭,但是幸运的是,一同消失的还有俄国的威胁(即便只是简单地说),中东地区只留下了两个大国。它们互不信任,但是可以达成大致共识,基本上来说,如果英国在伊拉克自主行事,法国也可以在叙利亚自行其是。国际联盟合法地将阿拉伯的土地奖励给了英法进行托管,巴勒斯坦、外约旦和伊拉克归英国,叙利亚交给了法国,法国从一开始就实行高压统治,在国民议会要求独立或者英美托管后,法国依靠武力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他们驱逐了阿拉伯人选出的国王——侯赛因的儿子,随后又不得不面对大规模的起义。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仍然继续依靠武力维护他们所占有的,尽管那时已经有迹象表明:他们不得不向民族主义者让渡一些权力。不幸的是,叙利亚的情况很快显现出了民族主义造成的内部分裂力量: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人起义谋求从一个阿拉伯人的国家里分裂出来,这产生了另一个西方外交官至今都需要面对的中东问题。

同时,阿拉伯半岛被侯赛因与另外一个国王之间的争斗弄得疲惫不堪,这个国王与英国已经达成了协议(他的追随者是一个特别极端的伊斯兰教派,这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增加了王朝与部落之间的宗教纷争)。侯赛因被取代了,1932年沙特阿拉伯这个新的国王出现在汉志。紧随其后又出现了其他问题,因为侯赛因的儿子这时已经成为伊拉克和外约旦的国王。激烈的斗争显示出前景的困难,此后英国人以最快的速度结束了伊拉克的委托统治,寻求仅仅通过保留一定陆军和空军力量以保护英国的战略利益。于是在1932年,伊拉克作为一个独立的、拥有完整主权的国家进入国联。在之前的1928年,英国已经承认外约旦为独立国家,并也在该国保留了英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 940

巴勒斯坦地区的情况更加复杂。1921年爆发了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的暴动,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移民和犹太人获取阿拉伯土地产生担

心,从此那个不幸的地区就再也没有长久的和平。不仅仅是宗教或民族情感,还有更多的因素造成了危机。犹太人的移民意味着新的西化和现代化力量的入侵,这种新力量的活动将改变经济关系并且会让一个传统社会产生新的需求。英国的托管机构左右为难,一面是如果它不限制犹太人的移民,就会遭到阿拉伯人的公开反对,另一面是如果它这样做,就会遭到犹太人的反对。当时阿拉伯人的政府也认为,他们占据的土地在经济和战略上都对英国安全有重大作用。世界其他地方也参与进来。1933 年上台的德国法西斯迫害犹太人,并且剥夺他们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得到的法律和社会权益,使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到 1937 年,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地区进行了群殴。不久,一支英国军队设法压制了一场阿拉伯人暴动。

在过去,阿拉伯土地上最高权力的崩溃常会立刻带来一个混乱时期。这次是否像以前一样,混乱之后随即建立一个帝国的霸权,局势仍不清楚。英国不想做这个角色,在短暂地陶醉于帝国胜利的果实后,他们只渴望保证他们在这一地区的基本利益:对苏伊士运河的保护以及保证来自伊拉克和伊朗的日益扩大的石油运输。英国在 1918 和 1934 年间建立了一条巨大的石油管道,从伊拉克北部穿过外约旦和巴勒斯坦到达海法,它给这些地区的未来带来了另一个新的转折!欧洲的石油消费需求还没大到会对它产生依赖,在 20 世纪 50 年代没有什么大发现可以再次改变它的政治地位。但是人们感受到新的因素正在产生,英国皇家海军已经开始认真考虑用船运输石油。

941

英国人认为保护苏伊士运河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军队驻扎在埃及,但这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麻烦。战争已经加剧了埃及人的不满和愤恨。侵略军从来到哪里都不会受欢迎。当战争导致物价上涨时,外国人更是备受指责。1919 年,埃及的民族主义领导者就尝试把他们的要求提交到巴黎和会上,但被阻止了,接下来国内兴起反对英国的浪潮,很快也被平息了。但英国也开始从埃及撤退。1922 年,为了在民族主义者情绪爆发之前抽身,英国结束了作为埃及保护国的身份。然而埃及这个新王国的选举制度选出了主体民族中民族主义者的多数派,这

就使得埃及政府难以达成任何一届英国政府能接受的保护英国利益的协议。结果,埃及陷入长时间的立宪危机和断断续续的社会混乱之中,直到 1936 年英国同意接受在运河区有年限的驻扎权为止。外国人的审判特权也被宣布取消了。

这是大英帝国撤退的一部分,1918 年后在别处也可以发现这种现象。这反映了英国权力和资源的过度延伸,因为英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开始受到挑战。中东地区之外的世界关系的变化有利于影响后奥斯曼土耳其时代伊斯兰地区的发展。另一个重要的要素是马克思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对阿拉伯国家的无线广播支持着第一批阿拉伯共产主义者。但虽然引起了关注,共产主义却没表现出可以取代那个地区最强烈的革命思潮的迹象,也无法取代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响。到 1938 年,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焦点转向了巴勒斯坦。在那一年叙利亚召开了一个代表大会以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事业。阿拉伯世界对法国在叙利亚的野蛮行径的愤恨已经越来越明显,还有英国公开反对埃及民族主义者对英国的抗议行为也引起阿拉伯国家的不满和愤怒。在泛阿拉伯的民族情绪里存在着一种力量,有人认为这种力量最终可能会压倒王国的分裂。

战争期间的结盟协议也让奥斯曼的家乡土耳其(很快就被改名)的历史越来越复杂,英国、法国、希腊和意大利都满意自己所分得的战利品;战争简化了一些关系,比如俄国对君士坦丁堡和两大海峡地区的要求被否决了。面对法国、希腊和意大利的入侵,苏丹被迫签署条约以换来可耻的和平。希腊获得了重大的让步,亚美尼亚将成为独立的国家,而土耳其剩余的领土被划分为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势力范围。这是最露骨的帝国主义,所签的协议也比在凡尔赛宫上强加给德国的不平等条约苛刻得多。简而言之,欧洲的财政控制权又得到重建了。

942

接下来是第一次成功修订和平协议。这主要都是一个人的功劳。此人以前是青年土耳其党党员,也是土耳其惟一的常胜将军,他就是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他在吓跑意大利人后,接着赶跑了法国人和希腊人。在布尔什维克的帮助下,他制服了亚美尼亚人。英

国决定谈判,所以在1923年英国和土耳其签订了第二个条约。这是民族主义的胜利,超越了巴黎和会的决定,也是这一系列和平协议里面惟一一个在双方平等的基础上签订的,而不是强加给战败方的协议。它还是惟一一个有俄国的谈判代表参加,并且比其他的和平条约持续更久的协议。一系列不平等条款和外国的财政控制都消失了。土耳其放弃它对阿拉伯的土地要求,以及对爱琴海、塞浦路斯、罗德岛和多德卡尼斯群岛的要求。接下来希腊和土耳其间实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38万穆斯林离开希腊来到土耳其,130万多东正教徒离开土耳其去到希腊),因此,这些人彼此之间的仇恨进一步加强了。然而,鉴于随后发生的事,这个结果可以被认为是在这个区域的种族清洗措施中较有成效的之一。现在的状况已经没它刚形成时那么危险了。就这样,奥斯曼帝国六个世纪的统治终于结束了。1923年,一个新共和国以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份诞生了。在1924年,哈里发也跟随着奥斯曼帝国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奥斯曼时代的终结,而土耳其的历史则刚刚开始。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如今在这五六个世纪里第一次成为他们的国家人口中人数最多的民族。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是,土耳其的首都也从伊斯坦布尔移到安卡拉。

凯末尔——他喜欢这样称自己(名字的意思是"完美")——有点像彼得大帝(但在成功修订强制性的条约后凯末尔不喜欢领土扩张),又有点像一个更开明的专制君主。他也是土耳其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现代化改革家之一。土耳其的法律实现了世俗化(以拿破仑法典为楷模),伊斯兰律法被废除。1928年,宪法开始修订,把关于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国家的表述去掉。到今天,它仍然是中东惟一一个有穆斯林人口但采用世俗化原则的国家。多妻制也结束了。1935年每周一次的休息日,从以前的星期五(伊斯兰的神圣日)变成星期日;一个新的词汇进入土耳其的语言:vikend(从星期六下午1点开始到星期日的半夜这段时间);学校停止宗教教学;土耳其毡帽被禁止,尽管这种帽子来自欧洲,但它被认为是穆斯林的。凯末尔意识到他想要达到的现代化必须是彻底的,所以这些象征性的东西对他来说也是重要的。它们是

943

标志,但事物的标志很重要,因为这些表明欧式社会代替了传统的伊斯兰社会。一个伊斯兰的思想家敦促跟随他的土耳其人要"首先属于国家土耳其,其次属于伊斯兰教,最后才属于欧洲文明",而且要做到这些似乎也不难。字母表被拉丁化,这对教育是很重要的,从那以后,小学就是义务教育。在学生的教科书里,这个国家的过去也被重写了,教科书里说亚当也曾是土耳其人。

在土耳其的国民大会上,凯末尔被授予"阿塔图尔克"(Ataturk)的称号,意思是"土耳其之父",这是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情。也许他就是穆罕默德·阿里想要成为的那种人——伊斯兰国家第一个现代化的改革家。直到1938年他去世,他一直都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似乎下决心不让他的改革停滞,结果他造就了一个新国家,而且让土耳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世界最先进国家中的一员。在土耳其,另一项对过去的突破就是给予妇女新的社会角色,这比欧洲的妇女相关政策更加伟大,并且在1934年,土耳其妇女获得选举权。女性也被鼓励从事专业工作。

在1914年前,既没有被欧洲宗主国直接统治,也没有被奥斯曼帝国统治过的最重要的伊斯兰国家就是波斯。1907年,在英国和俄国同意划分势力范围后,这两个国家就开始干预波斯的内政,但随着俄国国内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它的势力很快就消退了。英国势力继续在波斯的国土内经营,直到一战末期才结束。当波斯代表团向巴黎和会陈述他们的要求却不被允许时,波斯人对英国的愤恨迅速蔓延。有一段时间英国很困惑,当时它在努力寻找在军队撤出波斯以后能持续抵抗布尔什维克的方法。继续在波斯驻扎军队是不可能的,这对于英国的国力来说负担过重。很偶然地,一个英国将军发现有一个人打算以一种难以预见的方式去行事。

这个人就是礼萨汗(Reza Khan)。他是一个军官,他在1921年时发动政变,并且迅速利用布尔什维克对英国的害怕这一弱点和俄国签订了条约,这个条约使俄国出让其在波斯的权益和资产,并且从波斯撤军。礼萨汗接下来继续打败英国支持下的分裂分子。1925年,国民大会授予他独裁的权力,几个月以后,他被称为"伊朗的王中之王"。他统

治波斯直到1941年(那时苏联人和英国人联合把他从王位上撵下来),他就像是伊朗的凯末尔。对面纱和宗教学校的废除,表明他对国家进行世俗化的决心,尽管他的改革没有取得像土耳其那么彻底的成效。1928年,波斯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款都被废除,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举措。同时,波斯的工业化和交通快速发展。波斯和土耳其的密切关系也逐步培养起来。最后,这位波斯的政治强人在1933年的时候第一次在一门新技艺——石油外交中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功,当时英波石油公司所拥有的特权被礼萨汗取消。当英国政府把这个事情反映到国际联盟时,礼萨汗得到了另一个对他有利的更大让步。这是礼萨汗最伟大的胜利,也是波斯独立自主最好的证据。波斯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标志性事件是1935年官方更改了国家的名字:波斯改为伊朗。两年后,礼萨汗的妻子第一次没戴面纱出现在公众场合。

五、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表明了欧洲时代的终结。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开始于1939年的二战从欧洲国家间的争斗演变为世界大战。在程度上它远远超过以往的任何战争，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要求：没有什么未被触及，没有什么未被动员，没有什么未被打乱。二战可以真正称为“全面”战争。

945

到1939年，已有许多明显的迹象表明一个历史时代正在结束。尽管1919年的战后安排导致殖民国家控制领地的进一步扩张，但是最大的殖民国家——大英帝国的行为表明，帝国主义如果不是已经处于撤退中，就是处于防御中。日本的活力意味着欧洲不再是国际权力体系的惟一焦点；早在1921年，当中国再次运用其影响力的可能性还不十分明显时，一位南非的政治家就预言，国际政治舞台已从欧洲转向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现在来看这个预言愈发正确。在此预言之后的十年，比起所依赖的政治基础，西方优势地位所依赖的经济基础愈发明显不牢固了；美国作为最大的工业国家，尚有1 000万人失业。尽管当时没有一个欧洲工业国家陷入这样的困境，但对本国经济体系根基稳固所怀有的那种理所当然的自信已永远地消失了。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重整军备的刺激，一些国家的工业得到了恢复，但是，1933年世界经济会议的失败，表明通过国际合作寻求经济复苏的国际努力失败了。此后，

各国各行其是;甚至英国最终也放弃了自由贸易原则。即使人们还在谈论自由放任主义,但它已走向末路。到 1939 年,西方各国政府都在有计划地干预经济,采取了自重商主义极盛以来政府都未采取的措施。

如果 19 世纪的政治和经济假设已经失灵,那么其他很多东西也如此。阐明智力和精神的趋势比把握政治和经济的趋势要难得多,但是,尽管很多人仍固守旧的信条,对引领思想和舆论的精英人物而言旧根基已不再牢固。很多人仍参加宗教服务活动——尽管只占少数,甚至是在罗马天主教国家情况也如此——但是工业城市的群众已生活在一个后基督教世界里,宗教机构和有形标志的清除并不会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多大的不同。知识分子也如此,他们可能会面临一个比丧失宗教信仰更大的问题,因为许多帮助基督教徒从 18 世纪解脱出来的自由思想,现在也开始被取代了。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个体人身自由的普遍认可、客观的道德标准、合理性、父母的权威以及一个可解释的机械的世界,所有这些似乎都和自由贸易的信条相伴随着。

946

改变最明显的是艺术。自人文主义时代以来的三四百年里,欧洲人认为,艺术以易于理解的方式向普通人表达愿望、感悟和乐趣,即使它们在创作时可能会被提升到一个特别精致的程度,或者以集中的形式表现出来,以至于并非所有人都喜欢。无论如何,对那整个时代而言,这种想法是可能的:给予时间和研究,有教养的人能判别所处那个时代的艺术的感受,因为它们用共同的标准表达共同的文化。这一想法在 19 世纪有所削弱,当时人们仿效浪漫主义运动,将艺术家理想化为天才——贝多芬是最初的例子之一——并且系统阐述先锋派的观点。

不过,到了 20 世纪的头十年,即使是训练有素的眼睛和耳朵也难以辨别很多当代艺术家在作品中表达的东西。这方面最生动的例子是绘画上的形象错位。在这方面,表现派的飞跃仍然与传统保持着微妙的关系,正如立体派后期表现的那样。但随后它已不再清晰地展示给普通的、有教养的人——如果他还存在的话。艺术家龟缩到一种越来越难以理解的个人视角的混乱状态中,其焦点已放在达达主义和超现

实主义的世界里。在1918年之后的几年,最有趣的是艺术的解体达到顶点:在超现实主义里甚至连客体的概念也消失了,只留下单独的描绘。正如一位超现实主义者所言,这种趋势意味着"对思想的支配摆脱了理性施加的控制,超越所有美学的或道德的成见"。超现实主义者透过偶然性、象征手法、冲击、联想以及疯狂行为,寻求远离意识本身。通过这样做,他们只是在探索许多作家和音乐家当时竭力在做的事情。 947

这种现象为自由文化的衰退提供了众多不同形式的证据,它是欧洲时代高度文明的最终结果。重要的是,认为传统文化太局限于排斥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情感和经验资源的感觉,推动了这种解体运动。或许赞同这一点的艺术家实际上也很少能读懂那个人的作品,这个人超过其他任何人,给予20世纪一种语言和用于探索这一领域隐喻库以及生命奥秘所在的信心。

这个人就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他认为自己在文化史上足以与哥白尼或达尔文齐肩,因为他改变了受过教育的人思考自我的方式。弗洛伊德进行了意识的对比,将无意识的思想描述成继日心说和进化论之后对人类自我陶醉的第三次"侮辱"。他用平实的语言介绍了若干新观点:我们现在所说的"情结"(complex)和"强迫观念"(obsession)的特殊含义,以及熟悉的术语"弗洛伊德式失语"(Freudian slip)和"里比多"(libido)的出现,成为其学说力量的永久典范。他的影响力迅速蔓延到文学、人际关系、教育、政治。与许多预言家的话一样,他提供的信息常常被曲解。人们认为他所说的话比他在具体临床研究方面的科学贡献更重要。与牛顿和达尔文相比,弗洛伊德的重要性几乎不与自然科学沾边——他在这方面的影响要比他们小得多——但他提供一个新的神话。他的理论将被证明具有很强的破坏性。

人们从弗洛伊德得到的信息表明:潜意识是大部分重要行为的真实源泉;道德观念和态度是塑造潜意识的影响因素的投影,因而责任心的理念充其量不过是个神话,而且可能是危险的神话;或许理性本身是一个幻觉。假如这是真实的,弗洛伊德的主张有没有意义已没有多大

的关系。这就是过去许多人相信由他所证明的东西——现在仍有很多人相信。这些观点质疑自由文明本身的根基、理性的观念、责任心以及自觉的有动机的个体,这是其主要的重要性之所在。

弗洛伊德的学说并不是导致确定性和人们没有坚实立足点这一感觉丧失的惟一知识力量。但它在两战间歇期间的知识生活中最为明显。面对弗洛伊德的学说,或面对艺术领域的混乱,或面对科学世界的晦涩难懂(似乎牛顿和拉普拉斯突然间被遗弃了),人们忧心忡忡地投身探索新的神话和准则,以便为自己指明方向。政治上,这导致诸如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出现,过去认为必然之事中更加不理性的地方也显露出来。人们不会因宽容、民主和天赋的个人自由而备受鼓舞或者兴奋不已。

948

这种影响使处理逐渐加深的不确定性以及消除笼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国际关系的阴霾难上加难。这个中心在欧洲,在于德国问题,它预示着比日本更大范围的扩张。德国在 1918 年没有被摧毁,因而,有朝一日它将再次企图获得它应有的权力,这是一个符合逻辑的结果。地理、人口和工业能力都意味着,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统一后的德国必定在欧洲中部占主导地位,而且令法国黯然失色。根本的问题是能否做到无需面对战争。只有少数人认为或许再次肢解 1871 年统一的德国能够解决问题。

德国很快开始要求修订凡尔赛条约。尽管在 20 世纪 20 年代它是以一种充满希望的心态来处理的,这一要求最终变得难以应付。德国实际负担的赔款逐渐削减,《洛迦诺公约》被视为重大的里程碑,因为通过它,德国同意凡尔赛条约对西部领土的处理。但它遗留下了修改东部版图的问题,而且在此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的问题:考虑到德国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经历,一个潜在实力像德国这样强大的国家,怎样才能以一种平衡与和平的方式与它的邻居维持关系。

大部分人希望一个民主的德意志共和国的产生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它的制度将温和而友善地重建德国的社会和文明。魏玛共和国的宪法(因宪法大会召开的地点而得名)是相当自由的,但太多德国人自

一开始并不认同它。当经济大危机粉碎德国共和国狭小的栖息地,释放毁灭性的民族主义以及由它伪装的社会力量时,魏玛已解决了德国的问题显然是一个幻觉。

当这发生时,遏制德国再次成为一个国际问题。但是由于诸多原因,20 世纪 30 年代是一个无望轻易实施遏制的十年。一开始,在中东欧几个经济实力相对弱小、农业经济主导的新独立的国家里,人们能感受到世界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最严重。法国一直在中东欧寻找遏制德国复兴的盟友,但是现在这些盟友被经济危机严重削弱了。由于这些盟友的特殊位置,在遏制德国时必然牵扯到又一个无可争议(有些神秘)的大国——苏联,这使问题变得加倍的困难。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已经足以阻挡苏联与英国、法国的合作,更不要说苏联与英法在战略上的巨大差异。如果不穿越一个或几个东欧国家,苏联军队不可能抵达中欧,而新成立的东欧国家中弥漫着对俄罗斯和共产主义的恐惧。毕竟,罗马尼亚、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与苏联存在许多纠葛,其中有一些国家就建立在前沙俄帝国的领土上。

949

美国人也不会提供任何帮助。自从威尔逊未能使美国加入国联以来,美国政策的总体趋势已退回到只关心自己的孤立状态之中,这符合美国的传统政策理念。曾赴欧洲参战的美国人不愿意再重复这样的经历。美国经济在 20 年代的繁荣证实了孤立政策的合理性,而 30 年代经济的衰退从反面促使美国人坚信孤立政策。美国人毫不犹豫地指责欧洲人制造的麻烦——一战争债务问题,它带来了巨大心理影响,因为它被认为与国际金融困难密切相关(确实有一定关系,但没有美国人想的那样密切)。美国人对此时进一步卷入欧洲事务感到不放心。无论如何,经济大萧条使美国人有足够的理由只关心本国事务。随着民主党在总统大选中的胜利,美国开启了一个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这种变革将最终消除孤立主义的氛围,但在当时没人能预见到这一点。

紧接着这一阶段的美国历史由民主党人领导,他们连续把持了 5 个总统任期,前四个任期是由同一个人——富兰克林·罗斯福竞选赢得的。连续四次赢得总统选举胜利,这几乎是不可超越且令人吃惊的。

(只有社会主义者尤金·德布斯连续四次参加总统选举,但都失败了)罗斯福每一次都赢得了绝大多数选民的支持,看起来像一场革命。早期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从美国内战以来没人赢得过这样的胜利,而后来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1964年前也没人如此。并且,罗斯福是一位富有的、贵族化的人物。因此,更让人吃惊的是,他会成为20世纪前期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之一。在每一次基本上是希望与失望对决的总统选举中,罗斯福都赢得了大多数选民的支持。他给人们带来了采取行动摆脱经济萧条不良影响的自信和希望。伴随着选举的胜利,罗斯福进行政治改革,构建了民主党在国内政治中的支配权,它是以南方人、950 穷人、农场主、黑人、进步自由知识分子这些不可忽视的支持者组成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改革进一步赢得了更多的支持,仿佛它已经取得了成果。

美国人对改革存在一定程度的错觉。罗斯福政府进行的"新政"到1939年仍未圆满地解决经济问题。尽管如此,"新政"改变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工作重点及其与政府的关系。一项庞大的失业救济保险计划开始启动,数百万人投入到公共工程,新的金融制度被采用,一项重大的公有产权实验在田纳西河流域的水电项目中开展。资本主义被赋予了新的生机和新的政府机构。新政导致了和平时期美国联邦政府对美国社会和各州最重要且不可逆转的权力扩张。因此,美国的政治反映了它一样面临着走向集体主义的压力,集体主义在20世纪影响着其他一些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罗斯福时代在历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它改变了自内战以来未曾变动的美国宪法历史和政治历史的进程,并且顺便为世界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民主选择,即一种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的自由资本主义。这个成就更加的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它几乎完全依赖于忠于民主过程的政治家的有关选择,而不是依赖于经济学家的主张。有些经济学家已经在宣扬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进行更大规模的中央管理。这有力地证明了美国政治体系有能力实现人们觉得他们想要的东西。

当然,这个体系也能将大多数美国人的民意转化为外交政策。罗

斯福比他的大多数同胞更加清醒地知道将美国孤立于欧洲事务之外的危险。但是他逐渐地展示自己的主张。如果德国复兴,只有西欧的大国继续对抗德国,而无法得到苏联和美国的帮助。英国和法国不幸地将自己置于欧洲警察的位置。历史上,即使当俄国与他们站在一边时,英法应对德国仍困难重重。何况自 1918 年后,英法之间矛盾重重。在军事上,两国也十分脆弱。为了应对德国重新武装的可能和自己在人力上的缺陷,法国沉迷于战略防御方案,修建了壮观的要塞,但是它极大销蚀了军队的进攻性。英国皇家海军的优势地位受到了挑战,也不能再像 1914 年那样,放心地将兵力集中在欧洲海域。在全球安全承诺对其军队造成日益增长的压力之时,英国政府一直在谋求削减军备开支。经济危机加重了这种趋势;人们担心重整军备的开支将会导致通货膨胀,严重破坏经济的复苏。许多英国选民也相信德国的不满是合理的,他们倾向于在尊重德国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的名义下作出妥协,甚至主张归还德国的殖民地。英国和法国都被欧洲国家中的小丑——意大利所困扰。英法希望墨索里尼领导的意大利加入反德阵营的愿望到 1938 年破灭了。

951

这归因于意大利姗姗来迟的对非洲的争夺,1935 年它的军队入侵了埃塞俄比亚。意大利的行为产生了一个问题,国联应该作何应对?国联的一个成员国侵犯另一个成员国,这是对国联盟约的公然挑衅。法国和英国的处境非常尴尬。作为大国、地中海国家和非洲殖民宗主国,他们理应在国联带头反对意大利。但是英法的反对如此的软弱无力和半心半意,因为它们不愿意疏远意大利,希望意大利和它们一起对抗德国。最坏的结果出现了。国联未能制止侵略并且意大利被疏远了。埃塞俄比亚丧失了独立地位,尽管只持续了 6 年。

事后看来,这是几个犯了致命错误的时刻之一。但是,事后追溯在什么阶段事情发展至如此不可收拾的情形,这是无用的。可以肯定的是,一个更加激进、穷凶极恶的机会主义体制在德国出现,是事态发展的重大转折点。但是大萧条的影响更大,并且使事情的发展成为可能。经济的崩溃也产生了另一个重大影响。它使用意识形态解释 30 年代

的事情听起来很合理,由此进一步增加了人们的怨愤。由于经济危机带来的阶级冲突的加剧,相关政治家时常把国际关系解释为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左翼与右翼或者民主与专制的斗争。墨索里尼被英法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事件中的行为所激怒,逐渐与德国结盟,并且主张进行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圣战。此后,国际关系的意识形态化解释更加盛行了。30 年代所有的对国际事务的意识形态式的解释都易于模糊德国问题的核心本质,由此也易于使德国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

苏联的宣传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30 年代苏联国内局势是不稳定的。工业化运动带来了国内局势的严重紧张和大量的牺牲。苏联残暴集权的专制体制控制了这些情况,尽管其可能被夸大了。这个专制体制不仅表现在集体化过程中对农民的斗争,还表现为从 1934 年以来针对体制内同志的恐怖措施。5 年内,数以百万计的苏联人被处死、投入监狱或者被放逐,最常施行的处罚是强制劳动。当看到一批批被告在苏联法庭上俯首帖耳地用滑稽可笑的供词承认自己的罪行时,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在这些年中,一个新的共产主义精英集团代替了旧的集团;到 1939 年,曾出席过 1934 年党代会的超过一半的代表被捕了。局外人很难确定苏联国内正在发生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苏联绝不是一个强大的潜在盟友。

952

由于与此相随的宣传,上述情况直接影响了国际局势。许多是由来自苏联内部被包围心态的蓄意刺激引起的。苏联通常用以苏联和美国对立的习惯性思维来看待世界,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和 1918 至1922 年资本主义国家对俄国的干涉。在 30 年代,这种习惯性思维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进一步强化。对外宣扬国际阶级斗争的共产国际也持有这种想法。这种观念在国际间的相互影响是意料之中的。世界各地保守主义者的担心加剧了。对左翼甚至温和进步力量的任何妥协都很容易被人们想象为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右翼力量这种态度的强化,恰好为共产主义者所宣扬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是不可避免"的论断提供了新的证据。

但是当时并未发生成功的左翼革命。革命的危险在一战结束后不

久就被迅速地平息了。在20世纪20年代,工党曾一度平和地执掌英国政权,并未采取激进的措施。1931年随着金融体系的崩溃,第二次执政的工党被保守党联盟取代。保守党联盟赢得了压倒性的选民支持,并且坚持传统的执政理念:进步的、逐步的社会和行政体系改革。这些改革表明英国进入了“福利国家”行列。这个方向被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进一步推进了。这些国家经常作为榜样被提出,受到其他国家的钦佩,因为它们将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和实用的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明显不同于共产主义。即使在法国存在着一个庞大而又活跃的共产党,也没有迹象表明在大萧条后法国共产党的目标得到了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在德国,1933年前共产党还能获得较多的选票,但是从未能取代社会民主党控制劳工阶级的运动。在其他不太发达的国家,共产主义革命成功的可能性更加渺茫。在西班牙,共产党面临着社会党和无政府主义派别的竞争。西班牙的保守派确实害怕共产党,并且可能有理由担心在共和国体制下(1931年建立),西班牙存在滑向社会革命的危险,但实际上,共产主义对他们几乎没有威胁。 953

然而意识形态化的解释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甚至对非共产主义者来说也是如此。随着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新的统治者,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尽管他所追求的目标很难使人认为他是完全理智的,但希特勒的成功使人们很难否认他是一位政治天才。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只是一个落魄的鼓动者,曾企图推翻巴伐利亚政府但遭到失败。在那具有催眠功效的演讲中和那不成形的长篇半自传中(很少人读过该书),充斥着他所热衷的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凭借他领导的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在选举中的强劲表现,1933年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的共和国总理。从政治上来讲,这可能是20世纪最重大的一个决定,因为这意味着德国的根本性变革,它转向了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这场战争以摧毁旧的欧洲和德国而结束,也意味着一个新世界的出现。

虽然希特勒演讲的要点很简单,但他的要求却很庞杂。他鼓吹德国的困境有明确的缘由:凡尔赛条约、国际资本家,还有马克思主义者

和犹太人所谓的反国家活动。他还表示,纠正德国政治的错误必须结合德国社会和文化的革新;这是一个通过切除非雅利安人组成部分以净化德国人生物种群的问题。

这种言论在1922年影响很小,却在1930年使希特勒领导的纳粹赢得了议会107个席位,超过了共产党人的77个席位。纳粹是已经崩溃的德国经济的受益者,同时它将使德国经济变得更糟。纳粹在政治上的成功有几个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德国共产党人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把社会党人当作对手进行斗争。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这严重阻碍了左翼力量在德国的发展。另一个原因是,民主共和国的反犹太主义情绪已有所增长。随着经济的崩溃,这种情绪进一步加剧。像民族主义一样,反犹太主义的影响力在于可以跨越阶级,用来作为德国困境的解释,而不像马克思主义者同样简单的阶级斗争(反对一个阶层,吸引另一个阶层)的解释。

954 到1930年,纳粹党成为德国的一支政治力量。纳粹获得了更多的支持和不同的支持者:有些人将纳粹在街头的暴动视为反对共产党人的保障,而支持纳粹;力图重新武装德国和修改凡尔赛和平条约的民族主义者支持纳粹;保守的政治家将希特勒视为他们政治游戏中有价值的角色而支持纳粹。经过一系列的纵横捭阖,1932年纳粹尽管还未取得国会多数席位,但已成为德国国会中最大的政党。1933年1月,根据宪法程序,希特勒被德国总统召见。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尽管得到了政府垄断的电台的支持和使用了恐吓手段,纳粹仍未获得国会多数席位。尽管如此,在得到一些右翼议员的支持后,纳粹获得了国会多数席位,这些右翼议员投票支持给予政府特别有利的权力。最重要的权力是《紧急法案》赋予的管理权。这一事件宣告了这一届国会会期的结束,也宣告了国会最高权威的终结。凭借这些特别权力,纳粹开始彻底地破坏民主体制。到1939年,德国社会没有一个部门未被纳粹控制或恐吓过。保守派也弄不明白了。他们很快发现纳粹严重破坏了传统权力机构的独立性。

纳粹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敌人毫不留情地使用恐怖手段

上。德国很快就爆发了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惊讶的欧洲人发现，自己正在亲眼目睹中世纪欧洲一个最进步国家的大屠杀或沙皇俄国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复活。这确实让人如此震惊以致德国以外的人们很难相信它正在发生。对纳粹本质的混淆使应对德国变得更加困难。有些人认为希特勒仅仅是一个民族主义领导人，像凯末尔一样，倾向于复兴自己国家和坚持其应有的索赔。其他人将其看作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十字军斗士。即使当人们只是认为希特勒也许可以充当抵制布尔什维克的"栅栏"时，这也导致了一种可能：在左翼人士看来，希特勒是资本主义国家反苏的工具。但是没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描绘希特勒或他的目的，并且对此人们的认识还存在巨大分歧。一种可能合理的接近事实真相的一点是，人们只是认识到：希特勒以最消极和破坏性的形式表达了德国社会的怨恨和愤怒，并且以一种可怕的形式体现出来。经济灾难，政治犬儒主义和有利的国际力量格局，给他的个性施展提供了机会，这时他可能会释放这些负面特质。所有欧洲人，包括他自己的同胞，都要为此付出长期的代价。

1939 年德国再次走向战争的方式是复杂的。有种观点认为，当时存在避免走向战争的可能性。显然墨索里尼（以前对德国在欧洲中部的野心保持警惕）成为希特勒的盟友是一个重要的时刻。由于对埃塞俄比亚的冒险，意大利与英法疏远了。此后，一批西班牙将军发动兵变反对左翼共和国，西班牙内战爆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派出特遣队支持那里的反政府武装领导人佛朗哥将军。这超过其他任何一个事实，在欧洲产生了一条泾渭分明的意识形态分界线。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佛朗哥都被确定为"法西斯主义者"。苏联开始调整外交政策，指示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放弃对本国其他左翼政党的攻击，并鼓励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并与西方国家统一协调支持西班牙。于是，西班牙被认为是最纯粹的右派和左派之间的冲突。这是一种歪曲，但它鼓励人们去思考这个事实——欧洲分为了两大阵营。

9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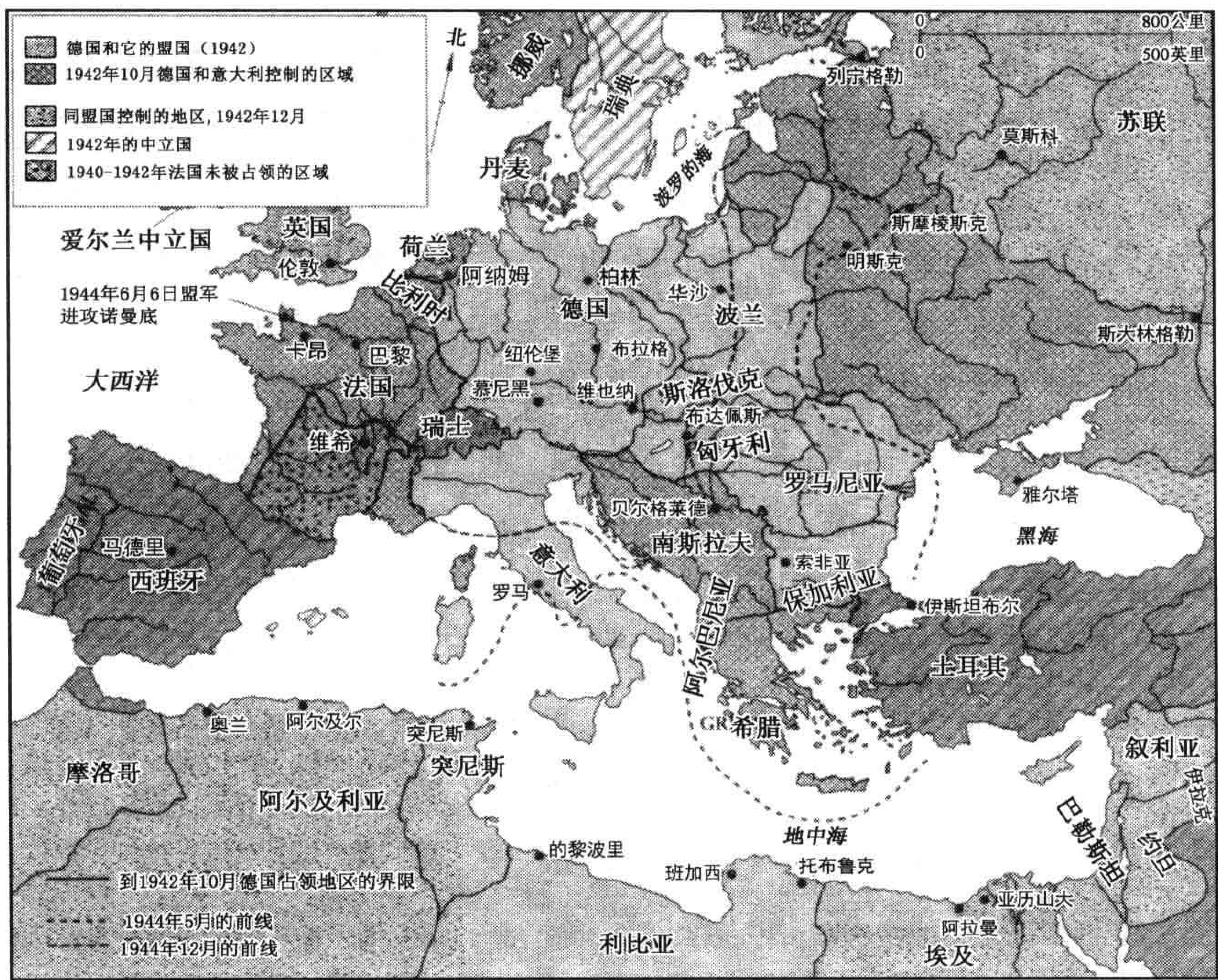
英国和法国政府深知在这个时候应对德国的困难。希特勒在 1935 年已经宣布德国开始重整军备，这是被《凡尔赛条约》所禁止的。

直到英法完成重整军备，他们仍然非常软弱。由此导致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德国军队违反《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再次进入莱茵兰非军事区。英法未采取任何举动抵制德国的这次行动。西班牙内战使英国和法国国内舆论陷入进一步的混乱，于是希特勒趁机吞并了奥地利。《凡尔赛和约》条款禁止德国和奥地利的合并，这点似乎很难坚持；对法国和英国选民看来，对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民族主义问题，这是理所当然的。奥地利共和国长期以来被内部问题困扰。1938 年 3 月，两国正式合并。到了秋天，德国把下一个侵略的目标指向了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一部分。这次的理由又是貌似有理的民族自决的要求。这次涉及的地域是如此的重要，它们的丧失会削弱捷克斯洛伐克未来自卫的前景，但这些地区居住着许多德意志人。第二年，基于同样理由，梅梅尔(Memel)被德国吞并。希特勒一步一步实现了在普鲁士击败奥地利后德意志人丢失的旧梦——一个统一的大德国，涵盖所有德意志人居住的土地。

捷克斯洛伐克的肢解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它是通过 1938 年 9 月慕尼黑会议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完成的。英国和德国在会议上发挥了主要作用。这是英国试图满足希特勒外交政策的最后一个重大倡议。这位英国首相对于是否扩充军备抵制德国仍然犹豫不决，还幻想着，随着最后一批被外国人统治的德意志人回归德国，希特勒进一步修改《凡尔赛条约》(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凡尔赛条约》已千疮百孔了)的动机就会消失。

英国首相错了，因为希特勒把扩张的计划扩大到入侵斯拉夫人的土地。他的第一步就是在 1939 年 3 月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剩余的领土。这导致了对 1919 年波兰问题协议的质疑。希特勒憎恨“波兰走廊”，它将东普鲁士和德国本土隔开，它还包含但泽市，一个古老的德国城市，在 1919 年被规定为处于国际保护之下。在这一点上，虽然犹犹豫豫，但是英国政府改变了方针，并向波兰、罗马尼亚、希腊和土耳其提供了反对侵略战争的保证。它也开始与苏联进行谨慎的谈判。

苏联的政策依然难以琢磨。看起来，只要西班牙内战能吸引德国



1939－1945 年战争期间的欧洲

的注意力，斯大林仍然会支持共和国政府，但同时也在寻找其他拖延时间的办法以防止苏联遭到来自西边的攻击，这是他一直担忧的。在他看来，是存在这种可能的：英国和法国会怂恿德国进攻苏联，以减轻来自这个敌对的工人阶级国家的威胁。毫无疑问，英法可能会这样做。957 与英国或者法国合作反对德国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即使他们愿意这样做，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不穿过波兰，苏联军队不可能接近德国，而波兰人是不可能同意的。因此，当一位苏联外交官听说慕尼黑决定后对法国同行说，这没什么，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只是波兰面积的四分之一。1939 年夏，苏联和德国进行谈判。他们相互进行了激烈而不愉快的抨击：布尔什维克-斯拉夫式的野蛮和法西斯资本主义的剥削，之后德国和苏联在 8 月就两国瓜分波兰签订协议。在这个条约的保证下，希特勒发动了对波兰的进攻。两天后，英国和法国履行其对波兰的

保证,对德国宣战。

英法政府十分不情愿这样做,因为很明显它们不能给波兰提供什么帮助。这个不幸的国家再次灭亡,战争爆发后一个月它被德国和苏联瓜分了。但不干预就意味着默许德国对欧洲的统治,因为其他国家将认为拥有英国或法国的支持没有价值。所以,欧洲仅有的两个宪政大国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的威胁时,没有了 1914 年一战爆发时的兴奋,而是充满了不安。无论是他们的人民,还是政府都没有热情承担这个角色;并且自 1918 年以来自由和民主力量的衰落,使他们处在一个远逊色于 1914 年协约国所处的位置,但希特勒的一系列侵略、出尔反尔以及相伴随的烦恼使人们很难看到什么样的和平会让他们安心。1914 年战争爆发的基本原因是德意志的民族主义,但是那时德国走向战争是因为它感到了威胁,现在英国和法国正面临德国扩张所带来的危险。这次英国和法国也感到了威胁。

进攻波兰的战役很快就结束了,这六个月的战争几乎是平淡无奇的。这使许多观察家感到吃惊,也使另外一些观察家感到宽慰。机械化部队和空中力量比一战时期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因此战争进行得很平淡。第一次世界大战索姆河和凡尔登战场的"大绞杀"给英法太深的记忆以致他们只计划进行经济的攻势;他们希望武器封锁将是有效的。希特勒是不愿意去打扰他们,因为他十分希望英法保持这种和平。当英国谋求加强对斯堪的纳维亚海域封锁的时候,僵局打破了。值得注意的是,这正好与德国进攻挪威和丹麦以确保矿石供应同时发生。进攻发生在 1940 年 4 月 9 日,由此也开始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战争阶段。仅仅一个月后,德国发动了一次绝妙的入侵,首先进攻低地国家,然后进攻法国。通过阿登地区,德国一次强大的装甲攻击打开了进攻英法联军和占领巴黎的通道。6 月 22 日法国与德国签署了停战协定。到了 6 月底,整个欧洲海岸,从比利牛斯山到北开普省都在德国人的控制中。在法国投降十天前,意大利加入了德国阵营。由于担心可能落入德国人的手里,英国查封或销毁了法国军舰,此后新的法国政府——维希政府(Vichy)断绝了与英国的关系。随着贝当元帅(第一次世界大

958

战期间的英雄)就任维希政府的首脑,法国第三共和国实际上走到了尽头。随着大陆上没有留下任何的盟友,英国面临着一个远比反对拿破仑战争时期还要糟糕的战略态势。

但战争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不再孤独。英国所有的自治领和来自敌占区的海外流亡政府与英国站在一起,加入了战争。他们指挥自己的部队和挪威人、丹麦人、荷兰人、比利时人、捷克人和波兰人一起英勇斗争,他们在未来的岁月往往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最重要的流亡团体是法国代表团,但在那个阶段,他们仅是法国的一个派系,而不是它的合法政府。戴高乐将军是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他在法国签订停战协定前已离开,并被缺席判处死刑。英国仅仅承认他是"自由法国"的领导人,但戴高乐把自己看作第三共和国合法的遗产继承人,法国利益和荣誉的保管人。他很快就开始显示出自主性,这最终使他成为自克里蒙梭以来法国最伟大的"公仆"。最后,获得大西洋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港口对德国人意味着:后来所称的"大西洋战役"(由潜艇、水面和空中攻击构成的战斗,目的是为了断绝或拖垮英国的海上交通)势必更加激烈。

随即,英伦三岛面临着直接攻击。危机时刻人们已经找到了支撑国家应对如此挑战的那个人。在挪威战役失败的时候,温斯顿·丘吉尔经过一个漫长而多变的政治生涯,成为英国首相,因为没有其他人能在下议院赢得所有各方的支持。他立即组建了联合政府,并进行强有力的领导,这是英国此前深感缺乏的。更为重要的是,他通过广播发表讲话,呼吁他的人民重拾自身那些被遗忘了的品质。在遭到直接攻击后,人们很快明白,只有战胜敌人才能使英国脱离战争。 959

依靠英国雷达技术和皇家空军的英勇作战,英国赢得了 8 至 9 月在英格兰南部大空战的胜利。此后,人们更加坚信这一点了。这时,英国人才理解了马拉松战役胜利后希腊人的骄傲和轻松。丘吉尔在演讲中经常引用的一句话:"在人类战争历史中,从来没有过以如此之少的兵力取得这么大的胜利",这是真实的。这一胜利使德国海上入侵英国的计划成为泡影(虽然总是不可能一次成功的)。它还使德国人认识到

仅仅依靠空中轰炸击败大不列颠是不可能的。大不列颠的前景依然黯淡,但这场胜利改变了战争的方向,因为它是战争新时期的开始。在这个阶段,诸多因素影响使德国的注意力转向其他地方。1940 年 12 月德国开始计划入侵苏联。

那年冬天,苏联进一步向西扩张,显然是为了获得一个缓冲区以防备德国未来的攻击。对芬兰的战争使苏联获得了一块重要的战略区域。波罗的海的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共和国在 1940 年被苏联吞并。罗马尼亚在 1918 年从俄国得到的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连同布科维纳(Bukovina)北部地区现在被苏联收回。对于布科维纳北部地区,沙皇都未曾占领,而斯大林做到了。德国决定攻击苏联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苏德在苏联扩张的未来发展方向上存在分歧:德国力图使苏联远离巴尔干地区和黑海海峡。它也是为了证明,通过迅速打败苏联,德国进一步入侵英国是毫无意义的。同时,在德国发动对苏战争的决策中,也有强烈的个人性格因素的影响。希特勒一直强烈和狂热地厌恶布尔什维主义,并且一直认为作为一个低劣种族的斯拉夫人应该在欧洲东部为德国人提供生存空间和原材料。历史上,日耳曼人一直都力图将西方文明强加给东方的斯拉夫民族。这种论调是对这种古老斗争的极端和变态的演化,且得到了很多德国人的响应,并以此证明比早期任何斗争更骇人听闻的暴行的合理性。

在短暂的春季战役中,德国占领南斯拉夫和希腊(自 1940 年 10 月以来,这是意大利军队第二次被迫参与战斗),这是即将到来的大国间冲突的序曲。英国军队再次被赶出欧洲大陆。克里特岛在一次大规模的德国空降突击中被占领。现在,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大规模攻击苏联,即“巴巴罗萨计划”,这一计划以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①]的绰号命名。

960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向苏联发动了进攻,并在早期取得了巨大胜利。大量的战俘被抓获,苏联军队后撤数百英里。德国先头部队进

---

① 曾率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结果在途中溺水而死。——译者注

攻到离莫斯科几英里的地方。但这个距离是很难跨越的,在圣诞节前,苏联第一次成功的反击事实上宣布德国被牵制住了。德国已经失去了战略主动权。如果英国和苏联坚持抵抗,如果他们能保持同盟关系,即使没有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的发明(它导致战争技术的彻底调整),美国的援助也将必定增加他们的实力。当然这不意味着他们将不可避免地击败德国,仅仅意味着他们可能迫使德国进行谈判。

自 1940 年以来,美国总统认为,为了美国利益,英国应该获得超越美国公众允许和"中立法案"规定的限制。事实上,他有时巧妙地突破这两个方面的限制。到 1941 年的夏天,希特勒知道美国实际上是一个未公开的敌人。一个关键步骤是当年 3 月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根据该法案,英国在美国的资产被偿还美国债务后,美国将向盟国提供产品和服务,而不用支付现款。不久,美国政府将海上巡逻和护航进一步向东扩展到大西洋。德国入侵苏联后,丘吉尔和罗斯福进行了会晤,结果产生了一份包含共同原则的声明,即"大西洋宪章"。两国领导人共同讨论了,"在最终摧毁纳粹暴政"后,战后世界的需要。从孤立主义到"大西洋宪章",美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这也是希特勒在 1941 年 12 月 11 日(也就是在日本进攻英国和进攻美国领土的四天后)对美国宣战的背景。对美国宣战是早些时候希特勒对日本的承诺,这是他在 1941 年所犯的第二个致命且愚蠢的决定。于是,这场战争演变为全球性的。英国和美国对日本的宣战,可能会导致反对欧洲法西斯和亚洲法西斯这两个战争的迅速蔓延,只有英国同时参与这两个战场的战事。希特勒的行动使他失去了这样的机会:美国的力量远离欧洲,只在太平洋发挥作用。几个不多的单独行动明显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因为它宣布了欧洲事务在国际舞台上重要性的丧失。现在欧洲的未来不是由它自己的努力能决定的,而是由处在它侧翼的两个大国,即美国和苏联来决定。

961

日本的决定也是草率的,尽管长期以来日本的政策逻辑是以与美国发生冲突为指向的。虽然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的关系对双方有一些宣传价值,但在实际中并没有多少作用。关于挑战必然卷入战争的美

国是否危险的争论结果是影响日本政策时机选择的主要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日本要想成功地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和获取石油,需要美国默许其摧毁中国。这是美国政府不能答应的。相反,在 1941 年 10 月,美国政府加强了对日本的全面贸易禁运。

20 世纪 30 年代反动和好战势力在日本的崛起推动了对美国战争的进程。随后的是这个过程的最后阶段。此时,这已成为日本军方规划者纯粹的战略和技术问题;自从他们决定通过武力夺取东南亚他们所需的资源,所有一切安排都是围绕确定对美国战争的类型和时机。这样的决定根本就是不合理的,最终成功的机会非常渺小。国家荣誉的主张占据了上风,不过,关于最佳攻击点和时机的最终方案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日本决定从一开始就尽可能猛烈打击美国的海军力量,以便获得在太平洋和中国南海的最大行动自由。结果,日本在 12 月 7 日发动偷袭,其核心是攻击珍珠港的美国舰队。它是战争史上构思最巧妙和执行最杰出的行动之一。然而它并没有取得圆满的成功,因为它并没有摧毁美国海军的空中力量,但它使日本在两个月里享受了梦寐以求的战略自由。在珍珠港胜利后,日本面临一场注定要失败的长期战争。日本人使美国人团结了起来。12 月 8 日后,孤立主义实际上被美国抛弃了。罗斯福获得了整个民族的支持,而威尔逊从未获得过这样的支持。

几个日本炸弹甚至降落到美洲大陆,很明显,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二战更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战争。当日本偷袭珍珠港时,德国军队战斗在巴尔干地区,当时欧洲大陆仅剩下四个中立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典、瑞士。北非的战争肆虐在利比亚和埃及之间。随着一个德国代表团的到来,战争延伸到叙利亚。由德国空军支持的伊拉克国民政府被英国部队解散了。伊朗已由英国和苏联军队在 1941 年占领。在非洲,埃塞俄比亚获得解放,意大利的殖民帝国倒塌了。

962

随着远东战争的展开,日本也摧毁了该地区的殖民帝国。在几个月里,他们占领了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马来亚、菲律宾群岛。他们穿过缅甸推进到印度边界,并很快从新几内亚轰炸了澳大利亚北部的达

尔文港。与此同时，德国的潜艇部队、飞机和海上突击舰参加的海战遍布大西洋、北冰洋、地中海和印度洋。只有极少数国家未卷入这场战争。二战的需求是巨大的，对全社会的动员程度比一战又推进了一步。美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它巨大的制造能力为同盟国提供了无可争议的物质优势。

尽管如此，前进的道路依然艰难。1942 年上半年对联合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黯淡的阶段。依靠四场不同的重大战役，反法西斯战争迎来了转折。在 6 月，攻击中途岛的日本舰队受到美国作战飞机的重创。日本航空母舰和机组人员损失严重以致日本舰队从此失去了战略主动。而美国在太平洋的长期反击开始了。随后，11 月初，在埃及的英国军队决定性地击败了德国和意大利，开始向西挺进力图最终将所有敌人驱逐出北非。在英美军队于法属非洲殖民地登陆的同时，阿拉曼战役打响了。随后他们向东进军，到 1943 年 5 月，德国和意大利在非洲大陆的抵抗停止了。在此六个月前，即 1942 年底，苏联在伏尔加河流域的斯大林格勒遏制住了希特勒贸然部署的德国军队。1943 年 2 月，进攻斯大林格勒的残余德军投降，这是德国在苏联所遭受的最令人泄气的失败，但这只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三个月冬季攻势的一部分。冬季攻势的胜利是东部战线的转折点。

还有一个盟军的伟大胜利，虽然没有具体的日期，但同样重要。这就是大西洋战役。1942 年盟军的商船损失达到高峰，在年底有近 800 万吨商船被德国的 87 艘 U 型潜艇击沉。在 1943 年这个数字分别为 325 万吨和 237 艘 U 型潜艇。在春季几个月的战斗中盟军取得了胜利。仅 5 月份，就有 47 艘 U 型潜艇被击沉了。对联合国家而言，这是所有战斗中最重要的战斗，因为联合国家可以顺利得到美国的援助。

963

拥有制海权使盟军重新进入欧洲成为可能。罗斯福同意优先击败德国，但在法国登陆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苏军压力的准备工作不可能在 1944 年前完成，这令斯大林很生气。1944 年 6 月，英美军队在法国北部的登陆是历史上最大的海上远征。那时墨索里尼政权被意大利人推翻，盟军已经从南部攻入意大利。当时，德国要在三个战线上作战。

在英美诺曼底登陆后不久，苏联进入波兰。苏联推进的速度比他们的盟友快，但要到明年4月苏军才能到达柏林。在西线，盟军打败了意大利进入到中欧，从低地国家进入德国北部。顺便说一下，大规模的空中进攻给德国城市造成了可怕的破坏。它一直持续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但并没有产生决定性的战略作用。当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废墟中的一个掩体里点燃了大火自杀时，历史悠久的欧洲，无论是实际上还是比喻意义上，处在一片废墟中。

在远东的战争持续时间稍长些。1945年8月初，日本政府知道它必定被打败。许多被日本占领的地方被收复，日本城市被美军的轰炸所摧毁；从入侵以来，日本联络和安全所依赖的海上力量也被摧毁了。同时，美国投下了两枚破坏力至今还未消除的核武器，给两个日本城市造成了可怕的影响。在两次核武器爆炸之间，苏联对日宣战。9月2日，日本政府放弃了最后一搏的自杀式计划，并签署了一份命运被控制的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走向尾声。

二战巨大的影响带来的直接后果是难以衡量的。只有一个明确和毫不含糊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即推翻了纳粹政权。当盟军进入到欧洲，随着集中营的打开和对集中营中暴行的持续揭露，纳粹政权的恐怖和酷刑制度的最深罪恶被揭露出来。这时人们才突然清楚地发现丘吉尔讲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丘吉尔曾告诉他的同胞："如果我们失败了，那么全世界，包括美国在内，包括我们知道的和关心的国家，将陷入一个更加阴险，也许更加漫长的新的黑暗时代的深渊。"这种威胁的现实，可首先在贝尔森(Belsen)和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看到。区分政治犯、来自其他国家的干苦役的劳动者及战俘所受暴行的程度，这几乎没有意义。德国人系统地消灭欧洲犹太人的尝试，即所谓的"最终解决方案"，极大地改变了欧洲人口版图：波兰的犹太人几乎被消灭，荷兰的犹太人也大大减少。这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虽然永远不可能得到完整的确切数字，但大约有500万到600万的犹太人被杀害，他们在东欧和东南欧的毒气室以及屠杀营的火葬场被枪杀和灭绝，或因过度劳累和饥饿而死。

964

众多人口和国家投入到这场战争,不是因为他们将这次战争看成反对邪恶的斗争。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当这场战争被赋予了道德意义时,他们中许多人感到了振奋。这要归因于战争的宣传。当英国是欧洲惟一坚持为生存而战的国家时,英国社会曾试图这样看待这场战争:斗争的积极意义超越了生存和纳粹主义的破坏。对新世界大国间的合作以及经济社会重建的愿望,体现在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家中。人们为盟国间的美好愿望以及短暂出现的利益和社会观念差异的模糊感到鼓舞。随着和平的到来,许多战时的虚华辞藻带来了自食其果的严重后果;美好理想也幻灭了。然而,这是因为1939至1945年的欧洲战争在一定形式上仍然是一场道德斗争,或许,这种形式是其他大国之间的战争中不曾有过的。记住这点很重要,因为关于盟军胜利的令人遗憾的结果,人们听的太多;人们常常很容易遗忘这场战争曾粉碎了对自由文明最严重的挑战。

一些有远见的人,在此可以看出一个深刻的讽刺。在许多方面,德国曾是欧洲最先进的国家之一;许多体现在其文明的精华部分。德国集体紊乱产生的恶劣影响,表明德国文明的根源存在错误。纳粹主义的罪行不在于进行了忘乎所以的野蛮的征服,而在于其以系统的、科学的、有控制的、官僚系统(虽然往往效率不高)的方式进行征服;这种方式除了令人震惊的结果外没有什么是不合理的。在这方面,亚洲的战争明显的不同。一段时间里,日本帝国主义取代旧的西方帝国主义,但是许多被统治民族对这种变化并不十分后悔。战争期间的宣传力图使"日本法西斯"这个概念得到认同,但这个概念是对极其传统的日本社会特性的曲解。德国统治下欧洲国所面临的可怕后果不会发生在日本统治的地区。

965

战争的第二个明显结果是其无与伦比的破坏性。这在德国和日本被摧毁的城市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这些地方,大规模的空中轰炸(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创新之一),比西班牙内战中对城市的轰炸,更能证实战争带来了更加惨重的生命和建筑物损失。然而,即使是那些早期论文也足以让许多观察家相信单纯的空中轰炸可以使一个国家瘫

痪。事实上,虽然战略轰炸往往与其他战斗形式的联合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英国皇家空军从 1940 年开始对德国进行战略轰炸,起初规模很小,从 1942 年得到美国的稳步配合后,规模逐渐扩大,其在联合作战部队的指引下对目标进行了昼夜不停的轰炸。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这种战略轰炸所取得成果还非常微小。对日本城市的猛烈轰炸在战略上并不像消灭其海上力量那样重要。

不仅城市被摧毁,中欧的经济生活和通讯也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1945 年,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徘徊在中欧,试图返回家园。由于食品供应困难,这里存在着严重饥荒和流行病的危险。1918 年的巨大问题再次降临欧洲,但这次面临问题的国家由于被打败和占领而士气低落;只有中立国和大不列颠逃脱了这些灾难。大量的武器掌握在私人手中,有些人害怕会发生革命。在亚洲也可以发现这些情况,但这里的物资破坏不太严重,复苏的前景更好。

战争带来的巨大政治影响十分明显。欧洲的权力结构直到 1914 年才形成,并在两次世界大战间得以勉强地延续,在 1941 年就瓦解了。两个外围的大国在政治上主导了欧洲,并在军事上于欧洲中心地区确立了大国地位。在 1945 年 2 月盟国领导人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秘密与斯大林就苏联参加对日战争的条款达成一致,这是最明显的表现。雅尔塔会议还为三个大国达成一项共识奠定了基础。它是欧洲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最接近正式和平协议的共识。其结果是旧的中欧消失了。欧洲将被分为东西两半。的里雅斯特-波罗的海分界线再次变成了现实,但这时在旧的分界线上又添加了新的差异。在 1945 年年底,除希腊外,欧洲东部国家都建立了共产党政府或者共产党与其他派别共同执政的政府。苏联军队在这些国家的蔓延,证明他们本身相比革命,是更加有力的国际共产主义的扩张工具。战前就存在的波罗的海共和国未能从苏联分离出来,当然,这时苏联也占有了战前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部分领土。

966

德国作为老欧洲权力结构的中心,确确实实不复存在了。它主导欧洲历史的阶段结束了,俾斯麦缔造的德国被苏联人、美国人、英国人

和法国分区占领了。西欧其他主要政治力量在占领和失败后进行了重组,但十分软弱;在墨索里尼被推翻后,意大利加入了盟国,像法国一样,意大利国内存在一个力量大大加强和规模扩大的共产党,仍然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只有英国保持了1939年时在世界的声望,甚至在1940和1941年暂时提高了,并且她在一段时间里获得了公认的和苏联及美国平等地位(形式上,中国和法国也是大国,但被人们忽视了)。然而,英国的时代已经过去。通过巨大努力动员超常的国家资源和社会力量,英国才能够保留其地位。但它留下了一个战略僵局,只有德国能攻击苏联,并且只有依靠美国的租借,才能维持下去。这种援助不是没有代价的:美国人坚持英国通过出售海外资产,以满足即将通过的租借法案。此外,英镑区已经无法正常运转了。美国现在大规模地将资本投向英国的自治领。从自身新的战时实力和依靠母国保卫自己防卫的弱点中,这些自治领学到了新的经验教训。从1945年开始,它们越来越多并正式地独立行事。

只用了几年时间,最大的老牌帝国主义的位置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就清晰起来。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当1944年英国在欧洲进行最后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时,这次行动是由一位美国将军指挥的。虽然英国军队在此后的几个月里在欧洲可以和美国人匹敌,但到战争结束时,他们在数量上已被美军超过了。在远东也是一样,尽管英国重新征服缅甸,但打败日本的是美国海军和空军。尽管丘吉尔作出种种努力,罗斯福在战争谈判结束前,还是越过丘吉尔与斯大林商谈,除此之外,他还建议拆散大英帝国。尽管它独自胜利地抵抗了德国攻击并且赢得了崇高的道德威信,但英国没有逃脱战争对欧洲政治结构造成的惊天动地的影响。事实上,在某些方面,德国的情况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967

因此,欧洲霸主地位在欧洲的丧失在其周边也可见一斑。英国政府最后一次成功地短暂挫败美国政策的努力是,英国军队确保会及时将荷兰和法国在亚洲的领地交还给他们,并且防止反殖民制度的力量夺取权力。但是,与叛乱分子的战斗几乎立即开始;很明显,帝国主义国家面临着一个困难的未来。战争也给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带来了大变

革。权力的万花筒已巧妙、突然地发生转移;当战争宣告结束时,它仍然在转移中。因此,1945 年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停顿点;当时,现实仍然有些被表象所掩盖。但很多欧洲人还是痛苦地发现,欧洲的帝国时代已经结束。

六、一个新世界的形成

968 一战后，仍可能存在一种错觉，那就是旧秩序会被恢复。但到了1945年，没有一个权威人士还相信这种事。对本世纪重新安排国际生活秩序的两次重大努力的环境进行比较是有益的。当然，这两次重大努力没有一个是从一开始计划就不存在失误的。当时发生的事情已关闭了许多可供选择的途径，并且关于战后该如何做的重大决议已被提出，一些获得赞同，而另一些未得到认同。建立一个新国际性的组织来维持国际和平，成为二战期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大国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组织，美国人将其作为通过法律来规范国际生活的开始，俄国人将其作为维持大国联盟的工具，但是这未能阻止大国推动这个国际组织的向前发展。所以，1945年联合国组织在旧金山成立。

关于国联未能发挥应有作用，人们很自然地做了许多思考。1945年，被避免的国联缺陷之一是：美国和苏联从一开始就属于这个新组织。除此之外，联合国的基本结构大体类似于国联。其两个主要的机构是小规模的理事会和大规模的全体大会。所有成员国常驻代表都将出席联合国大会。起初安理会只有11个成员，其中5个是永久性的，分别是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在温斯顿·丘吉尔的坚持下进入安理会）和中国。安理会被赋予了比旧的联盟理事会更大的权力，这很大程度上是苏联人努力的结果。苏联人相信他们几乎不可能在起初只有

51个国家代表出席的联合国大会上获得多数票,因为美国不仅能获得盟国的投票支持,而且还可以获得其在美洲卫星国的赞成票。当然,不是所有小国都喜欢这样。他们对这个机构感到不安:在这个机构里小国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获得有最后表决权的席位,而大国在其中发挥着主要作用。然而,大国所希望的组织结构被采纳了,因为事实上只要任何组织能够起作用就必然会这样。

969

另外一件引起严重的宪章争议的重大事件是,否决权被给予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大国要接受这个组织,这是必然的,尽管否决权最后会受到一些限制,因为常任理事国不能阻止特别是影响到自身事件的调查和讨论,除非这些事件有可能导致不利于其利益的行动。

理论上,安理会拥有非常大的权力,但是,常任理事国的行动必定是对政治现实的反映。在最初的十年里,联合国的重要性不在于依赖它的权力采取行动,而是在于它提供了讨论的公共场所。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公众通过广播、电影和后来的电视联系在一起,耳闻目睹联大讨论主权国家间的事务。这是非常新鲜的事情。联合国立刻给予国际政治新的内容;它会花更长时间为解决问题提供有效的新方案。当不可能改变人们观念的争论中日益激烈和不妥协的观点被陈述时,国际争论的新闻报道有时会给人以枯燥贫乏的感觉。但是这产生了教育意义。联大很快作出把永久性会址设在纽约的决定,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吸引了美国人对它的关注,有助于抵消孤立主义的历史性影响。

尽管如此,1946年在伦敦,联合国大会召开了第一次集会。更加激烈的争论立刻开始了,苏联士兵在伊朗的阿塞拜疆省持续驻扎的行为遭到谴责。但是,苏联人迅速地作了反击,攻击英国在希腊保持兵力。几天之内,苏联代表团投下了第一次否决票。此后有更多的否决票投下。否决权被美国人和英国人视为用来保护特别利益的非常手段,同时也成为苏联一种常见的外交技巧。1946年,联合国已经成为苏联与西方国家集团争论的舞台。这个集团还处于初期阶段,它的政策有待进一步巩固。

尽管美国与苏联冲突的起源常常能追溯到很远,但是在战争的最

后数年里,英国政府越来越感觉到美国人做了许多让步,并且对苏联过于友好。当然,一种基本的意识形态分歧总会有的;如果苏联人不总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行为根源有一种成见,他们当然也会在 1945 年后对他们的战时同盟有不同的作为。一些美国人从来不信赖苏联,并且将它看作是革命性的威胁,这也是真实的。但是这不意味着他们能对美国政策制定能起到多大的影响。在 1945 年,当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人对苏联人意图的不信任比后来要少得多。这两个国家中苏联要更多疑和谨慎。 970

在那个时候,再没有其他真正的大国了。战争已促使一个世纪前的托克维尔直觉成为现实,那就是某天美国和俄国之间将有一个会统治这个世界。关于安理会构成的所有说辞只不过是一种合法的虚构,英国严重衰落了,法国几乎不能从生不如死的占领和国内分裂势力(一个巨大的威胁它稳定的共产党势力)的困扰中崛起,而意大利的加入使得旧的纠纷更加复杂。德国成为一片废墟并被占领。日本被占领,军事上软弱无力,而中国还未成为现代强国。因此,美国人和俄国人拥有胜过所有可能对手的巨大优势。他们也是仅有的真正的胜利者,因为只有他们从战争中获得了显而易见的收获。所有其他胜利国最多赢得的是幸存或复兴。对于美国和苏联而言,战争带来了新的帝国。

尽管苏联帝国是以巨大代价取胜的,但是它现在比沙俄统治时更强大。苏联军队统治了一个巨大的欧洲区域,其中许多地方是苏联本国领土;剩下的区域在 1948 年被组成了一个个国家,实际上就是卫星国,其中之一是东德(一个重要的工业实体)。在这片区域之外,还存在前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两个国家,它们是自战争以来仅有的没有在苏联军队帮助下获得解放的共产主义国家;在 1945 年,它们似乎是莫斯科放心的盟国。苏联的有利地位是通过红军战士浴血奋斗赢得的,同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西方政府和他们在欧洲的统帅(当进入战争最后阶段,他抵制了在俄国人之前到达布拉格和柏林的压力)所实施的决定。由此产生的苏联在中欧的战略优势更具威胁性,因为俄国在 1914 年时进入中欧的传统障碍——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现在不

971 存在了。如果美国不参与欧洲事务,人们很难期待元气大伤的英国和缓慢复苏的法国承担起抵抗红军的任务,人们也很难想象出还有谁能与之抗衡。

1945 年,苏联军队也在共产主义正在兴起的土耳其和希腊边境驻军,并占领了伊朗北部地区。在远东,他们控制了新疆、蒙古、北朝鲜的大部分地区和中国海军基地旅顺港,还占领了中国东北剩下的地区,尽管他们实际从日本夺来的惟一领土是萨哈林岛的南半部分和千岛群岛。他们其他的收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国为代价的。然而在中国,在战争结束时,人们已经能够看到一个新的被期望对莫斯科友好的共产主义国家的雏形。在过去,斯大林也许支持过不合适的领导人,但是中国共产党不再希望从其他任何人那里寻求道义和物质帮助。因此在亚洲,人们似乎也能看到一个苏联卫星国可能在形成。人们没有理由相信苏联领导者已经忘记了旧俄国成为太平洋强国的野心。

与苏联相比,新的世界强国——美国很少依赖领土的占领。在战争结束时,它在欧洲中心也有驻军,但在 1945 年,美国选民想尽可能撤军。环绕在欧亚大陆许多地方的美国海军和空军基地是另一回事。尽管苏联已成为一个远比任何时候都强大的霸主,日本海军力量的消失,飞机场岛屿的获得和制造大型快速火车技术的革新,共同使太平洋变成美国的内湖成为可能。此外,广岛和长崎已经证实了美国独家拥有的数量稀少的新武器——原子弹的威力。但是美帝国最深的根基在于他的经济实力。美国势不可挡的工业力量以及苏联红军成为盟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再者,与盟国相比,美国胜利的代价很小。美国伤亡人员比他们少,即使英联邦的人员伤亡也很惨重,苏联的伤亡人数也很庞大。美国主要基地没有受到敌军的重大攻击和破坏,它的固定资产完好无损,它的资源也比任何时候都强大。它的公民认为他们在战时的生活标准实际上提高了;军备计划使罗斯福新政都未能克服的经济大危机消失了。美国是一个信誉大国,因为其资本能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海外投资,而其他国家无法做到。最后,它以前的商业和政治对手正在

972 缓慢复苏。因为资源的缺乏,它们的经济逐渐被纳入到美国的范围。

结果导致美国力量在世界范围的间接崛起,这在战争结束前就已初现端倪。

在欧洲的战斗停止以前,人们依稀看到未来大国两极化的趋势。比如,很清楚地,苏联人不被允许参与意大利的占领或殖民帝国瓜分,英国人和美国人不希望出现斯大林想要的波兰解决方案。尽管他们的活动范围在他们自己的半球,但是美国人不太乐于接受限制明确的势力范围,而苏联人更愿意将它们作为活动基地。当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被推定是由他们当中任何一方挑起时,人们没有必要在假设中加入太多的分歧,尽管这种假设在战后很多年成为趋势。一些表象是不真实的。因为在 1945 年,美国所有的势力几乎没有利用这种分歧的政治意愿;胜利后美国军方头等重要的事就是尽可能快地裁军。就在日本投降前,美国国会 1941 年通过的与盟军的《租借法案》被取消了。这进一步降低了美国间接的国际影响力;它也削弱了很快就会需要帮助的盟友,而这些盟友现在正面临着重大的复苏问题。他们无法提供一个新的安全体系来替代美国势力。除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原子弹是不能被使用的,因为它们的杀伤力太强大了。

人们很难确定斯大林统治的苏联正在干什么。它的人民很明显遭受到了可怕的战争苦难,可能比德国人遭受的还要严重。没有人能够提供准确数据,但是似乎有超过两千万苏联公民已经死亡。战争结束时,斯大林也许也意识到了苏联的虚弱,而不是苏联的强大。确实,他的统治方式缓解了裁撤赋予他欧洲霸权地位的庞大陆军的需要(比如面对西方国家)。但是苏联既没有原子弹,也没有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轰炸机部队,斯大林发展核武器的决定进一步加重了当时苏联经济的压力,那时国民经济重建是非常必要的。战后时期,如同 20 世纪 30 年代的工业化竞争时期那样残酷。然而 1949 年 9 月,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了。在第二年的 3 月,苏联官方宣布拥有了原子武器。到那时,很多事情改变了。

逐渐地,两个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在那时严重恶化。这是欧洲发生事情的主要结果,1945 年这片区域最需要的是进行富有想象和

973

合作的重建。战争破坏的代价从未有过精确的测算。除去俄国人,大约有 1 425 万欧洲人死去。最贫困国家的那些幸存者居住在一片废墟中。有人估计,在德国和苏联大约有 750 万套住宅被毁坏。工厂和交通设施都被摧毁。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偿付欧洲所需的进口物资并解决金融体系的崩溃;盟国占领军发现,香烟和罐头牛肉比金钱更好。文明社会不仅在纳粹战争的恐怖下让步,而且因为纳粹的占领把说谎、欺诈、欺骗和偷窃变成行为美德;它们不仅是生存的必要,同时它们可以被美化为"抵抗"行为。反对德国占领军的斗争孕育了新的分歧;随着盟军的进军,国家被解放了,随之而来的行刑队开始行动起来,被杀的人数超过了以前的记录。据说,法国解放过程中的"纯洁化"造成的死亡,比 1793 年大恐怖时期还要多。

欧洲经济结构的瓦解比 1918 年更彻底。工业德国曾经是欧洲经济生活中的飞轮。但是,即使有了交通设施和机器生产能力的恢复,盟军也会坚决第一个压制德国的工业生产,以防止它的复苏。其次,德国被一分为二。从一开始,俄国人就已经并且将来还会剥夺德国的固定设备,将它们作为恢复遭受蹂躏国土的"赔偿";德国仅在从俄罗斯的撤退中就摧毁了 39 000 英里的铁路轨道。苏联可能已经失去了其总固定设备的四分之一。

东欧和西欧之间的政治分歧在战争结束前日趋明显。尤其是英国对波兰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这似乎表明,苏联将只能容忍屈从的东欧政府。美国人为东欧人自由选择自己的统治者所作的设想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直到战争结束,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美国公众都没有非常关注或者怀疑他们能与俄国人达成合理协议。从广义上讲,罗斯福一直相信美国可以与苏联友好相处;他们的共同点在于抵抗德国势力的复兴和破坏旧的殖民帝国。无论是罗斯福还是美国公众都意识到俄国政策的历史趋势。他们强烈反对英国军队打击希腊寻求在德国撤军后推翻君主制的共产党人(斯大林并不反对:他和丘吉尔达成一致,作为苏联在罗马尼亚拥有自由处置权的交换,英国在希腊应该拥有自由处置权)。

974

杜鲁门总统(1945 年 4 月罗斯福逝世后的继任者)以及他的顾问由于他们在德国的经历而很大程度地改变了美国的政策。俄国人一丝不苟地履行着达成的协议,允许英国和美国(以及后来的法国)的军队进入柏林,并且分享被他们征服的这个城市的管理权。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希望德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被统治(就像 1945 年 7 月战胜国在波茨坦的设想),因为这会让他们掌控鲁尔,一个潜在的赔偿宝库。然而,德国经济很快就孕育出东西方之间的摩擦。苏联抵制德国复兴确保安全的努力,导致其占领区从其他三个占领国中逐渐地实际分离。苏联最初打算为一个统一的德国提供一个坚实可靠的核心(即共产主义),但是它最终导致了德国问题的分区解决,这是任何人都没有想象到的。首先,除了东方占领区,西方占领区因为经济原因成为一个整体。同时苏联占领的政策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不信任。共产主义在东德的牢固确立似乎重复着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模式。1945 年,只有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拥有共产党多数派,在其他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只能分享联合政府的权力。然而,看上去这些政府实际上逐渐成为苏联的傀儡。1946 年一个集团已经在东欧出现。

斯大林显然很担心德国的重新统一,除非在一个他能控制的政府之下实现统一;苏联很难从太多的来至西部的攻击回忆中去相信一个统一的德国。一个卫星国是不会有侵略的潜力的。无论苏联政府意识形态的特点是什么,这是俄罗斯人的真实想法。一个统一的德国可能是资本主义的,这只能使情况变得更糟。不过,在其他地方,苏联的政策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当仓促间组建的东德站在了欧洲大陆上逐渐出现的苏联集团一边时,在中国,苏联仍然正式支持国民党。另一方面,在伊朗,苏军很明显不愿意履行早已达成的撤军协议。即使当他们最终离开,他们在阿塞拜疆留下了一个附属的共产主义共和国——后来被伊朗人消灭,因为 1947 年美国人给予了伊朗军事援助。在安理会,苏联的投票越来越习惯于阻挠以前的盟友,很明显,西欧的共产党被苏联的利益所左右。然而,斯大林仍然在不确定地盘算着,也许他在等待、期待甚至在依靠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瓦解。

975

曾经的盟友依然对苏联怀有善意。1946 年,温斯顿·丘吉尔发表了《铁幕演说》,这并不是为了他的同胞,也不是为了美国的观众,而是为了吸引日趋分裂的欧洲的注意力;一些人谴责了他。然而,尽管 1945 年当选的英国工党政府首先希望进行“左派与左派的对话”,但这很快就遭到了质疑。1946 年,英国在希腊的干预实际上使得自由选举成为可能,而美国官员对苏联政策的倾向更有经验;此时,英国和美国的政策开始趋同。杜鲁门总统在支持苏联离开方面没有任何偏见。此外,如今英国已经很明确地离开印度,这符合美国的官方观点。

1947 年 2 月,英国政府发给杜鲁门的信息,也许比其他任何形式更加承认了一个长期以来不愿承认的事实,那就是英国不再是一个世界强国。由于战争期间巨大的消耗,英国经济已经被严重的破坏,迫切需要国内投资。非殖民化的第一阶段也是非常昂贵的。一个结果就是,到 1947 年,只有从希腊撤军,英国才能维持财政收支平衡。杜鲁门总统立刻决定美国必须填补这个空白。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给予希腊和土耳其财政援助,是为了让两国能够在苏联的压力下生存下来。他特意提醒注意这样做的含义,远远超过了支持两个国家。尽管只有土耳其和希腊将接受援助,但是他有意提议美国领导世界上所有“自由人民”在美国的支持下抵制“少数武装或者外来压力所施行的征服活动”。1945 年美国似乎很明显地要重走孤立于欧洲事务的老路,现在情况逆转了,这是美国外交政策历史传统的巨大突破。这个被称为“遏制”苏联力量的决定,可能是自购买路易斯安那以来美国最重要的外交。这是由此前一年半里苏联的行为和斯大林政策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恐惧所导致的,也是由于英国的虚弱导致的。最终,这将导致对美国实力有效边界的不切实际的评估,并且批评者说,当它的政策被扩大到欧洲之外时,这将导致一个新的美帝国主义,但是这在当时并没有看到。

976

几个月以后,“杜鲁门主义”形成了,它是由另一个更加缜密的步骤完成的,那就是提议美国经济援助欧洲国家,使他们能够联合起来谋划经济的复兴。这就是马歇尔计划,以宣布这项计划的美国国务卿名字

命名。它的援助是以非军事、非攻击性的方式来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这让每个人都很惊讶。英国的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是第一个领会其含义的欧洲政治家。他和法国迫切要求西欧接受这个提议。当然,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接受了。但是俄国人不会参与,也不允许它的卫星国这样做。相反,他们猛烈地攻击这个计划。当捷克斯洛伐克联合政府也婉言拒绝坚持参加这个计划时,整个国家(东欧惟一一个政府没有完全被共产主义者控制的国家,并不被认为是苏联的卫星国)显然很沮丧地不得不站在了苏联一边。1948 年 2 月共产主义者发起的政变取代了政府,这使捷克斯洛伐克独立自主的任何残留的信念都被消灭了。另一个苏联不妥协的标志是一种旧的战前宣传机构,即共产国际,其在 1947 年 9 月以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Cominform)的形式复活了。它随即开始谴责马歇尔计划是一个赤裸裸地掠夺和扩张的过程……这是为了美帝国主义建立世界霸权。最后,当西欧建立起一个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来施行马歇尔计划时,苏联人通过组织东欧国家建立经济互助委员会来回应。经济互助委员会是苏联实现东欧指令性经济一体化的门面。

冷战(后来被命名的)开始了。欧洲战后历史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全球历史的下一个阶段将持续到 20 世纪 60 年代。在这个阶段,苏联和美国领导的两个国家集团在主要竞争者之间利用除战争外的一切办法努力度过一系列的危机来保证自己的安全。意识形态的方式被使用的最多。在一些后来加入西方集团的国家里,冷战也以内战或接近战争的形式出现,或者以关于价值道德争论的形式出现,诸如自由、社会正义、个人价值观。冷战的一些斗争是在边缘地区进行宣传或颠覆,另一些则是由两大国支持的游击活动。幸运的是,他们总会在使用核武器这个临界点上停止斗争,因为威力日益增强的核武器使得获得胜利的想法越来越不切实际。冷战也是一种通过成功国家对卫星国和中间国家提供援助的方式进行的经济竞争。无法避免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僵化混在了一起。可能冷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是一种几乎波及全球的祸害,是罪恶和腐败渗入的源头,

977

是持续了 30 年的苦难。

现在回想起来,尽管它产生了难以言表的暴行,但是冷战现在看上去就像发生在 16 至 17 世纪欧洲的复杂宗教斗争,当时意识形态能够引发暴力、狂热,甚至有时能够动员信念,但是永远无法完全涵盖那时复杂的局势和不同的信仰。尤其是,它无法包含关系到国家利益的东西。就像过去的宗教斗争,尽管很快每一个迹象都会表明,特定的争吵也许会逐渐平息,灾难会被避免,但是它的言论和神话在它们停止反映现实后还会长期存在。

跨越冷战的头等重要的复杂情况是越来越多新兴国家的出现,但它们并没有对冷战任何一方表示坚定的承诺。许多新兴国家诞生于 1945 年后的十年里,它们是非殖民化的结果。

在世界一些地区,这引起了许多比冷战本身更多的动荡。联合国大会作为一个平台,比起冷战宣传,它更关注反殖民宣传(尽管这两者经常被混淆)。虽然短命的欧洲帝国已成为世界历史的一种现象,但是它的消逝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一般来讲,每一个殖民地和每一个殖民政权都是一个特例。在某些地方——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现代化的进程刚刚开始,而殖民主义留下很少能够建设的东西。在另外一些地方——法国的北非地区是一位典型的例子——殖民地政府(事实上,严格地说阿尔及利亚根本不是一个殖民地,而是作为宗主国法国的一部分被管辖)不能忽视长期定居的白人居民。相反,在印度,英国人的存在在印度争取独立的过程中没有多大重要意义。独立进程的时间在不同地区也有很大区别;到 1954 年,欧洲在亚洲任何程度上的统治都消失了,而非洲在未来十年内才刚刚摆脱殖民主义,葡萄牙的殖民统治甚至持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但是,在南部非洲,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在其他方面也是例外的,就像阿尔及利亚和印度支那,他们是殖民地政权和土著居民之间艰苦斗争的区域,而在其他非洲殖民地,权力相对和平地移交给继任的精英(他们的优势在数量上各不相同,对于管理国家的任务来说他们是合格的)。在一些国家——印度和印度支那是典型的不同的例子——在帝国统治者(英国不像法国,它已经作

978

出了重要让步)到来之前就存在真正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组织,而在非洲大部分地区,民族主义是新生事物和独立的结果,而不是起因。

尽管情况有所不同,但是1945年以前亚洲殖民地的人民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这是很有意义的。在1939年以前,这不仅是一个让步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战败的结果;1940至1941年欧洲帝国主义被日本夷为平地。它不仅仅是一个在特定的殖民地帝国权力替换的问题。1942年,在新加坡有六万多英国、印度和自治领士兵投降,这表明欧洲在亚洲的帝国已经瓦解了。这比约克镇不可避免的投降更糟糕。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有时表现出他们新的征服行为,而这几乎不被关注。甚至他们这种恶劣的暴行也没有疏远占领区的人民,而是找到了许多合作者,其中包括民族主义政治家。盟军给那些他们认为可能抗日的力量投送武器,这带来的可能仅仅是这些武器被用来抵抗他们的重返。此外,与欧洲因轰炸、征兵、饥饿、战斗和疾病带来的动荡相比较,亚洲的许多村庄以及大部分农村生活继续在日本统治下,几乎不受干扰。到1945年,亚洲发生变化的潜能十分巨大。

帝国主义注定要失败,因为两个主要的世界强国都反对它,起码反对其他民族的帝国形式。由于截然不同的原因,美国和苏联均致力于破坏殖民主义。1939年以前,莫斯科为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庇护和支持。美国人以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来理解《大西洋宪章》中宣称的各国有权利选择自己政府的意义;它被签署仅仅几个月以后,美国副国务卿宣布说“帝国主义时代结束”。苏联和美国的代表发现,共同签署“联合国宪章”以肯定殖民地独立的最终目标并不困难。然而,大国的关系没有保持不变的。虽然在1948年美、苏十分清晰地划定了彼此的界线并保持了40年不变,但是远东的外交格局仍然在很长的时间内受到怀疑,部分原因是由于出现了新的大国,部分是因为帝国统治消失导致的不确定性。

979

有些人一直认为,印度一旦自治后,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亚洲强国。1939年之前,概括地说,当讨论英国统治的时间表和殖民统治被替代时,许多英国人赞成印度独立,希望一个新的印度保持与英联邦国

家(这是 1926 年御前会议后给定的帝国正式的名称)的联系。那次会议还第一次提出了“自治领地”这个官方名词,它是效忠英国君主的英联邦的独立联盟,能够完全独立掌控内部和外部事务。尽管许多人认为,对于印度来说这是一个可以想象的目标,但是直到 1940 年没有一个英国政府承认这个直接目的。尽管过程很曲折,但在此之前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印度没有像在中国所发生的那样彻底的对西方的反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印度政客们已经深感失望。他们大部分恢复了对英国君主的忠心;印度在劳力和金钱方面对帝国战争的努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后来被看作是印度民族之父的甘地也认为这会带来应有的回报。1917 年,英国政府宣布,它赞成在帝国内对印度负责任的政府实施稳步发展的政策——即所谓的地方自治——尽管这离一些印度人一开始所寻求的目标不远。虽然 1918 年推行的改革依然令人失望,但是这使得一些温和派感到满意,即使这些有限的成功随之很快消退。作为国际贸易条件的经济越来越糟糕。在 20 世纪 20 年代,印度殖民政府已经顺从印度人的要求,终止有利于英国的商业和财务安排,并坚持帝国政府对印度在帝国国防中的恰当贡献支付费用。很明显,一旦进入世界不景气,伦敦不可能再被允许使印度的关税政策以适应英国工业发展。在 1914 年,印度纺织制造只满足了全国四分之一的需求,而这一数字在 1930 年已成为一半。

那时依然阻碍事态发展的一个因素是在印度的英国团体的持续的隔离状态。坚信印度的民族主义是少数雄心勃勃知识分子的问题,这迫使殖民当局对阴谋采取强硬措施。这对面临布尔什维克革命影响的统治者是有吸引力的(虽然直到 1923 年印度共产党才成立)。结果是对嫌疑犯的正常法律保障被暂停,这违背了印度立法会所有成员的愿望。这激起了甘地领导的第一次罢工与非暴力和平反抗运动。尽管他努力避免暴力,但还是有暴动发生。1919 年在阿姆利则,一些英国人被杀、被袭击后,一个将军愚蠢地决定以武力驱散人群,将此作为英国人决心的例子。射击停止后,近四百印度人死亡,逾千人受伤。当居住

980

在印度的英国人和一些议员对这件事大声叫好之时，英国的信誉愈加受到不可弥补的打击。

随后印度经历了一段联合抵制和内乱的时期，期间甘地的计划被国会通过。虽然甘地本人强调，他倡导的运动是非暴力的，不过仍然有很多骚乱，1922 年他第一次被捕并关押(因为他可能会有在监狱中死亡的危险，所以很快就被释放)。接下来几年里印度未再发生重大动荡。1927 年，英国的政策又开始缓缓向前推进了。一个委员会被派往印度研究修改宪法的最后系列工作(虽然这造成更多的麻烦，因为委员会中没有印度人)。维持民族主义者之间团结的大部分热情到现在已经消失，并且有分裂的危险，只是甘地的努力和威望才将那些坚持完全独立要求的人和那些致力于自治地位的人联系在一起。在任何情况下，印度国大党的国民大会并非像其言论所说的那样结构坚固。与其说它是一个有着深厚群众根基的政党，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当地头面人物和利益集团的联盟。最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仍然存在着不断深化的严重分歧。在 20 世纪 20 年代还发生过公共骚乱和流血事件。到了 1930 年，穆斯林政治联盟的主席建议，印度未来的宪法发展应包括在西北部建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政权。

这是一个充满暴力的一年。英国总督宣布，召开会议以实现自治领地的目的，但这一承诺因为英国的反对而毫无意义。因此，甘地不会参加。当危难随着世界经济大萧条而加深时，非暴力不反抗运动得以恢复并且更激烈。在国大党党员的呼吁下，农村群众更迅速地被动员起来；由于国大党国民大会改而考虑群众利益，这使得甘地这位印度头号政治家能够号召全印度范围内的追随者。

981

在吸取辩论和 1927 年委员会的教训之后，印度当局如今开始转变方向。1935 年出现了真正的权力和任命权的下放，只留下诸如国防和外交事务等由总督单独控制，当时政府的印度法案获得通过，进一步推动了议会责任制政府的建立。这是英国立法的结果，尽管法案中关于国家权力的转移并未完全实施。但那时它们已经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搭建了框架。愈发明显的是，在所有层面上，印度人之间的决定性斗争将

在国大党中展开。1935 年的法案进一步确认独立的团体代表制原则，它的实施几乎立刻挑起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更深的敌意。国大党至今追求的是建立一个印度教组织(尽管它拒绝承认穆斯林联盟是穆斯林的惟一代表)。但是,国大党也有它内部的问题。一些成员仍希望向独立迈进,而另一些人则开始对日本的侵略警觉起来,愿意与帝国政府合作使新的机构运作起来。英国下放权力的实际行动势必会造成分裂,不同的利益团体开始努力确保自身在不确定的未来里的利益。

因此,到了 1941 年,这一浪潮汹涌澎湃。如果不是从民主角度来看,印度在近二十年的地方政府中设立代表机构以及高级公务员的逐步印度化,已创建了一个必须取得其精英的实质性同意才能进行管理的国家,这个国家已做好了自治的准备。尽管战争的逼近令英国人越来越意识到他们需要印度的军队,但他们已经放弃让印度为战争买单的企图,而且直到 1941 年他们还承担着印度现代化的费用。随后,日本的进攻束缚了英国政府的手脚。英国向印度的民族主义者承诺战后实行自治以及赋予其从英联邦脱离的权利,但为时已晚;现在他们要求立刻获得独立。他们的领导人遭到逮捕,印度继续着英国的统治。1942 年的叛乱比近一个世纪以前的兵变更迅速地被镇压下去,但是如果英国想平静地离开已经没有时间了。一个新的因素便是来自美国的压力。罗斯福总统秘密地与斯大林讨论为印度的独立做准备的必要(正如亚洲的其他部分一样,包括法属印度支那);美国的介入暗示其他民族的事务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就像 1917 年那样。

982

1945 年,长期将印度和缅甸的独立作为其方案一部分的工党在国会掌权。1946 年 3 月 14 日,英国政府表示愿意印度完全独立,这时印度正遭受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暴乱的煎熬,它的政治家们则为未来争吵不休。近一年之后,英国宣布最迟将于 1948 年 6 月移交权力,以此胁迫印度人。族群对抗的纠结切断了,伴随其后的是次大陆的分裂,它曾经拥有过的高度统一的统治正走向终结。1947 年 8 月 15 日,两个新的国家在其境内出现,即巴基斯坦和印度。前者是伊斯兰国家,本身分为两块,坐落在印度次大陆北部的末端;后者是世俗政权国家,但是印

度教在其组成和思想激励方面占压倒性优势。

或许分治是不可避免的。印度未曾作为一个实体被统治过，甚至在英国的统治下也如此；自大暴动之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愈发分裂。然而，它的代价是惨烈的。对民族主义者造成心灵创伤的事件是甘地被一名狂热的印度教徒刺杀。大屠杀发生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两百万人逃往其教友控制的地方。独立翌日几乎惟一明显的政治收获是，为不久的将来提供解决群体问题的方法，一个流血的方法。除此之外，新兴国家的财产包括大国向他们表现出的善意（出于复杂的动机），在独立之前已经大部分是本地人的继任的公务员以及机构和部门的重要的基础设施。然而，这些遗产并没有得到平等的分配，印度分配到的多于巴基斯坦。

这些优势对解决次大陆经济社会落后的作用不大。最严峻的问题在人口方面。在英国统治之下，印度人口开始稳定增长。有时它因受马尔萨斯所说的灾难影响稍微有所缓解，如一战末期的流感大瘟疫击倒了 500 多万印度人，或者二战期间的孟加拉大饥荒夺走过百万人的生命。但是，1951 年印度再次发生大饥荒，巴基斯坦在 1953 年也发生大饥荒。这一幽灵一直徘徊到 20 世纪 70 年代。

次大陆的工业化，尽管它在 20 世纪获得长足的发展（二战期间尤为明显），也未能抵消这一危险。它无法为快速增长中的人口提供新的就业岗位和足够的收入。虽然新印度享有那儿的大部分工业，但是它在这方面的问题要比巴基斯坦严重得多。在大城市之外，多数印度人是少地的农民，居住在农村，尽管新共和国的一些领导人持平等主义抱负，那里的不平等还是一如既往。为统治国家的国大党提供资金的地主在国大党的代表会中占主导地位，他们抵制任何能解决这一问题的土地改革。在许多方面，过去总是强调新国家应宣扬西方的民主思想、民族主义、世俗主义以及物质进步，这使得改革和发展的道路变得复杂。

983

中国长期忙于击退一个不同的帝国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中国战胜日本以及完成其长期的革命成为可能。这一转变的政治阶段始于

1941 年,当时抗日战争融入到整个世界的冲突当中。这给中国带来了强大的盟友和全新的国际地位。重要的是,与英国、法国及美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的最后残余被废除了。这比盟国所能提供的军事援助更重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盟国忙于摆脱 1942 年初的灾难以至于无法为中国提供更多的帮助。事实上,一支中国部队反而帮助盟军阻击日本人,以保卫缅甸和通往中国的陆上交通线。尽管得到美国飞机的支援,中国人还是被困于西部地区,他们在很长的时期内尽自己最大的能耐坚持着,只能通过空中或者滇缅公路与盟国取得联系。尽管如此,决定性的变化依旧开始发生。

中国起初以长期追求的全民族团结一心的精神来对抗日本的侵略,但全民族团结一致迄今为止未曾到来,或许除了五四运动时。虽然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存在摩擦,有时甚至爆发公开的冲突,但这种团结得以幸存下来,从广义上讲,一直到 1941 年。随后,新的事实是美国成为日本的主要敌人,并将逐步摧毁它,这开始微妙地改变国民政府的姿态。它认为一旦最终的胜利确定无疑,那么在和平之后很可能还要与共产党人做斗争的形势下,耗尽人力和资源去抗击日本人是没有意义的。它的一些成员更进一步采取行动,很快国民党再次与共产党发生冲突。

“两个”中国正在形成。国民党中国日益表现出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懒散、自私自利和腐败,这些都在腐蚀着国民党,因为它获得支持的阶层类型已发生变化。该政权压制和扼杀批评意见,疏远知识分子。有时对士兵的指挥失当且毫不纪律可言,他们和日本人一样胁迫中国的老百姓。共产党中国则不同。在大片由共产党人控制的区域(通常在日本人战线的背后),推行着温和但毫不含糊的改革以及有纪律的行为,以尽量确保获得不同利益团体的广泛支持。这是个深思熟虑的尝试。对地主的彻底攻击通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通过实施低租金以及取消高利贷,农民的善意得以培育出来。同时,为了培养储备承担未来任务的共产党新干部,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理论著作。当共产党和其领导的军队的数量稳定增长时,产生了进行一场政治教育的需要;当日

984

本在 1945 年战败时,中国共产党已拥有 100 多万人的军队。

胜利的突然到来是塑造中国革命最后阶段的第二个因素。国民政府控制的国土突然增大了。但是它们中很多地方在 1945 年之前就已在共产党人的控制之下,其他地方在共产党人站稳脚跟之前,国军是无法到达的。美国人尽其所能地派遣部队占据一些港口,直到国民党能够接管它们为止。在一些地方他们勒令日本人坚持抵抗,直到国民政府重建其权力。但是当革命最后的军事阶段到来时,共产党人比过去占领更多的领土,而且主要依靠人民大众的支持来守卫它,人民发现共产党的统治绝不是他们听说的那样糟糕。

虽是无意之举,日本人对国民党政权发动的进攻,最终导致了他们长期竭力予以避免的中国革命的重大胜利。如果国民党没有因受外来的侵略而分心以及它所遭遇到的沉重损失,至少他们在短期内制服共产党是可能的。在 1937 年,国民党仍旧享有爱国的声誉;许多中国人相信它是革命的可靠执行者。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战争剥夺了开拓这一事业的机会,但战争最终也使中国能够重新开始迈向世界强国的漫漫征程,这一进程曾先后受到欧洲人和亚洲人的干扰。中国民族主义遭受的长期挫折行将结束,而受益者将是共产党人。

共产党在国内战争中击败国民党用了三年的时间。尽管通常情况下日本人应该向国民党或者美国人投降,共产党还是要求在新领地获得权力以及日本库存的大量武器装备。俄国人在日本人投降之前的最后日子里进占了中国东北地区,他们帮助共产党获得那儿的日本军火。毛泽东发表了深思熟虑的温和政策声明,继续推动土地改革。这赐予共产党在这场持续至 1949 年的内战中更为有利的条件;战争的胜利从本质上讲,是以农村为基础的政权对以城市为基础的政权的胜利。

985

蒋介石政府表现出来的缺陷和腐败令美国的政权大失所望。1947 年美国军队撤出中国,放弃了在“两个”中国之间调停的努力。接下来这一年,随着北方大部分地区落入共产党人之手,美国人开始削减对国民党的财政和军事援助。从这时起,国民政府在政治和军事上走下坡路了;当这一趋势尤为明显时,越来越多的政府人员以及地方当局寻求

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只要其具备可行性。一个新时代正在显露的信念逐渐传开。到了10月初,中国大陆已没有完整的国民党军队,蒋介石本人则撤退到台湾。当此次撤退正在进行时,美国人切断了他们的援助,并且公开谴责国民党的无能导致政权的崩溃。同时,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正式在北京举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共产主义国家诞生了。

与其他地方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结束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尽管与英国相比,荷兰和法国的殖民统治终结得更快更血腥。在1939年之前,荷兰授权印度尼西亚创立代表机构,但未能制止其民族主义政党的成长,随后还出现了蓬勃的共产主义运动。一些民族主义领导人,当中有一位是艾哈迈德·苏加诺(Achmed Sukarno),在1942年日本占领这些岛屿时与其进行合作。日本投降时,他们处于夺取权力的有利位置,并且他在荷兰重返之前宣布成立一个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斗争和谈判持续了近两年,直到最终达成协议,印尼共和国仍留在荷兰王国内;这并没有用。战斗再次打响,作为从前的殖民大国,荷兰徒劳地在最初的一场战役中实施"警察行动",希冀借此在联合国全面发起对共产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责难。印度和澳大利亚(他们认为荷兰应明智地安抚独立的印尼,它的出现是迟早的事)将此事送交安理会处理。荷兰最终屈服了。开始于三个半世纪前的阿姆斯特丹东印度公司的故事于1949年随着印度尼西亚合众国的成立结束了,一亿多人组成一个混合体,分散居住在数百个岛屿上,分属不同的人种,信仰不同的宗教。在荷兰王国内保存一个印尼与荷兰的联盟,但五年之后便解散了。20世纪50年代初,30多万白肤色和棕肤色的荷兰人离开印尼抵达荷兰。

986

法国对印度支那的掌控似乎一度比荷兰更严密。该地区的战时历史与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有些不同,因为尽管日本人自1941年起就对该地区实施全面的军事控制,但直到1945年3月法国的统治权还未正式被取代。日本人随后将安南、交趾支那和东京(Tongking,注越南北部一地区旧称)合并,组成一个在安南皇帝统治下的新的越南国。不过,

日本人一投降，当地的共产党组织首领——胡志明便在河内的政府宫就职，宣告越南共和国的成立。胡志明是一个对共产党和欧洲有深刻体验的人。他接受了美国的支持和援助，而且相信中国在其背后做靠山。当中国军队进入越南北部而英军派军至南部时，革命运动迅速蔓延。事实证明，法国企图重建自己的势力绝非易事。英国人会与他们进行合作，但中国不会，它只会令法国重建势力的行动迟缓下来。一支庞大的远征军被派往印度支那，但法国最终作出妥协，承认越南共和国是法兰西联邦的一个自治邦国。但这时产生了归还交趾的问题，交趾是一个主要的产粮区，具有独特的地位，所有企图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协议的尝试均失败了。与此同时，法国士兵受到狙击，他们的车队遇袭。1946 年底，河内的居民遇袭，许多人遇难。河内遭遇轰炸(6 000 多人遇害)且重新被法军占领，胡志明出逃。

由此开始了一场持续三十年的战争，战争中共产党人致力于国家统一这一民族主义目标，而法国则竭力维持一个缩小的越南，以使它和其他印度支那国家一同留在法兰西联邦内。到了 1949 年，法国人转向合并越南的交趾支那，并且承认柬埔寨和老挝为“准国家”。但新的局外人开始感兴趣，冷战波及印度支那地区。胡志明政府得到莫斯科和北京的承认，由法国人创建的安南皇帝政府则得到英国和美国的承认。

987

这样，亚洲的非殖民化很快就超出了罗斯福最初的设想。当英国开始清算他们重新得手的遗产时，事情变得复杂化。1947 年缅甸和锡兰获得独立。翌年，共产党支持的游击战在马来亚爆发，尽管并没有取得成功，这也不能妨碍国家在 1957 年的独立，它是最初困扰美国政策的众多后殖民问题之一。与共产主义世界对抗的加剧很快使美国将内心深远的反殖民主义置之不顾。

只有中东地区的事务看起来明朗。1948 年 5 月，新国家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诞生。这标志着四十年来两个大国共同协商管理该地区的时代的结束。法国和大不列颠发现这并不太难。1939 年，法国仍然持有国联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委任统治权，英国则维持其对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权。在阿拉伯境内的其他地方，英国对个别国家的新领导

者施以不同程度的影响或者权力。最重要的是伊拉克，那里由一小股英军把持着，主要是几支空军小分队，至于埃及，大批驻军守卫着苏伊士运河。在20世纪30年代，当意大利对英国的敌意增强时，后者变得越来越重要。

如同其他地方，1939年的战争给中东带来了变化，不过起初并不明显。在意大利参战之后，运河周边一带成为英国最为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埃及突然间发现自己成为西方边境地区的前线。埃及几乎保持中立至战争结束，但实际上是一个英国基地而非其他。战争也使确保从海湾地区，尤其是伊拉克获得石油供应变得不可或缺。这导致英国的干涉，当时伊拉克在1941的民族主义政变之后威胁将转向亲德的方向。1941年，英国和自由法国对叙利亚的入侵使其免于落入德国人之手，也导致一个独立的叙利亚的出现。此后不久，黎巴嫩宣布独立。法国试图在战争的后期重建其势力，但没有成功，1946年，这两国看到了外国驻军最后的撤离。法国西进也遇到困难，1945年阿尔及利亚爆发战斗。那时候那里的民族主义者只要求在法国联盟下的自治，法国于1947年开始沿着此方向走，但离故事的结束还很远。

988

哪里的英国影响力至高无上，哪里的反英情绪便是一个很好的战斗口号。埃及和伊拉克在战后时期对英国占领军充满敌意。1946年英国宣称他们准备撤离埃及，但关于签订一个新条约的谈判破裂了，以致埃及将此事提交给联合国(没有成功)。到此刻，对阿拉伯地区的未来整个问题的关注，因犹太人决定运用武力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民族国家而转移了。

巴勒斯坦问题此后一直伴随着我们。它的催化剂是德国的纳粹运动。贝尔福宣言时期，巴勒斯坦居住着60多万阿拉伯人和8万多犹太人——这一数字令阿拉伯人感受到巨大的威胁。不过，若干年之后，犹太移居外国者实际上超过迁入者，因此，在巴勒斯坦协调对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的许诺以及尊重非犹太社区的民事权和宗教权这一问题有望得到解决。希特勒改变了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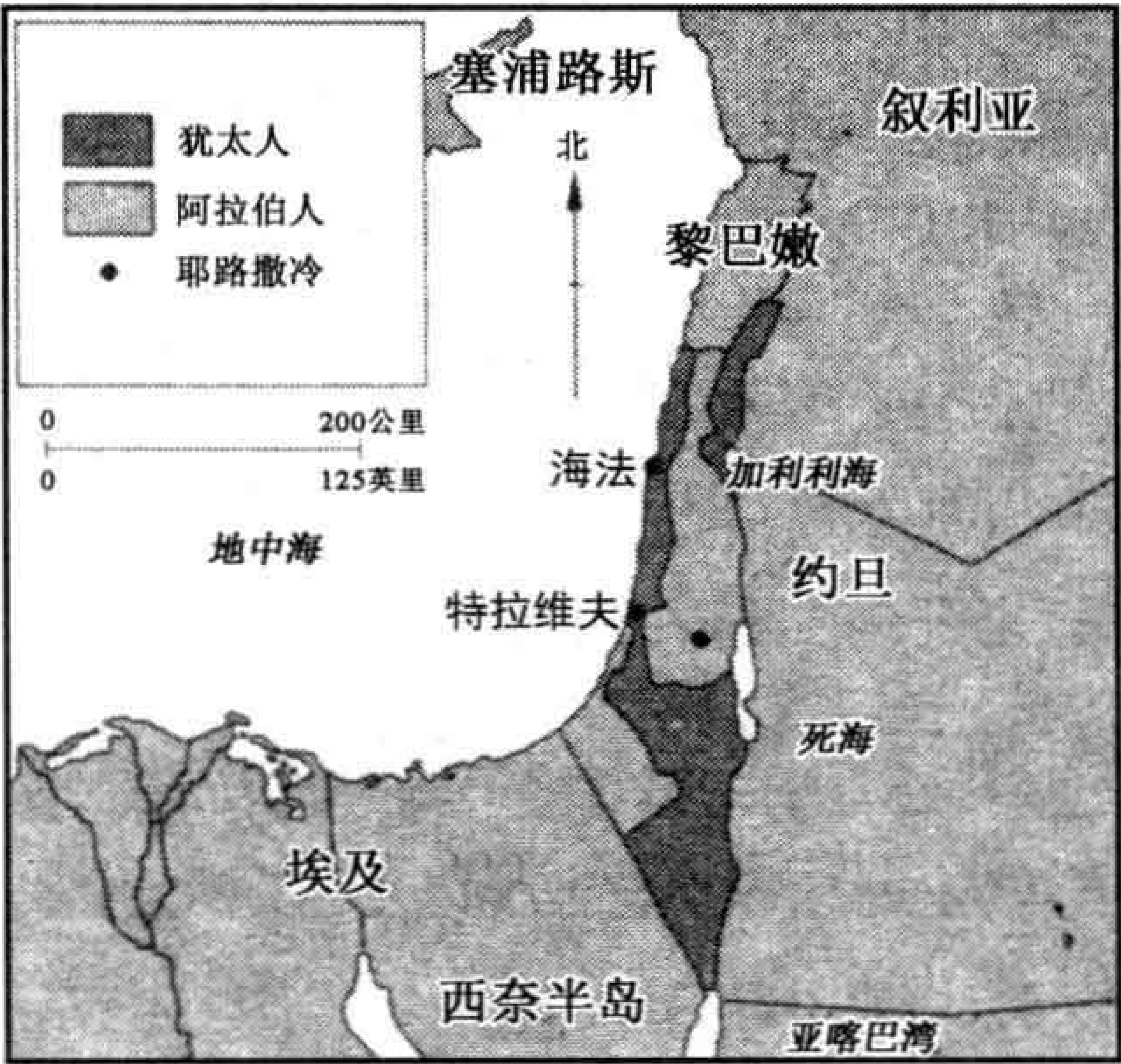
自纳粹迫害开始，希望前往巴勒斯坦的人数不断增加。当灭绝政

策在战争时期实施时，他们置英国的迁入限制于不顾，一方面，英国的政策令犹太人无法接受；另一方面巴勒斯坦的分割为阿拉伯人所不容。战争一结束这一问题就戏剧化了，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协会要求立刻让100万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其他新的因素开始发挥作用。1945年，英国以善意的目光看待一个由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也门以及约旦组成的阿拉伯联盟的形成。英国的政策总是存在一丝幻想，即泛阿拉伯主义能够探索一条使中东地区在后奥斯曼帝国混乱之后平静下来的道路，阿拉伯国家政策的协调将为其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事实上，阿拉伯联盟很快就以排他性的方式重新占领了巴勒斯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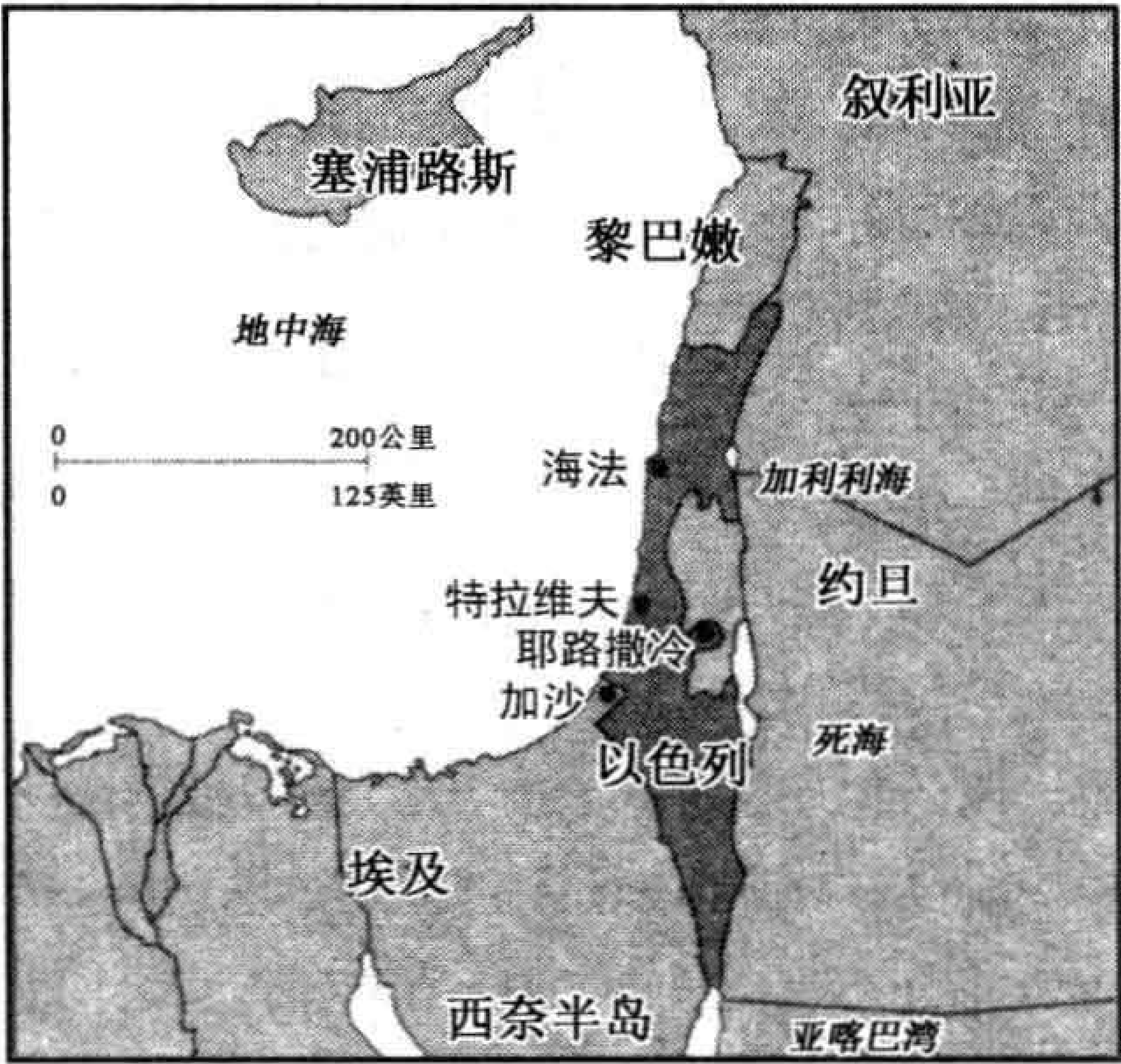
另一新事物是冷战。在战后初期，斯大林似乎仍持有旧的共产主义观，认为大不列颠是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帝国主义支柱。于是对它的地位和影响的攻击开始了，当然，中东地区还与俄罗斯的传统利益联系在一起，尽管苏联政府在1919至1939年间对该地区不感兴趣。土耳其在海峡问题上遇到压力，而且苏联开始向犹太复国主义提供引人注目的援助，这是对整个局势最具破坏性的因素。无需非凡的政治洞察力便可看出俄国人恢复在奥斯曼帝国遗留地利益的含义。然而，此时美国的政策转向反英或者亲犹太复国主义。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1946年美国举行国会中期选举，犹太人的选票具有相当的分量。自罗斯福的国内政治改革以来，民主党总统几乎不会持反犹太主义立场。

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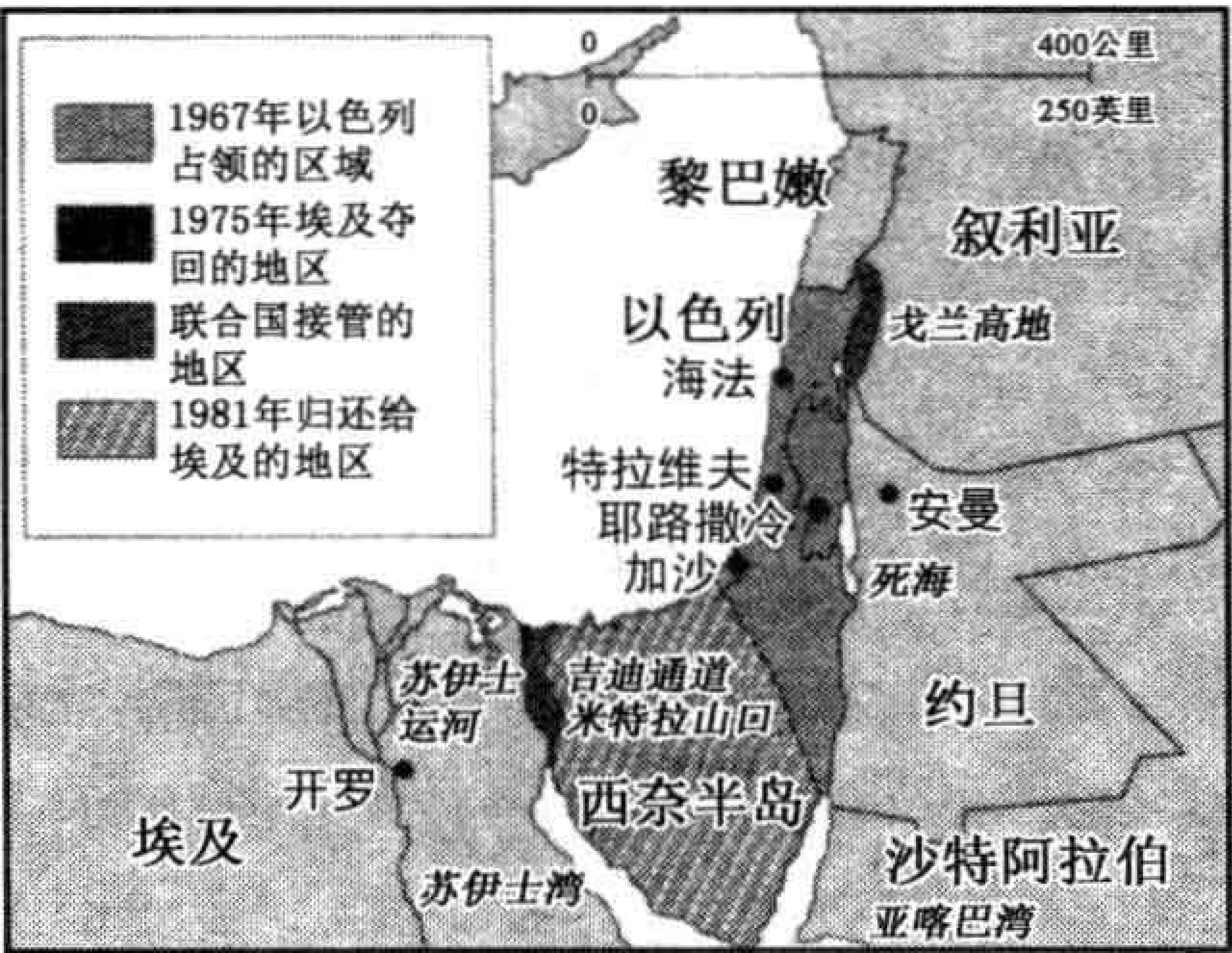
既然如此烦心，英国便试图将自己从圣地解脱出来。自1945年开始，他们在巴勒斯坦就面临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恐怖主义和游击战。不愉快的阿拉伯警察、犹太警察以及英国警察正努力维持局势的稳定，英国政府则仍然试图找出一种能够被双方接受的方案以结束委任统治。英国寻求美国的帮助，但无济于事；杜鲁门想要的是一个亲犹太复国主义的解决方案。最终英国将这一问题提交给联合国。联合国建议分割巴勒斯坦，但这对阿拉伯人而言仍旧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两个族群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英国决定立刻撤离。在他们这样做的那天，



1947年联合国的巴勒斯坦领土分配方案



1948-1967年的以色列



1967-1975年的以色列

即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诞生。它立刻得到美国(在建国16分钟之后)和苏联的承认;美苏在接下来的25年里在中东地区其他问题上再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990

埃及几乎即刻对以色列发动进攻,它的部队入侵了部分联合国授予犹太人的地区。约旦和伊拉克军队则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领土要求。但以色列击退了敌人,随后在联合国的主持下签订停战协议(在此期间一个犹太复国主义恐怖分子刺杀了联合国的调停者)。1949年,以色列政府迁至耶路撒冷,它自罗马帝国时期以来第一次再度成为犹太人国家的首都。城市的一半还在约旦军队的占领之下,但这似乎已经是留给未来的最小的问题了。美国和苏联的外交支持、美国的私人资金,以及犹太人的精力和创造力使一个崭新的民族国家得以形成,25年前那里连一点建国的基础也没有。然而,代价是需要长期支付

的。失望和受辱的阿拉伯国家决定持久地敌视以色列,从而为大国将来的干预提供机会。而且,犹太复国主义极端分子的行为和以色列军队在1948至1949年的行动导致大批阿拉伯难民的迁徙。很快,他们当中的75万人滞留在埃及和约旦的营地里,造成经济社会问题,这是世界良知的沉重负担,也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潜在的军事力量和外交武器。以色列的首任总统鼓励本国的科学家们从事核能计划研究,这是真实的(如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因而,许多股潮流以一种奇特的和颇具讽刺性的方式汇聚在一起,在一个经常成为世界历史焦点地区的混乱状态中搅动着。作为多个世纪的受害者,犹太人现在反过来被阿拉伯人视为迫害者。奥斯曼帝国几个世纪以来权力的消逝、帝国主义继任者的对抗(特别是两个新的世界大国的对抗,它反过来又阻碍两国关系的发展)、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与古代宗教信仰的相互作用以及发达国家对石油新依赖带来的重要影响所产生的力量加剧了该地区人们不得不为之斗争的问题。20世纪很少有时候像以色列建立时一样沉浸在历史中。这是历史转向20世纪后半部分之前的一个合适的停顿点。

第八卷

新　纪　元

20 世纪即将结束,但世人皆知,从 1945 年至今,世界发生了伟大而惊人的变化,而且对今天的影响更为显著。然而,我们试图解决的那些作为世界历史一部分的问题依旧没有消失。它们可能会变得更加难以解决。仅是所要叙述的事件也似乎突然地、不明不白地、自主地增加了。由于最近新发事件总给人留下更深刻印象,我们试图获得对过去 50 多年和先前 6 000 多年历史之间关联的正确看法比以往任何时候的难度都增加了。 991

其中一个障碍来自我们的合理期望。当我们通过自己的生活经历去解读我们所处的时代时,我们期待能够遇到记得的事件,或回忆起在容易受影响的年龄阶段发生的事情。一旦它们未在故事中展现,我们就会有些失望。但所有的历史都是一种选择;严格意义上讲,它就是每一个时代认为此前的岁月曾展现的卓越之处,而人们的期望(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并非是近期历史所面临挑战的惟一来源。变化速度加快也带来了另一重困难。人类文化演进的概念也是几个世纪前才开始得到历史作家的青睐。此外,也就是最近,历史学家才开始想当然地认为代际因文化而不同,人们生活的社会总是在以非常深刻和确定的方式发生变革,且改变人们的基本态度。然而,任何一个活着的成年人肯定有着激进的适应经历,尽管他们比我们前辈的经历可能要更深刻、更显著,但今天看来很是正常,并融入到我们的潜意识之中,经常不为人知。其中人口增长堪称典范;早期的人从未经历过如此迅猛增加的人口数量。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问题。

历史加速不仅体现在事件更迭加快上。由于速度与变化同在,因此其产生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往往比过去更广泛、更深入。例如,尽管仍有许多人不满意,但西方社会中妇女的机遇、自由发展的程度和规模已大大超过前几个世纪。虽则如此,它们的全部影响力仍未穷尽(或在某些地方正在显现)。同样,许多更精密的技术和新材料已经出现,但 992

其中一些远未发挥出它们的潜在影响力。

如果由于历史导致的快速和激进的变革,而使得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与早期历史完全不同,这就使它很难作为同一故事的一部分。在研究历史时,我们看来不仅要(在某种意义上)改变思路,也需要采取一种不同的看法。为了表明这样或那样的事实或事件的特殊影响,这需要更多解释方法,尤其是当涉及技术创新时。比如,在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秩序背景下,或为了明确人类干预自然导致的结果的重要性,要阐述一个崩溃与重构的世界体系需要更多细节。当然,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先前历史中也需要考虑。然而,早前事件的深刻和长远影响往往只是慢慢地显露出来,有时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而目前,它们有时会产生令人惊讶的影响,甚至是爆炸性的,也就使得人们很难获得一种固定的观点。

再就是作为历史基石的年表。对 20 世纪中叶历史迈入的新的、独特的阶段进行反思,很多人在寻找那些在年表中可能会成为转折点、标志和不可缺少的里程碑的事件,我们在早期历史中认为这些事件都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思考这些问题时,1917 年是否是一个比 1919 年更有意义的转折点,或 1931 年发生在满洲的事件是否就比 1939 年发生在波兰的事件更引人注目,这些疑问可能在几十年中不像我们认为的那么重要。有些日期可能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例如,1951 年有效控制妇女生育、且能安全口服的专利药品的诞生。十年后,它很快成为人类发展进程中家喻户晓的里程碑,而"避孕药"早已发挥了巨大作用。

接下来,我尝试着有意识地对待此类问题,并通过简明的叙述,展示在过去的五十多年中,最能体现或代表长远主题和深刻影响的总体发展事件,以使它们显得更为明确。在此之后,我才会按一段一段较短的时段,试图描述那些经常出现在报纸头条中的种种事件。以这种方式,我希望"当代史"的各个主要里程碑(即这样一些时刻,此时,若历史不成其为历史,因此不会在固有规律的约束下按实际发生的方式上演的话,那一切就将大不相同)会浮现出来。

993

当然,也有一些普遍性的观点将会出现,对此我们可以相当肯定甚

至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就已经出现。例如,看出欧洲人统治世界事务的时代已经结束并不难;我们可以把自1945年后的这段时期称为后欧洲时代。但也有一些更普遍的彻底改变需要得到关照。现在的世界独一无二。在短短几年内,世界发生了迅速变革,也许这是对早期历史而言变革更为彻底的途径之一。一个共享的文明正在传播,它比迄今任何一种文明都要影响广泛。然而,当我们观察到这一事实,它却在我们眼前变成别的事情。事实上,这是一个必然要变化的文明,因此,往往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我们可能远不及我们的前辈那样对未来的生活抱有坚定的信心。经济和技术上更强的独立性,尤其是信息的大量增加和更好地处理信息的手段的出现是其中最明显的原因。几乎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任何事情,原则上都可能在其他地方迅速产生影响;即使尚未影响到所有地方,但政治领导人应认识到这一点,无论它们是否通过意识形态、计算、简单的恐惧造成影响。即使有时太缓慢,他们大多最终会明白,并认识到它们早已在历史上发生过。为方便起见,在世界的任何角落,涉及的过程往往被看作“现代化”及其表现,即使它们在某些地方表现并不突出。

史前时期,人类开始凭借原始技术从大自然中解放出来。千百年来,人类朝着不同的路径发展,这让人们获得不同的生活方式,创造了高度个性化和特定的文化与文明。几个世纪前,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扩展,这些不同的文明开始走向融合。现在,我们可以感受到它们正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融合,即使我们不能确定它们各自在何种层次上发生着。我们必须(且幸运的是,可以很容易地)承认的是,仍然可以依照较早的历史来观察近期历史。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确保对即使是最大的变革进行公正评价的可能性又增加了一点。 994

一、概　　观

人口

995　1974年,在罗马尼亚举办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世界人口会议。少数了解相关情况而感到担忧的人士首次得到一个平台,借以呼吁人类慎重考虑人口数量问题。25年后,世界人口数量仍在加快增长,其势头已持续了几个世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也显然无法控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将带来全球性的问题,即使它们之间具体的因果联系仍因信息的不完全而不明确。我们无法精确地计算出人口的数量,只能估计出大约有多少亿。尽管如此,误差的程度可能并不会严重歪曲我们对发生的一些事情的印象。以整数而论,两个半世纪前世界人口约为7.5亿;150多年后即1900年人口数增加了一倍多,大约16亿人;然后,大约用了50多年增加了8.5亿;截止到1950年,世界上有大约25亿居民;下一个8.5亿人的数量增长仅用了20年;现在,世界人口超过60亿。这也可以用更长的时间标准来衡量。人口数量达到10亿(1840年左右达到)用了5万年,而最后一个10亿仅仅用了15年时间。也就是说,几十年来人口总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可能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每年高于2%的增速达到其峰值。

这样的增长使得马尔萨斯灾难的幽灵再次显现,尽管正如马尔萨

斯观察到的,"现有人口增加或减少的速率,并不能使我们对未来人口或人口的消失进行估计,这一判断是可以信赖的"。我们不能确定未来模式会怎样变化。例如,有些地方试图控制它们的规模和形式。严格来说,这种努力并不是全新的。一些地方,谋杀和堕胎早已是减少对稀缺资源需求的通常做法。在中世纪的日本,婴儿面临死亡;在 19 世纪的印度,溺杀女婴很是普遍。新的转变主要是指政府开始把资源和权威隐藏在更人道的人口控制方法背后,目的是积极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而不是单纯地避免个人和家庭的窘迫。

996

只有少数政府作出这样的努力,经济和社会事实表明这一努力并没在各地产生同样的效果,即使是毫无异议地促进了技术和知识上的进步。20 世纪 60 年代,一种新的避孕技术在许多西方国家迅速传播,并伴随着对人类行为和思维的颠覆式影响,此时它还未被非西方世界的妇女们同样快乐地接纳。尽管全球范围内并不是到处采取同样的形式,或引发相同的反应,但这仍是人口增长的多方面因素中的一个。虽然许多非欧洲国家都遵循了 19 世纪的欧洲模式(首先表现在死亡率下降,但出生率并未下降),但判断它们会简单地重复发达国家人口史下一阶段状况则是草率的。我们不能假设在一个地方或一个社会出生率下降的模式将在其他地方重演——但同样我们也不能确保这不会发生。人口增长的动力是极其复杂的,由于对具体情况的不了解,个人和社会的态度很难来衡量,更遑论操纵,但在我们等待这些动力因素更加明朗的时候,一些贫穷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可能期待实现人口平衡。近几个世纪,当少数欧洲国家的繁荣致使组建小家庭吸引力更大些的时候,欧洲的出生率才开始下降。今天的欧洲国家很少呈现快速的人口增长,其或多或少是基于这个原因。医疗、营养条件的改善,公共健康的提供很可能使事情变得更糟。自 1900 年以来,对人口控制的进步是巨大的,但在 20 世纪之前,相较于欧洲而言,也有许多地方还没有关注死亡率。在它们产生作用的时候和地方,人口的数量可能仍上涨较快。

婴儿死亡率是一个很有帮助的预测未来人口增长潜力的粗略指

标。1970年之前,发达国家的婴儿死亡率从每千名约225人下降到每千名20人以下;1988年孟加拉国和日本的这个数字分别为118和5。今天,富国和穷国之间的这一差距比过去更大。任何年龄段的寿命上也有差距。在发达国家,出生率在1870年略超过40人(每千名),而一百年后却略超过70人(每千名)。如今显示了非凡的平衡性,例如,1987年,美国、英国和苏联的这一数字分别为76、75和70。通过与埃塞俄比亚(41)和印度(58)的比较,它们之间的这种差异更显得微不足道。然而,印度婴儿的生存环境较之1900年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更不用说与1789年在法国出生的婴儿相比了。

997

不久的将来,这种差距将引发新的问题。在历史上多数时期,所有社会就像金字塔,大多数人处在金字塔的底部,一些老人则处于其上部。现在,发达国家的人口状况却宛若一个尖细柱体,老年人的比例大大超过了以前。而在一些贫穷国家,情况正好相反,肯尼亚约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在15岁以下。中国则有三分之二的人是在33岁以下。因此,简单探讨整体的人口增长会掩盖重要事实。世界人口可能在迅速地增加,但却有着非常不同的根源,并将具有大不相同的历史意义和效果。

其中,人口流动的方式是需要考察的。20世纪末,人口在各大洲的分布大致如下:

洲	百万	占总数的百分比
欧洲(包括俄罗斯)	745	13.5
亚洲	3 424	62
非洲	701	13
南美洲和加勒比	308	5.5
北美	294	5.25
澳大利亚和大洋洲	47	0.75

19世纪中期的欧洲,其占世界人口的份额(四分之一)下降得非常快。4个世纪以后,从欧洲迁出的人遍布世界各地,直到20世纪20年

代，欧洲仍向海外输出人口，尤其是向美国。在这10年中，由于美国的限制政策，欧洲输出的人口数有所降低，大萧条时期这一数字进一步减少，之后再也没有恢复到昔日的水平。另一方面，加勒比海地区、中南美洲、亚洲移民到美国的人数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迅速飙升。此外，尽管欧洲一些国家仍然输出移民（在20世纪70年代，相较于来自国外的移民而言，每年迁出的英国人更多），它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也吸引北非人、土耳其人、亚洲人和西印度群岛的人到欧洲寻找工作机会，因为他们无法在本国找到工作。总体上说，欧洲现在是人口输入洲。 998

目前，这样的模式可能无法长期保持不变。亚洲有着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印度排名第六，但一些导致以上人口增加的高增长率，终将开始下降。20世纪60年代初，巴西的人口增长速度是世界平均值的两倍有余，尽管巴西人口继续增多，但这一速度已经不再出现。至于在其他拉美国家，19世纪末，其中大部分国家人口的生活和寿命的标准并没有好过欧洲，但人口增长很快。罗马天主教会因此一直受到指责，因为其长期反对节育和堕胎，但这难以成为一个完美的解释。拉美国家中，男性对待女性的态度及社会规训的伦理导向都差不多，都是把家庭责任强加于许多贫困大家庭的女性身上（直到最近，这些女性依然毫无疑问地顺从于男人与社会）。同时，最惊人的增长速度在伊斯兰世界中被发现：20世纪90年代，约旦在16年内人口增加一倍，伊拉克的人口以每年3.5%的速度增加，而沙特阿拉伯虽仍然人口较少的，却以每年令人惊讶的5.6%的速度增长。

过去30多年，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家庭规模缩小的证据或多或少是有的。毫无疑问，部分是源于官方的努力。尽管共产主义政权的国家从不欢迎人口稳定或减少的思想，20世纪60年代，中国和苏联却开始鼓励人们晚婚并组建小家庭。中国出台了颁布相应法律规制、税收优惠和对超生者施加社会压力等措施。印度政府花大笔钱用于避孕宣传，其中一部分也用于改善女性生殖健康，但成果有限。既不像日本那

样在经济上取得革命性变化,也不像中国那样经历了对传统体制的政治变革,印度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思想和制度上都十分保守。例如,在印度的精英少数派之外,传统意义上的男女地位和就业前景不平等依旧存在。假使欧洲或北美对待妇女的通行态度能在印度得到哪怕稍稍多一点的采纳,都很可能会大幅提高妇女的结婚年龄,从而降低每户家庭平均的儿童人数。但这种变化打破了印度权力结构的传统方式、机遇和模式,这将远比 1947 年印度赢得政治独立更为激进。毫无伤害地摆脱根深蒂固的传统和文化是不可能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很容易地摆脱如此多的束缚。

999

也许我们不必过于悲观。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福祉的增加,生育率便会下降。即使在印度这样的国家中人民的生活仍未能得到明显改善,但拉丁美洲的证据表明,这种改进仍改善了出生率下降的方式。欧洲传统文明的影响仍在扩大,尽管它在到来时被包装起来,但仍是融化传统方式的最强大溶剂,这一点历史可以证明。人口结构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发生变化,似乎宗教文化的削弱是不可避免的,如工厂建设或妇女解放——可以列举出很多类似的例子。

人口的差异及其变化影响着国家的相对实力,虽然它们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权力差异。资源和文化也很重要,在一个方面具有的力量通常并不能等同于在另一方面具有的力量。尽管如此,权力和人口在很多方面是有关联的。例如,中国拥有的庞大人口,使其大到几乎不可战胜。但这种关联也并非总是如此直接和明显。20 世纪末,10 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口估计如下表:

国　家	年　代	人口(百万)
中　国	1997	1 243
印　度	1998	970
美　国	2000	274
印　尼	1997	199
巴　西	1997	159
俄罗斯	2000	145

（续　表）

国　家	年　代	人口(百万)
巴基斯坦	1997	138
日　本	1997	125
孟加拉国	1997	122
尼日利亚	1997	118

注：1997 年，德国有 8 200 万人，使其成为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

无论怎么计算，上表包含了世界上三个最强大的国家；当然，它们在一百年前并非如此。10 个中也有一些很弱小。中国的社会变革走在了前面，而列表上的一些国家仍被贫困包围，且看起来难以逾越，或因自然资源太少(如孟加拉)，或由于人口增长太快吞噬甚至超越了现有的社会经济发展(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种情况下，说得好听点，新生财富很大程度上被更长的预期寿命消耗掉了。印度农业产量于 1948 至 1973 年间翻了一番，被认为进入到一个自给自足的食物供应阶段，但这才勉强能够维系以每月百万速度增长的人口的需求。

1000

世界人口也以另一种方式在不断变化。20 世纪结束时，近一半人居住在城市。城市成为人类特有的栖息地。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这表明城市已失去其传统的杀戮力。过去，城市生活的高死亡率要求农村出生的人移民到城市以保持城市人口的数量。19 世纪，一些国家的城市居民开始自我繁衍以保证城市的有机增长。结果是惊人的：现在许多城市的居民都无从统计。加尔各答早在 1900 年就拥有 100 多万人，但现在已超过原先的 15 倍；20 世纪开始时，墨西哥城只有 35 万居民，但 20 世纪结束时，有超过2 000 万居民。我们可以从更远时期获得其他数据。1700 年，世界上只有 5 个城市的居民超过 50 万，1900 年有 43 个；现在仅巴西就有 7 个城市的居民超过百万。在一些国家，卫生制度和公共健康措施远比别的国家改变得更缓慢从而使这种变化成为可能，且城市化的浪潮远未结束。

新的充足性

人口和城市化的动态变化均意味着世界资源巨大的增长。尽管很多人饿死但仍有很多人活着;虽有百万人死于饥荒,但迄今全球没有出现马尔萨斯灾难。如果全球不能养活他们,人口的数量将会减少。但这是否可以持续则是另一个问题。专家们得出结论,我们可以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为越来越多的人提供食品,也希望人口政策有助于稳定需求。但在这一问题上,我们进入了推测的范畴,尽管这种希望引发了历史学家的兴趣,对他们来说,当今世界的实际状态对推测将会发生的事情很重要。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现代史的主要经济事实,特别是过去半个世纪的经济事实:它生产出了前所未有的财富。

1001

本书的读者可能在电视中看惯了饥荒的悲惨景象。然而,1945 年以来,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第一次被认为是必然的。尽管其中曲折颇多,但增长已是“常态”。任何速度的放缓目前都是一种警示。更重要的是,人口数量表明,真正的经济增长一直发生在大多数不发达世界。这大大挑战了世界的传统看法,即使在 1939 年,这也是一场革命。然而,经济高速增长并未仅仅始于二战后的几十年,这一时期世界处于前所未有的增长黄金时代。激增的财富已成功地担负起了世界人口的剧增。测量方法之一,目前人均财富是 1500 年的 9 倍。世界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从 500 年前的基数 100 上升为当今的超过 11 600——并被更多的人共享。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1988 年) (单位:美元)

国 家	1900 年	1988 年
巴 西	436	2 451
日 本	677	23 325
意大利	1 343	14 432
瑞 典	1 482	21 155

（续　表）

国　家	1900 年	1988 年
法　国	1 600	17 004
英　国	2 798	14 477
美　国	2 911	19 815

事实上，在 19 世纪以前，财富和人口的数量基本保持平行。然后，一些经济体逐步比其他经济体增长得更快。20 世纪初，财富创造的新集约化道路已经开始，尽管两次世界大战和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所造成的动荡严重阻碍了这一进程，但 1945 年后它又得以恢复；尽管不同的经济体之间挑战和差异很大，但经济增长从未停止。1960 年后，GDP 全球性地增长，同样人均 GDP 也增加了。相对于一些国家的差距和挫折而言，经济增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泛。

1002

前文表格中所选择的数字必须谨慎解读，它们可能很快发生变化，却给了我们一个真实的印象，即，世界在不到一个世纪内已经变得更加富有，尽管有一些人仍然很贫困。

20 世纪 90 年代的穷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单位：美元）

阿富汗	1996 年	70
莫桑比克	1996 年	88
埃塞俄比亚	1998 年	101
马达加斯加	1996 年	132
柬埔寨	1996 年	143
坦桑尼亚	1996 年	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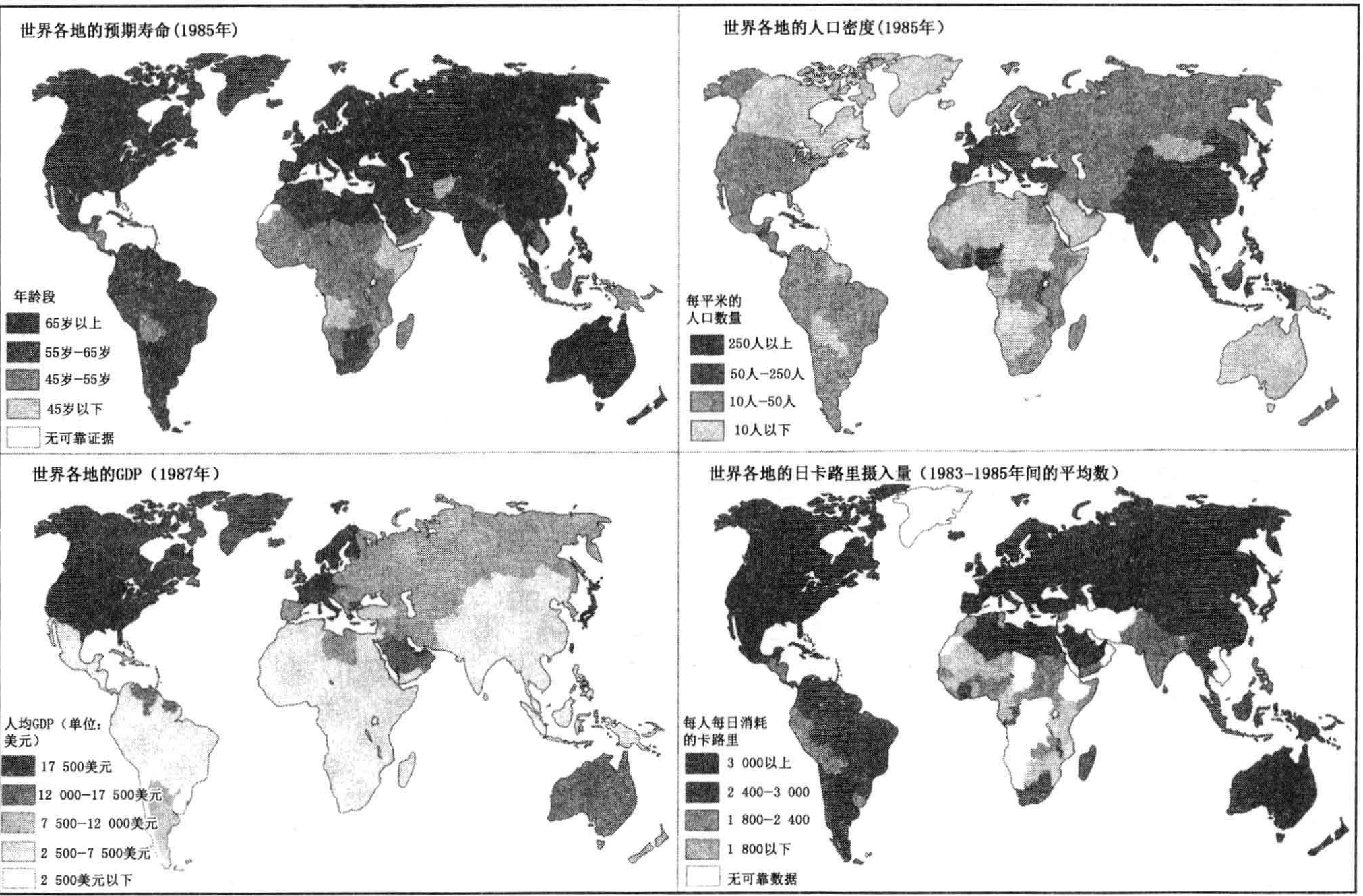
财富创造是最重要的事实之一，这有益于大国之间的持久和平。当然，1945 年以来，世界仍有许多较小规模血腥的或初步的冲突，每一天都伴随男性和女性的死亡，数万人在军事行动中及之后死亡。大国通过代理人为它们的利益而展开诸多战争。但任何一次都没有两次世界大战对人力资源和经济资源的破坏大。相反，在这些冲突之下潜藏的国际竞争在许多国家往往会促动一定的经济活动。它提供了许多技

术副产品,并导致资本投资和政治动机的转移,其中的确促进了财富的增加。

第一个此类的转移发生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即美国的援助为欧洲经济复苏提供了可能。这一点是成功的,美国这台发动机可以用来促进恢复,而在 1918 年后尚未如此。美国庞大的战时扩张经济最终把它拉出战前的萧条,同时美国本土免于战争的破坏。美国经济实力部署会以援助的方式进行,这还需从当时的国际环境(冷战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寻找答案。当时的国际紧张局势使得援助欧洲似乎符合美国的利益;许多政治家和商人抓住了这一机遇;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如此规模的资本替代来源;最后,它帮助了不同国家的人,甚至在战争结束前,为了避免退回到 20 世纪 30 年代那种几乎致命的经济无政府状态,美国建立了管理国际经济的制度。1945 年之前,世界就开始重塑经济生活,战时的努力产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它们为 1945 年后非共产主义国家的经济稳定提供了支撑,并使世界贸易在 20 年间每年以近 7%的速度增长。1945 年至 20 世纪 80 年代间,制成品的平均关税水平从 40%下降至 5%,而世界贸易也增加到之前的五倍多。

1003

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科学家和工程师往往以非正式的或是隐秘的方式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科学技术知识的应用,以及在探索提高效率的过程中,进程和系统的改善与合理化,在 1939 年前都是非常重要的。1945 年后它们脱颖而出,并开始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工业化之前农业上的改善是公认的事实,且是科技效果最明显的例子。几千年来,农民几乎完全采用古老的方法来逐步提升其收入,首当其冲的是开拓新土地。但是仍然有大量的事例证明,适当的投入可以增加收成(即使是像印度这样一个人口拥挤的国家,在过去的 25 年中也采取很多增加收入的措施来使用这些土地)。然而,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世界农业产量最近增加得那么厉害。根本的解释是近代早期欧洲农业革命的发生发展,且至少从 17 世纪便已显现。250 多年后的今天,在很大程度上科学的应用使农业产量的增长加快了速度。


世界各地的预期寿命(1985年)
年龄段
65岁以上
55岁—65岁
45岁—55岁
45岁以下
无可靠证据
世界各地的人口密度(1985年)
每平米的人口数量
250人以上
50人—250人
10人—50人
10人以下
世界各地的GDP（1987年）
人均GDP（单位：美元）
17 500美元
12 000—17 500美元
7 500—12 000美元
2 500—7 500美元
2 500美元以下
世界各地的日卡路里摄入量（1983-1985年间的平均数）
每人每日消耗的卡路里
3 000以上
2 400—3 000
1 800—2 400
1 800以下
无可靠数据

早在 1939 年,小麦被成功地引入迄今由于气候原因导致其未被种植的土地。植物遗传学家研究了新谷物品种,这是 20 世纪大规模针对农业的第一个科学贡献,远远超出了早期的错误评价;后来,基因改造作物品种开始引起了不利的批评。

1005 一些地区通过使用更好的化肥(于 19 世纪第一次使用),对世界粮食的供应作出了更大的贡献。氮在先进农业国家土壤中的空前使用提高了粮食产量,这如今已经司空见惯。不过,这样做的代价是巨大的能量投入,以及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人们逐步表示出对其造成的生态后果的担忧。此时,除了高效肥料外,更为有效的除草剂和杀虫剂也已问世,而农业的机械化在发达国家大大增加。依据每英亩的马力,英国曾在 1939 年拥有世界上最机械化的耕作,然而英国农民当时仍主要靠马完成大部分工作,而联合收割机(在美国已经普及)是罕见的。但是,不仅是该领域开始机械化。电力的使用带来了自动挤奶、粮食干燥、脱粒,冬季可以在大棚里为动物保暖。现在,计算机和自动化已经开始减少农业对人类劳动的依赖;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持续下降,而亩产量却不断提高,转基因作物将能带来更高的产量。

矛盾的是,仅仅由于世界上人更多了,导致当今世界比 1900 年有更多的自给农民,尽管他们的耕地和生产作物的价值份额减少了。但是 2%的生活在发达国家的农民现在却提供了大约一半的世界粮食供应。欧洲的农民很快不见了,正如在两百年前的英国一样。但这种变化并不一致。俄罗斯是传统的农业大国,最近于 1947 年却遭受了如此严重的饥荒。对于那些人口不断增长、但仍维持着生存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国家而言,当地的粮食不足仍是一种威胁。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的小麦亩产量已是印度的 2.5 倍;1968 年则是印度的 5 倍。同期,美国人把水稻产量从每英亩 4.25 吨提高到近 12 吨,而缅甸作为“亚洲的饭碗”,仅从 3.8 吨上升至 4.2 吨。1968 年,一个在埃及的农业劳动者可提供略多于一个家庭的食物,而在新西兰,每个农场的雇员足以提供 40 人的食物。

在经济其他方面上先进的国家表现出最大的农业生产力。相较于

领先的工业国家,最需要粮食的国家却无法以更经济的方式生产出大量粮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罗斯人、印度人和中国人,这些大的粮食和稻米生产者,发现自己正在购买美国和加拿大的小麦。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却在几十年的充足供应中扩大。大约一半的人消耗约七分之六的世界产量,其余的人分享剩下的。美国是迄今为止最奢侈的消费国家。1970 年,几个美国人就使用了世界年产 100 桶油中的将近 40 桶。他们每人每年消耗大约 25 吨的纸制品;在中国,相应的数字大约是 20 磅。当时中国一年内所有的能源消耗总数(据说)仅够供给美国的“空调”的消耗。事实上,由于电力较少用于国际贸易且大部分是在国内消耗掉,因此,电力生产是进行比较的最佳标准之一。20 世纪 80 年代末,美国生产的电力是印度人均的 40 倍,是中国的 23 倍,但只是瑞士的 1.3 倍。 1006

世界各地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自 1945 年以来已经变得更加明显,不仅是因为穷人更穷了,也因为富人更富了。惟一例外的是,相对富有(依据世界的穷国标准)的苏联和东欧国家,由于管理不善和命令经济导致了较低的增长率,或根本没有增长。除了这些例外,即使高速的生产(例如,亚洲一些国家提高了其 1952 至 1970 年之间的农业产出额,与欧洲持平以及超过了北美)也很少成功地改善贫穷国家的地位,这是因为这些国家人口不断增长及富国发展水平更高了。

尽管它们彼此的排名可能会有变化,但总体而言,1950 年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现在仍然享受着它们的辉煌(但日本已加入其列)。这些主要的工业国家是当今最富有的国家,并成为穷国谋求自身经济增长的模仿榜样,我们通常称这个发展过程为工业化进程。诚然,今天主要的工业经济体与 19 世纪的国家并不相似。而长期作为经济实力基础的传统制造业也不再是简单而又令人满意的措施。领先国家的主要工业都有所下降。1900 年的三大炼钢国家,前两个(美国和西德)八年后仍然是世界前五,但分别是第三名、第五名。英国(1900 年是第三名)排名第十——西班牙、罗马尼亚和巴西紧跟其后。如今,波兰生产的钢材比一个世纪前的美国要多。此外,相较于成熟经济体,新生产业增长 1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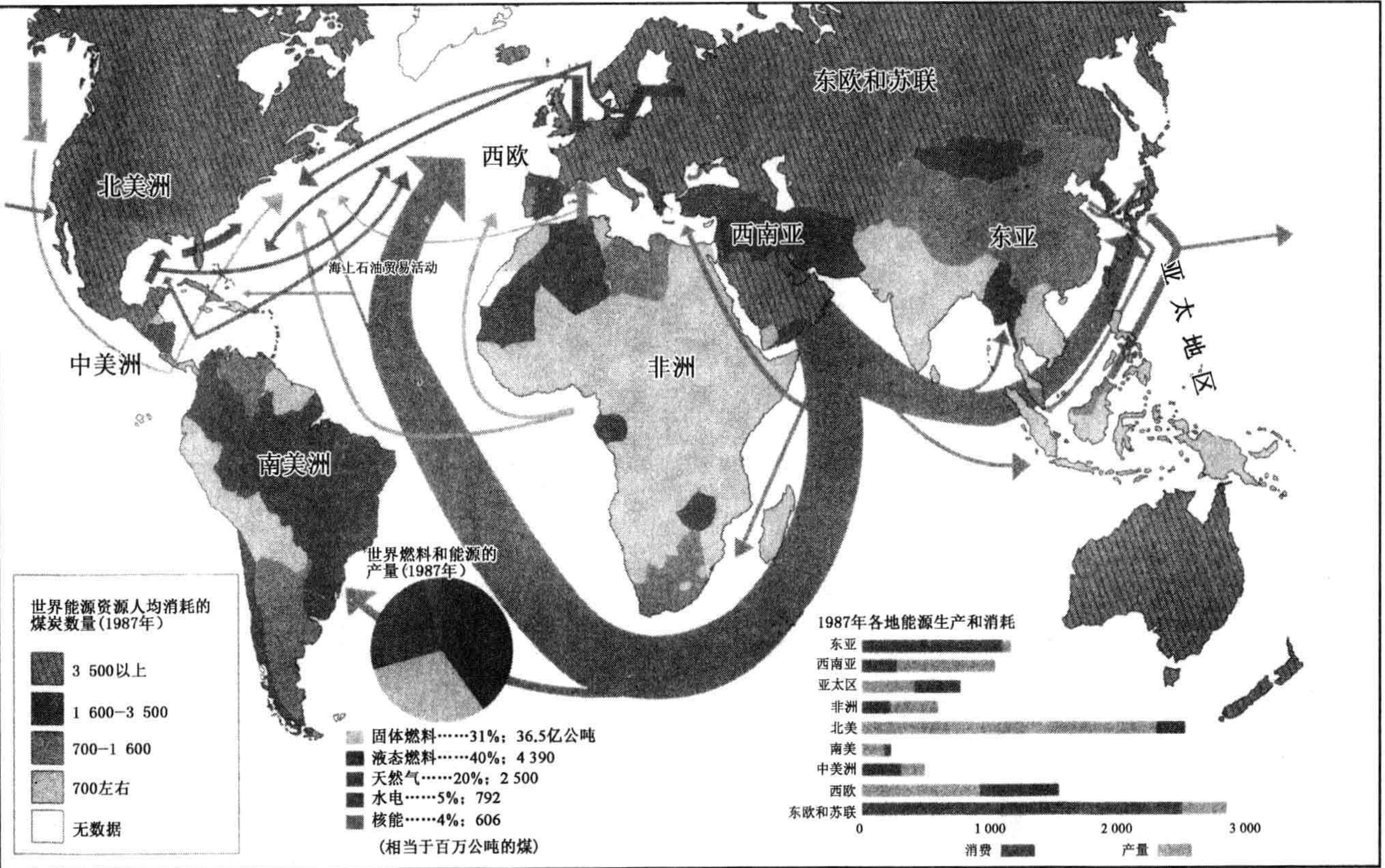
往往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找到更好的环境。因此,1988 年时,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印度的 15 倍。

20 世纪经济的增长来自特定的行业——如电子和塑料行业——1945 年的时候这些及新能源并不存在。19 世纪,煤炭取代活水和木材成为工业能源的主要原料,但早在 1939 年前,水力发电、石油以及天然气已是主要能源;近年来,核电也成为新能源。由于电力、运输成本有所回落,因此,工业增长便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其中,创新发挥了极大的重要性。1885 年,第一辆由内燃机推动的动力机车诞生,也就是说,使用热产生的能量直接驱动发动机汽缸里面的活塞,而不是通过烧锅炉产生的蒸汽进行转换。九年后,法国潘哈德公司(Panhard Company)制造了四个轮子的机器,这便是现代汽车的前身。接下来几十年中,法国与德国控制了汽车生产,但它仍是富人的玩具。这是汽车发展的前史。汽车的历史始于 1907 年,此时美国人亨利 · 福特已经建立了生产汽车(即之后闻名遐迩的"T 型车")的生产线。该车价格低廉,主要针对普通百姓。到 1915 年,福特车每年生产百万辆,到 1926 年,T 型车的成本低于 300 美元(当时约 60 英镑)。一个巨大的商业成功已经起步。

这同样也带来了社会和经济变革。福特改变了世界。通过给予普通百姓以前认为是一种奢侈品的东西(即使 50 年前的百万富翁都不可能拥有的汽车),他的影响如同铁路一样伟大。这一便利设备迅速传遍世界各地,并带来多样的后果。全球汽车制造业诞生便是其中之一,它控制着国内制造业,最终使得汽车制造国际一体化。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上生产的四辆汽车中有三辆是由八个大型生产商生产。该行业也激起对其他行业的巨大投资;几年前,一半的机器人在汽车厂做焊工,另外的四分之一则给这些产品涂上油漆。同时,汽车生产极大地刺激了石油需求。大量雇员为车主供油,并提供其他服务。公路建设的投资成为政府的主要关注对象,这是自罗马帝国以来久未得到关注的问题。

1009

像其他许多伟大的革命家一样,福特把他人的思想纳入自己的想法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改变了工作场所。在这一榜样的带动


东欧和苏联
西欧
北美洲
西南亚
东亚
亚太地区
海上石油贸易活动
中美洲
非洲
南美洲
世界燃料和能源的产量(1987年)
世界能源资源人均消耗的煤炭数量(1987年)
3 500以上
1 600—3 500
700—1 600
700左右
无数据
固体燃料……31%；36.5亿公吨
液态燃料……40%；4 390
天然气……20%；2 500
水电……5%；792
核能……4%；606
(相当于百万公吨的煤)
1987年各地能源生产和消耗
东亚
西南亚
亚太区
非洲
北美
南美
中美洲
西欧
东欧和苏联
0
1 000
2 000
3 000
消费
产量

世界能源资源

下，装配生产线成为消费品制造的特有方式。福特设置的生产线，即汽车制造稳步地从一个工人转到另一工人，每个人在特定时间内完成必要的任务，如果可能的话，他（或，后来的她）完成熟练而简单的任务。很快人们发现这种工作方式会对工人产生心理影响，但福特认为这项工作非常单调，于是开的工资较高（从而也使他的工人能更容易买他的车）。这是对社会根本性变革作出的另一贡献，并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文化后果——由日益增加的购买力和需求刺激了经济繁荣。

通讯

时下一些装配生产线完全是由机器人“操控”。1945 年以来，技术变革影响着工业社会的发展，这些新技术后来被宽泛地称为信息技术，即设计、建构、处理以及管理电子信息处理器的复杂技术。在技术变革的历史上，很少有发展如此迅速的技术。仅在二战期间运用的工作应用程序几十年后被广泛运用到服务和工业的生产过程。最明显的是，作为电子数据处理器的“计算机”被广泛使用，第一台于 1945 年诞生。能量和速度迅速增加，尺寸缩小，视觉显示能力带来了庞大的信息量，可以控制且在给定的时间内进行处理。量变带来了质变。由于所涉及的数据量非常之大，此前这类技术操作一直很难实现，但现在却成为可能。智力活动从来没有如此突然加速过。此外，在电脑的能力不断发生变革性增长的同时，其也在变得越来越具实用性、廉价性和便携性。仅仅 30 多年，一张信用卡大小的“微芯片”就能承担的工作，起初需要如英国客厅大小一样的机器来完成。据观察，1965 年，一个“芯片”的处理能力每 18 个月增加一倍；30 年前一个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大约为 2 000 个，如今却已增至数以百万计。这种影响已经强烈地被感知，人类的每项活动——从金钱、战争决策、学术到色情，都被牵涉其中。

1010

当然，计算机只是各种通信进步和创新发展的一部分，这一进程开始于固体物体如商品和人的物理及机械运动。19 世纪的主要成就是蒸汽机运用到海陆通信，以及后来的电力和内燃机。在空中运输方面则是气球。第一个“可以驾驶”的飞艇 1900 年之前已经出现，但 1903

年一名男子驾驶着自己制作的“比空气重”(即,浮力不是来自比空气还轻的带状气体)的机器进行了第一次飞行。由此宣告了一个物质传输的新时代;80 年后,伦敦最大的机场运输的商品,其价值远大于任何一个英国海港所承运的。如今,数百万人通过飞机旅行开展业务或休闲,飞行让个人的空间掌控能力大为增长,而这在本世纪之初仍只是模糊的想象。

信息通讯早已进入到另一场革命。根本意义上来说,信息流动与信息来源和信号之间脱离了任何物理链接。19 世纪中叶,在铁路线旁的有线电报是一个熟悉的景象,而用海底电缆连接世界的进程也已开始。但线路连接仍很重要。之后,赫兹发现了无线电磁波。到了 1900 年,科学家们利用电磁理论开始用“无线”电报传递信息。发报机和接收器不再需要任何物理链接。相应的,1901 年即新世纪的第一年以这项发明为标志,马可尼(Marconi)发送了第一封横跨大西洋的无线电报。30 年后,数百万人拥有了无线接收器,他们已不再相信需要打开窗口以接收神秘的“电波”,同时所有主要国家都有了大型广播系统。

1936 年,英国广播公司开设了第一家定期安排的电视广播服务;20 年后,在主要的工业国家中,这种传媒已是司空见惯,现已真正的全球化了。正如印刷业的到来一样,新媒体有着巨大的影响,但为了更全面地评价它们,必须把它们放置在整个现代通讯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尽管新的传媒与印刷业一样,保持着政治和社会的中立(也可说是一把双刃剑),但其影响仍是不可估量的。电报和无线电使得信息传播更为迅速,这可能既对各国政府也对他们的对手有利。电视具有的暧昧立场则更加迅速地得到了展现。它们可能会曝光政府想掩饰的内容从而吸引诸多目光,但也有人认为它们发布的观点服务于那些控制它们的人的利益。20 世纪末,毫无疑问,互联网构成了信息技术的重大进展,但其立场并不明确。它源自阿帕网(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于 1969 年组建),到 2000 年已有 36 亿固定用户。这些用户大部分在发达国家。那时,它所提供的便捷交流有助于革新全球市场并强烈地影响世界政治,尤其是在那些迈向更加开放制度的地区。随着诸如亚马

1011

逊和易趣这些公司在市场上成为最有价值和最有影响力的公司,电子商务(通过互联网买卖消费品和服务)成为21世纪早期美国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到2005年,在北美、欧洲和东亚部分地区,电子邮件作为一种完美的通信方式取代了邮政服务。但与此同时,不断增加的互联网传输速度能力的大部分被用来观看色情电影或玩互动游戏。随着大部分容量被浪费,那些每天大部分时间在线的人和那些没有进入互联网的人之间的社会差异快速增多。

科学和自然

截至1950年,不管人们承认与否,现代工业早已直接或间接,或明或暗地依赖于科学和科学家。此外,到此时,基础科学转化为终端产品往往非常迅速,大部分地区的技术也在不断革新。得知内燃机原理之后,汽车得以大量推广,历时约半个世纪。而最近,微芯片的发明与使用,使得手提电脑在10年左右就能生产。技术进步仍是大多数人意识到科学重要性的惟一途径。然而,技术进步也出现了重要的变化方式,并塑造了他们的生活。19世纪,大多数的科学实践成果往往是科学好奇心的结果,有时甚至是偶然发生的。到了1900年,变化便开始了。一些科学家意识到有意识地、集中地进行研究是很重要的。20年后,大型企业开始认识到研究对正确投资的重要性。即使是很小的一些工业研究部门最终也与其他如石化、塑胶、电子以及生化药物部门一样确立了自己的威信。如今,发达国家的普通公民的生活不得不依赖于应用科学。这一普遍性,再加上最壮观成就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科学获得公认的原因之一。金钱只是一个尺度。例如,1914年之前,剑桥的凯文迪什实验室(Cavendish Laboratory)进行了多次核物理实验,当时学校每年给予实验室约300英镑的费用——按当时的利率折算,大约为1 500美元左右。1939至1945年战争期间,英国和美国人决定必须下大力气研制核武器,"曼哈顿计划"因此而诞生。其成本估计相当于先前人类有记录的所有试验总花费。

如此庞大的数目(战后世界因此产生的花费比这还更高)标示着另

1012

一个重大变化，显示出科学对政府的重要性。几个世纪之后，那些仅被国家偶尔关照的事情，现在却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1945 年以来，只有政府才会提供资源做大量必要的事情。这么做的好处之一是，他们通常寻求研制新式武器，这便是对美国和苏联进行巨大科学投资的解释。但另一方面，参与国政府的兴趣却并不意味着科学日渐国家化，事实上，情况正好相反。科学家之间的国际交流是 17 世纪这样一个伟大科学时代的遗产。即使不是如此，科学也会因为理论、技术原因而冲破国界。

再次，历史背景是复杂和深刻的。早在 1914 年前，个别学科(其中一些自 17 世纪后就已经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之间的界限就开始慢慢地趋于模糊直至消失。但是，这种情况的影响力近期才开始充分显现。1013 如果说 18、19 世纪伟大的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取得了很大成就，那么是物理学家改变了 20 世纪的科学地图。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是剑桥实验物理学的首席教授，19 世纪 70 年代他将电磁学研究首次引入了牛顿物理学未触及的问题和领域。麦克斯韦的理论工作和实验研究深刻地影响了传统观点，即认为宇宙服从于一个自然的、普遍的和可发现的机械力，且它由不同方式和安排组合的牢不可摧的物质构成。这就是新发现的电磁场，其技术可能性迅速获得非专业人士和科学家们的一致认可。

1895 至 1914 年间，现代物理理论诞生的关键在于伦琴(Röntgen)发现了 X 射线，贝克勒尔(Becquerel)发现了放射性，汤姆逊(Thomson)发现了电子，居里夫妇分离出镭，卢瑟福(Rutherford)深入研究了原子结构。他们使人们以一种新的方式观察物理世界。不再是纠缠的物质团块，宇宙更像一个原子的集合体，它们是由不同排列组合的电力黏合在一起的太阳系的微小粒子。这些粒子运动的方式模糊了物质与电磁场之间的区别。此外，颗粒的组合并非固定不变。从本质上讲，一个组合可能是另一组合的基础，因此，一种元素可能转变为其他元素。卢瑟福的工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他认为原子可以“分裂”，原因在于原子结构是一个粒子系统。这意味着即使在最初阶段，

物质就是可以被控制的。很快两个这样的粒子被发现：质子和电子；其他粒子直到 1932 年后才被发现，也就是查德威克(Chadwick)发现了中子。现在，科学世界已经被证明是作为一个粒子系统的原子结构。但迟至 1935 年，卢瑟福认为核物理将没有实际意义——并没有人反驳他。

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是，科学家们并未立即展开实验工作以提供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取代牛顿的体系，只是从理论上进行了长期的争论。这开始于 19 世纪最后几年，并于 20 世纪 20 年代达到顶峰。

1014

它侧重于两类不同的问题，引发了相对论和量子理论指导下的研究。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是开拓者。到了 1905 年，他们提供了实验和数学证据，认为牛顿运动规律是一个对一些从未被反驳的事实解释不足的框架，即物质世界的能量转换不是发生在流动中而是在分离运动中——这在后来被称为“量子”。普朗克发现热量(例如来自太阳)并非如牛顿物理学认为的那样持续射出；他认为这是真正的能量转换。爱因斯坦认为光并非不断传播而是粒子运动导致的。虽然在接下来的 20 年里又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但普朗克的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可终极定论并未诞生。牛顿的观点已被发现是有缺憾的，但却没有产生可以取而代之的框架性理论。

同时，爱因斯坦在研究量子后，于 1905 年出版了专著，因此而受到广泛关注，这也是他庆祝相对论发表的声明。它基本上是打破空间和时间，质量和能量传统区别的宣言。它打破了牛顿的三维物理，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空间——时间连续性”，该理论可以理解空间、时间以及运动的相互作用。很快天文观测证实了牛顿宇宙学的不足，但在爱因斯坦理论中可以找到答案。相对论研究的一个奇怪且意料之外的结果是他关于质量和能量之间关系的论断，以此论断得出一个公式：$E=mc^2$，其中 E 代表能量，m 代表质量，c 代表恒定的光速。大量核子物理试验之后，这一理论建构的重要性和准确性才逐渐得以清晰。当原子核裂变过程中质能转换为热能时，这一关系也就更为明显，并且同这一

公式也很吻合。

虽然吸收了这些成绩并试图改写物理学，但他们远没达到这个程度，直到 1926 年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终于为普朗克的观测和核物理提供了一个数学框架。薛定谔(Schrödinger)和海森堡(Heisenberg)两位数学家的成就也同样在影响力上波及全世界，他们为量子力学在科学上的无限解释力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可以对卢瑟福和玻尔(Bohr)发现的原子里面的粒子运动进行解释。他们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导致了新核粒子存在推断的出现，即于 20 世纪 30 年代得以发现的正电子。新粒子的发现持续着。量子力学似乎已经开创了物理学的新时代。

1015

到本世纪中叶，相较于曾经被接纳的一系列一般规律而言(任何情况下，对于日常而言，牛顿物理学仍然是所有的基石，这一点儿是毫无异议的)，科学上的很多内容消失了。物理学已扩展到其他学科，一般规律的概念已被统计概率概念所取代，我们可能希望这是最好的。这一有关科学的观点和内容则是不断变化的。此外，科学之间的界限在新理论和仪器产生的新知识的冲击下已经崩溃。任何一个有关科学的伟大传统分类很快就超越了一个人的观点。把物理学理论运用到神经病学、数学或生物学的综合方式，又为 19 世纪人们都希望获得综合知识梦想的道路铺设了障碍，因为获取新知识的概率(从数量上，它只能通过新近的可用的计算机来处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这种考虑并没有削弱科学家或信仰的威信，他们是人类更好地管理其未来的美好希望。他们开始怀疑起来，原因并非因为他们没有能力研究出一个像牛顿定律那样曾经可以解释一切的包罗万象的理论，而是有其他原因。同时，科学的具体进步仍在继续着。

1945 年后，接力棒从物理学传递到生物或“生命”科学。它们的成功再次影响深远。17 世纪，显微镜的发明首次让人们观测到组织机构可以被分解为具体的单元，即细胞。19 世纪，研究者早已发现细胞可以分裂，而且是单独成长的。于 1900 年被广泛接受的细胞学认为，单个细胞提供了一个研究生命的好方法，它与应用化学的结合还成为生物学研究的主要途径之一。19 世纪另一个主要进步是，生物学促生了

一个新的学科——遗传学,即对后代遗传父母特征的研究。达尔文曾认为遗传是通过自然选择而获得特质繁殖的重要手段。19 世纪五六十年代间,奥地利僧侣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使得理解这一原理成为可能。经过一系列细致的豌豆育种实验,孟德尔得出结论,存在控制从父母遗传给后代特质的遗传单元。1909 年,丹麦人把它们命名为"基因"。

1016 渐渐地,细胞化学逐步得以理解,基因的物理现实已被接受。1873 年,物质的细胞核可能是所有活着物质的决定因素,这一观点已经确立。随后,实验揭示了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位置,在 20 世纪 40 年代,基因被证明控制着蛋白质的化学结构,是细胞的最重要构成。1944 年,科学家开始迈出研制带来某些细菌变化的特效药的第一步,因此进一步控制蛋白质的结构。20 世纪 50 年代,它最终被确定为"DNA",其物理结构(双螺旋)于 1953 年被认知。这一物质(它的全称是脱氧核糖核酸)的重要性在于,是遗传信息载体决定了作为生命基础的蛋白质分子的构成。最后,人们还认识到了在生物现象多样性背后的化学机制。这表明了自 19 世纪达尔文主义被传播后,人对自己生理上的,也许是心理上的看法的前所未有的转变。

DNA 结构的识别和分析是迈向新的操纵自然、塑造生命形式进程的最为显著的一步。早在 1947 年,已经创造出"生物技术"这一词语。再次,不仅有更多的科学知识,也还有研究领域新的定义和新的应用随之出现。"分子生物学"和"基因工程",如"生物技术"一样,迅速成为人们熟悉的术语。一些生物体的基因可以改变以便于给予这些生物体新的和可取的特点很快就变得很明显这一点。通过控制它们的成长过程,酵母和其他微生物也可以产生出新物质,如酶、激素或其他化学品。这是新科学的早期应用之一;千百年来在制作面包、啤酒、葡萄酒以及奶酪中积累的有经验和非正式的技术和数据最终被超越。细菌的遗传变异现在可以产生新的化合物。截至 20 世纪末,美国种植的大豆四分之三是转基因种子,而像加拿大、阿根廷和巴西这样的农业国家已开始种植大量的转基因作物。

更引人注目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科学家们开始了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协作调查，即人类基因组计划。其难以想象且雄心勃勃的目标是绘制人类基因组图谱。科学家要确定人的基因的位置、结构和功能——据说每一个细胞里的基因数目在3万至5万之间，每个基因拥有多达3万对四种基本组成化学单元，形成了遗传密码。本世纪结束时，该项目宣布已经完成。（不久，科学家发现了人类拥有的基因数大约只是果蝇的两倍——实际上比预期的要少得多）人们已经打开一个操纵伟大未来的大门——它意味着什么早已在苏格兰实验室第一次成功地“克隆”羊时初见端倪。目前，缺陷基因的筛查也是一个现实，且更换其中一些是可能的。这对社会及医疗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日常水平，所谓的DNA——“指纹”是现在警务工作中从血液、唾液或精液样本中识别一个人的重要内容。

1017

到2005年，日益清楚的是，基因工程可能会对我们的大部分未来产生重大影响，尽管在这个领域的很多研究项目引发了公开辩论。基因学者创造的“新”微生物现在可以取得专利，因此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商业化成为可能。此外，转基因作物通过创造更具有抵抗力和多产的菌株来增加产量，从而使一些地区第一次在主食上获得自给自足的机会。但同时产生了明显的利益冲突。由于提供可能不安全的食品产品，以及世界性的大型跨国公司在研究与生产上日益占据统治地位，生物技术也受到了密切关注。当对人类物质的基因研究涉及诸如在胚胎干细胞方面的研究时，这些关注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变得特别强烈。很多科学家在如何应对公众不断增加的巨大关注问题上归于失败，大部分源于20世纪历史的警告。

这些事情进展的惊人速度，大部分要归因于新的计算机能力的应用，科技进步加速的另一个实例是，既能促进新知识的快速应用，又能用新观点来挑战世界的预设判断，而这些必须考虑到普通人。然而，仍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看到此类挑战意味着什么或可能意味着的意思。尽管近来生命科学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它们的重要性是否被一个极小群体之外的广大民众所感知，是值得怀疑的。

太空：人类的新环境

20世纪中叶的一个短暂时期，科学的能量在太空探索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人类生存环境可如此延伸，这或许在某天会让其他的历史进程（本书用较多篇幅来讨论的那些）相形见绌，但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迹象。然而，它表明人类文化应付前所未有的挑战的能力与以前一样重要，并为人类统治自然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壮观的例子。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太空时代始于1957年10月，即无人驾驶的苏联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Sputnik Ⅰ）由火箭发射，很快开始绕地球旋转，并发射回无线电信号。其政治影响是巨大的：它打破了苏联技术明显落后于美国的观点。然而，这一事件的充分意义仍模糊不清，因为大多数观察家关注的是两大超级大国的对抗。事实上，它结束了质疑人类能够太空旅行的时代。因此，无意之间，它具有了像欧洲发现美洲或工业革命一样的重要性，是打破历史连续性的重要标志。

1018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太空探索已经出现。它们此时已在小说中吸引了西方公众的目光，尤其是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和威尔斯（H. G. Wells）的小说。相关技术的出现也差不多可追溯至这段时期。1914年之前，一位俄国科学家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K. E. Tsiolkovsky）设计了多级火箭并且制定了许多太空旅行的基本原则（且他写了部小说以使他的观点普及化）。1933年，第一个苏联液体推进剂火箭起飞（高度达3英里），六年后，苏联发明了二级火箭。二战催生了一个德国火箭计划，而美国于1955年开始提出自己的计划方案。与苏联（它早已领先）相比，美国寻找更加轻便的硬件，美国第一个卫星重3磅（史普尼克一号重达184磅）。1957年12月底，美国做了大量宣传，但火箭并没起飞而是葬身火海。美国人本可以做得比这次更好，但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一个月后，又发射了斯普特尼克二号，一个惊人的成功机器，它重达半吨，并携带了太空的第一个乘客，即被称为莱卡的黑白狗。这颗卫星围绕地球旋转了近6个月，全人类都目睹了这一历程，但它也激怒了数千名爱狗的人，因为莱卡再也回不来了。

之后,美苏的太空计划开始分道扬镳。苏联人在战前经验的基础上,侧重于关注火箭的力量和大小,让它可以承载大负荷,因此它们的重量继续增加。与美国将注意力集中在数据搜集和仪器上相比(同样深刻,但不那么引人注目),苏联这样做的军事意涵更为明显。两国很快展开了你争我夺的竞争活动。尽管被人们称为"太空竞赛",竞争双方实际上在奔向不同的目标。除了一个例外(希望首先把人送到太空),美苏的技术决策可能不怎么受到彼此行为的影响。显著体现这种对比的是,美国于 1957 年 12 月发射卫星失败后,于次年 3 月才成功发射。虽然它很小,但是它比任何先驱走到更深层的空间,并按它的大小比例来说提供了比其他任何卫星更有价值的科学信息。这些科学信息可能几个世纪之后才得以传播。 1019

新成绩接踵而至。1958 年底,第一颗用于通信的卫星成功发射(美国造)。1960 年美国人又取得了另一个"第一"——发射并回收了太空舱。苏联人紧随其后,发射并回收了 4.5 吨重的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五号,其上载有两只狗,它们成为第一对进入太空又活着安全返回地球的生物。次年春天的 4 月 12 日,苏联载人飞船载着一个名为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的人起飞了。它用了 108 分钟绕着地球旋转一圈后,又带着加加林安全着陆。在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四年后,人类的太空生活已经开始。

可能是为了抵消美国与古巴之间最近的公开危机的不利影响,1961 年 5 月,肯尼迪总统提出十年内应该尝试送一个美国人到月球上(第一个人造物体早在 1959 年坠落在那里),并让他安全返回地球的登月计划。肯尼迪公开陈述了理由,并把它与 15 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统治者支持麦哲伦和达·伽马航海进行了对比。理由有四,首先,它提供了一个好的国家目标;其次,它将会很著名("令人印象深刻的"这是总统的原话);第三,太空探索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某种程度上奇怪的是)将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且需要高额的费用。肯尼迪说这无关科学的进步,无关商业或军事优势——事实上,什么是他真正的动机:那就是要在苏联之前做到。令人惊讶的是,该计划并未遭到反对,且第一笔

费用很快到位。

20 世纪 60 年代初,苏联持续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他们于 1963 年把一名女士送到了太空,这也许是最令世界兴奋的。但飞船的大小仍是它们技术能力的最好体现——1964 年,苏联推出了载三人飞船——次年又实现了第一次"太空行走",宇航员从船舱走出来且在外行走(尽管使用了救生索)。苏联人进一步实现其在飞船和控制他们回舱之间的对接,但 1967 年(太空旅行第一例死亡年,一名苏联航天员在返回时死亡)后太空成就向美国人转移。1968 年,美国取得了轰动的成功,发送一个载 3 人的飞船进入环绕月球的轨道,并向地面发回电视画面。这就是著名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它的后续项目也很成功。

1020

1969 年 5 月,一艘飞船被该计划的第十个火箭送入轨道,与月亮只有 6 英里的距离以评估着陆最后阶段的技术。几个星期后,7 月 16 日,3 名宇航员搭载飞船起飞。四天后他们的登月飞船降落在月球表面。第二天早晨,7 月 21 日,航天员阿姆斯特朗作为该次任务的指挥员,将左脚踏到月球上,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踏上月球的人。肯尼迪总统的目标提前实现。其他着陆行动紧随其后。这个十年中,美国政治上在加勒比地区受辱,最终又在亚洲陷入战争泥潭,登月计划相比之下是美国重申它(某种意义上指的是资本主义)可以做它想做的事情的胜利宣言。这也是现代人拓展其生活环境的最新和最伟大的延伸,人类历史开始了新阶段,开始探索其他天体。

即使在当时,这一伟大的成就也遭到了谴责,以及到了现在仍难以摆脱这种反高潮的感觉。批评者认为,动用该计划所需的资源是不合理的,因为它无关地球的实际问题。某种程度上,太空旅行技术似乎已是我们文明的金字塔,巨大投资用在错误的事情上,世界需要金钱用于教育、营养、医学研究——太空研究徒有虚名但并非迫切需要。由此不难赞同这一观点。然而,太空探索深远的科学和经济影响是难以量化的;它需要使用小型化的知识控制系统,例如,迅速波及明显的社会和经济的应用价值。事实上,既不能说这一知识必然把投资太空放在第一位,也不能说,我们相信投向太空探索上的资源会有助于实现任何伟

大的科学或社会目标，而它们的使用目的并未朝这个方向迈进。我们的社会机制并不是如此工作的。

1021 所发生的事件具有的神秘力量也必须加以考虑。不管有多令人遗憾，现代社会似乎无力唤起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热忱来为集体目标奋斗，只有短期的例外（或在战争期间，而战争的“符合道德的等价物”——正如一位美国哲学家1914年之前就很好地阐释一样——却仍未寻得）。大多数人的想象力并非真正被国内生产总值或引进一个更细化的社会服务体系所点燃，不管它们从根本上多么值得追求。肯尼迪制定的国家目标是明智的，20世纪60年代陷入困境的美国人面临太多煽动和分化，但他们并没有阻挠太空探索任务。

正如过去一样，太空探索也变得更加国际化。20世纪70年代前，最大的两个国家即美国和苏联之间很少合作，努力大量重复且效率低下。10年前，美国人在月球上插上了美国的国旗，苏联的任务就是要在月球上插上列宁锦旗。这似乎是不祥的；在科技比赛本身和民族主义上的国家竞争可能会挑起“空间争夺战”。但这一竞争的危险被避免了，两国在“天体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上达成了一致。1975年7月，距离地球上空约150英里，合作成为现实，苏、美发射飞船进行联合对接飞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尝试，使得双方航天员进行飞船间访问。尽管存在疑虑，但在一个相对和谐的国际环境下的这种探索仍在继续。对更远的超过木星的太空的视觉探索是由无人卫星执行的。1976年，一架无人探索飞船首次登陆火星。1977年，作为第一架可重复使用的太空飞行器——美国航天飞机实现了首航。

这些成就是巨大的，但现在仍未引起关注，我们的想象力已经疲惫。一个新的熟悉太空旅行的观点如此迅速地成长起来，到了2000年，似乎只有美国人应该作为第一个付费太空旅行的乘客的论断显得滑稽。安全降落在月球上并返回，乃是对下列观点的绝佳证明，即我们生活在一个可被操控的宇宙中。这样的行为曾被认为是魔幻的，但现在都已成为科学技术。但整个自然界可被操纵，历史上人类对此的自信心不断增长。登月是这一连续历程中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不亚于火的掌握、农业的发明或核电的发现。

1022 它可以与发现新大陆的伟大时代相比拟，但时间跨度有所不同。葡萄牙用了80年左右的探险，发现了非洲和印度；而把第一个人送入太空到人类登陆月球只间隔了8年。1961年设定的目标大约18个月便成功实现。它也证明了太空探索的安全性。尽管仍有一些意外，即使根据一名乘客一英里死亡人数的计算，它仍然是已知的最安全的运输形式，而15世纪的航海则是一个冒险的行为。更确切地来说，搭载"圣玛丽亚"号、甚至"五月花"号旅行的风险也一定远大于"阿波罗"号上宇航员面临的风险。但两者也有一定关联。海洋探险时代很长一段时间主要由葡萄牙人主导，它为知识的缓慢积累奠定基础。渐渐地，随着数据一点一点的增加，探险的基础逐渐扩大。绕过好望角时，达·伽马不得不选择一个阿拉伯航海家。前方全是未知海洋。五百年后，"阿波罗"号在一个更广泛的但仍在积累的基础上发射，这几乎是人类的全部科学知识。1969年，已知的到月球的距离，已具备的人们到达那里的条件，包括他们可能会遇到的危险，能量的数量以及他们返回将需要的其他支持系统的性质、供应，他们身体所能承受的压力都已经被较好掌握。尽管可能会出错，人们也普遍感觉到不会出错。可预见的，正如量变到质变，太空探索是文明基础上的科学缩影。或许这就是太空为何不像先前的伟大发现一样，可以改变人类的思想和想象力。

七八千年间人类控制自然能力提升的背后，是数万年的史前探索史，其技术是从一把利刃可以放在石头上打磨以及火是能够掌握的向前推进的，而笼罩在人类身上的遗传编码和环境压力的重担仍大于有意识地控制。在人类的身体结构被固定为今天的这个样子之后，人类意识到他们能在有意识控制方面做得更多，这是人类进化迈出的一大步。有了这种意识，控制和利用经验已成为可能。

新关怀

1023 然而，早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人类干涉自然而产生的新的不安致使太空探索在人们的大脑中蒙上了一层阴影。苏制人造卫星斯普特

尼克一号发射的几年内,人们开始对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关系这一熟悉观点的思想根源进行质疑。这种不安现在可以清楚地表达出来,基于迄今不能得到或在当时也未被考虑但可观察到的事实;是科学本身提供的仪器和数据挫败了正在进行的事情的积极性。干涉环境可能带来的破坏开始显现。

当然,这种认知是全新的而非仅是引发它的现象。人类(或许是他的前辈)总是挣扎于他居住的自然界,改变了自然的很多内容,且毁掉了其他物种。一千年后,人口南迁,以及美洲旱地作物的引入毁坏了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森林,侵蚀该地区土壤,致使长江排水系统淤塞,最终使得大部分地区重复水涝。中世纪早期,伊斯兰征服带来的是在北非沿岸地区放牧山羊和砍伐树木,摧毁了曾能填补罗马粮仓的肥沃土地。尽管这种变化并非没人注意到,但却不被理解。然而,起源于 17 世纪被欧洲人向前推进的生态干涉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把事情推向高潮。20 世纪后半期,未经深思熟虑的技术能力将危险强加给了人类。人们开始估算成本和收益,截至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即使人类掌控环境的故事是一部史诗,但也很可能变成悲剧。

随着 17 世纪科学革命的权威和影响逐渐展开,虽然只限于几个幸存的原始的或反对改革的飞地,但西方社会对科学的怀疑从来未完全消失。历史可以提供大量干扰自然并试图控制它而引发人们不安的证据,但直到最近,这种不安似乎还停留在非理性的理由上,如害怕挑起神怒或遭到报应。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成功干扰自然而带来的明显好处和进步,这种观点不断被削弱,最明显的是通过各种商品形式创造的新财富,从更好的药品到更好的衣服和食物。然而,20 世纪 70 年代,对科学本身的一种新的怀疑在国外流行,即使只是在少数人之间和富裕国家中。一个愤世嫉俗者可能说过,科学的红利已经结束。尽管如此,怀疑主义者表示这种表现本身就存在着,20 世纪 80 年代,"绿党"致力于促进制定保护环境的政策。他们不可能取得太大的成就,但他们却壮大了;一些已成立的政党和敏感的政治家也因此把"绿色"主题当成政治玩具。环保人士利用现代通信的新进展,从之前的沉默寡

1024

言转而迅速发布令人不安的新闻。1986 年，乌克兰核电站发生爆炸。突然间，人类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清晰可见。威尔士羔羊吃的草，波兰人、南斯拉夫人饮用的牛奶，瑞典人呼吸的空气，全都被污染了。多年来，无数俄罗斯人死于核辐射的缓慢影响。数百万人在电视上看到美国的火箭炸毁而无生还的事件之后没多久，电视又把这一震惊的消息带到了千家万户。切尔诺贝利事故及其挑战者首次向更多人展示了先进技术的局限性和可能带来的危险。

这次事故加强了人们对环境的新关注。关注很快与其他纠缠在一起。最近出现的怀疑尽管接受我们的文明善于创造物质财富的观点，但认为要注意的是，这本身并不一定给人们带来快乐。这并非一个新观点，但它总体上是应用于社会，而不是把个人作为新重点。这便导致了这样一种广泛的认知，即社会条件的改善并不能消除所有人的不满，且实际上还更可能激起其中一些人的愤懑。污染、难以忍受的拥挤的城市、紧张的压力以及现代工作条件的压力，很容易消除物质利益带来的快乐，何况这并不是新问题：1952 年在英国，一个星期内有 4 000 人死于大气污染，但所谓的“烟雾”在此之前早已存在了近半个世纪。目前，其规模本身也成为一个大问题。一些现代城市，甚至可能已经发展到现有问题的临界点，而目前又解决不了。

有人担心资源如此浪费从而使我们面临一个新的马尔萨斯危险。1025 能源从未像今天这么奢侈地使用。一项统计表明，20 世纪人类已使用的能源比以前的整个人类历史(换言之，就是过去一万年内)使用的还多。然而，这个最佳估计数并未说明促进大部分增长的矿物燃料消耗殆尽后将带来的巨大灾难。我们也没有通过任何方式达到生产粮食能力的极限，虽然我们比过去有了更多耕地(在过去的一个世纪，耕地的面积翻了一番)，但如果整个世界以当今发达国家的水平来消费食品之外的其他商品，这也是不可能满足的。一个人能吃的有限，但在一个舒适的环境、良好的社会服务以及医疗保障的社会中，实际上很难知道他或她要消费什么。我们可能无法控制能源消耗给环境带来的难以避免的问题(比如，对臭氧层的污染或损坏)，并进一步强化了这些问题的不

可忍耐性。伴随着那些尚未把握但早已出现的变革，产生了一些社会和政治后果，没有任何事情能与知识、技术或目标的共识相比拟，如人类能够登陆月球。

由于一个新幽灵困扰着本世纪的最后十年，因此这些后果也变得更加明确——人为的可能性，及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1990 年还没结束，据说就已被认为是有气候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这就是有人说的由于人类使用矿物燃料而排放的大量二氧化碳造成的"温室效应"、"全球变暖"的迹象吗？据估计，与前工业化时代相比，现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高出 25%以上。可能这是准确的(据说每年世界释放的此类物质为 60 亿吨，但这不是门外汉该争论的问题)。二氧化碳并不是空气中阻止地球散热气体增加的惟一贡献者；甲烷、氧化亚氮和氟氯化碳都加重了这一问题。如果全球变暖还不足以担心的话，那么，酸雨、臭氧耗损导致臭氧层的"空洞"，以及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砍伐森林，所有这些都为新的环境关注提供了依据。如果没有出台有效的应对措施，这些行为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表现在人们对气候变化(下个世纪，地球的平均地表温度可能会上升 1 到 4 摄氏度)、农业转型、海平面上升(每年 6 厘米被认为是可能且可信的)以及大规模迁移的担忧。

1026

联合国关于气候变化的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在 2005 年生效，这是一个通过限定大气层温室气体排放量来处理这些问题的一次尝试。38 个工业国承诺到 2012 年将其排放量减少至 1990 年以下水平。但是世界最大的污染排放国美国，拒绝签署，而世界第二大污染排放国中国，由于其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而免除了大部分义务。即使各缔约国履行他们的承诺，大部分专家认为要消除全球变暖的长期影响，还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到 21 世纪初，很明显的是，如果主要国家最终实现的是合作而不是竞争的话，那么将有很多共同关心的问题需要人类合作解决——如果他们能在必须要做的事情上达成共识。

信仰与态度

历史学家不应该武断地推测大多数人心中在想些什么，因为他们

并不比其他人知道得更多;哪些人留下了突出的证据,他们知道有关哪些人的事情就最多,但这些并非典型。在推测他们认为的影响时应该谨慎。显然,近来政治对环境问题的回应,表明思想观念的变化很快会影响到我们的集体生活。即使只有少数人知道臭氧层,这也会变为事实。这种思想很是普遍,一个含糊、欠定义的词语仍具有历史影响;一名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发明了"习惯蛋糕"(cake of custom)的表达方式以说明根深蒂固的、通常不容质疑的判断,这代表着大多数社会中有着重要分量的保守分子。对于观念如何发挥作用的教条式主张比认为思想如何被具体问题纠缠在一起(如环境变化)更危险,但人们必须作出努力。

例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商品日益丰富,以致最近打破了百万人期待的——不久前仍没有的——一个稳定的世界。但这种情况仍然发生着,尤其是在一些最贫穷的国家更为突出。便宜的消费品及其代言人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广告中,特别是在电视上,带来了重大的社会变革。这些商品包含了地位;它们能够激发嫉妒和野心,激励人们为工资工作从而购买它们,并经常鼓励人们为工资向城镇和中心城市迁移。这隔断了与传统方式和规律的、稳定的生活之间的联系。但它只是加速现代化进程激流中的一个表现而已。

1027

这一变化过程的部分复杂背景存在一个明显的悖论:20 世纪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看都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可怕的悲剧和灾难,但如今很多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相信人们的生活和世界条件都会改善,可能是永远的,因此它们应该会这样。这种乐观态度的根源可追溯到几个世纪前的欧洲,直到最近,这一观点被限定在植根于这片大陆的文化之中。它们在某些方面仍取得了很大进步。即使被问及时,很少有人能够有如此清楚、自觉的想法,却有一个共识,行为改变无处不在。

几乎可以肯定这种变化很难归咎于劝诫说教(尽管已经有很多),而是归功于物质变革,这一变革造成的心理影响有助于打破传统。在许多地方,它们有助于理解改变实际上是可能的以及事情并不总是这样。过去,大多数人类社会主要由被共同的常规、传统、季节和贫穷束

缚着的农民构成。现在,人类之间(比如欧洲工厂的工人和印度或中国工人)的文化鸿沟通常是巨大的。工人和农民之间也是如此。然而,即使农民也开始感到变化是可能的。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不仅仅知道变化是可能,更是可以实现的,这是所有文化胜利中最重要、也最具有破坏性的因子——它起源于欧洲,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

技术进步常通过破坏宽泛领域中传统行为的方式促进了这种变化。如前所述,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更好的避孕方式的出现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避孕药"迅速扩散,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巅峰。尽管西方社会的妇女在这些问题上有着有效的技术和知识,避孕药——本质上是一种抑制排卵的化学手段——却暗示了性行为中的权力向妇女转移。尽管非西方世界妇女使用避孕药没有像西方国家一样如此广泛,尽管并非所有发达国家都在法律上给予了认可,并通过它潜在存在的传播开创了性别关系的新时代。但科技改变社会的能力的很多例子是可以借鉴的。例如,在交流技术上两个世纪的变化,尤其是过去的六七十年的变化,对历史文化而言的意味更为久远,换言之,它意味着印刷时代的到来,要感知这些并不困难。技术进步也常通过看似神奇的科学力量发挥功效,因为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有许多科学家对此予以关注;他们更加重视科学教育;科学信息通过媒体可更广泛地扩散,且更容易理解。 1028

然而,矛盾的是,正如太空探索的成功一样,收益却递减了。当越来越多的东西被证明是可能的时候,新近的奇迹并没有令人惊讶。当一些问题顽固不化时,甚至出现了(不合理的)失望和愤怒。要努力抓住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以及在具备足够资源的情况下,自然会发生有针对性的变化这一观念,尽管它受到强烈批评但越发显著。目前科学虽已遍及世界各地(都是以欧洲的传统实验为基础),但仍散播破坏以神为中心的、传统的人生观的思想,这是欧洲观念。与之相伴的是,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批判超自然观点的漫长过程的高级阶段。

科技从而既会削弱传统权威和习惯方式,也会接受思想观念。即使它们是为某个社会提供物质和技术支持,但它们的资源也会提供给

批评家使用。科学家们的所作所为很难被广大公众所熟知，然而，即使大多数人传统意义上的虔诚和迷信并未受到干扰，也不可能停留在熟悉的轨道上，这一点是明确的。当然，不仅对于思想文化史上非常著名的知识分子来说，而且对于多数靠着遗传来的假设和偏见生活的人而言，这都是事实。科技的第二个作用在近代历史上比早期更重要，是由于通讯改善比之前更能迅速地把新思想传播给大众，尽管仍更容易把握科学思想对精英的影响。18 世纪，牛顿宇宙学与基督教以及其他有神论思想共存，并未带给与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和道德信念麻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科学根本上很难与任何固有信念调和。强调相对主义和环境压力以排除任何不容挑战的假设或观点，有时也会出现。

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即新的科学分支——心理学从 19 世纪开始衍生。1900 年后，普通公众开始听说更多有关心理学的知识，尤其是它的两种表达方式。其一是，最终有了“精神分析”的名称，它被认为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开始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工作，并已经开始应用到临床观察，这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由于其是药物外发挥的作用，他的这一理论迅速传播并家喻户晓。经过大量的临床工作后声称的它的科学性(尽管其地位受到许多科学家质疑)，它否定了许多公认的假定，首先是对性、教育、责任以及惩罚的态度。弗洛伊德的工作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通过揭示病人潜意识的意愿、感受和想法而搜集的相关临床数据，治疗是可行的。对于艺术家、教师、伦理学者以及广告专家来说，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礼物。与此同时，另一种心理方法是被实践者追捧的“行为主义”(如“弗洛伊德”和“心理分析”一样，这个词语经常被滥用)。其根源于 18 世纪的思想，其获得人体的实验数据与精神分析的临床成功试验一样令人印象深刻(可能不如)。与行为主义相关联的一个先驱是俄罗斯人伊凡·彼德罗维奇·巴甫洛夫(I. P. Pavlov)，即“条件反射”的发现者。这取决于对实验中变量的控制，为了通过“条件反射”(经典实验是，先摇铃再给狗食物；一段时间后，摇铃声但不给食物将刺激狗分泌唾液)得到可预见的行为结果。这一程序的改进和发展提供了很多信息，并被认为可以观察人类行为。

1029

无论这些心理研究可能带来怎样的好处，但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最引人关注的是弗洛伊德和巴甫洛夫为不容易定义的文化变革作出了巨大贡献。与利用化学、电力以及其他物理干预方式医治精神病患者的疗法一样，两者的学说必然揭示了欧洲道德文化核心中对道德自主权和个人责任的传统尊重的缺陷。它们的重要性现在又得到了19世纪地质学家、生物学家以及人类学家的推崇，是这些人打破了宗教信仰。

无论如何，西方社会中神秘和莫名的事情被神奇或宗教手段控制的旧观念力量现在似乎已经减弱。可以承认的是，无论走到哪儿它很快被接纳，即使有时会停滞并处于初级阶段，科学成为管理大部分生活的途径。但谈及此类事情，人们需要非常详细的证据。当人们谈及宗教衰退的时候，他们往往只是指基督教教会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行为和信仰是完全不同的问题。450年前，自伊丽莎白一世以来，没有一个英国君主再向占星家寻求加冕的吉祥日子。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当听说美国总统的妻子喜欢占卜，全世界都被逗乐了(也许有点焦虑)。 1030

1947年，印度独立仪式的时间是在占星家们的磋商后确定的，尽管印度拥有一部非宗教的且从理论上说是世俗的宪法，因此这一例子显得更典型。在伊斯兰国家之外，现在全世界范围内宗教国家或成立宗教是罕见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宗教信仰或宗教追随者的真正实力有所下降。巴基斯坦的创始人是世俗派、西化的人，但在独立后他们在与保守派乌里玛的斗争中却失败了。巴基斯坦随后成为一个正统的伊斯兰国家，而不是一个世俗的、西化的民主国家，它把伊斯兰教作为它的子民中多数人信奉的宗教。

今天，更多人关注宗教权威的言论，这是事实：毕竟人口也更多了。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当伊朗神职人员宣告一个流行作家是伊斯兰教叛徒，并宣告他的死亡判决的时候，很多人都吓了一跳；对于思想正统的人及进步圈子而言，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正如从前一样，中世纪传统仍然在世界一些地区全面铺开，而他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当他们的穆斯林同胞同意法学家的裁决时，他们甚至更震惊。尽管“原教旨主义”是借鉴美国宗教社会学的一个词语，在基督教内也存在，但

它表达了那些感受到现代化威胁的人对现代化的抗议。然而,一些人认为,西方社会提供了一条其他社会向它学习的路径,且传统的西方自由主义将会盛行。可能会是这样。同样,也可能不会是这样。宗教和社会的相互作用非常复杂,最好要谨慎。前往麦加的朝圣者数量的急剧上升可能表示一种新的热情,或可能仅是由于拥有了更好的航空旅游设施。

近来,穆斯林大声疾呼重申自己的信仰是值得警惕的。然而,伊斯兰教似乎并不能避免欧洲传统的技术和唯物主义的文化影响。伊斯兰社会中激进分子经常与西化的伊斯兰精英发生冲突。当然,伊斯兰教仍然是伊斯兰团结的信仰和观念,而它远未在伊斯兰土地上消失。它仍可以鼓励人们行动。1947 年印度独立时,宗教与强大的社会势力一起,在印度次大陆制造了可怕的大屠杀。1971 年,宗教导致东孟加拉脱离巴基斯坦成为现在的孟加拉国。在北爱尔兰阿尔斯特和爱尔兰,爱尔兰宗派以 17 世纪欧洲宗教战争时代的语汇来表达愤恨,探讨未来,尽管没有过去那么猛烈。虽然不同宗教的阶层和领导人发现应当表现得友好,但不能不说,宗教仍是一股分裂的力量。教义可能变得更加隐秘,但无论宗教的超自然内容是否正在失去其在世界各地的控制力,且作为一个团体成员的身份标志是否很重要,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

1031

毋庸置疑,当今世界发端于基督徒们,他们塑造了这个世界,随着基督教信仰的缺失,宗教冲突随之减少,勇气也丢掉了。基督教内的普世教会运动,最突出的表现是 1948 年世界基督教堂理事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罗马没有加入)的成立,很大程度上这归功于发达国家的基督徒们逐渐意识到他们住在恶劣的环境中,也由于对基督教及基督教的宣称有着诸多未知和不确定性。基督教惟一充满生机的标志是罗马天主教徒人数的增长(主要是自发增长)。大多数基督教徒已不是欧洲人,其教徒构成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有了转变,当时教皇首次访问南美洲和亚洲,1962 年,梵蒂冈拥有 72 个非洲血统的大主教和主教。1980 年,世界 40%的罗马天主教徒主要在拉丁美洲,大部分的

主教学院坐落在欧洲之外。

教皇在罗马教会的历史地位，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削弱，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本身就提供了一些迹象。若望二十三世认为梵蒂冈应更加"与时俱进"(Aggiornamento)，甚至谈及要尊重伊斯兰教义中传递的"真理"，其激进程度可见一斑。但在1978年(本年有三个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登上教皇宝座，他是450年来第一位非意大利人教皇，历史上第一位波兰籍教皇，也是第一位坎特伯雷大主教出席其加冕仪式的教皇。他的果断很快显示出他运用历史权威及其利用保守观点执政的决心；然而，他也是第一位亲自前往希腊的教皇，以寻求与东欧东正教教会的和解。

1032

1989年东欧剧变(特别是他的祖国波兰的那些变化)大部分归功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道德权威和实践主义。2005年他去世，成为历史上任职时间第三长的教皇，并留下了一份混合的遗产：作为一位坚定的教义保守主义者，波兰籍教皇对他所看到的不断渗透当代世界的唯物主义关注的与日俱增，尤其是在他帮助下摆脱共产主义过去的那些国家。推动机制改革将是危险的，这一机制的历史与罗马教皇的命运一样坎坷(上至希尔德布兰德的教会改革，下至大裂教及和解主义；上至特伦特，下至启蒙；直至第一次梵蒂冈会议的召开)。其他姑且不论，至少承认这一点是板上钉钉的：在百万罗马天主教徒看来，20世纪知识以及避孕技术认同上的进步，第一次对罗马的权威造成致命的伤害。

半个世界

近代，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变革表明了它们的重要性和影响力；毕竟，尽管我们通常认为它是妇女史的一部分，但避孕对全人类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即使从一个侧面考察主体是传统的简易方法，但男性和女性的关系应被视为一个整体。尽管如此，即使很粗糙也可以大致衡量和判断决定妇女命运的因素，并很快发现虽然这一变化很大，但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根本性的改变只发生在少数地方，(如果有的话)也只能从近100年的历史衡量。我们已认识到这一变化；大多数西方国

家妇女的生活,已大大不同于她们的曾祖母的生活,而世界一些地区的妇女生活千百年来一直未发生变化。

我们很容易观察到妇女与男人一样具有的政治和法律平等的进步。目前,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接受一些女性参政,且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国家),正式的和法律上的性别不平等已受到长期的攻击。对此的持续道德质疑必然要求满足平等主义者的意愿。试图保证公平对待妇女的立法范围一直稳步扩大(例如,意识到长期以来一直被忽略的女性就业上的弱势)。因此,甚至不顾保守派的抵制,在非西方国家也有类似具有影响力的例子。这是一个改变观念的新的推动力,当然,由于技术和经济变革,在妇女劳工已拥有越来越多机会的国家中,它已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她们能够获得的工作机会主要是纺织工人和打字员,后来又增加了百十个新角色,由于她们掌握了其他技术技能,使她们能够承担这些角色——事实上,教育机会的增加也用来满足她们的需要。

1033

这种情况通常以工业化浪潮以来形成的相互联系、环环相扣的方式,逐步在发展中国家展开。甚至家也变为一个工作的地方——自来水和天然气很快紧跟着电力和国内进程更容管理的可能性,洗涤剂、合成纤维和速食进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而妇女能够通过广播、电影、电视以及廉价的印刷品获得信息。20 世纪 60 年代,“避孕药”的出现带来的根本性影响迄今在一个更加复杂的社会中没有再发生过类似的变革,这种推测颇具诱惑力。多亏了它的方便性及其使用方式,与早期避孕知识和避孕技术的进步相比,在这些问题上,权力得以转移到妇女自身的生活中,避孕药发挥的作用更大。它开启了性文化史的新时代,即使三四十年后才在某些国家显著地表现出来。

随之而来的是,特别是在美国,一种新型女权主义从自由主义传统中脱离出来。传统的女权主义观点倾向于自由,认为妇女生活不受法律和习俗支配的观念并不能强加给男人,除非找到了具体原因,否则它只是自由和平等真理的逻辑扩展。新女权主义有了新的进展。包括宽泛的妇女保护领域——例如对女同性恋的保护——它特别强调妇女的

性解放，以及努力发掘无法识别的对女性的各种心理的、隐式和制度化形式的男性压迫的案例。它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社会和文化范畴的影响也不例外，而在这些社会、文化中的精英易于受到现代化和这一思想的影响。 1034

任何女权主义者在一些传统的社会都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仅在一个方面有着广泛的和惊人的变化，这一变化既归因于殖民主义、共产主义和基督教，也归因于女权主义的发展。即一夫多妻制在全球退出历史舞台。现在很少有政府正式支持它。尽管如此，其他的对女性解放的特别文化态度的制度诉求也十分显著。这通常也是西方国家评论穆斯林方式的言论。但很难予以一定评价。它诱使观察者对各种事物进行主观和感性判断，最好不要放弃本能的反应。虽然具体化几乎与过度概化一样危险。很显然，伊斯兰世界仍保持着男人占主导地位的传统。试图改变这一点的尝试都夭折了。然而，并非所有的伊斯兰社会都让妇女带上面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妇女身着遮蔽身体的大黑袍，与伊斯兰学者为捍卫妇女特定权利取得的成功并不矛盾。这样是否会形成一个合理的妥协或不安的平衡，不同伊斯兰国家情况会有所差异。直到最近在欧洲社会中出现的妇女维权行为，其中暴力是有差异的这点不能忘记。由于它们表现为信仰的一致性，致使很难得出这一悖论。

执政和权力

无论有组织的宗教和固定不变的道德法律观念是否失去了对社会监管的作用，作为管理社会秩序的第三个伟大的历史性代理机构——国家，乍一看，似乎对社会管理的效果更好一些。它已前所未有地被广泛视为是理所当然的。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地理意义上界定的政治单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拥有立法主权及在国内使用武力的权力。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政府是确保他们福祉的机构而不是他们的敌人。政治是夺取国家权力的斗争，有时可以取代宗教（有时甚至会削弱市场经济）作为信仰的核心以排除万难。

欧洲留给世界历史最显著的制度标志之一是，国际生活的问题主

1035 要是主权(现在,至少在名称上往往表现为共和国家)国家问题。主权国家的建立始于 17 世纪,19 世纪开始在全球展开,20 世纪在全球确立。这一类似于国家机器的形式有时通过模仿,有时通过帝国统治者的强迫得以扩散。这是现代化的伴生物。目前,即使许多地方仍未建立主权国家,但主权国家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必然的选择。这很大程度上是帝国崩溃的后果。新国家应运而生以取代帝国,在任何阶段都未受到质疑。其他帝国崩溃 50 年后,苏联解体,伴随着这一进程,有关主权的宪法概念如人民、代议机制以及分权的全球化达到了历史巅峰。

因此,国家的强化——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并未遇到有效的抵抗。即使在那些政府历来不被信任或现存机制对它们进行抵制的国家,人们往往觉得较几年前它们遇到的阻力更小。对滥用权力最大的抵制是习俗和假设的保持;只要自由国家的选民认为政府不会立即使用武力,他们便不会感到恐惧。但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民主事业并不总是看起来非常有希望的,世界现在比起 1939 年有着更多专制政治国家(虽然,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变化,之后东欧国家也发生了变化,专制政治国家很少出现在欧洲)。这一评价曾被认为是未来事业变革原因的狭隘基础,但似乎这只发生在 19 世纪的发达国家。此外,自由主义政治的蓬勃发展曾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民主和宪政,而民族主义达到了历史的高度。然而,与那些思想结合在一起的实质性自由,往往已不存在或明显处于危险之中,即使大多数国家宣称是民主国家,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历史性和具体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显缺失。

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所处的环境并不利于这些想法的发展。正如伯克(Burke)早就指出政治原则始终从环境中汲取养分一样,对这

1036 一结论的质疑不能从历史角度考虑。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代议制和民主形式已被证明在缺乏与其相匹配的习惯的坚实基础的社会中是不起作用的,或者可以说强大的分裂影响了它们的效用。这种情况下,一旦殖民者强加的法纪不复存在,专制主义政府常常是抵制社会分裂的最佳途径。很明显,这并不意味着后殖民国家拥有了伟大的自由。它

们是否会迎来更大的幸福值得商榷,不能被认定。

现代化在巩固国家这一形式中的作用——很早在穆罕默德·阿里(Mehemet Ali)或凯末尔(Kemal)时代之外的欧洲已经显现出来——成为国家日益增强其道德权威新来源的象征。不是依赖于个人对王朝的忠诚,或神权统治,它越来越依赖于民主和实用主义宣言,而这一宣言能够维护集体的利益。通常这些都是为了物质利益,但有时不是;如今,它们似乎常常着眼于追求更大的平等。

如果有一个比国家权威更具合法性的价值观,那就是民族主义,它仍是世界政治碎片化的动力,但矛盾的是,它也曾经是许多国家的敌人。民族主义得以成功动员人们团结一致的力量,没有其他力量能够做到;将世界以其他方式融合成为一个政治体系的其他力量,发挥作用则是间接的和物质的,而不是源自相对强大的道德观念或神话力量。民族主义也是革命历史年代最强大的力量,是多民族帝国的主要威胁。现在它常与竞争性的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暴力和破坏性斗争仍是它们的标志。

不可否认,即使从外表来看,巨大的力量集中在国家制度上,但与民族主义发生冲突时,国家常常失败。虽然它们具有共产主义集权的制度,但是苏联和南斯拉夫现在已经解体为单一的民族国家。魁北克人仍在试图脱离加拿大。还有许多令人不安的潜在暴力的例子。然而,民族主义也大大增强了政府的权力并扩展其掌控范围,且在那些不存在民族主义的国家,许多国家的政治家都在努力工作以培育新的民族主义,以维持其非殖民化后不牢固的政权。

民族主义通过维护集体利益的宣称,成为国家道德权威的载体。即使仍存在有关国家在特定情况下应提供怎样利益的争论与质疑,政府的现代合法性至少依赖于其宣称它能够提供,且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当然,国家是否发挥了这样的作用一直有争议。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一些地方,国家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然而,即使是马克思主义政权,也未证明这一看法。至于国家是指一个王朝的私人财产或个人服务于私利的看法,即使现在在许多

1037

地方成为现实，却并未得到普遍认可。

如今，有些国家已经比它们的前任精心设计了更完美的体制、联系和组织，远超过了简单联盟和要求主权让渡。有些是分组开展共同活动，有些为它们的同伙提供新机遇，而其他的则自觉限制国家的权力。它们在结构及其对国际行为的影响上发挥的功效各异。

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但它具备对个别成员国采取授权性集体行动的权力，而国际联盟或更早的组织并不具备这个权力。一个较小但重要的情况，是区域集团的纷纷涌现，它们需要遵守共同规则。如东欧证明了这些规则会消失，然而，欧盟是个例外，即使欧盟成立之初的很多愿景仍未实现且缓慢向前发展。2002 年 1 月 1 日起，欧盟 12 个成员国开始使用共同的货币，这一举动涉及 3 亿多人。正式组织也不是故事的全部。仍有一些无组织或有组织的超国家现实不时侵蚀了单个国家的自由。伊斯兰教作为类似力量时而被担心或时而受到欢迎，或许泛非主义的种族主义意识——或被称为黑人精神主义(négritude)，抑制了一些国家的行为。国际事务中这一潜流的蓬勃发展，必然使得这一旧观念过时，即世界由独立自主不受限制(除了个人利益)的国家组成。奇怪的是，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间组织却出现在国家间相互冲突史无前例激烈的世纪。

尽管存在诸多违反国际法的例子，但是目前国际法仍然被期待较之前能够更加有效约束国家行为。这部分源于舆论环境出现了缓慢但较小变化的改变。不文明和野蛮的政权仍旧继续其不文明的野蛮行为，但文明政权也赢得了胜利。在战时的欧洲，1945 年纳粹政权现实引发的震惊意味着如今已不能以貌似合法的理由展开大屠杀。1998 年 7 月，120 个国家的代表——尽管美国不在其中——同意成立一个常设的国际法庭，用以审判那些犯下战争罪、危害人类罪的个人。次年，英国最高法院规定一个前国家元首是可被引渡到另一个国家以回答对他的犯罪指控，这是史无前例的。2001 年，塞尔维亚前总统被他的同胞移交到国际法庭，出现在被告席上。

1038

重要的是并不能夸大它的作用。因为成千上万的坏人继续在世界

各地实施暴行，而目前却不能对他们进行惩罚。国际犯罪是一个侵犯国家主权的概念，而美国也不大可能在近期内承认国际法庭对本国公民具有司法管辖权。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却出于准道德性质的目标，明确采取了革命性的外交政策，目标在于推翻萨达姆和米洛舍维奇政府，而现在它又关注联合各国打击恐怖主义，这必然意味着对其他国家主权的进一步干涉。

然而，两三百年来，政府在本国享有越来越多的权力，去做被要求的事情。最近，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困境和战争要求庞大的资源和政府权力的新扩展。这些动力增加了对政府间接促进公民福利和履行服务职能的需求，这些需要要么迄今并未出现的，要么是过去留给个人的作为家庭和村庄的"自然"单位。英国和德国早在 1914 年之前就已经是福利国家。在过去的五十多年中，国家的 GDP 迅速提高。也一直敦促实现现代化。欧洲以外的少数几个国家实现了这一目标，甚至在欧洲的一些国家现代化也归功于政府。20 世纪的著名例子是俄罗斯和中国，两个伟大的农业社会，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现代化。最后，技术通过更好的通讯、更强大的武器和更全面的信息系统对利用它的政府来说是有用的。

不久前，即使是最伟大的欧洲君主国也不可能达成高度一致或创建一个统一的内部市场。现在，国家是一国资源控制的主要工具。即使是一百年前，未被战争动摇以及叛乱冲破的政府的警察和武装部队仍保障了他们的安全；技术只是增加了他们的确定性。虽然新的镇压技术和武器仅是故事的一小部分。通过其作为消费者、投资者或设计者的权力，以及改善大众通讯的形式达到了所有物质的高度集中，国家得以干预经济。希特勒和罗斯福充分利用广播（尽管有着非常不同的结果），试图规范经济生活的方式与政府本身一样久远。

1039

尽管如此，如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努力应对世界经济的新一体化，因此，控制本国的经济事务的自由度下降。这也超出了超国家机构如 IMF 的职能范围，它是一个可以预见的趋势，现在因其最新的表现通常被称为"全球化"。有时国际协议或者由大公司的单纯的经济

增长的限定,但上升的动力无处不在,它是一种常打破政治家按照他们预设期望管理社会的期待的现象。不受管制的全球资金流动侵犯了经济和政治独立,大公司的业务也不例外,其中一些大公司拥有的资源远超过许多小国。矛盾的是,对全球化引起的对国家独立干涉的抱怨,来自那些督促更严厉地干扰主权的人,例如在侵犯人权的情况下。

随后的篇章中将会进一步展现这种力量的作用。或许它们缩小了国家权力,而在其他地方则增强了。这至少比激进势力更能破坏国家。这种势力的存在,有时它们从一些新的事业中汲取力量并似乎在其中蓬勃发展——生态、女权主义和广义的反核“和平”运动。但在 40 年的活动中,只有当能够影响和形塑国家政策、变革法律以及设置新机制的时候,它们才成功了。重大改良完全不通过这种占主导地位的机制来实现似乎仍是不现实的,只有 19 世纪的无政府主义和乌托邦运动才会推崇这一观念。

二、世界新秩序

冷战的开始

到了1950年,出现了这样一个时期,不管其他地方爆发了什么事件,世界政治秩序的核心特征似乎没有发生改变。此后大约25年,变革的速度加快,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潮。到了1990年,长达30多年的冷战及其他对峙消失了(有时几乎是在一夜之间),然而,这又引发了其他问题。不过,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它才发生。苏美之间长期而剧烈的对立,笼罩着整个国际社会,摧残着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构成了犯罪、腐败的根源,并持续了30多年。冷战远不只是塑造历史的惟一力量,它也可能不是最根本的,但却是关键的力量。 1040

最初的严重斗争发生在欧洲,其中战后第一阶段的历史是短暂的,可能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接管政府为结束时间。在那一刻,欧洲大陆的经济复苏几乎没有开始。但也有一些理由,使我们对其他的、较老的问题抱有希望。熟悉的德国威胁已消失,现在没有来自曾经的强权的威胁。相反,它的前对手不得不应付欧洲中心的权力真空。再往东,边界的变化、种族清洗和战时的暴行,已使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不再有它们在1939年前必须面对的种族混杂问题。然而,在某种程度上,欧洲前所未有地分裂了,其深层原因在于全球范围内的苏美对抗,尽管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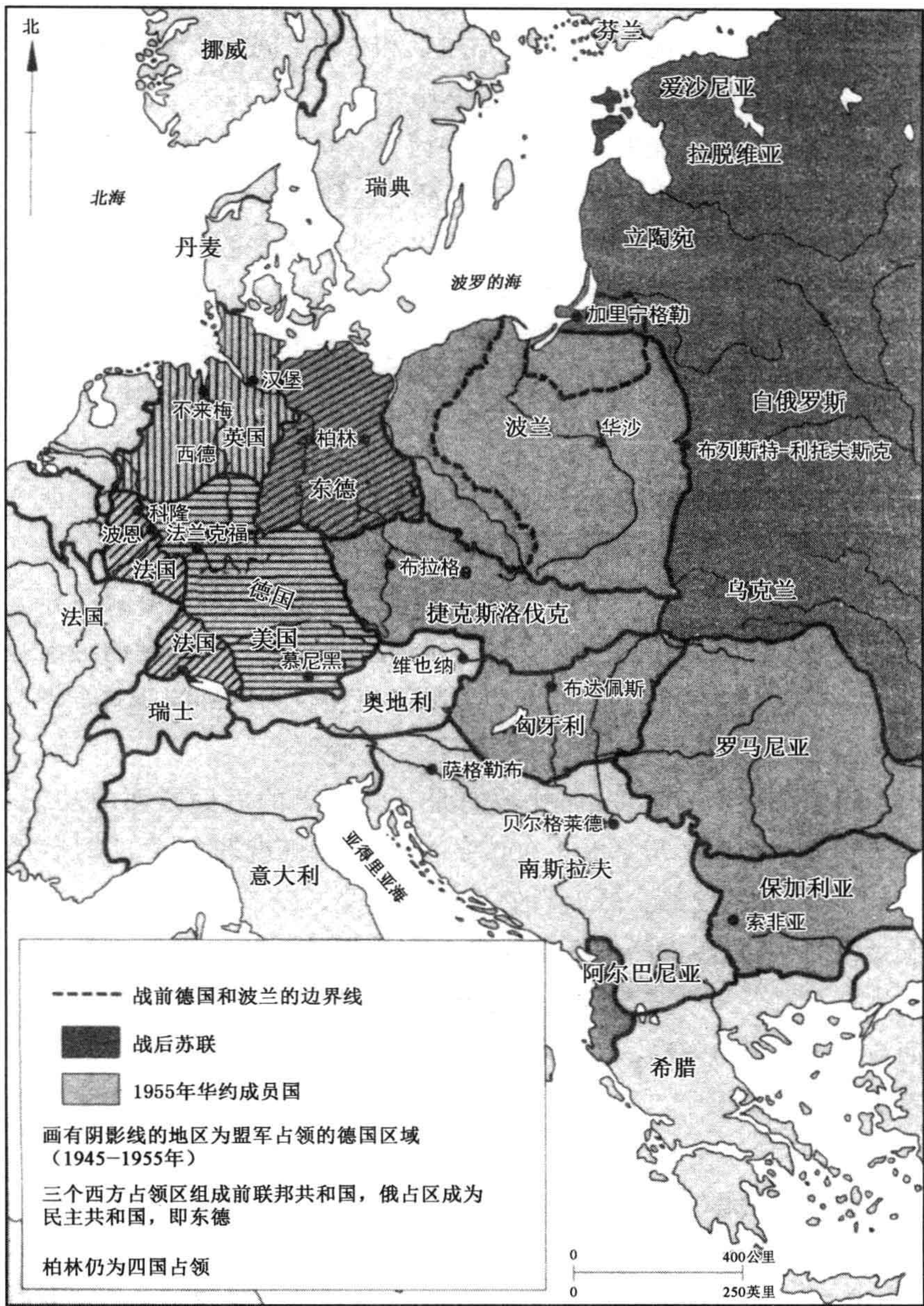
确切的时间起点仍然是有争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究根问底,意识形态和外交史上的分裂发生在 1917 年,而这只是其延迟的且大规模的显现。共产党俄国从一开始就以新的和独特的令人困扰的方式着手处理国际事务。对它而言,外交不仅是便捷的交易方式,也是推动革命的武器。尽管如此,其影响力原本可能也不会有那么大,但到 1945 年,新的世界强国,期待已久的现代化俄罗斯诞生了,它在东欧远胜过任何沙皇帝国,并在世界其他地区彰显其野心。斯大林掌权之后的苏联外交往往反映了历史的野心、由地理和历史决定的苏联国家利益,而且与意识形态的斗争密不可分。共产党人和其同情者认为他们必须保卫苏联。拥护国际工人阶级,守护整个人类的命运。当布尔什维克表示他们的目标是推翻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他们付诸实践。1945 年后其他共产党国家已经存在,这些领导人至少在口头上认为,欧洲和世界最终被划分为两大阵营。

1041

到 1948 年,在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中已不再有非共产党人,而此时,共产党人在保加利亚政府中占主导地位。随后,马歇尔援助计划启动,而后来被认定为冷战第一场战斗——围绕柏林命运展开的争斗也旋即开始。这场战斗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它显然让美国在欧洲有了一个立足点,可据此展开争夺。它并不意味着俄罗斯人已经预料到这一结果。尽管他们企图阻止一个统一和经济实力强大的、不受他国控制的德国再次出现。在未来德国政治模式确立之前,复兴占领区内德国经济,与西方国家的利益相冲突,不过,这对于西欧作为一个整体的复苏是至关重要的。

1948 年,未经苏联的同意,西方国家在自己的占领区推行了货币改革。改革有巨大的作用,加速了西德经济复苏的进程。根据马歇尔计划,仅西部占领区进行改革(由于苏联的决定);这一改革,超过任何其他步骤,把德国一分为二。尽管东部占领区不可能与西欧连成一体,但一个独立的充满活力的西德即将出现。西方国家继续推动占领区的事务,毫无疑问具有经济意义。但此后东德一直存在于“铁幕”的另一边。货币改革分割了柏林,从而阻止共产党人在城市进行暴动,尽管西

1042



二战后的德国和中欧

部占领区与苏联占领区早已隔开了。

1043 苏联的回应是扰乱德国西部占领区和柏林之间的交通联系。无论他们的初始动机如何,这种争端逐步升级了。在西柏林三个西方占领区被隔离的危机可能发生之前,某些西方官员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封锁"一词已经被使用,并且当时已经在这种意义上来解释苏联的行动。苏联当局并不质疑西方盟军在其各自的柏林占领区内部获得其影响力的权利,但是他们扰乱了在这些区域内确保补给柏林市民的交通。英国人和美国人组织了一场空运来为这个城市提供补给。俄国人企图向西方大国宣示,如果他们不同意,那么西方国家就无法留在那儿;他们希望因此消除障碍,使得选举产生的非共产主义市政当局的存在被置于苏联控制的柏林之下。因此,某种力量的考验在进行之中。西方大国,尽管为了保持西柏林在食品、燃料和药品方面的持续运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仍然宣布他们准备无限期地坚持下去。其含意是除非通过武力他们才会停止。美国战略轰炸机返回其在二战时期的英国基地。尽管双方都不想打仗,但是以对德战时协议为基础的所有合作希望都已彻底消亡。

封锁持续了一年多,而挫败它是一场显著的后勤方面的功绩。因为许多时候,每天单单 1 000 多架次的飞机就获得了日均运输 5 000 吨燃煤的成绩。然而它的真正意义是政治上的。联合补给没有被中断,西柏林市民也没有被恐惧吓倒投降。苏联当局通过故意把城市分割开来以及拒绝市长接近办公室来尽一切力量刁难。其间西方大国已经签署了一项协议来建立一种新联盟,超越欧洲范围的首次"冷战"诞生了。在通过协议结束封锁几个星期之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经在 1949 年 4 月创立。美国和加拿大是成员国,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也是(只有爱尔兰、瑞典、瑞士、葡萄牙和西班牙没有加入)。它显然是防御性的,为任何受到攻击的成员国提供共同防御,然而另外一个突破也使当时美国外交政策的孤立主义传统几乎消失了。在 5 月份,一个新德国,联邦德国,在三个西方占领区出现了,在随后的 10 月份,民主德国在东部也成立了。从此以后存在着两个德国,这显示出,

冷战沿着“铁幕”分割了它们,却没有进而向东,就如丘吉尔在 1946 年所揭示出的那样,从的里雅斯特到斯德丁。但是,在欧洲,一个特别危险的阶段结束了。 1044

如同有两个欧洲一样,世界被冷战分割成两个很快也显得可能了。在 1945 年,沿着北纬三八线,朝鲜已经被分割,它的北方工业区被苏联人占领,而它的南方农业区被美国人占领。统一问题最终提交给联合国处理。在未能举行全国选举以后,该组织承认了在南方建立的一个政府为朝鲜共和国惟一的合法政府。尽管在当时苏联占领区也产生了一个声称对全国都拥有主权的政府。苏联和美国军事力量都已撤出,但是 1950 年 6 月,在斯大林的预先知晓和同意之下,北朝鲜军队侵略了南方。在两天之内杜鲁门总统已经在联合国的名义下派出美国军队与他们作战。联合国安理会已经投票武力抵抗这次侵略,并且由于苏联人当时拒绝参加,他们没能否决这次联合国决议。

在朝鲜,美国人一直充当着联合国军队的主力,但是其他国家很快也派出了野战部队。前几个月他们在三八线北部进展顺利,北朝鲜似乎可能会被推翻。然而,当战争接近中国东北边界时,中国共产党军队开始干涉并且把联合国军赶了回去。当时存在着一种更大冲突的危险。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共产主义国家,并且人口最多。苏联在其背后力挺;一个人(至少在理论上)从埃尔福特步行到上海,哪怕一次,都无法离开共产主义版图。美国和中国之间直接冲突的威胁出现了,并有可能动用核武器。

杜鲁门审慎地坚持,美国在亚洲大陆不可以卷入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这个问题解决了,进一步的战斗表明,尽管中国人可能继续守住北朝鲜阵地,但是他们不会推翻南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了。1953 年执政的新一届美国政府,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主义的共和党人,但意识到其前任已经充分地阐明了美国建立一个独立南朝鲜的意愿和能力,并且认识到冷战真正的中心是在欧洲而不在亚洲。在 1953 年 7 月,一项停战协议签署了。随后把这项协议转变成一个正式的和平协议的努力迄今仍然没有成功;近五十年后,在两个朝鲜之间仍然高度保持着潜

在的冲突。不过在远东和欧洲,美国人已经赢得了冷战的第一场斗争1045的胜利;在朝鲜他们面对的是真正的战斗,据评估显示,战争付出300多万人死亡的代价,尽管绝大多数是朝鲜平民。

在停战谈判开始之前不久,斯大林逝世了。很难去猜测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在特定时期内,这显得是苏联政策连续性的一个中断,但是在当时这一点并不明朗。美国新总统艾森豪威尔继续保持着对苏联意图的不信任,并且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冷战如同过去一样紧张。斯大林逝世不久,他的继任者透露,他们也拥有众所周知的氢弹这种改进型的核武器。这是斯大林最后的丰碑,以保证(假如这一点已被质疑)苏联在战后世界上的地位。斯大林已经继承了列宁压制性政策的合乎逻辑的信念,但是他的作为远远超过了他的前任。他重建了俄国的绝大部分领地,并且在考验最严峻时刻给予了俄罗斯生存的力量(恰好,并且正是在其强大联盟的帮助下)。以这种代价取得的或者值得取得的东西是不清楚的,除非(如同被虑及的)可以免于失败以及控制德国具有足够的正当性。苏联是一个大国,不过在它的构成成分中,几乎可以怀疑某个时候俄罗斯至少可能再次变成一个没有共产主义的帝国。然而,1945年她的人民仅得到极少东西来补偿他们的牺牲,只是给予他们国际力量的一种保证。战后国内生活更加严酷;数年来消费一直停滞,并且苏联平民遭受宣传控制以及警察体系的残酷控制显示,战后一切方面都被强化了。

欧洲分裂,斯大林的另一遗产,在他死后比生前更加明显。1953年,由于美国经济支持以及承担了其自身大部分的防御成本,西半区实质上已经重建起来。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渐行渐远。随后的时期,在1954年3月,俄国人宣布东德现在拥有了完全的主权,并且西德总统签署了宪法修正案允许他的国家重新武装起来。1955年,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与之针锋相对的是华沙条约组织,它的卫星国联盟。柏林的未来仍存疑问,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除协议之外,北约强国将会以武力拒绝其地位的改变。在东方,民主德国同意与宿敌和好:以奥得河-奈塞河一线作为与波兰的国境线。希特

勒实现19世纪民族主义者的大德国的梦想终结在了俾斯麦德国的湮没之中。历史上的普鲁士现在被革命的共产主义者所统治，而新西德在结构上是联邦制，由非军国主义者以及天主教和社会民主党政治家所主导，这些人曾被俾斯麦视为“德国的敌人”。因此，虽然没有一个和平协议，对这个通过战争两次摧毁欧洲的德国的遏制问题最终得到了妥善解决。同样在1955年，当奥地利作为一个独立国家重新出现、占领联军与最后的美英军队从的里雅斯特撤出，以及意大利-南斯拉夫边界争端解决时，欧洲两大阵营之间也进行了陆地边界线的最终划定。 1046

中国建立共产主义体制之后，世界范围内的分裂在我们所谓的资本主义和计划（或准计划）经济之间出现。苏联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商业联系，自从十月革命以来一直受到政治的拖累。1931年以后，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资本主义经济陷入衰退并且寻求通过保护主义摆脱困境（或者自给自足）。1945年以后，尽管世界市场所有早期裂痕都已超越；两种资源分配的组织方法首先分裂了，尤其在发展中世界和其他地区之间，最显著的是在东亚。资本主义体系基本的决定因素是市场——尽管市场区别于传统自由主义关于自由贸易思想的设想，并且在许多方面不完美，要容忍通过国际机构和条约不同程度的干预；而在共产党控制的国家集团（或者一些其他国家）中政治权威试图成为决定性的经济因素。两种体系之间的贸易继续进行，但却是在一种狭窄的基础上。

体系并非保持不变。它们之间的联系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倍增。长久以来的历史表明，它们为世界提供了经济增长的可替代模式。它们之间的竞争由于冷战政治而激化并且扩展了相互之间的敌意。然而，这并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与1950年的情形相比，在某个短时间内这种体系稍微为美国所主导，而在其他时期则略微被苏联所主导。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双方都拥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但是其后由于市场经济迅猛发展而分道扬镳。从1945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两种经济体系之间的差别仍然构成了世界经济史的一个基本特征。

亚洲革命

1047 中国实行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起初几乎完全被人们用冷战思维加以看待，并且也被作为战略平衡的一个转折点。然而到斯大林逝世时，有许多其他迹象显示，南非政治家扬·史末资在四分之一多个世纪前预言的“场景从欧洲转向远东和太平洋”就已经实现。尽管德国继续是冷战战略的中心，朝鲜作为一个显著的证据表明，世界历史的重心正在又一次转移之中，这次是从欧洲转向东方。

当新独立的亚洲国家越来越意识到它们的国家利益和主权（或者缺乏这一点）的时候，欧洲大国在亚洲的衰落注定伴随着持续的变化。殖民者给了它们国家形式和统一，但这常常不能比殖民帝国持续更久；1947 年印度次大陆抛弃了至少一个世纪的政治统一，同时马来西亚和印度支那到 1950 年为止在政府安排方面已经开始进行了重要的但一直不是满意的变化。内部压力困扰着某些新国家；印度尼西亚的华人族群拥有不成比例的地位和经济权力，并且在新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影响到他们。更糟的是，无论他们的政治环境如何，所有这些国家都拥有快速增长的人口，并且在经济上是落后的。因此，对许多亚洲国家来说，欧洲统治的正式结束当时看起来比曾经设想的转折点在意义上要小得多。最重大的变化随后接踵而来。

欧洲对它们命运的控制多半很有限。尽管欧洲人改变了数百万亚洲人的命运，并且影响他们的生活好几个世纪，但欧洲文化即使对统治精英群体心灵的触动也极少。在亚洲，欧洲文明必须同比世界上其他地方更加根深蒂固的和更加强大的传统进行竞争。亚洲文化并没有（也不可能）如同前哥伦比亚美洲印第安人的一样被弃之一边。正如在中东一样，欧洲人直接的努力和欧洲文化间接的扩散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思想和行为的最深层面常常保持着未被触及的状态，即便是深信自己从过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那些人也是如此：当孩子出生和订婚的时候，文化本性仍然在受过教育的印度家庭中反映出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继承了悠久的华人相对于非华人的一种坚不可摧的道德优

越感。

为了理解亚洲在世界历史上最近的角色，两个亚洲文明区如同数个世纪以来那样保持了独特性和重要性。西亚地区被北印度连绵山脉、缅甸和泰国高地与主要部分是印度尼西亚的巨大群岛所界定。它的中心是印度洋，在历史上产生主要影响的文化有三种：从印度延伸到东南亚的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也向东部横向延伸）与最初是通过商业和传教士接着是一段较短时期政治统治的欧洲文明的影响。另一个文明区是东亚，由中国主导。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人口大国的地理特征的简单作用，但是它的人口数量和移民，以及更加间接和易变的中国文化对东亚边缘——尤其是日本、朝鲜和印度支那——的影响力，都构成了具有解释力的事实。在这个文明区，欧洲对亚洲直接的政治统治，在程度和持久性两方面从来没有能像它在西部那样深远。 1048

在1945年后的混乱岁月里，正如历史的其他作用成果一样，很容易迷失对这种重要差异的查知。在这两个文明区内的国家好像采取了激烈排斥西方的同样路线，运用了西方民族主义和民主术语，并且运用了精明的语句诉诸世界舆论。印度凭借与本土传统几乎无关的极端的民族主义，在数年内就吸收了在英国统治印度时期幸存的君主制土邦以及次大陆上遗留的法国和葡萄牙飞地。很快，印度安全部队强力在新共和国内镇压了任何分裂主义或者地区自治。或许这并不值得惊讶。印度的独立，从印度方面看，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的作品，这些精英从西方输入民族、平等和自由思想，即使最初仅仅寻求平等并且与总督合作。1947年以后一种对精英地位构成的威胁可能常常易于（并且真实地）被理解成一种对实际上还在创造之中的印度民族性的威胁。

让所有这些更加真实的是，独立印度的统治者从英国统治者那儿继承了许多诉求和制度。内阁制度、宪法条例、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权、公共秩序和安全都被贴上了共和国的标签，一直运作到1947年之前。政府居于主导的和明确的意识形态，在当代英国观念看来，这是一种温和的和官僚性的社会主义，在精神上远远没有消除英国总督统治 1049

最后时期代表制式的公共管理和开明专制。印度当局面临着来自那些有打破传统特权表决权并处于前王公控制之下的地方保守贵族的强大阻力。然而,更可怕的问题是,印度面临人口的快速增长、经济的落后、贫穷(1950 年,印度平均人均年收入为 55 美元)、文盲、社会、种族和宗教信仰上的分裂,以及各种独立主义的滋生膨胀。很明显,必须作出重大的改变。

1950 年的新宪法没有让这些问题发生任何改变,至少直到下一个十年为止,这种日趋严重的状况没有任何变化的迹象。时至今日,印度大部分乡村的生活现状实际上依然像过去一样,战争、自然灾害和猖獗的盗匪仍然恣意横行。这意味着贫穷会持续加剧。到 1960 年,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村贫困人口每周生活费仍然不足一美元(同一时期,有一半的城市居民至少能够挣得满足每天人体健康必须吸入卡路里的最低水平)。经济增长仍然为人口增长所吞噬。在当时的环境下,印度的统治者在宪法条款中列明享有像英国总督那样大的应急权力(像他一样可以实施预防性拘留和终止个人权利),也就不足为奇了,至于以所谓“总统统治”为名架空各州政府,将权力收归中央,就更不在话下了。

当印度与邻居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发生冲突时,那个软弱、优柔寡断的新政府所采取的对策越来越糟糕,在那里,一位印度王公统治着主体为穆斯林的臣民。早在 1947 年,当穆斯林试图加入巴基斯坦组成联邦,克什米尔王请求印度帮助,并加入印度共和国的时候,战斗从那里打响。克什米尔的穆斯林领导人之间也存在分歧,这让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印度拒绝了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全民公投的建议;那时,三分之二的克什米尔仍然掌握在印度人手中,成为印巴关系日趋紧张的一个硬伤。战争在 1949 年停止,随后又在 1965 至 1966 年和 1969 至 1970 年再次爆发。事件随着划界争执和印度西北部水源的开发利用而进一步复杂化。1971 年,在印度的资助下,东巴基斯坦一个讲孟加拉语的穆斯林地区分离出来,形成一个新的国家——孟加拉国(因此,这表明单独的伊斯兰并不足以组成一个可行的国家);印巴两国间的争斗加剧。而这个新国家很快就面临比印度或巴基斯坦更为严重的经济问题。

在这些动荡时期，印度领导人展现出巨大的野心(大概有时竟表现出重新统一次大陆的愿望)和对其他民族利益的公然漠视(例如对那加人)。印度人的雄心激起的怨怒因冷战而变得更加复杂。印度领导人很快就表示不会加入任何一个阵营。在20世纪50年代，这意味着印度与苏联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关系远比与美国的关系更加密切缓和。尼赫鲁似乎很喜欢对美国人的行动吹毛求疵，以此帮助确信印度奉行进步、和平、不结盟的民主政治制度可以赢得更多的同情。因此，当这些同情者及印度共和国自身在1959年发现，尼赫鲁政府与中国围绕北部边界已经争吵了三年只是没有公之于众罢了，他们感到受了巨大的打击。在1962年末，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开始了。尼赫鲁作出了不太可能的举动，向美国人寻求军事援助，甚至更不可能的是，他还得到了！因为他同时也从苏联获取(在空军力量方面)援助。至此，他在5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的威望开始严重下滑。 1050

实际上，年轻的巴基斯坦并没有像印度一样结交同样的邦交友国。1947年，巴基斯坦比邻国印度更加脆弱，其受过培训的公务人员很少(印度教徒加入旧印度政府机构的人数比穆斯林要多很多)，在地理上又被分成两个部分，而且几乎一立国就失去了最有能力的领导人——真纳。然而，即使在这位拉杰的统治下，与国大党相比，伊斯兰教领导人在民主的形式上(或许更加现实)总是表现得缺乏自信；与印度相比，巴基斯坦通常被追求军事自给、经济发展、国家改革和伊斯兰教模式稳固的独裁军人所统治。

巴基斯坦总是与邻国印度保持不同，它是一个正式的伊斯兰教国家，而印度则是一个世俗的、没有宗教忏悔的国家(表面上带有西方的模式，但又不完全与印度传统文化融合一致)。这就导致巴基斯坦沿着伊斯兰教的本质特征向前发展，不过，宗教信仰的差异对巴基斯坦对外关系的影响仍低于冷战。

万隆会议

1955年，来自亚非29个国家的代表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会议 1051

后,一个自称为尼赫鲁主义者和"不结盟"的国家联盟诞生了。与此同时,冷战使亚洲政治局势更加扑朔迷离,难以捉摸。除了中国之外,大多数国家都曾是殖民帝国殖民地的一部分。它们很快就与来自欧洲的南斯拉夫结为一体;南斯拉夫是一个让人回想起既有帝国主义历史又有曾受外国统治历史的国家。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都贫穷、物资匮乏,对美国的疑虑多于对苏联的怀疑,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对它们都更具吸引力。它们一起被称为"第三世界"国家,很明显这是一位法国新闻记者创造的一个专用术语,联想自 1789 年来自法国社会底层并拥有合法地位的"第三等级"(它曾是法国大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其含义就是它们反对强权政治和拒绝发达国家享有的经济特权。虽然这听起来貌似合理公平,但掩盖了该群体中各个国家间存在的重大差异。第三世界的政治联合并没有证实其适用性和持久性,自 1955 年以来,死于第三世界国家间战争和国内战争的人数远多于它们与外部阵营之间的冲突。

然而,在二战结束十年时,万隆会议向超级大国们表明,只要动员组织起来,弱国也能形成一支重要的国际政治力量。在冷战时期,当它们寻找盟友或在联合国中寻求选票支持时,它们总能牢记这一点。直到 1960 年,由于苏联和中国都寻求对不发达国家和未明确表态国家的领导地位时,两国必将分道扬镳的显而易见的信号便告出现。首先这种情况在对待南斯拉夫的不同态度上间接地出现;最后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竞争。初期的结果看似相当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巴基斯坦与中国(全然不顾与美国的协定)走得更近,而苏联与印度走得更近。1965 年,当美国在巴基斯坦与印度交战期间拒绝向其提供武器时,巴基斯坦转而向中国寻求帮助。尽管造成的影响小于预期,但它仍然成为 20 世纪 60 年代国际关系出现新动向的早期证据。不论是苏联还是中国或美国都不可能忽视它的影响。实际上,正是冷战促成美国在亚洲角色产生戏剧性变化;它不再像反殖民主义的热心赞助者及其盟友殖民帝国的粉碎者,反倒有时看起来像这些帝国的继承人,虽然其势力范围与其说在印度洋(在那里,长期且没有预期回报的努力就是安抚忘

恩负义的印度;在1960年以前,印度从美国获得的经济援助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不如说在东亚。 1051

大国们遭遇了新困难,印度尼西亚就是一个特别具体的例子。它广阔而布局散乱的国土上包含有很多民族,民族间时常伴有多方面的利益分歧发生。尽管佛教是第一个在那里站稳脚跟的世界性宗教,印度尼西亚却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佛教徒现在在人口数量上居于少数。从13世纪以来,阿拉伯商人就开始将伊斯兰教带入印度尼西亚,据统计,现在大约有超过五分之四的印度尼西亚人信奉伊斯兰教,尽管传统的万灵论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在印度尼西亚还存在一个根深蒂固的华人社群,早在殖民地时期,华人就分享着压倒性优势的经济财富和行政管理工作。荷兰殖民者离去后随着后殖民时期司空见惯的人口过多、贫穷、物价飞涨等问题开始显现,以往被殖民者强加的秩序所抑制的族群间紧张气氛就开始释放出来。

在20世纪50年代,人们对新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不满与日俱增。到1957年,新政府面临苏门答腊岛和其他地方的武装叛乱。以民族主义者激情来分散反对派精力的方式曾被历史证明是有效的(在西新几内亚,反对矛头持续对准荷兰殖民势力),如今却不再行得通;民众对苏加诺总统的拥戴已不可重现。他的政府已经远离国家新生伊始所采纳的自由主义形式,越来越依赖于苏联的支持。1960年,议会被解散,1963年苏加诺被任命为终身总统。然而,美国因担心他可能会转向中国寻求帮助,而一直持续支持他。

美国的支持使苏加诺有能力吞噬掉(源自对荷兰的反抗)来自新几内亚(西伊里安)可能出现的独立政权。1957年,他又把矛头指向新成立的马来西亚联邦——由英国在东南亚分散殖民地连成一体而产生新联邦。在英国的帮助下,马来西亚人在婆罗洲、沙捞越和马来西亚本土挡住了印度尼西亚的进攻。尽管他仍然得到美国人的资助(那时,肯尼迪总统的弟弟在伦敦现身支持他的做法),这种倒退仿佛成为苏加诺的转折点。一切到底是发生的,至今仍然不清晰,然而,当食物短缺、物价

飞涨即将失去控制的时候,一场(失败的)政变爆发,据军队领导人说,其幕后策划是共产主义者。毛泽东曾希望印度尼西亚在革命输出中扮演重要角色,这或许是可能的;苏加诺试图用来平衡其他派别政治家们的共产党,一度宣称是世界上第三大共产党。无论共产党有无预谋夺权,经济危机被那些担心共产党接管的人利用了。流行的传统印尼皮影剧场几个月来持续上演古印度英雄事迹,其主要素材来源于大量政治典故和对未来变化的暗示。1965 年,一场政治风暴爆发,当大屠杀剔除了那些可能让苏加诺转变政治立场的共产主义者时,军队却夸张地退居幕后了。被屠杀的人数估计在 25 万到 50 万之间,他们多数是华人或者具有华人血统者。苏加诺本人在一年后被正式搁置起来。一个坚定反共产主义的政权随后上台执政,并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直到 1990 年才重新恢复)。1965 年的部分失败者被投入监狱,少数人作为当局坚决与共产主义作斗争的证据而被绞死,毫无疑问,这是在杀一儆百。

1053

中国的复兴

荒谬的是(以印度尼西亚为例更是长期让人感到费解),美国对苏加诺的支持反映出其下列信念的坚定和强大:繁荣的民族国家是反共产主义的最好堡垒。东亚和东南亚过去 40 年的历史实际上需要重新解读,以便为这种信念提供佐证,但它又总是被应用于各种困难而复杂的环境。不管怎样,到 1960 年,新加坡以东地区一个重要的、决定性的事实就是,中国力量在东方的再现。韩国和日本已经成功地抵制住共产主义,但它们也从中国革命获益;它给它们提供了应对西方的手段和杠杆。正如远东总是比印度洋地区国家更成功地回绝欧洲一样,它们显示出 1947 年后有能力在共产主义和非共产主义形态之间维持自己的独立,而不受中国摆布。一些人将这种独立性归结于几个世纪以来借鉴中国模式形成的深层次且表现多元的社会保守主义。在有序而复杂的社会网络、改善社会生产的能力、忽略个人利益、敬重权威和等级秩序,以及强烈意识到自身是与西方有很大不同的文明和文化中一员

这些方面，东亚人不仅受到了中国革命成功的影响。实际上，这种革命只能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其表达方式相当多元，且远不能由“亚洲价值观”这样的专业术语来充分概括。

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1949 年新政府就职掌权，北平又一次成为形式上统一的(新生)中国的首都。很多人认为，这表明中国的领导人意识到来自北方陆地边界的压力又一次超过了持续一个世纪之久的海上威胁。然而，这也可能是由于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人民共和国(其首都不久就被官方定名为北京)的国家，紧随其后的是英国、印度和缅甸。除了无处不在的冷战思维和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新中国实际上没有面临来自外部的可以明确确定的威胁。它的领导层可能关注的是长期未完成的而又困难重重的现代化任务；被限制在台湾的国民党势力几乎可以忽略，尽管当时他们处在美国的保护之下而无法消除。当 1950 年联合国军队到达东北鸭绿江边境时，一个主要的威胁出现了，中国的反应是迅速而有力的：它派出了一支大军进入朝鲜。但是中国新统治者主要关注的是国家内部的状况。贫困普遍存在，疾病和营养不良广布。物质与自然科学建设及其重建长期滞后，大陆人口压力依然严重。在前几个世纪中“古老政权”(ancient régime)崩溃留下的道德和意识形态真空需要填补。 1054

农民问题是起点。在这方面 1949 年并不是意义非凡的日子。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土地革命一直被农民自己在各地大规模组织实施。到 1956 年时，以一种据说将控制权交给由农民组成的新组织的社会改造，中国的土地实现集体化。地主和乡村首脑被推翻的过程往往充满暴力，他们应该占到后来被毛泽东在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里提到为“已清算”的 80 多万人中的大半。同时，在苏联(这是中国当时惟一能够获得外援的国家)的帮助下，工业化也在加紧进行。苏联模式也是惟一能够选择的模式：1953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宣布实施，开创了一个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经济管理上占据统治地位的短暂时期。

新中国很快成为一支主要的国际力量。然而，其真正的独立，长期

被社会主义阵营表面上的统一和被排除在美国主导的联合国之外所掩盖。1950 年的中苏条约被解释——尤其是在美国——为中国正在进行冷战的进一步证据。无疑地,其政权是共产主义的,宣扬革命,反殖民主义,她的选择必然受到冷战因素的限制。然而,从长远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明显关注着一些更传统的焦点。在非常早的观点里,显而易见,他们主要关心着重建过去数个世纪以来中国倾向于具有的在整个地区的势力和影响。

1055

东北地区的安全本身足以解释中国军队对朝鲜的干预,但是半岛也将长期成为中国和日本间的争议地区。但是从一开始,要求恢复中国统一的最大呼声为清除占据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台湾 1895 年被日本占领,仅在 1945 年短暂回归大陆控制)。直到 1955 年,美国政府也一直致力于支持盘踞那里的国民党政府,美国总统声称美国不仅仅保护台湾岛,而且保护那些临近中国海岸线的具有重大国防意义的小岛。关于这个事件,一份心理背景资料显示,美国慈善机构和教士提供的长期资助遭到来自中国令人费解的拒绝,美国人对中国问题的见解困扰长达十年,以至于国民党的追随者有时看起来好像是美国的走狗。与之相反,在 50 年代期间,印度和苏联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了北京,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这么做它们根本就不需付出什么。因此,中国最终会与这两国发生武装冲突,实在是非常令人震惊。

1056

在 1963 年,外国观察家应该也更多地回想起久远的过去。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前,中国革命就是一场民族复兴运动。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摆脱外国人的控制,恢复主宰自己的命运。在这些外国人中,俄国人居于强势主导地位。他们侵占中国领土的记录可追溯到彼得大帝,从沙皇专制时代一直持续到苏联时代。在沙皇的支持下,1914 年一个受保护的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建立,但是该地在 1944 年被苏联吞并。1945 年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和中国北部,因此恢复 1900 年远东沙皇专制的盛况;他们留在新疆直到 1949 年,在旅顺港口直到 1955 年。在蒙古,他们留下一个建立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卫星国蒙古人民共和国。两国这样分享近 4 000 里长的边界(如果蒙古人被包括在内),沿

着漫长的边界线潜在的摩擦是很多的。1960 年苏联当局抱怨5 000名中国边民越界。一个近加拿大五分之一的区域正式地处于争议中,直到 1969 年(一年里有很多的战斗和很多人被杀),中国人称莫斯科为“法西斯”专政,大张旗鼓地进行备战。导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陷入混乱的中苏争端也由于俄国人的不智而加剧。苏联领导人看起来似乎成长为一个像对西方帝国主义者的感觉一样粗心的盟友:当在中国游览时,一位苏联领导人曾经赤裸裸地评论,他和其他俄国人“习惯于嘲笑他们原始形式的组织”。1960 年,苏联在经济、技术援助上的撤退是一个严重的侮辱,更是一种严重的伤害,因为苏联撤退时,当时中国正面临新政权第一个主要的国内危机,这在中国官方正式地被描述为由洪水泛滥引起的“自然灾害”。 1057

毛泽东的个人经验一定曾经为这次危机的发生作过很多预测。虽然他的主要思维模式是马克思主义的,虽然他认为这些范畴论有助于解释他的国家所面临的困境,他总是用实用主义来冲淡它们。毛泽东是一个不倦的探求者;他的政治判断力仅在成功的那些年里表现出动摇,而自信心、虚荣心和年龄最终产生了影响。年轻时,他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拒绝那些消耗中国共产党亲和力的苏联教条。毛泽东世界观的基础似乎是这样一种社会和政治学视角:就像一个竞技力量的角斗场,人类的意志力和暴力可被用来产生道德上令人满意而富有创造性的改变——当然这种改变是由一位全能的领袖来界定的。他与其政党的关系并不总是和谐的,但是他依靠农民的政策提供了在城市共产主义造成灾祸后继续前行的道路。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经历暂时的挫折之后,大约从 1935 年开始,他已成为党内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农村的影响力已经占据支配地位。对毛泽东来说,一个新的方法也可适用于国际事件:长期的革命战争以及从农村包围城市的主张,在那些需要发展工业以形成一个革命无产阶层、传统马克思主义信仰没有说服力的地方,看起来很有希望。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的显著特征就是强力征收和能量释放。以此受益之后,1955 年,中国的乡村地区事实上遭受了一个新的变动。数

亿村民被组织加入“公社”,目标是农业集体化。私人财产被公社吞并,新目标是集中进行生产,新的农业方法被强制推行。一些新方法带来了负面的损害(例如,消灭食谷鸟类的运动促进了昆虫捕食动物的剧增,然而鸟类并在此列),另外的一些方法也是毫无效率的。管理公社的干部变得越来越倾向于弄虚作假,以显示他们完成了目标,对于食物生产却并不关心。结果是损失惨重的;生产总量灾难性地下降。当在1958年,一股新的奋进浪潮——“大跃进”——得到赞扬,随即成为强加在公社身上的新压力。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直到1960年,大部分地区遭受饥荒或接近饥荒状态。事实被隐瞒;甚至大部分统治阶层都不了解真实情况。现在估计,在几年之内上千万中国人死去。尽管如此,在1961年,一些高级官员开始收集确凿的证据。毛泽东的立场受到抵制。他的同伴慢慢地使经济回归到现代化道路。

1058

在1964年,一个显著的成功象征是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因此,中国获得了加入排他性核俱乐部的高价通行证。然而,它的国际影响力的终极基础一定是庞大的人口。即使在经受挫折后,人口总数仍然在持续上升。到1950年,5.9亿人口已经被认为是一个合理的估计;25年之后,将达到8.35亿。虽然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份额可能在过去某个点要更高一些,在太平天国运动前夕它大概几乎占有世界人口的40%,但在20世纪20年代,它的人口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庞大。其领导人声称,即使核战争成为可能,好像也不能将他们全部消灭。中国人幸存的数字将比其他国家都要大。有迹象显示,在本国大部分人口稀疏的边界上存在着统计学上如此庞大的人口实体,这着实让苏联感到恐慌。

一些对共产主义政权极其不友善的国家也因这个数字的刺激而震惊,同样让它们吃惊的还有20世纪60年代早期这个国家发生的事件(据说蒋介石希望趁机从台湾发动入侵而受到美国人的阻止)。很快,毛泽东也再一次试图恢复他的统治权。他致力于要证明大跃进的正当性,处罚那些他发现的阻碍大跃进,甚至背叛他的人。他部署对抗他们的一个武器就是自斯大林死亡以来很多共产主义者对苏联的政治事件

的不安。在那里专政铁柄的放松,虽然是节制的,看起来似乎对官僚制度和党内派系的腐败和妥协敞开了大门。在中国如果纪律放松同样的事情可能会发生的恐惧,促进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在 1966 至 1969 年间,"文革"使国家和政党支离破碎。数百万人被杀、拘禁、被剥夺工作或者被清除。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和个人声望不仅被复活而且进一步得到宣扬;资深的党员、官僚和知识分子受到侵扰;大学被关闭,体力劳动被作为对全体公民的要求,以改变传统的态度。年轻人充当了迫害的主要工具。国家被"红卫兵"翻转控制,他们在各行各业中成为令人恐怖事件的制造者。机会主义者在他们自己被年轻人破坏以前拼命地加入他们。最后即使毛泽东本人也开始显示出信号,他认为事情走得有些过头了。新的党务干部被安排到位,代表大会确认了他的领导地位,但是他再一次失败了。军队终究还是恢复了秩序,这次是以学生为代价的。

1059

· 然而红卫兵的狂热是真实的,其中浮现的强烈道德偏见至今依然在某种程度上神奇异常,令人惊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毫无疑问是复杂的。除寻求对那些抛弃大跃进的人给予报复之外,他真的似乎感觉到革命可能会凝固而且失去原有的道德热忱的危险,这种热忱曾经推动革命走得很远。为了寻求维护这种热忱,旧的思想意识必须清除。在中国,社会、政府和经济整合为一个整体,其程度远胜于在其他地方。知识分子和学者的传统声望仍然具体表达着旧秩序,正如考试制度在本世纪开始时就已经存在了。对知识分子的"降级"和妖魔化被催促为制造新中国的必需结果。同样的,对家族权威的攻击并不仅是多疑政府对告密者和不忠者的鼓励,而是要促使所有中国机构的保守派人士现代化的尝试。解放妇女不提倡早婚的宣传大大扩大了"进步的"男女平等思想或人口控制的空间;它们是一种对过去的抨击,从来没有其他革命曾经如此做,因为在中国,过去意味着妇女的地位比美国、法国甚至俄国革命前夕所发现的任何等级都还要低。对党派领导人的攻击,这主要是谴责他们固守儒家思想,而不是保持一致。他们也不可能像西方那样,因为西方并没有长达数世纪的让人们彻底拒绝的

传统文化。从这方面看,“文化大革命”可能被视为在政治现代化方面的一种演练。

然而,拒绝过去只是故事的一半。如果追溯到秦朝,中国有着两千多年连续的历史,这或许进一步限定了其革命的形式。其中的一个线索就是权威的作用。就革命的全部价值和残酷性而言,革命就是一部英雄奋斗史在程度上可与伊斯兰教的传播或欧洲在近代早期对世界的扩张所引起的剧变相提并论。而中国革命与这些剧变的不同在于它是集中指挥和控制的。其悖论之处在于它取决于大众的热情,但是若缺乏继承了传统“天命”的国家的有意识的指引,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人的传统是尊崇权威,而且给予它一种在西方长期都难以具有的道德认可。中国和其他任何大国一样都不可能脱离它的历史,因此,共产主义政府有时表现出一种似是而非的保守面孔。没有任何大国能够驾驭其国家和人民这么长久,过于强调集体,而不关心个人,甚至为了国家的利益,政府能够合法地不惜任何代价调动数百万的资源为自己开展大型工程。在公共利益上,政府长期所有的一切都是毫无异议的。对中国人来说,反对派的主张是灾难性的,因为反对派的观念对中国人而言是灾难性的,这意味着社会分裂;它暗示着涉及西方个人主义的那种革命行不通,虽然这里并不缺少个人主义或集体的激进主义。

1061

毛泽东所掌管的政权,在从中国历史中获益的同时又毁掉了它,因为他的角色可以很方便地用它所界定的权威概念来理解。他被奉为一个圣人统治者,既是导师又是官员(在中国人们总是很尊敬老师);宣扬他的思想地位的红宝书无处不在,这让西方的评论家感到滑稽(但是他们忘记了很多欧洲新教徒的圣经崇拜)。毛泽东思想是被视为社会核心的道德教义的发言人,正如孔子思想曾经是社会道德的核心一样。在毛泽东的艺术兴趣里也有些是传统的元素;作为诗人,他被人们赞美,他的诗歌赢得了行家的尊敬。在中国,领导者为人民做好事的行为总是得到舆论力量的普遍支持,成为人们可以接受的价值观。毛泽东的行为可能以这种方式得到解读。

中国的周边及以外

历史也影响到中国的外交政策。虽然曾在全世界资助革命，但是中国主要关注的还是远东，尤其是朝鲜、印度支那这些曾经的藩属国。在后者的问题上，苏联人和中国人也是有分歧的。朝鲜战争之后，中国人开始向在越南已经发起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中居于少数的共产主义的游击队提供补给，不论事件的随后如何发展。在1953年，法国人放弃高棉和老挝。1954年，在一场为了法国的威望和全体选民愿望而进行的决定性战斗中，他们丢失了被称为奠边府的战略基地。从这以后，对法国来说，维持自己在红河三角洲的统治几乎是不可能的。来自中国的代表团参加了日内瓦会议，这因此代表着中国重新进入国际外交领域。会议同意越南分成南方越南政府和共产主义者控制的北部地区，直到选举产生统一的国家。这场选举从未发生。相反，自1945年开始，印度支那很快出现了自1941年开始的亚洲反对西方战争以来的最激烈的时期。

1062

除了美国外，西方的竞争者不再具备先前的殖民实力；法国人回家，而且英国人也在其他地方遇到很多难题。另一方面，印度支那的共产主义者、国家主义者和改革家是一个联合体，得到了为在印度支那增强影响力而开展竞争的中国人和苏联人的支援。美国的反殖民主义和美国应该支援本土化政府的信念导致它重返南越，就像它回到韩国和菲律宾一样。不幸地，既非在老挝也不是在南越或其他地方，最后在高棉，那里出现的政权，其合法性在他们眼中都存在争议。美国仅仅只赞助经过鉴别的政府，那些与西方为敌的在东亚很不受欢迎。美国的支持也容易除去基于这些政权幕后的激励民族统一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越南，那里事实上的分割并没有产生好的结果或是稳固南越政权。佛教徒和罗马天主教痛苦的争吵，而且农民越来越与土地改革失败的政权疏离，一个公开腐败的统治阶层似乎不能够在政府更替中幸存。这使共产主义者获益。他们按自己的方式寻求统一，获得来自北方越共在南方活动的地下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

到 1960 年,越共已经控制了南越大部分地区。这就是 1962 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作出那个重大决定的背景:美国不仅提供了财政和物质上的援助,而且还派出 4 000 个“顾问”来帮助南越政府建立军队。这是自杜鲁门亚洲政策被放弃后,美国第一次卷入亚洲大陆的一场主要战争。它最后导致了超过 5 万名美国人丧命。

在亚洲,华盛顿对冷战的另一回应就是把占领日本提升到长期向其提供安全保护的特殊地位。这事实上就是独占,尽管有英联邦军事力量的象征性参与。这可能是由于苏联延迟宣布对日作战,因为日本的放弃抵抗的速度使斯大林感到惊讶。美国人随后坚决拒绝了苏联分享占领的要求,苏联军事力量在对日占领中未参与任何行动。结果日本成为西方家长式的管理在亚洲最后也是最为成功的例子,也成为日本人在向他认为值得学习国家的学习上展现了惊人天赋的一个新的实证,尽管在保卫自身安全防卫上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变化。

1063

1945 的事件迫使日本从精神上进入 20 世纪,而它的科技早就迈入了。失败使其民族面临国家认同和更为深层的令人困扰的问题。明治时代的西化播种一个“亚洲人的亚洲”的梦;这当做日本类似门罗主义政策的一种,在远东地区广为传播的反对西化的情绪支撑下,成为掩盖日本帝国主义实情的外衣。它随着日本人的失败烟消云散,1945 年之后,殖民主义的消退留给日本的是没有明显的可信的亚洲角色。实际上,当时它在很长时期内似乎不太可能拥有对付别人的力量。而且,战争证实了日本易受攻击的弱点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就像英国,它的安全来自它控制了海洋,它的失败则注定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此外,日本的失败还有就是苏联占领了库页岛和千岛群岛,以及美国对其的军事占领。最后,日本还面临着巨大的物质破坏和人员创伤需要修复。

在资产方面,1945 年日本人仍然拥有毋庸置疑的中央君主政体的机构,其声望高贵,实际上,是它让投降成为可能。在日本人看来,裕仁天皇不是授权战争的主宰者,但是这个人的决定使他们得救,免遭湮

灭。在太平洋的美国指挥官——麦克阿瑟上将，想要坚持君主政体作为和平占领的机制，而且很小心地使天皇不受1941年前在决策中扮演角色的危害。他谨慎地建立了日本新宪法（选民群体是原来两倍大小，现在包括女人在内），在美国的共和政体热衷者可能干预之前，这一新政体就得以认可。他主张应该给予有效的经济援助，以便使其尽快减少美国纳税人的负担。日本社会的凝聚力和纪律性产生了极大的帮助，即使美国人可能会决定强加给日本一种民主政体，一段时间使其有所削弱。一些问题必须通过主要的土地改革得到缓解，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土地从地主所有转为农民所有。直到1951年，民主教育和非军事化被认为足以可能使日本和它以前大部分对手间保持和平条约，除了苏联和中国国民党人以外（与他们和解又花了几年）。日本恢复了它的完全主权，包括建立用于防御目的武装的权利，但是事实上放弃了它先前的全部海外所有物。因此日本人自战后时代重新崛起，开始控制他们自己的事务。与美国的协议允许在它的土地上保留美国军队。把它自己限制在其狭窄的岛屿内，面对中国的不断壮大甚至其地位比一个世纪之前更加巩固，日本的位置也不再必然地处于劣势。历史证明，在20年之内，这一日益弱势的地位再一次改变。 1064

冷战甚至在1951年之前就改变了美国占领的含义。日本与苏联和中国之间的海上距离分别为10海里和500海里。朝鲜——其旧日帝国竞争的地域，仅150海里远。冷战在亚洲的传播使日本在美国人那里得到甚至更好的对待的保证，现在考虑的是让人们见到它时，信服地把它作为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的样板，以及美国给它提供核保护“伞”。朝鲜战争让日本成为一个重要基地，并刺激了日本的经济复兴。工业生产指数很快地达到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美国通过外交政策提升了日本的海外利益。最后，日本起先没有防卫费用，禁止有任何军队直到1951年。

日本与美国关系密切，与社会主义阵营地域上相邻，经济和社会进步、稳定，所有的这些自然使它完全应该在美国建立主导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安全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体系的基础是与澳大利亚、新西兰

和菲律宾(在 1946 年独立)缔约。其次是和巴基斯坦及泰语地区建立紧密联系;这些是台湾之外美国人在亚洲惟一的盟友。印度尼西亚和(更加重要的)印度依然疏远。这些同盟部分地反映出自英国从印度撤退之后,太平洋和亚洲地区国际关系的新情况。对于更长一段时期来说,英国虽然仍然在东方的苏伊士地区保留军队,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现英国无法给他们保护,而美国却可以。1942 年,英国对新加坡援助的失败更加坚定了这一信念。尽管 20 世纪 50 年代英国军队支持马来西亚对抗印尼,60 年代,保留了香港殖民地,但很显然,只是因为这符合中国人的需要以至于得以维持。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必须解决冷战时期国家之间的简单联合所构成的新太平洋秩序这一复杂问题。与日本的和平条约本身引起了巨大的困难,因为美国视日本为一个潜在的反共产主义的力量,而其他国家——特别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仍记得 1941 年的遭遇,非常害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1065

尽管美国的政策制定并不仅仅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然而,它长期受到这样一种观念的误导,即共产主义在中国获得成功并由中国将这一革命输出到非洲和南美是一种灾难。当然,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已经发生改变,而且会更进一步。然而,这种决定性的事实是中国本身正在重新崛起。最后这并没有加强二元的冷战体系,但是使之变得毫无意义。虽然起先只在前中国地区内,但它与相关的力量联系时,注定会发生一个大的改变;这首先在朝鲜出现。在那里联合国军受阻,还考虑轰炸中国的必要性。但是中国的崛起对苏联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成为两极体系的一分子后,莫斯科现在成为了潜在的三角中的一角,失去了它在全球的革命运动中从未受到质疑的显赫地位。中国革命的更为广泛的影响是最容易出现的,这也是与苏联相关的。至关重要的是,中国革命仅是拒绝在亚洲四处传布西方民主的典型例子。当然,矛盾的是,这种拒绝在所有的亚洲国家不断地用各种形式、语言和借助于西方本身的神话来表达,无论他们是工业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民族主义或马克思主义。

中东

以色列要求生存下去，冷战的来临以及对石油需求的剧增使得1948年之后的中东政治革命化。以色列比英国更刺激到阿拉伯人的情感。它使泛阿拉伯主义看似真实。面对(曾被视为)阿拉伯土地被不公正地掠夺，巴勒斯坦难民的困境，大国的义务以及联合国的相关反应，阿拉伯人痛苦地沉思过，阿拉伯统治者除了接受现实之外别无选择。

然而，在1948至1949年的失败之后，阿拉伯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并未再次打算公开指派自己的军队作战。一方面，正式的战争在延续；另一方面，一系列的休战也在进行。为与以色列确立实际边界，约旦、叙利亚和埃及与它的休战持续到1967年。20世纪50年代早期，出现了很多持续的边界冲突，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由来自埃及和叙利亚难民营中招募的一群年轻游击队军人组织实施，但是，移民、勤奋的工作和来自美国的金钱有助于巩固新生的以色列。围城心理帮助稳定了以色列的政治；当犹太人建立他们的新国家时，政党的威望没有使其出现混乱。随后几年里，犹太人在开发贫瘠的土地和建立新工业上表现出巨大的进步。以色列的国民人均收入与其他人口更多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差距在稳步扩大。 1066

在这里还有对阿拉伯人另外的刺激。对他们国家的外来援助没有产生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埃及，是它们中人口最多的，尤其面临严重的人口增长的问题。当产油国于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从增加的税收收入和较高的国内生产总值中获益时，这时常会导致相互之间的紧张和分裂。这种差别进一步加深了不同阿拉伯国家间以及国家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裂痕。大部分的产油国家是被少数富人所统治，有时是传统的和保守派人士，偶尔也有民族主义者和西方化的精英阶层，他们并不关心那些贫农和贫民窟居民。这种差别被一次阿拉伯人新的政治运动所利用，在战争期间建立了阿拉伯民族社会复兴党。它尝试综合马克思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但是叙利亚和伊拉克这场运动的双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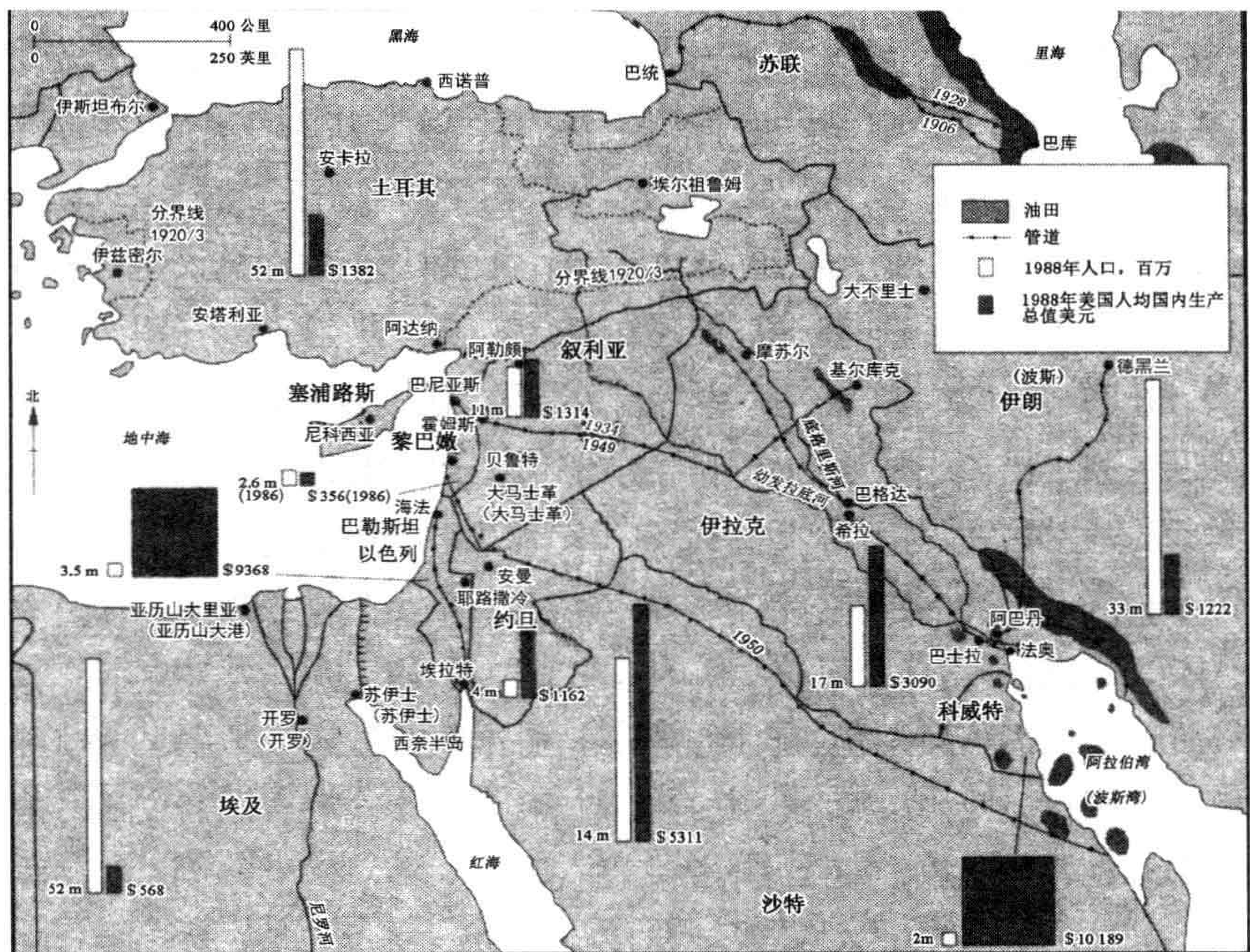
(在两个国家中,政治运动是最强烈的)几乎从一开始就彼此争吵不休。

就所有源于反以色列人和反西方情感的统一行动的冲动来说,泛阿拉伯主义是难以克服的。哈桑王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这些欧化而且都市化的北非国家以及黎凡特之间,都有着强烈的分歧意愿和非常不同的历史传统。它们其中的一些,像伊拉克或约旦,其构造是根据1918年之后欧洲大国的需要和希望创建的;还有些国家则成为社会和政治化石。甚至在许多地方,阿拉伯语只有在清真寺是一种共同的语言(并不是所有讲阿拉伯语者都是穆斯林)。虽然伊斯兰教是许多阿拉伯人之间的纽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它似乎看起来只占很小的比重;在1950年,几乎没有穆斯林谈到它具有攻击性的好战特质。只有以色列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敌人。

1067 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希望被埃及革命所唤醒,在那里最终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军人,名叫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一段时期内,他似乎打算联合阿拉伯世界一起对抗以色列,并开辟社会变化的新道路。1954年,他成为(两年前推翻埃及君主政体的)军事委员会的领袖。埃及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数十年中让英国成为攻击的焦点和替罪羊,因为英国驻军于运河区域,并参与了以色列的建立。英国政府由于担心苏联在区域内影响力日增会危及对英国的通讯和石油补给,全力与阿拉伯统治者合作。对英国人来说,从印度撤退后,中东(讽刺性地首先考虑到英国人在那里存在的动机)并没有丧失它在战略上的吸引力。

这也是阿拉伯世界到处涌现出强大的反西方浪潮的时期。1951年,约旦国王被暗杀;为了维持统治,他的继任者很清楚地表明,自己切断了与英国历史久远的特殊关系。再往西,此前已被迫承认摩洛哥和突尼斯完全独立的法国人又遇到了麻烦,到1954年,面对着阿尔及利亚国家的民族主义叛乱,而且它很快演变成一场全面的战争。没有哪届法国政府会轻易地放弃一个驻有上百万欧裔移民的国家。而且,撒哈拉也刚好被发现藏有石油。在这个动荡不安的阿拉伯世界背景中,纳赛尔描绘的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反以色列的情

1068 感毋庸置疑,他很快地兑现他的承诺,成功地与英国达成从苏伊士基地



后奥斯曼时代的近东和中东

撤军的协议。与此同时，美国人意识到苏联人在中东的威胁与日俱增，暂时把他看作是一个可以接纳的反殖民主义者和潜在的委托人。

他很快开始越来越少得到他们的援助。游击队从埃及的领土对以色列发动突袭，那里有一个最重要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这引发了华盛顿的不满。在1950年，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已经表示他们只会向中东国家提供有限制的武器支援，而且要以维持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平衡为前提。当纳赛尔以棉花为担保与捷克斯洛伐克达成一笔军火购买交易，且埃及公开承认社会主义中国，西方对他的正式立场开始强硬起来。为了表现不满，美国和英国原先提议为其拟定的一项重大国内发展项目——在尼罗河上修一个高水坝提供经费援助，但却撤回了融资计划。作为回应，纳赛尔将私人公司财产收归国有，收回苏伊士运河，宣称它的利润会给水坝供给经费。这触碰了英国敏感的神经。仅部分受到帝国收缩态势约束的本能不快反应，这次立刻与反共产主义

和与比较传统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友谊保持一致,这些国家领导人开始满怀疑虑地将纳赛尔当作是革命激进分子。英国总理安东尼·艾登,痴迷于错误的类比,这也导致他将纳赛尔视为新的希特勒,在他开始着手一个成功进攻的事业之前应该受到阻止。至于法国人,他们被纳赛尔对阿尔及利亚人叛乱的支持惹恼。两国均正式地抗议运河国有化并和以色列联手,开始计划推翻纳赛尔。

1956 年 10 月,以色列人突然侵入埃及,他们宣布,毁坏游击队骚扰以色列定居点的基地。英国和法国政府立刻宣称运河的航行自由受到威胁。他们要求停火。当纳赛尔拒绝停火时,他们首先发动了(在盖伊·福克斯日)空袭,然后攻击埃及的海上运输。与以色列的共谋被否认了,但是这一否认是前后矛盾的。它是一则谎言,从一开始就非常难以置信。很快美国人就彻底地警醒:担心苏联在这场帝国主义的争斗中获得优势。他们用财政压力迫使英国接受一个由联合国商议通过的停火协议。英法的冒险以耻辱的方式失败。

苏伊士事件看起来是(本身就是)西方的一个灾难,但是从长远来看,它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心理上。英国人遭受的损失最大;它使大部分英国人丧失了信心。尤其是在英联邦内部,由于帝国的撤退,使其丧失了诚挚的自信。它加剧了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憎恨;由于怀疑其与西方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阿拉伯人于是更容易接受苏联的迎合。纳赛尔的声望大幅提升。有些苦涩的是,苏伊士事件在关键时刻影响了东欧西部(当西方国家还在争吵不休时,那里反对苏联卫星国政府的匈牙利革命已被苏联军队粉碎)。然而,这次危机所引发的区域事件比以前增多,可能会激起一场泛阿拉伯主义的新浪潮。苏伊士事件并没有改变冷战或中东的平衡。

1069

1958 年,阿拉伯民族社会复兴党的同情者试图将叙利亚和埃及联合在一起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共和国。这个尝试在 1961 年短暂呈现。那年,黎巴嫩前亲西方政府被推翻,伊拉克的君主政治也被革命清扫出局。这些事实激起了泛阿拉伯主义者的信心和勇气,但是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差异很快被他们自己所坚持。当美国军队被派往黎巴嫩,英国

军队在约旦帮助维持他们的政府镇压亲纳赛尔势力时,全世界都在好奇地关注着。与此同时,在叙利亚和以色列边境的战斗仍在零星地进行,虽然游击队一段时间内受到阻止。

然而,从苏伊士事件直到 1967 年,阿拉伯世界没有获得什么重要的发展,除了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法裔(pieds noirs)的不妥协,许多军人的痛苦(他们感觉被要求在那里做一个不可能的工作),几乎引发了法国自身的一场政变。尽管如此,戴高乐将军的政府仍与阿尔及利亚叛军进行了秘密的谈判,在 1962 年 7 月,公民投票公决后,法国正式地宣布承认新阿尔及利亚独立。100 万阿尔及利亚法裔满怀怒意地迁移到法国,扰乱了它的政局。讽刺的是,不到 20 年,法国将受益于阿尔及利亚的 100 万移民工作者,而汇款对阿尔及利亚的经济是必不可少的。在 1951 年,利比亚脱离联合国托管独立时,在位于极小的西班牙飞地外边的整个北方非洲海岸,欧洲人都很清楚地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或地位。然而,就像数个世纪以前土耳其帝国曾经征服的那样,阿拉伯人的历史受到外部的影响仍然很小,但是现在间接地这么做,通过援助和外交手腕,当美国和苏联试图争取朋友时。

美国在不利的条件下艰难选择,但没有美国总统或国会会放弃以色列。犹太人在美国选民中的重要性非常大,虽然在选举当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苏伊士事件中足够勇敢地面对了他们。因此,尽管美国手段很透明,埃及和叙利亚的政策继续鼓动反美,表现得非常气愤。另一方面,苏联很快放弃它早期对以色列的支持,就像它停止提供有用的武器让英国人困窘一样。苏联政策现在保持了对前阿拉伯问题的稳定性,尽力煽动阿拉伯人怨恨英国帝国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的残余势力。很轻易地,在随后的 60 年代,在骚扰他们国内犹太人时,苏联人获得了阿拉伯人廉价支持的红利。

1070

同时,中东问题的背景慢慢地发生改变。在 20 世纪 50 年代,关于石油有两个重要的发现。一是在一些地方发现了相当大的储量,特别是在波斯湾的南边,其规模远高于之前在当时仍然在英国影响力之下的那些小酋长国和沙特阿拉伯发现的量。其次是西方国家的能源消费

在加速上升,尤其是在美国。石油繁荣的主要受益者是沙特阿拉伯、利比亚、科威特,其次是伊朗和伊拉克,这些已经成为主要的石油生产国。有了这两个重要的结果,那些依赖于中东石油的国家——美国、英国、德国和不久的日本——不得不在其外交政策上对阿拉伯人的看法给予更大的重视。它也意味着相对的财富和阿拉伯人国家的地位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前三位的主要产油国,其人口既不过多,在以往的国际事务中也未表现出非常重要的分量。

这些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东危机中表现得并不十分明显,1966年在苏联支持下一个非常极端的政府取得了掌控叙利亚的权力时,变化的影响力才开始显现。只要他不支援巴勒斯坦的游击队(1964年组建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或PLO),约旦的国王就会受到威胁。约旦军队因此开始准备和埃及、叙利亚加入对以色列的攻击。但是在1967年,被尝试封锁其红海港口的举动激怒,以色列人首先发起反击。通过一次很漂亮的战役行动,他们摧毁了埃及的空军和西奈半岛上的军队,轰炸回击约旦,赢得了"六日战争"(在苏伊士运河上,戈兰高地和约旦新边境发生的战斗)。为了自卫,以色列将其以前的边界大幅向前推进,并宣布将保有这些领土。情况还不止这些。失败使富有魅力的纳赛尔——第一位真实的泛阿拉伯主义的领袖黯然失色。很明显,他完全依赖于苏联力量(当以色列人的进攻到达苏伊士运河时,一个苏联海军装甲连到达了亚历山大里亚防卫)和来自石油国家的援助。两者都要求他更加审慎。这也意味着阿拉伯民众的激进领袖们将遭遇困境。

1071 然而,1967年的六日战争什么也没解决。新的巴勒斯坦难民潮又起;在1973年之前,大约140万名巴勒斯坦人据说散布在阿拉伯国家,留在以色列及其占领区的数量大体相同。当以色列人开始在他们新赢得的征服成果上修建定居点时,阿拉伯人的怨恨变得更强。即使时势、石油和出生率似乎有利于阿拉伯人,但其他各种因素的走向却并不明朗。在联合国,号称由不结盟国家组成的"77国集团"达成了中止以色列(像南非)在某些国际组织中的资格,也许更重要的是,意见一致的决议谴责以色列吞并耶路撒冷。另外一个决议呼吁

以色列从阿拉伯领土上撤退以换取邻国的承认。同时,巴解组织转向在受争议的土地周边实施恐怖行动,以提升他们的影响力。像 19 世纪 90 年代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他们认定,西方式的民族国家神话就是他们消除困境的答案:一个新国家应该是他们的民族地位的独立表达,而就像 20 世纪 40 年代的犹太人好战分子一样,他们选择恐怖主义——暗杀和任意谋杀——当作他们的武器。很明显,另外一场战争迟早会爆发,随之而来的一种危险就是,由于美国和苏联分别站在敌对双方两边,世界战争可能突然从本土冲突中引发,就如 1914 年那样。

当埃及和叙利亚在 1973 年 10 月犹太人的赎罪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危险即将来临。由于他们的对手提高很大和苏联军事力量的存在,以色列人首次面临军事失败的可能性。然而,在苏联被指出输送核武器到埃及和美国在全球保持军事戒备之后,他们再次获胜。在那个年代,这可怕的背景不能向公众完整描述,就像以色列自己可能会拥有核武器并在极端的情况下准备使用一样。

然而,这并不是危机超越区域的惟一途径。1919 年遗留的奥斯曼帝国领土的继承问题(以色列的出现只是一部分)持续在产生毒害,导致其加剧的因素首先是英国和法国在两次大战间隔期的政策,然后是冷战引发。但是现在很清楚的是,中东的世界角色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改变。1945 年,世界最大的石油输出国是委内瑞拉;20 年之后不再是如此,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靠中东地区的石油。在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及 6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人和英国人都有信心从这个地区获得廉价、更为确定的石油补给。通过在 1953 年推翻不友善的伊朗政府,他们已经着手处理曾经视作对来自伊朗石油通道的潜在威胁,直到 1963 年都在伊拉克运用非正式的控制性影响力(当时阿拉伯民族社会复兴党在那里夺取了政权)并且毫无困难地获得了沙特阿拉伯的友谊。然而,赎罪日战争结束了这个时代。在沙特阿拉伯的领导下,阿拉伯国家宣布切断对欧洲、日本和美国的石油供应。以色列不得不面临那种可怕的处境,以色列不可能总是依赖于在阿拉伯地区以外的外

1072

交支持，这种支持过去总是能够找到。对一个在落后地区追求进步的国家来说，它不能持续清算大屠杀的罪行，持续获得同情和钦佩，持续维系美国犹太选民的重要影响力。对美国及其盟友来说，这不是一个好的时期。1974 年，联合国 138 个成员国一起反对西方(就以色列和南非问题)，这在联合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尽管当时联合国赞成在以色列和埃及的西奈半岛问题上施加压力，但这些地区根本性问题没有一个得到解决。

无论如何，石油外交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地域性。很快，20 世纪 60 年代的经济问题变得日趋严重。世界石油价格猛涨。各地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变成对支付平衡问题的破坏。挣扎于印度支那困境的美国也受到严重动摇；日本和欧洲也出现全面的衰退。看起来或许一个新 1930 年正在重现；无论如何，有保障的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已经结束。同时，石油进口国家中最穷的国家在石油危机中遭受的损失最大。许多国家很快就面临物价飙升的通胀，他们需要拿出大量的收益来向他们的债权国支付大量的债务利息。

非洲

日益高涨的石油价格对非洲大部分地区的冲击非常大。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早期，非洲大陆经历一场快速的非殖民化进程。这是令人振奋的，但是它却留下了许多虚弱的新国家，特别是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法国、比利时和英国是与整个意外和平的非殖民化进程关联的主要殖民帝国。1943 年意大利失去了非洲最后的殖民地，仅在解放阿尔及利亚和葡萄牙人的殖民地进程中发生了流血冲突，在 1974 年国内革命结束后，葡萄牙人放弃了；因此开启欧洲人海外统治冒险事业的伊比利亚人几乎是最后放弃殖民事业的。事实是，当非洲人开始掌握非洲时，产生了大量的流血事件，但是对法国和英国来说，这些冲突仅在涉及白人定居社区时才值得着重关注。在其他地方，法国和英国的政治家们关心的是，他们要尽可能对他们的前臣民们显示仁慈来保留影响力。

1073

结果就是产生了一个其现状主要归因于19世纪欧洲人的决定(就像中东许多国家把政治结构归因于20世纪欧洲人一样)的黑非洲。新非洲国家通常都是由前殖民边界定义的,这些边界表现出显著地持久性。他们经常包括了不同的语言、血统和习俗的民族,殖民当局的管理要比一个正规的整体部落产生的影响小得多。正如非洲缺乏诸如亚洲那些有一致性影响的大的本土政治文明,来弥补大陆殖民化的分裂,帝国的撤退伴随而来的就是小国割据。求助于非洲西化精英阶层(塞内加尔,一个穆斯林国家,有一位会用法语写诗的总统,他也是研究歌德的专家)的民族主义的教义证实了大陆的分裂,经常忽视一些重要的现实,诸如殖民主义的包容或操纵。新统治者偶尔尖锐的民族主义言论经常是对具有分裂倾向危险势力的一种回应。西部非洲梳理了其历史记录——诸如古老的马里和加纳,东部非洲笼罩着一种隐藏在遗迹中的过去,诸如津巴布韦的废墟,像欧洲早期民族主义者一样都是为了伪造民族神话。民族主义既是黑非洲非殖民化运动的产物也是其起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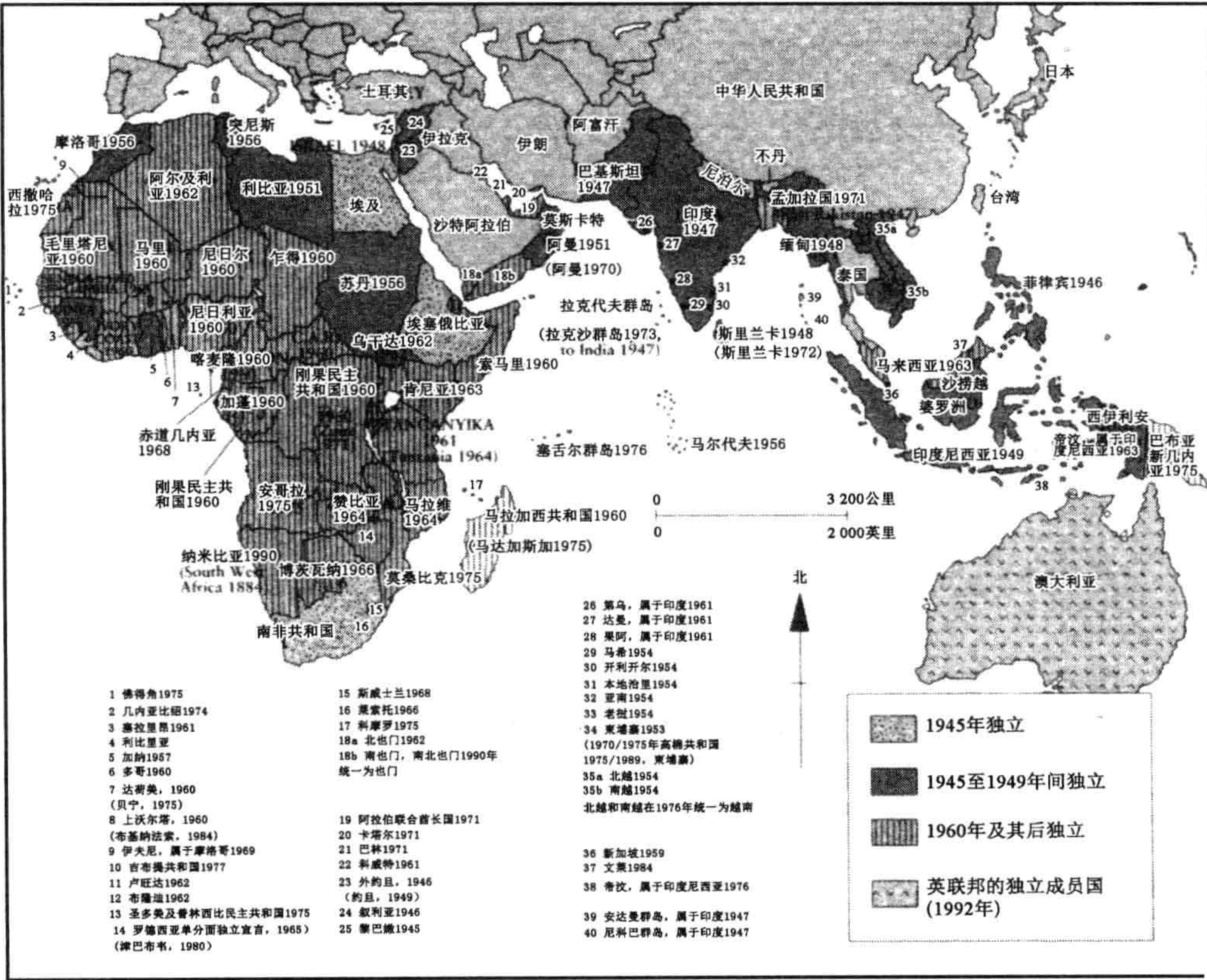
内部的新分裂不是非洲面临的惟一问题,也不是其最严重的问题。尽管非洲大陆有巨大的经济潜力,但是一个繁荣兴旺未来的经济社会基础却是不稳固的。帝国主义的残余再一次产生巨大的影响。殖民统治体系在非洲留下了比亚洲更加虚弱的文化和经济基础设施。识字率低,受过训练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少。非洲重要经济资源(特别是矿产)所需要的技术、资金和用于出口的销售设施,最近才从外部引进(许多黑人政治家将南非白人控制区长期称作"外部")。更重要的是,由于欧洲人需求和嗜好的转向,许多非洲国家经济近期遭受了明显的混乱。在1939至1945年战争期间,英国殖民地的农业转向大量出口,现金收入大幅增长。无论这符不符合农民(此前种植谷物,家畜仅用于自己消费)的长期利益是有争议的,但可以确定的是其直接后果却是意义深远的。一方面现金的流入有助于支持英国和美国需要的生产。这在局部上产生更高额的工资,但现金经济的扩大通常会扰乱本国货币的稳定。取而代之的是乡村的增长和区域性的发展。许多非洲国家与在战后时期显现出脆弱性和不足之处的某些经济模式绑在了一起。即使像英国

1074

殖民地发展和福利基金方案这样仁慈的计划,或许多国际扶助计划,也明显促使非洲生产者被世界市场所束缚。由于独立后的错误经济政策,当这些非洲国家被卷入的情况一再发生时,其阻碍就更加严重。通过出口交换谋求工业化的驱动经常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尤其是当经济作物交易的价格人为地低于与之相关的其他本地制造商品时。几乎总是农民为城市居民作出牺牲,低价导致他们没有增加生产的激励。考虑到20世纪30年代人口开始增长,在1960年后这种状况更加快速,随着对来自没落的殖民国家的“自由”现实的失望,不满就必然会产生。

1075

尽管如此,不管有多大的困难,黑非洲的非殖民化进程不可能被打



亚非的非殖民化进程

断阻碍。1945年除了埃及,非洲真正独立的国家仅有埃塞俄比亚(它本身只在1935至1943年短暂地处于外国殖民统治之下)和利比亚,虽然在事实和法律上,南非联邦是英联邦的一个自治领,但在形式上被排除在此列之外(模糊的身份掩盖了英国殖民地南罗德西亚的实质性的独立)。到1961年(当时南非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共和国,并退出英联邦)为止,有24个新非洲国家获得独立新生。现在则超过了50个。

1957年,加纳成为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第一个前殖民地新国家。当非洲人摆脱殖民主义时,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在随后的27年来,非洲发生了12次战争,有17个国家的领导人被谋杀。冲突带来两个特别严重的后果。在前比利时殖民地刚果,矿产资源丰富的加丹加省试图自行独立的举动引起了一场内战,竞争对手苏联和美国势力的快速介入使其变得更加复杂,与此同时联合国则努力恢复和平。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出现了一个更加令人烦恼的插曲,尼日利亚,这个迄今为止非洲最为稳定最有前途的新独立国家,发生了内战。这也促使非非洲人涉入大屠杀(一个原因是尼日利亚加入了石油生产国行列)。在其他国家,虽少有血腥屠杀,但是派系之间、地区之间和部族之间的斗争仍然很激烈,这就使少量西方化的政治精英发生了动摇,放弃了他们在殖民主义体制苟延残喘之时一度津津乐道的民主与自由。

在新独立国家中,为防止现实的或是想象中的瓦解,压制公开言论和强化中央集权是必要的,大部分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处于一个政党、一个集权政府或是军人掌控的军政府领导(这与解放战争之后南美新独立国家的历史不一样)之下。通常,在一个特定国家独立时期出现的民族政党的对手,在独立后会蒙上叛国的污名。那些古老的独立非洲国家幸存下来的政体也无法逃脱。由于古老的政治制度好像无法提供政治上的和平并开展大规模社会变革,这就引发了1974年的埃塞俄比亚革命。"犹大的狮子"[①]靠边站的过程几乎是碰巧地结束了世界上 1076

① 在《圣经·旧约》中是犹大部落的象征,在《启示录》中还指诞生自这个部落的耶稣,此处泛指基督教。——编者注

最古老的基督教君主政体(同时也终结了这里的王室世系,其谱系在某个版本中据说可一直上溯到所罗门和示巴女王之子)。一年后,夺权的军人看起来像其前任一样不可信。非洲别处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有时出现的一些政治专制者让人想起欧洲早期的独裁者,但是这种比较可能会令人误解。非洲民族主义者委婉地暗示出那些新生国家的"强大人物"中,与同期西方比较,大部分都能被视作前非洲殖民国王的继任者,当然,还有一部分简直就是盗匪。

非洲人自身的麻烦并没有使来自外部世界的刺激减弱。有些刺激的根源并不久远。非洲人视为种族剥削典型事例的基于古代欧洲奴隶贸易的神话剧,其实是欧洲人和北美人的一种创造。政治自卑感在非洲大陆上那些相对比较弱小无力的国家(部分国家的人口低于一百万)普遍存在。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一个分裂的非洲不可能期望在国际事件中发挥影响,尽管它一直努力尝试克服来自分裂的弱点。一个失败的例子就是 1958 年创建非洲统一国家;它开创了一个结盟、偏好联合和在联合中的言论一致的时代,在 1963 年以非洲统一组织(OAU)的成立达致高潮。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在政治层面,尽管在 1975 年为保护非洲生产商的利益与欧洲达成了一项有利的贸易协定,但非洲统一组织的努力却很少成功。

对独立非洲早期大部分政治历史的极度失望使有见识的政治家在经济发展上转向于合作,首先与欧洲保持合作关系,这些前殖民国家保留了非洲最重要的资本、技术和决策资源。但是黑非洲的经济记录却变得糟糕。1960 年,粮食生产仍与人口增长大致保持一致,但到 1982 年,撒哈拉沙漠以南 39 个国家中除了 7 个外,其他国家的人均口粮均比 1970 年的还要低。腐败、失信的政策和以博取卖弄声望投资案为主导的思想挥霍了来自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即使在 1965 年,整个非洲大陆的国民生产总值加起来还低于伊利诺伊一个州,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一大半非洲国家的制造业产出额都呈下降趋势。这些虚弱的经济首先遭遇了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石油危机的打击,随后又面临贸易衰退。之后由于持续的干旱,非洲更是雪上加霜。1960 年非洲的国民

1077

生产总值在以不令人兴奋的速度增长，但是年均仍有约 1.6%的正增长；不过，其发展趋势不久就开始下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前半期以年均 1.7%的速度下降。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在 1983 年将非洲经济出现的景象和历史趋势描述为“近乎一场噩梦”。

因此毫不奇怪，政治上的愤世嫉俗盛行，独立时期的领导人中大部分好像已经迷失。在新的不满的刺激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表现得近乎完全缺乏自我批评和挫败，这种挫败经常被表示为鼓励新怨恨(有时更加激化，在冷战时期通过外部的努力使非洲卷入)。这些都是令人失望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很少成功。反常的是，仅在埃塞俄比亚——独立非洲国家中最封建落后的国家，前葡萄牙殖民地和欠发达的前殖民领地，正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权才得以建立。前法国和英国殖民地几乎未受到影响。

不可避免地，替罪羔羊被找到。逐渐地，但大概可解释的，考虑到非洲的非殖民化运动之急速和彻底，及其大部分地区在地理上的偏远性，人们倾向于就在身边寻找替罪羊，在内战和大屠杀中，旧日的族群差异显现。非洲内部黑人和白人间的种族分裂引起的怨恨也逐渐成为焦点。这在南非联邦——非洲国力最强大的国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那些被称为南非白人的布尔人，直到 1945 年一直主宰着这个国家，热衷于反对英国可追溯到大迁徙时期，并且因布尔战争的失败而得以增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们对维系英联邦联系的纽带展开积极破坏，其进程由于在开普敦和纳塔尔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法院地区的集中投票而变得更加容易。布尔人不仅在德兰士瓦省挖掘壕沟自保，也在主要的工业区和农村偏僻地区挖掘壕沟。南非确实在 1939 年站在英国一边加入战争，并提供了重要的战争力量，但即使那样，不妥协的“南非白人”(Afrikaner)(这群人逐渐以此自称)却支持一场与纳粹分子顺利合作的运动。1948 年，布尔人的领导人在全国大选中战胜南非资深政治家扬·史末资(Jan Smuts)，成为南非总理。当布尔人在联邦内部稳步巩固力量，在工业和金融领域建立其地位，迫使黑非洲背离其深深的偏见的政策的前景已经变得不可信了。其结果就是种族分离线

的重建：种族隔离。它使在布尔人观念里黑非洲的下层社会阶层的立法削减有系统地具体化和更加强化。它的目标就是保证工业化地区白人的地位，减少已经实施的市场经济的管理规则，并通过古老部落的划分来分配黑人人口的增长。

1078

种族隔离对非洲其他地方的白人也有吸引力——而且他们秉持的理由要比原始的迷信或是所谓的南非白人的必要经济需求更不可原谅。惟一一个黑人和白人人口比例与南非大致相当、财富集中程度也相当的国家是南罗德西亚。让英国政府极为难堪的是，1965 年，它正式退出英联邦。令人担忧的是，分裂者的目标就是推动社会越来越像。英国政府犹豫不决，失去了它的机会。尽管对这块前殖民地以贸易禁运的形式采取了“制裁”，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并不能直接对罗得西亚直接做什么，联合国也所做不多，很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忽视禁令的存在，而对于主要石油公司积极采取行动将产品运给叛逆者的行为，英国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作为一个无能内阁政府的最可耻的插曲之一，大英帝国的声望在非洲人眼里沉沦了，非洲人不理解英国政府为什么没有像 1776 年那样明目张胆地在军事上介入镇压殖民地的革命。而英国人的回应是，正是借鉴了这一久远的先例，他们才会认为出兵干涉一个遥远且军力薄弱的自治邦实在不可取。

虽然南非(非洲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在一直变得更加富有和强大)看起来是安全可靠的，但它与罗德西亚和葡萄牙一道，成为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引发黑非洲愤怒的主要对象。南非对黑人的微小让步及其与一些黑非洲国家经济联系日益增强，均无法弥补种族战争的前景。也有一个危险就是外部力量很快就会卷入。1975 年，葡萄牙从安哥拉撤退之后，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在那里夺取了权力。当内战来临的时候，外国的共产主义战士从古巴到来支持这个政府，同时南非很快也考虑支持叛乱分子反对它。

南非政府很快就表明它可能采取行动。它追求使自己摆脱与一个坚强谋求独立的罗德西亚结盟的尴尬(当 1974 年葡萄牙人结束在莫桑比克的统治时，莫桑比克掀起了一场反罗德西亚的游击运动，使其前景

严重恶化)。美国政府担心,万一罗德西亚陷入那些共产主义分子支持的黑人民族主义者手中,后果将不堪设想。它施加了压力给南非人,相反地,南非人又施加压力给罗德西亚人。1976 年 9 月,罗德西亚总理悲伤地告诉他的国民,他们不得不接受黑人多数派的统治信念。建立一个由白人主导统治的非洲国家的努力归于失败。这是欧洲强国衰落的里程碑。然而,当黑人民族主义者追求实现无条件投降时,游击战继续,更加激烈。最后,1980 年罗德西亚在其实现独立前暂时回归英国统治,这时,随着首位黑人总理当政,津巴布韦作为一个新的国家诞生。

1079

这使南非单独成为非洲大陆惟一由白人主政且最富有的国家,以及全世界黑人(在这方面,其含义是非白人)怨恨的焦点。尽管非统由于安哥拉内战而分裂,非洲领导人还是时常找到反对南非的共同基础。1974 年联合国大会因种族隔离禁止南非加入其组织,1977 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灵活地避开对乌干达地区因黑人反对黑人而引发的恐怖罪的调查要求,同时谴责南非(以及以色列和智利)据称犯下的不端行为。来自比勒陀利亚的倾向北方的观点看起来越来越威胁。在苏联的支持下,来自古巴的部队到达安哥拉后显示了一种反对南非的战略行动的新力量。前葡萄牙殖民地和莫桑比克也为南非的持不同政见者提供了基础,他们在黑人地区煽动动乱,并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进行城市恐怖主义。

这些毫无疑问属于引起南非政府立场发生变化的原因。在这十年中,越来越多的种族隔离问题的可憎特征是否应当被废除看起来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在没有武装冲突的情况下,黑人多数派的统治是否为南非白人所认可。当一位新任总理在 1978 年就职时,改变是很明显的。让南非白人失望的是,皮特·威廉·博塔(P. W. Botha)慢慢地开始展现一种妥善政策。然而,没过多久,他的积极性减弱了,联合国持续敌视南非的信号、国内恐怖主义、来自北方纳米比亚(数年前作为联合国托管殖民地分配给南非)边界不断增加的危险和军事需要的环境,以及博塔在其南非白人支持者中民心渐失(在选举中显示出来),所有这些促使他转回实行镇压政策。他最后的放松姿态就是 1983 年一部

新宪法,宪法向南非非白人提供了代表权,并由于它的缺陷激怒了黑人政治领袖,而他对非白人的一点儿让步也使白人保守人士感到厌恶。

1080 与此同时,由其他国家发起的对南非的"国际制裁"的压力正在增加。在 1985 年,即使美国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措施;到那时为止,国际上对南非经济的信心正在不断下降,这对国内的影响逐步显现。在国内,主张变革的风向标可以在荷兰改革教会的决定里被察觉出来,对许多有欧洲血统的南非人来说,种族隔离至少是一个错误,不可能(当时是这样宣称)在宗教经文中找到合法依据。南非白人政治家中间的分裂也在加剧。尽管它日益孤立,但南非的军事行动成功控制了边界(虽然它无法击败安哥拉政府,因为古巴势力在那里保持渗透如此之久),这可能也对政策的改变有所助益。1988 年,在南非认为令人满意的条约基础上,纳米比亚获得独立,南非还与安哥拉实现了和平。

这是反对皮特 · 威廉 · 博塔(自 1984 年以来共和国的总统)的基础,1989 年博塔极不情愿地愤愤离职,由弗雷德里克 · 威廉 · 德 · 克勒克(F. W. de Flerk)继任。他很快就使其清楚明了,自由主义化的行动继续,并且比其他许多可能的想法走得更远,即使在各个方面这并不意味着种族隔离的结束。政治上的抗议和反对党被赋予更多的自由。集会和游行被许可;被关押的黑人民族主义领导人被释放。与此同时,在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上出现一个重要的变化,美国和苏联之间就结束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斗争,给予纳米比亚自由达成一致协议。

突然,前方的道路戏剧性被打开。1990 年 2 月,弗雷德里克 · 威廉 · 德 · 克勒克宣告"一个新的南非"诞生。9 天后,象征性人物纳尔逊 · 曼德拉,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最终从监狱获释。不久以后,他开始忙于与政府讨论南非未来的发展。由于他的言辞坚定,新的有希望的现实态度信号发出了,即在黑人多数派的统治下关于白人少数派的未来必须得到保障的任务必须得到尝试。当然,正是这些信号,激起了其他黑人政治家更大的不耐烦。

南非向民主法治的过渡不是一个简单的转变。即使德 · 克勒克以迅速而极具勇气的行事方式,到 1991 年底撤销了大部分种族隔离制度

的立法，在白人精英阶层还有很多人以各种方式抵制变革。但不论是1993年非洲人国民大会杰出的左翼领导人克里斯·哈尼的遇刺，还是黑人城镇的种族冲突(种族隔离状态下无赖分子通常使其加剧)，都不可能毁掉迈向多数人统治的道路。逐渐地，南非所有种族中的绝大多数将纳尔逊·曼德拉视为——人们经常尊敬地以其宗族名称其为"玛迪巴"——多种族新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进步的捍卫者。当1994年他当选为总统时，曼德拉谈到了一个重生的国家和所有南非人重新获得的骄傲。但在第二年，当曼德拉披上全为白人球员的南非国家橄榄球队的运动衫，庆祝他们在世界杯上获得胜利时，他成为白人与黑人团结的国家象征。球队队长说："马迪巴神奇的力量帮助了我们。"1999年，当曼德拉从总统职位卸任时，所有南非人都有理由这样说。

1081

拉丁美洲

到1900年，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开始安顿下来，不仅稳定而且繁荣。阿根廷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除了最初在大陆的殖民，它们还受到19世纪欧洲的文化影响，特别是法国的影响，这些影响力在后殖民时代深深吸引了拉丁美洲的精英阶层。他们的上层已经被高度欧化，一些美洲大陆的大城市的现代化反映了这一点，同样地，它们也反映出近代欧洲移民的影响，移民逐步取代了老殖民精英。至于原美洲土著人后裔，他们几乎没有被纳入统计。在一两个国家里，他们被抑制得如此彻底以至于几近消失。

几乎所有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农业或矿物输出的主要生产国。一些国家相对而言城市化较高，但它们的制造业部门却是无足轻重的，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它们似乎也没受到19世纪欧洲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影响。除了仅在金融危机与幻灭的影响下短暂而偶尔中止外，资本持续大量涌入美洲大陆。1914年前拉丁美洲国家仅有的一场社会革命(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政府却更迭频繁)，始于1911年墨西哥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iaz)的倒台。它导致了近十年的斗争，一百万人死亡，但革命的主要角色是由被现有政治制度排除在利益之外的中产

阶层扮演,而不是工农无产者,因此中产阶层是主要的得利者。他们与政党政治家一起垄断权力直到20世纪90年代。尽管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在其国家内部显示出大量的阶级冲突,但它们并没有经受欧洲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阵痛。

1082

这些看起来有前途的社会没受到一战太大的影响,继续繁荣发展。这给其与欧洲和北美的关系带来重要的变化。1914年前,虽然它在加勒比海有压倒性的政治影响,美国对南美并没有更多比重的经济投入。1914年,美国在格兰德河以南的外国投资中仅占17%,而英国更多。在一战期间,英国股份公司停止营业改变了那种现象;到1919年美国一国成为南美洲最大的外资来源地,提供了南美大陆外资的约40%。然后世界经济危机开始,对拉丁美洲国家来说,1929年处在一个新的令人讨厌的时代的关口,它们的19世纪真正结束、20世纪真正开始了。许多国家拖欠外国投资者的债务。从国外几乎不可能借到更多的资金。繁荣崩溃导致民族情绪增加,有时这指向别的拉美国家,有时指向北美人和欧洲人;在墨西哥和玻利维亚,外国石油公司被没收。传统欧化的寡头集团由于他们没能处理好国家收入下降所导致的问题,被迫作出妥协姿态。从1930年开始,军事政变、叛乱和流产的革命起义比独立战争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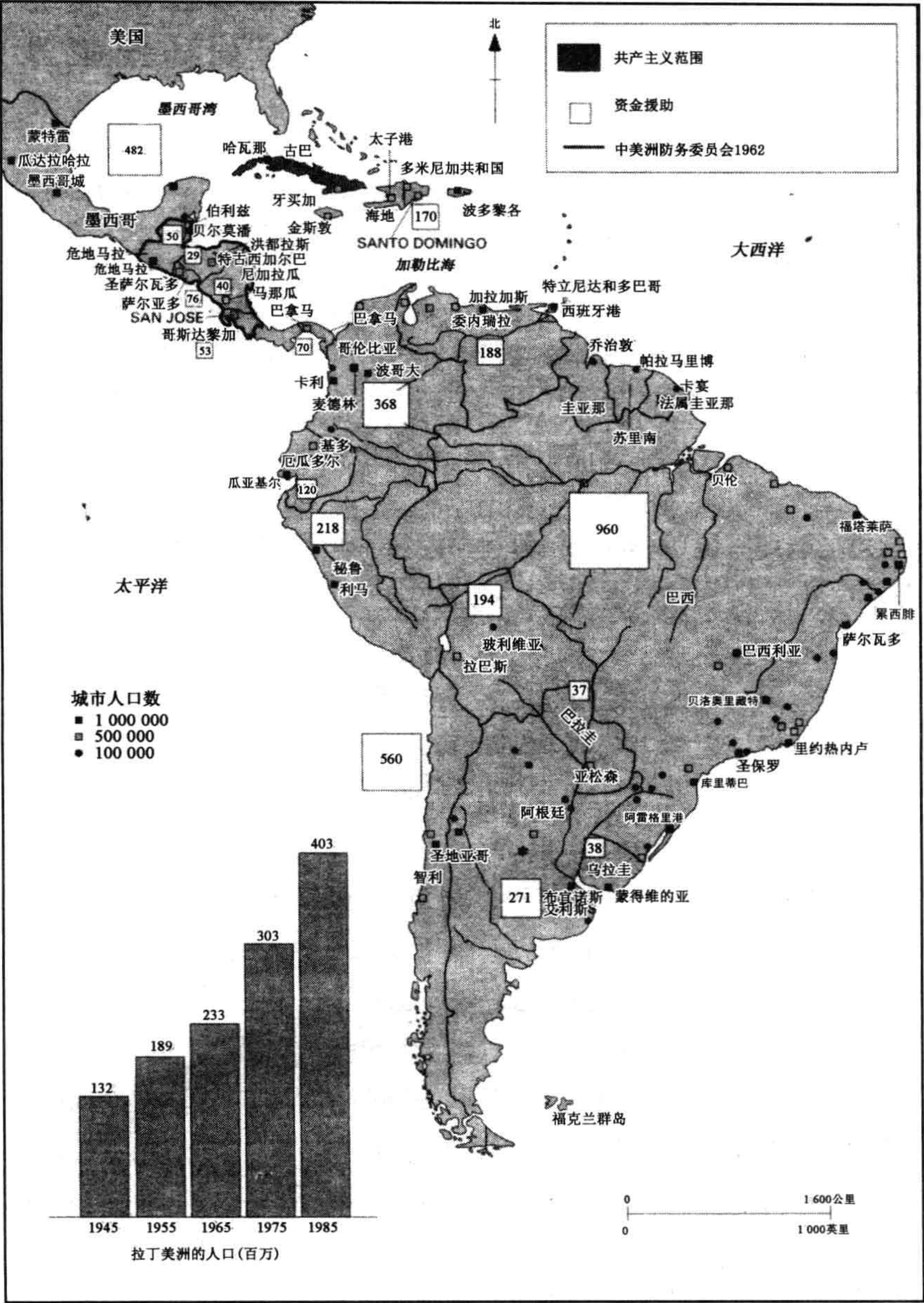
1939年由于战争需求(1950年朝鲜战争延长了这种趋势),商品价格上涨再一次带来繁荣。尽管阿根廷统治者对纳粹德国的臭名昭著的钦佩,在一些别的共和政体上也有德国政体的影子,它们中的多数不是响应对设法向其献殷勤的同盟国,就是对美国卑屈逢迎。它们大都在战争结束前后加入美国阵营,一个显著的姿态就是巴西还向欧洲派遣了一支小远征部队。然而,战争对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影响是经济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早前对美国和欧洲的工业品的过度依赖,如今以物资短缺的形式暴露出来。密集的工业化驱动在几个国家提速。在后战争时代,工业化建立产生的城市工人作为军事独裁和传统精英阶层的竞争对手成为一股新的政治力量进入政治舞台。独裁主义者、半法西斯主义者出现,但平民主义大众运动把一种新型的政治强人推上了

权力舞台。阿根廷的庇隆是最著名的,但 1953 年的哥伦比亚和 1954 年的委内瑞拉产生过同样的统治者外。共产主义在人民大众中没有如此明显地成功。

美国在加勒比海利用其压倒性的力量的方式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但并不是战争所致的结果)。在本世纪的头二十年,美国武装力量先后 20 次直接干预邻国的共和政体,甚至有两次走得更远,建立起受保护国。在 1920 至 1939 年间仅有两次这样的干预,即 1924 年在洪都拉斯和两年后在尼加拉瓜。到 1936 年,在拉丁美洲国家的领土范围内,任何地方都没有美国军队驻扎,除了达成协议的驻地外(在古巴关塔那摩基地)。间接施压也在减少。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环境变化的一个可感知的标识。20 世纪 30 年代的直接干预一无所获,罗斯福总统通过宣扬"好邻居"政策(他在第一次就任演说上首次使用这种表述)来确立其价值,强调在任何事件中美国都不会对美洲国家使用武力干预(罗斯福也是历史上第一位因公访问拉丁美洲国家的美国总统)。在华盛顿的鼓励下,这开创了一段美洲大陆(受到鼓励,也由于国际形势的恶化,逐步意识到德国在美洲的利益)外交和工业合作的时代。它成功地结束了玻利维亚和巴拉圭之间血腥的查科战争。这场战争从 1932 至 1935 年激烈进行,直至 1939 年以发布拉丁美洲中立宣言的方式宣布结束,宣言声称在其 300 英里水域范围内保持中立。然后,在第二年,一艘美国巡洋舰被派往蒙得维的亚加强乌拉圭比索政府对令人担忧的纳粹政变的抵抗。比以往更加明显的是,门罗主义及其"罗斯福推论"像一个共同安全体系一样悄悄地卷入更多的事务。

1945 年后,拉丁美洲再一次反映出国际形势的变化。在冷战的早期阶段,美国的政策集中关注欧洲,但在朝鲜战争后,它开始将关注点南移。对于拉美(所有反美味道的)民族主义的偶然表现,华盛顿不再过于惊慌,而是更为关注,以免南美洲半球为苏联的渗透提供温床。随着冷战加剧,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政府的支持变得更具有选择性。在那个时代,它也导致了很多秘密行动:例如,1954 年推翻共产主义者支持的危地马拉政府。

1084


北
共产主义范围
资金援助
中美洲防务委员会1962
美国
墨西哥湾
482
蒙特雷
瓜达拉哈拉
墨西哥城
墨西哥
哈瓦那
古巴
太子港
多米尼加共和国
牙买加
海地
170
波多黎各
SANTO DOMINGO
加勒比海
大西洋
伯利兹
贝尔莫潘
金斯敦
洪都拉斯
特古西加尔巴
尼加拉瓜
马那瓜
巴拿马
危地马拉
圣萨尔瓦多
萨尔瓦多
SAN JOSE
哥斯达黎加
50
29
40
76
53
70
加拉加斯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西班牙港
巴拿马
委内瑞拉
188
哥伦比亚
波哥大
卡利
麦德林
368
乔治敦
帕拉马里博
卡宴
圭亚那
法属圭亚那
苏里南
基多
厄瓜多尔
瓜亚基尔
120
贝伦
218
960
福塔莱萨
秘鲁
利马
太平洋
194
巴西
累西腓
玻利维亚
拉巴斯
萨尔瓦多
巴西利亚
37
贝洛奥里藏特
巴拉圭
里约热内卢
城市人口数
1 000 000
500 000
100 000
560
圣保罗
亚松森
库里蒂巴
阿根廷
阿雷格里港
38
圣地亚哥
乌拉圭
智利
271
布宜诺斯艾利斯
蒙得维的亚
福克兰群岛
403
303
233
189
132
1945
1955
1965
1975
1985
拉丁美洲的人口(百万)
0
1 600公里
0
1 000英里

战后拉丁美洲

同时,美国的决策者们担忧其后院据点因贫穷为共产主义提供机会,不满应该被消除。他们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援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拉美的援助仅为向欧洲和亚洲提供援助的一小部分,但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增加很多),称赞那些声称要进行社会改革的政府。不幸的是,一旦这些政府通过国有化消除美国资本的控制,华盛顿就再一次转向改变,要求给予相应规模的补偿,因而使改革变得非常困难。从整体上看,因此,它虽然也可能谴责个人独裁政府的不人道行为,诸如 1958 年的古巴那样,美国政府倾向于发现自己,像在亚洲一样,在拉丁美洲支持保守利益集团。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些政府运行有效,特别是玻利维亚,1952 年实施了土地改革。但是真实的情况是,就像以前世纪大部分时间一样,穷困的拉美人的疾苦并没有得到平民主义或保守派统治者的聆听,因为两者都仅仅听取了来自城市的意见,但显然,最贫苦的是农民,其中大部分是美洲印第安人。

1085

然而,令华盛顿紧张不安的是,拉丁美洲有几场小的革命行动。除了古巴革命胜利外,在当时大部分是一种主观希望或担心。这在很多方面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古巴离美国的距离很近使其意义重大。能进入运河区经常显示出其在美国的战略考虑上远比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上要重要得多。其次,古巴已经被打击得异常萧条;它实际上仅仅依靠一种农作物——蔗糖,农作物仅有一个出口地——美国。而且,这种经济纽带仅是古巴比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与美国保持更密切而令人讨厌的"特殊关系"之一。其历史关联可以追溯到 1898 年前古巴脱离西班牙独立之时。直到 1934 年,古巴宪法制定包含限制古巴外交自由的条款。美国仍然保留其在古巴岛屿的海军基地。在城市资产和公用事业上美国有大的投资,古巴的贫穷和低价格使它对追求赌博和女孩的美国人有很大的吸引力。总而言之,毫不惊讶,古巴正如它所做的那样,在大众的支持下制造一种强烈的反美运动。

美国长期被作为藏于战后保守的古巴政权背后的真正掌权者而受到谴责,尽管在 1952 年独裁者巴蒂斯塔夺权后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停止;美国国务院并不赞同他,在 1957 年切断对他的帮助。到那时,一个

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律师——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开始他的反政府的游击活动。两年后他获得了成功。1959 年,作为新的革命古巴的首位总理,他将其政权描述为"人道主义的",并强调,并非共产主义。

卡斯特罗的最初目标仍不为人知。或许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在想什么。从一开始他是与想推翻巴蒂斯塔的人民一起活动,从自由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这些有助于使美国安心,短期内资助他作为古巴人的苏加诺;美国公众的观点是把他作为浪漫主义人物偶像崇拜,胡须在美国激进主义者中成为时髦。一旦卡斯特罗转向干预美国公司利益,开始推行农业改革和蔗糖业国有化政策,关系很快变得恶化。他也公开谴责古巴社会那些支持旧政权的美国化的元素。反美主义成为一种合理的方式(或许是惟一的),是古巴革命后卡斯特罗公开团结古巴人民的方式。不久美国中断了与古巴的外交关系,也开始施加其他各种压力。美国政府确信这个岛国可能会落入卡斯特罗日渐依赖的共产主义者之手。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警告说,如果美国采取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且不终止门罗主义,将招致苏联火箭的攻击;美国国务院很快宣称它的终止报告是夸大其词。最后美国政府决定运用武力推翻卡斯特罗政权。

1086

通过古巴流亡人士来实施获得赞成。当 1961 年总统换届时,约翰·肯尼迪继续贯彻这个决定。在美国的支持下,流亡人士已经在关塔那摩基地受训,美国与古巴的外交关系已经中断。肯尼迪没有发起这些行动,但他既不谨慎也不足智多谋到能阻止它们。这是很遗憾的,因为新总统对拉美的态度没有这么好。很显然一段时期内,美国需要在那里培植善意。在美国金钱和武器的支持下,古巴流亡人士组成的远征队,在 1961 年 4 月出现了一个悲惨的结局,由于著名的"猪湾"惨败,更积极接触的可能性几乎立刻化为泡影。卡斯特罗开始真诚地转向苏联,在 1961 年底宣布自己是一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那时一个新的更加明显的冷战时期开始出现在西半球,开局对美国而言很糟糕。美国一开始在任何地方都招致反对,因为它的行动进攻的是一个受欢迎的有坚实基础的政权。自此以后,古巴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拉丁美洲革命者。卡斯特罗的刑官取代了巴蒂斯塔的,他

的政府所推行的政策，与美国的压力一道，让经济受损严重，但却带来了平均主义和社会改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古巴宣称在拉丁美洲其儿童死亡率最低)。

几乎附带地，作为革命的副产品，古巴很快就发生了整个冷战时期最严重的超强对峙，这或许是转变的起点。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和什么时候，苏联政府决定在古巴安装覆盖美国任何地方的导弹，使美国的潜在目标城市和基地数字大约增加一倍。其动议是来自哈瓦那还是莫斯科，都无从知晓。虽然卡斯特罗向苏联寻求武器援助，但这只是第二位的。无论什么原因，美国人拍摄的勘查照片证明 1962 年 10 月苏联人在古巴修建导弹基地。肯尼迪总统一直等到其确凿无疑时才宣布美国海军将阻止任何船只向古巴继续输送导弹，已在古巴的导弹必须撤离。一艘被搭乘的黎巴嫩船只在随后几天受到搜查；苏联船只仅受到监视。美国强大的核武力量做好了战争准备。几天之后，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通过私人信件交换意见，后者同意撤出导弹。 1087

危机大大超出了美洲半球的历史界限，它的外部反响在其他地方被最大地议论。单就拉丁美洲的历史而言，即使美国答应不入侵古巴，它仍然继续将其与它的邻居孤立起来。毫不奇怪，古巴革命的诉求仍然没有在其他年轻的拉美国家中获得长期基础。这没有使它们的政府给予卡斯特罗更多的同情，特别是当他谈到古巴作为拉美其余地方的革命中心时。结果，在玻利维亚最为成功的一次尝试显示，革命不可能很容易得到成功。古巴的情况已经是非常的例外。别处试图包容农民叛乱的希望是虚幻的。其他国家当地的共产主义分子对卡斯特罗的努力表示遗憾。革命需要的潜在兵员和物质证明城市比农村多，中产阶级要比农民多，游击运动仅在几年之内在大城市制造新闻。在一些国家，尽管令人惊叹和危险，不太清楚他们是否喜欢大众的支持，即使施加于他们身上的暴行使他们远离独裁政府。与此同时，反美主义持续高涨。肯尼迪提出了新美洲一体化的设想，基于社会改革——一个“进步联盟”正如他命名的一样，由于美国人对待古巴的态度引发的憎恶而毫无进展。他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总统，没有做得更好，或许因为他

1088 对拉丁美洲的兴趣远低于国内的改革。在联盟最初提出以后,设想从来没有再提。裹足不前的恶劣后果是,1965 年它被新发生的直接干预例子所取代: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四年前,美国帮助推翻扼杀了一个腐败残暴的独裁者,并建立一个锐意改革奉行民主的政府。当这个政府被保护特权阶层的军队推翻(他们觉察到了改革的威胁),美国中断了援助。最终,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进步联盟得到了有差别的应用。但援助很快得到恢复,对其他右翼政权也是如此。1965 年反军人叛变的结果是 2 万美国军队到达将其扑灭。

到这十年末期,联盟实际上已经被遗忘殆尽,部分是由于对现存共产主义的害怕,这导致美国在拉丁美洲各处支持保守派,部分是因为美国面临大量的其他紧迫性问题。一个讽刺的结果是,当共产主义分子的危险看似持久的时候,那些毫不担心会失去美国支持的政府掀起了对美国资产机构攻击的一个新高潮。智利国有化了最大的美国铜业公司,玻利维亚接管了石油产业,秘鲁没收了美国人所有的种植园。1969 年,拉丁美洲国家政府召开了一个没有美国代表出席的历史性大会,美国的行为被明确而毫无保留地受到责难。那年,美国总统的代表进行的一次旅行引发了抗议和骚乱,美国资产日渐泡沫化,纷纷要求远离这些国家。当艾森豪威尔的副总统的“友好”之旅以其闹哄哄告终而受到唾弃的时候,它更像是前十年的终结。总的来说,看起来到 1970 年,好像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旺盛时期。如果古巴授意的游击运动曾经代表着一种危险,他们现在不再是危险了。一旦内忧之疾消失,对政府来说没有理由不去尝试利用反美情绪。

然而拉丁美洲真正的问题并未得以解决。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更长的时间暴露出长期存在的经济问题,直到 1985 年观察家仍会认为是似乎无法解决的危机。对于这一点有以下几个因素。尽管美洲进行了快速的工业化,大陆受到咄咄逼人的人口增长的威胁,这是显而易见的,正如拉丁美洲的经济困难再一次显示出它们的棘手。进步联盟援助方案处理这些问题部分失利,失败滋生了大量对美国基金使用

1089 的争吵。管理不善产生了巨大的外国债务,这削弱了维持投资以获取

更好的贸易平衡的努力。社会分配面临威胁,即使最发达的拉丁美洲国家仍显示出财富和教育巨大的落差。就算有些国家存在法制和民主,但似乎这些也越来越不足以处理这些问题。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秘鲁、玻利维亚、巴西、阿根廷和巴拉圭都经历了持久的军事独裁统治,大量的民众相信名义上的民主和文官政府无法带来的变化,只有靠独裁主义才能实现。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开始了解到来自像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这些曾经被看做是文明法治的国家的虐待和暴力镇压。智利与其邻国相比,享受成为法治国家的时间更长、历史更久,一直持续到 1970 年的选举,这一年,分裂的右派让位于少数派的社会主义联盟。当一个新政府开始采取的措施带来了经济混乱,好像进一步左倾,甚至进入一种崩溃和无法控制的境地,结果是 1973 年美国赞同并暗中支持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然而,许多智利人由于担心社会形势看起来会变得更糟,并相信被推翻的政府会在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下,便也赞同了政变。智利新独裁军政府很快利用最野蛮的方式对其对手和批评者进行残酷的而广泛的迫害,并没有表现任何不安。最后,它重建了经济,甚至在 20 世纪 80 年代晚期开始显示出仿佛它还能够克制约束自己。但是它带给智利社会的思想分裂比迄今为止这个国家所知道的要更深,这个国家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中毫无疑问成为潜在危险的显著象征。所有这些并不是都属于同样的类型。在 20 世纪 70 年代,哥伦比亚由于争夺控制这个国家巨大的可卡因生产(直到下个世纪开始仍然在激烈进行),实际上造成了这个国家的分裂。

雪上加霜的是,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石油危机降临于这个麻烦缠身又误入歧途的大陆。它使石油进口国家(除了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外债问题失去控制。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一个又一个的国家都开始实施经济补救,但所有这些都证明是无效的或不可能强制执行的。要处理无法控制的通胀,外债收取的利率,来自过去政府资源配置的扭曲以及易于滋生腐败的管理和文化上的缺失,好像都不太可能。1979 年,阿根廷政府为民众动乱所推翻,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阿根廷人经历 1090

了 200 倍的通胀。拉丁美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爆炸性的不安的大陆,国家之间变得越来越不相似,尽管它们有着共同的根源,尤其是在悲痛上有着共同的经历。对于由印第安人、奴隶、殖民和后殖民经历所导致的分层(这些分层明显地体现出经济发展的不同),随着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所设想的发达的、高科技社会的到来(这一社会有利于改善人们的生活,而不是使其更糟),新的分化进一步增加。就像在亚洲,尽管它很不明显,现代文明作用于历史悠久社会而产生的张力现在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可见,即使拉丁美洲自 16 世纪以来就在经历其中的部分。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它们通过与独裁主义者一样的激进主义分子展现出来的恐怖主义额外地表达出来,继续威胁早期取得的文明和法制成就。

然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那里民主法制的政府大部分得到恢复,拉丁美洲主要国家的经济得到了复苏。在这些国家中,军政府被正式抛弃一边。这有助于美洲半球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好。阿根廷和巴西双方一致同意关闭它们的核计划,同时在 1991 年,它们与巴拉圭和乌拉圭一起,同意建立一个共同市场——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并立即发起削减关税活动。1996 年,智利也加入进来。这种充满前途的氛围因经济情况受阻时几次未成功的行动而陷入困境。不幸地是,这些状况在十年间一直在大陆上蹒跚而行,直到世界银行推出新的方案才将阿根廷和巴西从那些麻烦中解救出来。有预兆的是,虽然前者已经将本国货币与美元挂勾(美元本身也是导致部分困难的根源),当阿根廷的对外债务上升到失去控制的时候,巴西再一次开始显示出通胀的影响。国际社会面临空前规模的债务拒付,不得不采取行动。当 2001 年临近年底时,布宜诺斯艾利斯居民再次走上街头,在十天之内经历了数次流血事件和三位总统的更替之后,面临着新一轮的通货紧缩和苦难时期。

21 世纪早期清楚地显示经济增长领域的赢家和输家开始在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定型生根。许多国家的经济要比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他们取得的发展速度快得多,但这些发展成就的国内回报率在居民中

1091

的分配是不均衡的。例如,巴西,按照大多数标准是全球最不平等的社会。它 1.7 亿人口中最富有的 10%达到了欧盟平均生活水平,最贫穷的 50%的生活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则鲜有改善。在 21 世纪初期,很多拉丁美洲国家是左翼政府赢得大选,反映出这种发展不平等受到关注。但是即使是激进的领导人——他们包括委内瑞拉的煽动者平民主义者乌戈·查韦斯,到智利温和的社会主义总统米歇尔·巴奇莱特(2006 年当选)和巴西的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2003 年当选),都不愿意涉及过去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而人们普遍认为,正是这类改革,让这些国家出现了持续时间超过一代人的第一次经济发展。因此,经济增长与赤贫之间的矛盾很可能将成为拉丁美洲未来几年发展的关键问题。

三、破碎的必然

超级大国的争议

1092 在20世纪70年代,两个巨人仍然支配着全世界。自1945年来他们一直如此,他们依然经常探讨好像世界已被分成他们的追随者或敌人。但是变化一直在按照他们认可的方式发生。很多人相信美国已经失去了对苏联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或许根本没有任何优势。这个观念是错的,但是许多人甚至连美国人也认同它。那些很容易因一切不稳定的信号而感到害怕的人总在想,如果另一场冲突发生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另一些人认为越来越势均力敌的平衡会使危机变得不可能,别的相关性变化很难评估。两大阵营或多或少曾经都是内部团结的集团,边缘围绕着一些可能被他们吞并的小虾米,但其内部正呈现出紧张的信号。新的争吵开始超越旧的意识形态分歧。愈发有趣的是,平衡超级大国力量的新的野心家将会出现。一些人甚至开始谈论缓和时代。

再一次,变化的根源要回溯到过往岁月中,两个时期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例如,斯大林的死不可能毫无影响,虽然它对苏联政局没有明显的直接影响,对其解释则更加困难。随后的人事变化在近两年之后导致赫鲁晓夫作为苏联政府的决策人上台,1956年莫洛托夫退

休,他是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冷战外交的老手,作为其在位时的外交部长。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二十大一次秘密会议上发表了一篇轰动的演说。在演说中,他公布了斯大林时代的错误行为,宣布现在苏联外交政策的目标是"共存"。演说很快被广泛宣传,此前共产主义者向世界展示的团结一致形象,第一次疏远了许多共产主义同情者,到目前为止,在西方国家这些同情者始终认为苏联现实没有任何困扰,或者,这次揭露只是让他们有机会在不受良心谴责的方式下表达出由来已久的背离之心。 1093

如果 1956 年的局势没有迅速恶化的话,与苏联削减军备的宣言一起,赫鲁晓夫的演说在国际社会中可能预示着一种新的情绪。苏伊士冒险让苏联对大英帝国和法国的威胁变得明显;莫斯科可不想因为不支持埃及而损害与阿拉伯世界的友好关系。但是同一年在波兰发生了反苏骚乱,在匈牙利爆发了反苏革命。苏联的政策总是成为病态地引发其卫星国背弃和不满的信号。1948 年,苏联顾问被从南斯拉夫召回,那时南斯拉夫已被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被四处宣传,对"铁托主义"长达五年的挖苦讽刺的攻击开始了。直到 1957 年两国政府最终达成谅解,当时苏联让步,并象征性地重新开始对铁托的援助。然而,但南斯拉夫作为华沙条约外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种具有破坏性且令人尴尬的存在,是南斯拉夫被开除,不是这些顾问使莫斯科对东方阵营中的各种风吹草动变得更加敏感。像 1953 年东柏林的反苏骚乱一样,1956 年夏天波兰的骚乱显示出,因经济的不满而加剧的爱国心,仍然会在中心地区向共产主义发出挑战。同样的力量有助于解释 1956 年 10 月布达佩斯的骚乱为何会演变成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导致苏联军队从该城市撤离。新的匈牙利政府承诺自由选举,结束一党执政。当匈牙利政府也宣布退出华沙条约,宣称匈牙利中立,并请求联合国解决匈牙利问题时,苏联军队返回了,致使数千人逃离这个国家,匈牙利革命遭到镇压。联合国大会两次谴责干预,但都无济于事。

这一事件使两边阵营的态度更加强硬。苏联领导层意识到他们在

东欧缺乏人心,因此对西方谈及的"解放"他们更加怀疑。西欧国家再次回想起苏联力量的真面目,并进一步巩固他们不断增长的力量。

最后的冷战危机

1094 1957年10月,前苏联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揭开了超级大国太空竞赛的时代,给美国认为苏联技术落后于美国的自信心以极大的震动。赫鲁晓夫时代的苏联外交政策继续保持对抗,不合作,有时显得异常自信。由于担心西德有重新武装的危险,苏联领导人急于加强他们的卫星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版图包围起来的西柏林显而易见的成功和繁荣令人尴尬。东西之间的城市内部边界容易被穿越,经济富裕和自由吸引越来越多的东德人——特别是技术工人——到西德去。1958年,苏联取消了柏林赖以运转了十年的体制,声称如果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苏联占领区将移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持续的争吵延续近两年。当柏林上空的危机气氛不断加深时,通过柏林的流民输出急升。东德前往西德的人口数字1959年是14万,1960年达20万。当1961年前6个月人员流出超过10万时,东德当局在这年8月突然修建了一座墙(不久通过地雷和带刺铁丝网加强),切断了柏林苏占区与西方占领区之间的通道。不久,紧张气氛急剧增加,但长期来说,柏林墙使事态平静下来。它阴暗的存在(零星的杀死试图穿越的东德人)成为四分之一世纪里西方冷战宣传的赠礼,尽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阻止移民方面取得成功。当美国清楚表明不准备就柏林的法律地位作出让步,即使冒着战争的危险,赫鲁晓夫悄悄放弃了更多极端的要求。

同样的事情也在随后对古巴的问题上出现,尽管所冒的风险更大。与对解决德国问题上的风吹草动相比,美国的欧洲盟友们对此并没有显示出直接的兴趣,苏联人看起来也对古巴的利益没有付出更多的关注。此外,在超级大国"纯粹的"对抗上,苏联表现出来的是被迫让步。回避性的行动或语言可能会成为危险的挑衅,通过限制其必要的要求公开留给他的对手一种简单的退避路线,尽管如此,肯尼迪总统没有显

而易见的让步，虽然过了不久美国导弹从土耳其撤走。赫鲁晓夫马上 1095
不得不对美国没有侵占古巴的许诺感到满意。

很难说这不是一个主要的转折点。作为冷战在全球扩张的终极代价，苏联必须面对核战的前景，尽管核战是不可接受的。意识到因误会引发的冲突危险通过私人联系比普通的外交渠道更加必要，两国随后在首脑之间建立起直接的电话通讯——热线。相反，很清楚的是，不管苏联如何自夸，美国在武装力量上的优势在任何时候都很大。与两个超级大国直接冲突最为相关的新式武器是洲际导弹；1962 年末，美国人在洲际导弹上优势明显，其与苏联人的比率超过 6∶1。苏联开始着手缩小这方面的差距。选择就是制造更好的火箭，苏联消费者再一次承受了负担。其间，古巴对抗帮助英国、美国与苏联之间就限制在太空、大气层和水下进行核试验首次达成一致协议。裁军历经多年追求仍然没有成功，但关于核武器，这是所有协商达成的第一个积极结果。

1964 年，赫鲁晓夫下台。自 1958 年以来，作为政党和政府首脑，他个人对苏联历史的贡献似乎就是造成了一场巨大的震荡。那意味着有保留的"去斯大林化"，对农业的巨大忽视，在重点武装部门上的变化（偏向成为其精锐军种的战略火箭部门）。赫鲁晓夫在外交政策方面特有的主观臆断（除了灾难性的古巴冒险之外）成为免除他职务决定的根本原因。然而，尽管在军队的默许下他被他所冒犯和警告的同仁抛弃，他没有被处死，或被投入监狱，甚至被流放到蒙古的一个军事驻地。很明显，苏联正在培育其政治变革的技巧。这些与过去相比，冲击巨大。

斯大林死后，苏联社会实际上很少放松。在第二十次党代会上的演说一直被提及，即使其主旨在于让批评转移，不再集中于那些曾参与犯下斯大林受谴责的错误的那些人（像赫鲁晓夫本人）。（斯大林的遗体被象征性地从列宁的坟墓移走，那是国家圣地）。接下来的数年被一些人称为"解冻时期"。作家和艺术家被允许有少量的创作自由，同时这个政权也短暂地表现出它开始更加关注世人对其某些行为的看法，比如它对待犹太人的方式。但这是个别的和零星的。惟一清楚的也许 1096
是，斯大林死后，尤其是在赫鲁晓夫统治时期，政党再次作为俄国人生

活中一种独立的因素显现出来。

“交汇”的幻觉

谈论美国和苏联发展得越来越相似,这一度成为流行,现在看似有些古怪。这意味着苏联政策变得缺少威胁。这种“交汇”理论强调了一个无可争辩的扭曲事实:苏联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由于这一点,一些欧洲左翼人士依然认为社会主义是一条真正合理的现代化道路。但是经常被忽略的事实是,苏联经济也是无效率的和扭曲的。

虽然苏联工业在重工业方面长期有着明显的实力,与美国相比较,苏联个人消费保持低水平,倘若没有昂贵的补助金制度体系,可能还会低更多。俄国的农业曾经养活了中欧许多城市,曾向沙皇时代的工业提供原料,如今却持续地失败;矛盾的是,苏联经常不得不购买美国的谷物。1961年,苏联共产党计划到1970年,实现在工业产量上超过美国。但这没有发生,尽管肯尼迪总统同年派人登月的建议实现了。然而,苏联与不发达的国家相比,无疑是富裕的。虽然,以消费社会的角度看它们之间的不一致非常明显,但对穷人来说,美国和苏联有时看起来并无差别。许多苏联人会更有意识地将他们这个在20世纪40年代灾难重重且贫困不堪的国家与在60年代的情况相比,意识到两者之间的差距,而不是把本国与美国对比。两种制度的比较也并非总是一边倒。例如,苏联在教育上的投入,取得了与美国一样的高识字率,甚至比美国当时还要更好一些。这种比较,很容易让人混淆对量的判断和对质的判断,尽管如此,基本的事实不会改变,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远远落后于美国。即使它的公民在1956年终于得到了养老金(在英国人之后近半个世纪),他们也不得不忍受下降得越来越厉害的健康服务,落后于西方可得到的服务。长期以来遗留下的落后和造成阻碍的东西需要剔除。直到1952年,苏联的实际收入才回升到1928年的水平。“交汇”理论总是太过乐观和过分简单化。

1097

尽管如此,到1970年,苏联有一个科学的和工业的基础,其规模和

比例处在最好状态下可以与美国相匹敌。它最明显的表现,激发苏联公民爱国自豪感的伟大源泉,是在太空领域。到 1980 年,在轨道上有如此多的铁制飞行物,因此,想要再次激起 20 年前第一批苏联卫星上天时引发的惊叹已非常困难。尽管美国在迅速跟进,苏联太空成就仍是最棒的。太空探测的报道提供了爱国想象力,在苏联人日常生活其他方面激发出毅力。对一些苏联人而言,他们的太空技术证明了革命的正确,这样说并不为过;这表明苏联能够做到别的国家可以做到的几乎任何事情,还可以做许多只有一个国家能做到的事情,甚至可能做一两件一段时期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做到的事情。最终,苏联实现了现代化。

这是否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她正在成为一个令人满意的国家,领导人更加自信,很少质疑外部世界,不致妨碍国际环境,是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苏联对中国复兴的反应似乎并没有显示这一点,有讨论到对中国边界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攻击。到 1970 年苏联社会又开始表现出内部紧张的新信号——异议和批评,特别是对知识分子自由的约束,在 20 世纪 60 年代首次变得明显,流氓行为、腐败和酗酒等反社会行为的征兆也是如此。但是他们很可能成功控制住了这两类因素,使其不能像在其他大国一样,产生引发重大变化的潜力。从长远来看,事实证明,其他没那么明显的事实却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本国讲俄语的人第一次成为苏联人口中的少数派。同时,这个制度仍然是一个个人自由和基本人权的权限由行政决议和政治监狱支持的机构限定的社会。苏联和美国(或者是任何一个西欧国家)之间生活的差别仍然可以通过诸如在对外国广播限制上的庞大开支等衡量标准来评估。

由于一些明显的原因,美国的变化比苏联更容易观察到,但这并不总是使其基本原则容易辨别。美国力量确实增长了,它对世界非常重要,这些都毋庸置疑。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美国容纳了世界人口的 6%,却生产了世界工业产品的一半多;到 2000 年,仅加利福尼亚一州的经济总量就足可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1968 年,美国人口达到 2 1098

亿(在 1900 年有 7 600 万),每 20 个人中仅有 1 个不是本土出生(虽然在十年内有大量讲西班牙语的人口从墨西哥和加勒比海移民美国)。1960 年后出生人数在增长而出生率却在下降;在这方面美国在主要的发达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美国人越来越多地生活在城市或是郊区。自 1900 年以来,他们死于某些恶性肿瘤的可能性增加至三倍;这相反是公共健康改善的一个确切信息,因为它表明其他方面的疾病正在不断得到控制。

极大成功的美国工业结构在 1970 年被一些非常大的企业所支配,其中一些企业所掌握的资源和财富比一些国家掌握的还要多。考虑到这些大公司在经济领域的分量,经常有言论称,要监督这些公司关注保护公共机构和消费者的利益。但毫无疑问它们有着创造财富和权力的经济能力。尽管事实将表明,它可能做不到它被要求做到的任何事情,但美国的工业力量是战后世界一个非常大的恒量,所支撑的巨大的军事潜力不可避免地成为操纵美国对外政策的依赖力量。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政治的神话仍然在进行。杜鲁门总统的第二任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任期都被打上嘈杂的辩论和许多关于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危险尝试的印记。大部分与这一点无关。自 1945 年以来,联邦政府在掌控,并且实际上增加作为美国经济第一消费者的重要性。政府开销成为主要的经济刺激,增加政府开支成为成百上千的利益集团和数千资本家的目标;平衡预算的希望和廉价的参照商业体系的行政总是搁浅于这个事实。重要的是,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无论什么教条的反对,无论多少华丽修饰的攻击,一个福利国家仍在缓慢地进步,因为投票者希望它走那条道路。这些事实让传统的不受政府控制和干预的自由经济的理想变成了空想。他们也有助于延长民主的联合。在 1952 和 1968 年当选的共和党人总统每一次都得益于厌战;但两者都不能说服美国人应该选出共和党人的国会。另一方面,即使在1960 年前,在民主党集团当政期间可以看到紧张的信号——艾森豪威尔呼吁许多南方选民——到 1970 年在共和党人的旗帜下,事情一点也不像一个民主保守政党,因为许多南方选民被民主党关于黑人只有一

1099

半投票权的立法所冒犯。由民主党人投票被内战所造就的“坚固的南方”作为一个政治常数抵消了。

总统们有时会改变重点。艾森豪威尔时代留下一个印象：其间美国国内历史上几乎没有大事发生。这位总统丝毫不认为，作为总统，他应该积极主导国内政策。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一点，1960 年肯尼迪在民众投票中以微弱优势当选——一个新人(也是一个年轻人)的出现，产生了一种将要有显著变化的感觉。在当时，太多文章做在了非常肤浅的方面，结果产生了太多的错误印象。但回顾过去，可以认同的是，在对内对外事务上，从 1961 年开始八年民主党人的复兴统治，给美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并不是以肯尼迪或是他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就职时所希望的方式。

1960 年就已经存在的一个议题是“黑人问题”。解放后一个世纪，与美国白人相比，美国黑人可能更穷，接受救济更多，失业更多，居住条件和健康更差。40 年后，这种状况依然真实存在。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发生的变化增长了乐观主义情绪。由于三个新事实成为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美国社会黑人的地位突然出现无法忍受的状况。一是黑人移民使之从南方问题转变成为北方难题。在 1940 至 1960 年间，北方各州的黑人人口在移民运动中几乎增加了三倍，直到 1990 年才改变。纽约成为联邦黑人人口最多的州。这不仅将黑人带入新的地方，接触新的生活观念，而且要适应新的生存方式。他们面临的问题不仅是一个法律权利的问题，而且是多方面的综合性问题；经济和文化的匮乏也是其中之一。第二个事实将这个问题推向了美国之外更宽泛的民族主义层面。新生的国家正在联合国中成为多数派，而它们大多是有色族群组成的国家。尴尬的是美国国内如此明目张胆地违反它在国外大肆宣扬的思想，这在美国大部分黑人处境艰难的事实中得到确证。 1100
最后，在一些受到甘地主义对待压迫消极抵抗原则激励的领导人的带领下，黑人自身的行动把许多白人争取过来了。最终，作为结果，美国黑人的法律和政治地位完全向好的方向转变。然而，在这一进程中，苦难和仇恨没有剔除，而且在很多地方实际上还在增加。

对黑人来说，争取平等地位的运动最早最成功的例子，是为“公民权利”的斗争，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受限制的选举权(形式上享有，可实际上在一些南方州不可得到)和在其他方面的平等待遇，例如使用公共设施和学校教育。其成功源于 1954 和 1955 年最高法院的裁决。这个过程不是开始于立法，而是源于司法解释。这些重要的裁决宣告在公共教育体系内不同种族的隔离是违反宪法的，存在隔离的地方应在一个合理的时期内结束隔离政策。在许多南方州，这是对其社会制度体系的挑战，但到 1963 年，在每个州仍只有一些既接收白人儿童又接收黑人儿童的学校，其他的都是只收黑人或白人的学校。

直到 1961 年后立法才真正变得重要起来。由黑人领袖发起的一场成功的“静坐抗议”(它本身取得了许多局部胜利)运动开始后，肯尼迪启动了一个旨在抨击种族隔离和各种不平等事件的投票权方案。他的继任者继续推进这一方案。在破旧的城郊地区，贫困、恶劣的居住环境和糟糕的学校是美国社会混乱不堪的征兆。而随着总体富裕程度的增加，在这种背景下，不平等显得更加令人厌烦。肯尼迪政府呼吁美国人把消除这一切作为“新边疆”的挑战之一。

林登·约翰逊更加强调借助立法来根除它们。当 1963 年 11 月肯尼迪遇刺时他继任为总统。不幸的是，美国黑人问题的最深层根源在于法律无法达到的美国大城市中称为“隔都”的地方。此处，以长远的视角来看待又一次认为是大有裨益的。1965 年(在美国全境解放黑奴成为法律一百年后)，在洛杉矶黑人行政区爆发了一场最大规模有 7.5 万人参加的暴动。在其他城市麻烦相继而来，但是没有同样的规模。25 年后，在瓦茨(洛杉矶暴动发生的地方)所发生的一切使得情况进一步恶化。美国的黑人问题(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经济机会问题，但即使这样看待，也并不容易解决。它不仅未解决而且出现偏离解决问题的趋势。它隐藏的危害在犯罪上突发出来，这成为一些黑人社区和一些无法监管的内陆城区健康标准的一个主要危害。在白人美国的文化和政治里，由于肤色和种族问题，这偶尔会导致产生近乎神经质的妄想。

1101

在南方贫困家庭成长的经历使林登·约翰逊总统成为一个令人信

服的有力的“伟大社会”的拥护者,他在“伟大社会”里描绘了美国的未来,或许这会使他在有生之年坚守处理黑人经济问题的承诺。虽然具有成为美国勇于开展伟大变革总统之一的潜力,虽然满怀抱负、经验和技巧,他也不免体验了悲惨性的失败。他建设性的变革工作很快就被遗忘(而且必须说被放弃),在被一些人称为“美国的西西里远征”结束前,他的总统任期由于这场灾难性的亚洲战争逐渐变得暗淡无光。

越南

在艾森豪威尔当政期间,美国在东南亚的政策逐步建立在这样的信条上: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南越对安全是必不可少的,想要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或是更遥远的印度和澳大利亚不被颠覆,南越就必须保留在西方阵营内。因此,美国已沦为印度支那部分地区保守政府的幕后支持者。肯尼迪总统没有质疑这个观点,开始提供军事“顾问”援助。在他死时,南越已有 2.3 万名美国军事顾问,他们大部分都参与实际作战。约翰逊总统遵循这个已经确定的路线,认为对其他国家的保证必须显示其得到实施。但是西贡一届政府接一届政府被证实是容易被推翻的芦苇。1965 年初,约翰逊被警告南越可能会垮台;因此,他指示政府行动(由于国会严格的政治管理使得前一年北越攻击了美国军舰而他无法回击),对北越目标进行空袭。不久以后,第一支正规部队被派往南越。美国的参与规模很快就失去了控制。1968 年有 50 万军人在越南服役;到这年圣诞,大量的炸弹降临在北越人的身上,比整个二战期间落在德国人和日本人身上的都多。 1102

这个结果在政治上是灾难性的。约翰逊几乎很少担心美国的支付平衡会因巨额的战争开支受到破坏,但这也挤占了国内改革项目急需的资金。更糟糕的是,随着伤亡人数的上升,国内激烈的抗议在不断增多,谈判的努力毫无进展。经济境况不好的年轻人试图逃避征兵。美国人在国内沮丧地从电视上注视着一场战争所付出的代价,他们坐在家里就能前所未有地把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怨恨在增加,美国的惊恐随之增加。一点小安慰是,苏联人对北越的武器供给开销也很大。

美国国内关于越南的纷争远不止年轻人的抗议和怀疑政府的骚乱，也多于由对爱国主义象征的仪式性侮辱和拒绝服兵役所引起的保守派理想主义者们的怒气。越南正在改变许多美国人看待外部世界的方式。在东南亚它最终向英国人证明，即使强大如美国也不可能获得想要的每一个结果，想要仅花费一点合理的代价就得到则更不可能。在 20 世纪 60 年代晚期，美国力量无限且不可抗拒的错觉宣告终结。美国人曾用这种完美无缺的错觉来处理战后的世界。他们认为，他们国家的力量最终决定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走向。除此之外，再倒退一个半世纪，则是几乎不受抑制和阻挡的大陆扩展，欧洲干预的免除和在美洲半球令人印象深刻的领导权增长。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什么事是完全糟糕的和无法挽救的，几乎没有任何事情是注定失败的，没有什么事情让多数美国人感到任何内疚。基于无限可能的漫不经心的假设，这是很容易的和自然的。财富有助于把它从国内事情转向国外事情。美国人很容易忽视他们的成功长期建立的特殊条件。

当许多美国人不得不满足于朝鲜战场上远比他们希望的少得多的胜利时，这种评估在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出现。之后的 20 年，美国沮丧地和一批国家打起了交道，这些国家的国力还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但却似乎能够阻碍它。最后，在越南灾难里，力量的限制和巨大的开支展现出来。1968 年 3 月，反对战争的力量在初期选举中清晰地表现出来。约翰逊逐步得出美国不可能赢得胜利的结论。他准备严格限制轰炸，要求北越重启谈判，富有戏剧性的是，他现在又开始宣称他不会再次参加 1968 年的竞选。正如朝鲜战争的伤亡让艾森豪威尔赢得 1952 年选举一样，在越南战场和国内的损伤有助于(随着第三位候选人的出现)1968 年(仅在约翰逊赢得民主党绝大多数支持的四年之后)选出另一位共和党人总统，在 1972 年再次当选。越南不是惟一的因素，但它是最后扰乱老民主党联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1103

新总统理查德 · 尼克松，在其就职典礼后开始从越南撤出美国的地面部队，但是创造和平耗费了三年。1970 年北越和美国之间开始秘密谈判。进一步的撤退在继续，但美国人也重新开始并加强了对北方

并延伸至柬埔寨的轰炸。外交是曲折和困难的。美国不可能承认它正在放弃它的盟国,尽管它正在如此做,北越也不会接受让自己无法通过他们在南方的同情者而控制南方政权的条款。在美国规模庞大的公众抗议潮中,轰炸在 1972 年底重新开始,但这是最后一次。很快不久,在 1973 年 1 月 27 日,停火协议在巴黎签署。战争花掉了美国巨大的金钱,造成 5.8 万美国人死亡。它严重损害了美国人的声望,侵蚀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破坏了民主政治,使改革受挫。所得到的就是不稳固的南越暂时得以保存,所担负的内部问题使其幸存成为不可能,而可怕的破坏施加于印度支那各民族,造成了 300 多万人死亡。或许放弃美国万能的错觉是多少算是一点弥补。

使美国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是一个现实的成功,尼克松总统收获了政治利益。清除这桩风险之后,他又发出了其他承认自古巴危机以来世界已经发生变化的信号。最令人惊喜的是一项与社会主义中国实现正常直接的外交关系的新政策。这在 1978 年达到高潮,但早在越南战争和平解决之前,就发生了两件大事。1971 年 10 月,联合国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在联合国惟一合法的代表,驱逐了台湾的代表。这不是美国预期的结果,直到决定性的投票结果出来。随后的 2 月,尼克松前往中国访问,这是美国总统历史上第一次访问亚洲主要大陆,作为一次尝试,他将其形容为抚平"1.6 万英里的和 22 年的敌意"之旅。 1104

当尼克松不仅实现了他的中国之行,也成为首位访问莫斯科(在 1972 年 5 月)的美国总统,并就限制性武器达成临时协议(在武器限制方面这还是首次),好像另一个重要的变化发生了。冷战正变得模糊,然而未来也是不确定的。解决越南问题的协议随之达成,这不可能与它不相关;要达成停火协议,莫斯科和北京两方都必须得到安抚。我们可以猜想,中国对越南战争的态度绝不简单;由于来自苏联的潜在危险,美国的力量在亚洲无处不在,特别是台湾和日本,以及由于越南爱国力量的古老记忆,使之变得复杂化;印度支那的共产主义卫星国不可能获得信任。曾经被中国看作纳贡的属国之一,越南回顾其反对中国

与反对法国帝国主义一样有很长的历史。作为美国撤离的直接后果，越南继续战争的实质越来越清楚地被视为一场致力于统治一个重新统一的国家的内战。

北越没有等待很长时间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一段时期内，美国政府必须假装没有看到这一点。国内对于能不再遵守对亚洲的承诺，而去趟浑水感到如释重负，根本不想再去实际监督使撤离成为可能的和平协议的切实落实太多的释放。当一件政治丑闻迫使尼克松下台时，他的继任者面对的国会对越南行动充满质疑，将其视作为危险的外交冒险，决定阻止它们。没有任何努力来维护 1972 年的和平协议，使其保障南越政权不被推翻。在 1975 年早些时候，美国对西贡的援助逐步结束。一个实际上失去所有领土的政府没落到背水一战的地步，尝试用一支意志消沉的战败之师控制首都和湄公河下游。同时，在柬埔寨，共产主义力量正在摧毁另一个曾经被美国支持的政权。国会阻止了进一步派遣军事力量和财政援助。1947 年中国的模式正在被复制；美国正在减少自身的损失，代价则让曾经依赖于她的那些人去承受(虽然有 11.7万越南人与美国人一道离开)而北越军队于 1975 年 4 月进入西贡。

1105 这样的一个结果具有双重讽刺性。首先这表明在亚洲政策上强硬分子总是正确的——美国最终会诉诸于战斗的认识是后殖民主义政权抵抗共产主义的惟一保证。其次，美国又退回至孤立主义这一趋势没有因战败和灾难而受到抑制，反而因此而加强。那些现在反思美国人的死亡、失踪和巨额花费的人，将整个印度支那时期看作是无意义的不可原谅的浪费。但也有人认为，与中国改善关系比讨论越南的损失更为重要。

随着 1980 年日益临近，许多美国人越发困惑和担忧。民族的士气不是很好。越战留下了深深的心理创伤，也助推了国内令人恐惧的反主流文化趋势。在 20 世纪 60 年代，第一次对环境危险提出警告的声音出现；20 世纪 70 年代发生了石油危机，还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当时美国的中东盟友以色列，首次对他的敌人来说不再不堪一击。一次行

政权力不体面的滥用之后,尼克松总统面临的耻辱和弹劾逐渐毁掉了人们对国家机器的信心。在国外,其他盟国(由于美国人的混乱使他们自己感到担忧和困惑)的行为可预知的比过去更少。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国家被寄予厚望,匡扶人类,但在遭到伊斯兰世界多次直率的拒绝后,他们也变得迟疑。

形势实际上变得不容易看清。然而美国的民主制度没有显示出崩溃的信号,也没有显示出无法满足国家大多数需要的迹象,即使它不能找到所有问题的全部答案。美国经济异常惊讶地能够持续多年支付巨大的战争开支,把人类送入月球的太空探险项目以及在全球性的驻军开销。确实,美国黑人的困境继续恶化,国内一些最大的城市由于郊区的衰退看起来更加受挫。然而,却很少有美国人认为这些事实令人担忧,他们更担心的是,本国似乎在导弹力量上不如苏联(它成为 1980 年总统选举的一个议题)。杰拉尔德·福特总统(1974 年在他的前任辞职时就职)已经必须面对国会对支持进一步对美国在印度支那盟国进行援助的不满意。当柬埔寨垮台,南越很快紧随其后时,关于美国的力量在全世界的撤退可能达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在国内外被提出来。如果美国不再为印度支那而战,那么对泰国她也会这么做么?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她会为以色列甚至柏林而战吗?有很充足的理由认为美国退却和沮丧的气氛不会永远持续,但是当它还在持续的时候,它的盟国在观察事态,感觉不安。 1106

两个欧洲

欧洲是冷战的发源地,长期成为冷战的主要战区。然而早在 1970 年前,有一些信号显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的精简制度化不是已经成型的历史的全部。尽管能导致变化的外部刺激都被苏联力量及计划经济体制隔离,通过共同的经济,但东欧还是出现了分化的信号。20 世纪 60 年代,中苏两国闹翻,华约中最小的国家阿尔巴尼亚激烈谴责苏联,支持中国,苏联人不得不忍下这口气,因为阿尔巴尼亚与其他华约国家没有边界相连,这就无须顾忌红军。更令人惊讶的是,

罗马尼亚在中国的支持下成功地对经济互助会控制的经济目标提出异议,主张按照自己的利益发展国家的民族权利。在外交政策问题上,该国甚至采取了模糊的中立主义立场,尽管它还保留在华约内。更令人奇怪的是,它是在一个对同胞强迫统治的统治者控制下这么做的,那曾是东欧最严厉的独裁政权之一。但是罗马尼亚与北约国家没有陆地边界,与苏联有一条800公里长的边界;因此,它的轻佻可能被容忍,因为如果需要,它很快就会被勒住。1968年,当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政府开始着手放宽对内部结构的限制,发展与西德的贸易关系时,转变昔日共产主义的整体一致是会受到明确限制,这一点就充分显现出来。这一举动没有被容忍。在一系列将其带回正轨的尝试之后,捷克斯洛伐克于1968年8月遭到华约军队的入侵。为避免重复1956年匈牙利发生的一切,捷克政府没有抵抗,一段简短的"人道社会主义"(正如一位捷克政治家所说的)尝试就此被消灭。

尽管如此,中苏间的紧张关系,再加上东方阵营中的震动(或许还要加上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别扭的关系),意味着作为整体的世界正在放弃两极性,而像一位意大利共产主义者所称的那样,走向"多中心主义"。冷战简单极化关系的放缓实际上是令人惊讶的。其他复杂化的发展同时在西欧出现。到1980年,很清楚的是,西欧民族所扮演的历史性角色之一已经结束,因为他们当时所统治的世界表面并不比他们的祖先在500年前所控制的多。巨大的转变已经发生,自那时起不可逆转的事情正在进行。尽管欧洲过去的帝国已经结束,但新发现的角色进行得很好。西欧开始第一次发出微弱的信号,表明民族主义对于人类大规模组织潜能的掌控,可能恰恰会在民族主义的起源地变得更加松散。

1107

欧洲人共同的遗产被热衷者追溯到了加洛林王朝,但1945年确实可作为一个起点。从那时起,大陆未来的40多年一直由战争和苏联政策的结果所决定。自战败和分区占领清除了德国问题,在西方,关于德国问题会引起另一场大内战的可能性看起来很遥远,法国的担忧平静下来。当时苏联的政策给了西方国家更多紧密合作的理由;20世纪40

年代末东欧的事件使它们深受触动，意识到美国一旦撤回家，一切都可能发生，他们会遭受分裂。马歇尔计划和北约组织是一个新欧洲走向一体化的最先两个重要步骤。

一体化有着更重要的根源。1948 年马歇尔计划一开始就通过了建立一个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起先有 16 个国家，但后来扩大)的计划，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条约签署一个月后，在一个新的欧洲委员会领导下，代表着十个不同欧洲国家的首个政治团体建立起来。然而，是经济力量使一体化发展得更快速。1948 年在"比荷卢三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之间以及法国和意大利之间(以不同的形式)，关税同盟建立。最终朝向伟大联合的早期步骤中最重要的源于法国建立一个煤和钢铁共同体的建议。这在 1952 年逐渐形成，包含法国、意大利和比荷卢三国，最重要的是，还有西德。它使西欧核心工业区的恢复成为可能，也是使西德融入新的国际架构的主要步骤。通过经济调整，既牵制又复兴西德的手段形成。在西欧面临苏联地面武装力量威胁的情况下，很明显，复兴西德的力量非常必要。在朝鲜事件的影响下，美国官方的观点(让一些欧洲人感到惊慌失措)在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也快速转变为主张德国必须被重新武装。 1108

另外一些事件也有助于欧洲走向超国家组织的道路变得容易。在法国和意大利，政治上的软弱得到了其国内共产主义在野党的同情，这主要归功于经济恢复。共产主义者早在 1947 年就开始在政府中停止扮演任何角色。法国和意大利民主制可能会遭遇到捷克斯洛伐克一样的命运，这种风险在 1950 年消失。反共产主义的观点围绕这样一些政党联合组织起来：促进团结的力量或者是罗马天主教政治人士，或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都意识到其东欧同仁的命运。概括地讲，这些变化意味着，稳健的右翼的西欧政府在 20 世纪 50 年代都在采取务实的措施，追求经济复兴、福利服务提供和西欧融合等相似的目标。

更进一步的机构出现了。1952 年，一个西欧防卫共同体使西德的军事地位变得正式。这逐渐又被德国获得北约组织成员国资格取代，但是像以前一样，迈向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是经济。1957 年，关键性

的步骤出现：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意大利共同签署《罗马条约》，欧洲经济共同体诞生。除了展望包括其成员的“共同市场”的建立外，在共同市场内，货物、服务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被逐步消除，采用共同的关税，同时，条约还提供了一个有决策权的机构、一个官僚机构、以及一个拥有咨询权的欧洲议会。一些人谈及重建查理曼的遗产。它促动了没有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国家两年半后建立起更松散、更有限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到 1986 年，6 个欧洲经济共同体创始国(到那时，它已简化为欧共体，“经济”一词相当引人注目地被拿掉了)发展到 12 个，同时，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仅剩下 4 个成员国。5 年后，残留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与欧共体合并。

西欧缓慢但是加速朝着初步政治共同体迈进的行动，证明了那些作出这些安排的人的信心：他们的国家间的协商与合作不应再为武装冲突所取代。不幸的是，尽管认可这个事实，但是大英帝国政府没有抓住机会加入，在制度上作出表示；后来，它两次被欧洲经济共同体拒之门外。同时，共同体的利益通过一项共同的农业政策逐步被联结在一起，尽管声称有各种意向和目的，但这是对农牧民的一笔巨大的收买款，因为他们是法国、德国选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来，当那些穷国成为成员时也是如此。

1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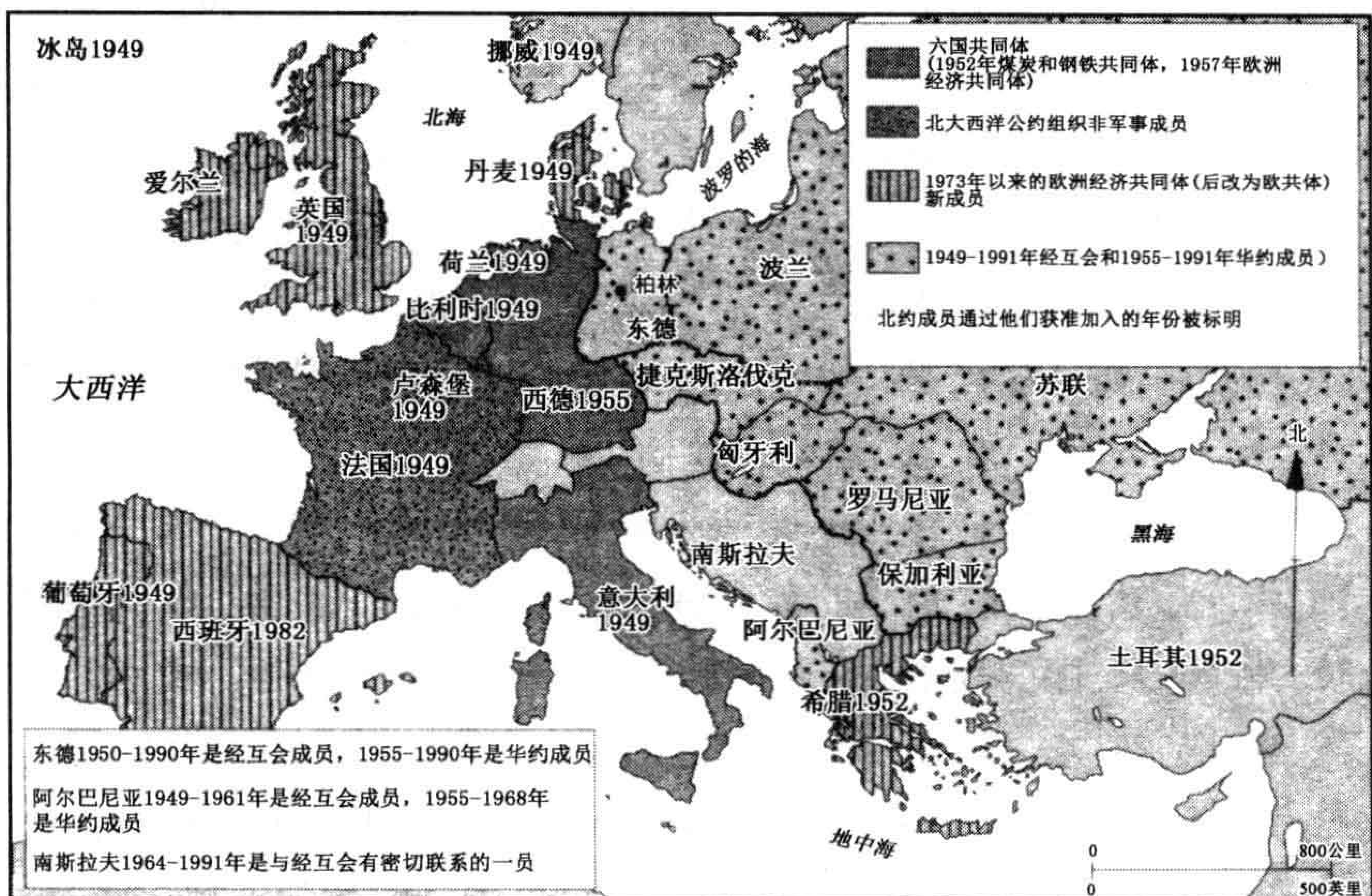
长期坚决反对进一步政治一体化的呼声来自法国。戴高乐将军尤其强烈反对。他 1958 年重返政治舞台，成为法国总统，此时第四共和国似乎很可能陷入阿尔及利亚内战。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与这些极端人士协商，推行重要的宪政改革，建立第五共和国。他为法国作出的下一项贡献与其在战时生涯中的贡献一样伟大，即 1961 年解除了法国对阿尔及利亚所负的责任。驻扎在那里的军团回国了，虽然有些不满。这场行动使他和他的国家获得自由，可扮演更有力的国际角色，尽管多少有些消极的成分。戴高乐的欧洲统一观仅限于独立国家间的合作；他把欧共体主要看作保护法国经济利益的途径。他十分愿意准备充分利用这个新的组织推行他的道路。因而，他在英国申请加入欧共体上两次都投了反对票。战时的经历留给他的是对“盎格鲁-撒克逊人”深

深的不信任,而且他相信(绝非无凭无据),英国仍然期望与包含美国的大西洋共同体联合,而不是欧洲大陆。1964年,他与新中国互派外交使节,这惹恼了美国。他坚持认为要发展法国自己的核武器项目,减少对美国保护的依赖。最后,在引起更大的麻烦后,他从北约组织退出。这被视作西方阵营"多中心主义"时代的来临。当1969年一项不利的公民投票后,戴高乐辞职,一股导致西欧走向不稳定和混乱的政治力量消失。

英国在1973年最终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有最保守历史的民族国家也认可并融入了20世纪的历史事实。这个决定与帝国的收缩相辅相成,意味着英国的战略边界不再位于莱茵河,而是易北河。虽然离决定性的时刻还较远,但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英国政府联合经济增长、增加社会服务供给和维持高水平的雇佣的努力都失败了。第二点最终依赖于第一点,但当困难增加时,第一点总是被牺牲,以成全另外两方面。毕竟,英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贪婪且易受骗的投票者必须得到抚慰。英国传统经济致力于发展国际贸易,这也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其他弱点在于它老式的主要产业、投资缺乏和根植于民族性格中的保守态度。虽然英国变得富裕(实际上在1970年还没有英国体力工人一年有四周带薪假期,而十年后他们中有三分之一的人享有了),但在财富和财富创造率上它越来越觉得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如果说英国人已成功应对自身国际力量的衰落,并在不引起殖民地出现明显暴力和苦痛的情况下实现非殖民化成就,那么,不清楚的是,他们是否能在其他方面摆脱过去,并确保自己能作为二等强国保持哪怕适度的繁荣。

1110

北爱尔兰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对其文明秩序的威胁。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中的恶棍好像决心毁掉他们的国家而不是寻求与他们的对手合作,这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造成了数千英国公民死亡,其中包括士兵、警察和市民、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爱尔兰人,以及苏格兰人还有英格兰人。幸运的是,他们没有像爱尔兰人过去所做的那样妨碍英国政党政治。英国选民仍然十分专注于那些关键性的事件。通货膨胀以前所未



二战后欧洲的经济和军事集团

有的水平运行(1970 — 1980 年按年计算的通胀率高于 13%)。在 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徘徊在新的工业危机边缘,特别是随着石油危机而来的。一场矿工罢工就推翻了一届政府,这不免让一些人怀疑,国家是否“难以管制”,同时,许多领导人和评论家死抱住社会分裂的主题不放。即使是联合王国是否应该留在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个问题(1975 年 6 月这被提交给全民投票这种革命性设计),也经常被放在这些议题之中。当投票结果清楚地赞成继续保留成员资格时,许多政治家感到更加惊讶。

尽管如此,更加艰难的时世(在经济上讲)立即降临;通货膨胀(1975 年石油危机爆发时通胀运行在 26.9%)最后被政府认定为最主要的威胁。工会提出的工资要求预期通胀仍会来临,有些人开始理解到,在消费方面无可争议的增长时代已经结束。仅有一丝光明,几年前大型油田在北欧海岸的海底被发现。1976 年,联合王国成为一个石油输出国。那并没有立即产生很多的帮助;同年,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需要还款。当撒切尔夫人,国家的(和欧洲的)第一位女性首相,

领导主要政党(保守党)的第一位妇女,于 1979 年上任,在某种意义上,她也没什么好失去的了;她的对手已信用全无,很多人觉得,曾长期不加批评而被接受的那些决定了英国政策的观念也是如此。一个彻底的新尝试这一次真的好像成为可能。使她的很多支持者和对手感到惊喜和错愕的是,经历了一个不稳固的开始之后,作为 20 世纪执掌英国权力最长任期的首相,她所做的正是彻底的革新。 1111

担任首相不久,1982 年,撒切尔发现自己意外地主持了可能是英国最后一次的殖民战争。在阿根廷军队短暂的占领后,福克兰群岛[①]的夺回在逻辑上既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功绩又是一个心理和外交上的主要成就。首相直觉地认为,英方应为国际法准则而战,应为岛民表达他们应该接受谁的统治的权利而战,这种判断与大众的情绪不谋而合。她也准确地判断了国际形势的可能性。一个不确定的开始(考虑到拉丁美洲传统的敏感性,这并不令人吃惊)后,美国提供了重要的实际意义的秘密帮助。智利与其不安分的邻居间关系绝算不上和谐,因此,也不打算反对英国在南美大陆的秘密行动。更重要的是,欧共体大多国家支持在联合国孤立阿根廷,决定谴责阿根廷的行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一开始得到了法国政府的支持(这样明确的支持他们并不经常提供),因为它感觉到对既定权力的威胁。

现在很清楚的是,前些年获自于英国外交的可能反应的令人误入歧途的观感鼓励了阿根廷人的行动(由于这个原因,英国的外交部长在危机开始时辞职)。令人高兴的是,这场冲突的政治结果是,阿根廷的声望受到致命的损伤,当政的军政府被推翻,1983 年末,一届民选的宪政政府取而代之。在联合王国,撒切尔夫人的声望因国家的士气上升而上升;在国外,她的地位也提高,这是很重要的。在这十年剩下的时间里,这个国家对其他国家的首脑(显著的是美国总统)产生了影响,其影响的程度,单凭英国国力的基本事实,是根本达不到的。像戴高乐将军一样,撒切尔夫人的个人信念、主观印象和偏见总是显而易见的,而 1112

① 即马尔维纳斯群岛。——译者注

且她,像他一样,都不倾向于欧洲一体化(如果这个词意味着致力于在情感上或实践中立足于欧洲整体,不惜模糊个人对国家利益的预见的话)。同时,在英国内部,她改变了英国政治的条款,或许也在文化和社会争论方面也作出了努力,消解了根深蒂固的就国家目标达成的所谓“正统”(bien-pensant)共识。这与她许多毋庸置疑的激进主义政策一起,既唤起了人们的热情,也激起了对她的憎恶。然而,她在最重要的一些目标上没有取得成就。她上任十年后,政府在很多社会领域扮演了越来越重大而不是越来越小的角色。自 1979 年以来花费在健康和社会安全维护上的公共资金增加了三分之一(但并未满足大幅增长的需求)。

尽管撒切尔夫人带领保守党连续赢得了三次彻底的选举胜利(在英国政治舞台上惟一的成就),党内很多人相信在下一轮竞争中它的得票会越来越低,这可能不会遥远。面对忠诚和支持的侵蚀,1990 年她辞职,留给继任者的是不断增加的失业和糟糕的财政形势。但带来的另一个可能是,英国政治对其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并参与其事务的阻碍越来越少,并且越来越务实。

20 世纪 70 年代对所有欧共体成员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增长衰退,在石油危机的影响下各国经济步履蹒跚。这引发了惯常的争吵和口角(特别是关于经济和财政问题),这使欧洲人想起迄今为止所取得成绩的局限性。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这种情况继续,连同对由日本主导的远东经济的成功的不舒服感觉,一个以及越来越意识到别的国家希望加入这十国的行列,推动关于“共同体”未来的进一步思想结晶。许多欧洲人更加清楚地看到,进一步统一、合作的习惯和财富增长是欧洲政治独立的必要条件,但是一些人也有一种新的感觉,认为这种独立总是显得空洞,除非欧洲也能把自己变成一个超级大国。

1113

热衷者描绘了源自于一体化进一步发展带来的安慰。1979 年欧洲议会的首次直接选举已经举行。希腊于 1981 年,西班牙和葡萄牙于 1986 年,很快加入了共同体。1987 年,欧洲共同的货币金融体系的基础被拟定(虽然英国没有同意),决定 1992 年是真正的统一市场的落成

年，过境的货物、人员、资金和服务将可以自由通行。成员国甚至在原则上支持欧洲政治联盟的观点，虽然英国和法国有明显的疑虑。这并没有如期望的那样，立即促进更大的精神团结和舒适，但是它是某种发展的一个毋庸置疑的信号。

在《罗马条约》签订以来的这些年里，西欧已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或许已超出了曾在这里出生并长大成人的男男女女们能把握的程度。在这些制度变化之下，相似性（在政治、社会结构、消费习惯和关于价值观与目标观的信仰上）也慢慢发展起来。甚至一些经济结构上传统的不一致大大地减少，这表现在法国和德国农民财富上的增长和数量上的减少。另一方面，新的问题呈现在他们面前，由于那些比较贫困、或许政治上不太稳定的国家加入欧共体。融合度是相当高的，这一点无可辩驳。但这对未来意味着什么，却依然不明朗。

冷战世界秩序的新挑战

1975 年 12 月，杰拉尔德·福特成为第二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随着越南的教训被缓慢接受，他的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仇恨的调节开始了。在中国这边，变革是重大发展的一部分：中国正在恢复与其历史地位和潜力相符合的国际角色和区域角色。这只可能自 1949 年开始，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它已完成。与美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现在是可能的。对已经取得的成就正式承认在 1978 年呈现出来了。在一份中美协议里，美国作出关键性的承诺，从台湾撤军，与台湾国民党政府断交。 1114

1976 年 9 月毛泽东去世，他发起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也很快由于“四人帮”（其中一个是他的遗孀）的被捕（而且，最终在 1981 年被审判和定罪）而告结束。在经验丰富的新领导人的带领下，“文化大革命”过火的趋势很快被纠正。1977 年，先前两次被打倒的邓小平作为副总理重新进入政府，坚定地与截然相反的趋势保持一致（他的儿子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的迫害而瘫痪）。不过，最重要的改变，是中国期待已久的经济恢复最终实现。现在机会被给与私人企业、

谋利动机,与非共产主义国家保持经济联系受到鼓励。目标是重新开始技术和工业现代化。

新路线的主要定义在1981年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被表述出来。它也开始了一项微妙的任务,区分毛的积极成就——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他由于"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而导致的退步的"总错误"和责任。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去留,神秘的争论和口号标语化继续让政治现实模糊不清,虽然邓小平和他的伙伴必须通过一个包含保守派在内的集体领导来开展工作,20世纪80年代仍逐渐塑造了一种新的趋势。现代化最终被优先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即使这不可能被大声地宣扬(当党的总书记在1986年发表轻率的令人惊讶的意见"马克思列宁不可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时,他很快就被解职)。马克思主义仍是政府的主导思想。一些人声称中国正在重新开始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其意指理所当然地非常模糊不清。党内和政府里坚持清楚地把握住积极的计划经济的必要性;在追求主要经济目标、国家力量,改善生活水平和宽广的平均主义方面试图更加仔细地区分什么是什么不是有效监管的范围的愿望和实践限制方面有了新的认识。

1115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农业进行了改革。虽然农民没有被给予土地的永久业权,但仍被鼓励在市场上自由出售产品。新的标语"致富光荣"被创造出来,用于鼓励发展乡镇企业和工商业。实用主义的发展道路成为"四个现代化"的指示牌。经济特区——与资本主义世界自由贸易的飞地首先在广东(中国与西方贸易的历史中心)出现。这不是一个没有成本代价的政策。谷物生产首先下降,通货膨胀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显现,外债也增加了。一些人把不断扩大的犯罪和触眼可及的堕落归咎于这一路线。

然而在经济上的成功毋庸置疑。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开始表现出(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像台湾地区那样的经济"奇迹"。到1986年,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煤炭生产国、第四大钢铁生产国。在1978至1986年间,GDP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而同期工业产量在价

值上翻了一番。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了近两倍,到 1988 年平均每个农民家庭估计有近 6 个月的收入存入银行。从长远来看,考虑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惊人损失,这一对比就更加明显。1950 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人均外贸总值大约是起初的 25 倍。伴随这种变化的社会效益也一清二楚:食品消费和预期寿命不断提高,旧制度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的大部分致命灾难实质性结束,大量文盲的消除有了巨大进展。中国持续的人口增长是可怕的,激起了政府有力的干预措施介入;但是并没有像印度那吞噬经济发展的成果。

新路线特别将现代化与强大联系在一起。因此它反映了五四运动以来甚至更早时期的中国改革者们的愿望。中国的国际影响在 20 世纪 50 年代已经有很明显提升;它现在则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展现自己。1984 年,中国与英国就香港 1997 年租借期满后重新回归达成协议,与葡萄牙也随后达成为恢复澳门主权做准备的协议。在中国的邻居当中,越南(与中国的关系一度退化成公开战争,当时两个共产主义国家成为控制柬埔寨的竞争对手)怀有敌意,这是对中国应有地位的总认识的一个污点;台湾人有些安心于中国大陆承诺在适当的时候把海岛重新并入共和国的领土而不会威胁到它的经济制度。同样的保证也适用于香港。像建立贸易保护特区使对外贸易繁荣之类的措施体现出了其重要性,即中国新的领导人把商业作为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的这些小规模特区的设立,对广阔的外部世界起到了一种重要的政策导向。到 1985 年,整个东亚和东南亚组成了一个空前有潜力的贸易区。 1116

在贸易区里,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新的工业和商业活动中心发展如此之快,以至于它们自己得出了旧的全球经济平衡格局已经消失的结论。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都已经摆脱了经济不发达的状况。到 1990 年,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看起来好像也快速提升到加入它们中去。它们的成功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东亚的一部分,而日本对这一结果是必不可少的。像中国一样(并且超过它),日本作为一支力量快速恢复以前的地位,在亚洲和世界均势格局中具有明显的暗示。1959 年,日本的出口再次达到战前的水平。到 1970 年,日本的 GDP

在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占据第二位。日本复兴了工业基础，在制造业新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仅在1951年，日本建造的第一艘用于出口的船舶下水；而20年后，日本已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船舶建造工业。同时，在诸如电子器件和汽车等消费工业领域，日本也占据着领先的地位，日本制造比任何国家都多，除了美国。这引起了美国制造商的怨恨。1979年，日本汽车被同意可以在英国生产，并开始进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市场。但这段故事苦涩的一面在于日本人口的快速膨胀以及长期以来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日本环境遭破坏以及城市生活令人厌烦的证据大量涌现。

不过，日本长期受惠于外部环境。像朝鲜战争一样，越战也构成一个帮助；美国人在占领期间偏好投资而非消费也有益于日本。因此人类必须行动起来利用有利的环境，日本的态度可作为关键表率。战后的日本在民众中散布强烈的自豪感和一种集体努力无与伦比的愿望；其涌现出深厚的凝聚力和个人目标从属于集体目标的能力，一直是日本社会的显著特征。奇怪的是，这种态度似乎在民主制度来临时得以幸存。民主机制在日本社会中的扎根程度究竟有多深，现在就下定论可能还为时尚早；1951年后很快就出现了像一党统治（尽管人们对此的反感很快就以一些更极端组织涌现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中有些是反自由主义的）之类的共识。对传统价值观和制度状况逐渐增加的担忧也显示出来。经济增长的代价不仅反映在巨大的城市群和污染上，而且在使日本习俗更为扭曲的社会问题上突然出现。在通过传统观念和制度支持的团队忠诚基础上大公司仍然营运成功。并且，甚至日本家庭也似乎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紧张。

1117

经济进步也有助于改变外交政策的内容。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外交政策已开始摆脱前十年的单一性。经济力量使日元在国际上更加重要，将日本吸入西方的金融外交。财富也使它介入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在太平洋流域，日本是其他国家重要产品的主要消费国；在中东它成为石油大买主。在欧洲，一些人认为日本的投资值得警惕（即使总的份额并不大），同时它的工业产品的进口也威胁到了欧洲生产商。

甚至食物供给方面也引起了国际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90%的蛋白质需求来自捕鱼,这引起国际社会对日本在重要地方过度捕鱼的警告。

同样地,这些和别的一些事情改变了日本外交关系的内容和气氛;其他国家的行为也如此,特别是在太平洋地区。20世纪60年代,日本日益对太平洋其他国家拥有明显的经济优势,这与1914年前德国对中欧和东欧国家的情况不无相似。由于日本已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原材料进口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会发现其经济越来越多地与日本的利益绑在一起。两国都供应肉食,澳大利亚还供应矿产,特别是煤和铁矿石。在亚洲大陆上,苏联人和韩国人不断抱怨日本捕鱼问题。这为老的历史问题增加了新的纠纷。韩国还是日本出口的第二大市场(美国是最大的市场),1951年后日本又开始在那里投资。这激起了传统的不信任。日本不曾料到韩国的民族主义有如此高的反日声音,以至于1959年韩国总统鼓励他的国民团结起来"像一个人",不仅用来反对北方邻居,而且反对日本。在20年里,日本的汽车生产商满怀疑虑地发现,他们曾经帮助扶持起来的地方已成为有力的竞争对手。像台湾一样,韩国工业增长建立在日本的技术输出之上。 1118

虽然,当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猛涨时,尽管日本因依赖于能源进口而意味着一次严重的经济打击,但从长期来看,这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日本的经济进步。1971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价值达60亿美元:到1984年,总额又增加到十倍。到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在GDP总量上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当日本的工业家们转向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进步,并开始讨论汽车制造业的下滑时,没有理由会认为日本已经失去了训练有素的自我调适。

力量越大必然意味着责任越大。1972年当冲绳岛(第一个收回的海外占有地)被归还日本时,逻辑上美国管制的撤退已经圆满完成,即使那里仍保留了一个美军大基地。千岛群岛(仍然在俄国人手中)问题、台湾(由中国国民党控制,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称拥有主权)问题仍未解决,但是日本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态度无疑慎重地保持克制。萨哈

林岛问题也有重启的可能。在中国和日本的复兴开始带给亚洲格局巨大变化之时,所有这些问题的修订或至少是重新考虑,看起来都变得更加敏感。中苏争吵给日本提供了更多策略上的自由,无论是对它从前的守护神美国还是对中国和苏联都是如此。随着越南战争加剧,以及日本国内相应的反战声浪高涨,与美国保持太紧密的联系会带来尴尬,变得更加清楚。日本的自由受限,这体现在到 1970 年,亚洲地区其他三个大国都用核武器武装了起来(所有国家中日本最有理由了解其影响)。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日本必须拥有的话,它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生产出来。日本的立场完全有潜力导致各种各样的方向。1978 年,中国国家副主席访问东京。无可争议,日本再一次成为一个世界大国。

如果地位的衡量体现在一国能持续在本国地理区域之外施加决定性影响(无论是在经济、军事还是政治方面)上,那么到 20 世纪 80 年代时印度仍然不是一个世界大国。这大概是 20 世纪后半时段的一大奇事。印度独立时拥有众多优势,而这既非其他前欧洲属国能拥有的,也非战败的日本能享有的。印度于 1947 年接管了一个有效的政府,有训练有素可依赖的装备精良的军事力量,有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阶层,有繁荣的大学(大约 70 多所),有更多可以利用的国际善意和友好,有一个庞大的未受战争损坏的基础设施;不久,又享有可开发利用冷战激化的益处。这个国家虽然也必须面对贫困、营养不良和主要的公共健康问题,但中国也是如此。然而到 1980 年两国之间的对照比较显而易见。到 1970 年中国城市的大街上充满了衣着耐用(虽然单调)营养良好的人们,而同期印度街上仍然展现着贫困和疾病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例子。这使人们很容易趋向选择悲观论调来看待印度不佳的发展状况。虽有一些层面的发展客观上令人印象深刻,但这些成就却被经济增长紧紧受到人口增长追逼的事实所遮蔽。大多数印度人仅比 1947 年赢得独立时过得稍微好一点。

1119

考虑到这个国家的分裂本质和潜在的分离可能,可以说使印度保持统一本身就是一件伟大的成就。无论如何,一种民主选举的秩序得到维持;即使有许多限制,作为民主选举投票的结果,政府的和平变革

出现了。即使印度的民主状况在1975年后看起来不那么令人鼓舞——当时，总理(尼赫鲁的女儿)甘地夫人宣称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强行推行总统制统治，类似旧时代(印度两个共产主义政党中有一个支持她)的总督。但实际是，随后不久，她在1977年的选举中失利，接着在第二年被司法排除在政府和议会之外；这被认为是印度立宪主义良性运作的一种征兆。当然在天平的另一端，诸如在特殊地区利用总统权力终止正常的宪政、对警察和安全部队在少数民族采用暴行的报道等等事件也在反复出现。

对分裂危险回应的一个不祥征兆是，1971年，作为第一个能切实对国大党领导权构成威胁的力量，一个正统的非常保守的印度教政党出现在印度政治舞台上，并控制政府长达3年。不过，国大党的领导权仍然持续着。独立后40年，国大党与其说是一个欧洲意义上的政党，不如说是一个全印度利益集团、贵族名流和控制任免权者的联盟。这一点再明显不过了。这给予国大党(即使在尼赫鲁的领导下，即使有他充满社会主义的抱负和理论语言)一种固有的保守特征。自英国统治结束后，国大党的功能从不包括带来变革，反而是适应。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在印度政府的王朝本质上。尼赫鲁的女儿接替他成为总理，甘地夫人(她已经开始背离他的愿望，通过放弃他不要宗教仪式伴随葬礼的要求)的接班人则是她儿子拉吉夫·甘地。当拉吉夫·甘地被刺客爆炸谋杀(当时他不在职)后，国大党领导人立即显示出一种几乎是机械式的反应，追求说服他的遗孀继续担任国大党的领袖。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出现了王朝式统治不可能长期生存下去的信号。1984年，当印度军队在阿姆利则开始执行对锡克教徒信仰最重要的圣地进攻后，印度锡克教徒用暗杀甘地夫人(再次担任总理)的方式将自己生动地带到世界媒体面前。在接下来7年时间，大约有1万多名锡克教斗士、无辜遭殃者和安全部队成员被杀。在这10年的后期，与巴基斯坦关于克什米尔的战争也再次爆发。1990年，官方承认该年有890人在印度教徒-穆斯林暴乱中死亡，是自1947年以来情况最糟的。 1120

再一次，要想不恢复陈腐的印象是困难的。在印度重视过去是非

常重要的，缺乏有活力的力量出现来推翻它。因而印度的现代性的到来是缓慢而补丁式的。当对印度独立前的记忆逐渐消失时，对印度传统的重申却总是可能。象征性地，当 1947 年独立时刻降临时，印度正处于漆黑的午夜。因为英国人没有征求占星家们提供一个吉利的日期，因此在两天之间的时刻必须被选择作为一个新国家的诞辰。这也是一种断言：在接下来的 40 年里，印度传统的模式将不会失去力量。印巴分治因而让印度社会主要处于印度教方式的统治下。到 1980 年，印度最后一批在英国统治下招聘的官员已经退休。印度仍然生活在舶来的西方政治制度和传统社会之间明显的不一致当中。尽管印度的许多领导人(具有献身精神的男男女女们)取得了诸多的伟大成就，但根深蒂固的过去(意味着特权、不平等、非正义)显而易见仍在妨碍印度的发展。因而，或许那些在 1947 年相信印度未来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将多么艰辛，但是，那些已发觉在自己的社会中进行比这更简单的根本性变革也很难的人，也不应因此就觉得高人一等。

伊斯兰教的世界

1121　印度的邻居巴基斯坦更有意识地转向了伊斯兰传统，很快就在一场大部分伊斯兰世界都可见的复兴运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不是第一次。西方政治家再次回想起伊斯兰在大陆上的扩张，从西方的摩洛哥到东方的中国。印度尼西亚(这个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巴基斯坦、马来西亚以及处在它们之间的孟加拉国，几乎包含了全世界穆斯林的一半。除了这些国家和阿拉伯文化的土地外，在苏联和人口最多的非洲国家尼日利亚也有大量的穆斯林国民(早在 1906 年，俄国沙皇政府就很担忧伊朗革命的影响，因为怕它激起本国穆斯林的骚动)。但是对伊斯兰世界的新认识需要花费时间。一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当人们想到伊斯兰教时，世界余下的部分只倾向于提到中东阿拉伯国家，特别是那些石油富国。

这种限制性的观念也因冷战而长期变得模糊和混乱。有时冲突的形式也嵌入到更古老的体系中。对一些观察家来说，俄国在这个地区

体现影响力的传统愿望似乎也是苏联政策考虑的一个因素，而且此时前所未有地接近满意的结果。到1970年，苏联拥有了与美国相匹敌的世界性海军力量存在，甚至在印度洋也建立了活动基地。随着英国1967年从亚丁撤离，其基地被苏联与南也门政府达成一致协议利用。所有这一切几乎同时发生在美国人更南部的战略受挫时。冷战在非洲之角和在前葡萄牙殖民地发生，给更北部的事件增添了重要的意义。

然而，苏联的政策，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在伊斯兰世界中似乎并未得益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中东政策明显的混乱局面。埃及当时已经与叙利亚起纠纷，希望在与以色列达成保全面子的和平基础上转向美国。当1975年联合国大会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是一种种族主义，并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联大"观察员"时，埃及不可避免地感到了来自其他阿拉伯国家更多的孤立。到这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北部各地的行动不仅骚扰以色列，而且驱使黎巴嫩（曾经是一个西方价值观的堡垒，现在是巴解组织的避难所）成为废墟并趋于瓦解。1978年以色列侵入黎巴嫩南部，希望结束巴解组织的骚扰。尽管非伊斯兰世界都鼓掌赞成埃及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在华盛顿会见并于次年达成和平协议，为以色列从西奈半岛撤退做好准备，但这位埃及人在3年后付出了被暗杀的代价，那些人觉得他背叛了巴勒斯坦的事业。 1122

埃及和以色列之间问题的有限解决，大部分应归功于吉米·卡特总统，他在1976年作为民主党候选人赢得了美国总统大选的胜利。与中东相比，美国人的士气那时正在遭受别的挫折。越战已经毁掉了一位总统，而他的继任者已经确立了处理美国战败和和平解决的事宜（不久就清楚解决的价值多么小）。此外，暗地里，许多美国人都在担心苏联弹道导弹力量上的提升。所有这一切都影响到美国对一件几乎完全没预料到的事件的反应——伊朗国王被推翻。这不仅对美国是一个有害的打击，而且揭示了中东和伊斯兰波动的一个极大的潜在新维度。

作为一个可靠的伙伴，以及美国长期支持的接收者，1979年1月伊朗国王被从王位上赶走，其国家则被义愤填膺的自由派人士和伊斯兰保守派人士的联盟控制。但尝试建立一个稳定的立宪政府的努力，

很快由于大众群起支持伊斯兰教的努力而瓦解。伊朗的传统模式和社会结构曾由于国王追随他的父亲礼萨·汗实施的一项现代化政策(但却更不慎重)而遭到动摇。但几乎马上,出现了什叶派伊斯兰共和国,由年长而狂热的宗教领袖领导。美国很快就承认这一新政权,但是无济于事。作为前国王的赞助人、资本主义和西方实利主义的优秀化身,美国被认为罪行累累。一点小的慰藉是,苏联很快也被伊朗的宗教领导人指以类似的诽谤,视为第二个威胁到伊斯兰教纯洁性的"撒旦"。然而,当伊拉克尤其残忍的阿拉伯民族社会复兴党政权(之前就因无情处决和追捕伊拉克共产主义者而受到青睐)与新伊朗发生争吵——由美索不达米亚的逊尼派教徒与波斯的什叶派穆斯林间传统的怨恨激起(不顾阿拉伯民族社会复兴党人的世俗主义)的一场冲突——时,一些美国人备受鼓舞。当 1979 年 7 月萨达姆·侯赛因在巴格达接任总统时,他看起来受到了中央情报局的鼓励:曾认为他可能抵消伊朗人在波斯湾的威胁。

因为伊朗革命不仅仅暗示着美国失去了一个附属国,因此,这一切就更受欢迎了。即使这些冤情联合起来使推翻国王成为理由,但快速恢复古老传统(引人注目地表现在对妇女的态度上)则表明,被否决的不仅仅是一位统治者。一个新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虽然主要是什叶派,却提出了普世的主张。它是一个神权国家,在这里合法的统治源自合法的信仰,有些像加尔文的日内瓦。它也是世界各地众多穆斯林(尤其是阿拉伯地区)在世俗的西化开始和现代化失败时所共享的一种愤怒的表达。在中东,而不是别的地方,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解决地区问题上都失败了——或者至少在满足它们所激发的情感和欲望上失败了。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认为阿塔图尔克、礼萨·汗、纳赛尔都引导他们的人民走向了错误的道路。伊斯兰社会在抵制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蔓延上非常成功,但对穆斯林来说,他们的领导人追寻了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的西方文化熏陶,现在看起来似乎甚至威胁更大。自相矛盾的是,西方资本家剥削的革命观念有助于促成这种情感的剧变。

1123

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姑且使用这个不太令人满意的涵盖语)的根源各种各样而且很深。它可能汲取了几个世纪以来的反基督教斗争。它于 20 世纪 60 年代恢复精神,体现在,当考虑到冷战划分的需要,外国势力(包括苏联)在将其意愿强加于中东和波斯湾时,困难明显增加。对许多阿拉伯穆斯林来说,逐渐增加的证据表明,作为自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提倡的对土耳其衰落的一种组织性补救,西方对于民族的原则没有实施。非常明显,奥斯曼继承权战争没有结束。对西方来说,由于近来石油因素的启示,一个窘困但有用的应对仍然是作出更多的承诺。但是,自 1945 年以来,虔诚的穆斯林日益认识到,西方提供给那些拥有石油的富国的商业、通讯技术和简单的诱惑物,将比已经出现过的任何早期(仅仅是纯粹的军事)威胁都对伊斯兰国家产生更多的危险。这必将走向紧张和不安。

然而,这些团体发现很难采取一致的步调。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敌对状态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名义上发端于伊拉克的阿拉伯民族社会复兴运动鼓舞了很多穆斯林,但在 1945 年后的这段时期,却已被穆斯林兄弟会诅咒。该会甚至在巴勒斯坦争端里谴责双方的“不信神”。人民主权论是原教旨主义者拒绝的一个目标;他们追求伊斯兰教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因此,不久以后,世界开始习惯于听到巴基斯坦禁止男女混合的曲棍球,沙特阿拉伯用投石击毙和肢解来惩罚犯罪,阿曼正在建立一所在讲课期间将男女隔离的大学等等更多的新闻报道。到 1980 年,激进穆斯林的力量足以确保他们在很多国家的目标的安全。甚至在相对“西化”的埃及,到 1978 年时学生们在他们自己的选举中投票赞成他们,同时一些医学院的学生拒绝解剖男性尸体,要求一个隔离的双重教学体系。

1124

此外(乍一看,以西方的观点来看,学生激进分子乐意支持如此反动的事情是很奇特的),为了恰当地看待这些态度,在伊斯兰世界,必须把这一切放在类似于西方的国家或者制度理论长期缺位的背景下加以理解。甚至在正统的方面,即使它传递了令人向往的东西,就这点而论,在伊斯兰思想里国家不是不言而喻的成为一个合法的政权——而

且,在那之上,自 19 世纪以来阿拉伯大陆国家组织的引进已经处于对西方的有意或无意的模仿中。年轻的激进主义,努力发现那种缺乏的未存在国家或民族里的固有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政治(或者想到的一切就是那种,无论如何都是另外一种西方的舶来品);他们在别的地方发现,而且,部分地解释了首次在利比亚出现的努力成果,然后在伊朗和阿尔及利亚,促进了合法政权的新模式形成。旧日伊斯兰对公共体制的偏见,以及对部落主义和伊斯兰教联盟的偏好会否继续保留,还有待观察。毕竟,虽然谈及兄弟关系,终究不能不承认世界上大部分穆斯林都不懂阿拉伯语。

潜在的混乱,甚至部分穆斯林世界的两败俱伤的冲突,使它太具诱惑而不能简单化。伊斯兰世界没有文化的同质性。不过 20 世纪 80 年代清真寺里的大众传教士谴责神话"西方",认为伊斯兰教能够令人信服地得到认同。像"西方"一样,它是一个抽象概念,偶尔的一个用于说明的缩写。很多穆斯林包括一些认为宗教铸造心灵的人,都寻求能立足于两个世界,尽管都不可避免地在西方和伊斯兰教的思想里有不同程度的犯错。每个世界都象征着一个历史中心,一种活力来源,不管如何定义,很显然在西方文明里这些比任何伊斯兰教读物都更为真切。

在很多阿拉伯国家令人担忧的伊斯兰教政治暴力,它通常是作为专制的权威主义一面和激进波浪另一面之间一个简单极化的结果。20 世纪 80 年代,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国内秩序因此受到困扰。由于人口问题,形势变得更加危险,更具有爆炸性。在大多数伊斯兰社会制度中,其人口的平均年龄据说在 15 到 18 岁之间,而且仍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增长。他们有着太多年轻的精力,对于前景有着太多的挫折感,以至于不能承诺和平。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伊朗革命后不久,德黑兰的学生就通过猛攻美国大使馆,抓住外交官和其他人作为人质来发泄他们的愤怒。一个备感震惊的世界突然发现,伊朗政府支持他们,代为看管人质,并赞成学生遣返国王接受裁决的要求。卡特总统可能面临着一个更加尴尬的形势,因为那时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首要政策是忙于干预苏联入侵阿富汗。切断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和强迫其接受经济处罚

1125

是第一个回应。然后是一次失败得一塌糊涂的营救行动。最终不满的人质通过谈判(实际上是一个赎回：归还在革命时期被冻结的伊朗在美国的资产)获救,但是美国人受辱并不是此次事件中惟一或者甚至最重要的意义。

除了广泛的政治反响外,人质被扣在另一个方面也具有象征意义。这对一项公约造成了冲击(在联合国记录着全票通过谴责)。该公约首先在欧洲逐渐形成,然后历经 3 个多世纪的发展遍及整个文明世界,即外交使节应享有豁免权。伊朗政府的行动宣告它不再遵守这一已被接受的原则。这是对"文明"设想的一次公然拒绝,它迫使一些西方人士想知道,伊斯兰革命还会暗示些什么。

四、一个时代的终结

挫折

1126　20世纪80年代带来了惊人的变化,但中东地区很少;而当这十年开始时,那里却似乎大都很相似。一个普遍的停滞似乎已经笼罩这个地区。1980年那里已经高度紧张,并已经存在了多年;而利益相关各方就以色列作为巴勒斯坦地区奥斯曼帝国继承者出现所带来的问题能够解决的希望也已绵延多年。除了对少数以色列人而言,其他各方的这些希望都沉重地归于破灭。一段时期内,看起来好像伊朗革命会改变迄今为止所运行的游戏规则,事实上一些人也希望如此。然而十年后,实际上在伊朗之外改变了什么,或者在伊斯兰世界所驱使的一切骚动的真实重要性究竟如何,仍然很难评说。在一段时期里看起来像伊斯兰教复兴的那些迹象,也可能仅仅是清教主义贯穿几个世纪不时激励和再生忠诚的周期性浪潮之一。很明显,紧张也归功于环境;以色列占领其第三重要的圣地耶路撒冷,突然提高了伊斯兰世界的团结意识。然而1980年伊拉克对伊朗的进攻导致了一场持续达8年的血战,100万人丧生。无论还有什么别的隐藏因素,在那场冲突中起关键作用的是伊拉克的逊尼派、伊朗的什叶派。又一次,伊斯兰教世界的人们同时被古代的界限和当代的政治主题所分割。

不久伊朗也表现出，虽然它可能激怒和警告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因为它有数百万穆斯林大众），但不可能阻碍它们。在1979年末，伊朗的统治者不得不无助地注视着一支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去，那里支持一个傀儡共产主义政权反对穆斯林叛逆者。伊朗支持恐怖分子和绑架者的一个原因是，那是它尽最大努力能做到的。此外，尽管伊朗成功地扣押了美国人质，却不可能得到前国王回去接受伊斯兰教法律制裁的成果。通过在人质事件中捏住鹰的尾部羽毛，伊朗使美国蒙羞，但这似乎很快就不再像发生的那时候那么重要了。回顾过去，卡特总统在1980年宣布美国把波斯湾视作至关重要的利益区域，显示了未来更加重要。这是美国人缺乏把握和感到挫败等夸大情绪走向终结的一个早期信号。一个主要的国际政治现实是打算重新主张自己。尽管自古巴危机以来发生了各种剧变，但美利坚合众国在1980年仍然是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这会赋予其毫无质疑的地位。就像（用苏联官方的定义）是"最伟大的世界力量，没有谁的参与，就没有一个国际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参与可能是潜在而不明确的，但是它是这个世界运转的一个主要因素。

1127

此外，历史不会长期偏向谁。虽然一些美国人在古巴导弹危机后由于苏联的力量而害怕，但有大量的信号显示，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苏联领导人已经陷入困境。他们必须面对马克思主义自身所宣称的自明之理：意识随着物质条件进化。除了其他影响外，苏联社会虽有限但切实放松的管控产生了两个结果。其一是明显的异议，规模虽相当小，却表明了对更大的不断增长的精神自由的追求。另一个结果没那么明显，但却真实存在，即人们纷纷认为进一步的物质收获即将来临。虽然如此，苏联却继续在军备上花费巨大（20世纪80年代大约是GDP的四分之一）。因此这些似乎还不可能足够。为了更好地承担这个责任，西方的技术、管理技巧，（可能的话）资金都是苏联所需要的。接下来可能出现的所有变化都是有争议的，但是会产生变化则是确定无疑的。

然而，到1980年，两个超级大国间发展得更加强大，在大多数方面几乎不相上下。虽然苏联尽巨大的努力以带给美国更大的核威慑力



1939–1945年取得的领土
1945年后与中国和蒙古有争议的边界
1990–1991年出现的独立共和国
北
0 1 000公里
0 600英里
北冰洋
白令海
鄂霍次克海
日本海
哈巴罗夫斯克
哈巴罗夫斯克
俄罗斯联邦
蒙古
中国
哈萨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阿拉木图
比什凯克
塔什干
杜尚别
阿什哈巴德
咸海
里海
巴库
第比利斯
埃里温
格鲁吉亚
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黑海
基什尼奥夫
摩尔多瓦
乌克兰
基辅
明斯克
白俄罗斯
莫斯科
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
立陶宛
维尔纽斯
里加
塔林
波罗的海
俄罗斯联邦的部分

苏联及其继承者

量，但它在这一水平上的优势几乎只是一个名义上的问题。美国，利用他们的才能用一个引人注目的标语，简明地总结了当时的形势为“MAD”(同归于尽)。意思是说，两个国家都有能力“确保相互摧毁”。或者更加精确地说，两个潜在的参战者每个都有足够的打击力量以确保能够相互摧毁，即使一次意外的攻击使它失去了主要的武器，其所保留下来的武器也足够确保其作出回应。而这个回应是如此令人震惊，以至于能使对手的城市变成冒烟的荒地；而虽然留下的武装力量可能很小，但却仍能试图控制住惊恐的幸存者。

1129

这种离奇的可能性是一种伟大的保守力量。即使偶尔也会有疯子(让我们简而言之)掌权权利。据约翰逊博士的观察，这方面的不幸能够给铭记于心的知识带来集体威胁：一个错误的知识对谨慎的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刺激。这也许构成了新的高度合作的最重要解释，这一点已经在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和苏联之间特殊的争吵中得到验证。1972 年关于防御性导弹限制的条约是它的第一个成果；它把某些事情归功于关于双边关系的一个新认识，科学现在可能监督对这种协议的违反(不是所有的军事研究都促进紧张加剧)。紧随其后，这一年关于进一步武器限制的讨论开始；同时另一组开始讨论探究在欧洲实施一个全面的安全条约的可能性。

作为无保留承认欧洲战后边界的回报(首要的是两个德国之间)，苏联谈判代表 1975 年最终在赫尔辛基同意加强东西欧洲间的经济交流，并签署了一份人权与政治自由保证书。当然，最后一点是不可能强制执行的。然而，它比象征性的边界承认更加重要，对此苏联谈判代表赋予了更多的意义。西方在人权上的成功不仅是对共产主义欧洲和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一个巨大鼓舞，而且是对在被视作共产主义国家国际事务干预上单方面奉行惯例抑制的鼓励。最终有助于东欧发生变革的公众批评逐渐上升。其间，两个欧洲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潮流几乎立即开始增加，尽管也非常缓慢。它是迄今为止最接近于达成终止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总的和平条约时的立场，它给予了苏联领导人最渴望得到的东西：保障其在 1945 年胜利后取得的主要战利品之一——

领土分配方案的安全有效。

虽然如此,当 1980 年来临时,美国对世界事务忧心忡忡。这一年美国要进行总统大选。18 年前,古巴危机表明,美国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国家。那时它享有超级出众的军事力量,遍布世界的盟国、代理人和卫星国的支持(通常是可靠的);同时公众在尽力克服巨大的国内问题时,愿意去承受一个世界性的外交和军事努力。到 1980 年,许多美国公民觉得世界已经发生变化,而且对它并不满意。当新共和党人总统罗纳德·里根 1981 年就职时,他的支持者回顾了之前美国变得越来越无力的十年。他继承了庞大的预算赤字,对苏联力量在非洲和阿富汗看起来取得的新进展的沮丧情绪,以及相信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在核武器方面享有的优势已消失的失望氛围。

1130

中东问题

在接下来的 5 年里,里根总统将让他的批评者们大吃一惊,他将通过非凡的(即使通常是表面的)领导才能来恢复国民的士气。具有象征性的是,在他就职典礼当天,伊朗人释放了美国人质,一段伤自尊的、令人沮丧的插曲到此结束(很多美国人相信释放的时机是由新政府的拥护者监督策划的)。但这绝对不是美国在中东和海湾地区所面临的麻烦的结束。两个主要的困难并没有解决。一个是当冷战还在持续时,这个地区的国际秩序所受到的威胁;另一个则是伊拉克问题。许多人认为,伊拉克和伊朗间的战争是首要的危险。不久,一些阿拉伯国家的不稳定变得更加明显。有序的政府在黎巴嫩完全消失,它坍塌成为一个受到叙利亚和伊朗资助的枪手你争我夺的无政府区域。结果这给了巴解组织中的革命派一个比过去更加有前途的发展基地。以色列也因此在北部边境或越过北部边境采取不断升级的暴力和扩张性的军事行动。随后在 20 世纪 80 年代紧张状态升级,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比以往更加剧烈。更让美国人心生警醒的是,黎巴嫩陷入无政府状态后,随着美国海军的到达,炸弹在美国大使馆和海军兵营爆炸,总共超过 300 人死亡。

美国没有单独陷入这些持久疾病引起的麻烦当中。当苏联派出士兵进入阿富汗时(在那里他们陷入困境长达下一个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伊朗人和其他地方穆斯林的愤怒注定会影响到苏联境内的穆斯林。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信号,相信伊斯兰世界的混乱会引起两个超级大国的重视,或许会导致它们在这个地区的卫星国和盟国无法得到无条件的支持。当然这对以色列最为重要。同时,伊朗革命中更多的吓人的示威运动和华丽的修饰性语言,使一些人认为文明的冲突已经开始。伊朗激进的清教主义,虽然也在保守的阿拉伯国家和海湾地区富有石油的王国——尤其是沙特阿拉伯中引起了颤动,但在其他伊斯兰国家,实际上存在着为数众多看起来像对伊朗革命激进的反对派传递着同情信号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 1981 年暗杀了埃及总统。巴基斯坦政府继续坚持声称(和利用)其伊斯兰教正统性,默许对阿富汗的反共产主义叛乱分子提供援助(尽管在伊斯兰国家中它独树一帜,在这十年的末期出现了一位妇女总理,并且甚至于 1989 年重新加入英联邦)。

1131

当这十年继续推移,北非涌现出更多惊人的激进伊斯兰教气氛的证据。利比亚的兴奋的独裁者奇异的激情迸发和公开宣称(卡扎菲上校号召别的石油生产国停止供应美国石油,同时利比亚石油的三分之一在那里继续寻找市场。1980 年他还简短地“团结”了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者叙利亚)看起来没有阿尔及利亚那么重要。那个国家在赢得独立后开创了一个有前途的开始,但到 1980 年时其经济呈萎靡态势,维持独立运动的共识已破碎,移民到欧洲寻找工作对很多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来说似乎成为惟一可行的出路。在 1990 年阿尔及利亚的选举中,一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政党赢得了多数投票,这在任何阿拉伯国家都是第一次。而一年前苏丹的军事政变,为那里带来了一个军事好战的伊斯兰政权的统治,随之而来的则是对当地人民少之又少的国内自由的压制。

尽管如此,虽然伊斯兰激进运动颇具吸引力,但到 1990 年,有大量的迹象表明,温和派和保守的阿拉伯政治家与原教旨主义者进行了充

分的对抗,且常常是有效的。但我们仍然很难相信潜在的革命者能获得足够的力量,即使我们不考虑以下政治事实及其相关深层问题:当其如此多的潜在支持者仍在下意识地寻求实现一些从系统框架上就与伊斯兰教教义与习俗不相容的权力和现代化目标时,成功的伊斯兰革命是否可能出现。利比亚可以武装爱尔兰恐怖分子,也可以使其他非洲国家陷入不稳,但是很少取得别的成绩。由于专注于别处的环境改变,苏美之间由来已久的对抗也越来越利用不上了。原教旨主义者们所能指望的只剩下两个相当富有的伊斯兰国家——伊拉克和伊朗,但它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相互之间正忙于进行花费巨大而致命的斗争。

也有不断增加的证据显示,得到了美国的资助,同时又身为中东地区主要的麻烦制造者,伊拉克的统治者仅战略性和务实地支持一下伊斯兰教。萨达姆·侯赛因从小作为一名穆斯林长大,但领导的却是一个正式来讲基于资助、家族和士兵利己主义的世俗的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者政权。他把追求权力和技术现代化作为其道路,没有证据显示他曾关切伊拉克人民的福利。当他发起对伊朗的战争,斗争的延续和花费的证据得到了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救济——特别是海湾其他石油生产国——因为它同时压住一群危险的强盗和让他们害怕的伊朗革命。然而,使他们不太满意的是,战争转移了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注意力,毫无疑问使以色列对付巴解组织变得更加容易。

1132

海湾地区近十年的惊慌与不安,引发了对西方石油供应方面的进一步干扰。插曲性事件似乎有时会威胁到武装冲突的扩大,特别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在黎凡特的事件加剧了那里的僵局。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持续占领,在黎巴嫩发起对巴勒斯坦游击队和他们的资助人的积极行动,其政府鼓励进一步的犹太移民(特别是来自美国),都有助于支持以色列应对可能会再次面临阿拉伯联军的日子。然而,在 1987 年底,以色列占领区爆发了第一次巴勒斯坦人暴动,并发展成一个间接而持续的暴动——起义。巴解组织,虽然通过承认以色列本身的生存权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同情,但 1989 年当两伊战争最终结束时它仍

然处于一个不利的被动的地位。在接下来的那一年,阿亚图拉·霍梅尼逝世,出现了新的迹象显示,他的继任者在支持巴勒斯坦和原教旨主义者伊斯兰事业上可能会缺少胆量。

在两伊战争期间,美国偏袒伊拉克,部分是因为美国夸大了原教旨主义的威胁。然而,美国仍然发现自己最后在海湾地区面对面地与一个公认的敌人进行战争,但它是伊拉克,而不是伊朗。1990 年,在与伊朗达成满意的和平后,萨达姆·侯赛因重启了与科威特酋长国的一项旧日的领土争端。他也与它的统治者就石油定额和价格进行争吵。要相信这些冤情是真实的不太容易。无论它们对侯赛因本人象征性地意味着什么,似乎他的动机完全在于夺取科威特巨大的石油财富。1990 年夏,它的威胁升级。然后,8 月 2 日伊拉克军队侵入科威特,几个小时内就使它屈服。

1133

在联合国有一股异常显著的反对伊拉克的世界舆论动员潮流。侯赛因试图打出伊斯兰和阿拉伯两张牌,用阿拉伯对以色列的仇恨来混淆自己的野心追求。中东城市大街上支持他的示威游行证明了其价值非常低。仅有巴解组织和约旦官方表示了对他的支持。毫无疑问,使他感到震惊的是,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埃及迅速形成不像会发生的反对他的联盟,实际上成为了伙伴。几乎同样让他吃惊的是,在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都得到了苏联的默许。最令人吃惊的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达成(以压倒性多数)了一系列决议谴责伊拉克的行动,最后授权使用武力对付他以确保解放科威特。

在美国的指挥下,巨大的军事力量都聚集在沙特阿拉伯。1991 年 1 月 16 日他们投入了战斗。在一个月内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后,伊拉克作出了让步并宣布退出(盟军的伤亡较少)。然而此耻辱显然并没有威胁到侯赛因的生存。再一次,中东地区许多人期待已久的转折点并没有出现。战争使阿拉伯革命派和西方想成为和平缔造者的人顿感失望。最大的输家是巴解组织,而以色列是最大赢家;阿拉伯要想让其付出代价来取得军事成功,在短期内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当另一场奥斯曼继承战争结束后,以色列问题仍然存在。在科威特危机前,叙利亚和

伊朗已经开始显示那种信号，对他们自身而言，他们打算尝试通过谈判来达成一个解决，但这样的方案是否会出现是另一回事，即使对美国来说显然，其达成的比以往更加迫切。

也许这是一个进展——一个激进原教旨主义的泛伊斯兰运动的幽灵已经被驱散一段时间。但就实践目标来说，阿拉伯的团结又一次成为海市蜃楼。尽管出现了种种窘迫、动乱和许多穆斯林对西方的不满，但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怨气将得到协调一致的表达，而更不可能的是他们可以不利用西方提供的具有微妙腐蚀性的现代化方式。顺便说一句，海湾危机也似乎表明石油武器已失去了许多对发达世界损伤的威力；尽管有一次就足以令人恐惧，不过没有新的石油危机。在这种背景下，1991 年美国通过外交努力终于说服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又一次参加到关于中东局势的会议中去。

缓和

1134 同时，大转变在其他地方发生，而且也影响到中东的事件。虽然它们的影响只是通过塑造美国和苏联在那里的所作所为来间接施加的。1979－1980 年，美国的总统竞选活动故意利用了国民对苏联的忧虑。毫不奇怪，这重新唤起了官方一级的敌意；保守的苏联领导人再次怀疑美国政策的走向。似乎有可能将有希望的裁军步骤抛在一边——或者甚至更糟。结果，美国政府逐渐在外交事务方面表现出新的实用主义；同时，在苏联这边，内部的变化也逐渐开辟了更宽广的灵活道路。

一个里程碑是 1982 年 11 月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去世。他是赫鲁晓夫的继任者，担任苏共总书记长达 18 年。他的直接接班人(克格勃首脑)不久就死去了。这样，一位 70 多岁的老者(紧随其后，死得更快)在最年轻的政治局成员(时年 54 岁)戈尔巴乔夫接替担任总书记(1985 年)之前接替了勃列日涅夫。实际上，他的整个政治经历被称为是后斯大林时代，对他的国家、世界、历史的影响都是显著的。

推动戈尔巴乔夫继承的势力组合仍不清楚。克格勃大概不反对他的晋升，而且他最初的行为和言论是正统的(虽然他已经在前一年给英

国首相留下了一个可以共同谋事的印象)。但他很快就阐明了一种新的政治基调。"共产主义"这个词很少在他的演讲中听到,"社会主义"被重新解释为要排除平均主义(尽管他不时提醒他的同事们他是共产党员)。因缺少更好的表达词汇,许多外国人将他的目标视为自由化,这是西方对他大量使用的两个俄语词不太充分的概括尝试——公开性(glasnost)和改革(perestroika)。其过程的含义将是深刻的和戏剧性的,因为在这十年的剩余期间,戈尔巴乔夫一直在与之斗争。

当他着手进行时,实际上其间所发生的一切他不可能想象过。毫无疑问,他发现没有彻底的变革,苏联经济就不可能为苏联供给先前的军事力量,维持它对盟国的承诺,提高(不管多么缓慢和适当)国内生活标准,保证继续自主的技术进步。因此,戈尔巴乔夫似乎在设法避免共产主义的崩溃,通过他自己对列宁主义的看法来开放它;最重要的是使它成为一个更加多元的制度体系,让知识分子能参与国家政治。而这种变化的可能意义似乎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实质上它是在承认:通过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70年实验失败了,自由和物质状况的恶化已经降临,现在成本已变得过于沉重而难以负担。

1135

罗纳德·里根很快就从戈尔巴乔夫的上台中获利。在他们之间的会谈中,苏联的政策反映出了一种新的基调,裁减军备的讨论被重新修订。其他问题也达成协议(而且这在实施过程中变得更加容易。1989年苏联领导人决定从阿富汗撤军)。在美国的国内政治中,一个庞大且仍在不断增加的预算赤字和一个萎靡不振的经济,如果是在大多数总统的统治下,这必将会产生政治舆论哗然。但是在国际舞台转型带来的兴奋中,它实际上被掩盖了多年。很多美国人对苏联这个"邪恶帝国"(作为里根曾称呼的)的恐惧逐渐在减弱。

当苏联表现出不断分裂并且改革出现困难时,美国的乐观情绪和信心得到了极大的增长。同时,由美国政府主导在天空形成新的防卫措施,有望成为奇迹。尽管数以千计的科学家说这个方案不切实际,苏联政府无法面对与其竞争的成本。1986年,当美国轰炸机从英国起飞执行了对利比亚的惩罚性使命后,美国人感到振奋。利比亚不安分的

统治者一直在支持反对美国的恐怖分子(重要的是,苏联对此表示的关注比许多西方欧洲人更少)。可在说服他的很多同胞相信,更有力地捍卫美国在中美洲的利益确实对他们有利方面,里根总统并不成功。但是他仍然非常受欢迎,这一事实仅在他离职后才开始浮现:这一时期,美国一直存在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1987 年,军备控制谈判的成果聚集在中程核导弹的协议上。尽管新权力焦点的出现带来侵蚀和大量冲击,但核均势长期保持足以使超级大国首次作出让步。无论其他国家是否追求获得核武器,至少美苏逐渐认识到了核战争来临会造成的人类实质性毁灭的前景,并开始着手为此做一些事情。在 1991 年当美国和苏联同意大幅削减现存武器储备时,进一步取得了重大进展。

1136

一个毁灭性的场景

在国际关系中这种巨大的变化与其对其他国家产生的后果是分不开的。虽然它们不得不被人为地分开讲述,但是它们却是相互影响着的。在 1980 年结束时,没有理由相信东欧和苏联人民将会看到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无与伦比的变化。已经清楚的是,欧洲共产主义国家发现,要保持他们曾达到的、甚至最适度的增长率越来越困难。虽然并没有出现对 1953 年、1956 年、1958 年的裁决或者是苏联在东欧力量的任何挑战,但与非共产主义世界市场经济的比较已经对它们越来越不利。华沙条约所提供的外壳,似乎仍然能够容纳社会和政治变化长达大约 30 年(或许更多,如果从二战非自愿的大变化及其余波算起)。

乍一看,共产主义欧洲有一种显著的一致性。在每一个国家党都是至高的;野心家都围绕它来建设他们的生活,就如在前几个世纪人们集聚在法院、赞助人或者教堂周围一样。每个国家(首先是苏联本身)都有一个难以言明和无法查证的过去,这些过去无法被哀悼或谴责,谁重要谁就主宰着精神生活和政治决策——迄今为止任何存在——正在使它们变得恶化。在东欧经济领域,重工业投资和资本货物产生了一股早期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比其他国家更有活力);那时与其他社会主

义国家达成贸易协定的国际体系受控于苏联,并且通过中央计划调控方向使其僵化。这也造成了可怕的环境和公共健康问题上升,埋下了诸多国家安全问题。越来越明显且不断加剧,不断增长的生活消费品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当它们被从国际经济分工的优势条件切断时,在西欧被认为是司空见惯的日用品在东欧国家成了奢侈品。土地私有制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已经大幅减少,通常被一种混合的合作社——国家农场所取代,尽管在这幅大体一致的图画里后来也出现了不同的模式。例如,在波兰大约有五分之四的农田甚至在共产主义政府的主导下最后返还给私人开发。然而,其产量较低;大部分东欧国家能获得的农业产量仅有欧洲经济共同体产量的一半到四分之三。到20世纪80年代,东欧国家几乎全部不同程度地出现经济贫弱,仅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可能例外。即使在那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88年也只有9 300美元,相比之下,联邦德国达到了19 500美元。其他问题也上升了。基础设施投资下降,因此其世界贸易份额也在下降。在硬通货上的债务累积起来。在20世纪80年代,仅波兰一国的实际工资水平就降低了五分之一。 1137

所有的一切逐渐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主义",(1968年有官员在华沙发表了一次演讲后)宣称在东方阵营国家内部的发展会要求——像捷克斯洛伐克那年一样——直接的苏联干预来捍卫苏联及其盟国的利益,反对企图将社会主义经济转向资本主义的任何尝试。然而勃列日涅夫也对追求缓和感兴趣,他的主义反映了他对共产主义欧洲分离发展可能引发国际稳定危险的现实主义态度。这些危险可以通过更加清晰的线条来加以限制。自那时起,伴随着20世纪40年代的记忆和看似远远地落在身后的可能的破坏,西欧内部的变化伴随着稳步的增长更加繁荣,为东西间的紧张关系消除了部分根基。到1980年,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后,没有一个专制独裁政权在的里雅斯特—斯德丁一线以西幸存,民主于是到处大获全胜。30年来,产业工人反对他们的政治主人的斗争只发生在东德、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全是共产主义国家。

1970年后,更重要的是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签署后,随着东方阵营与西欧进行对照比较的意识增长,持不同政见集团开始出现;尽管压制严厉,却也加强了他们的地位。渐渐地,也有少数官员或经济专家,甚至一些政党成员,对于详细的计划经济的效率开始表露出怀疑的迹象,越来越多地开始讨论市场机制的优势。但是促成根本性改变的关键在别处。如果勃列日涅夫主义仍然盛行,且背后有苏联驻军支持的话,没有理由相信在任何华约成员国有这种可能。

表明情况不会永远如此的首个清晰信号,20世纪80年代早期出现在波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波兰民族通过追随神父而非统治者保留着集体的完整性。作为国家的化身,罗马天主教会对大多数波兰人的思想和情感有着持久的控制力,而且能为他们代言——一旦一位波兰人当上教皇,一切将更加令人信服。它曾为那些在20世纪70年代反对经济政策的工人的利益这么做,谴责他们受到的虐待。这与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一起,成为1980年波兰危机年的背景。一系列的罢工逐渐在格但斯克造船厂可歌可泣的斗争中掀起一个高潮。从他们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自发组织起来的团结工会联合会;罢工工人的经济目标开始添加了政治要求,其中包括一个自由独立的行业工会。团结工会的领导人莱赫·瓦文萨,是一位非凡卓越、经常被监禁的电气联盟的领袖,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与波兰的统治集团保持密切接触。造船厂的闸门装饰着教皇的图像,罢工工人举行了露天群众集会。

1138

随着罢工的扩散,一个受惊吓的波兰政府很快作出历史性的妥协。至关重要的是,政府承认了团结工会作为一个独立自治的行业工会。而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也认可了天主教弥撒在星期天定期广播。但是混乱没有停止,随着冬天的来临,危机的气氛变浓。威胁听说将来自波兰邻居可能的干预;40个苏联师据说已经在东德和苏联边境做好准备。然而晚上没有狗叫声;苏联军队没有移动,也没有接到勃列日涅夫要求这么做的命令,或者他的继任者在这接连动荡的岁月里没有这么做。这是莫斯科第一次出现变化的信号,是东欧接下来十年中所发生的一切的必要前提。

1981年,紧张继续上升,经济形势持续恶化,但是瓦文萨力图避免挑衅。华约部队的苏联指挥官5次来到华沙。最后,激进分子摆脱了瓦文萨政府的控制并呼吁总罢工,如果政府行使紧急权力的话。12月13日,戒严令被强加。接着是激烈的镇压和可能数百人的死亡。但波兰军队的行动也使苏联入侵不必要。团结工会转入地下,开始了长达7年的斗争。在这期间,情况变得越来越明显:军事政府既不能阻止经济持续恶化,也得不到"真正"的波兰的支持。一场道德的革命正在进行。如一位西方观察员描述的那样,波兰人开始表现出"好像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的行为。秘密组织和出版物、罢工和示威游行,以及基督教会持续地谴责政权,有时候表现出一种内战的气氛。 1139

虽然几个月后政府谨慎地放弃了戒严,但仍然继续部署各式各样公开和秘密的镇压措施。与此同时,经济进一步变弱,西方国家未提供任何帮助和一点同情。然而1985年后,莫斯科的变化开始产生影响。这一切在1989年达到高潮。对波兰来说这一年是自1945年以来最伟大一年;对其他国家也是一样,归功于波兰的示例。在政府接受的情况下,开启了其他政党和组织,包括团结工会在内都必须分享其政治的进程。作为真正波兰政治多元化的第一步,在6月举行的选举中,一些议席第一次自由竞选。团结工会在议席选举中大获全胜。很快新议会通告废除了1939年8月签署的苏德协议,谴责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开启了自1981年起政治谋杀事件的调查工作。

在1989年8月,瓦文萨宣布团结工会支持联合政府;共产党的顽固分子被戈尔巴乔夫劝告进行了这个方面的尝试(并且一些苏联的军事单位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在9月,团结工会主导了一个联盟,处于自1945年波兰政府上台之后第一个非共产主义的总理领导下。西方的经济援助很快就答应了。1989年圣诞节,波兰人民共和国已被历史所遗忘;再一次,历史性的波兰共和国已从坟墓里崛起。更重要的是,很快就证明,波兰引导了东欧走向自由。在其他共产主义的国家那里,波兰发生的重要事件很快被知悉,它们的领导人都很震惊。不同程度上,所有的东欧都面临着一个新的因素:不断增加的有关非共产主

义国家的信息。这首先是通过西方电视(在东德特别容易收到)获得的。更多的自由运动、更多地接触外国书籍和报纸,就像在波兰一样,这逐步加速了其他地方批评主义的进程。尽管这些国家采取了一些荒谬的尝试去控制信息(罗马尼亚仍要求打字机要在国家当局登记),但意识上的变动正在进行。

在莫斯科似乎也出现了同样的事情。在这些事态发展的早期阶段,戈尔巴乔夫逐渐掌权。5 年后,很明显在苏联他的政府设想也产生了革命性的制度变迁。首先政党的权力减少。然后,这些被提供的机遇为新近出现的反对力量所抓住:首先是加盟共和国开始宣称不同程度的自治。不久,事态的发展似乎表明,戈尔巴乔夫破坏了自己的权威。矛盾、也令人震惊的是,经济境况看起来越来越糟。很明显,无论缓慢或快速,向市场经济过渡,有可能在很多(也许大多数)苏联公民(其数量超过了预想)身上施加更大的困难。到 1989 年,苏联经济显然已经失去控制,变得精疲力竭。一如俄罗斯历史上的情形,从中央发起的现代化通过专制结构流向边缘。但那恰恰是不能再依赖的模式。首先是由于党的权贵(nomenklatura)的阻力和行政命令的经济;然后是因为,在这十年里中央高层权力明显快速地摇摇欲坠。

1140

1990 年,比以往任何时候,世界其他地方都可以得到关于苏联及其人民态度的真实状态的更多信息。现在不仅能知晓公众的情绪,而且"公开性"政策也带来了苏联第一份通过投票得到的民意测验。一些潦草的判断可以得出:党和党内权贵丧失名誉是意义深远的,即使截至 1990 年,其程度还不像在其他华约国家那么厉害。更令人惊讶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旧政权相比,长期被认为残酷的东正教会却似乎保留了更多的尊重和权威。

但是,很明显就像一团乌云,经济失败笼罩在任何开放的政治进程之上。苏联公民和外国观察员一样开始谈起 1989 年内战的可能性。过去的铁腕控制的融化,揭示了由经济崩溃和机会所激发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情绪的力量。在经过 70 多年打造团结一致的苏联人民的努力后,情况的发展表明,苏联仍是彼此间具有空前差异性的多个族群

的聚合体。15个加盟共和国中有几个(最重要的是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很快表达了不满,它们将逐渐走向政治变革的道路。在伊斯兰动荡的阴影下,苏联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问题在整个地区都变得更为复杂。更糟的是,一些人认为存在军事政变的危险。和那些在越南战争中失败的美国士兵一样,有些人认为,对苏联在阿富汗失败不满的指挥员很可能成为发动政变的波拿巴。

分裂的迹象成倍增加。虽然戈尔巴乔夫成功地继续掌权,且以正式的手段增强了自己名义上可拥有的权力;但此举的不利之处在于,一旦失败,他也将担负更多的责任。经过复杂的谈判后,立陶宛议会一份宣称1939年的兼并无效的声明,导致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声称自己的独立,尽管术语略有不同。戈尔巴乔夫没有寻求撤销分裂国家的事实,而是与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协定了其保证向苏联持续提供某些已经存在的实用服务。对他来说这意味着结局已开始。有一段时期他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调整来调整去,一会儿与一派结盟,后来为了保持平衡,又倒向另一派。这么做的结果是,到1990年底,各种妥协方案似乎越来越不可行。在新年初,对士兵和克格勃在维尔纽斯和里加的镇压行动的纵容,未能遏制这种潮流。届时,有9个苏联共和国也声明自己是有主权或有相当多独立性的联盟政府。它们中一些已将当地语言定为官方语言,另一些则将苏联的政务部门和经济机构转移为本地控制。俄罗斯共和国——最重要——开始着手脱离联盟单独运行自己的经济。乌克兰共和国建议成立自己的军队。3月,选举导致戈尔巴乔夫再一次回转向改革道路和为苏联国家探求新的联盟条约,从而使其能保留一些中央的作用。全世界都在关注,充满了迷茫。

1141

波兰事例在其他国家的威望不断增加,它们意识到日益分裂甚至瘫痪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会(也许不能)进行干预,以维护在华沙条约组织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官僚去控制各自的国民。这使1986年后它们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定形了。甚至在公开的政治变化之前,匈牙利人在经济自由化方面已经几乎像波兰一样迅速改变了,虽然他们对欧洲共产主义瓦解的最重要贡献在1989年8月才来临。那时来自

东德的德国人获准作为游客自由进入匈牙利，虽然谁都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向联邦德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申请作为难民避难。9 月，匈牙利的边境完全开放（捷克斯洛伐克也步其后尘）时，人流汇聚成了洪流。在三天内，有 1.2 万东德人穿过这些国家进入西德。苏联当局说这"不同寻常"。对东德来说，这是结束的开始。在东德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精心策划的大肆吹嘘庆祝 40 年"成功"的前夕，在戈尔巴乔夫（使德国共产主义分子感到绝望，他促请东德人抓住机会）访问期间，防暴警察不得不在东柏林的街道上与反政府示威者战斗。党与政府抛开了他们的领袖，但这还不够。11 月开始，许多城市爆发了反对日益明显腐败的政权的大规模游行示威。11 月 9 日，所有示威中最伟大的象征性行动来临了：柏林墙被破坏。东德政治局屈服了，随后拆除了柏林墙的其余部分。

发生在东德的事件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这表明即使在最先进的共产主义国家，公众与这一政权大规模疏远的情感也有很多年了。1989 年，这种异化达到顶峰。在东欧各地共产党政府在他们国民的眼中缺乏合法地位突然变得清晰，人们或者起来反抗他们，或者转向不支持他们，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失败。这些制度上的异化在任何地方都表现为反对党要求可以自由地参加竞选。波兰遵循了自己的部分自由选举，一些议席仍然保留给现政权的支持者，新宪法也在筹备当中。1990 年，莱赫·瓦文萨成为总统。而几个月前，匈牙利选举产生了一个议会，从中选拔出一个非共产主义政府，很快就商定苏联部队在 1991 年 5 月前撤出该国。在这些选举当中，没有一次选举能让共产党政客得票超过 16%。保加利亚的投票不那么具有决定性：在这里，此次竞选的获胜者是转向改革派和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共产党员。

在有两个国家，事件的发展不太一样。1989 年 12 月的一场起义之后，罗马尼亚经历了一场暴力革命（以前共产党独裁者被杀而告终），这预示了对于前进的道路和内部分歧存在不祥纷争的不确定性。1990 年 6 月，被一些人认为仍深受前共产党人影响的政府，开始攻击部分前支持者（如今的批评者），在矿工治安小队以生命为代价且得不到外部

赞成的援助下粉碎了学生的抗议。东德是事件发生特殊转向的另一个国家。它必然是一种特殊情况,因为政治改革的问题必然要绑定德国统一的问题。柏林墙的倒塌透露出,人们不只是没有支持共产主义的政治意愿,也没有支持东德的意愿。1990 年 3 月,在那里举行的换届选举中,基督教民主党——西部德国联邦共和国执政党主导的联盟——得到了大多数席位(48%的选票)。统一不再受到怀疑,尚有待解决的只剩下程序和时间表。

7 月,两德加入了货币、经济和社会的联盟。10 月,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前东德的版图变成了联邦共和国的省。变化是重大的,但并没有公开表示出来的即使是在莫斯科,严厉警告戈尔巴乔夫的默许是他对德国国家的第二大贡献。然而,苏联必然会因此产生警惕。新德国将会成为苏联以西欧洲最强大的力量。苏联的力量现在处于没落状态,是自 1918 年来从没有出现过的。对戈尔巴乔夫而言,得到的回报是与新的德国签署了一份条约,承诺对苏联的现代化给予经济援助。新德国通过使那些想起 1939 至 1945 年的人确信的方式,表明了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古老的复兴的帝国。德国现在已被剥夺了旧东德的土地(事实上,已经正式声明放弃),也没有像俾斯麦时期的帝国和魏玛共和国那样被普鲁士控制。更加令人确信的是(对那些感到疑虑的西欧人会更加重要),联邦共和国是一个看似确保了经济成功的联邦和宪政国家,建立了近 40 年民主的经验,并已嵌入到欧盟和北约的结构之中。它给那些处于长期怀疑中的西欧人带来利益,至少当时是这样。 1143

冷战格局的终结

1990 年底,曾经看似一个整体的东欧阵营已经发展到很多元的状态,完全不适合概化或笼统的描述。当一些前共产主义国家(波兰、捷克、匈牙利)申请加入欧共体,或准备申请加入(保加利亚)时,观察人士开始考虑到一个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广阔的潜在的欧洲统一体。那些注意到新的或者旧的民族和地区分裂态势出现的人士,作出了更加谨慎的判断。东欧国家普遍存在着经济失败的暴风雨,必然会带来动

荡。解放可能就要来临了,但对复杂性和发展水平不同的民族和社会来说,却有着不同的历史渊源。提前预言是不明智的,而且在 1991 年这种不明智变得更加清晰。在那一年,当南斯拉夫的两个加盟共和国宣布分离的决定时,对和平变革前景的乐观受到了动摇。

1918 年,“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作为塞尔维亚和黑山的继任者登上了历史舞台。伴随着王室独裁政权的建立和为了消除旧的分歧,于 1929 年更名为“南斯拉夫”。但它的大多数臣民,包括塞族人和非塞族人,都认为新王国寻求的目标实质上是“大塞尔维亚”历史旧梦的表现。当第二个国王亚历山大于 1934 年在法国被暗杀时——这是一个马其顿人在克罗地亚人的援助下实施的——行动也得到了匈牙利和意大利政府的支持。国家分歧的辛酸很快就吸引了外人涉足其事务,当地的政客也开始寻求外界的支持。1941 年,当德国部队到达时,克罗地亚随后宣布自己作为一个国家独立。

1144

除了人口和族群的多样性(1931 年南斯拉夫人口普查中区分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德国人、马札尔人、罗马尼亚人、瓦拉几族、阿尔巴尼亚人、土耳其人,以及其他斯拉夫人、犹太人、吉普赛人和意大利人),南斯拉夫也显示出在风俗、财富和经济发展上的不一致。在 1950 年,南斯拉夫一部分地区刚刚褪掉中世纪的色彩,而其他地区实现了现代化、城市化,其中包含有重要产业。总体而言,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农业经济体为主的地区变得更加贫穷。然而南斯拉夫政权在与德国战争期间转变为克罗地亚—塞族间的对抗。1941 年后,克罗地亚人、以塞族为主体的共产党人(他们自己的领袖却是克罗地亚人铁托)和塞族保皇党人之间的三边内战所导致的战时暴行和斗争,又加深了这种对抗。这场斗争始于一场对 200 万新克罗地亚(其中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塞族人发起的恐怖的种族清洗运动。1945 年,它在共产党人的胜利中结束,在联邦结构内通过铁托的独裁统治有效地遏制了民族分裂;这看起来似乎可以解决旧的波斯尼亚和马其顿问题,并很可能能够抵挡外界的领土野心。但是,45 年后,也即铁托死亡十年后,旧的问题突然显著表明其本身仍然充满生机地存

在着。

1990年,南斯拉夫联邦政府企图处理经济困境,却加快了政治分裂。当不同的民族开始想方设法填补共产主义崩溃后所留下的政治真空时,民主自决终于消除了铁托的成就。代表塞族、克族、马其顿人、斯洛文尼亚人利益以及赞成南斯拉夫理念和联邦本身的党派纷纷形成。不久,除了马其顿,所有共和党政府都依靠多数当选,个别共和国内新少数民族党派甚至已经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克罗地亚塞族人宣布自治,于是在塞尔维亚人省份科索沃出现了流血冲突,其中有五分之四的居民是阿尔巴尼亚人。在这里,一个独立共和国的宣言对塞尔维亚人是一种主要象征性的侮辱——而且与希腊和保加利亚政府关系重大,自巴尔干战争时代以来,它们的祖先就未停止拥有马其顿的野心。在8月,塞族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零星的空中和地面战斗开始了。对外界干预的先例似乎并不永远充满希望——尽管不同的欧共体国家持不同的观点——当苏联在7月对当地冲突蔓延至国际水平的危险发出警告时,它的前景变得更加没有吸引力。同年底,像克罗地亚一样,马其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斯洛文尼亚都自行宣布独立。

1145

苏联的警告是这个政权最后的外交方针。很快,它被更重大的事件所吞噬。8月19日,一场悄无声息的秘密政变企图废止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政变失败了,三天后他又重新掌权。不过,他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不断追求妥协已经毁了他的政治信誉。他对党和联盟固守得太久;苏联政治已经在蹒跚前进,在很多人眼中已经走向解体。这给苏联最大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共和国的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提供了机会,而他也抓住了机会。军队,作为惟一能对其支持者有威胁的力量,并没有反对他。现在他作为一个强力人物出现在苏联政治舞台上,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事情都不能做;并且,作为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扛鼎人物,他可能会威胁到其他共和国。当外国观察员还处于观望时,清除那些曾支持或默许政变的人的行动已发展成对联盟各级官长果断的更替洗牌;重新定位在克格勃的角色,在联盟和共和国之间重新分配对它的控制权。最显著的变化是对苏联共产党的破坏,这几乎立即开始

显现出来。几乎从暴力流血发生开始,发端于 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巨大创造即将走向终结。那似乎是首要值得高兴的好理由,虽然并不清楚接下来是坏还是好。

当这一年走向年底时,形势仍不明朗。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俄罗斯共和国放弃价格管制的决定出台,不仅导致苏联体制最早时期以来空前的通货膨胀可能出现,而且意味着几百万俄国人濒临饿死的危险。1146 在另一个共和国格鲁吉亚,第一次自由选举后,不满的反对派和当选总统的支持者之间就已经爆发战斗。然而,所有这些变化的共同事实就是,在布尔什维克革命流血经历中诞生的超级大国瓦解了。近 70 年来,几乎直到最后,它始终是世界各地革命者的希望和赢得了历史上最伟大陆地战役的军事力量的发动机。现在它突然无能为力地瓦解为一系列继任国家。当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 12 月 8 日在明斯克会晤并宣布结束苏联、建立新"独联体"时,欧洲最后的多民族大帝国消失了。1991 年 12 月 21 日,11 个前苏联共和国的代表聚集在阿拉木图短暂会晤,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同意在当年的最后一天正式解散联盟。随即,戈尔巴乔夫辞职。

这是一个现代历史上最令人吃惊和有重要变化的高潮。没有人能确知前路究竟为何,对许多前苏联公民来说,只知道这是一个危险、困难和痛苦的时期。在其他国家,政治家们在此重大事件发生期间,除了表现谨慎外,也无甚多言。因为前面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例如,对苏联先前的朋友来说,它们保持沉默。它们中甚少有哪一个对这年早期发生的事件给予更多的谴责,以至于它们对 8 月发生的未遂政变表达了赞许或鼓励。利比亚和巴解组织会这样做是因为,任何回归到像冷战之类的事情注定能激起其重新进行国际操纵可能性的希望;这种操纵曾因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缓和、然后因后者的衰落而受到压缩。

中国

苏联的事件必定会在中国引发特别的兴趣。中国的统治者有自己的理由,对有最长陆地边界的另一边共产主义垮台后出现的事件走向

表示不安。随着苏联的消失,他们仍然是惟一一个完好无缺的多民族国家的统治者。此外,自 1978 年以来,中国一直持续进行着谨慎而有控制的现代化进程。

在这方面,邓小平被认为有着主要的影响,但他坚持集体领导。机会被给予地方和集体企业,包括利润动机。与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商业联系开始受到鼓励。虽然适当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语言对新进程被做界定,结果似乎是一场实质性的经济自由化(至少在传统的中共党员眼中),同时实际上也没有显示出现政权的权力弱化。中国领导人仍牢牢地控制着,并倾向于这样做。他们受益于对中国社会传统规则的坚持,受益于为"文化大革命"所抛弃并被数百万人所体验到的那种释放,受益于对毛泽东理论的狂热崇拜(虽然它可能会受到限制),进而受益于经济收益应经由这一体系流向农民的政策(相反,直到 1980 年这个政策在莫斯科仍作为马克思主义进行详细阐述)。这提高了农村的购买力,使农村走向富足。动力的主要源泉是脱离农村公社;在很多地方几乎都不再与其有关。到 1985 年时,家庭农业作为大部分中国农村生产的主要形式回归。

1147

尽管批评家抱怨中国正在恢复"资本主义道路",通过讨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对待局部利益与区域差异的审慎的实用主义,敏感的顾忌得以减轻。乡村工业和商业企业从大跃进时代的"公社"和"生产队"中脱胎而出。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农村收入的一半来自工业就业。

在某些地区,与资本主义世界开展自由贸易的飞地——经济特区建立起来;第一个特区设在广东——历史上中国与西方保持接触联系的一贯地点。到 1986 年,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第四大钢铁生产国。有调查称,在 1978－1986 年间中国 GDP 每年以高于 10％的速度增长,工业产量在那段时期翻了一番,农民人均收入几乎增长至原来的 3 倍(到 1988 年,据说平均每个农民家庭有 6 个月的收入储蓄在银行里)。在一个更长的远景里,在 1950 年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人均对外贸易价值大约增加到最初的 25 倍。这个政权的成功在精神

上受到了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协议的支撑。

然而,新政策不是没有代价的。不断增长的城市市场激励了农民并给他们以利润回报,但城市居民开始受到物价上涨的影响。随着这十年的推进,国内的困难在不断增加。外债猛升;在这十年中通胀以年均约30%的速度发展。对贪污现象的愤怒以及领导层的削弱(在控制党内事务的老人中一些人相继逝世或患病)普遍存在。一些人认为有必要重申政治控制的主张开始抬头,并有迹象表明,他们正在策划说服邓小平。然而大概受到了经济自由化政策的引导,西方观察家和一些中国人对于政治松弛的可能性抱有不切实际和乐观的看法。东欧令人振奋的变化则进一步刺激了这种愿望。但这种幻想突然崩溃了。

1148

虽然政党和统治集团有点混乱,但加强政治有力的尝试随即进行。新马克思主义口号再次被提出。党内纪律得到强化。经济自由化一段时间内受到遏制。中国很快就清楚它不可能走东欧国家或苏联的道路。但向哪里去呢?也许这一阶段得出的最安全结论是,它将再一次探索自己的规律,利用一切特殊力量美化修饰所有的制度,像抗议者一样。在天安门广场遇见坦克的青少年,不仅建起雕像作为他们的自由象征,而且还通过唱"国际歌"表明他们将这一切都归功于非中国化的西方的灵感。这表明了反对运动的复杂性(甚至不一致)及其对许多在中国仍有的影响力的异化。即使最近的1987年,一项民意调查报告表明,即使在中国城区,最强烈谴责的道德缺陷是"子女的不听话"。世界大部分地区已经发生改变,而天安门广场事件后的中国,由于其对境外的潮流看似强大的免疫力,仍使观察家和未来学家们感到困惑。中国政府的传统角色之一一直是其价值观的捍卫者。如果世界上有任何地方最终可能会证明其现代化不意味着"西化",那它可能就是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并不容易消除。

五、开始与终结

民族和种族

在苏联解体之前很久,很明显,在欧洲所发生的一切,世界很少能完全不受影响。冷战结束再度凸显了贯穿欧洲大陆的老问题——认同,而新问题也在出现。在对某些人而言是一个寒冬的黎明所带来的微光中,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和别人。有些噩梦已被风吹走,但新浮现的也不过是令人不安的风景。一些重要的问题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包括认同、种族和宗教等方面;有些问题实在令人困扰。新的塑形时期在世界历史上又一次出现了。 1150

近乎偶然,不仅欧洲安全问题的一半随着华沙条约组织消失,而且另一半的北约也被巧妙地更改。主要的潜在对手苏联的崩溃,不仅剥夺了联盟的主要角色,而且也消除了已经形成的压力。像温暖的房间里的一个牛奶冻,它开始有点消融。即使有些人已经认为,一个复活的俄罗斯在将来某个日期将作为一个新威胁出现,但意识形态斗争的消失将意味着潜在对手需要以新的方式来考虑这件事。很快就有前共产主义国家谋求加入北约。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在 1999 年加入,而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国家在随后的 5 年中加入。与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 1990 年给予

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承诺完全相反,北约不仅扩张到了苏联的边境地区,而且还越过了边境。联盟成为一个联系美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除去俄罗斯)的工具。但即使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开始关注北约,将其作为处理新欧洲问题的一个工具,特别是在前南斯拉夫;进而在欧洲地区之外加以运用。在军事力量上的目的并不明朗。

1151 冷战结束后,在东欧和东南欧,人民的命运似乎是 20 世纪第一次显然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像旧王朝帝国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和意大利独裁者的即兴之作一样,现在这个地区共产党搭建的框架已经倒塌。随着许多埋葬的历史重现,还有更多的被记起或捏造出来,而出现的一切往往有点令人沮丧。斯洛伐克人对归入捷克斯洛伐克感到焦躁不安,但是斯洛伐克自身在人口构成上也像罗马尼亚一样有大量的匈牙利人。对于处于其北部和东部边境以外的马札尔人所受的待遇,匈牙利人现在可以更公然地表达他们的怒气。最重要的是,前南斯拉夫老问题迅速升级为新的暴力事件和危机。1991 年,当前南斯拉夫联邦国家全部宣布独立时,战争在本地塞族人与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新政府之间打响。塞族少数派得到了贝尔格莱德政府(在激进分子塞族民族主义者米洛舍维奇的领导下)的支持,还得到了南斯拉夫联邦军队残余分子的援助。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内战导致了自二战结束以来对欧洲公民最残酷的暴行。由于——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穆斯林三个主要的族群都尽可能控制更多的版图,当他们进占时通常将别的人口群体驱赶出境。在斯雷布雷尼察,塞族军队 1995 年屠杀了数千名波斯尼亚公民,并且塞族人从 1992 — 1995 年包围了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欧盟和美国不情愿进行干预;对塞族人来说,只有军事上的失利才导致了 1995 年 12 月在俄亥俄州的代顿达成协议。从原来不同种族群体组成的和平大聚落中,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引起了“种族清洗”——借助人民的力量来驱逐被定义的敌人。克罗地亚利用塞族军事衰落的机会收回了克拉伊伊那整个地区,将那里大部分塞族多数派人口驱逐出境。在米洛舍维奇的所谓塞族“自卫”战中灾难一个接着一

个发生了,他最后在 2000 年被推翻;他在阿尔巴尼亚人占主导地位的科索沃地区实施高压政策之后,导致了北约干预打击他的军队。而出于对波斯尼亚人暴行的反复担忧,西方联盟最后就干预达成协议。

1989 至 1991 年之间,数百万计的东欧人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和困难。协议缺乏合法性原则和理念。对于拥有现代化精英的地区,他们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旧的共产党员结构。其中,有效与否,通常要在旧的共产党层次结构中找到。不可避免地,一些国家专业人员、管理人员和在共产主义机构内取得其职业生涯的专家继续主宰着国家,仅仅是因为当时没有人可以替换他们。另一个问题是,随着政治革命的即时幸福感的消退,当时参与自由投票选举的人口变化无常。对明显安全的时光充满了怀旧。当人们为这个国家的合法性到处寻找新的基础时,惟一可行的候选人往往似乎就是民族主义;这曾经常困扰过去的政治,有时长达几个世纪。过去的部落制度很快就重新露面,虚构的历史很快就成为比过去实际发生的事件更重要的事件。

1152

悲剧地是,一些古代的对抗性事件随着第二次大战而结束。在最可怕、最伟大的事例中,大屠杀——就如人们号召“纳粹”清除犹太人的尝试,结束了东欧作为世界犹太人中心的历史。1901 年约有世界四分之三的犹太人生活在这里,大都住在俄罗斯帝国。而现在在那些曾经讲意第绪语的地区,仅有略高于 10%的犹太人居住。近一半的世界犹太人现在都在讲英语的国家中找到,其中另有 30%在以色列。在东欧,共产党急于利用传统流行的反犹太主义(尤其是苏联),通过骚扰和司法迫害来鼓励移民。作为一个重要的人口因素,在这里少数几个国家几乎消除了 1945 年的犹太人口所留下的一切。1945 年幸存的 20 万波兰犹太人很快发现,自己再次沦为传统暴虐和骚扰的受害者;到 1990 年,没有移民者的数量仅为 6 000,过去东部欧洲犹太人的中心消失了。

在一些西欧国家,少数民族也显示出新的抵制。巴斯克分离主义分子在恐吓西班牙。在比利时,瓦龙人和弗莱明人相互谴责。北爱尔兰也许是最引人注目的实例,在那里,贯穿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工会主

义和民族主义情绪持续阻塞着解决之路。1985 年的英爱协定承认爱尔兰共和国在讨论解决乌尔斯特的未来中的权利和作用,并成立了新的机构为它服务。但不超过 18 个月后,停火协议悲剧性地结束。但工党政府于 1997 年控制威斯敏斯特时,它表明了愿意采取重要的象征性步骤——直接公开与爱尔兰的新芬党谈判,掩盖了爱尔兰共和军恐怖分子的政治运动。在这年年底前,新芬党代表在伦敦受到英国首相的接见。1998 年,与爱尔兰政府合作,英国倡议成功,排除阻力,在全爱尔兰全民公决的建议上赢得了新芬党和北爱尔兰统一党官方领导人的默许,比以往在保卫北部民族主义少数派和北方与英国的历史纽带制度化的做法更进一步。当然,这暗示着在未来官方主权的内涵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顺便说一句,比英国政府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同时引进的权力下放措施更加进步得多)。虽然细节上仍可能有潜在的巨大分歧,但对双方边境新安排的原则得到公众的赞同。与此同时,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第一次将所有代表党派合成一个北爱尔兰行政部门的努力失败——因此必须重回到伦敦的直接控制——直到 1998 年这个省都被占据主导地位的恐怖主义分子的暴行所分隔。

1153

欧洲联盟越来越紧密?

从 1986 年起,与发行国家的名称一样,向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公民发出的护照印上了“欧洲共同体”一词。然而,在实践中,共同体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虽然主要的中央机构成员国部长理事会、委员会和法院开始运转,但并非毫无阻碍;其政策,特别是渔业和运输方面,激起了广泛宣传的差异。特别是在 1971 年美元结束可兑换黄金的历史、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和石油危机后,汇率的波动率成为尴尬和惯常争吵的另一个根源。然而,20 世纪 80 年代有鼓励经济成功的确凿证据。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作为外来投资的主要接受国恢复到 1914 年前的水平,它吸引投资的三分之二是欧洲的。西欧占了世界贸易的最大份额。外界变得热衷于加入一个向穷的成员国提供有吸引力贿赂的组织。1981 年希腊加入该组织,而西班牙和葡萄牙于 1986 年加入。

后者被认为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年份；当时欧共体同意在1992年采取超越单纯的关税同盟的进一步措施，进而形成一个单一、综合、无国界的内部市场。在艰难的磋商后，1991年12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就欧洲单一市场作出了适当安排并提出完全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完成时间表不得迟于1999年生效。资本、货物、服务和人员最终可以无障碍或妨碍地自由跨越国界。又一次，谨慎的英国提出了保留和特别的安排。作为首相撒切尔夫人的继任者，约翰·梅杰是一个未知数，但他几乎马上发现自己在马斯特里赫特谈判首脑峰会上，在对于统一市场的划分中维护了英国最后达成的立场。该条约打开了单一货币的道路，并设立自治的中央银行进行管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也给了所有成员国的国民以新"欧洲联盟"公民的身份，以取代欧洲共同体；并规定其有义务在劳动实践和一些社会福利上对其成员施加某些共同的标准。最后，该条约扩展了欧盟可能通过多数票赞成的方式作出决策的领域。这看起来像一个权力集中的重大发展。虽然为了尽力安抚质疑，条约也针对主从性原则(subsidiarity)——一个根植于天主教社会教义的词汇，达成了共识；它表明，在干预国家行政管理的细节上应限制在布鲁塞尔的委员会的管辖权。关于欧洲防务和安全政策的协议，由于波斯尼亚事件，很快就陷入无望的混乱。

1154

在一些国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实施遇到了困难。第二年，丹麦人在全民公决中否决了它。在法国的类似测试仅产生了微弱的多数赞成票。英国政府(尽管它谈判达成了特殊的安全保护)历经重重困难，在议会上在这一问题的投票中胜出，但当它下一步面对选民时，执政的保守党内部出现的分裂将使这个政党瘫痪。欧洲的选民仍通常考虑保护或破坏性的传统区域和国家利益；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条件出现恶化的时候，这些更加隐约可见。但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最终被15个会员国批准。对各会员国独立受到布鲁塞尔委员会侵蚀指称的争论，以及个别国家较公平或不公平地使用或滥用联盟规则的争论，一直都有发生。

然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进程由于很多成员国的需要部分被

创设出来——特别是法国——因为强大统一的新德国融入欧洲是一个更深一步的联合,它很快产生更广泛的意义。随着共产主义在东欧的消失,需要一个真正的欧洲联盟脱颖而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之后称为共同体。它是欧洲联合半个世纪以来所创建制度力量的证据。欧盟设法引入一种共同的货币(欧元,从 2002 年开始)。在欧盟中央银行之外,将在刑事司法、外交政策和军事事务方面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其间,中欧和东欧快速向成员国资格靠拢。1995 年冷战中立国奥地利、芬兰和瑞典加入。然而东扩一个大的步骤出现在 2004 年,伴随着四个国家的加入,分别是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匈牙利。而最惊讶的是前波罗的海苏维埃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加入。尽管不断否决其宪法、预算和进一步扩张的计划,拥有 4.6 亿人口的欧盟,向着成为一个其创建者所设想的全欧联盟迈出了巨大的步伐。

1155

经济环境也已经改变了。最重要的是,共同农业政策(CAP)没有了 20 世纪 60 年代的含义。在一些国家,它正经历从向大量小农选举贿赂向人数较少但更富有的农学家们的福利制度的演变。在新联盟的内部,国家的反应与它们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更晚时期的含义不同。德国现在是联盟的驱动力量和联盟大部分财政的支持者。总理赫尔穆特·科尔最伟大的成就是实现祖国统一,巩固了德国作为欧洲大国的地位。但这是非常昂贵的。德国在贸易项目上陷入赤字,对统一条款的不满开始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人旧的噩梦——通胀的危险也更多被传出。当前东德人迁移到西德时,德国纳税承担的负担和失业上升。经济衰退,事实上,在 20 世纪 90 年代欧盟大多数成员国中都蒙上了持久的阴影,让人想起它们之间人民的差距及其经济实力的差异。20 世纪 90 年代到处出现的财政、预算和交换问题逐渐削弱了政府的信心。

因此,有许多政治家们开始考察评估。世界各地的观念正在发生改变。对法国来说,例如,欧洲冲击最深的根源总是在于对德国的恐惧。法国政治家曾设法让德国首先实现共同市场,然后与共同体牢牢地系在一起;但随着德国经济不断增长壮大,他们被迫承认它在绘制欧

洲未来的版图上享有优势。在法国人心中,戴高乐的欧洲国家理想已经让位于一个多国联邦。也就是说,矛盾的是,更加集中——一个被有意识建构起来的欧洲观给了法国的非正式和文化重量最多——获得通过,例如,在布鲁塞尔的职位。如果有一个欧洲的超级政府,法国至少可以尝试主宰它。不过,1995 年法国重新加入北约的决定与戴高乐路线是一个明显的决裂。

1990 年之后,德国政府很快就设法通过与前共产主义邻国的邦交来寻求施加其新的影响。德国商人和投资在这些国家获得工程项目的迅捷,德国在 1991 年年底承认新独立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速度和渴望(它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一点也不让其他欧盟成员安心。欧盟如何扩张,对世界历史来说注定是决定性的。一个拥有近 7 亿人口的民主多元的欧盟,从北极圈延伸到爱琴海,从葡萄牙到普鲁特河,将会成为一个可想象的结果。但另一个结果是现存联盟的崩裂(不一定为其国家的组件)。最后,出现的问题是,是否尝试联合俄罗斯。尽管它非常庞大且有专制传统,但不可辩驳的是,它是一个有很多资源——人口和原料——的欧洲国家,而这是欧盟持续满足其公民福利需求的资源。

1156

在 30 多年的时间里,在欧盟内部和共同市场内,理所当然地产生了文化融合。不过,消费日益规范化与其归功于欧洲的政策,不如归功于在大众层面上更精明的市场推广和日益增长的国际交流(结果通常情况下,像在过去一样,被谴责为"美国化")。这种缓慢的交汇有时被自觉地推进,例如,农业已经非常昂贵,钢铁农业政策必然地激怒非农选民。联盟在处理对外事务上看起来也似乎虚弱无力;它在南斯拉夫问题解体上展现出来的几次检验都公然失败。因此,在 20 世纪即将结束之际,许多不确定因素仍然笼罩着欧洲的未来。单一的欧洲货币项目就是其中之一。虽然围绕货币而产生的论点总是带有压倒性的政治色彩,它断言巨大的经济效益来自它的引进,较低的价格和较低的利率也会有可能随之而来。它指出,随着平等的承诺,参与国可能会失去对其经济生活重要方面的控制。事实上,一种共同的货币,暗示着主权进

一步的丧失。

政客冥思苦想的是，当必须作出的选择会带给他们一个货币联盟的后果时，选民会怎么想。虽然不难想见，一旦货币联盟失败或扩张不成功，欧盟还可以退回到仅仅安心于一个简单的关税联盟。

赫尔穆特·科尔在1998年11月德国的选举中被击败，德国统一后第一个社民党总理格哈特·施罗德上任。但这对德国政府的货币联盟目标没有任何影响。法国政府也紧随其后。丹麦和瑞典坚定地宣布不想参与。在英国，托尼·布莱尔的新工党政府1997年以绝对优势当选，其间他们对进一步的联合持谨慎地肯定，拒绝加入“直到时机成熟”时为止，而在他们执政的第一个十年，成熟的时机并没有出现。但在2002年1月1日，大多数成员国引入了自查理曼时期以来第一种共享的货币。为了刻意回避冒犯国家情感，采取伟大历史名称如克朗、弗罗林、法郎、马克、泰勒等的可能性被搁置在一边，新的货币单位被称为“欧元”。到21世纪头十年的中期，其纸币及硬币在12个会员国3亿公民中成为惟一合法货币；它甚至也被欧盟以外的国家和领土诸如黑山和科索沃采用。

1157

扩大联盟的困难在当时变得更加清楚。最长时间坚持加入的候选者是土耳其。一些成员国质疑它是否完全是一个“欧洲”国家，因为其领土的大部分处于亚洲，大部分人口是穆斯林。更糟的是，在长达60年的高举高扬之后，阿塔图尔克的现代化遗产面临挑战。伊斯兰教徒总是不满政权的传统世俗主义。然而，如果所谓欧洲性的测试标准在于机制的现代化(例如代议制政府和妇女的权力)和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那么很显然地，土耳其将与欧洲人站在一起，而不是与余下的伊斯兰近东地区。可是，土耳其对政治反对派和少数民族(尤其是库尔德人)的处理仍然遭到很多国外的反对；作为人权卫士，土耳其政府的记录受到质疑。因此就有关什么是真的欧洲，土耳其又一次造成了一个旧的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值得一提的是，对安卡拉来说，土耳其的旧敌希腊已经成为其成为成员国的关键支持者之一，从经济和政治路线两方面为其游说；尽管两国在塞浦路斯(现在独立成为欧盟的一个成员)

的争端尚未解决。

2000 年末,在尼斯的谈判,为就进一步扩大的原则达成一致时,它也同意了改变投票资格。法国像德国一样,成功地掌握了相同"份量"的投票权,而德国现在无可争议地成为规模最大、最富有的成员国家。《尼斯条约》的批准仍然不得不获得各国议会的许可。当然,爱尔兰政府很快就不得不面对其提案的全民投票的失控问题;这引发了对于这个制度体系的另一场危机。2001 年底达成协议,应订立一个特别的公约考虑欧盟机构的运转,及其可能出现的变化,但这仅稍微抵消了之前的冲击。2005 年法国和荷兰的公民投票拒绝了那个公约(稍微有些过度地称为"欧洲宪法")的产生,这个进一步深化联合进程的方案似乎再一次深陷困境。虽然,该宪法到处遭否决再次表明,欧洲联盟仍然只是政治精英的事业,仅得到他们的力挺,宪法的大部分内容还是(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渗入到欧盟的条例和规章中,即使一个被提议的宪法修正版没有在那些拒绝它的国家实现重新公投。 1158

在一定程度上,冷战的结束似乎终于揭示出,欧洲不仅仅只是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表现的那样,是一种单纯的地理表达概念。不过,同样的,在寻求一种先天的欧洲本质或精神上,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缺少方向;更遑论一种欧洲文明,尽管它曾是世界文明的主要来源。它如以往一样,是一个对它自己内部的动态产生强大共鸣的民族文化的集合。因为在 21 世纪开始时,鲜有迹象表明存在一种爱欧洲主义,能像旧时代的国家忠诚思想一样煽动群众的情绪;尽管自《罗马条约》以来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功。欧洲议会选举投票的参与到处都在下降,除了在投票是强制性的国家之外。语言沙文主义成为联盟机构内部一种新的不易操作的威胁——其巨大、无序的复杂性已经阻碍了那些在其中寻求政治逻辑的国家,这无疑有助于公众更加意识到谈论"欧洲"这个概念很无聊。但也经取得了很多成就。最重要的是,欧盟是各宪政民主政体组成的共同体,是在欧洲同化上不基于单一国家霸权的一次成功的尝试。当 20 世纪结束时,欧盟,即使处于不断上升的经济风暴中,从长远来说显然在经济上是成功的。包括瑞士(当然,不是欧盟成

员)，西欧国家已占世界贸易(多数是其自己的成员国之间)的约 75%和世界 GDP 的 40%。其自身的本地生产总值在那一年大于美国，是日本的两倍多。欧洲是过去 50 年间出现的世界经济三个主要推动者之一。尽管欧洲人似乎仍然对自己走向哪里感到担心，他们却显然是一个许多旁观者希望加入的团队。

中国和东亚

1159 1989 年给中国未来的走向留下了很多疑问。占据统治地位的共产党不仅面临来自下层的巨大挑战——它可能唯有通过利用武力来克服——经济似乎也徘徊不前，在很多领域的增长被拉平。邓小平，十年前设计经济改革的人，85 岁高龄，于 1989 年危机扩大时重返政治决策中心，现在开始着手他最后的活动。1992 年巡视南方各省，邓谴责了那些把政治削弱等同于经济削弱的人。改革必须加强，邓说，应当给予私有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到那时，1989 年的停滞已经成为过去；从 1992 年开始中国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GDP 年均增长速度连续 14 年超过 10%。

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全球最重要的事件。它不仅创造了一个多达 200 万的中产阶层，其购买力达到了欧盟的平均水平，也使中国成为全球第四大国家经济体。这种增长的大部分是在私有领域；但是，大量的重建后，到 2000 年初，国有或集体所有板块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中国经济模式中，似乎国家甚至是共产党在结合资本主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将对来自农村大量进入工厂的男女青年劳动力的开发利用与强调对所有公司的政治控制结合起来，包括那些由中国人或外国人拥有的私人企业。同时逐步向北和西部扩张推广。增长仍然主要集中在南方和东部地区，沿着海岸线和大河两岸，重复着自最早时期以来那种显而易见的模式。然而，中国共产党似乎已经找到了一种可行的发展模式(至少在好的时期)，当形势变坏时它很少求助于合法施政。

冷战结束也改变了中国的对外关系。与前苏联共有的 4 000 多英

里边界，现在被新独立的、更弱小的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替换掉了一半左右的界线。与此同时，在 20 世纪 90 年代晚期，关注台湾——长期与中国内部政策和对外关系在捆绑一起的问题——民族主义政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近 50 年貌似根本性的原始冲突，像以前一样清楚地富有活力。事实上，台湾国民党政府与美国外交关系正式结束及其从联合国被逐出后，问题已经稍微变得模糊。然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当北京依旧坚持台湾(如香港和澳门)与大陆统一的政策为一项长期目标时，岛上便开始出现更多所称的独立情绪。北京显然感到不安；在 1995 年李登辉访问美国期间，警告达到了顶峰。中华人民共和国撤回驻华盛顿大使，官方报纸宣称台湾问题为“爆炸的火药桶”。很明显，如果台湾正式宣布自己独立，大陆进攻台湾岛将可能随之而来。 1160

此外，台湾仅是导致东亚不确定性和情绪紧张的根源之一。冷战结束后，不断增加的不稳定和波动性在这个地区尤为明显，即使这些趋势没有达到当时欧洲相同的水平。在第一时间内界定相对明确和越来越清楚的斗争的真正意义，是难以判断出来的。例如，在朝鲜半岛，改变很少；由于其统治者决定孤立地维持计划经济模式，朝鲜顽固地与美国和韩国进行对抗。由于经济管理不善，1991 年前苏联的援助终止，以及在独裁者的统治下部分直接的王朝式的集权，1998 年初朝鲜走到了饥荒的边缘。朝鲜的问题仍然不同寻常地独特，多少有些游离于地区趋势之外，而韩国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韩国都是一个保持数字高增长、稳定的民主政权，在国际贸易领域更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参与者。

然而，所有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中国除外)在 1997 至 1998 年陷入了一场严重但(对大多数国家来说)短暂的金融危机，日本则进入冷战结束后持续十多年的经济不景气。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经济经常被称赞为生产效率领域的世界引领者；到 20 世纪末，其状态却虚弱不少。房产投机，在非生产性活动或产生回报很小的部门的巨额投资，因不能使用的债务，妨害了银行和金融机构。货币大幅下挫；相关投机 1161

行为迅速打击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快捷的金融交易领域。日本盛行的企业文化牢牢地嵌入官方和金融网络,而这些网络现已证明不能被授予绝对领导权力;当条件恶化时,这一切将导致难以取得解决办法。日本经济在国际术语中意味着落后者,并伴随着通货紧缩和失业的后果。频繁更迭的政府似乎无力阻止这一进程,一些政府人员开始迎合民族主义者的观点以强化其权威。日本的不景气意味着它不能被指望在 20 世纪 90 年代晚期帮助其他经济克服经济困难。尽管作为一个整体这个地区在 2000 年早期再一次开始增长,一些国家,像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并没有继续保持早期的增长率。在这一过程中,从北海道到巴厘岛,数以百万计的人失去了他们的积蓄和营生。

在东南亚伴随着危机的政治更替也意味深长。一些国家的专制政府利用公共资源来维持在权力和他们的家庭上保持密切关系的人的利益。1998 年 5 月,印度尼西亚经济自年初以来萎缩了大约 8%多一点,货币对美元的汇率降了五分之四后,暴乱将总统赶下台。一个长达 32 年的控制紧密、腐败、但形式上“民主”的制度走向了终结。继任政府使印度尼西亚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但缺少重建经济的运气。结果是,种族和宗教冲突增加了,印度尼西亚被分隔为庞大的伊斯兰多数派、有重要地位的印度教徒、基督教徒,以及华人社区。东南亚地区的第二人口大国越南,则以相反的方向运行,进一步集中它的政策同时强化中国模式的经济改革。这在越南被称为革新开放(doi moi)。到 2000 年早期,越南经济增速为世界第二,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是非常贫困。总之,东亚经济在 21 世纪头十年表现出的极端高低起伏表明,世界经济已经融合到了何种程度。北京或雅加达的经济转型可能会对世界有直接的影响,而反过来也是一样。

印度次大陆

1162

印度,像中国一样,没有立即遭遇许多东亚国家那样的金融和经济混乱。在这方面,无可否认,过去的政策有利于印度。国大党政府,虽然有些逐渐远离了独立早期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其长期受到贸易保护

论者、计划管理、国家自给自足，甚至是经济主权独立思想的强烈影响。其因此付出的代价是低增长率和社会的保守，但与此同时则让其受国际资本流动影响的程度比其他国家更低。

1996 年，印度教的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 BJP)挫败了国大党，成为议会下院最大的单一政党。不过，它并不能够维持自己的政府，组建的联合政府在 1998 年另一场大选(非常暴力)中没有幸存。这场失败也并非决定性的，因为议会中的多数派没有明确出现，人民党及其盟友组成了议会中最大的单一组织。另一个联合政府很快出现，其来自人民党的支持者很快就发布了一份不祥的民族主义议程表，宣称"印度应由印度人来建设"。一些人发现这种趋势出现在这个国家令人震惊，因为虽然民族主义已受到国大党长达一个世纪左右的鼓励，但其通常被对次大陆实际的分裂生殖和潜在的暴力的谨慎识别所抵消。不过，最终，新政府通过避免国内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过激行为和加快经济自由化使很多人感到惊讶，并导致部分地区的经济持续增长。这种增长在新国大党主导的政府(2004 年奇迹般地当选)领导下继续——印度实行民主体制的另一个示例。新总理曼莫汉・辛格，一位锡克教出身的经济学家，努力加快印度经济开放，使其在国际上更具竞争力。到 21 世纪前 10 年的中期，印度似乎出现了经济快速扩张的势头。

尽管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似乎与赢得国内赞誉的定位保持一致，但要以与巴基斯坦旧日宿怨的持续发展为背景，世界才能努力理解人民党政府在 1998 年 5 月和 6 月继续进行一系列核试爆的决定。他们激起巴基斯坦政府效仿进行自己类似的核试验。两国政府现在被公认为具有可装备核武器国家俱乐部的成员。但这个事实更大的背景，(印度总理指出)印度担心的是，中国已经成型的核力量，以及巴基斯坦政府对其他国家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鼓动所展示出来的越来越多的同情——特别是阿富汗，在一个名为"塔利班"的小派别领导下，1996 年设想在喀布尔建立一个激进反动政府。一些人士沮丧地思考这个观念：一颗巴基斯坦的炸弹也可能是一颗伊斯兰炸弹。无论如何，在制 1163

止核武器扩散取得的成绩方面曾遭受巨大的挫折，有证据表明进行核武器扩散试验的测试将会受到警告。几位大使撤出了德里，一些国家跟随美国切断了对印度的援助。不过，这种行动，并没有阻止巴基斯坦追随印度的先例。很明显，直到冷战结束，世界没有使自己摆脱核战争的危险。现在来理解世界上的那种危险，一些人认为比 20 世纪 60 年代更加缺少安全感。由于克什米尔问题，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仍然糟糕。

一个新的俄罗斯

俄罗斯，最大和最重要的独联体国家，1991 年 6 月鲍里斯·叶利钦在自 1917 年以来第一次自由选举中以 57%的得票率当选为共和国总统。11 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被总统令解散。1992 年 1 月发起了一个激进的经济改革方案，这导致经济从以前的管制转向几乎完全自由。这种自由化的经济后果，几乎对所有的俄罗斯人来说都是一场十足的灾难。少数局内人变得非常富有，而大多数人失去了他们的积蓄、退休金，或是他们的工作。能耗下降了三分之一，伴随着快速上升的失业率，国民收入和实际工资下降，工业产量下降一半，政府机关严重腐败，犯罪滋生蔓延。对很多俄罗斯人来说，这些抽象事物在个人苦难的原始细节中得到证明。大众健康和男性的预期寿命在 21 世纪初期下降到 60 岁以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下降了 5 岁。

1993 年，一个新的包含他很多敌人的议会当选，增加了叶利钦的困难。其他困难源自与独联体里非俄罗斯人的共和国（那里居住着 2 700万俄罗斯人）的关系，政治利益集团已围绕着新俄罗斯的官僚和工业精英产生，以及源自失望的前改革派（他已清洗掉他们中的很多人）。没过多久，人们开始认识到，俄罗斯的麻烦不完全由苏联的遗产引起，而是大部分归因于俄罗斯历史文化和文明的总体状况。1992 年俄罗斯本身已经成为一个联邦；在下一年，一个总统制的、甚至独裁的组织完成了国家的宪法框架。但鲍里斯·叶利钦很快就不得不面对来自左和右反对派的挑战，最后，演变成为暴乱。他中止议会职能并下令

1164

“渐进式的宪法改革”后，100多人丧生于自1917年以来莫斯科最严重的流血事件中。像他早些时候解散共产党一样，这被视为总统的专横。无疑，总统的个性和办事风格总是使他比耐心的外交努力更有可能采取有力的行动。不过，考虑到他给俄国人的物质享受如此之少，同时经济被腐败的官场和追求名利的企业家所利用，因而，是他主导的政府的信誉，以及俄罗斯人对他们新获得的自由的热爱，才让他成功地击退共产党新人新的挑战，并于1996年成功连任总统。

在这之前两年，一个新问题出现在内陆车臣地区。一个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多民族的俄罗斯联邦自治共和国，出现了一场国家叛乱。一些车臣人感到遗憾，并要报仇；他们说，叶卡捷琳娜大帝在18世纪对他们的征服和镇压行动是不道德行为。他们的愤怒和反抗由于俄罗斯人的暴行而变得更强：俄方为免他们为其他穆斯林树立危险的榜样，采取了严酷的行动，让车臣首都沦为废墟，乡间陷入饥荒，数千人丧生。但俄罗斯的人员伤亡再一次唤醒当年在阿富汗的记忆。很明显，许多战斗有蔓延到邻近共和国的危险。毕竟，俄罗斯的驻军自1992年不断支持塔吉克斯坦政府消除被巴基斯坦支持的伊斯兰激进势力颠覆它的危险。相比这令人怀疑的背景，1996年的改革和开放所激起的希望没有留下多少。很明显，当叶利钦总统的健康很差时(可能由于过度饮酒使其更加糟糕)，形势变得格外黑暗。当时俄罗斯外部的事件，尤其是在前南斯拉夫，以言行让西方再次觉得，这个国家仍渴望扮演一个它认为它理所当然的大国角色，同时俄罗斯卷入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事务的干预的暗示日益受到关注。

1165

然而，直到1998年，俄罗斯政府几乎很难征收税收并支付其雇员薪水。1997年是自1991年以来(即使很小)第一年GDP显示出真实增加，但显然，当国家经常在腐败和受优惠的基础上卖掉越来越多的国家投资给私人企业时，经济取决于特殊利益集团的恩惠。部分人迅速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但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人遭遇拖欠工资，市场上的日用品消失，价格继续上涨。当一些人由于消费水平高而遭遇贫困在街道上乞讨时，刺激和敌对行动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接着，1998年，

金融危机和外债违约冲击着俄国。叶利钦不得不更换掉因致力发展市场经济而当选的总理,接受对手强加给他的另一人。然而下届议会选举回报给他一个不太可能与他争吵的议会。1999 年新年除夕,他觉得能够宣布辞职。

他的继任者那一刻已经在担任他的总理。鲍里斯·叶利钦正式宣布下届总统应该是弗拉基米尔·普京,因此他在 2000 年 3 月选举后上任。作为一位前克格勃成员,当时普京在很多俄罗斯人眼中成功地平定了车臣叛乱(尽管事实证明这是短暂的),降低了其动荡可能超越其原始的边界的危险。国外对于车臣人权问题威胁的抗议有可能进一步帮助弗拉基米尔·普京重新激发起爱国者的支持,而且他也在西方国家的首都留下良好的印象。尽管他作为总统的第一个月遇到一系列的意外灾害灾祸,这反映了俄罗斯的基本概况,有一种严重问题终于要克服的新感觉。用一种更狭隘的个人情感来说,对叶利钦,那无疑是真的;他与他的家人都得到了他的继任者的保证,对他担任总统期间犯下的罪行免予起诉。

在叶利钦最后几年的无精打采之后,普京的总统任期给俄罗斯政府注入了新活力。新总统,当他任职时仅有 48 岁,行事简朴,在他性格外向但经常无能的前任之后,其形象得到了多数俄罗斯人的喜爱。普京渴望被称为实干家。他立即开始在俄罗斯重新集中权力,严厉打击超级富豪——所谓的石油寡头——当他们不愿执行克里姆林宫的命令时。在 2004 年重新当选后,对于他的政府操纵俄罗斯媒体对其总统政策的批评,舆论表达出压力。然而 2001 年的“9·11”事件给了普京一个受欢迎的机会来展现其好斗的品行,他将在车臣的战争描绘成一场反对恐怖主义分子的战争,从而避免了西方太过直言不讳的反应,虽然他在结束冲突方面很少成功。在促使对俄罗斯有影响的前苏联邻国对新俄罗斯采取更加有好的态度上,他的努力也大多适得其反。普京最重要的贡献是创建了某种形式的经济稳定;到 2005 年,通货膨胀得到遏制,俄罗斯 GDP 逐步增长。在引领俄罗斯在世界权力中心重新占据一席之地,走向新俄罗斯社会的道路上,弗拉基米尔·普京仍然可能会被看作是一个带来转变的人。

1166

20世纪90年代的泛美和平

从21世纪初极目回溯,与1945年相比更加清晰,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强国。尽管20世纪七八十年代遭遇了一系列困境,又是一位因财政赤字而公共债务不断增加的骑士,长期来看,其巨大的经济继续呈现出一种从挫折中恢复过来的巨大的活力,以及看似源源不断的动力。当20世纪90年代即将接近尾声时,其经济的放缓并未改变这一点。尽管其政治保守主义常常让外人感到吃惊,美国仍然是世界最自适应及瞬息万变的社会之一。

当20世纪最后十年开始时,仍有许多老问题悬而未决。对那些无需亲自面对这些问题的美国人来说,繁荣使其更容易容忍它们;但实际上,它也为美国黑人的愿望、恐惧和怨恨提供了刺激因素。这反映了自约翰逊总统以来他们推动了社会和经济的进步,至少可以看出他们立法使美国黑人摆脱麻烦的努力。虽然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州长就职于1990年,仅在2年后,瓦茨的居民(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他们的暴乱臭名昭著)就再一次显示出他们只不过将洛杉矶警察部队看作是占领军成员。将整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一个年轻黑人男子被谋杀的可能性要比同期的白人多出7倍;对一个黑人小伙来说,更有可能去坐牢而不是上大学。如果当时近四分之一的美国婴儿为未婚母亲所生,那么黑人婴儿就占了其中的三分之二——一个美国黑人社区家庭生活破裂的缩影。犯罪、一些地区出现严重卫生健康状况恶化,以及实际上毫无监管的中心市区,仍然使许多负责任的美国人相信很多美国的问题正在争相远离解决。

1167

但事实上,一些统计数据开始看起来有所好转。如果比尔·克林顿(1992年担任总统)因其通过的立法的实际内容让许多支持者深感失望,那在国会的共和党人其实应负主要责任。虽然出现"拉美裔美国人"数量迅速增长的新兴现象,来自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合法与非法移民涌入倍增让很多人担心,克林顿总统却搁置了进一步限制移民的建议。拉美裔人口在30年里翻了一番,现在占总人口的11%。

在最富有的州加州,这些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是主要的低工资劳动力资源。即使在得克萨斯州,拉美裔已开始利用政治活动来确保自己的利益不被忽视。与此同时,用一个时髦的比喻,克林顿可以冲浪经济浪潮。他在国内政策的失误,其支持者倾向于认为是由于他的对手,而不是他自己失败的领导和过度选举考量造成的。虽然在 1994 年民主党失去了对立法机关的控制,但在 1996 年的选举中他大获全胜,他的政党也在随后的中期选举中获得成功。

不过,克林顿的第二个总统任期是令人失望的。若为他辩护的话,可以说他一开始就继承了一个自约翰逊时代和尼克松的最初数年以来逐渐降低威望和权力的职位。在伍德罗・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政期间总统的权力已经积累下来,冷战初期以及尼克松之后迅速而显著地消退。但克林顿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阻止这种败坏。事实上,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是他使其变得更糟。他个人的失误导致了对其展开的长期金融调查和性指控。这一切又得到大肆公开报道,还导致了 1999 年一件前所未有的事件:参议院对当选总统的聆讯指控,目的是引发他的弹劾案(巧合的是,在那一年弹劾鲍里斯・叶利钦的企图也失败了)。但克林顿的公众民意支持率在聆讯开始时比他们启动弹劾早些时候更高,弹劾失败。那些投票支持他的人是满意的,似乎,他被认为可以处理一切想要做的,即使他们注意到他性格上的缺点。

正如克林顿总统任期所暴露的,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主导世界的可能性开始出现被削弱。不管美国的报纸和电视媒体通常报道什么,似乎那时总有一会儿某些传统的本位主义和孤立主义可能永久没落的希望。美国在全球的每个部分所要持续和积极努力关注的事项几乎不可能被忽略。他们实际上在未来十年仍然有更大的笼罩,但这很快就被美国政策的含糊之处遮住。克林顿最重要的目标是帮助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让其他国家来学习美国的成功经验。而克林顿本质上是一个多边主义者,是一位过于小心的政治家,他不会冒险反对美国公众已经厌倦的冷战时期的国际运动。许多美国可能已经起带头作用的问题,例如世界贫困和全球生态问题,因此为了回报将其视为"感觉

1168

良好的总统”的选民而被一带而过——他让他们感觉良好,除了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外,回报其实很少。

然而,不久,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使美国政策陷入困境。1995 年联合国成立 50 周年年会促使克林顿告诉他的同胞,不与这个组织合作就是在忽略历史的经验教训;而他的言论是由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年早些时候的行动引发的,其提出削减美国对联合国维持和平经费的贡献。此外,美国拖欠联合国正常预算会费累计超过 2.7 亿美元(占所有拖欠联合国国家总欠款的十分之九)。随着联合国 1993 年在索马里干预的崩溃,导致了参与联合国部队的伤亡,愤怒和欣喜的索马里人虐待美国军人尸体的壮观出现在电视画面。美国的政策似乎到达一个转折点。不久,美国拒绝参与或支持联合国对非洲布隆迪和卢旺达的干预表明,美国人拒绝参与或允许用地面部队进行强制干预会在维持和平行动中带来怎样的灾难性,更遑论缔造和平。这两个小国家每个都从族群上无奈地被分化成执政的少数和从属的大多数;1995 — 1996 年,种族灭绝大屠杀发生,超过 60 万人被杀,数以百万计(这两个国家的总人口一共只有约 1 300 万)难民被迫流亡。看来如果华盛顿不采取行动,联合国什么也不能做。

美国总统克林顿授权对波斯尼亚塞族军队进行有限空袭,最终带来了 1995 年在代顿签署的和平协议。之后,在学者、记者和政治家中,对美国的世界角色应该是什么有很多争议。这种争议大部分集中于美国力量的正确使用和它应当运用到哪里为止,甚至对于潜在的文明冲突。与此同时,克林顿的外交政策处在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夹在创造一个服从于美国意识形态目标的世界的愿望和避免军事伤亡(最主要和重要的是美国人)的希望之间。 1169

在所要面对的新国际问题中,新的潜在核危险的来源是其表现之一。1993 — 1994 年朝鲜初步的核计划表明(1998 年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核试验被确认),无论其运载系统和潜在的攻击能量仍具有多大巨大优势,美国现在是几个缓慢发展的核国家团体之一(七个公开承认,另外两个没有)。美国已经没有理由再相信(因为在过去有时很可能)所

有这些国家会合理计算各自的利益所在。但这仅是冷战结束后众多新决策考虑的因素之一。

在中东地区,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由于美国对西岸犹太人定居点扩散施加的财政压力,在一段时间内似乎表明,它有可能说服受到起义及其随附的恐怖主义骚扰的以色列政府,武力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将是无效的。当时,付出巨大努力后,在挪威政府友好的帮助下,1993 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代表在奥斯陆的秘密谈判终于导致了令人鼓舞的新尝试。双方当时宣布是时候"结束几十年的对抗和冲突,认识到……相互的合法和政治上的权利,努力实现和平共处"。以色列同意成立自主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坚定地定义为"临时")管理西岸和加沙地带,最终和平解决应在 5 年之内结束。这似乎使中东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更加稳定;巴勒斯坦人也第一次收获了他们的重大外交成果。但是,新的以色列定居点在被以色列军队占领的地区持续植入,很快再次摧毁了良好的气氛。当恐怖袭击再次开始或向他们报复时,乐观情绪开始消退。阿拉伯炸弹在以色列城市的街道杀害和致残许多购物者和路人;同时一名犹太人枪手在希伯伦清真寺杀死 30 名巴勒斯坦人,事后赢得很多同胞的掌声。即便如此,希望继续徘徊。叙利亚、约旦和黎巴嫩都恢复了与以色列的和平谈判,事实上是在以色列军队撤出指定的巴勒斯坦自治地区时进行。

1170

然后,在 1995 年 11 月,以色列总理被其狂热的同胞暗杀。次年,一个保守的总理依赖犹太极端主义党派控制的议会支持上台。他受欢迎的多数是很小,但很明显,在不久的将来,至少,除了以色列进一步坚持领土定居点的侵略政策外,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来到,而且奥斯陆协定受到质疑。即使 1999 年新当选的工党政府也没有导致继续遵守奥斯陆协定。新的谈判,由克林顿在他总统任期即将结束的日子主导,在达成任何实质性的解决上令人吃惊地归于失败。2000 年,一场新的巴勒斯坦起义爆发后,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在被以色列军队包围的拉马拉寓所里度过了余年(他死于 2004 年)。2006 年,伊斯兰组织哈马斯——一个致力于灭亡以色列的政党——赢得了对巴勒斯坦

议会的控制。在应对一个世纪以前犹太复国主义创建及1917年贝尔福宣言的影响上,美国并没有比这个地区其他局外人做得更好。

美国在波斯湾的政策也没有给那里提供持久的解决办法。联合国授权制裁对伊朗或伊拉克并没有益处,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过后者所有有意图和有目的的耐心和刻苦努力,打碎了保持1991年建立的广泛基础的反对它的联盟的任何机会。萨达姆的政府看起来似乎没有因制裁陷入困境:他们使其臣民负荷沉重,但政权所需商品可能因走私得到缓和。伊拉克还是一个大的石油出口国,来自石油的收入使其可能恢复部分军事潜力;虽然联合国已经下令,但该国并没有对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开展有效的检查。美国的政策前所未有地远离了其革命性的、明确推翻这个政权的目标,即使(仅英国支持)它在1998年12月诉诸公开的空战长达四个晚上。它无助于增强美国的威望。当轰炸进攻的时间可能会与想要分散被弹劾的注意力联系在一起时,怀疑产生了。

1998年伊始,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他的国情咨文中强调国内情况表明美国人有了"好时光",但这并不反映外交事务方面的真实状况。8月,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美国大使馆遭到穆斯林恐怖分子袭击,人员受到重大损失。在几个星期内,美国的答复是用导弹袭击了在阿富汗和苏丹的所谓恐怖分子基地(被攻击的工厂据说在准备细菌战武器,但这一指控的公信力迅速消退)。比尔·克林顿将大使馆爆炸案与沙特的极端分子神秘人物本·拉登联系起来,在发言中还称有进一步针对美国公民攻击计划的"令人注目"的证据。这些断言的影响受到削弱,由于导弹袭击的明显失败,以及引发总统很高兴能够起某些方面找到一个转移注意力的议题的怀疑,当时他自己的行为在华盛顿遭受起诉。11月,一个曼哈顿联邦大陪审团起诉了本·拉登和他一名同伙,原因是其策划了超过200项的大使馆袭击以及1993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一次流产的轰炸。毫不意外,他未能出庭应诉。据说,本·拉登正躲在阿富汗,处于塔利班政权的保护之下;塔利班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控制了这个因对苏战争变为废墟的国家。

1171

1999年开始,科索沃成为前南斯拉夫纷争的中心。在春夏之交的3月份,北约部队(但主要由美国和英国进行)对塞尔维亚最后发起一场纯粹的空袭战役;其战略承诺似乎实现很小,除了增强其人民的抵抗意志和增加科索沃难民的流动之外。俄国人对北约的行动感到震惊,因为它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支持,并认为它忽略了自己在这个地区的传统利益。伤亡强加于塞尔维亚人和科索沃人平民很快就在19个北约国家国内舆论中引起疑虑,同时由于克林顿保证北约不会进行地面入侵,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显然已经增加了信心。即将发生的一切确实不寻常:一个欧洲主权国家由于其对待本国公民的行为而受到外国武装胁迫。

与此同时,超过100万科索沃难民中有四分之三越过边境在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寻求安全避难,带来了塞族人制造暴行和恐怖的故事。现在看来,贝尔格莱德政府蓄意打算清空清除处于人口多数地位的非塞族人口中的多数。接着是灾难性事故。按照过时的信息突袭——因此可以避免的错误——美国飞机直接命中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杀害了其工作人员。北京甚至拒绝听克林顿试图作出的道歉。一系列精心安排的电视活动已经将整个北约干预行为向中国人民简单解读为美国的敌意。组织严密的学生袭击了美国和英国驻北京大使馆。由于临近天安门广场事件10周年纪念日,在反对外国人的骚乱中,学生的怒气被消解。

1172

中国关注美国世界角色的深度几乎毋庸置疑,而中国的参与,像俄罗斯一样,当然不会在科索沃危机中增加北约要实现其目标的难度。在安全理事会的否决权制度上中国人有强烈的信仰,把它视作对个别国家主权的保护。他们也无意于给科索沃分裂分子想要的同情,因为他们对自己广大的国家的任何分裂版图的危险总是很敏感。在这深远的背景中,也必须存在主张自己历史性的世界角色以及近年来具体棘手事件的思想。鸦片战争后的一个世纪,毕竟,中国在确保几个城市的“秩序”时从来没有逃脱过欧洲和美国的军队的污辱。也许在一些中国人的心灵记忆中,如果中国士兵最终成为欧洲维持和平部队的一部分,

这将是一个甜蜜的命运逆转。

由于美国总统希望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暴露的地面部队遭受危险，正如波斯尼亚事件破坏了联合国作为保证国际秩序的一个工具的公信力，现在看来科索沃可能会破坏北约的公信力。不过，早在 6 月，看来轰炸造成的损失，加上俄罗斯及时努力调解斡旋，英国通过北约部队开展地面入侵的压力，最终削弱了塞尔维亚政府的意志。同月，俄罗斯政府参加调解后，商定北约地面部队应该以“维持和平”的角色进入科索沃。塞尔维亚部队然后撤出科索沃，该省被北约占领。这不是前南斯拉夫联邦烦恼的结束。两年后，北约士兵们还在那里，科索沃的长远未来仍然不确定；即使塞族少数派变得越来越弱，同时阿尔巴尼亚多数派用强有力的方式控制着这个省。但那时贝尔格莱德政府的情绪有了明显的变化，前塞尔维亚总统已被逮捕，并移交给海外一个新的国际法院，开始审判其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罪行和其他指控。

当克林顿的总统任期走向结束时，他在不同的时间主张需要扭转国防开支下降的趋势；指出对气候造成损害的工业气体排放是不能接受的，建议加以限制；并致力于安抚中国，确保与其保持正常贸易关系。 1173
事实上，在 2001 年，中国获得了争取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认。在 2000 年总统大选期间，共和党候选人乔治·布什在成功竞选活动中强调，他渴望避免使用美国部队承担海外维和职责；他将授权建立核导弹防御系统，以保护美国对抗装备有这种导弹的“无赖”国家。空气中正好有种暗示，促进美式和平可能让位给堡垒美国的建设。在本书前一版的尾声我写道，我们将总是发现发生的一切有些令人惊讶。因为一方面事情往往会改变得更慢，另一方面又更快，皆超出我们可把握的范围。这一点似乎前所未有地准确——2001 年 9 月 11 日的悲惨事件使事情重新发生变化。

“9·11”之后的世界

在那个美丽秋天的上午，美国境内的四架定期航班在飞行中被有伊斯兰或中东背景和出身的人劫持。没有尝试(类似的空中劫机行动

经常发生)要求赎金或对他们的目标发表公开声明,恐怖分子更改飞机航向,结成自杀和谋杀的组合,其中两架飞机撞击曼哈顿世界贸易中心的巨塔,另一架袭击了华盛顿的五角大楼,美国的军事计划和管理的核心。第四架坠毁在空旷的乡村。显然是一些乘客的英勇努力战胜了劫机的恐怖分子迫使其下降。这架飞机里无人幸存下来,两座城市(最重要的是纽约)的损失是巨大的,3 000 人丧生,他们中有许多人不是美国人。

很明显,需要花时间来发现这些悲剧的完整真相,但美国政府的直接反应是把责任笼统地归咎于伊斯兰极端恐怖分子,布什总统宣布开展一场毫无保留的全球战争来对抗抽象的"恐怖主义"。更具体的是,要追捕本·拉登,并将其绳之以法。在某种意义上,"9·11"事件中的个人责任并不是眼前最重要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全球普遍爆发激情,追究穆斯林激进主义——也许是伊斯兰教本身——与这种暴行的总体联系。为此,所发生的一切的潜在影响甚至比他们带给数千人的苦难和恐惧,造成的物质和经济损失更加重要。这几种影响在几个国家直接表现为独立发生的反穆斯林的行为。

1174

一切都因"9·11"事件发生了改变,这迅速成为一种陈词滥调。这当然是一种夸张。尽管接下来产生了种种反响,但在世界许多地方很多历史进程继续无法改变。但是袭击的影响是,毫无疑问,使人震惊,使先前隐藏的东西变得明显。很明显,美国人的意识立即受到巨大的冲击。这是无法估量的,不能仅仅用公众舆论不同寻常地群起支持总统将此事件列为一场"战争"爆发(虽然敌人并未精确识别)的言论,以及新任总统乔治·布什处境的转变来衡量——在年初,一场有争议的选举后,他还受到很多人质疑。很明显,现在他的同胞再次感到国家的愤怒和团结之类的东西,这在近六十年前的偷袭珍珠港事件出现过。美国国内外遭受恐怖袭击长达二十年。但"9·11"事件的悲剧,完全是规模空前的,不幸的是,也意味着其他暴行可能即将到来。因此布什觉得他可以用强有力的语言回应民主的愤怒并不令人感到惊讶,而全国上下也压倒性地表示支持他。

很快就似乎有可能的是，在逮捕和审判幕后人物本·拉登之外，将增加以武力清除协助恐怖主义的“无赖国家”的目标，其被认为对恐怖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帮助。这种实际影响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军事努力，并立即开始充满活力和展开世界各地的外交攻势，获得精神上的支持和实际的援助。这是非常成功的。并不是所有的政府都以平等的热情响应，但几乎所有反应积极，包括一些伊斯兰国家，更重要的则是，俄罗斯和中国。安全理事会没有遇到任何困难，一致表示赞同；北约各国则承认他们的责任在于协助盟友进行攻击。

正如拿破仑战争后神圣同盟时代中那样欧洲保守国家饱受阴谋与革命的恶梦。劫机事件后数年，有令人震惊的线索显示，出现了类似的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夸张的恐惧。毫无疑问，发生的一切都曾仔细和巧妙地计划。但实际上对真正的有组织的力量是什么，以及它们的分支和范围是什么，知之甚少。只一个人的作用就可以解释这些行为，这一看就似乎不合理。但也不可能振振有词地说世界正进入文明的冲突，虽然有些人这样说。

1175

美国的对外政策——最重要的是，支持以色列——极大鼓舞了阿拉伯国家反美情绪的增长，这不容质疑，即使对许多美国人而言那是一个新的看法。进攻的鼓噪也产生了广泛的不满，随着美国通信技术将麻木不仁的资本主义文化表现形式推入到非常贫穷的国家。在一些地方，被视为美国军队占领的一些干涉形式(都会被视为不速之客不受欢迎)，可能会被描述为腐败政权的支持者。但这并不能真正地合计成讨伐伊斯兰文明的十字军，正如巨大的多样化的伊斯兰文明无法被视为一个单一西方文明的一个单体对手。在其当地和长期的敌人及美国轰炸、技术和特别部队联合努力下，很快所取得的一切是推翻了在阿富汗喀布尔敌对的塔利班政权。到 2001 年年底，一个新的阿富汗国家正式形成，尽管它看似毫无资源，危险地分裂为各个军阀领地和部落飞地，虽然看来，它依靠美国和其他北约力量来打击敌人。在其他地方，界定不明的反恐战争的后果使巴勒斯坦事件复杂化。当以色列以反对国际恐怖主义为名攻击他们，阿拉伯国家并不愿意停止

支持巴勒斯坦人。

2001 年 9 月 11 日的暴行最大的灾难性影响就是由布什总统和其主要的国际盟友,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作出的在 2003 年入侵伊拉克的决定。入侵的主要原因是对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拥有或很快可能掌握大规模杀伤性化学、生物或核武器的担忧不断增加,特别是美国。2001 年 9 月前很难想象对一个基于(无事实根据的,结果证明)武器拥有的怀疑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不论这个国家的政权是多么的不得人心。但是,对许多美国人来说,"9·11"事件改变了一切。他们现在已经准备好——至少一段时间——跟随想利用后"9·11"紧急事件意识的总统来应对别的潜在威胁。即使布什和布莱尔认识到萨达姆——他所有的反西方的虚张声势和恫吓——都无力对纽约和华盛顿发起攻击,他们认为他的政权是一个必须清除的邪恶势力。尽管遭受到安理会其他成员国和全球绝大多数舆论的坚决抵制,美国和英国开始推动形成联合国授权他们进攻伊拉克的决议。在 2003 年 3 月初,当它很清楚这种决议不会达成时,两个国家及其部分盟国决定入侵伊拉克,消灭萨达姆政权,即使没有联合国的支持。

1176

第二次海湾战争在 2003 年 3 至 4 月仅持续了 21 天,但却在 21 世纪伊始逐渐主导了国际事务。可预料的,它以推翻萨达姆政权及随后对他的审判和处决告终。但它也在政治上滋生出新的无法弥合的新分歧,在伊拉克很多地区出现了对一切被视为外国占领行为的抵抗。在欧洲,法国、德国和俄罗斯反对入侵,大声疾呼反对它。中国谴责其违反国际法。北约面临着后冷战时代最大的危机,当它不能就支持入侵事件达成一致,美国只有东欧新成员作为其最坚定的支持者。但最大的损害则是对在大国中间磋商的后冷战时代世界新秩序的概念,多边行动应当替换世界范围性的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加纳人科菲·安南——一位美国努力促使其当选的人——告诉世界美国和英国在伊拉克的行动是违法的。对他,对其他很多人而言,真正关心的不是布什清除萨达姆的决定,而是其他别的地方将会发生什么,当其他国家决定清除他们敌人的时候,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通过单边行动做了一个示范。

布什和布莱尔可能会回避入侵伊拉克后出现的一些批评，如果对这个国家的占领得到更好规划的话。相反，政权垮台后这个国家部分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同时基础服务停止，经济裹足不前。长达数月的抢劫和目无法纪到处存在，之后伊拉克人——很多人得到了美国坦克的帮助——推翻了巴格达市中心的萨达姆雕像。即使伊拉克主要民族和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对任何后萨达姆时代的政府来说都将很难处理，安全缺乏和经济混乱无异于火上浇油。大多数什叶派穆斯林——长期受到前复兴党政权的主要逊尼派领导人的压制——蜂拥而至追求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许多人渴望建立一个类似于伊朗那样的伊斯兰政权。期间，基于萨达姆追随者和不断增加的来自伊拉克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逊尼派伊斯兰分子之间大量的反叛在这个国家逊尼派控制区展开。新伊拉克政府——一个由什叶派控制的脆弱的联合政府——不要依赖于美国的军事支持来维持，同时北部库尔德人地区建立了他们自己的与巴格达政府机关分开的机构。 1177

冷战结束之际，美国明显地在操练历史上的第一个全球霸权。再怎么往好里说美国在行使这种霸权方面的第一组尝试非常磕磕绊绊。2011 年 9 月 11 日对无辜生命的屠杀事件给美国确立了一个方向，这导致美国疏远大部分朋友，以及一场看似无法全部打赢的或撤退的战争。结果，2004 年重新赢得大选后不久，布什总统是在人们记忆中比其他任何总统更不受年轻人欢迎的总统，除了当时面对迫在眉睫弹劾的尼克松总统外。但是，尽管入侵伊拉克没有动摇布什的总统地位和布莱尔的首相地位，在后冷战世界很少有人能拿出解决美国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更好的方案。一方面，美国人自己就认为伊拉克的教训是需要更多孤立主义还是更多多边主义产生分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世界其他国家，经常抱怨美国单方面行动的后果，当面临主要危机的时候很少摆正它的位置。在后冷战时代末期，文明发源地区已经开始分娩出历史漫长传奇中又一道起伏。美索不达米亚入侵者和侵略者凄凉的命运毫无新意，一个国家的全球优势是明显的。美国有力量改变国际事务。但它会凭此做些什么，仍有待观察。

整体世界历史

在这本书中讲的故事没有明确的结束。无论多么充满戏剧性和干扰性,世界历史都不能被缩短或者在完整的按时间编年顺序的边界处停止。在作者选择不再写下去的那一年结尾完全出于形式的要求;关于当时正在进行的历史进程的未来,它什么都没说,因此在中期切断。因而,历史是一个时代认为值得注意另一个时代却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最近发生的事件将会获得新的意义,当人们一次又一次反思是什么创造了他们生活的世界时,当前的模式将失去其清晰的轮廓。即使几个月,目前判断什么是重要的可能显得反常,现在的事件可以变化得如此之快。透视越来越难以维持。

1178 这并不意味着记录仅仅是一个事实的集合体或正如一连串的事件不断改组如万花筒的形象。明显的趋势和力量,均在时间的长度和空间的宽度上运行。在这所有三种互联趋势的最长运行中脱颖而出:日益加速的变化、日趋一致的人类经验和人类控制环境能力的发展。在我们的日程里,他们第一次创造了可见的真正统一的世界历史。公然表达“一个世界”只不过是一个黑话术语,对所有第一次使用它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有太大的冲突和争论,以前从来没有早期世纪像二十世纪这样见过这么多的暴力。其政治是昂贵的和危险的,即使他们没有爆发公开战斗,并像冷战那样非常清楚地展示出来。而现在,正进入新世纪,新的分裂仍在出现。讽刺的是(即使比五十年前稍少一些坚定),联合国仍然基于对整个地球的表面分为属于近200个主权国家的领土的理论。前南斯拉夫殊死斗争可能重新开启,许多人也想坚持伊斯兰与西方文明冲突的简单性,与阿富汗那样如此伊斯兰化的一个国家按照部落分歧被划为好几份相反。

沿同样的思路可以说很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现在共享不比过去它所分享的更多。蹒跚前行的统一拴紧了人类。最初源于基督教的日历(现在在“基督教国家”,多以BC和AD代替了BP和CE,以消减其意识形态色彩)现在是周围世界上大多数的政府活动的基础。现代

化意味着日益增长的共同的目标。文化冲突频繁，但过去显然冲突更多。现在共享的是数以百万计平凡个人的经验；如果社会是共享的参照物，我们的世界分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即使，自相矛盾地，人们也在日常经验中敏锐地感到他们之间的区别。然而当那些住在邻近村庄的人说着显著不同的方言，当大多数人终其一生最多只能到离他们的家园十英里远的地方，甚至他们的衣服和工具可能提供很大的差异，技术、样式和自定义其形状和工艺证据时，这种经验显示了比现在更重要的区分方式。过去巨大的物理、种族和语言区分要比今天的更难克服。这是因为通讯的改进、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在受过教育的人当中的普及、大众教育、日常所需物的批量生产。在一些国家旅行者仍然可以看到具异国情调或不熟悉的衣服，但更多的人在全球大部分地区现在穿衣服都比以往更相近。苏格兰方格呢短裙、土耳其长袍、和服正在成为游客的旅游纪念品，或小心地保存流于情感的过去的文物，而传统的服装越来越成为贫穷和落后的标志。几个自觉保守和民族主义的政权努力坚持他们过去的符号只能证实这一点。伊朗革命者要求妇女回归披巾，因为他们觉得从外面的世界喷涌的经验对道德和传统具有腐蚀性。彼得大帝命令他的臣子穿西欧的衣服，阿塔图尔克禁止土耳其人穿菲斯，宣布在教育追求进步、先进文化和象征意义的一步面向新的未来。 1179

不过，现在可用的共享经验的基础仅仅是任何有意识的承诺的辅助性后果。也许这就是它为什么被历史学家如此忽视的原因之一，他们对此不感兴趣。然而，在较短的时间，数以百万计的不同文化的男子和妇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获得解放，例如，因电力、空调和医学对气候差异产生的影响有了反抗力。现在世界各地的城市视为理所当然的路灯和交通信号，有警察当值，在超市和银行以相似的方式办理业务。很多相同的货物可在大多数其他国家购买到(在当季时，日本也卖圣诞蛋糕)。不了解彼此语言的人们在不同的国家使用相同的机器服务。汽车到处都是有害的东西。在一些地方农村地区仍然逃避这些现代生活物品，但大的城市，现在居住着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多的人口，却没有

这样做。然而数以百万计的居民分享的经验却是肮脏、经济不稳定和相对的剥夺。无论他们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基督教的起源有什么不同，无论他们拥有的是清真寺、寺庙或教堂，开罗、加尔各答和里约提供同样多的痛苦(而对少数人，类似的富裕)。其他的不幸，现在也更轻松地共享。现代运输工具为人民的融合提供了可能，包括疾病的相互传播，而这些都是由于旧的免疫力的消失。每一个大洲(或许南极洲除外)，现在都出现了艾滋病，这每天夺去6 000多人的生命。

甚至在几个世纪前，从罗马帝国到洛阳——汉朝首都，旅客就会比现代的继任者发现很多更大的反差。富人和穷人会穿戴以不同的方式裁剪的款式，由不同材料制成，这些都是他过去所不知道的，他吃到的食物将是不寻常的，在大街上他就会看到不熟悉品种的动物，士兵的武器和铠甲看上去相当不同。连小车也有不同的形状。而一个现代化的美国或欧洲人在北京或上海看到的却不怎么令人惊讶，即使这个国家还在很多方面比较保守；如果他选择的中国菜(也不一定要选这种菜)，这可能不太一样，但中国客机看起来像任何其他国家的一样，中国的女孩穿网眼连裤袜。这仅仅是一小部分，在过去舢板船是中国的远洋船只，且看上去完全不同于同时代欧洲的柯克船或轻型帆船。

1180

物质共享的现实使精神共享和共同承担责任提前成为可能。现在生产出来的信息和大众娱乐可供全球消费。流行音乐家环游世界，像(虽然更容易也更赚钱)吟诗人闯荡中世纪的欧洲，在不同的国家演唱和表演。现在有成千上万的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放弃了其独特的本地的生活方式，转而追逐那些遥远地方的可以自由支配口袋里闲钱的年轻人的生活方式。相同的电影，配音和配上字幕，面向全世界的观众播放，让他们从中获得类似的幻想和梦想。在一个不同的更加自觉的预期的水平上，民主和人权的语言比以前更广泛地，至少在口头列明了西方对公共生活的概念。无论政府和媒体实际意愿怎样，他们认为他们必须宣扬他们相信某种民主、法治、人权、性别平等和其他一些东西。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令人厌恶的震惊事件，诸如一些在实践中暴露的虚伪本性，不确定的道德争论或者是迟钝的文化摒弃，仍污染着他们的

传统和人民的感情。

确实,数以百万计的人仍然居住在村庄,在高度保守的社会内依靠传统的工具和方法苦苦挣扎谋生,而富国和穷国之间一目了然的不平等使过去曾存在的分歧变得渺小。有钱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富裕,并且有钱人越来越多,同时按照现代标准一千年前所有社会都是贫穷的。因此,至少在这种方式下,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彼此联系比今天更加紧密。获取个人每日面包的困难,在视人命如草芥的神秘无情力量面前人类生命的脆弱性,是所有男子和妇女都共同拥有的东西,无论他们说何种语言或遵奉何种信仰。现在,有一小半人都生活在人均年收入超过 3 000 美元的国家,另有一些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人的对应数字不到这个数字的十分之一,甚至在这些穷人中又有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异是相对近期一个短暂历史时期的产物,我们不应假定它们持续的时间会比其轻易或迅速消失的时间更长。

1181

领导阶级和精英,即使在最贫穷的国家,也有至少一个世纪依靠某种现代化的路径作为摆脱他们的麻烦的一条出路。他们的愿望似乎证实了源于早期欧洲的文明的普遍影响。有些人说现代化只是技术问题,更为根本的信仰、机制和态度仍然是更强的社会行为的决定因素,但这避开了有关物质经验塑造文化的方式问题。证据在不断增加,某些主要的理念和制度,也和物质艺术品和技术一样,已经在人类中间普遍传播和扩散。无论诸如联合国人权宣言这些档案文件的实际影响是什么,在拟定它们和签署它们时表现出的兴趣都曾有征兆地激烈深刻,即使当一些签署国很少尊重他们的意图时。这些原则总是从西欧传统派生出来,无论我们是否将这个传统看作贪婪、暴虐、残酷、传统和剥削,或视作客观地改善,仁慈和人性化是无关紧要的。阿兹特克和印加文明面对西班牙不能站得住脚,印度和中国的文明对抗以后的“法兰克人”只是稍微成功。这种声明不能辨别真假:但事实是,既没有令人敬佩,也没有令人深恶痛绝。他们记录了这个事实,欧洲重塑旧世界,创造了现代世界。

一些最终源于欧洲的“西方”思想和制度,常常受到深深反感和抵

制。妇女仍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无论好坏都与这里无关——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社会中，而且他们在当今显现的所有伊斯兰社会中或是在所有我们称之为“西方”社会里都没有得到同等待遇。印度人仍然用占星术来选定一天的婚礼，而英国人可能会寻找火车时间表（如果他们能获得关于它们的准确信息）或不完美的天气信息，他们认为这是更加有关的“科学”。不同的传统，甚至对共享技术和想法的使用也不同。日本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与英国不同，其任何可能的解释都深深根植于这两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根基之上（如无入侵的岛民等）。然而其他传统没有像欧洲人那样在相异的设置里表现出相同的活力和吸引力：作为世界的塑造者，它没有竞争对手。

1182　甚至其最粗暴的表现形式——其实质性的贪婪和掠夺——也显示出这一点。原先以原样接受一切的态度为基础的各个社会，如今也已接受了这一信念：物质生活水平的无限改善是一个适当的目标。意志可能导致变化，这个看法本身就有深刻的颠覆性，这种变化可能是通往幸福的道路——这一观念也是如此。多数人现在都知道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事情都在变化，并觉得或许一切将会进一步变得更美好。人类面临的问题是可以操控或至少可挽回的，对此不假思索和不加反思地接受，是一个主要的心理转型。这也是几乎无法想象的，更不用说确立，即便是几个世纪前的欧洲人当中。虽然在他们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里，数以百万计的人仍然很少考虑未来，除了非常不幸和忧虑外——在正常的事件过程中，超过数以百万计的人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都没有饿着肚子，这样做，他们也似乎没有任何明显的危险。与以往相比，现在更多的人理所当然的认为他们永远不会知道真正的需求。一些规模较小，但数字仍庞大的人很容易相信他们的生活会改善，很多人更是觉得他们应该得以改善。

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当然在富裕的社会中最明显，他们现在消耗的地球资源比几十年前的富国所消耗的还要多。在西方世界，尽管还存在相对被剥削的少数民族和下层阶级，但大多数人现在正处于这种富有的状态。只在约 200 年前，一个典型的英国人一生当中除非徒步出

外旅行，否则不会走出离他的出生地几英里之外的地方。仅 150 年前，他将无法保证供得到清洁的水源。一百年前，他仍面临一个因意外事故或疾病而致残甚至被杀的机会，因为补救办法未知或不存在，无法给他提供护理，同时很多像他及其家人的人吃着微薄的缺乏平衡和营养(更不要说是枯燥乏味的)的膳食，在这个国家，这些食物如今只有最贫穷的人才吃；他们可以想见，在五六十岁(如果他们能活这么长时间的话)时，一个痛苦贫乏的老年时代将来临。其他欧洲人和北美人、南美、日本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可以说大致如此。现在即使全球最贫穷的数百万人，也可以瞥见他们的生活有变好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那些逐渐相信可以去追求、去提倡这种变化也实际带来这种变化的人。政客如此告诉他们：现在很显然，人民和政府毫不保留地相信这将成为事实，他们的社会生活中的许多具体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因此，很多人走得更远，觉得他们将会如此。当然，这不可能在逻辑上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很可能正面临耗尽便宜的石油燃料和充足的水供应。我们也可能会对重新安排世界来增加人类幸福的指数感到怀疑，当我们想当 20 世纪在社会工程方面的一些有益尝试，或者迷信和宗派主义、顽固的道德准则和部落忠诚仍耗费太多的痛苦和鲜血时。然而，与以往相比，更多的人现在表现得好像他们的问题大多在原则上都是可以解决的或是可以补救的。这在人们的态度上是一场革命。毫无疑问其最深的根源很遥远，远至这些史前数千年缓慢增长的征服自然的能力，当前人已会很方便地用火，这来自古老的燧石取火。但这种控是可能的——这一抽象观念只是最近才形成，起初，在某些关键的时代和文化区只有几个人有这种洞察力。但这个想法现在却司空见惯，它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我们现在理所当然认为，每个地方的人都应该和即将开始问自己，为什么事情还一成不变，它们明明可能变得更好。这是最伟大的历史变迁之一。

1183

驾驭自然

这种变化最可见的基础是过去几个世纪人类驾驭这个物质世界能

力的不断增长。科学为此提供了工具。现在看来,它提供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我们站在时代的前沿,带着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比过去更加重要深刻所带来的美好前景和威胁(例如,转基因工程)。也许摆在面前的世界,人们将能够委托,好像它是,可以订购的私人期货。现在,可以想象的是,当信息技术可用来创建比现状更完美的虚拟现实时,他们可能计划基因塑造尚未出生的后代,为自己买到"现成商品"。如果他们想要的话,可能人们将能够过着更接近他们设想的生活,生活在他们自己构筑的世界而非普通感官经验体验到的世界中。

这种猜测可能有些令人生畏。毕竟,它们很可能预示着巨大的混乱和不稳定。与其想了解什么会或不会发生,最好是扎实地反思历史,反思人类过去生活中已经出现的改变。例如,物质生活水平的变化,不仅通过改变预期继承的遗产而且通过更改政客们要作出决定的环境、制度运行的方式和社会力量的分布来改变政治。现在只有几个社会团体仍坚持先前对待或实践宗教的方式。科学不仅大幅扩大了人类可用于征服自然的知识工具包,而且也改变了数以百万计日常生活层面中曾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这个世纪,它造成了人口数量的大幅增长,国家间的关系出现的根本性变化,世界经济整个行业的兴衰,近乎即时通讯让世界日趋结成一起,以及其他很多最令人吃惊的变化。而且,无论过去的一个多世纪到底在政治民主制方面达成或错失了什么,由于科学,它将带来实际自由的伟大扩张。绝大多数源于西方(尽管亚洲文明在早期多有突破),表达在先进技术领域里的科学知识很快就影响到了全球。

1184

直到20世纪60年代左右,在人类通过科学和技术驾驭世界的能力(而不是,比方说,通过魔法或宗教),并因此满足人类的需要方面,只有富裕社会在知识产权的领导权上有一些明显的自信和资格,且几乎没遇到挑战。这样的资格会延续很长时间。我们现在对我们的自然环境的脆弱性及其应对恶化的敏感性知道得更多。一种新的认识是,并不是所有来源于自然开发的明显利益都不需付出代价,有的甚至可能会有令人恐惧的影响,而且,更根本的是,我们还不具备确保人类将很

好地利用知识的社会与政治的技巧和结构。公共政策的讨论是最近才开始,对因此引起的许多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其中那些最受关注的可以概括为"环境"——污染、土壤侵蚀、水供应减少、物种灭绝、森林枯竭是它们当中最先被注意到的部分。

这种认识在近几年来对"全球变暖"问题给予的关注中体现得很明显。地球表面平均气温的上升,据信源于大气层和大气平流层中的变化,这些变化影响到热量分散和速率失去。事实本身直到最近仍有争议,但1990年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会议承认,全球变暖事实上是一个不断增长的危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造气体在大气层中累积的问题。人们同意,这在一个世纪里已经让平均温度明显上升;气候变化事实上比上次冰河时代以来的任何时候更快。目前,权威的共识是人类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因。 1185

关于进一步增加的可能速率及其可能后果的讨论还在继续(其中,例如海平面上升),同时有关人为的气候变化的框架公约的筹备工作已经开始,到1992年已经准备到位。其主要目标是稳定排放水平,以便在2000年他们应该仍是维持在1990年的水平。1997年在京都,这被变成一项涵盖所有主要的排放"温室"气体的监管协议(如他们所称为);它强制实行减少排放量和时间表,主要负担放在发达国家。在公约签署之前,这一年早些时候,克林顿总统发出警告,美国不会接受这种减少,乔治·布什总统在2001年证实了这一点。同时,全球变暖的不利影响的迹象增加,寻求法律补救办法来减少由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的最初尝试已经开始。

十年左右的时间几乎不足以期望或找到政治上可接受的解决如此大规模的问题的办法。在它们可能更好的转变之前,似乎没有理由认为事情不会更糟,但更重要的是,没人认为解决办法不可能被找到。毕竟,人类对科学的信心基于真正的成功,而不是错觉。即使这种信心现在是合格的,它是因为科学使其成为可能,通过给我们更多加以考虑的知识来这样做。合理地说,虽然自人类成功地从其史前栖息地取代大型哺乳动物以来可能正在制作很多不可逆的变化,因此,现在所造成的

一些严重问题,人类的工具包显示并未被耗尽。人类曾经面临这种挑战,资源匮乏的冰河期以及知识和技术,而今天它面临气候变化的挑战。如果对自然的干扰已导致新的外观,在我们所创建的已经更改的环境中耐药细菌通过自然选择突变,掌握它们的研究就仍将继续。更有甚者,进一步证据和考虑迫使人类应当放弃假说,全球变暖主要是一个人为现象——如果说,它变得似是而非,超越人类控制或操作的自然力量,例如那些产生巨大史前冰河期,是工作的决定性力量——那时科学本身将会适用于处理那种后果。

长远来说,即使不可逆变化本身,也不会直接导致必然放戏对人类终究能让自身脱困的信心。虽然我们可能已经永远失去了一些选择,人类可以行使选择的舞台——历史本身——除非人类灭绝,将不会消失。人类因自然灾害灭绝,这独立于人的行为,也是可能发生的,但对其苦苦猜测几乎是没有用的(甚至是精算的),除非在范围有限的情况下(世界应受到怪物般的小行星的撞击)。人类仍然是一种具有反思能力、会制造工具的动物,而在穷尽这种事实的可能性上,人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一位学者一语惊人的表达,从其他生物的角度来看,人类成功的竞争力从一开始就类似于一种流行病。不过,不管它对其他物种做了什么,其数量和寿命的证据似乎仍显示,人类的操纵力量迄今为全人类带来的好处比伤害要多。这仍然属实,即使科学和技术在找到答案之前迅速创造出一些新问题。

1186

人类的力量几乎已经潜移默化地鼓励了一些假设和神话的良性传播,这些神话源自欧洲自由主义的历史经验,又传播到其他文化中,且具有对待政治的乐观态度,而不顾同时代的证据。社会适应可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例如,在有效地应对全球变暖时,这一点不容怀疑。质疑这一切是否可以在没有大规模痛苦和胁迫的情况下实现也是恰当的。尽管如此,我们对政治文化的信心仍然很高,这可通过被广泛采用来判定。如今,共和国存在于世界各地,并且几乎所有人都谈论民主和人权。到处都在努力让政府和行政部门变得合理化和实用,努力复制在欧洲传统的国家机构中已发现可成功运作的模型。当黑人男子大声

疾呼反对他们所生活的那个由白人统治的社会时,他们希望实现自己的也是由欧洲人发展出来的人权和尊严的理想。就算有的话,能完全抵制这种有力传统的文化也极少:中国在很久以前就向马克思和科学顶礼膜拜,后来它又为了市场这样做。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成功地进行了抵制,但几乎处处存在的其他伟大的政治文化的个性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了。当现代化的推动者们设法在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政治模式中进行挑选和选择时,他们发现这样做并不容易。若付出一定代价,有选择地实现现代化或许也有可能,但它通常都是一股脑涌进来的,总会带来一些不受欢迎的内容。

1187

对持怀疑态度的人来说,对政治文化同一化对社会福祉可能带来的模棱两可结果的最佳证据,体现在持续活跃的民族主义上,近百年来其成功几乎在全世界达到极点。我们最全面的国际(一个词的普遍接受是重大的)组织称为联合国,其前身为国际联盟。旧的殖民帝国已经分解成不同的新国家。许多现有民族国家必须向该国少数民族证明自己存在的合法性,方式就是宣称它们是全民的,因此有摆脱和统治他们的权力。当某些少数民族希望打破统治它们的国家——例如,像很多的巴斯克、库尔德人、魁北克人做的——他们会谈到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没有建立。民族国家似乎已非常成功地满足其他思想麻醉品不能达到的欲望;它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伟大创建者,扫清阶级和宗教,带给老旧纽带已腐坏的现代社会那些漂泊的人生活的意义和依靠。

再一次,无论大家对国家作为一种机制的兴衰起伏持什么看法,或对民族主义的观念持什么看法,世界的政治大部分是围绕最初源于欧洲的概念组织的,无论它们在实践中受到怎样的质疑或产生了怎样的含糊性,正如世界上智力生活越来越多地围绕原产于欧洲的科学来组织。不可否认,文化移植可以不可预知地起作用,并因此产生令人惊讶的后果。从它们最初得以酝酿的国家输出之后,诸如个人可维护自己的权利的观念已经产生的影响,将远远超出那些因自信地认为这导致了他们的成功而鼓励人们采用这些原则的人的想象。新机器的引入、铁路的建设和矿井的开采,以及银行和报纸的来临用无人愿意和想象

的方式和它们固有的方法,改变了社会生活。电视现在继续着这个进程,一旦开始,将是不可逆转的。欧洲人的方法和目标一旦被接受(如他们已经或多或少,有意或无意地,通过几乎处处存在的精英们),不可控的进化就开始了。虽然继续塑造它,人类一如过去,无法长期决定历史的进程。即使在得到最严格控制的现代化尝试中,新的、意外的需要和要求也不时涌现。或许这个时期已经隐隐呈现现代化的幽灵——现代化的成功可能传达给了人类一些目标,这些目标在物质和心灵上是难以实现的,并且在不断扩大,永不满足。

1188 这几乎不可能是一个可被轻易断言的前景,但预言不是历史学家的业务,即使假装成推断。尽管猜测是允许的,如果他们阐明事实目前的规模,或起到教学辅助的作用。化石燃料也许会走上与大型史前哺乳动物在人类猎人的手中消失一样的道路——或也许它们不会。历史学家的主题仍然是过去。这是他所要谈的全部。当它是最近的过去,他可以尝试做的一切就是要看到与之前一切的一致性或不一致之处,连续性或不连续,诚实地面对通过蜂拥而来的大量的事实在我们面前所展现出来的困难,特别是在最近的历史。它们造成的这种异常混乱意味着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革命时期,迄今为止已经说到的关于继续加速变化的一切证实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更暴力、更彻底的变化并不源于是以一种可解释且在很大程度上可理解的方式,从过去的历程中慢慢浮现出来的。

认识到这类问题,正是导致现在观察世界方式的合理性貌似比以前更少的部分原因。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可能毫无困扰且确定无疑地认为,就世界秩序通常以北京的普遍君主制为核心,通过神圣天命维持。穆斯林过去没有、现在仍没有在他们的思维中为国家这个抽象概念找到很多空间;对他们来说,信徒和非信徒的区别更重要。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没有任何科学的理念,这长时间以来也没引发什么困难。与此同时,那些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在他们心目中可以将世界分为“文明”和“不文明”,就像英国人可以马上在板球场上区分“绅士”和“恶棍”一样。

这种明显的分歧现在受到如此重大的侵蚀,标志着我们终于走向“同一个世界”的程度。中国的知识分子现在流行讲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即使在吉达和德黑兰,富有思想的穆斯林也必须面对这样一种,即在传统的影响力和至少对一个相异的现代主义危险的诱惑有一些了解的需要之间的张力。在 1947 年其领导人所设想的世俗民主价值与过去的吸引力之间,印度有时似乎也会出现精神分裂症般地撕裂。但过去总是与我们所有人联系在一起的,不论其是好还是坏。我们必须承认,历史依然散乱地夹杂在现状之中,且并没有出现即将走到尽头的迹象。

索　　引

（本索引条目后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B

D

E

G

H

I